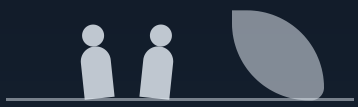


社会派悬疑 · 长篇

茶经楼下

竟陵白夜二十年



陆见微 著

· 全书十四章 · 约三十四万字

开 卷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湖北天门，西湖边的望湖茶仓里死了一个茶行老板。现场现金分文未动，只留下一张黄纸剪的「双童奉茶」。

此后二十年，天门人看着两个失去至亲的孩子各自长大：一个成了茶圣故里的名片「小茶仙」，把品牌做成产业，把旗舰店开进茶经楼的影子底下；一个从户籍里蒸发，活在别人的名字后面，每年只在一个日子露一次面。他们从未被人看见同行，从未说过一句被人记得的话；而靠近他们的人，一个个失足、失火、失踪。

退休老刑警竺长生揣着一张剪纸追了二十年。他追到茶经楼落成，追到追诉时效只剩一夜，追到那座九层的楼灯全亮、亮如白昼的一刻——才知道有些案子，从一开始就没有能递出去的手铐，只有一盏替人遮光的灯。

全书十四章，约三十四万字。社会派悬疑；本书向东野圭吾《白夜行》致意，承其叙事骨架（双主角全程他者视角、二十年罪案长河），人物、事件与文字皆为原创。本故事纯属虚构，地名景观仅作文学背景。

目　　录

序章　松风 …… 4

第一章　嘉木 …… 20

第二章　阴林 …… 67

第三章　雨前 …… 119

第四章　杀青 …… 161

第五章　渥堆 …… 204

第六章　封仓 …… 249

第七章　做旧 …… 290

第八章　洗茶 …… 337

第九章　出汤 …… 374

第十章　分茶 …… 415

第十一章　焙火 …… 462

第十二章　茶凉 …… 514

第十三章　白夜 …… 561

尾声　明前 …… 608

序章　松风

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五，夜里十点四十七分，刑警大队值班室的座机响了。竺长生值夜班，桌上摊着半本没看完的旧卷。报案的人就在西湖边上，风灌着话筒，话一句一句地断。竺长生把地名问了两个过：望湖茶仓。这个地名他有多少年没听人提起了，仓废了，地名还活在街坊的嘴里。

那天是入冬头一场霜。他把电话记录抄在本子上，叫上技术中队的两个人，又给大队长曹德贵挂了个电话。两台车一前一后出厂门，过陆羽公园那段湖堤，路灯稀，车灯扫过去，湖上的雾一层一层往后退。夜宵摊在收摊，泔水泼在路边，冻出一层亮的。堤上的柳叶子早掉尽了，枝条上凝着霜，车灯一晃，白花花的。到了仓前，两台车先后熄了火，谁也没有先下车，湖水的声音先灌进来。

望湖茶仓在西湖西北角，红砖墙，杉木梁，废了两年。早年间，松风茶行的茶箱一直堆到这里。拾荒的老汉蹲在板车边上，胶鞋帮上裂了口，人还没近，话先到了：这仓废了两年，前几晚都是黑的，就今晚，门底下漏灯光。他说他没敢喊，也没敢走，把板车横在路上，就在霜里站着等，站到脚麻。竺长生问他平常几时来这一片。他说隔天一趟，昨天来过，仓前头还黑着。

卷帘门落到底。锁挂在门里侧，铁链绕了三道，锁鼻好好的，外头没有一点撬痕。铁链上的锈叫手磨掉了一圈，露出新的亮。

“里头上着锁。”竺长生拿手电贴着门缝照了一遍，“人不是打门走的。”

记笔录的蒋阔那年三十岁，把这话又讲给老汉听。老汉点头，翻来覆去只讲他那一车废纸，讲他今晚本想在仓檐下避风。仓后墙根有一条排水暗渠，砖拱，半人高，直通河埠头。渠口的铁篦子早叫人撬了，扔在草里，断口是新的。泥滩上一行脚印，解放鞋，前掌深，后跟浅，朝外去。步幅小，一步挪不了多远。泥滩叫这一双脚踩熟了，脚印边上还有几片浅浅的印子，叫霜杀住了，看不真。

技术员拿毛刷在门内侧的铁链上找指纹。链环粗，纹路吃进缝里，刷了三遍，刷出来的是锈末。门闩上一层灰，灰上有两道新的擦痕，指头宽。挂锁的钥匙孔里也是灰，插进钥匙去，转不动——锁着的意思，是里头的人锁的。

竺长生问拾荒老汉，冬天夜里这片湖边还有没有人走动。老汉说没人，钓鱼的早歇了竿，鱼塘也干了，就他一辆板车。

三十三码。

竺长生蹲在脚印跟前看了很久。他四十七岁，头发白了一半，蹲久了膝盖响。技术员拿木条把脚印围起来，石膏粉兑水，天冷，凝得慢，这一模子要到后半夜才起得出来。石膏浆灌下去，咕嘟地冒泡，他蹲在旁边守着，烟抽到一半忘了弹灰。他让蒋阔带人沿渠两头走，自己弯下腰，进渠里走了一趟。渠里没水，烂菜叶冻在泥里，砖缝里结着蛛网，蛛网上也是霜。他数着步子走完，三十来步。手电的光扫到头，扫见河埠头石壁上一方黑黢黢的洞口。湖水拍着跳板，一下，一下。

卷帘门撬开，一股陈茶和潮气涌出来，里头混着一点别的味道，说不上来。应急灯挂在茶箱垛上，灯罩发绿，半仓的影子都往一边倒。挂钩上的钉子打进箱板，钉子还没生锈，装上没有几天，灯绳是新的，旧灯绳还在箱板后头盘着。电工凑近看了看，说这灯的电是满的，充上没有多久。

茶箱码出一条夹道，一人多高，走到底要拐两个弯，像仓里头又隔出一间小屋。箱子是杉木的，四角包铁皮，箱面上两个字：松风。摞到第七层，最上头压着半捆稻草绳。铁钉锈了，杉木缝里渗出陈年的茶香。别处的灰有铜钱

厚，蛛网从梁上挂下来，一碰就掉灰。夹道里的地却扫得干干净净，扫帚立在墙角，帚尖也是干净的。竺长生沿着夹道走了一遍，脚下茶末沙沙的。

沈松庭在那间“小屋”里。

五十一岁，松风茶行的老板。仰面躺着，衣裳齐整，颈胸之间一道创口，细，深，凶器带走了。血在身底下洇开，黑了。照相的闪光灯把茶箱一排一排照亮，又熄掉，仓里黑一阵，白一阵，给创口拍特写的时候，过片的声音在空仓里格外响。老法医蹲下去，用镊子拨了拨创缘，只说了一句：刃薄，单刃，进得深。又摸了摸尸僵，说，人死在九点到十一点之间。

夹道口的煤炉还温着。炉上一把铝壶，水熬得快干了，声音反倒细下来，比响的时候渗人。壶嘴里结着一层白垢。竺长生站在壶边听了一会儿。他小时候在茶馆里长大，柜上的老师傅说过，水开到这一步，叫松风。

老板死在松风里，炉子还替他烧着。

曹德贵在门槛上蹲下抽烟：“深更半夜，跑废仓里做什么营生。”

“做当铺的营生。”竺长生说。

街坊都知道，松风茶行半个当铺。茶饼押账，也放钱，利钱几分。有人拿祖传的镯子来换过冬的口粮，也有赎不回来的，缝纫机、自行车、皮箱，堆在店后头，落一层灰。拾荒老汉在门外插话，说西街一个寡妇，男人的遗物押了两年，去年腊月去赎，柜台说利滚利，赎不起了，人站在店门口哭了半条街。又说，掌柜的平日见人三分笑，收起账来是另一张脸。又说，松风茶行就一个儿子，书念得好。

死者左手边有只月饼铁盒，大红喜字剥落了一半。盒盖开着：两千三百元，一百的一张一张理得整齐；两枚金戒指，原样搁着。盒边压一沓当票，行里自印的格纸，一张一张编了号。头一张写着：女式手表一只。第二张：男式棉袄两件。字是账房体，一笔不苟。

“钱没动。”曹德贵说。

“钱没动。”竺长生说。

“那就是寻仇的。”曹德贵把烟头在鞋底摁灭，“天门城里恨他的，能排一条街。”

技术员把当票一张一张翻着拍照。死者贴身没有钥匙，柜上没有账本。做押店的人，账本不在身上，也不在柜上。竺长生把这一条记在本子上。他有个习惯，案子上的事记两遍：本子上一遍，心里一遍。

炉边一只小方凳，凳上一只玻璃罐头瓶，茶叶泡得发黑。灶台上还扣着一只，洗过，瓶底一圈茶垢。凳子的位置正对着夹道口，坐在这儿的人，看得见进出。竺长生走到凳子跟前，站着朝夹道口望了一眼，又回头看那只倒扣的瓶子。他没让人动。

他叫蒋阔把拾荒老汉的话又细问一遍：几时看见的灯，几时报的案，前几晚是不是黑的。蒋阔记了三页。

河埠头摆渡的老倌也叫寻来问了。他睡得晚，前半夜看见渠口有一点白光，压得低低的，一晃一晃，顺堤往南去了。他当是打鱼的，翻身又睡。

堤下头有一截跳板，空着，拴船的木桩上结着冰。竺长生站了一会儿，看雾从湖心往岸上搬。看鱼塘的窝棚黑着，塘早干了，塘底晒着几片破网。

夹道口倒着一只大茶篓，篾条断了几个头，茶末撒了半条夹道。篓沿上挂一根红头绳，褪成粉白，挽着个死结。竺长生捏起来看了两遍，又原样搭回去。这一样，他没让它进勘查记录。

剪纸是在两垛茶箱的缝里发现的。黄纸，比巴掌大一圈，边上有折过的印子，折过又展开。两个小人牵着手，站在一棵树底下，高的那个双手托着一只小碗。树枝的剪法是一气连下去的，一刀不断。刀口细密，收口的尖一律朝左下斜。他小时候看西湖边的茶祭，纸匠剪过这个样子，老辈人叫“双童奉茶”。

他用镊子把纸夹到绿灯底下看。两个小人的手在纸上搭着，从头一刀到末一刀，纸没有断开过。树干上有两个节疤，也剪出来了。

“烧寒衣的纸。”曹德贵拿手电拨了拨，“扫进杂物袋。”

寒衣节过了半个多月了，竺长生想说。纸也没有烧过，剪得整整齐齐，压在死人的仓里。他把话咽回去，趁人收拾器材，拿证物袋把它单独收了，拍照，登记。登记册上写的是：杂物，黄纸一张。

曹德贵看他装袋：“一张纸，留它做什么。”

“留个样子。”

“样子有什么用。”

“纸上有手。”竺长生说。

曹德贵摆摆手，招呼人抬箱子去了。

指纹刷在茶箱上扫了半夜，扫出来的全是灰。柜台的抽屉半开，里头一把算盘，珠子拨到一半。像是算到一半，人走开了，再没有回来。

天快亮的时候，尸袋抬出去，茶末地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从夹道口一直拖到门口。拾荒老汉把脸别过去，看他那一车废纸。

围看的人站满了堤，缩着脖子，哈出的气是白的。人群里有半大的孩子追着问死了几个，叫大人拧着耳朵拖回去了。老人讲，望湖仓早年是公家囤茶的地方，后来折给了私人；讲沈松庭起家，是挑担子下乡收茶起的家，秤上做过什么手脚，各人有各人的讲法。有个提篮子的老娘子插话，说上个月还见掌柜的在云香居打牌，输赢不大，牌品好。

后半夜，竺长生到仓外站了一阵。湖风把烟吹斜，废仓的窗洞一个一个黑着，雾从窗洞里过。曹德贵隔着门喊他，说排查还是要快：查账，查仇家，查流窜，三条腿走路，哪条腿硬走哪条。竺长生说，暗渠里外都熟的人才走那条道。又说，仓里夜里有两个人喝茶。曹德贵弹了弹烟灰，说，又一个是你编的。烟头亮了一下，两人都没再讲。

回到队里，他调了望湖仓的底档。仓是九几年抵给银行的，这两年一直空着，钥匙在谁手里，档案上没有下文。他把这一条也抄进本子。

天亮前收队。石膏模起了出来，鞋纹清清楚楚，包上报纸，登记在册。河埠头的雾漫上堤来，湖水在跳板底下响。队里来换班的车停在堤上，蒋阔连打了几个哈欠，纸杯里的茶冻透了。

竺长生没有回家，坐在车里就着顶灯翻笔记本。他写：暗渠，三十三码。这一行底下，他画了一道。写：柜上无账。写：两只瓶子。最后写：持剪者，手小。

案子过了两天就传遍了竟陵。茶行老板夜里死在废仓里，说法一天一个样：谋财的，寻仇的，过路劫道的。只有仓后那条暗渠，没人提。

过了几天，他从技术中队的杂物堆里把那张黄纸换了回来，登记册上的字没有改。原件收进他家里米面柜的夹层。干了二十多年刑警，这是头一回，他把证物揣回自己家里。

曹德贵敲了敲车窗，隔着玻璃打哈欠：“回去睡一觉。流窜的，天亮就结案。你莫魔征。”

◆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星期一，竟陵二小早读铃照常响。五年级二班六十三个人，点到名的六十一个。第三组倒数第二排，两张课桌空着，一张靠窗，一张靠门。

毛慧芳教了二十三年语文，这个班是她从四年级带上来的。早读的书声拖得长，从窗口漫出去，操场上雾没散尽，国旗的绳子敲着旗杆，叮，叮。窗玻璃上蒙着雾，值日生拿抹布擦出一块圆，不到第二节课又蒙上。点名册上，她把靠窗的名字圈了一道：沈嘉木。又把靠门的名字圈了一道：苏穗。

沈嘉木是礼拜三回来的。人跟上礼拜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袖口上多了一块茶渍，洗过了，还剩一片浅褐，像一小张地图。上课他不大抬头，手在课桌肚里动。毛慧芳走过去，从桌肚里收上来一把剪刀、七八张纸。纸是作业本撕的。纸上是人。站着的人，坐着的人，手拉手的人，一个一个，全都没有脸。

没有眉毛眼睛，两片光溜溜的。人倒有高有矮，衣裳上还剪出细密的褶子。她把纸对着窗上的亮翻过来看，刀口很小，很密，收口的尖都朝一边斜。

第二天美术课，剪纸是那一周的功课。别的娃剪窗花，剪喜字，他的剪子上来又下去，纸上又出来一个没有脸的人。美术老师拿起来看了看，说手上有功夫，剪个带脸的吧。他没接话，接着剪。美术老师还看出一桩，他是左手使剪，剪出来的口子倒匀净。老师把这话当趣事讲给毛慧芳听，毛慧芳没笑。

又过了两天，毛慧芳上课板书，听见后头有剪刀似的轻响，一下，又一下。她回头，他的手摊在桌面上，什么也没有。这样有三回。第四回她没回头，下课把那把剪子又收进了讲台抽屉。

课间操他不下楼，一个人在教室里摆桌子，一张一张对齐，横平竖直。做操的音乐从操场传上来，喇叭里带着电流声。

她把那些纸压在讲台上，剪子收进抽屉，说放学来拿。放学他来了，取了剪子，说了一声老师。那声老师平平的，不带高矮。

礼拜四下午，她把沈嘉木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生着一只蜂窝煤炉，炉上坐着水，没人喝，白冒气。她说家里出了事，这几天落下的课，老师给你补。

沈嘉木抠着橡皮，把橡皮抠出一个坑。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爸死了。”

就这一句。再问，他看自己的手背。手背上有两道红印子，像冻的，又不像。毛慧芳换了个问法，问这两天的饭是谁做。他说他自己做。问衣裳谁洗。他不答了。她抽出他四年级的作文本，那时候他写过一回《我的爸爸》：我爸爸的茶行里有一杆大秤，称茶，也称人拿来的东西。字歪，笔画压得纸起毛。她把本子推过去，他看了一眼，推回来。上课铃响了，他把橡皮屑拢到掌心，倒进纸篓，说：老师，我回去了。毛慧芳站在窗口看他穿过操场。他走得很慢，不跑，也不停。

• • •

苏穗也是礼拜四来的。三天没来，衣裳反倒齐整了：红呢子外套，纽扣一直扣到领口。辫子梳得紧紧的，扎辫子的红头绳是新的。轮到她那一组值日，她把黑板擦得比哪一天都干净，粉笔灰掸进簸箕，掸了三遍。落下的作业补得整整齐齐，只是补的那几页，纸的颜色跟原来的不一样。字比先前还小，还齐。

有一回课堂领读，她站起来读课文，又平又稳，一个字不错，不快，也不慢。读到一半，毛慧芳叫停，全班这才动起来。同桌跟她借尺子，她递过去，接回来，都用两只手。发新本子的时候，她包书皮包得平平整整，四个角折得一样大。

毛慧芳在教室后门问她，这几天怎么没来，家里也不捎个信。

苏穗看着她身后头的大门。“我妈让我在婆婆家睡的。”

声音不高，像背书。问婆婆家远不远。她说：“远。”问睡得好不好。她说：“好。”下课铃响了，她说：老师，我进去了。门关上，走廊里就剩毛慧芳一个人，站了一小会儿。

礼拜五早读前，毛慧芳抱着两摞作业本上楼。走廊东头，苏穗一个人站在窗前，玻璃上蒙着雾。听见脚步声，她转过身，贴着墙根让开，喊了声老师，声音不大。毛慧芳进了办公室，隔着门上那块玻璃又看了一眼。走廊空了，窗上留一小片呵气化开的印子，正在慢慢收。走廊的窗子缺了一块玻璃，报纸糊着，糊了一层又一层。

第二节课前，还是这条走廊。沈嘉木从东头慢慢走过来，书包带子松了一根，鞋尖上沾着灰。他在办公室门口顿了顿，没进来，转身走了。毛慧芳追出去，走廊两头，一个人也没有。水磨石的地面刚拖过，两行湿脚印，一行朝东，一行也朝东，都不是他自己的。

礼拜五放学，她留下沈嘉木补课。他一笔一画写了半页，字越写越大，把一行挤满了，笔画出了格。毛慧芳看了看，说明天再补。他把本子收进书包，

说：老师，我走了。写满的那半页，她后来夹进他的成绩册里。散学的时候册子交回来了，家长签字那一栏签了字，笔画很重，一撇一捺都按进了纸里。

那天办公室里没人。毛慧芳对着自己那杯茶坐了一会儿。有一句话她存了很多年，退休教师的酒席上才说给人听：这两个伢，像两扇关紧的门。

席上没人接她的话。

· · ·

头一个礼拜天，毛慧芳去家访，先去的城西云香居。出门早，先在西湖路口吃了一碗黄潭米粉，鳝鱼臊子，碗沿一圈红油，吃到一半就凉了。账桌上有人扒算盘，扒的是别人的数。

云香居一楼是铺面，卖百货，柜台上摆着成排的搪瓷盆。二楼摆四张牌桌。木楼梯又陡又暗，拐角贴一张褪色的价目表，她上到一半，牌声先下来了。楼道里堆着白菜和蜂窝煤，扶手上黏的，窗台搁着两截吃剩的甘蔗。苏彩娥坐在门边那桌，手边一缸子酽茶，烟灰缸满了，还有人往里弹。她手腕上一只镯子，推牌的时候哗啦响。

毛慧芳说明来意。苏彩娥摸牌的手没停：“老师坐。”又朝柜台喊倒茶。

“苏穗这几天在学校，还好？”

“好。”

“前头几天怎么没来？”

“在婆婆家睡的。”苏彩娥碰了一张牌，推倒，“苏穗命硬，好带。放她婆婆屋里，我放心。”

毛慧芳又说功课，又问娃晚上睡得踏实不。苏彩娥这回转过脸来，笑了：“老师，她有什么睡不踏实的。”又问成绩册上的评语写的什么。毛慧芳说，写的好。她说：“好就行。认得字，会打算盘，就够了。”牌桌上有人替她答：小孩子家，认得两个字够用了。一桌人都笑，码牌，洗牌，牌声哗啦哗啦。对家的男人接了话头，问毛老师放不放寒假，放了他好把孙子送乡下他姥

姥屋里去。里屋的门帘垂着，帘子后头没有一点声音。毛慧芳下楼的时候，牌声又密起来，把她的脚步声盖住了。走到楼梯拐角，帘子那边响了一下，像有人掀开一角又放下。她回头，帘子还是垂着的。

第二个是离学校两条街的松风茶行。

卷帘门放下一半，进去要弯腰。店里暗，茶叶的陈味压着，货架空了一半，样茶的罐子东一个西一个。茶箱上蒙着灰。柜台上压着一沓送货单，最上头那张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七。柳文霞坐在柜台里头的灯底下拆毛衣。深灰色的，男式高领，下摆没有收针，一只袖子已经织成了。拆下来的线绕成圈，一圈一圈套在膝上，她的手很稳。

收音机没有开。墙上一只挂钟，满屋子都是走针的声音。

“嘉木在学校，还听话吧？”她先开的口。

“功课落了些。”毛慧芳说，“家里的事，要是有什么难处——”

“没有难处。”柳文霞把绕好的线按了按，“他爸的事，跟他不相干。”

毛慧芳坐了一会儿，没话找话，说嘉木手工课的剪纸剪得好。绕线的手停了一下，就一下。

“剪那个做什么用。”柳文霞说。

柜台上倒扣着一把铜壶，壶底是干的。炉膛是冷的，炉边一副火钳也没了灰。楼梯口黑着，楼梯扶手上搭着一条孩子的围巾，蓝的，洗得发白。毛慧芳朝上头望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她走的时候回头，柳文霞还坐在灯底下，绕线，一圈，又一圈，拆完的那只袖子摊在竹篮里，像一段褪了色的肠子。

两个家她都是天黑以前出来的。回去的路上她想，云香居吵成一锅粥，里屋倒没有一点声音；茶行安静得听得见钟走针，楼上也没有一点声音。这安静不像丧家。她没让自己往下想。

礼拜一讲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收上来六十三本，有一本只写了题目，底下空白；还有一本，题目写了，正文只有一行：我爸爸做事的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秤。毛慧芳把那两本摞在一起，看了很久，放了学才发还。

还有一桩事，她搁了两三天。班里这两个孩子都剪得一手好纸。前年工人文化宫办少儿剪纸班，班里送去过四个人，两个都在里头，先生是个姓齐的退休裱褙匠，手艺人的规矩大，一个学期只收十来个娃。她想跟办案的公安提一声，又怕人家笑话，小孩子学手艺的事也当线索；更怕给两个孩子惹祸。夜里她翻出旧教案，在背面把这桩事写了三行，看了一遍，又拿铅笔头涂掉。拖到下个礼拜，她往办案点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问，先生叫什么。她说，齐守拙。那边嗯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放寒假前一天，冻雨下了一整夜。屋檐上的冰凌一根一根，敲下来当当的响，操场上的篮球架冻了一层亮壳。操场东边两棵挨着长的水杉，靠外那棵拦腰折了，斜砸在里头那棵的枝桠上。里头那棵还立着，半边的枝子断了，断口白得扎眼。

散学典礼上，苏穗上台领了奖状，鞠躬，下台，掌声没落，她又回身鞠了一躬。台上念她名字的声音通过喇叭，操场四角都听得见。散了学，毛慧芳收拾讲台，墙角纸篓里有几团剪坏的纸。摊开看，是人的胳膊和腿，没有脸。

成绩单发下来。教务处的红榜贴在传达室外头，苏穗的名字在第一个，两张卷子都是一百分。沈嘉木的名字要顺着往下找，总评从上学期的前十掉到倒数第五，算术卷子大半空白。

发成绩单的时候，苏穗那张头一个发。她双手接了，说谢谢老师，鞠了一躬。

沈嘉木那张，毛慧芳留到了最后。放学的铃声响过，教室里的人走空了，他才上讲台来接。他看也没看，折成两折，放进书包最外头的一个兜里，拉链拉上，背起书包出门，走廊里他自己的脚步声跟了他一路。

毛慧芳把两页成绩单并在桌上，看了很久。办公室里的人在议论冻雨，说年跟前还要冷。她说了一句：“倒了的那棵，是替那棵挡了风的。”

没有人听懂。

◆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初，松风茶行的卷帘门照旧放下一半。老板的丧事办过了，老板娘柳文霞发话，门面不开，货不动，公安还要来。曲健每天上午去开店门，卷帘门拉起来一半就插销，半人高，进出都要低头。麻雀在檐下躲夜，门一响，扑棱棱飞出去。他抹一遍柜台，下午守着半间黑店坐到天黑。早饭在街口买两个锅盔，一边走一边吃，芝麻掉在前襟上，他拿手掸掉，掸不净。

曲健四十岁，在这个铺子里站了十七年柜台。称茶，打包，记账，送货，一把杆秤使得比谁都熟。柜上那杆秤他还天天擦，秤砣上拴着一截红头绳，是老板当年拴的，他一直没解。茶样柜的抽屉他挨个拉开又推上，钥匙还是原来那一串，就是秤砣上叫人摸出来的那一层亮，如今暗了。他原来还兼烧水待客，如今那把壶他不敢烧。水一开，呜呜地响，满店都是。他把火撤了，客人来了，倒凉的。

公安来寻他，一共三回。

头一回是案发后第三天，在城西的办案点。一间临街的屋子，两张桌子拼着，记录的刑警坐对面，问话的四十来岁，桌上一个搪瓷缸，一个硬壳本。问的是账：茶行押出去多少茶饼，放出去多少账，利钱几分。曲健一条一条背，背到半夜，记了四页，念给他听，念到“利钱几分”，记录的刑警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念得重了些。他按了手印，指头上的印泥冻得发硬。屋里生着铁炉子，他坐的位置背对着门，风一进来，后颈一阵一阵地凉。回来路上他在铺子门口买了包烟，多给了五毛钱，没等找零就走。

第二回隔了五天。这回问那一晚。他说他在家睡觉。问家里几口人，他说一个人。问话的还是那个四十来岁的，眼睛不重，问得慢，一句一句，像往秤盘里添砝码。他答一句，秤上添一句。问到后半夜，那人合上本子，顿了顿，又问：你老板生前，常带什么人去仓里。他说，送茶的，收账的，常来常往。那人看了他一阵，没有再问，说，回去吧。出来的时候，后背的衣裳贴在肉上。

那晚他不在家。汉北河老桥底下有个流摊，夜里推牌九，柴油灯照着一圈手，桥洞里全是水汽和烟。桥头卖烤红薯的认得他，那晚招呼他，他没应。他那晚手气顺，赢了两百四十块，钱卷在一块手绢里，压在铺子后屋的席子底下。他数过两遍。花不敢花，丢不敢丢。这一摊的事他不能说。说了，头一条说不清的是他为什么连着一个月夜夜在外头；第二条，老板娘也知道他夜夜在外头。两句话一碰，就拴到一处了。

第三回在十二月初。这回不问账，也不问那晚，问他跟老板娘处得怎么样。他说，老板娘待他不薄。问的人把本子合上，说，回去吧，想起来了再来。出来路过办案点对面的杂货摊，摊主招呼他，你又来买东西？他说买烟。烟买了，没抽，夹在指头里，烧到指节才丢。摊主找他钱，一枚硬币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他站着看它滚停。

那些天公安把仓里每一只茶箱都拍了照，编了号，粮站的人讲得有鼻子有眼。货还照送，只是望湖仓那条巷子，曲健绕着走，多走两条街。夜里他起来两三回，摸一摸门闩。盘账的时候他发现，抽屉里的现钱短了一小沓。他把账本合上，没有作声。

他和文霞的事，店里没人明说过。可送茶的、进货的，眼睛里都有数。这事如今成了一根线头，他夜夜睡不着，就捏着这个线头看：一扯，是他；再一扯，是她。扯断在哪儿，他不看。有一晚他蹲在后门口抽烟，把出事那晚从头到尾数了一遍：几时接的电话，几时出门，炭多重，路多长。数完了，只有那一眼，数不进去。烟头一亮一亮，照见他自己的鞋尖。

他往下数着日子过。广州的表哥上月来信，说灯饰仓缺个管账的，一个月八百，包住。他把信折成四折，垫在烟盒底下。店门上了双锁，钥匙分两处放。后屋的账柜他夜夜上锁，钥匙拴在裤腰里，睡觉硌得慌，他没换地方。

还有一桩事，他谁也没有说。

出事前十来天，一个落雨的傍晚，老板打电话叫他往望湖仓送炭。电话是店里的座机打到他屋里隔壁小卖部的，响了很久，他才趿着鞋去接。仓里早不

用炭了。他冒雨去了，巷子里的水顺着车辙淌，两筐炭压得扁担直颤。卷帘门开着半边，里头亮着灯，沈松庭站在门里头，牵着苏穗的手腕。那孩子他认得，拣茶零工苏彩娥的丫头，来店里拣过茶，头发叫雨打湿了，贴在腮上，鞋尖全是泥。

老板回头看了他一眼："炭搁下就回。"

他把两筐炭卸了，肩上的雨珠子甩了甩。仓里飘出陈茶的气，还有算盘珠子的响，噼里啪啦一阵，停了。炭筐落地的时候，那丫头往门里退了半步，手叫牵着的，退不进去。出门的时候，卷帘门在背后哗啦啦落下来，落到底，又响了挂锁的声音。回去的路上他把手笼在袖子里烘了烘，炭末子黑，指头缝里黑了三天。

他往牌摊走，一路把这一眼往轻里压：大人的事，掌柜的事，关他一个伙计什么相干。天黑，雨大，他连那孩子的脸都没有看真。

如今掌柜的死在那间仓里，这一眼就没法再往轻里压了。它夜里自己回来。曲健躺在床上睁着眼，把它按下去：没看清，就是送炭。按下去，又浮上来。有时候他往好处想：兴许是那丫头家里有难处，掌柜的发善心，送她几斤茶。这么一想，也就睡得着了。睡得着两三天，第四天夜里，它又回来。天亮起来，眼皮上一层青。

他跟公安说的还是那句话：在家睡觉。这话说了第二遍，就有点像真的了。说了第三遍，他自己的记性也跟着改了。牌摊上的那一晚，他也在黑暗里过了几遍，先摸牌，再点钱，几点到，几点走，一样一样排好，排得像真的一样。

· · ·

十二月里一个夜里，柳文霞把他叫进后屋，门上了闩。后屋门后有一双他的旧棉鞋，落了灰，他看了一眼，没动。床头一只闹钟，指针停着，她一直没有上弦。五斗柜上立着一帧放大的照片，沈松庭穿着呢子中山装，两枚章一样亮。她提灯过来的时候，顺手把相框扣下了。她给他沏茶，滚水冲下去，茶沫

子浮起来，她盯着那把壶，看到水响小了，才把壶挪开。灯泡上包着一层报纸，光发黄，照见她手上的指节，拆毛线磨得发红。

“大队里又寻你了？”

“寻了。”

“问了什么？”

“问我和你。”

柳文霞端碗的手停了停。她把茶碗放下，从针线笸箩底下摸出一只棕色小药瓶，往掌心里倒药片，一片，一片，又一片，数到八，又一片一片装回去，拧紧盖子。笸箩里还有一团线，深灰的，跟柜台上那件毛衣是一个颜色。

“安定。”她说，“医生开的，失眠。”

“我没问你这个。”

柳文霞又问，那仓里如今是什么样子。他说不知道，他没有进去过。说完他喝了一大口茶，茶酽，烫，他咽得慢。她提壶给他添水，壶嘴对着碗口，添到七分，停了。挂钟走针。两个人都没说话。灯泡里的钨丝嗡了一声。后来柳文霞说：“过户的事你去打听，公安几时放卷，茶行几时能过户。”

曲健说好。隔了一会儿他问：“那晚你在屋里？”

“数钱。”柳文霞眼皮都没抬。

曲健没再问第二遍。他把茶喝完，茶是酽的，苦得挂喉咙。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健哥，店里那笔账，你心里有数就行。”

他嗯了一声，把卷帘门落下一半，站在门口抽完一根烟。街对面早点铺的灯亮了，揉面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过来，蒸笼一揭，白气漫过半条街。他抬头望了一眼，二楼的窗户里，柳文霞端着灯从这头走到那头，走到那头，又走回来。天又要亮了。

那几夜他夜夜做梦。梦里他总在望湖仓的夹道里，茶箱码到一人高，杉木的气味压得人喘不上来，应急灯是绿的。箱板上有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认不出。梦里也有水声，远，一下，一下。他的鞋是干的，他记得那晚下着雨，鞋不该是干的。走到某一步他站住——板缝后头有一双眼睛，不大，也不眨，贴着那道缝，看他。他在梦里想跑，腿是别人的；喊，喉咙里没有声。有一夜梦里那双眼睛不在了，板缝后头空着，他反倒站住了，不敢往下走。

他坐起来，摸火柴，划了三根才点着。烟抽到一半，借着火柴光看了一眼桌面：表哥的信还在，四折，垫在烟盒底下。信上写着，这边冬天不冷。他把这一句又看了一遍。

烟灰长了一截，掉在信封上。他拿指头把灰抹掉，抹得很慢。窗纸有点发白。窗台上那盆蒜苗冻死了，叶子塌着。他起身把门闩摸了一遍，冰的，好好的。躺回去，又把席子底下那卷钱摸出来看了一眼，再放回去。黑暗里他说了一句：

“关我么事。”

第一章　嘉木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竟陵落了三场霜。西湖沿的柳条一夜比一夜硬，早市的棚布压得低低的，卖锅盔的炉子贴着布，白气从破口里一股一股往外冒。修鞋的把锥子在灯上燎了燎，缩回袖筒，半天不伸出来。

鸿渐路口的茶庄还开着两家。南街永昌的陈老板念旧情，仍把拣茶的活计发给苏彩娥。松风茶行的卷帘门锁了一个多月，门上贴过一张白纸，风吹雨打，只剩四个角，风一过就抖，像要开口，又咽回去。一街的人路过，脚步都要慢半拍。

这天早上去领茶，陈老板蹲在店堂里剪茶样，抬眼看她，往里让了让：″今年的散货少，你手稳，给你留着。别家我不敢发，发了拣不匀。″

她把茶包上肩：″我拣得快。″

″晓得你快。″陈老板把剪刀放下，声音压低了，″松风那边的事，你莫往心里去。外头的话，风一吹就散。″

她应了一声，出门。茶包压在肩上，一路没歇。路过松风茶行，她隔着街看了一眼：卷帘门底下，扫出来一小堆烟头，七八个，都是同一个牌子。松庭抽的也是那个牌子。她把这一眼收起来，赶紧走过去了。

拣茶要拣三道。梗归梗，叶归叶，黄片另堆一堆。竹匾架在窗根底下，冻手，她把两手拢进腋下焐热了再下匾。指尖先掐梗，再片叶，拇指上的茧一年厚过一年。拣得快，一天能挣十二块钱。

十二块钱，牌桌上两把牌的事。

云香居的账，她还欠着郑胖婶四百二十块。十一月里输出去的，当时想得简单，松风茶行的工钱一发就还上。如今工钱没了来处，账还挂在郑胖婶墙上那本流水簿子里，一笔一笔，墨迹清清楚楚。

腊月里郑胖婶寻到巷子口来过一回，没催账，只把一包冻鱼塞给她，说：″年前把账清了，清了财气才进得了门。″

彩娥接了鱼，笑了一笑：″晓得。″

″我不催你。″郑胖婶说，″我是讲给你听，让外头人听的。账挂在你名下一天，就有人说一天。你清了，话就断了。″

彩娥点头。两个人在巷口站了站。风从湖那边过来，郑胖婶把围裙角掖了掖，到底没提西湖里那桩事，转身走了。走出巷口，她又回头补了一句：″孩子的脚长得快，鞋莫买得太合脚。″

腊月初，她去松风茶行讨过一回工钱。十一月她拣的末一茬茶还压在人家库房里，账没结。卷帘门底下的缝里黑着，她敲了三下，里头有搬东西的响动，没人应。她又敲，响动停了。她隔着门缝说了工钱两个字，里头还是没人应。

回巷子的路上碰见裁缝铺的老板娘，正在门口掸灰。老板娘压着嗓子说，松家那个伙计，带人清了两回货了，一夜一夜地搬。她点了点头，把肩上的茶包往上颠了颠，没接话。

穗在城西小学读六年级。放了学回来，书包立在门边，先洗手，再写字。这孩子干净得不像从她身上掉下来的。早上她带穗去街口吃一碗黄潭米粉，鳝鱼臊子盖在面上，红油浮着。穗只吃半碗，剩下的拨到她碗里，自己喝汤，喝得慢，一滴不洒。

学校要收八块钱资料费。穗没开口，把单子折成小方块，压在她的枕头底下，姓名那一栏自己填好了，笔画压得整整齐齐。她早上铺床看见了，捏着那个小方块站了一会儿。这孩子要钱从来不开口。她把钱夹在单子里塞回穗的书包，也没讲。

期中考那天她提早收了工，站在校门口等。放学的孩子潮水一样涌出来，穗走在最后。她问考得怎么样。穗说，卷子答完了。三个字，再多没有。回来的路上她给穗买了一块糖塑，吹糖人的老汉把糖吹成一只公鸡，穗举着，举到天黑也没吃，搁在窗台上。第二天糖化了一半，粘在窗纸上，她拿温水一点一点替她擦了。

新棉鞋是上礼拜的事。她趁穗睡熟，拿纳鞋底的棉线沿着旧鞋底绕了一圈，又拿手指头伸进新鞋里试松紧。西湖路夜市最末一个摊子，不讲价，十五块。她把鞋塞在穗床脚下。天亮穗穿上了，鞋带系了两道，没说一句话。

她伸手摸了摸穗的头。手放上去，像放在一口井沿上。穗一动不动，睫毛都没颤，只把作业本往灯底下挪了一寸。

就这一寸，苏彩娥看了一年，没有看懂。

· · ·

夜里她数钱。卷了角的票子一张张抹平，压在席子底下。数着数着，就想起松风茶行那间铺子。柜台旧了，算盘珠子却新，松庭拨起账来脆生生地响，一把零钱数得比银行柜上还齐整。这个人死了快一个月了。

外头的话她听得全。茶行老板死在自家仓里，铁柜的现金一分没动，说是贼，又不像贼。公安来过两回，问她欠不欠茶行的账。她说欠，欠两个月拣茶工钱。这话半真半假。真话她不说。

真话铺在里屋床上。一床大红的缎子被面，灯底下淌光，办喜事的料子。去年腊月松庭用报纸包了送来，说是工钱的添头。她收下了，手没抖。穗的学费，穗头上那根红头绳，她腕上这只银镯子，一笔一笔，都有来处。

入冬前他最后一次来，把一沓钱压在腌菜坛子底下，说穗明年的学费先放这儿。她说这怎么好意思。他说，你把孩子养得这样干净，也有功。人说完就走，鞋底不带一点泥。

这句话她当时当体面听。如今再想，细想不得，一细想就想到底下去。

被面她翻出来看过两回。一回想抱去当掉，一回想压在箱底，等穗长大了办嫁妆。后一个念头把她自己吓了一跳。她把被面叠得棱是棱角是角，塞回箱底，压上冬衣。

她夜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说给自己听：我冇卖她，我是让她讨生活。

这句话讲熟了，像数钱，一遍比一遍顺。

入冬以后，穗不扎红头绳了。那根头绳收在针线筐最底下，蓝布包着。彩娥翻针线筐时看见了，想是孩子大了，嫌红头绳土。她捏着那根头绳站了一会儿，又放回去了。

穗也更静了。饭吃得少，碗洗得干净。有一夜她起来喝水，看见穗屋里还亮着灯。门缝里那孩子盘腿坐在床上，手里捧着什么，一动不动。她推门进去，穗把手里的东西拢进被子，闭上眼。被面鼓着一小块。

她没问。问了也白问，这丫头从会走路起就省话。

十二月中，她带穗去湖边汰衣裳。石阶上冻着一层薄冰，木槌下去，冰碴子乱蹦。她拧衣裳，穗学着拧，拧得小手通红。有一件是穗自己的罩衣，孩子不让代劳，按在石板上捶，捶一下，数一下。她说手要冻坏的。穗捶完了，把手拢进她的手心焐着，焐了一会儿，又慢慢抽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湖面的雾起来了。穗在前头走，影子拖得老长。她在后头看着，想起这孩子落草那天也是这样的雾。稳婆讲，起雾天生的是金贵命。她那时信了。如今她不讲金贵了，她只讲命。

十二月下旬的一个夜里，穗发了烧。她起来摸孩子的额头，烫手，就着煤炉熬了姜汤，一勺一勺喂。穗闭着眼咽，不出声，汗出了一层又一层。后半夜烧退了，那孩子翻了个身，说了半句什么，含在喉咙里，没说全。

她坐在床沿听着。窗纸外头有风，湖那边一声水响。她把被角掖好，回到自己床上，天亮前眯了一觉。

过了几天，牌桌上有人捎话，松庭家发丧，问她去不去吊。她把筷子放下，又端起来。她没去。她在自家巷口站了半晌，看花圈从街那头抬过去，白纸扎的仙鹤在风里一伸一缩。吹鼓手的调子拐了三个弯，散在霜里。

金主没了。这四个字她不敢往细里想。往后穗的学费找谁添，自己的账拿什么平，拣茶的活计还能发到几时，她把这些一样一样码在心里，像码竹匾里的黄片。码平了，面上看不出什么。

又过两天，她去云香居坐了两圈。手气平，输赢不大，赊的。牌桌上没人提松庭，只说今年茶价贱，棉价更贱，收棉花贩子压秤压得凶，棉农把棉花挑到站上，过完秤脸都是白的。隔壁桌的春芝隔着过道喊：″苏大姐，松风的工钱，跟你结清了没得？″

她摸牌的手停了半拍。

″结清了。″她说，″打好你的牌。″

那一夜她输了两块八。散场出来，湖上的雾贴着街面走，她走了半条街才到家。

腊月里的话越传越全了。有说贼进仓偷茶饼，被老板撞见，动了刀；有说外路来抵账的，抵出人命；还有说得有鼻子有眼，说那晚仓里亮过手电，亮了两晃就灭了。三个说法，三副讲法，没有一个人讲得出凶手姓什么。她听着，拣茶的手不停。这些话跟她隔着一层竹匾，隔着几十块一天的日子。她只求一样，话别往穗身上引。

过了几天，她在派出所门口站过一回。蓝底白字的牌子挂得端正，台阶扫得干净，一个民警端着搪瓷缸子进去了。她上了两级台阶，又退下来。风把围巾吹起一角，她按住围巾，转身回家，路上买了一斤藕。

再过两天，她出门倒煤灰，回来在门缝里摸着一张纸。折成四折，横格纸撕下来的，边口很齐，铅笔字，笔画很轻，一笔是一笔，像学生誊课文：

″一月九日晚上，望湖仓后门，拿回你的账。″

她捏着那张纸在门槛上坐了很久，灶膛的火气烘着膝盖。看了三遍。头一遍看的是内容，第二遍看的是字，第三遍什么都没看，纸上的字自己往眼睛里钻。

她把纸折回去，塞进灶膛。火苗舔上来，她先把手在褂子上擦了擦，才敢往里添柴。烧纸的气味散不掉，她把窗户开了一条缝。

那一夜她没睡踏实，梦里全是拣茶，梗挑不完，筐满了又满。天亮她起身，把屋里屋外扫了一遍，又把腌菜坛子挪开，看了看坛子底下。砖是原来的砖，砖上什么也没有。她把坛子搬回原位，压了压，在围裙上蹭了蹭手。

白天她照旧拣茶。竹匾里的黄片堆成一座小山，她抓一把，撒下去，再拣。窗纸上映着日头，一寸一寸挪。穗在里屋写字，笔尖沙沙的。她听着那沙沙声，心里那点烧剩下的灰，也跟着一寸一寸落定。

她想去报警。套鞋都穿上了，又在门槛上坐了回来。

报什么？说有人约她去茶仓后门对账？她跟松风茶行有什么账，公安顺着账翻，翻得出缎子被面，翻得出银镯子，翻得出穗的学费，翻得出腌菜坛子底下那一沓。城里人的舌头没有闸，嚼到她这里从来不停，再往下嚼，就要嚼到穗身上。

她认定是松庭那边的人。老板没了，账房的烂账总要寻个由头清一清。清谁？清她这样手上拿过东西的人。她把一年的账在心里过了一遍，记得起的都记了，记不起的，夜夜做梦接着记。

也有一根细念头，细得像拣出来的茶梗：万一是还东西的呢？万一把镯子还她呢？她把这念头掐了。掐了又生，生了又掐。到后来她不掐了，由它在心里烧，烧一夜，天亮就是灰。

一个大晴天，她踩着板凳擦房梁，穗在底下扶凳子。扫到里屋，她把席子掀起来晒，压席子的钱数了两遍，挪进枕头套，缝了两道线。墙角她垫了块新砖，把腌菜坛子摆得端端正正。屋里收拾完，亮堂了，她站在当中看了一圈，像在看别人家的日子。

一月八日夜里，她把衣裳换了三回。厚褂子，薄褂子，又换回厚褂子。四百二十块钱她数出来，压在席子底下最上头，一张一张理得整整齐齐。她对着镜子把头发抿了抿，抿了两道。穗屋里的灯灭了，她推开一条门缝看了看，又轻轻带上门。

回到自己床上，她睁着眼听到鸡叫。她想，账这个东西，躲是躲不过的，早对晚对，都是对。

· · ·

出了元旦，雪化了一半，街沿白天是泥，夜里冻成一层壳。一月九日这天她拣完了茶，天黑得早，灶上煨了饭。她换了件厚褂子，跟穗说去对个账，早去早回。

穗坐在灯下写作业，头也没抬。

巷子口有人喊。云香居的老位子上三缺一，郑胖婶的嗓门隔着两条街都听得见：″苏彩娥！来不来？三缺一！″

她回头应了一声：″去去就回。″

湖上的风顺着巷子灌进来，带着水腥气。她把围巾掖了掖，朝河埠头那边走。灯火一段一段稀下去，铺子的排门都上了，只有望湖仓那截路上黑得实在。她的影子在墙上拉长，缩短，又拉长。

◆

二〇〇五年腊月，桥东巷的沈家比往年冷。门框上的旧春联褪成了粉色，没人去撕，也没人换新的。灵位撤了，香炉收上柜顶，屋里剩一股散不掉的香灰味。白事剩下的花圈拆了纸，竹架子劈了当引火，只有那只纸仙鹤压瘪在床底下，她一直没舍得烧。

案发那晚的事，柳文霞翻来覆去想了多少遍，每一遍都停在同一处。松庭吃晚饭时说仓里到了两件货，要盘账，带了手电出门。十一点没回来，她当铺

子里有应酬，先睡了。半夜拍门，拍得又急又密，开门是派出所的人，手电先往她脸上一照。从那晚起，她再没睡过一个整觉。

后事是她一手办的，曲健跑腿。五七之内，灵堂的白布换了三水。来吊的人分三种：真哭的，看账的，看她的。她一样一样应付过来，应付完，人瘦了一圈，裤腰上多打了一个眼。

遗物是分批清的。铺子里的账，曲健陪着对了两回，一笔一笔念给她听：谁家当的，谁家赎的，死账几笔，活账几笔。她不熟账，只在每一页末尾按手印。按到印泥发干，曲健给她添了一回印泥，添得很及时。

铺子也有人来看着要。一个矮个子老板隔着玻璃柜指指点点，说门面他接，存货论秤称。曲健替她挡了："急什么。账没清干净，一间铺子抵不完。"矮个子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她记到年三十。

家里的东西她自己收拾。樟木箱底层有一只蓝布包，打开，是一本手抄的《茶经》。棉纸装订，针脚很密，一折一折像风琴。

字是松庭的字。他念过两年私塾，笔画里有股压出来的横劲。她一页一页翻，一之源，二之具，翻到扉页，停住了。

扉页上一行小字："嘉木吾儿：茶者，南方之嘉木也。父字。"

她的手指在这一行字上放了很久。儿子落地那年，松庭关起门来抄这本册子，抄一行念一行给她听。她问你抄这个做什么，他说，儿子的名字在头一页上，得有出处。

名字有出处。人没了。

她把册子按原样翻回去，翻得慢了。五之煮里有一句，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她想，烧开一锅水，先是鱼目，再是涌泉，最后才腾波鼓浪。人是这样，事也是这样，闹起来之前，先是有一点声。她对着那行字坐了一会儿，才合上册子。

她把册子包回蓝布里，压回箱底，又压上两件冬衣。

腊月十九，她去了趟西塔寺，给松庭点了灯。她不信这个，香还是点了。殿里就她和看殿的婆婆。婆婆问她求什么，她说求个觉睡。婆婆给了她一炷香，让她插在东边的龛里。东边的龛里坐着谁，她没看，拜了三拜。

然后有三件东西，她在腊月里一样一样想起来，想起来就睡不着。

第一件是校服。出事前一个礼拜，她给儿子洗校服，袖口里搓出一点茶末，还有指甲盖大的一块暗渍。她以为是孩子打架了，问了一句。嘉木说没有。她也就信了。茶末好解释，松风的儿子，袖口里进了茶末，天经地义。那块暗渍，她当时想的是铁锈，是红墨水，是桑葚。

现在她不想了。想不下去。

第二件是她床头那瓶安定。县医院开的，处方压在五斗柜的玻璃板底下。她的失眠是嫁过来第三年落下的——夜里算盘响，她数着算盘声睡；后来铺子上了锁，夜里静了，她反倒睡不着了。医生开了药，一天两粒，她数惯了。腊月里有一夜倒出来数，短了四粒。她以为自己记错，把当月的日子在日历牌上倒着数了一遍，还是对不上。她把药瓶从枕边挪到五斗柜，坐了一会儿，又挪回枕边。人跟自己的记性赌气，赌不赢的。她认了。

药短的事，她想过几种可能。夜里自己梦游，摸黑吃了药，天亮忘了——有可能。瓶盖没拧紧，药滚进床缝——也有可能。她把床挪开找过，只有灰。第三种可能她排在最后。排在最后的东西，往往最重。

第三件是夜里的声音。隔三差五，儿子屋里传出磨剪刀的声，沙——沙——，不紧不慢，磨一阵，停一阵。有一夜她贴着门听了半分钟，那声音像锯条子在锯骨头。她回到床上，把被子拉过头顶。

腊月二十五，她去医院续方。坐诊的是个年轻医生，翻了翻病历，问她睡得怎么样。她说不好。他说药不能加量，睡前泡泡脚，白天少喝酽茶。她说好。药拿到手，她在医院门口就拆了封，对着日头数了一遍，一粒不少。她数药的这个毛病，医生讲过，是失眠的人给自己找的事做。可她心里清楚，有些事不是找出来的，是短出来的。

天亮她看儿子的手。指甲修得干干净净，虎口没有茧。饭桌上他吃得少，答话准，问一句答一句，多一个字没有。公安来带他做过一回笔录，回来他照常上学，书包带断了，用鞋带接着。

第二次是让家属在笔录抄件上签字。嘉木那份短短一页。她签完字，人还没出门，她问："人家问什么了？"他说："问爹的事。""问完了？""问完了。"他进屋写作业去了。她站在堂屋里，手里捏着那页纸，捏了很久。

有一回她趁儿子上学，开了他的书桌。课本按课表码着，本子包了牛皮纸皮，名字写在右下角，一色一样的字。抽屉最里头躺着一把新剪刀，买剪刀时搭的红纸套还套着，没开过刃。她把抽屉推回去，手心的汗在红纸套上蹭了一道印。

还有一样，她没跟人讲过。出事那几天，她去巷口裁缝铺锁边，老板娘闲话里带出一句：那晚她起夜，望湖仓那边有手电亮，晃了两晃。这话公安排查时问过，她说没留意。她为什么说没留意——因为仓里那把手电，是她男人出门时带走的。

这一层她谁也没讲。讲了，头一个要解释的就是她。

她有时候在灶屋门口看他的背影。十二岁的孩子，背不驼了，站得笔直，像一杆秤。

放寒假的日子一天天近。她把新课本发包好，橡皮铅笔一样一样摆进文具盒。孩子回来，书包往门边一立，饭桌上一句学校的话没有。她问了三回，三回都是那两个字：上了。她就不问了。

· · ·

腊月二十，曲健又上门来。他是茶行的伙计，跟了松庭十一年，账是他管的。队里也问过他两回，街上传得难听，说伙计跟老板娘有什么。传话的人嘴上没闸，柳文霞耳朵里过，脸上不动。

曲健提着两条鲢鱼。进门换了鞋，先看水管。厨房的水龙头滴了半个月，他带来一把扳手，蹲在灶下拧了几圈，不滴了。

"嫂子，年货备了没有？"

"将就。"

"将就不得。"他把扳手收进工具包，"开年铺子转让出去，账我替你收。你莫慌。"

她送他到巷口。天擦黑，他把鱼从袋里拿出来，两手提着，鱼鳃一开一合。她说拿回去一条，他说不留不留。推了两个来回，到底有一条躺进了她手里的网兜。

巷子里的路灯亮了。他站住，替她把围巾往上拢了一拢，手在她下巴底下停了停，收回去。她没有退。风大，两个人又站了一小会儿。

"过了年，就有信了。"他说。

"我不慌。"她说。

年三十她包了白菜猪肉的饺子。娘儿两个一张桌，电视里放着晚会，锣鼓喧天。嘉木吃了十二个饺子，筷子不响，碗底见空。十二点的炮仗炸起来，满城的红光。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转身进屋了。窗外的光一朵一朵开在天上，没有一朵落进她这间屋。

正月里她回了趟娘家。嫂子在灶上剁鸡，话里话外打听抚恤和铺子，一个字没问她们娘俩。娘把她拉到里屋，塞给她两百块钱，说：霞霞，人在，比什么都强。她捏着那两百块出来，一路没坐车，走了十里地走回来。进了桥东巷，天黑透了。她在巷口买了一包蜡烛，回家一支一支点上，把堂屋点得亮堂。嘉木放学回来，看见满桌烛火，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进了屋。烛火燃到后半夜，她自己吹熄了。

回到屋里，她把鱼开了膛，洗净，抹了盐，挂到后窗外面。做这些之前，她打了肥皂，洗了两遍手。窗外那只篮子里还有发丧人家送的蒸糕，落了灰，

她一直没动。

年初二，曲健来拜年，拎了两瓶酒，一挂鞭。鞭是给孩子的，孩子接了，点了一下头。曲健坐了一刻钟，走的时候在门槛外站住，回身说：铺子有着落了，对面要开超市，出价不低。她点头。她听懂了——对面一开超市，松风那块招牌就要摘了。

招牌摘下来那天，她没去看。街坊说摘招牌的时候，卷帘门里头飞出一群麻雀。她听着，把碗里的粥喝完了。

人在水里泡久了，总要捞根浮木。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她需要一根拐。这根拐正不正，先不管，拄住了再说。

· · ·

出了正月，趁一个晴天，她挪儿子的床，翻晒褥子。床板与墙的夹缝里塞着一只鞋盒。

盒子里没有鞋，是一沓剪纸。红纸黄纸都有，剪的全是两个人。两个孩子，背对背；两个孩子，一前一后；两个孩子隔着一堵墙，墙上的窗剪成镂空的格。有一张，两个孩子的手没牵，当中空着一指宽，空得像一道没画完的门缝。

她一张一张翻。手法又细又稳，圆孔是针打的，方孔是铲的。她看不懂。看不出喜，也看不出丧，看不出这孩子剪这些做什么，更看不出那两个小人是谁。最底下一张剪的像是一盏灯，灯纸破了指头大一个洞，不知是剪坏了，还是故意的。

窗外有炮仗响。她把剪纸照原样理齐，塞回鞋盒，鞋盒塞回床板缝里，褥子铺平。

晚饭她多烧了一个鱼冻。嘉木吃了一碗，说：″我吃饱了。″

那是他那天说的唯一一句话。

◆

二〇〇六年一月八日，天门落了雨夹雪。刑警大队的走廊里生着两只煤炉，蓝焰苗子舔着炉门，炉盖上烤着两双湿手套。

竺长生的桌上摊着两份材料。一份是松风茶行案的补充排查，一份是苏彩娥的借贷底子。

松庭案立了三个月，查过贼，查过仇家，查过赌债，最后落在两条线上：一条是伙计曲健，一条是拣茶的苏彩娥。

曲健那条线起于奸情。沈松庭死前一个月，有人撞见他两回从柳文霞娘家的巷子里出来。传讯两回，他说案发那夜在车站旁边的旅社打牌，旅社的登记簿上确有他的名字，字迹潦草，日子对得上。他原配闹到队里，砸了茶行一块玻璃。这条线，搁下了。

旅社竺长生亲自去看了。柜台的老板娘翻出登记簿，指甲在纸上划：〞喏，这个。〞日子对，名字对，字歪得像虫爬。他问那晚牌打到几点。老板娘说后半夜，输赢不晓得，就晓得有个人摔了门走的。他合上簿子。对得上的，都对得上。

苏彩娥这条线，一月三号洗清了。云香居的牌友一个一个做了笔录：十一月十八那天夜里，她在郑胖婶的桌上打牌，从八点打到十一点半，输了六十块，赊的。四个人说得对得上茬口，连她中间胡了一把清一色、输家赖了两分钟的事，都对得上。

洗不干净的是另一样。一月五号走访她家，两间平房，堂屋里架着拣茶的竹匾，墙角立着腌菜坛，米缸半缸米。床上铺着一床大红的缎子被面，孩子脚边一双新棉鞋，鞋底还没沾稳地。问她被面哪来的，她说是东家给的工钱添头。问哪个东家，她说松风茶行。再问松庭添过几回，她不言语了，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围裙是干的。

走访记录的末尾一行：经济往来无法说清。

出门的时候，雪粒子迎面打过来。院墙上贴着半张旧年画，印的是胖娃娃抱鲤鱼，褪得只剩个轮廓。他在门口站了站，替那户人家把门带严实了。屋里灯熄着，竹匾空着，只有檐底下挂的一串风干的红辣椒，还替这户人家留着一点颜色。

还有那丫头。苏穗，十一岁，城西小学六年级。案发夜她说睡在隔壁张婆婆家。张婆婆耳背，嗓门大："那伢来睡过好几回，乖，不闹，天亮自家走。哪一晚？腊月里雪大那晚我记得，别的不记得。"再问，她就讲她年轻时挑棉花的事。笔录做了四十分钟，有用的三行。

问苏穗话是在里屋。那孩子坐在小板凳上，两手放在膝盖上，问了十句，答一句：

"我在隔壁婆婆家睡。"

眼睛不躲，也不迎，像隔着一层蒙了水汽的玻璃。

竺长生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苏家丫头，证言无可稽核。

他翻出十一月里沈家那孩子的笔录，又读了一遍。一页半纸，问一句答一句。问案发当晚在哪里，答：在家写作业，十点睡。问听见什么没有，答：没有。问认不认得现场那张剪纸，答：不认得。通篇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字。他当时在末页批了"属实"。现在再读，干净得像一间空屋子。

十一月里走访沈家那回，他也在场。堂屋收拾得过分齐整，香灰味还没散净。做母亲的端茶，茶盘上两只杯子，杯沿都磕掉了口，她把好的那面转向客人。那孩子坐在方桌边写作业，笔尖不快不慢。他问一句，答一句，眼睛不在人身上，也不在纸上，像看着两样东西中间的那个空当。

做母亲的送他们出门，在门槛里头站住，说了半句话，又咽回去了。他回头，她摆摆手，把门关了。

档案室的钥匙归他管。午休时间他一个人进去，把松庭案的现场照片又看了一遍。黄纸剪纸的照片，茶篓的照片，暗渠的照片。有一张他看的时间最长：河埠头往下的暗渠口，测量尺摆在鞋印旁边，三十三码，童鞋，胶底，纹

路磨得偏一边。这两样东西，刀口的朝向，鞋码的大小，他在呈报的报告里一个字没提。报告上写的是：现场提取物与流窜作案特征相符。

他把照片倒扣过去，锁了档案室。

一月上旬，排查材料归档。归档前一天，他又去了一趟河埠头。白天看，那里就是个寻常埠头：台阶上晒着鱼干，有人淘米，有人捶衣裳，棒槌声一声递一声。第三级台阶的石头缝里嵌着几根棉线，是洗衣裳蹭进去的。他在台阶上坐了一根烟的工夫。一个天天有人来洗东西的地方，一双摆得齐齐整整的鞋，一笔查不到来路的药。他把烟头摁灭，包进烟盒带走，起身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

出机关前，他去了趟永昌茶庄。问苏彩娥拣茶的手脚，问十一月里她来领过几回茶。陈老板说，手脚快，人干净，十一月来过三回。末了压低声：〝竺同志，松风那本账，人人沾一点，人人不讲。你真要往下查，先把嘴问宽了再查。〞

他在笔记本上记了四个字：人人沾账。

· · ·

一月九日夜里十一点二十分，值班室来电话：西湖浮尸。

他赶到河埠头，雨夹雪刚停。派出所的民警拉了警戒线，两支手电，一根竹篙，网是跟渔家借的。带路的渔家老汉打着哈欠说，这一片水深，河埠头第三级台阶底下有个网兜大的洞，涨水就漩，早年淹过鸭群。水皮上一层黑雾，手电打过去，光柱里全是斜的雨丝。

尸体是后半夜起来的。起尸的经过他站在台阶上看着，没有下去。围看的人越聚越多，民警往后拦，棉袄上落了雪水。人群里有个老婆婆念了一声菩萨，声音传得很远。天亮前雪又下起来，落在警戒线上，积了薄薄一层。有人认出死者是谁家的，人群里传了三句，就散了一半——天门城小，坏消息传得比救火车还快。

台阶上留着一双棉鞋。

第三级台阶。鞋尖朝湖，摆得整整齐齐，鞋带塞在鞋窝里。他蹲下去看了很久。人落水，鞋是自己脱的，还是别人摆的？自己脱的鞋，不会摆得这样齐。他让技术员拍了照，量了台阶：三级，每级十五公分。照片钉进笔记本，钉了一会儿，又取下来，夹进内页。

天亮认尸。亲属是从街道底册里寻出来的，一位姓唐的退休教师，住西湖沿的念庐。竺长生在走廊里等。老太太进去，不到半分钟就出来，扶着墙站了一会儿，说：″是她。″

声音平平的。他在登记表上记：唐韵秋，六十岁，远房表姑。签字的手一笔一划，很稳。

交代善后的话，他一条一条讲，老太太听得仔细，末了问了一句：″那孩子，夜里有人照应吗？″

他说街道安排了人。她点头，说：″那行。往后有事，您派人来念庐传个话。″

念庐两个字，他记下了。回队后他在排查地图上找着西湖沿，圈了一个点。这个点，后来他看了很多遍。

检材是他亲手封的。牛皮纸袋，火漆，托去地区公安处的班车捎走。司机下去抽烟，他把袋子搁在前座，一路用手按着。

第二天夜里回家，秀珍还没睡，问他又去哪了。他说湖里起了个人。秀珍说大冷的天。他说嗯。两个人再没讲话。他躺在床上，听风把窗纸拍得一响一响，拍到后半夜。

小江从学校打回来一个电话，是传达室转的。问妈的药减了没有。他说减了。又问爸你的降压药按时吃没有。秀珍在旁边抢着答：他呀，药在抽屉里睡大觉。电话那头笑。他没笑，听着忙音响了很久，才把听筒挂回去。

尸检报告四天后出来，检材送的地区公安处。死者苏彩娥，三十四岁，死因溺水，血内检出安定成分，酒精含量不低。衣物清点，棉鞋不在脚上。外衣口袋里有一团纸，泡烂了，字迹全化，只剩一个角上一个字认得出——

账。

他拿着那个字看了一晚上。松庭死了，账没死。账会自己找路。

隔了一天，他又去了趟苏彩娥家。门上挂着锁，门缝里干干净净。他拿手电照了照门槛，缝里有一小片纸灰，没扫净。烧过字条的人，手会抖；不扫的人，心会慌。他把这个念头记下来，没写进任何表格。

法医的报告里还有一行附记：死者指甲无搏斗伤，胃内有未消化的米粉。他盯着米粉两个字出神。傍晚路过鸿渐路口，卖米粉的挑子刚歇下，锅里的汤还开着。满城的过早摊子，一天卖出去几百碗，哪一碗也认不出是谁吃的。

第二天他去云香居。下午没有牌局，郑胖婶在码牌，自动麻将机洗牌的声音像涨水。她把流水簿子取下来给他看，苏彩娥的名字后头记着四百二十块。

"她十点钟走的，说去对个账。"郑胖婶说，"我说她账不在我这儿，在茶行。她愣了一下，就出门了。"

"她说去对什么账？"

"没讲。我们家这里，对账就是打牌的意思。"郑胖婶把最后一张牌码进牌墙，"警察同志，她那晚出门，不像打牌的走法。"

竺长生等她说下去。她没说下去，只把簿子上那一页折了个角，说："人没了，账我抹了。跟死人讨账，折寿。"

回到队里，他去找曹德贵。老曹在地炉边烤手，听完，把火钳往炉口一搁。

"失足。喝了酒，踩滑了，完了。"

"她血里有安定。"

"失眠的婆娘，哪个抽屉里没两片药。"

″台阶上的鞋摆得太齐。口袋里还有字条。″

″讨债的吓唬她，她自己吓自己，越吓越慌，慌了就喝，喝了就滑。″曹德贵把手伸到火上来回翻，″老竺，一年到头，西湖里要起几个？前年几个？大前年几个？″

竺长生不说话。

″结案报告写失足落水。家属签了字。″曹德贵抬眼看他，″你莫魔征。″

竺长生还站在那儿。曹德贵把火钳搁下，口气缓了半分：″字条是泡烂的，安定查不到来路。鞋摆得齐——齐能定什么？你把这些都钉进卷里，我不拦你。结论一个字不能动。松庭的案子压着全城的茶行，苏彩娥的案子再翻起来，全队这个年还过不过？″

他退出来了。走廊的灯坏了一盏，一明一暗。他在走廊尽头站了一会儿，煤炉上的水壶开了，呜呜地响，没人去提。窗玻璃上的霜花化了一角，又冻上。

回到桌前，他把两份材料并在一起。松风茶行案。苏彩娥案。桌下的铁皮柜有一格空着，他把材料放进去，压平，上锁。柜门一道锁，抽屉一道锁，两把钥匙分开挂，一把在裤带上，一把贴身揣着。

做完这些，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一月九日，雨夹雪转阴。西湖，浮尸，女，苏彩娥。鞋不在脚上。

写完他合上本子。窗外雪停了，湖面上起雾，一小团一小团，贴着水皮走。

◆

二〇〇六年一月下旬，念庐的天井里结着薄冰，枇杷树的叶子上蒙了一层灰霜。唐韵秋是被居委会的车接去的，去城西的殡仪馆认人。

车过西湖路，早市散了，卖米粉的摊子还冒着气。她一路没讲话。居委会主任陪着，把话在嘴里过了几遍，都没讲出来。

殡仪馆的走廊长，灯是白炽的。冷柜拉开，白气涌出来。白布掀开一角她就放下了，扶着墙站了一会儿。主任在旁边说：″唐老师，您节哀，得签个字。″

她签了。还是那一手工整的小楷，一笔没抖。

回来的车上她一直看着窗外。西湖边有人淘米洗菜，水鸟起落。她想，彩娥这个孩子，命苦在明处，苦得粗糙。粗糙的苦好认，认了就能帮。

她跟这孩子的缘分，其实只有一秋。老年大学的茶艺班设在文化宫西厢，来学茶的多是退了休的太太们。班上有个帮工的小姑娘，收杯、温盏、续水，手脚轻得没有声音。有一回先生讲″茶性俭，不宜广″，讲岔了，满屋没人听出来，角落里那小姑娘把茶则往回摆正了一寸。

又有一回下冻雨，散了课，她看见那孩子在屋檐底下把伞让给一个腿脚不便的老太太，自己顶着书包跑进雨里。第二天她问伞呢，孩子说借了。后来她才懂，是干脆送了。

她注意到这孩子的手，虎口有冻疮好过的疤，指甲修得圆。下课她问姓名，孩子答了一个″苏″字，就没有下文了。

她当时只当是缘分。天门的巷子这样深，一个孩子这样小，她的茶艺班偏偏缺一个帮工的。缘分这东西，人到六十才看得见针脚。

· · ·

认领那天落着冻雨。居委会主任把穗送到念庐，一只红白蓝的编织袋，袋角磨得发白；还有一只铁皮盒，老式的饼干盒，绿漆掉了半边，印着牡丹。孩子进门，先在门槛上站了站，把鞋底在台阶上蹭干净。

″往后这儿就是家。″唐韵秋说。

穗点了点头。

第一顿饭她做了四菜一汤，灶屋的烟囱多年没冒过这么长的烟。穗把碗里的饭吃得一粒不剩，饭后把自己的碗洗了，又把灶台擦了，抹布叠成方块压在水池边上。她说不用，孩子像没听见，做完了才回房。

夜里她听见后厢房有极轻的响动，像一页纸翻过去的声音。她没有起去看。

念庐是西湖沿的老宅，两进的天井，后院一棵枇杷树。前头正屋，她先生在世时开过蒙馆，梁上那块"明道"的旧匾没动过，匾角的灰她每年擦一回。过了几天，西湖沿的老邻居拎了一篮鸡蛋来认门，站在天井里讲彩娥年轻时候的事，讲她挑花挑得快，讲她嗓子好。穗在屋里写字，门关着。客人走了，唐韵秋把鸡蛋收下，篮子还回去，在篮底压了一把水果糖。

族里的饭摆在二月头。堂弟唐韵清在中学管后勤，说话有分量："姐，苏家那个女的口碑不好，牌桌上混饭吃的人。这孩子接进念庐，您六十的人了，图什么？往后上学、看病、说人家，桩桩都是事。"

旁边一个婶娘接话："接进来容易。往后人家讲闲话，讲的是您。"

满桌人不作声。唐韵秋夹了一筷子蒸菜，放下筷子。

"账不能记在伢身上。"她说。

唐韵清还要讲，被自家的婆娘在桌子底下拉了一把。散席的时候，唐韵秋在门口又说了一句："我一个孤老婆子，屋里有个人声，夜里踏实。"

办手续的那些天，她找了三十年前的学生，如今在民政局隔壁做律师的，把章程列成单子：户口簿，居委会证明，收养申请书，体检表，民政局的登记，公证处的公证书。她一样一样用回形针别好，别成一摞。二月跑居委会，三月跑民政局，四月跑派出所。

体检那天下小雨。孩子站上体重秤，医生报数，她在一旁替她记。听诊器冰凉，孩子没缩。表格里有一栏要填既往病史，医生问打过几回防疫针。她答不上来，回头看穗。穗伸出手，一根一根扳着指头数，数到第六根停住。医生笑了，说清楚，六回。她在那一栏先写了"不详"，想了想划掉，写：孩子自己

数得清。拍户籍照，照相馆的师傅让孩子往中间坐一坐，穗坐得笔直，快门响的时候睫毛都没动。照片洗出来，底色是蓝的，像一小片湖。她看了很久。

她也去了一趟城西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姓毛，戴眼镜，翻出成绩册给她看，一竖行的第一。末了说："这孩子的作文，从来不用改。"又说了两个字："费心。"两个字的交接，比很多话都重。

旧金山的电话打回来两回。儿子在电话里说："妈，您这个年纪，收养是要备案的，您想清楚。"

她说："我没想。有些事一想，就做不成了。"

电话那头静了半分钟："那我多寄点钱。"

"钱照旧。别多。"

户籍室的窗口里有风扇声。民警对着表格敲章，念："姓名苏穗，改跟您姓？"

她回头问穗："改不改？"

穗点头。

"苏穗，改为唐穗。"民警念了一遍。章落下去，红印油，一张崭新的户籍页从窗口递出来。她把那页纸抚平，像抚平一页刚发下来的作业。

户籍办下来那天，居委会主任也来念庐坐了坐，站在天井里看了一遍房子，说往后孩子上学的事，居里帮着跑。她送主任出门，回来在天井里站了一会儿。枇杷树的影子落在青石板上，一格一格的。她想，从前这院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如今多了一副，轻的，慢的，落在哪一格，她都听得见。

改了姓，她带孩子在巷口照相馆取照片，回来的路上买了一串糖葫芦。孩子拿着，没吃，举了一路，到家插在文竹盆里。糖化了，粘在竹叶上，她拿温水一点一点替她洗下来。洗到一半她停了手。她想，这孩子从前，怕是一颗糖都没得这样举过。

四月里，她带穗去裁缝铺做两身夏衣。裁缝拿皮尺量肩，量臂，量腰，报一个数，她在本子上记。孩子站得笔直，两臂平举，一动不动，量到哪里是哪里。裁缝讲，这孩子好做，衣裳上身就是衣裳。她看着皮尺绕过孩子的肩，忽然想起世上有的人量脚，用的是棉线，趁人睡着了比。她把这个念头按下去了，付了钱，领着孩子出门。日头正好，孩子的影子短短的，踩在她影子边上。

· · ·

穗住进后厢房。她把书桌给孩子置在南窗下，摆了一盏新台灯，一盆文竹。灶屋的米缸淘洗过，晒过，装了新米。她开春没再去茶艺班，先生说班上少个帮水的，她笑一笑，没接话。

四月里一个下午，她烧了水，把孩子叫到堂屋，教她烫杯。水线下去，蒸汽起来，她扶着孩子的手背走了一圈。那双手不抖，收得住。她想起茶艺班里那一寸，没作声，只说：〞记住，茶性俭，不宜广。学茶先学省。〞

穗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就一眼，又低下去。那一眼里有个什么东西，她到后来才一点一点懂，那时候不懂。

五月里一夜大雨，雷声贴着屋脊滚。她起来关窗，路过厢房，门缝里亮着一点光。孩子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那手电是灶屋抽屉里的，白天她还寻过一回。她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进去把手电收了，把自己的台灯留下，说：看书用灯。孩子躺着，点了点头。她出来，在走廊里把那盏黄铜座的灯擦了一遍，擦得很慢。

端午节她包了粽子，白米粽蘸糖。孩子吃了一个，把第二个剥好了，放到她碗里。她吃着，粽子是凉的，人是暖的。这一句她在饭桌底下按住了，没有讲出来。

她给孩子买了一支钢笔，英雄牌的，笔帽上一点金。头一回用它，孩子在作业本上写自己的名字，写了三遍：唐穗，唐穗，唐穗。一笔是一笔，收笔很齐。她在旁边看着，没作声。窗外枇杷黄了，她摘了几个，剥了一个递过去。

孩子吃了，把核吐在手心，问：这个种下能活吗。她说能，土好就活。孩子把核攥住了，攥了一下午。

六月里有天半夜，厢房里发出一声很短的哭。她赶过去，门开着，孩子坐在床上，眼睛睁着，脸上有泪。她没问，倒了半杯温水放在床头，坐下来，一只手隔着睡衣搭在孩子背上，轻轻拍。拍着拍着，孩子躺下了。她把门带好，回房前把走廊那盏灯又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床头那半杯水喝干了，杯子洗得干干净净，倒扣在桌上。

那只铁皮盒，穗放在枕头边上，睡觉的时候一只手搭在盒盖上。有一回收衣服，孩子不在屋，风把窗推开，盒盖掀开一条缝。唐韵秋伸手替她掩上，掩上以后，手指头像被纸边割了一下似的缩回来。她没看。

彩娥的骨灰寄在殡仪馆。清明前，她托人选了西湖后山的一块坡地，坐北朝南，看得见水。定地那日她去坡上看过一回，看坟的老汉问，立碑不立。她说，先立个小的，碑上的字，让孩子来定。老汉说，孩子定字？她说，她妈妈的事，得她点头。老汉没再问，领她在坡上转了半圈。风从湖上过来，吹得压坟的石片哗哗响，坟地边上一丛野茶，芽尖冒得比城里早。

落葬的日子定下，她跟穗说过一回。穗点头，又把头低下去写作业。

夜里她去看穗睡下。孩子在陌生的床上睡相笔直，被子拉到下巴，两只手放在被子外头，手心朝上。

像躺在一张考卷上。

她把那两只手放回被窝，掖好。第二夜再去看，那两只手又端端正正摆在被子外面。

第三夜她没进去，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了听，屋里静得匀。回房前，她把走廊的灯留了一盏。灯是她先生的遗物，黄铜座，绿罩子，十几年没换过灯泡。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替孩子关了灯。走廊里她对自己说：慢慢来。土换了，苗总要蔫一阵。

◆

二〇〇六年正月初十，工人文化宫的后楼还锁着假。前楼放映厅歇了业，铁门上一把链锁；台球室的窗户纸破了一个洞。走廊的光荣榜玻璃里嵌着去年的奖状，蒙了灰。剪纸班十三开课，齐守拙提前两天来生炉子。

文化宫是五几年的老楼，红砖，水刷石的门柱。从前楼里放电影，台球室、阅览室、灯光球场，一到晚上人多得下不去脚。这两年歌厅开到了对街，年轻人不来了，剩下一楼棋牌室还热闹。后楼这几间教室，租给剪纸班、书法班，一年几百块钱，算是文化宫最后的体面。

看门的老周围着围巾过来帮他开后楼的门，呵着白气说：″齐师傅，上头话又放出来了，说后楼这一片开春要修。真要动，你这柜子往哪儿搬？″

″不搬。″他说，″纸比楼命长。″

老周笑了，说好好好，纸比楼命长，真拆到你这间，我给你留话。

他七十三了，耳背了一些，手上的工夫不老。裁纸刀，小铁剪，竹镊，一枚纳鞋底的大针，码在一只木匣里，各归各位。引火的刨花用的是学生练废的纸，火柴一擦，炉膛里红起来。水壶坐上炉子，一会儿就有白汽。

他十五岁在汉口的裱画铺学徒。师傅头一年不叫他碰画，只叫他打浆糊。浆糊里要放明矾，防虫，去性。这双手打了六十年浆糊，托过寿幛，托过挽联，托过八十年代平反退还的字画。什么东西该托在底下，什么东西该揭开来晒，他心里有一杆秤。

师父教过他一句话：裱画的人，是给纸做后事的。纸也要安身，安对了地方，千年不腐；安错了，见风就裂。他那时候小，只当是行话。后来老伴走了，他给自己备料，寿衣做好压在箱底，樟木柜里给他留了一格。人这一辈子，装裱来装裱去，最要紧的是把自己安顿明白。他觉得他安顿明白了。

师父还讲过：纸是白的，事是黑的，裱画的人夹在当中，手要净。他记了一辈子，不收礼，不替人改一个字。班上孩子的作业，他只批两个字：好，或

者重剪。得过"好"的少，得过"重剪"的更少，更多的纸，他看了，不批。

收作业用的是一本样册。蓝布面，册页装，他自己托的裱。班里四五十个孩子，作业一人一页夹进册子，不许带回家。家长有话，他说纸样金贵，怕孩子们糟蹋。

这规矩立了有些年头了。头一届孩子毕业，家长上门讨作业，讨得鸡飞狗跳，他从此立下：作业留册，谁也不带回家。留得住的纸，早晚有人来看。

炉子生起来，他把教室的桌子抹了一遍。讲台抽屉里有孩子们留下的零碎：半截红蜡笔，一把缺角的尺子，几张揉皱的草稿。他把草稿展开看过，是练剪坏的字，替它们一张张抚平，收进纸篓边的废纸匣。废纸也是纸，纸都要有去处。

样册的夹层在衬纸底下。装裱行里，托在画心背面那层纸叫命纸。他托这本册子的时候，命纸下头留了一条三指宽的空，侧口藏在册脊的布套里。这是他吃饭的手艺，闭着眼也摸得到。

他隔些日子探一探那条空，像老衣匠摸暗袋。头几年摸出过糖纸，摸出过抄的歌词。有一年冬天，摸出一页不属于任何作业的黄纸，剪的是一只手电筒，光柱朝前，一道一道。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认出了刀口，没声张，原样放了回去。

从那以后，暗层里隔三差五多出纸来。他一回一回地看，一回一回地放回去。哪一年起的头，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这天他翻开册脊，两张纸并排躺在暗层里，都是新的。

第一张是黄纸。一栋塌了半边的房子，房梁斜着，烟囱还立着。房子前头站一个孩子，背对着看纸的人，手里垂着一样东西，剪不出来是什么。他用两根指头捻了捻纸角——是包茶饼的棉纸，浸过茶油，一股陈茶的气味。

第二张是白纸。一片雪地，雪用锯齿纹走，当中一只盖碗，碗盖揭开摆在一边，碗沿上搭着一只小小的手，是往上递的样子。圆孔用针打，密得像筛过的月光。

齐守拙把两张纸托在掌心里，就着炉火看了很久。

两张纸的刀口，收梢一律朝左，又轻又齐。右手运刀的人，收梢往右甩；往左收的，是左手拿剪。他班上用左手拿剪的，十六年里，前前后后只有那一个。

第一张的手法他认得。那个孩子剪人从来不剪脸，剪房子从来不剪窗里头的亮。第二张他也认得。下剪慢，收剪齐，每一条线都像先用指甲划过一遍。

塌房子是哪一家，雪地上的茶是端给谁的，城里刚过了两个白事，用不着猜。这一层他看懂了。再往下的七分，他不懂，也不想懂。

他把两张纸照原样放回暗层，取出一张大红纸，坐下，铰了一盏灯笼。灯笼提梁上一朵云，灯笼肚里镂出一个"灯"字，底下一点烛火，烛火旁边细密的小孔，像夜里围着一圈飞虫。铰到烛火那几剪，他的手稳，眼睛潮了——这双手剪了一辈子纸，没有一回像今天这样慢。

他把灯笼放进暗层，摆在两张纸的当中。浆糊是他自己打的，闻着有一点矾味。

· · ·

正月十三开了课。孩子们带着寒假的懒劲进门，先在炉子边围一圈烤手。他一人发两张红纸，教铰春字。铰到一半，有孩子举着纸问："齐先生，灯笼肚里那点火，怎么铰才不散？"

他走过去，握着那孩子的手背走了三剪。

"先铰火，后铰灯。灯是护着火的。"

满案的孩子低头运剪，纸屑纷纷。门边第一排的位子今天空着。他在讲台前站着，往那个空位看了一眼，把点名册翻过去一页。

放了学，孩子们涌出去，走廊里留下一串脚印。有个小姑娘回来取手套，鼻尖冻得通红。他帮她把手套找着，看着她跑远。后楼的灯一盏一盏灭。他在

教室里多坐了一袋烟的工夫，听雪粒子打窗纸，沙沙的，像谁在很远的地方磨铁。

课上有个孩子举手问：″先生，靠窗那个位子的同学怎么不来了？″他说，人家家里有事。又有人问门边那个呢。他说，一样。孩子们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剪。孩子的话像雪，落地就化。他把新裁的红纸一张一张分下去，分到门边第一排，那张纸在他手里多留了一息，才放下。

剪纸班办了十六年，一茬一茬的孩子从这间教室进出。他记得的孩子，都是手。有的手三天就会跑刀，有的手三年才稳。

那个总剪影子的孩子，来的时候才六岁，坐靠窗最后一排。剪刀到了他手里像长在手上。一样的兔子，别的孩子剪耳朵，他剪影子，兔子的影子趴在月亮底下。先生们夸，他不受夸，夸一句，下一次就换样。六年级往后，他来得稀了，来一回，交的作业比往年的深一层：屋里剪不开的，他剪影子；亮剪不出的，他剪纸挡亮。

那个剪雪地的丫头来得晚些，坐门边第一排。一张纸能坐一个下午，下剪以前先用铅笔画线，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她剪得慢，交上来的东西总比快手的多一层讲究：碗沿上一粒雨点，窗格里半片云。

他不记得他们同桌过没有。班上孩子多，一条长案坐十来个，先生记手，不记脸。

有一年腊月，他带班上的孩子铰了一批窗花，送到街上几户孤老家里去。剪纸班的窗花贴出去，一条街就亮一片。送窗花分了两拨，他去的是东街，西街是另一个先生领的。回来的路上雪下得紧，他把浆糊桶抱在怀里，怕冻上。

入冬这两堂课，靠窗最后一排空着。门边第一排那孩子来过一回，交了一张窗花，四平八稳。他在页脚批了个″好″字。

散了课，他挨个收作业。孩子的手一张一张递过来，他一张一张接。有的纸角卷了，他用手掌压平；有的沾了浆糊，他拿竹镊一点一点剔干净。四十几张纸夹进册子，册子厚了一圈。最后他把册脊的布套理顺，手指头在侧口上停

了半息。那是他一个人的关防。四十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晓得自己的手艺睡在什么地方。

册子收齐，他照例点一遍数。少一张，他要在放学前问出来。十六年了，丢过两张，都是孩子自己讨回去垫桌脚的。多出来的，只有暗层里那些。他不怕多，就怕少。多的纸是有话，少的纸是有事。

老伴走了五年，儿子在荆州安了家，一年回来两回。屋里就他，一柜子的纸。儿子回来，劝他把班散了："爸，七十多了，冬天教室冷，摔一跤怎么办。"他说班散不散，不由他。儿子说由谁，他说由那些手。儿子听不懂，他也不解释。夜里儿子睡下，他把木匣打开，一样一样擦过，又收好。

他当了一辈子装裱匠，揭裱过多少旧画。这一行有句行话：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一揭就要伤命纸。揭裱是把旧东西摊开来重做。托底不一样，托底是把东西稳稳当当护在里头，面上看不出，里头不伤。

铰那盏灯笼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点过的灯。汉口学徒那年，铺子里夜里失过火，师父把他从阁楼上推下来，自己没出来。打那以后，他见不得黑屋子，走哪儿都留一盏灯。暗层里那两个孩子，一个把纸剪给了塌了的房子，一个把茶端进了雪里。他给他们回一盏灯，不是应答，是照个亮儿，让他们知道这一层里有人来过。

有的话，问出口，纸就破了。

他把炉子封了，灯灭了。十三那晚放了学，他又把这一套做了一遍。锁样册的樟木柜立在墙角，柜门上的铜活擦得亮。他把样册平放进去，压上两方镇纸的石板，落了锁。

空教室里只剩炉膛的余温，火星偶尔哔剥一声。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落了雪，落在窗台上没有声。他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站了一会儿。暗层里那三张纸，他一张也没再看。有的纸要看一辈子，看一眼就够了。

他站在门口，对黑屋子说了一句：

"先生只管收作业，不管改命。"

说完他自己听见了。他没有回头。

◆

二〇〇六年三月，倒春寒，湖沿的柳条上鼓起一层看不出绿的芽。

竺长生去物证室签字，把那枚鞋印石膏模领了出来。登记簿上写着：松风茶行案现场提取物，暗渠尽头，石膏灌注，左足，三十三码。石膏模拿棉纸包着，边角磕掉了一小块，鞋跟处的纹路里积着经年的灰。

管理员小袁翻着簿子说：″竺队，这个月第二回了。″

″再登一回。″

他抱着石膏模去了望湖仓。卷帘门挂着锁，锁眼锈了，门缝里的蛛网结着细雪珠。他绕到后门，后门临着排水暗渠，渠口的荒草枯着。他把石膏模蹲在原来的位置上比了比。鞋头朝河埠头，鞋跟朝仓房。成年人不会从这里走——渠沿一人高，得跳下去，再爬上来。孩子的身量，下去，走，上来，都顺。

他用自己的步子量：后门到暗渠口，十九步；顺渠走到头，再上河埠头台阶，四十步。枯渠，没有水，走一个来回，鞋帮是干的。这些数字他记进笔记本。报告里没有它们的位置。

复核申请写了两页。他写了撕，撕了写，第三稿只留事实：刀口，鞋印，剪纸，三个话头。旁证一概没写。旁证拿不出手，他自己晓得。

他还把周边县市近三年同类手法的案件调了个遍。持剪刀入室的有，撬门的贼里有带剪子扎人的，剪窗花的孩子满街都是——流窜作案四个字，档案里查无来处。他把调阅单压在申请底下，一起交了。

申请交上去，队里起了些闲话。有人说他快熬出头了还折腾，有人说他跟松庭有旧怨。旧怨没有，旧交情有一点——松庭每年给他送一回新茶，他都折了价钱还回去。人情两清，案子不清。这些话飘到走廊里，他脚步没停。

下午的队务会，他把复核申请放在桌子中间：松风茶行案"流窜作案"的结论，建议重新核查。

会议室静了一下。窗玻璃上结着霜花。记录的年轻民警笔尖悬在纸上，不敢落。

曹德贵摘了老花镜："依据？"

"刀口方向。鞋印。剪纸。"

"剪纸？"曹德贵笑了一声，"剪纸也算依据？满城的孩子都剪纸。流窜作案是挂了号的结论，你翻它做什么？"

"翻它，是因为案卷合不上。"

"哪里合不上？"曹德贵把申请推回来，环视一圈，"松庭的案子，苦主认了。苏彩娥失足落水，家属签了字。伢的案子结了的多，你莫魔征。"

会不欢而散。散会时，年轻的蒋阔过来帮他拎了拎那摞卷宗，两个人一路没说话。到了档案室门口，蒋阔把卷宗递还给他，说："竺队，暗渠那个地方，我下去过。大人走一个来回，裤脚全是泥。"

竺长生看了他一眼。干渠无水，童鞋的鞋帮是干的——这句话他咽了回去，只说："去忙吧。"

蒋阔走两步又回头："竺队，工具我收好了。"

他应了一声。这孩子手脚干净，眼里有活。他想，等自己退了，这摊子交给他，接得住。接得住是一回事，接不接得住那口锅，是另一回事。

过了两天，曹德贵单独把他叫去，关上门，给他倒了一杯茶。

"老竺，我晓得你不服。"老曹说，"我也不全服。可这案子，铁证差一口气。差一口气的案子去翻，是砸自己的饭碗，也砸别人的。等。等那口气自己冒出来。"

他端着那杯茶出来，茶一口没喝，凉透了。

过两天他去了工人文化宫。到得早了，剪纸班正上课，他站在窗外看了一刻钟。一条长案坐十个孩子，人人低头运剪，纸屑落在案上，红的白的，像落了一层不成形的花。先生背着手在案间走。

晌午放了学，他敲门进去。齐守拙正在讲台前收作业，蓝布褂子，指头上全是浆糊。

他亮了证件，说明来意：想核一核剪纸班历届学员的名册。

老头拿抹布擦着手："学生多哦，记不得。"

"有登记簿也行，借我看一眼。"

"文化宫的房子朝不保夕，搬一回丢一回，哪里留得下那些。"老头把抹布搭在讲台角上，"同志，剪纸是孩子耍的，耍着耍着就长大了，长大了就不来了。没得什么名册。"

他把门带上了。带得不重。

竺长生站在走廊里没走。墙上贴着一溜历届学员的窗花，红纸的，压在玻璃底下。他从东头看到西头，在其中一幅前头停住了。

两个童子，捧一只盘，盘上一盏茶。玻璃反着光，他侧过身子，把光让开。底下标着年份：甲申年。

他退开两步，用相机照了相，又掏出笔记本，把两个童子的衣纹、针打的圆孔、收剪的方向，一样一样描下来。那手法，与松风茶行现场那张剪纸，如出一辙。

从文化宫出来，他绕到纸行问了一声。老板讲，这种黄棉纸是包茶饼用的，南街北街几家茶庄都有，不要钱，买茶就搭。不要钱的东西，最查不得来路。他谢了一声，出来在日头底下站了一会儿。

当晚他去队里的暗房放照片。红灯底下，药水晃动，窗花和现场那张剪纸先后浮上来。他把两张并排钉在晾板上，退后一步看。纸的白边裁得不一样，针孔的位置却是一样心思。他站到药水的气味呛嗓子，才关了灯。

回到队里，他把排查阶段的笔录翻出来重看。城西小学班主任毛慧芳做过一次笔录，话不长，末尾有一句：这两个孩子都在文化宫学过剪纸；学剪纸那阵，都才十岁的伢。

他又去了教育局的档案室，借了城西小学应届毕业生的学籍卡。两张卡片并排摆在桌上：一个二月生，一个六月生，同班，六年。他就着窗光看了很久，把它们放回原处。借阅单上他的名字，签得比平时重。

隔天他去了一趟城西小学，核实笔录上的话。六年级的班主任姓毛，办公桌上堆着两捆作文存根。她听明来意，说：〝我那句都在纸上，你再看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我教了六年，一个也是六年。〞她顿了顿，〝竺同志，十来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事。〞

他说是啊。出了办公室，走廊里挂着一排毕业班的成绩红榜，第一名那一栏，名字写得端正。他站了一会儿，把帽子扶正了。

临出校门，放学铃响了，孩子们潮水一样涌出来，从他身边跑过去。他站在传达室边上，等人都走净了才走。传达室的老头探出头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等人走完。

他抽出一张白纸，写下两个名字：沈嘉木，苏穗。

笔尖在纸面上停了很久。他把纸对折，又对折，折成拇指大，放进上衣口袋。

晚上在家，他把那张纸展开看了，拿铅笔在两个名字上各划了一道。划掉以后，他在笔记本的另一页写：

〝十岁的伢，立不了案，也立不了心。〞

写完这行，他把笔搁下，摸出那张折成拇指大的白纸，没打开，划了根火柴，丢进搪瓷缸里点了。纸烧到指尖，他把剩下的丢进去，看它沉底。名字烧得掉。别的东西烧不掉。

那晚回家，秀珍坐在灯下剥豌豆，眼皮抬了一下：″又去档案室了？你身上一股旧纸味。″

他愣了愣。旧的纸，旧的灰，旧的人。他把外套挂上阳台，回头坐下帮着剥。豌豆剥完，两个人的手指头都绿了。秀珍把碗收进灶屋，出来时说了一句：″下回你自己剥。″他说好。

· · ·

四月五日清明，天放晴。他去西湖沿核一桩入室盗窃的走访，路过后山坡下，看见一场小小的落葬。

十几个人，几只花圈，一个抱遗像的亲戚。坡上油菜花开了，黄得发闷。落葬的人里没有一个穿孝，居委会主任也来了，站在人堆外头打哈欠。抱遗像的亲戚个子小，风一吹，照片就要拿手按住。唐韵秋穿黑呢子外套站在人群边上，手里牵着穗。孩子也穿着黑，头发抿得光光的。

人们把土添上，烧了纸。纸灰打着旋贴地飞，飞不过一丈高就散了。唐韵秋朝着坟头弯了弯腰，牵着孩子往坡下走，走了几步，孩子站住了，回头望湖心。

湖上有雾，一小团一小团，贴着水皮走。

她望了很久。然后转过身，从怀里取出一枝白花，放在坑边的石头上。放得很轻，很正。手收回来的时候，指尖在石头上按了一按。

稳得像大人。

下坡的路上，唐韵秋一直把孩子护在里侧。坡底下停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垫着棉被。老太太先上去，回身伸手把孩子拉上去，两个人并排坐着，谁也没讲话。三轮车突突地开走了，车斗上盖的蓝布被风掀起一角，又落下去。

竺长生在坡上站了很久。风把油菜花吹得一伏一伏。他把这场落葬从头到尾又想了一遍：人少，祭品少，哭的人少。一个没了娘的孩子，一个接走她的先生，后事办得这样静。静得对，也静得不对。

他把烟摸出来，没点，又放回去。

孩子跟着唐韵秋下了坡，出了他的视野。他掏出笔记本，写了一行：四月五日，西湖后山，唐姓教师携苏家遗孤祭扫。

写完，他把"遗孤"两个字圈掉，改成"养女"。

回机关的路上，他绕到念庐外头看了一眼。两进的老宅，门楼上有一块旧匾。天井里晾着小孩的衣裳，蓝布的，风一吹，袖子一摆一摆，像在跟人招手。他看了一眼，蹬着车走了。

◆

二〇〇六年五月，云香居的吊扇转起来第一天，郑胖婶踩着凳子擦了扇叶，棉纱蘸着水，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抹过去。晚上八点，四桌麻将齐齐地响，自动麻将机洗牌的声音像涨水。茶水钱一桌一块，硬币在她围裙口袋里叮当，她心里有数。

她的一天有板有眼。上午提篮子买菜，猪油渣留给自家老头下酒；中午泡一大桶凉茶，金银花加甘草；下午四点上排门，桌布抹一遍，等牌客进门。开馆十年，云香居没红过脸，没烂过死账——赊可以，人得在。

馆里有三条不成文的规矩：赊账可以，赌咒不行；输急了可以出门透气，掀桌子不行；讲闲话可以，讲人家孩子不行。第三条是正月初里立下的。打那以后，桌上提起那两个孩子，她就把茶盘一放。有个新来的客不服气，说了半句什么根骨，她把他的茶杯收了："茶钱两块，慢走。"

云香居开在解放路中段，门脸一间半，后院搭了石棉瓦棚。街坊说她的麻将馆是半条街的会客室：谁家婆媳吵了架，谁家后生说了亲，头一天在桌上讲，第二天全城晓得。

彩娥的账还挂在墙上那本流水簿子里，四百二十块，红笔写的。人正月初里没的。那晚收了场，她拿橡皮去擦那个数，红笔字擦不干净，纸上留一道粉

印。她跟自家老头说："跟死人讨账，折寿。"

那四百二是怎么欠下的，她记得清楚。十一月里连着三个通宵场，彩娥输红了眼，赊了三回。第四回郑胖婶把牌扣了："苏大姐，牌是玩的，赊到这个数，手气要避一避。"彩娥笑，笑得白，说下个月拣茶的钱一到就还。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往窗外瞟了一下。窗外是解放路口，路灯刚亮。

牌桌上的话比橡皮快。"苏寡妇克了西湖"这句话，三天传遍竟陵。有人说她死那晚衣裳穿得太整齐，有人说见过她在河埠头跟人讲话。讲的人多了，细节一天一个样。郑胖婶听着，不接嘴。她做笔录那天把知道的都讲了：彩娥十点钟走的，说去对个账，后脚就出了门。讲完签字，按手印。

彩娥在的时候，手气差了就拿女儿说事："我家穗儿考试回回第一，我这牌运怎么不学学她。"满桌笑。孩子小的时候，她来打牌，把孩子放在柜台后头的竹睡篮里，一睡一下午，不哭不闹。郑胖婶那时候说过一句话：这伢将来有出息。如今这话没人提了，提的人少。

正月初十，她跟街坊凑钱送了个花圈去殡仪馆。灵堂小，人少，冷得站不住脚。她看了一眼遗像，出来在台阶上站了半天。照片是身份证上翻拍的，彩娥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在照相馆里坐直了拍的，又像睡着了被谁扶正的。

去年秋天也有一回，彩娥输急了，邻桌有人说风凉话，讲她挣的钱不干净。她把牌一推，站起来要掀桌子，是郑胖婶把她按住的。按住之后，拉着她到后院，给她倒了一碗凉茶，说了三个字：避一避。彩娥那晚走了，没结账。第二回来，照旧喊她胖婶，像那晚没发生过。人心换人心，有时候换不来，换不来也得换——这是郑胖婶开馆十年悟出的道理。

今晚这一桌，是老班子：剃头铺的老万，小卖部的春芝，收泔水的老秦，还有胡婆婆坐庄。牌过三圈，老万自摸了一把清一色，笑得后槽牙都露出来；春芝点了个炮，不服，起身去柜台买瓜子换手气。胡婆婆戴花镜，牌凑到鼻子尖看，一张牌看三遍。郑胖婶续水，收茶钱，耳朵支棱着。牌桌上的话，一半在牌里，一半在牌外。先是棉价，再是茶价，说着说着，就转到了松庭。

这几个人她都摸得底细。老秦收泔水起家，两个儿子一个跑运输一个开早点摊。春芝的小卖部就在对门，牌桌上的烟钱瓜子钱，一年流水有小一万。胡婆婆不缺钱，缺人，儿孙在深圳，一年寄三回照片回来。每个人心里的账，郑胖婶都记着，嘴上从来不提。麻将馆里没有秘密，只有不说的默契。

松庭的事有人讲，讲的人放低声，讲完喝一口酽茶。松风茶行开着的时候，半条街谁家没进过那道门：急等钱用，拎一饼茶去，当十还十一，一个月一转。老万当过一饼号称二十年的老茶，到期没钱赎，茶饼在玻璃柜里摆了大半年，人来人往都看得见。胡婆婆当过一对锡壶，赎回去了，逢人就讲茶行的公道。老万如今说起来，又松一口气，又臊：″他这一死，账烧了，我这脸也烧了。″

有人小声接一句：松庭放账，放的是活命钱，也是勾命钱。说完四下看看，把这句话咽了。

老万的剃头铺也在这条街上，两把椅子，一面水银斑驳的镜子。他说松庭那颗头，全城只有他剃得服帖，剃一回，茶行送一泡茶。如今镜子还在，头没了。这话说完他自己呸了一口，说口彩不好，重来：头还在，茶没了。满桌人笑，笑完各自摸牌。

十点多，进来个生面孔，西装外套搭在臂弯上，问这里可有个姓沈的老板，谈铺面。满桌的牌停了一停。郑胖婶给他倒了杯凉茶：″谈铺面去中介所，这儿只有码牌的。″生面孔坐下打了半圈，输了八十走了。他一走，桌上静了两圈，随即又响起来，比先前更响。

郑胖婶不掺和这些事，但她有她的耳朵。解放路口这半年来问铺面的，这是第三拨。前两拨是本地口音，这一拨口音重，问得细，连仓房后头有没有排水沟都问到了。她给续了凉茶，把话头支到中介所去。

松庭本人来过云香居两回，坐十分钟就走，茶钱压在杯子底下，压得平平整整。他走后有人翻开杯底，一张十块的。郑胖婶把那钱单独搁着，一直没进钱箱。现在想想，那钱她大概永远不会动了。

两个孩子的话头，是从"命硬"两个字上起来的。有人说沈家那孩子自打他爹没了就不见人，白得像个纸人；有人说唐老师收养的那个丫头，眼睛太老，六岁的孩子都没她眼神稳。说到后来，声音含混起来："一个克爹，一个克娘……"郑胖婶把茶盘往桌上一放："吃你家萝卜干饭。孩子家晓得什么。"满桌就转了话头。

深夜十一点多，最后一桌散了。收电器的跛脚刘多坐了一会儿，喝了郑胖婶一碗凉茶。话赶话地，又说起去年冬天的事——他在桌上输急了，出门透气，站在解放路口抽烟，看见两个伢影子一前一后地走。

"走得齐齐的，"跛脚刘比划着，"像一个大人在拖自个儿的影子。"

去年冬天他说这话，桌上笑成一片，说孩子下了晚自习结伴走，有什么稀奇。这回再说，桌上还是笑。有人问："跛脚刘，你那晚几多酒？"他认真想了想："半斤。"又是一片笑。有人接了一句："影子还能走不齐？除非一个是人，一个是纸剪的。"

笑得最响的，是说这话的人自己。

其实跛脚刘那晚还讲过一句，没人接。他说，两个影子个子差不多高，前头那个肩膀上好像背着个包。包里装的什么，没人问过。麻将馆里没人做侦探，牌摸完，各回各家。

跛脚刘开春去了广东，听说在东莞收废品。再没有人对他的眼睛感兴趣了。

老头子在里屋听收音机，单田芳的评书正说到关子处，一拍惊堂木。她插门闩之前隔着布帘骂了一句：几点了，声音小点。里头把收音机拧小了，哼出一声：睡你的觉。

第二天早上出摊，她在门口碰见来收泔水的老秦。老秦说，昨晚那个生面孔后来真去问了中介所，还去看了解放路口那间铺面。她哦了一声，把泔水桶递过去。桶换手的时候，两个人都没再讲话。解放路口她天天走，路口往东是望湖仓，往西是文化宫。这条路她收了二十年的茶水钱，头一回觉得它长。

郑胖婶把筹码收进抽屉，落了锁。石棉瓦棚上还存着白天的热气，麻雀在瓦缝里挪动。她关灯，插门闩，站在门后听了一小会儿街上的动静。

整条街黑下来了，只有她门口原先还漏出一线光。她把那线光也掐了。黑透的街上，湖那边的方向有一声水响，很轻。她听了听，跟自己说是鱼。

收牌的时候她想起一桩事，想起来了就搁不下。剪纸班的孩子从前放了学，从她窗根底下过，买锅盔，灌凉水，吵得房梁上的灰都动。那两个孩子也在这条街上走过——不是一路。沈家那孩子总在晌午过，书包带断过一截，用鞋带接着；苏家丫头总落在最后，走到糖塑担子跟前站一站，不买，又走开。

后来，那两个伢，再没来过云香居这条街。

◆

二〇〇六年六月，城西小学的栀子开了，香得发闷。毕业考考了两天，考完那天下了一场急雨，把操场上的粉笔道子全洗没了。

这个班她带了六年。六年前接手，点名册按笔画排，头一页上就有那两个名字，隔得远远的。六年里座位换了八回，两个人没同桌过一回——她没安排过，也没人调过，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年一年替他们挪开。她起初当是巧。后来不敢当巧了。

考语文那天上午，毛慧芳在考场外站了一场。铃响之前的教室静得能听见吊扇的电流声。苏穗的考桌靠窗，答完卷，她把卷角抚平，从头检查，铃响前五分钟放笔，两手交叠放在桌角。收卷的时候毛慧芳翻了一下，卷面干干净净，像印出来的。

考了两天，他都来了，坐最后一排，交卷交得早，出校门的时候书包带在肩上一颠一颠。照相那天没来。

监考的时候她走过他身边两回。卷面上该写的都写了，字比三年级时瘦，笔画却一笔不苟。第二回她走过去，他停了笔，等她过。整场考试，他抬头的

次数她数了，两次：一次看钟，一次看她。

考完那天清点试卷，他的卷子在最后一摞，压得很平。卷面左上角的名字写得很小，小得不像写自己的名字，倒像怕占了别处的地方。她用红笔在分数边上画了一道线，画完看了看，又把线描直了一点。有些孩子，你不给他描直，他就一直斜着。

成绩发下来，她把成绩单一张一张念。苏穗，全片区第一。念到名字时教室里静了一静，随即响起翻本子的声音。那孩子在最后一排坐着，把成绩单对折，放进书包最里层，从头到尾没有回头。

六年里她给这个学生写过十四回评语，越写越短。第一年写"该生活泼"，第三年写"沉静"，第六年只剩四个字：无可挑剔。无可挑剔四个字，她写的时候笔尖是沉的。教了三十年书，她头一回给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写出这四个字。

班上有个女生功课跟不上，怕人笑，从不开口求人。穗中午留下帮她听写，一天二十个词，帮了整整一学期。毕业那天那女生哭了，抱着穗不撒手。穗由她抱着，一只手轻轻拍她的背，一下，一下，节奏像数拍子。毛慧芳在门口看见，站了很久。她想，这孩子的温度在什么地方，平时看不见，看见的时候，已经要走了。

发毕业证那天出了太阳。校长在台上念名字，念到苏穗，台下拍手。孩子上台，双手接证书，鞠躬，弯下去的角度不多不少，直起来的时候证书抱在胸前。念到沈嘉木，没有人上来。台下有孩子笑了一声，被毛慧芳一眼压了下去。

散了会，一位穿黑呢子外套的老太太在教室外头等，等孩子们走完了才进来，说了一声费心，把穗的书包接过去。两个人在走廊里并肩走了几步，老太太说："孩子的作文，麻烦您留个底。"她说："留着呢。"老太太点点头，走了。这句话她后来想了很多回——留底，留的是什么底。

她当真去翻了作文。六年十二本，本本干净，字字入格，写的都是该写的事：我的母亲，一次劳动，西湖的春天。没有一本提到拣茶，提到牌桌，提到

巷子里的夜。最后一本的最后一篇是《二十年后的我》，通篇写她要在西湖边开一间茶馆，让天下人都来喝茶。结尾一句她划了又写，写了又划，最后留下的是：我会等一个人。

毛慧芳把这一篇看了三遍，没有批。红墨水拧开又拧上。

毕业照是第二天照的。摄影师在台阶上摆凳子，班长按个子排座次。轮到苏穗，她自己在最边上站定了。摄影师喊茄子的口令喊了三遍，三遍里她笑得一样，嘴角一样高，露一样多的牙。

照片冲出来，摄影师说这班孩子齐整，边上这个小姑娘最上相。毛慧芳看了很久。照片上，那孩子站在最边上，身子正，脸也正，像一张用尺子量着贴上去的剪纸。她把照片归了档，归档前多看了一眼边上的空位——那个空位，一直空到了照片边上。

毕业考最后一天放学，唐韵秋在校门口等。穗出来，先到办公室门口站了站，朝毛慧芳鞠了一躬，才跑过去牵住那只手。一老一小往西走，影子拉得很长。毛慧芳在窗口看着，一直到看不见。她教书三十年，送走过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头一回觉得自己像码头上送船的人——船开了，水面上什么痕迹都没有。

毛慧芳站在队伍外头，想起一句没处讲的话：这两个孩子，像两扇关紧的门。

她教了他们六年。成绩册上永远第一行的那个，值日永远做到最后——她留到最后走，把黑板槽抠得一根粉笔头不剩，抹布叠成方块。三年级以后话一年比一年少的是另一个，作业本却一年比一年干净。手工课上他的剪纸贴过校刊，教导主任要多裱两张办展览，他说纸是他的，收走了。教导主任笑他倔。她没笑。

还有一件小事，她记到如今。五年级下学期，班上丢了半盒彩色粉笔，翻遍了书包。第二天粉笔回来了，搁在讲台上，码得整整齐齐，少了两支。她没

查是谁拿的，也没问是谁还的。讲台底下坐着四十七个孩子，她一个一个看过去，没有一个抬头。

六年里她家访过沈家四回。头一回松庭在，客客气气，让烟让茶，说孩子的功课有劳。后三回，女主人一年比一年话少。孩子从来不在家访的场合出现——不是不在家，就是不出屋。她在联系册上写过六回"请家长多与孩子交流"，回回原样发回来，回回一个字没添。

毕业照前一个礼拜，教导主任找她谈过一回，说沈嘉木成绩滑坡，是不是家里没人管，学校要不要联系一下民政上。她把茶杯放下了："孩子有妈。"教导主任说他是为班上的平均分。她说，班上不缺一个平均分，缺的是人家屋里那本账。话说到这里，两个人都没了声音。

· · ·

家访是在一个傍晚。她去桥东巷做最后一次家访。巷口肉案前围着人，王春发正剁排骨，刀落得又密又响。柳文霞站在案边，手里拎一把小葱。王春发剁完了，挑一根筒子骨扔进她的网兜，两个人说着什么，都笑。柳文霞的笑很短，像划了根火柴，又吹熄了。

毛慧芳没有过去。她站在巷子这头，朝沈家二楼的窗户望——窗子开着，嘉木坐在窗前的方桌边剪纸。她仰头喊了一声。那孩子手里的刀没停。她又喊了一声。窗玻璃上映着他的影子，影子和人一样，低着头。

一小片一小片的纸从窗台上飘下来，白的，黄的，打着旋，慢慢悠悠落在青石板上。像一场很小的雪。

她弯腰捡起一片。半个人形，没有脸。她看了两眼，把纸片放回原处，用鞋尖轻轻拨到墙根底下，然后走了。家访的话没说出口，后来写在联系册上：暑假注意安全，少去湖边。

· · ·

放假前最后一天，她清毕业班的档案。历年的作文存根两捆，麻绳扎着，要交回教务处。她解开麻绳一本一本过数，过到最底下，抽出一本薄薄的：沈嘉木，三年级。

《我的爸爸》，一页半，铅笔字，笔画压得很重，纸背面全是印子。她靠着讲台又读了一遍。文中写爸爸的茶行，写爸爸的算盘，写家里有一杆秤，糖放少了称得出来，茶放少了也称得出来。写爸爸夜里盘账，算盘打到几点，他就听到几点。倒数第二行写：爸爸说，茶是树叶，称的是人心。

最后一行只有一道铅笔划的横线，没有字。

她把本子凑到窗口，对着光看那一道横线。铅笔压得太重，划破了纸。横线底下，前一层纸透出一个字的底子，像"秤"，又像"爹"。她看不清。教了三十年书，她头一回看不清一个三年级孩子的字。

毛慧芳把这一本从存根里抽出来，没交上去，也没舍得烧。她把它放进自己办公桌最底下一层，压在一摞备课本底下，落了锁。

空教室里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值日表还贴在墙上，粉笔槽里有半截粉笔头。窗外操场上，低年级的孩子还在闹。她带了他们六年，送出去一教室的孩子。只有这两扇门，到今天，她没敲开过。

◆

二〇〇六年八月，三伏，蝉从早叫到暗。竺长生家的小院里，秀珍把凉席搬出来拍了又拍，拍完铺在树荫底下，压四块鹅卵石。

通知书是七月半到的。邮递员的绿自行车在巷口按铃，秀珍跑出去，双手接了信封，又不知往哪儿放，最后供在堂屋的五斗柜上。信封她不拆，等竺长生回来拆。拆的时候，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遍。临床医学四个字，竺长生念了两遍。秀珍转身进了灶屋，半天没出来，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的，嘴上说是油溅的。

这个夏天他家有两桩喜事。一桩是小江考上了武汉的医学院；另一桩是秀珍的血压平稳了，医院减了一样药。

吃饭那晚，秀珍做了十个菜，粉蒸肉打底，蒸鱼、蒸茄子、蒸苋菜糊，天门人的席面，无菜不蒸。小江给爸妈各倒了一杯酒。

"爸，我上了医学院，往后你的血压归我管。"

"先管你妈的。"竺长生把酒喝了。

秀珍往儿子碗里夹菜："莫学你爸。你爸又把案子当饭吃，卷宗里泡了半辈子，饭凉透了才回家。"

"妈——"小江笑。

"我讲错了？"秀珍又夹一筷子，"你爸那个五斗柜，锁得比局里的柜子还紧。问他锁的什么，他不作声。"

桌上静了一下。竺长生把杯子放下。

"账。"他说，"旧账。"

秀珍哼了一声，起身给儿子添汤去了。

小江说："爸，等我毕了业，你提前退休，跟我去武汉住。"

"到时候再说。"竺长生给儿子斟上，"先把你自己的书念好。人体解剖，骨头一根一根记，你莫背岔了。"

一家人笑了一阵。院里的暑气退下去，秀珍收碗的时候，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了丈夫一眼，什么也没讲。

收桌子的时候，秀珍找剪刀，剪刀就攥在她自己手里。小江笑，她自己也笑，说人老了，手里拿着什么想什么。竺长生没笑。这个月第二回了。

八月二十九，他送小江去武汉报到。绿皮车是过路车，站台上人贴着人。秀珍塞了一饭盒煮鸡蛋，六个，说双数吉利。小江隔着车窗喊："爸，血压！"他也喊："记骨头！"车开了，他在站台上站到看不见车尾。回来的公交车上，售票员问他到哪儿，他半天没答上来。

小江走后没几天，蒋阔来家里坐过一回，拎了一箱汽水。两个人在小院里下象棋，将了一下午，谁也没提案子。收棋的时候蒋阔压低声问：″竺队，松庭那个案子，你还在翻？″

他把棋子一枚一枚装回木盒：″你听见什么了？″

″没听见什么。″蒋阔笑笑，″就是有人问起您。″

他点头，没再问。有人问起，比没人问好。有人问起，说明他还没有白熬。

· · ·

头一天下午他绕到望湖仓。卷帘门上换了新贴纸：门面转让，电话底下落一串号码。门缝里的蛛网叫雨水打得只剩几根丝。他站着抽完一支烟，把烟头踩熄，包进烟盒带走。这是他多年的习惯：走到哪儿，不留自己的东西。

夜里十一点，小江睡下了，秀珍也睡下了。竺长生进了灶屋，把米面柜里的面袋挪开半尺。柜底他夏天新加了一层夹板，隔出一掌厚的空当，里头躺着一只牛皮纸档案袋，三本笔记本按年份码着。秀珍量米，手伸不到这里。

他把材料在堂屋桌上摊开。头一本笔记本的第一页写着：十一月十八日，晴。望湖仓。往下字迹一页比一页密。第二本里夹着折成拇指大的一页纸，展开来，两个划掉的名字。第三本的头一页：四月五日，西湖后山。

档案袋里的东西，他一样一样点过：翻拍照片十一张，复印件七页，手记三本，还有半包没抽完的烟。烟不能当证据，只能当伴儿。点到复印页，他看见自己去年批的那个″属实″，橡皮擦过，没擦动，纸面起了一个小毛球。他用指甲把那个毛球捻掉了。

复印页的最后一张，贴着一张一寸照片：沈松庭，五十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办身份证明的那种照法，正面，不笑。他把照片看了很久。这个人他见过活的，也见过走的，哪一个都跟照片对不上。照片上的人只会一直做生意，一直打算盘，一直活着。

他又把三本笔记本的东西誊到一张包茶叶的白纸上，按日子排：十一月十八；一月五；一月九；三月十二；四月五。铅笔在日子之间连线，连到后来，一条线落在一双三十三码的鞋上，一条线落在一张黄纸上。纸的两头都空着。他把大白纸翻过去，扣在桌上。

翻过大白纸，他又在背面画了一条线。线是一晚上：六点，天黑；八点，牌局开局；十点，苏彩娥离开云香居；十一点二十，接警。线上有一个多钟头的空当，空当里什么都没有，什么又都可能有。他用铅笔把那个空当涂黑，涂到纸背都透了。

画完线，他把那晚自己的行踪也想了一遍。那晚他在队里值班，十一点前接到一个谎报的电话，说东湖有人落水，带人赶到，扑了个空。回来的时候车过解放路口，路口空空的，一盏路灯闪。他把这一条也写在了线的背面。

翻拍的照片他按日子钉成一排：茶行的门脸，暗渠，台阶上的棉鞋。钉到第四张，钉子弯了，他换了一根，手指头在钉帽上按了按。照片里那双鞋摆得端正，鞋尖朝着湖心，像一个人面向水面站着，永远站下去了。

卷宗照片他翻拍了一套：石膏模，暗渠，现场那张黄纸剪纸。翻拍的照片边上写满了小字，又用铅笔一道一道涂掉。

他问自己：证据呢？

刀口的方向，是推断。鞋印，实物在物证室，照片在卷宗里，鞋印只说明有个孩子到过暗渠——孩子到暗渠，捉迷藏也去得。剪纸的手法，满城的孩子都剪纸。学籍卡说明两个孩子同过学，天门的孩子，哪个不同学。两个名字，是他从班主任一句笔录里捡出来的。

嫌疑呢？他把"嫌疑"两个字写在纸上，看了很久，拿铅笔涂掉，涂得纸面起了毛。

十岁的伢——那四个字压着他的手。立不了案，也立不了心。他教过儿子：疑罪从无。他也这样教自己：没有证据的怀疑，对谁都是罪。

可他把材料一件一件归了档，没有烧。

有天夜里他把电话打到曹德贵家，响了六声，没人接。第二天他在菜市场碰见老曹买排骨，两个人都装作没看见。他不是没试过讲。前几年他试过一回，老曹把烟掐了，说：老竺，你这张嘴，要等到有纸包得住东西的那天再张。他一直没等到那张纸。

档案袋最底下有一只透明口袋，口袋里是那张黄纸的原件。那年冬天清点物证，编了号的都入了柜，这张纸在登记册上寻不见编号，跟着一袋杂碎物证到了他手里。他留了它。留它做什么，他说不清。

他把黄纸取出来，在台灯底下摊平。纸脆了，边角打卷，凑近有一股陈茶气。他拿两只压纸的石片压住对角。

现场照片上，这张纸只有指甲盖大，两个小人的眉眼糊成一团。他从没有摊开细看过。

灯下，两个童子剪得清清楚楚。左边一个捧盘，右边一个托盏，衣纹细密，圆孔如筛。他拿起放大镜，从衣领看到衣角，看到两只手的部位，停住了。

左边孩子捧盘的那只手底下，还剪着一只手。右边孩子托盏的那只手底下，也还剪着一只手。四只手，两只在明处捧着茶，两只在盘盏的遮掩里，牵着。

剪口收梢的地方，指头都分得清，一根搭在一根上头，牵得很紧。

竺长生把放大镜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桌角那杯茶凉透了，他没喝。

墙上的挂钟走到两点。秀珍起了一回夜，在堂屋门口站了站，没有进来，又回去了。鞋底擦着地，很轻。

他想把那行字想得更透一点。想不动。干了二十多年刑警，命案现场他进过一百多个。他晓得好些案子里，最要紧的东西都不是证据。是死人没来得及讲的话，是被吓哑的人不敢讲的话，是活人要带进棺材里去的话。他审过的人里，有人到最后一夜才肯开口。开口的都晚了。

这张纸上牵在一起的两只手，是哪一种话？他想不动，就不想了。

他想起晚上秀珍留的话，明早陪她去医院量血压。他应了。这些年他的血压总是偏高，医生说少熬夜，少想事。他答得很痛快，一样也没做到。

他又用放大镜顺着两个童子的衣领走了一遍。左边童子的领口，收梢向左；右边童子的，也向左。一张纸上两个小人，是一个人的刀口剪出来的。他把放大镜搁在桌上，玻璃片底下压着一圈灯光，像一圈看不见的手指。窗外的蝉不知什么时候哑了。

灶屋里，秀珍睡前温了一缸子牛奶，搁在灶台上，倒扣了一个碗。这是她的规矩：夜里加班，起来得喝口热的，不伤胃。他进去端出来，牛奶温得正好。他喝了一口，把缸子放回桌上，离那张黄纸远远的。

他在纸上写了几行，写了涂，涂了写。本子翻过两页。后半夜，他终于留下一行：

〞这不是证据。这是遗书。〞

第二章　阴林

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二〇〇六年九月，竟陵一中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初一（三）班重新排了座位。

陈晶晶坐在第四排。唐穗在她左前方，靠窗。窗子朝西，下午的日头斜进来，把课桌照成两种颜色，一种亮，一种暗。唐穗坐在亮的半边。

晶晶的母亲在陆羽大道边上开裁缝铺，改裤脚，缲边，烫衣裳，一天到晚踩缝纫机。铺子门脸窄，一进去先撞见蒸汽，然后才看见人。晶晶从小在铺子里长大，放学回来趴在案板边写作业，看人先看衣裳。

开学第一天她就看出来了，唐穗的校服跟谁的都不一样。

全校的校服是同一种蓝。穿在别人身上，几个星期就垮了，领子翻着，拉链开一半，袖口蹭得发灰。只有唐穗那件，蓝得发白，领口是平的，肩线是直的，两道裤线像用刀裁出来的。

后来晶晶知道，那不是新衣裳，是熨出来的。她专门看过，裤线的位置，前片在膝盖以上两指，不偏不倚，后片正压着腿肚。这种活计，她母亲做一件收两块钱，做完了还要对着光验一遍。

唐穗走路不看人。不是翘，也不是傲，是像走在一条只有她一个人的路上。早读铃响之前，她从后门进来，坐下，把三支削得一样长的铅笔并排放进文具盒，用指头把书角的卷边抹平。整套动作没有一下是多的。

她不用钢笔。晶晶问过她为什么，她头一回正眼看了晶晶一下，说：铅笔轻，错了能擦。就这一句，再没有下文。晶晶后来才咂摸出味儿来——她连写错的余地，都提前给自己留好了，留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九月底的一堂语文课，李老师抽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点到唐穗，她站起来，两手贴着裤缝，从“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背起，一直背到底，一个字没有打磕巴。她的声音也是平的，不高，不低，不喜，不悲，像替别人念一份东西。

李老师扶了扶眼镜，让她坐下。教室里安静了一小会儿，安静得能听见走廊里的风。

晶晶在底下看着那个背影，忽然手心发热。上午她刚把一只嚼过的口香糖按在前排女生的椅子上，那女生今天穿裙子。

入了秋，晶晶开始学她。

铅笔削得一样长，三支，并排。水杯用两只手捧着喝，小口。走路不看人——第三天就撞在传达室的门框上，额角青了一块，搽了一个星期的碘酒。她让母亲把她的校服也烫出裤线，母亲多烫了袋盖，嘴里说，这才叫板正。

她也改用铅笔，学唐穗把字写轻。结果作业发下来，李老师批了一句：字太淡，重写。她重写了三遍，一遍比一遍重，一遍比一遍不像自己。

倒是成绩自己上来了。晶晶学唐穗早到十分钟，学她把错题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学她上课把手放在桌上。期中考试，晶晶进了班级前十。家长会上班主任念了名字，母亲回来多给买了两根皮筋，粉的。晶晶扎上，对着铺子的镜子照，镜子里那个扎粉皮筋的人像谁，她说不上来。不是唐穗。唐穗不会扎粉皮筋。

她穿着烫了裤线的校服去上学，一整天挺着背，等一句夸奖。没有人夸。有一次她鼓足勇气借唐穗的橡皮，唐穗把橡皮递过来，点了点头，继续做题。橡皮还回来的时候，棱角还是新的，像没人用过。

还有一样晶晶学不来：唐穗不跟任何人走对门。放学的人流里，三五成群，她永远一个人，出校门往西，不快不慢，像量着走。有人故意在巷口等她，等来的也只有那一个不看人的侧影。晶晶跟过一回，跟到念庐的巷子口就

退回来了——青砖门楼，门楣上两个字，念庐。门槛内外，安静得像两个世界。

第三个星期，晶晶明白了。不对。

她不是讲究，她是省掉了多余的一切。桌上只有三支笔、一本书、一杯水。作业本包白纸皮，没有挂历纸的花纹，没有明星贴纸。回答问题只答问题，多余的字一个没有。就连笑，也只用到眼睛以下的部位。

晶晶学不来。她一学，就多出来。多出来的那部分，恰恰是唐穗身上从来没有的东西。

冬天的一个早晨，晶晶在校门口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送唐穗上学。女人替她把围巾掖了一掖，掖得很慢，掖完了又把帽子往下拉了拉。唐穗站定，由她摆弄，不躲，也不催。女人从布袋里摸出半只烤红薯塞进她手里，她捧着，捧得很稳。

女人走了以后，她把书包带子往肩上提了提，一手捧着红薯，一手扶着栏杆上楼，走进教室，把红薯搁在桌角，等到早读下课才吃。掰开的白气冒上来，她的脸在那点白气后头，看不出什么表情。

后来晶晶留了心。唐穗每天到校，早读铃前二十分钟，风雨无阻。传达室那口钟坏了两年，走得时快时慢，她跟它不一样，她自己的钟在身上。有一回落雪，全校迟到了一半，她还是那个点进门，鞋帮上一点雪，裤脚上一点雪，人干干净净。

老师们背后说，这孩子，稳重。只有李老师说过一句别的。李老师说：稳重跟稳重不一样，有的稳重是没经事，有的稳重是经过什么了。说完她自己摆摆手，笑，说瞎讲的。

年底卫生大检查，值周生挨个查桌洞。查到唐穗，桌洞里只有一个铁皮盒。值周生问是什么，她说，针线。值周生要看，她打开：两枚顶针，一小轴白线，一截红头绳。值周生把盒子原样合上，一分没扣，往后每回查到她，跳过去。

检查完了，唐穗把铁皮盒放回桌洞最里头。晶晶隔着两排看见那个放回去的动作：先放底，再放平，最后用两本练习册把它挡上。一截红头绳，值得这么收着。晶晶把这一眼收下了，收了很久都没想明白。

· · ·

领读原先是全都都的。

都都嗓门大，认人广。她父亲在北门开副食批发部，半条街的小卖部都从他那里拿货，门口常年停着一辆肮脏的厢式货车。班上一半人的抽屉里有她的话梅、辣条、橘子罐头。谁跟她好，谁放学就有人一起走；谁惹了她，谁的水壶就会被人拧开盖子。

十月月考，唐穗的名字上了红榜，班上第一。李老师把领读换给了她。李老师说：她的字音准。

都都在座位上切了一节课的橡皮，切得满桌子白屑。下课她把白屑拢在手心里，扬在唐穗的座位四周，像下了一场很小的雪。放学后唐穗留下来，用扫帚把雪扫干净了，笤帚放回原处，才背书包回家。谁也没看见她皱一下眉头。

闲话是从十一月起的。先是一句半句，在课桌缝里钻：你们晓得她亲妈是做什么的吗。后来就有了那个版本，说来说去只有半句——她妈是做那门子生意的，她也……

那半句像脏水，泼出去就收不回来。传到晶晶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添了眉眼，添了日子，添了谁谁亲眼看见。班上没有人当面问过她。

晶晶知道头一个讲的是谁。讲闲话前一天，都都请半个小组吃了话梅，一人两颗，酸酸甜甜。

讲闲话的人其实谁也没见过她妈。那个女人留给班上的东西只有两样：麻将，和西湖。两样都不解释，两样都够传的。

闲话后来传出了校门。铺子里的女客来缲边，压低嗓子讲，讲得有鼻子有眼：哪家茶行，哪一年，几岁。母亲手里的活没停，嗓门比平时高：王姨，你

这条裤子腰大了，得放两指。把她的话掐断了。晚上吃饭，母亲往晶晶碗里多夹了一筷子带鱼，什么也没说。晶晶扒着饭，扒得很慢。

再后来闲话换了方向，从同学传到老师办公室门口，又传回来，添了一句新的：唐老师图什么？一个退休教员，图一个来路不明的丫头？图什么，自己想去。

十二月初的一个早自习，唐穗站在讲台上领读《论语》。闲话从第四排起头，一行一行往后漫，压在读书声底下走，像水在冰底下流。

讲台上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个字一个字，平平地往前走，走过每一排竖起来的耳朵，走到后门，走到窗子外头去。

晶晶没有跟着念。她看着窗外。樟树上蹲着一只灰喜鹊，抖了抖翅膀，没有叫。

月底，李老师把都都叫去办公室，谈了两节课。都都出来的时候鼻子红红的，手里捏着一份检讨。闲话停了一个星期，又起来了，声音更小，像地底下的水。李老师没有再找谁，红榜上唐穗的名字却一个月一个月地往上走。

期末考完那天，班上炸了锅地扔试卷，纸片从三楼飘下去，像一场雪。唐穗的卷子留着没扔，一张一张订好，带回家。晶晶看见了，也把自己那张皱巴巴的语文卷子抻平，夹进了错题本。她没跟谁学这个，是那天看着看着，自己学会的。

放假前的最后一次早读，唐穗领完课文，站在讲台上帮李老师发卷子。日光灯嗡嗡地响。她把卷子一张一张发下去，发到谁桌上，就朝谁点一下头。点到的人，不管平日讲过什么闲话，都低着头接了。没有人看她，人人都在看她。

那天散学，晶晶一个人走到校门口才想起来，唐穗发卷子的时候，从头到尾，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同学的脸。

晶晶后来想，那大概就是怕。都都不怕老师，不怕家长，全班就怕一样东西——唐穗那个人，你冲她扔泥，泥不沾她。泥不沾她，就都掉在地上，掉在

扔泥的人自己脚边。

· · ·

二〇〇七年五月的一个课间，晶晶抱着一摞作业本上楼，在楼梯拐角停住了脚。

全都都堵在楼梯口，身后站着雷霞和王细细。雷霞胖，王细细爱笑，两个人一边一个，像两个门神。唐穗抱着一摞新本子站在下面一级台阶上，比她们矮半头。

“唐穗。”都都说，“星期天去废砖窑谈一谈，敢不敢来。”

楼梯间很静。楼下操场上有人喊传球，隔着玻璃，声音闷闷的。

雷霞在旁边嗤了一声。王细细的笑劈了叉，又忍住。

晶晶站在拐角，不敢动，也不敢出声。她看见唐穗抬起头，把都都看了一遍，又把她身后那两个人看了一遍。那目光不快，也不慢，像点数一样。

“好。”唐穗说。

说完她从都都身边的空当里走上来，脚步跟平时一模一样。都都扭头看着她的背影，看了四五级台阶，低声骂了句什么。晶晶没听清，也不想听清。

本子在晶晶怀里抱紧了，最上面一本的棱角硌着小臂。她在楼梯上一直站到上课铃响，下楼的时候，腿是麻的。

那天夜里晶晶翻来覆去地想：一个人怎么能连“怕”字都不带到身上。她想不明白，把被子蒙上了头。蒙了很久，她又把被子掀开，在黑暗里睁着眼。

废砖窑在城西。她去过一回，是小时候她爸带她去捡砖头垫鸡窝。那地方桑树密，天一擦黑，树影连成一片，大人都不去。

她翻了个身，把这件事跟被子压在一起，告诉自己明天就忘掉。

◆

二〇〇七年五月末的一个星期天，城西废砖窑。桑树林里的桑葚熟得发黑，蝉才开口，叫一声，歇一口气。

全都都起了个大早。夜里她翻了三次身，把两套话在黑暗里又默了一遍，窗外有夜班货车过，车灯从天花板上扫过去，扫了一道，又一道。她从自家批发部里挑了一包话梅、两瓶橘子汽水装进书包，又回屋换了双新凉鞋。凉鞋是上个月缠着她妈买的，白塑料的，走起路来咔咔响。她对着半人高的镜子把刘海抹了又抹。

出巷口的时候，卖糖人的正在收担子，铜锣都没来得及敲。天阴着，云压得低，像要下雨，又一直没下。都都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铺子，铁皮门拉了一半，她爸的影子在里头弯着，一箱一箱往里搬货。她心里忽然空了一下，像汽水跑光了气。她把这个空也咽了，跟那两套词咽在一起。

去窑上的路上，她在心里把要说的话过了一遍又一遍。要唐穗当着人把那句话收回去，要她认错，要她以后见了都都绕着走。她准备了两套话：一套是唐穗认错的，认了，就让她当着大家的面说三遍；一套是唐穗不认的，不认，就让她知道都都的厉害。两套话的结尾是一样的。

雷霞、王细细、刘丹在桥头等她。雷霞胖，怕她爸，出门前把书包里塞了两件旧衣裳，装作去同学家写作业；王细细一路笑，笑声劈叉；刘丹胆小，跟来是因为不来，下星期就没人跟她一起跳皮筋。

雷霞在桥头小声问：她要是不来呢？都都说：她敢。王细细说：唐穗那种人，独来独往的，指定带了人。刘丹说：带什么人，她天天一个人上下学。三个人吵这个，吵到桑树林边上，让都都回头瞪了一眼，才安静下来。

三个人一路剥桑葚吃，嘴唇染得发紫。都都回头说，等会儿别多嘴，看我的。

过了棉花地，桑树林就连成一大片了。五月底的棉苗才到脚脖子，嫩绿一片。桑树的荫罩下来，人走进去，像走进另一片更黑的林子。蝉声在头顶上一阵一阵。林子尽头是砖窑，轮窑，半截城墙似的一圈，烟囱歪着，顶上有个喜

鹊窝，窑顶塌了一角，长满草。喜鹊不知去向，窝还是热的，雷霞伸手探了探，说里头有蛋。王细细要掏，让都都骂回去了。窑门一个连一个，都黑着口。

窑门口堆着半垛没拉走的砖，码得整齐，砖上印着字：西河砖厂。有人拿粉笔在窑门上画过跳房子的格子，格子让雨水冲得只剩四个角。四个人走到这里，声音都自动小了。

唐穗来了。一个人，从大路那头穿过桑树林进来，校服洗得发白，裤线笔直，手里什么也没拿，脚上是一双干净的白球鞋。

都都把书包放在砖堆上，拉开拉链，拿出汽水，又塞回去，摆开架势：“唐穗，你晓得我喊你来做什么。”

“听你说。”唐穗说。

“外头那些话，是你讲出去的？”

“不是。”

“不是？”都都冷笑，“全班就你清白？”

唐穗没有接。她站在窑口的亮处，两只手垂在裤缝边，看着都都。那目光平得让人心里发毛，像一面太干净的镜子，照得都都看见自己染紫的嘴唇和歪了的刘海。都都准备好的两套词，一套也想不起来了。

都都把汽水瓶起开，灌了一大口，气从鼻子里顶出来。她把瓶子朝唐穗递过去。唐穗看了一眼，摇头。都都自己又灌了一口，把盖子拧上，手心里全是瓶子的凉。

王细细在旁边起哄，说窑里头凉快，里头能捡整砖。刘丹说里头有蝙蝠。雷霞推都都：你带头，你先走。走给他们看。

都都一咬牙，真就带头进了窑道。里头一股陈年的砖灰味，还有一点鸟粪的腥气。窑道两侧的门洞一个连一个，全是黑的，灰在那一小片天光里浮着。王细细踩上一块碎砖，尖叫了半声，自己笑了。

都都喊了一声：“都闭嘴。”

就在这时候，外头的桑树条响了一阵。

不是风。风过树，叶子是整片整片地翻；那一阵是一根一根条子地抽，像有谁从中间走过去。

都都朝窑口喊：“哪个？”

窑道深处没有回音。倒是窑口那边，刘丹尖叫起来，声音劈了：有人！有人跑——

乱的就是从这一秒开始的。

先是一只很小的手电亮了。光不大，贴着砖地扫过来，扫过都都的脚面。她朝光看过去，什么人形都没有，只有一片晃动的黑。接着黑暗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有谁被按倒在砖上，紧跟着是王细细变了调的哭声。

都都转身要跑。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按在她肩上，把她整个人按倒在砖堆上。

那只手不重，可是很稳。砖棱硌着她的锁骨，她动不了。她张开嘴，听见自己的尖叫撞在窑顶上，弹回来，盖过一切。

有一块砖从左边飞出来，贴着她的头皮砸在窑壁上，碎成三块。她没看清扔砖的人，只看清一条抬起来的胳膊——是从身子左边抬起来的。

然后是脚步，很多脚步，乱七八糟地往外踩。按着她的那个影子顿了一下。就一下，她看清了：很瘦，戴帽子，帽檐压得很平。影子松了手，退进侧面一个黑洞洞的门洞里，没有了。

都都后来想了无数遍，那一段到底有多长。半分钟？一分钟？她记得清清楚楚的只有几样东西：灰在光里浮，砖是凉的，还有那点光，一直贴着地，不往上照。没有警察来过。这几样东西，就归了她一个人保管。

窑道尽头的天光落下来一线，照见飞起来的灰。灰落定之前，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 · ·

都都爬起来的时候，窑道里只剩下她自己喘气的声音。膝盖火辣辣的，隔着裤子摸不出伤。

窑口亮着。唐穗站在亮里，背朝外，替她挡着风。傍晚的风从湖那边过来，穿过窑洞，呜呜地响。

“莫怕。”唐穗说，“我送您家回。”

她把校服外套披在都都肩上。外套是凉的，带着外头的夜气。

都都想说一句硬话，嘴张了张，没有出来。她抓住了那件发白的外套，指头攥得很紧。

穿桑树林的时候，她问：“你的人呢？”

唐穗走在她前头半步：“什么人？”

“就你——你是一个人来的？”

“嗯。”

都都不说话了。她回头望，砖窑的烟囱顶着灰蓝的天，桑树林黑成一片，蝉不知什么时候歇了。刘丹在林子边上哭，雷霞和王细细早跑得没了影。她自己的新凉鞋断了一只襻，一脚高一脚低。

到了大路，唐穗站住，替她把外套的领子拢了拢，就走了。走路的姿势跟平时一模一样，不看人。

都都站在原地看她过马路。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从她脚底下一直铺到马路对面，又让台阶裁成两截。影子那么长，人走得那么轻，像不是从同一个地方过来的。

都都在路口站了好一会儿。她想说的话，那句编了一路的、要唐穗认错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风把她额前的汗吹干了，她打了个寒噤，才发觉后背的衣裳湿透了。

星期一，雷霞没来上学。星期二来了，眼睛肿着，课间一直趴着，说什么都不肯讲。老师问起星期天的事，四个人口径出奇地齐：玩捉迷藏，摔的。

雷霞的爸不依，蹬着三轮把女儿抱到派出所，说孩子叫人吓掉魂了，夜里说梦话。材料做了一半，第二天他自己来了，说学校调解好了，赔了营养费，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撤了吧。走的时候他嘟囔了一句，被小吕听见了：孩子说，吓也吓了，救也救了，算了吧。

都都的爸也要去讨说法。都都头一回跟她爸犟，把筷子拍在桌上："去说谁？我连人都没看清。"她爸瞪她，她妈拉她爸的袖子。那顿饭没人再说话。

星期三，都都把外套洗了，叠得方方正正，课间放到唐穗桌上。唐穗说谢谢。都都说，该我谢你。唐穗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短得像没看。都都回到座位上，一节课没听进去。

第二天，有人在窑口捡到一只踩碎的橘子汽水瓶，绿玻璃，揣到学校里显摆。都都听说了，放学绕到那个人桌前，把玻璃片要了过来，走到河边，扔进了水里。玻璃片打着旋沉下去，她蹲在河边看到看不见，才站起来走人。

从那以后，全都都再没提过那句话。六月里有人想换个说法接着讲，讲唐穗那天自己摔的，装神弄鬼。都都把课本摔在桌上，走过去，一只手按住人家的桌面："再讲一句，试试。"

后来砖窑闹鬼的话在班上传开，越传越真：戴帽子的，红眼睛，专收说闲话的舌头。传到后来，没有一个人敢往城西去。都都听见这些话，一回也没有插嘴。那些话不像她记得的那一晚，可又句句像是替她记的。

从此没有人讲。她开始替唐穗做事：抬水，占座，发新本子，抢着干。唐穗每回都说谢谢。都都听着那两个字，半天接不上话。

夏天大扫除，她抢着把唐穗那份窗子也擦了。唐穗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一颗话梅，搁在她手边的窗台上。都都把那颗话梅含化了，核留下来，压在文具盒最底下。

暑假里她留在铺子里帮工，点货，理箱，一声不吭。她爸说她长大了。她没接话。长大这件事，原来是从不敢往后想开始的。

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晚上，她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在带锁的日记本上写。她把能记得的都往下写：桑树条响，一只很小的手电，按在她肩上的手，从左边飞出来的砖，帽檐。写到一半，笔停住了。

她盯着那半页字看了很久，把它撕下来，折成小方块，塞进了袜子底下。

日记本带锁，钥匙她拴了红绳，挂在脖子上。她妈翻出过一回，问是什么。她说是作业。她妈笑她，初中的作业还上锁。她也笑。笑完回屋，把锁又检查了一遍。

那把锁很小，铜的，锁眼比米粒大不了多少。她睡前又试了一回钥匙，开，合，开，合。试到第三回，她把钥匙含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才放回脖子上。

本子上只剩下最后写的一行字：

“我不敢想那晚的事。一想去，就看见唐穗的眼睛。”

◆

二〇〇七年六月九日，市局刑警大队。院里两棵栀子开了，香得发闷。

早上点名完了，各组分案子。入夏以来盗窃案压着几起，人手紧。大队长念结案率，念到他这个组，停了半秒，没点评。散会后年轻人在走廊里议论串案，声音很亮。竺长生端着搪瓷缸从他们身边过，谁也没觉得他慢下来，他自己也没觉得。他四十九岁，鬓角白了一半，看报纸要先伸胳膊。

城西派出所的小吕来送治安材料。交完了卷，小吕站在门口没走，回头看了一眼，把门带严实了，压低声音说：竺队，有个事，跟您说一声。

上月底，有个家长蹬着三轮，抱着闺女来所里，说孩子在废砖窑叫人吓了，要报案。闺女十三岁，初一的学生，竟陵一中的。夜里做梦喊，喊的话听

不清。材料刚起了个头，第二天家长自己来了，说学校调解好了，赔了营养费，孩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撤了。

“几个学生？”竺长生问。

“四个加一个。女孩子之间的事，看着像。”小吕挠了挠头，“就是那废砖窑，邪性。大人白天一个人进去都发麻。竺队，那家长撤的时候我跟了一嘴，他说了句怪话——孩子讲，吓也吓了，救也救了，算了吧。救也救了，这是啥意思？”

小吕在刑警队实习过三个月，跟过竺长生半年，懂一点分寸。把话说完，就退了半步，等着。

“家长姓什么？”

“蹬三轮那个，姓雷。雷霞的爸。”小吕说，“撤得利索，走的时候连材料纸都要了回去，说不好意思留字。”

“留字怕什么？”竺长生问。

小吕说，他问过，家长说留字怕学校多心。小吕说完自己也咂摸了一下，说不上来怕多心的是什么心。

竺长生把材料收进抽屉，锁了。他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栀子，给司机小陶打电话：下午去一趟竟陵一中。

校长姓万。办公室里挂着两面锦旗，一面“教书育人”，一面“桃李满园”，茶几上摆着不锈钢盘烟，烟灰缸是空的，擦得很亮。万校长递烟，竺长生摆手；倒茶，竺长生接了。

万校长两只手一摊：孩子之间闹着玩，吓着了，也赔礼了，也赔偿了，家长都签了字。学校有学校的规矩，内部消化了。

“万校长，孩子吓成那样，没问问看见了什么？”

“问过问过，政教处问了两回。”万校长把茶往前推，“小孩子，一惊一乍，讲不出个所以然。再说那一趟去的是废砖窑——那地方，出了名的邪性，

大人走夜路都绕着。怕不是自己吓自己。”

“四个孩子，一个不落，都是自己吓自己？”

万校长笑起来，眼睛眯成缝：“竺队长，快放假了。这种事闹大了，家长又要多想，学校也要背处分。都不是孩子故意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雷霞呢？还来上学吗？”

万校长摆摆手：“转走了，跟她爸回乡下外婆家了。这一摊子，算是了了。”他说“了了”两个字的时候，往椅背上一靠，像卸下一副担子。

竺长生看着他。他办了半辈子案子，认得这种卸担子的坐法。担子卸给谁了，没人在意。

临出门，万校长在走廊里追了一句：“竺队长，这事要真是刑事案件，你们管。不是，就别折腾孩子了。”

“我就是来看看孩子。”竺长生说。

政教处的老黄翻出一个牛皮纸夹子，把调解记录给他看了。记录三行半，字很工整。老黄又犹豫了一下，从夹子底层抽出两页复写纸：这是派出所头一天问的话，没编号，您看完还我。

问话很短。

问：星期天下午，你为什么在废砖窑？

答：全都都约我的。

问：她约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答：我说好。

问：你什么时候到的窑口？

答：我听到喊声才过去。

问：那天在窑口，你都看见了什么？

答：黑。

问：后来呢？

答：我送她回去了。

问：你看见那个人了吗？

答：没有。

被问话人一栏签着两个字：唐穗。字很小，笔画收得很紧，落在格子的正当中。

老黄在旁边说，这女娃，问一句答一句，一句不多，一句不少。做记录的民警说做了一辈子笔录，头回见这么稳的孩子。

老黄把复写纸要回去的时候，捏着纸角，忽然又补了一句：竺队长，这女娃的字，签得跟印出来的一样，笔画收在格子里，一点不出格。他上小学的时候，教写字的老先生讲过，字不出格，是格子里头有定数。

竺长生把那两页纸看完，还回去，回到走廊尽头没人的一间空教室，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铅笔，在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把那一句抄了下来：我听到喊声才过去。

抄完，他用铅笔把它圈了起来。

他坐了一会儿。空教室里还留着期末复习的黑板字，抄写工整，日期停在放假前。他从粉笔槽里拈起半截粉笔，又放回去了。有些字不能落在明处。落了，就得有人擦。

· · ·

从一中出来，车往城西开。

废砖窑还是老样子，桑树林把窑围了半圈，林子外头是稻田，再过去才是机耕路。竺长生让小陶把车停在路边，自己穿过桑树林走到窑口。

林子密，荫深，蝉声一进林子就远了。地上落了一层桑葚，踩上去黏鞋。他站在窑口，朝林子外头喊了一声。

隔了半分钟，小陶从机耕路那头小跑进来：“竺队，您喊我？”

“我在窑口喊，你听见没有？”

“没有。就听见蝉。”

竺长生点点头，打开手电，往窑道里走了十来步。门洞一个连一个，黑洞洞的，手电的光扫进去，像扫进棉花里，没有回声。窑顶漏下来的天光落在一小片碎砖上。他在砖堆前蹲下来。砖缝里有雨水冲出的细沟，上个月的雨把什么都洗掉了。

他蹲了很久，想起另一条暗渠——河埠头底下的那一条。三十三码，小半个鞋印，石膏模翻出来没几天就丢了，如今连卷宗里都只剩一张翻拍的照片。那半枚鞋印也是小，也是轻，轻得像怕惊动谁。三十三码的人，走路还没有砖堆高。他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没往本子上写。本子上的字，都要经得起别人看。

起身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烟囱。烟囱顶上有个喜鹊窝，窝边的枯枝让风扯掉了几根，悬着。小陶在林子外头按了两声喇叭。蝉还在叫，一声一声，把整个下午叫得很长。

上车前，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林子。桑树还没到最密的时候，叶子正面绿，背面灰，风一翻，半林子的绿半林子的灰。他这辈子见过各种藏人的地方，屋顶，地窖，芦苇荡。他头一回觉得，一片林子也能藏住一个下午。

回学校的路上，他绕到总务处，借看门窗的由头转了一圈。

器材室有几扇窗玻璃是破的，总务处安排各班轮流关。一个男生踩在长凳上，一扇一扇地关，关一扇，用手推一推插销，试过了，再关下一扇。袖口磨得发亮，手指头细，指甲剪得很短。

“哪一班的？”竺长生问。

男生回过头来。很白的一张脸，帽檐压着眉。

“五班的。”他说。声音很低，说完又转回去，把最后一扇窗的插销推到底，跳下长凳，把凳子摆回墙根，摆得跟墙线齐平。

竺长生站在门口没有动。总务处的老张凑过来，小声说：五班的沈嘉木。窗子是他自己找来的，说玻璃破了，冬天风灌进来，器材要冻裂。不要工分，白干。

“常来？”

“放学常来。”老张朝器材室努努嘴，“关窗，扫地，锁门，走人。一句话没有。要我说，这孩子不像他爸。他爸当年是场面人，茶行开得风风光光。这孩子闷，闷得像口井。”

竺长生嗯了一声，没接这个话。井这个东西，往下看是黑的，往下打，是有水的。

总务处的墙上贴着一张报修单，日期是上个月，报修事项一栏写着：器材室窗户三扇，玻璃破。处理意见一栏空着。字一横一竖都到位，落款只有名字，没有班级。

这个名字他认得。去年秋天的卷宗里，家属栏上有它，他在旁边画过两个圈。

男生从他身边走过去，朝他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人就没进了走廊。走廊很长，他的脚步声很轻，轻得不像一个半大小子。

· · ·

下午再进政教处那栋楼的时候，竺长生在门口的长椅上看见了一个女孩子。

她坐在椅子上等，脊背离开椅背一指宽，两只手捧着一个玻璃杯，杯壁上印着褪色的红双喜，杯里是热水，冒着细汽。看见他，她站起来，把杯子先搁在椅面上，才开口，叫了一声：竺叔叔。

声音不大，很稳。

“伤着没有？”他问。

“没有。”

“别怕。有话跟老师讲清楚。”

“嗯。”

她重新坐下，把杯子捧回手里。竺长生在长椅另一头坐下来，隔着一个人的位子。走廊尽头的窗子开着，操场上有体育课的哨子声。

“废砖窑，远不远？”他问。

“走路半个钟头。”

“你一个人走回来的？”

“送同学回去，再回来的。”

“路上不怕？”

“不怕。”两个字接得很快，快得像预演过。

政教处的门开了，老黄探出头喊她进去补签字。她应了一声，先把玻璃杯捧起来，走了两步，递还给闻声出来的万校长。

长椅上剩下一小片暖。竺长生低头看了看椅面，坐过的地方没有痕迹，杯底搁过的地方有一圈极浅的水印，眼看就要干了。

水是满的，一滴没有洒。万校长伸手去接，手背碰了碰杯壁，说了句烫。女孩子说：晾过了，正好。

万校长把杯子放在案上，转回来对竺长生笑：“您看，这么大的孩子，稳当。”

竺长生没接这个话。稳当，他这些年听得多了。塌下来的东西，塌之前都稳当。

万校长愣了一下，笑了。女孩子进了门，背影很直，头发扎得一丝不乱。竺长生站在原地，看着那扇门合上。

回局的时候天擦黑。街上下班的人多起来，三轮车、自行车、卖西瓜的摊子，副食店的喇叭里放着歌。车过西湖路，望湖茶仓的卷帘门拉得死死的，门上换了一张新封条，白纸黑字，在暮色里很扎眼。

“停一下。”

车靠了边。竺长生下车，站在马路这边，隔着一条人行道看那扇卷帘门。封条是新换的，浆糊味隔着街都闻得到。有个骑车的孩子从门口过，弯腰扶了一下车把，又骑走了。

他上了车。小陶把车绕着西湖开了一段。湖上有风，柳条秃着，水面泛灰。烟抽了半截，他掐了，把烟头带走，扔进车载的灰盒里。

小陶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竺队，这事，也归咱们管？”

竺长生看着窗外，隔了一会儿才开口。

“这案子要是有人做，做得比大人还干净。”

小陶没听明白：“您说啥？”

“没什么。”竺长生说，“开车。”

收音机里正报着天气预报，说明天多云转晴。竺长生伸手把声音拧小了。拧到没有。

◆

二〇〇七年暑假快过完的时候，工人文化宫的梧桐比往年厚，把半个院子罩在荫里。

齐守拙的剪纸班还开着。说是班，其实就剩十来个孩子，大的上了初中，隔三差五来一趟；小的住在附近，放了暑假天天来。文化宫好几年不拨钱，他分文不收，纸是市场上论斤称的黄板纸，剪刀是孩子们自家的。

齐守拙七十四了。十九岁进裱画铺当学徒，师傅教的第一句话是：裱画裱心，剪纸剪魂。一双手在浆糊和宣纸里泡了五十年，稳得像机器。退休那年文

化宫缺个哄孩子的差事，他就把剪纸班接了下来。班是九六年办起来的，头一届的孩子如今都当了爹妈，隔几年还有人领着自己的娃回来看一眼。红火的时候，活动室塞四十个孩子，排笔、剪刀、黄纸摆三排案子；后来一年比一年少，少到如今十来个，案子撤剩一张。他不催，不劝，来一个教一个。名册没造过一本，他心里有一本。

他有一本蓝布面的样册，自己装裱的。册子原本是给人看装裱样式的，里子有夹层——装裱匠的老手艺，夹层原是藏裁刀落下的边条用的。后来夹层里藏的东西换了。

换是从什么时候起的，他记不清了。起初是几个孩子比手艺，你夹一张，我夹一张，夹着夹着，成了暗地里的往来。他发现的那天坐了半宿：揭，是不忍心揭的；捅破了，孩子们就散了。他后来想通了一个理儿——邮局不问信里写什么，邮局只管送到。他当这个邮局，当到今天。

剪纸班的孩子们都知道这个夹层的用处：剪得好的纸，可以夹进去给先生看。夹在哪个页码，先生不问，也不说破。

夹层最底下那一层，从二〇〇五年冬天起，渐渐厚了。黄纸的、红纸的，一只船，一座桥，一只手电。齐守拙一张一张都看过，看完原样压回去，谁也不告诉。他只在节气的时候，往活动室的窗台上摆一盏小灯笼：元宵摆兔灯，中秋摆荷叶灯，摆三天，收回来。那算他的回话。摆灯的日子前后，夹层里的纸就会多一张。

有个小的问过他：先生，摆灯做什么？

他说：给走夜路的照个亮。

那孩子说：走夜路的又看不见纸。

他说：看得见的路，不用照。

孩子似懂非懂，走了。他站在窗台边上，把那盏荷叶灯扶正，扶了又扶。

窑口的事过去两个月，夹层里多了一张纸。

黄纸，剪的是一把伞。伞很大，伞骨十七根，一根没断，一根一根数得清。伞底下站着两个小人，一个高些，一个矮些。高的那个是女孩，梳辫子，双手举着伞把，伞面明显地朝矮的那边偏过去——女孩撑着伞，罩着男孩，自己的半边肩膀露在伞外头。男孩的手藏在女孩的衣角后面。

齐守拙对着那张纸坐了一个晚上。

活动室的灯是根日光灯，一头闪。他就着那点光，把伞面上的每一个锯齿看了又看。剪口干净，走刀不回毛，握剪的手比去年又稳了。他把纸翻过来，背面有铅笔淡淡描过的底稿，稿子改过一次，伞柄改长了一点——改的人怕另一个够不着伞把。

天亮的时候，他也剪了一张：一座砖窑，圆的窑顶，顶上一弯月亮。月亮的边剪出一圈细细的毛口，像霜。

他把两张纸并排摆在案子上看了很久，然后把自己的那张夹回夹层，压在伞的旁边。

那天中午，他把伞那张纸又抽出来，压在案子的玻璃板底下。吃饭的时候看一眼，吃完饭看一眼。黄纸旧得快，边角卷起来，他用浆糊点了两点，点在背面，正面一点没动。裱了一辈子画，他知道纸的脾气：纸要人守。

那年秋天，他开始睡不好。装裱了一辈子纸的人，头一回装作看不见纸上的话。他躺在阁楼上，听着底下的老座钟，一遍一遍地想：纸上的事，纸会收着。纸不会讲。人老了，眼睛也该学着装裱——有些东西，裱进里子去，面上要平。

夜里他起来两回。头一回，他把样册从樟木箱里取出来，坐在灯底下，打开，看了一眼，合上，放回去。第二回，他走到箱子跟前，站着，没有开。第三回他没起来。老座钟敲了两下，他在黑地里睁着眼，听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跟座钟一个走法。

有一夜他摸到锁，指头在锁面上停了停。装裱的人都知道，纸最怕两样东西，一样是水，一样是热。他守了一辈子纸，守到这会儿才明白，纸最怕的其

实是人——人一来，纸就要说话。

· · ·

十一月里，文化宫的围墙上贴出了公告，红头，盖着章：这一片划入拆迁范围，明年开春交地。

来看公告的人把墙根围了几层。有骂的，有叹气的，有当场蹲下来抽烟的。放映厅早改了台球室，台球室又空了两年；图书馆的牌子锈得只剩“图书”两个字。老人们围着公告，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完了互相问：真的假的？真的。

齐守拙挤不进去，也不用挤——他在这院里三十年，墙上的字，闭着眼都猜得到。

公告贴出来第三天，有人拿红漆在墙上写了个大大的“拆”字，圈了一个圈。字写得很潦草，圈倒是圆的。齐守拙从底下走过，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圈。圈这种东西，他熟——裱画的人管那叫局，画里留出来的一块空。可这一回，圈里圈外，都要空了。

剪纸班放到寒假就停了。腊月里最后一个周六，他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

那天来了七个孩子，大的小的挤在一排。他把一张黄纸对折，剪刀开一个口，转几个弯，抖开来，是一个捧茶的小人：双手齐胸，捧一只碗，头微微低着。

“这一式，叫奉茶。”他说，“纸要留白，手要留情。留白，纸才活；留情，剪子下头才有人。”

他把这句讲了三遍。有个最小的问：先生，奉茶奉给谁？齐伯说：奉给喝的人。那孩子问：要是没有人喝呢？齐伯顿了顿，说：那也剪。剪子在手里，人就得端正。

孩子们低头剪，剪出来七个捧茶的小人，歪的歪，斜的斜。

唐穗那天也来了。她上初中了，坐在最靠窗的位子，剪得不快，一剪子是一剪子。收上来，她那个小人捧茶的手势最稳，茶碗的弧线一分不差，连小人低头的样子都剪出来了，低得很轻。小人的眼睛，她剪成了两道细缝——全班只有她剪了闭着眼奉茶的。

齐守拙把那张纸端详了很久，夹进样册最上层。

孩子们走后，他扫纸屑，扫出来七八个歪歪扭扭的捧茶小人。他一张没扔，抚平了，一张一张夹进样册最后头。有人问过他留着这些做什么，他说，这是头一份奉茶，算学生们给他这个老东西的礼。礼这个东西，收了就要还。怎么还，他还没想好。

嘉木没来。那天从早到晚，门口的铃铛没有响。齐守拙教课的空当往门口看了几回。铜铃铛是六十年代文化宫挂剩的，风一过就响。那天没有风，铃铛哑了一天。

散了课，他把活动室的灯管卸下来，收进纸盒。日光灯闪了三年，他一直说修，一直没修。灯管取下来的时候，屋里暗了一瞬。他站在原地，让那一瞬长了一点。

锁门的时候，他在门口站了站。三十年的屋子，黑下来是一样的黑，可是这回的黑不一样——往后再开灯，就不是他开了。

· · ·

开春，拆迁队进场之前，齐守拙开始收拾东西。

展板拆了，图钉一颗一颗拔出来，按大小收进铁盒。墙上的范样一张一张揭下来，揭坏了两张，他捏着那张破纸站了一会儿，没有扔，抚平了，夹进一本旧画报。黑板没擦——上学期的值日表还在，粉笔字淡得像雾。他看了几眼，转身去拆案子。

一个傍晚，铃铛响了。

嘉木站在门口，帽子戴着，书包没放下。齐守拙给他倒了碗糖水，搁在案角。他没喝。进来，不说话，动手帮他抬案子，拆架子。拆下来的木条，他按长短码好，长的靠墙，短的归堆；图钉他分了颜色，一撮一堆；地上散着的碎纸，他拢成一小把，捏在手心，走到门口，撒进了墙角的砖缝——纸要回土里，这是齐伯从前随口讲过的话，他记住了。

干完活，孩子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夹进样册，转身走了。铃铛响了一声，人就没了。

案角那碗糖水，原封没动。碗底一圈糖沉在那里，像一小片月亮。后来那只碗他洗了三遍，倒扣在案子上。碗底那圈糖，洗到最后也没洗尽，结成一层薄薄的、发亮的壳。

齐守拙翻开夹层。也是奉茶的小人，黄纸。只是那小人捧着的茶碗是倒扣的，茶水剪成一条线，一直流到纸的边上，断在留白里。

倒着递的。

齐守拙把那张纸对着灯看了很久。教了一辈子，收上来的是倒着的一杯。他把纸放平，指头在那一道茶水上按了按，收进夹层最底下，压在那把伞的旁边。他做了一辈子装裱，收过多少人的字画，头一回觉得手里的纸沉。他把它压平，像收一份没有人来交的作业。

拆迁办的人来登记那两天，问他班里有多少学生，要造册，说是政策，要给办班的人算补偿。

“记不清了。”他说。

登记的人笑：先生连学生的剪纸都留着，会记不清人数？

“纸是纸，人是人。”他说。

登记的人还要问，他起身给人家倒水。水倒得很满，满得端不起来。登记的人捧着那碗水，没法再问，喝了两口，走了。

门板外头一场雨一场雪地过，转眼到了交地的日子。拆迁前夜，齐守拙一夜没怎么睡。

他把活动室的钥匙交给了留守处，交钥匙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黑黢黢一间屋，窗台空着，灯笼的挂钩还在，钩尖上有一点锈。

回到住处，他把样册用牛皮纸包了三道，绳结打在背面。樟木箱腾出来，底下先铺一层旧报纸。样册放进去，四边用装裱剩的绵纸塞紧，摇一摇，不响。

最后，他从阁楼的梁头上取下一盏荷花灯。竹篾扎的骨，粉纸剪的花瓣，瓣尖上还留着他的指甲印。是有一年元宵他给班里扎的样灯，说好了教孩子们扎，后来一直没腾出空，一直没舍得点。

搬了两回家，灯还是新的。

有一年他扎了两盏，一盏大的摆在班上，一盏小的在案头。大的那盏让哪个孩子提回家去了，他没追。小的这盏，他留到今天。留东西的人都有个毛病——总觉得日子长，总觉得有一天派得上用场。这一天还没等来，文化宫先没了。

他把灯放进箱底，压在样册底下，合上盖，落了锁。钥匙用红绳拴了，贴身挂着，贴在心口的位置。夜里翻身，钥匙硌他一下，他没挪。

外头，文化宫的墙已经推倒了半边，月亮照在砖堆上。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跟他在纸上剪的那一座，一模一样。

◆

二〇〇八年正月十六，柳文霞嫁到了陆羽大道北头。

酒席办了两桌，男席女席，就在院子里搭的棚。鞭放了三千响，鞭炮屑落在残雪上，红一层。街坊随礼随得厚，谁都知道王胖厚道。王春发街坊都喊他王胖，从前在粮站扛麻袋，粮站散了以后开翻斗车拉砂石，一天到晚一身灰，

一双手掌比蒲扇宽。他话少，敬酒的时候只会把杯举得比别人高，笑容憋得满脸通红。

彩礼没怎么讲究。王胖把一张存折压在文霞枕头底下，密码写在小纸条上，纸条折了四折。街坊说闲话的也有：带个半大孩子改嫁，图什么？王胖听见了，嘿嘿两声：图有个家。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给嘉木的自行车上油，油抹得匀，一圈一圈，比给自己那部翻斗车上得还细。

嘉木穿了件新衬衫，领子大了一圈。王胖喝到半酣，拉他起来给客人敬酒，他站起来，举杯，滴酒不沾，说：叔叔阿姨。满桌人笑。他站着，等笑完了，把杯放下，坐回去，接着吃饭。满桌的笑还没停利索，又都咽了回去。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反正那孩子一坐下，桌上就安静了一块。

搬家那天，文霞把沈家的旧物拢了三箱，抬进新家的阁楼。嘉木骑了那辆新车，没说谢，也没说别的，像房租里含了这辆车。链子掉了，他自己修，蹲在院里捣鼓半个钟头，从不喊人。

院里有一棵石榴树，是老住户留下的。秋天结果，王胖摘下来给嘉木塞了两个。他接了，没剥。石榴在窗台上搁到过年，皮干成了褐色，掰开，里头的籽还是红的。

吃饭的时候，王胖给他夹排骨，夹了三回。嘉木碗里的排骨堆成了小山，一块没动。文霞说，吃。他动了一下筷子。

夜里文霞跟王胖说，这孩子认生，处久了就好了。王胖说，孩子嘛，大了就好了。

她改口改得很硬。其实她自己没说出口的那句是：他不是认生。他是谁的屋檐底下都能待，待着，像房客。房客不拆屋，也不添砖。

他跟街上人没来往，上学放学一个人。有回下大雨，王胖开车路过学校，想捎他，按了两声喇叭。他回头看了一眼，把头低下去，继续在雨里蹬。王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那个背影一点点变小，回过神来，自己都奇怪眼眶怎么热了。

嘉木读初二了。话越来越少，成绩单发下来，他在灯下看一会儿，折成小方块，压到枕头底下。只有手工课的奖状年年有，灰墙上贴了一排，五张，纸都黄了，浆糊印一圈一圈的。文霞掸灰的时候数过两回，两回都是五张。有一回她多看了一眼，奖状上的红章盖得很正，像不敢有一丝歪斜。

开春的家长会，她去了。坐在最后一排，听老师们念成绩，念到她儿子的名字，念得很平，像念一页过期的日历。散了会她没走，在教室后头站了一会儿。黑板边上贴着孩子们剪的窗花，一张一张，其中有一张捧茶的小人，她一眼就认出来了，像认出自家的一样东西。她没去揭，看了两眼，出来了。走廊里风大，她把衣领拢了拢。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她绕到老街给嘉木扯了一块灯芯绒，藏青的，做裤子。裁缝铺的师傅问她做多长。她报了个数，师傅看了她一眼，说，孩子蹿个儿，放两指吧。她点了点头。回家的路上她算了一算，儿子十三岁，个子蹿得快，衣裳一年一换，奖状一年一张，都不等人。

三月里一个落雨的晚上，曲健来了。

他没进院子，站在院墙外头，隔着门缝说话。手里拎着两瓶黄酒，酒瓶上还挂着水珠。说去看看文霞，顺路。手指头黄得比烟熏还深。

他要下广州。跟人做灯饰生意，本钱差一截。“文霞，就这一回。广州那边，楼一栋一栋起，灯一串一串挂，钱就悬在头上，看谁伸手快。”

文霞在门里站着，没开门。雨丝斜着飘进来，打在门框上。她说，我改嫁了。

曲健在外头笑了一声，笑声很短：“改嫁好。改嫁了，日子就长了。”

他顿了顿，又隔着门缝说：“那孩子呢？长高了吧。”

“我的孩子，你少打听。”

“瞧瞧，”曲健在墙外头咂了咂嘴，“我掺和什么，我又不是他爹。”

雨大了一点。曲健把黄酒往门缝里推了推，没推进来，又拎回去。

“文霞，”他忽然说，“你说怪不怪，我这半年，老做同一个梦。”

“什么梦。”

他不说，笑了一下，摆摆手，走进雨里。那两步路走得深一脚浅一脚，像河滩上的人。

文霞把门关上，背靠着门站了一会儿。门外的脚步声下了台阶，过巷子，远了。她到这时才发觉，自己一直屏着一口气。三年了，那个人一开口，她还是要屏一口气。

文霞从屋里抽出五百块钱，第二天托人捎去的。手没碰着他的手，她故意隔了一天。钱送出去她就后悔了。后悔的不是钱，是他问那孩子时的那种口气——不是关心，是点货。点她还剩多少，点那孩子在哪儿。

· · ·

四月里出太阳，文霞上阁楼晒东西。

王胖说了，沈家的旧物该卖的卖，该烧的烧，别压着，压着晦气。三只纸箱摆开，账本发霉了，一册一册沤成砖；小铜秤的盘锈成绿色；几只茶叶罐，空的，摇一摇，罐底当啷响；一摞抵押的单子，茶行里抵钱抵茶用的，名字都让水洇了，一个都认不出。

最底下有一只蓝布面的本子，边角起了毛。她拿起来掸灰，抖出几张黄纸剪的小人来，剪纸落在脚边，她没敢细看，拢起来，随手扔进了烧水的炉膛。火苗舔了一下，纸卷成黑的，没了。

夜里躺下，她把那几张小纸人又想了一遍。没看清眉眼，只记得纸角——纸角都是齐的，齐得像有人剪完了又数过一遍。

本子的第一页是题的字。一行钢笔字，笔画很沉：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底下一行小字：甲戌年正月得子，取名嘉木。

文霞捏着本子，在阁楼上坐了半天。太阳从瓦缝里漏下来，一柱一柱的，灰尘在光柱里翻。

她想起从前柜台上的样子。松庭趴在账台上抄书，一抄抄到后半夜，抄了三个冬天，说茶行的儿子不认得茶经，出门叫人笑话。她那时还笑他酸，一个卖茶的，装什么读书人。原来名字是早先就起好的，一笔一画，写在这行老话底下。抄到后头某一页，那支歌的地方，字忽然大了，一笔一画，像刻上去的。

封皮的角上有一道细口，斜的，一刀，像剪刀试锋试出来的。她用拇指抹了抹那道口，抹不平。

本子的后头缺了七八页。撕口很齐，不像烂的，像撕下来另有用处。她想不起那几页上写过什么，只记得松庭提过一嘴，说抄了多少年，才敢把那支歌抄上去。

她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又合上了。

炉膛里的火苗矮下去。她起身爬下阁楼，把本子塞回箱子最底下，把箱盖压严了。

晒到天黑，三只箱子又原样搬回阁楼。她跟王胖说，卖不得，烧不得，放着。王胖说，放就放，一间阁楼，还放不下三个箱子。

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有些东西烧了，火会记着。

· · ·

入夏以后，夜里常有那个声音。

沙——沙——

不紧不慢，从隔壁那间屋的墙缝里过来，一下，一下，又停。停一炷香的工夫，再来。

文霞的失眠是老毛病，安定从一片减成半片，又加回一片。药片压在枕头底下，罐子里还剩小半瓶。半夜里那声音一起来，她就睁着眼躺着，数那声音的间隔。一下，两下。有时候是后半夜，有时候天快亮了还有一下。声音不吵，就是磨，磨得人心口发紧。

王胖夜里打呼，鼾声像拉风箱。文霞失眠，听着那鼾声，有时能睡着，有时更睡不着。睡着的那几回，梦见的全是老茶行的柜台，柜台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灯，灯底下坐着个人，看不清脸。她惊醒了就去摸枕头底下的药瓶。

白天她问过嘉木一回：手工课的东西，夜里磨它做什么。

嘉木在吃饭，扒一口，说：钝了。

就两个字。再问，饭粒在嘴里，不答了。王胖在旁边打圆场，说男孩子舞刀弄剪，正常，他小时候还磨过镰刀呢。

六月里的一个半夜，那声音又来了，比哪天都长。文霞睡不着，索性起来，站在堂屋里。凉席的印子在她胳膊上。王胖起夜，看见她黑地里站着，吓了一跳。

“睡不着？”他压着嗓子。

文霞往隔壁的方向偏了偏头。沙——沙——还在响，比锯子钝，比锯子慢。

“这伢夜里磨剪子，磨得像隔壁在锯棺材。”

王胖听了一会儿，打了个哈欠：“孩子嘛，做手工。回头我给他寻块好磨石，省得他费劲。”

他回屋睡了。文霞在黑地里又站了一会儿。窗外的狗叫了两声，停了。那磨的声音，也不知什么时候，没了。

第二天王胖真去街上买了块青磨石，搁在嘉木门口。晚上那孩子放学回来，把磨石拿进屋，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声：谢谢叔。

王胖高兴了半个月。街坊来串门，夸他会疼人。王胖摆手，说孩子懂事。懂事这两个字，文霞听着，像别人替她儿子起的外号。她儿子懂不懂事，只有夜里那面墙知道。

月底盘账，王胖把嘉木的名字添进了家里的账本，一家三口，一人一栏。嘉木那一栏的用项底下，他写了四个字：手工材料。字写得笨，笔画挤在一

起，像一个攥紧的拳。

文霞没有高兴。她夜里躺着，听隔壁安安静静，静得比磨刀声更难受。那天以后，她把堂屋的门闩插上了。第二天早上，又自己拔了。拔的时候她站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把闩用布擦了擦。

◆

二〇〇八年十月中的一个晚上，竺长生把卷宗摊在办公桌上。

局里刚开完三季度总结会，楼道里人走空了，食堂大姐给他留了饭，两个馒头一碟咸菜，凉在餐盘里。他把台灯拧到最亮，从柜子最里头取出一只牛皮纸袋。袋口的绳绕了三年，纸边都起了毛。

从二〇〇五年冬天起，每年入秋，他都要把那桩案子从头到尾过一遍，不叫人知道，也不叫自己忘。老伴笑他守着一口冷灶。今年他给这个规矩起了个名字，写在私人笔记的扉页上：年检。

过卷宗有他自己的记法。纸袋里不用案卷编号，用节气记：霜降看的，就在纸角点一个点；冬至看的，点两个。三年下来，纸角密密的，像另一张剪纸。保安十点巡楼，手电在门玻璃上扫一道。他等那道扫过去了，才把牛皮纸袋摆开。

有一年他试着把纸袋锁进档案室，钥匙交了，夜里睡到一半又坐起来。第二天他以旧案回访为由把袋子取了回来。老何说，竺队，你这个讲究。他说，不是讲究，是习惯。老何说，习惯也能害人。他说，那也要害在明处。

今年多了一样东西。

一张旧报纸，他托档案馆的人找出来的，《天门日报》，二〇〇三年冬天的，报缝里一条消息，火柴盒大：工人文化宫少儿剪纸班举办迎春展，退休裱裱匠齐守拙携学生现场献艺。配了一张黑白照片，老人坐在案子后头，一群孩子围着，举着剪好的纸，脸都小，看不清谁是谁。

竺长生把现场剪纸的照片从卷宗里抽出来，跟报纸照片并排放着，放大镜底下看了半个小时。

锯齿纹的走向是一样的。从右往左挑，密而匀，收口带一个小月牙。月牙的弧度，两张纸上几乎能对上。这不是巧。一师门里的手上功夫，跟人的笔迹一个道理，改得了字形，改不了运笔。

他又抽出一张二〇〇五年的现场照片，看那张“双童奉茶”的边角。剪的人手稳，锯齿密而不乱，一路剪下来没有一处补刀。补刀，是心虚的人才会有的动作。这张纸上，一处都没有。

他把报纸照片用翻拍架拍了一张，注明出处，收进纸袋。铅笔在报纸上“齐守拙”三个字底下画了一道。画完，又拿橡皮擦了。纸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压痕，比墨迹淡，比什么都重。

他把两张照片收好，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二〇〇五现场与剪纸班手法同源。往下又写：该查的，历届学员名单。

写到这儿他停了停。文化宫没了，班散了，人散了。名单在哪儿？他划掉“名单”两个字，写：先去见一见这个人。

· · ·

第二天下午，他去了文化宫。

围挡拆了，主楼还立着，窗户全空了，风从窗洞里过，呜呜地响。院里的梧桐还在，树底下原先摆石凳的地方，剩两个石墩子。看门的老头在空地上喂鸽子，鸽子呼啦啦起一片，又落下。墙上还留着半条标语，就剩一个“奋”字，一个“进”字。

砖堆码了半人高，浸过雨，砖缝里冒草。他在砖堆里翻了半个钟头，手套磨破了，翻出来一堆断竹竿、半张奖状、一只缺腿的方凳。奖状是台球比赛的，他把年代念了出来，一九九六年，念完自己笑了一下，笑完了接着翻。

看门的老头踱过来，蹲在砖堆另一头，看他翻，也不问。翻到后来老头开了腔：从前这里多热闹，周末有电影，寒暑假孩子满院子跑。竺长生问，剪纸班呢。老头说，齐先生嘛，搬到老街去了，赁了个门面，还做他的手艺。好些学生娃周末还去看他，大的小的，都去。

“都去？”竺长生问。

“都去。”老头说，“齐先生那人，孩子喜欢。”他说完看了一眼竺长生，又说，同志，你们公安的，也翻这些？竺长生说，翻翻旧账。老头说，旧账好，旧账不咬人。新账才咬人。

最后他从砖堆里翻出一块木牌子。断了，只剩半块，漆皮剥落，蓝底黄字，剩下三个字：剪纸班。断口是新的，像是拆的时候有人一脚踹的。两个钉眼，钉子没了。钉眼周围的漆面比别处干净，看得出挂了很多年，天天有人从底下走进走出。

他用袖子擦了擦，在砖堆边上站了一会儿。三十年，一间活动室，一年一届孩子，说没就没了，连块整牌子都没剩下。鸽子在头顶上咕咕地叫。

他把半块牌子抱上车，放在后座上。小陶问，竺队，这也要？

“留着。”他说。

车开出文化宫，他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主楼立在砖堆后头，空窗一排一排，像一双一双睁着的眼睛。二〇〇五年他来这院里排查的时候，还是一个冬天的下午，齐守拙坐在活动室里，身后的墙上贴满孩子们的剪纸，红一片，黄一片。那时候他问了三个问题，老人答了三个“记不清”。

齐守拙在竟陵老街赁的门面好找，问一句装裱的先生，就有人指。老街的青石板让岁月磨得发亮，街口有个吹糖人的担子，铜锣铛铛响。糖人担子前围着两个小孩，攥着毛票挑。师傅拿小铜勺舀了糖，在青石板上一浇一提，转出一只凤凰。齐守拙从前说过，糖塑跟剪纸是亲戚，一个在火里走，一个在纸上走。这话竺长生当年当街坊闲话听的，如今想起来，句句是行话。两开间的铺

面，门板卸了一半，屋里一股浆糊和樟脑的气味。老人在案子前托裱一幅字，先喷水，再上浆，排笔蘸着浆糊，纸边刷得又直又匀。

“齐先生，又见面了。”

老人抬眼，手上没停：“坐。炉子上坐着水。”

“您还记得我。”

“记得。”老人把字幅翻过来，上壁，用棕刷从中间往四边赶气泡，一下，一下，稳得像钟，“二〇〇五年冬天，你来过。问剪纸班。”

“您那时候说，不记得办过班。”

“老啦。”齐伯说，“记性是筛子。筛下去的，捞不上来。”

竺长生坐下，说明来意，还是名册：二〇〇〇年到二〇〇五年，剪纸班历届学员，想借来看看，就看看。

“没有名册。”

“拆迁办登记过人数。”

“登记的是人数，不是人。”

竺长生不催，坐着看他干活。老人把字幅上了壁，直起腰，捶了捶背。炉子上的水开了，滋滋响。老人腾出手，给他倒了碗茶。粗瓷碗，茶是陈茶，凉了半截。他还是喝完了。

“齐先生，”他说，“班办了十几年，不收钱？”

“不收钱。孩子肯来，是给我捧场。”

“班上的孩子，如今都出息了？”

“都好。”老人说，“剪子递出去的，手艺丢不了。”

“能借我看两张学生的剪纸吗？”

“学生的东西，学生肯给，才能看。”

“他们是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的纸，”老人把棕刷搁下，“更得有人守。”

竺长生把这句收下了。他端茶碗的手停了停。这句话往前翻三年，能翻出好多东西：守是谁在守，守的是纸，还是纸上的人。他没问。问，就要把那道浆糊撬开了。

“有个孩子，”竺长生把声音放得很平，“手工年年全校第一。”

老人托着茶碗的手没动。“孩子的事，街坊都传遍了。”他呷了口茶，“先生今日来，不是听我讲街坊的。”

竺长生不接话。他看着案子上的字幅——字是别人写的，裱的是老人的心。屋角堆着几卷裱好的东西，报纸包着，麻绳扎着，落了灰。他瞟了一眼，没问。问了，也是那句：学生的东西，学生肯给才能看。

字幅上壁的时候歪了一丝，老人伸手正了正，正得跟门框一个平行。这样的平，只有两种人做得到：干了一辈子手艺的，和在暗处待久了的。他随即在心里把后半句按住了。

屋里静了一会儿。浆糊的气味里，这铺子像一个倒扣的碗，什么声音都出不去。

临走，他在门口站住：“齐先生，一桩命案，拖了三年了。”

老人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看着他，目光缓得很。

“先生不揭学生的底，先生只装裱学生的好。”

说完，老人转身进里屋去添水。

就在侧身的那一下，竺长生看见他手里捏着一张没剪完的纸。纸剪了一半，轮廓已经出来了：一顶帽子，帽檐方方正正，帽檐底下的脸空着，还没剪；肩膀是直的。

像他戴的这一顶。

竺长生站在门口，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风从巷口过来，把他的衣角掀了一下。他想起老头的话：学生娃周末都去看他。去的人里，有没有两个，

是隔三差五去，一个走大门，一个走小巷的？他把这个念头按住了，按得很稳，像按一张上了浆的纸。

他走进秋天的巷子，巷口有人家在炒芝麻，香气一直跟到大街上。

当晚回家晚，秀珍把饭坐在锅里温着。他吃完饭，坐在灯底下，把半块招牌上“剪纸班”三个字描在本子上，一笔一笔。描完了，他在旁边写：字是漆的。漆是人刷的。人呢？

再往下，他写：齐守拙在守什么？

写完这一句，他看了很久，又添了一行：他守的东西，在纸上，还是在人身上？

写完他把笔记本合上，塞进纸袋，纸袋放回柜子最里头。锁柜子的时候，他又想起老人那句话——未成年人的纸，更得有人守。那么，未成年人本身，归谁守？他把这个问题也关进了柜子里。柜子答不上来。他答得上的部分，还差得太远。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夜里，城南派出所值班室。煤炉子封了又捅开，坐着一壶水，响得不紧不慢。

蒋阔那年三十三岁，刑警大队的侦查员，竺长生带出来的徒弟。队里人手抽去外地办案，他替城南所代两个夜班。值班室顶棚糊着旧报纸，墙上一张全市地图，图钉锈了。代班没什么事，翻翻值班登记，接两个醉汉，给走失的老人找家。

蒋阔有个毛病，写了字的纸都要编号。笔记本每页编，笔录复印件编，连给家里寄的汇款单存根都编。队里人笑他，说你这毛病，档案室见了都害怕。他不改。写下来的东西，就该有个名分。没名分的纸，最容易丢。

师傅教过他一句话：案子是纸堆里泡出来的。他那时不懂，嫌纸堆枯燥。代了这两个夜班他懂了一点——纸堆里泡着的全是人：报案的，撤案的，签了字又后悔的，写了不编号的。纸不响，纸等人。

他泡了一碗方便面，面还没胀开，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一个男人，酒气比话先到。

军绿色旧大衣，皮鞋帮开了线，头发长，胡子没刮。大衣第二颗扣子是后钉上去的，线色不对，一看就是路上掉了，随手寻的线。他把一只人造革包抱在怀里，往门边一站，先搓了搓手，又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警徽，看了一眼，低下头去。

坐下来之前，他把鞋在地上蹭了蹭。鞋帮上的泥是干的，城里的泥。他自己大概不知道，这个动作把他卖了一半——常年在外的，进门头一件事就是蹭鞋。

“同志，”他说，“我反映个情况。零五年，西湖边茶行那个案子——我在场。”

蒋阔把面往边上推了推，给他倒了缸子热水：“坐。慢慢说。”

男人坐下了，包抱在腿上，抱得很紧，像那包里有什么活物。蒋阔翻开登记簿，抽出一张笔录格纸，钢笔在废纸上试了试尖，先记下姓名：曲健，男，四十三岁，无业，现住广州。

“哪一年十一月十八？”蒋阔问。

“零五年。”曲健的手在膝盖上搓，“那天夜里，我在河边。西湖，河埠头那边。”

“你在河边做什么？”

曲健的眼睛躲了一下：“我……路过。喝酒了，走着消食。”他咽了口唾沫，“我看见一个伢从暗渠里头爬上来，左手拿手电。光很小，一跳一跳的，往老仓那边去了。”

蒋阔的笔顿了一下。

“多大？”

“黑。就看个影子和那点光。”曲健比了个高度，比到一半，手放下来了，“不大。反正不是大人。”

“看清脸没有？”

“没有。”曲健说，“就那个手电，我记得真。他拿手电的手——是左手。”

“手电朝前照，还是朝下照？”

“朝下。照着路，一小团光。”曲健说到这儿，忽然停了。

“暗渠在河埠头哪一头？”

“南头。闸口底下。”话一出口，曲健的嘴闭上了，像一把剪子铰了一下。

蒋阔没有抬头，笔在纸上走。他心里记下了这一条。不是记那句话，是记那一停——先停后答的，都是话到嘴边又自己筛过一遍的。

值班室里静了一会儿。炉子上的水开了，噗噗地顶壶盖。蒋阔续了热水，笔录做了一页半。

“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

“听人讲的。”曲健说。

“谁？”

“记不清。”

蒋阔又问：“隔了三年，怎么今天想起来讲？”

“路过。”

“广州到天门，顺不了这个路。”

曲健不吭声了。他开始摸口袋，摸出烟又塞回去，看看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酒像是醒了一半。“同志，”他说，“就当我没说。酒话，酒话莫记。”

“你既然讲了，就签个字。”蒋阔把笔录推过去，“想起来什么，随时再来。”

曲健签了。名字写得很轻，笔画都是飘的。蒋阔把笔录纸的角抚平了。他注意到签字那一块，纸让手汗洇软了，指印压在上面，比名字清楚。

蒋阔把笔录收进抽屉。这种夜里的“酒账”，所里一星期总有几条，一般附在值班登记后面，不编号，存着就算了。他问了最后一句：“你跟那案子什么关系？”

“我……”曲健站起来，腿碰着椅子，“我在那个茶行做过事。”

话音没落，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值班室的门开着，一个人端着茶杯从楼梯口过，听见动静，站在了门口。

竺长生。

· · ·

曲健从椅子上出溜下去半截，又撑着桌角站起来。腿一软，茶缸在桌上跳了一下，水泼出来一线。

“竺——竺队长。”

“曲健。”竺长生站在门口，茶杯里的热气往上飘，“几年不见。”

三年前排查，这个人他谈过四回。茶行的伙计，跟柳文霞的私情，麻将桌上的账。四回谈话，这个人从头到尾搓膝盖，搓得裤子膝盖两块发亮。

“上来说话。”竺长生侧了侧身。

曲健跟着上楼，一步一挪。上楼之前，他把那只人造革包存在了值班室。包里没什么：一瓶没开封的黄酒，一包烟，一只空信封。蒋阔登记了，让他签

字。曲健签在信封那一栏，笔停了停，问，这个也要留底？蒋阔说，规矩。

二楼办公室，灯很亮。竺长生关了门，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曲健面前的桌上。两个人隔桌坐着，谁也不先开口。暖气片咝咝地响。竺长生把三年前的谈话记录抽出来，摞在桌上，也不翻开，就摞在那儿。

曲健的眼睛在那摞纸上扫了一遍，喉结动了动。

一小时里，他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跟柳文霞的事，从头说了一遍：哪一年起的头，在哪儿碰面，谁给谁钱。时间、地点，跟三年前说的大体对得上，只在两处前后挪了挪，挪得对自己有利一点。竺长生听着，不点破，只在他停下来的地方问一句：然后呢。

他说茶行的账，后来都是他在管。说到“账”字，他自己停了。

“账呢？”竺长生问。

“早没了。烧了。”

“零五年十一月十八，你在哪儿？”

“株洲。”曲健说，“进货。有票。”

这一条，三年前有，今天也有，对得上。对不上的还是那条河。

“天门还有熟人不？”

“没熟人了。”曲健说。

“听说柳文霞改嫁了。”

曲健的手指停了一下：“听谁讲？”

“街坊。”

“广州也有人这么讲。”曲健说，“讲的还不一样。有说嫁到乡下的，有说嫁了个开车的。”

竺长生没纠正他。他看着曲健把那句“开车的”说完，看着他咽了口唾沫，把这个话头自己掐断了。

茶续到第三道，颜色淡了。竺长生忽然问：“广州，做什么生意？”

“帮人看仓库。”

“看什么仓？”

曲健的手指头抖了一下：“灯饰。灯泡，灯管，成箱的。”他说得很顺。顺得像背过。

“河边那个伢，是我编的。”曲健忽然说。

“编的？”

“喝多了。电视里放旧案，我就……顺嘴。”他抬起头，眼睛里有一层酒光，光底下是怕，“竺队长，我在广州，安安分分做生意。我回天门，是看看老朋友，看看就走了。”

竺长生把桌上的谈话记录往他那边推了半寸：“再看看，有要改的没有。”

曲健看了半天，改了日子。有一处的日子，从九月改到了十月。他改的时候，笔尖在纸上洇了一个点。

竺长生看着他，端起茶，喝了一口，放下。

“笔录你签了字。”他说，“要再想起来什么，随时来。想起多少，来多少。”

曲健连连点头，站起来的时候又碰了椅子一下。

送下楼，穿过值班室，曲健领了包，走到楼道里。声控灯要跺脚才亮，他不敢跺，摸着黑往下走。走到一楼，他忽然回过头，隔着半层楼梯看竺长生。

“竺队长，”他说，“伢的事，莫追。追到底，是两个家。”

说完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门外没有路灯，只有一辆三轮车从街口过去，铃声很远。

那辆三轮车过去之后，街口又静下来。霜在夜里落得无声无息，把派出所门口的旗杆落白了一截。曲健走上大街，走了十几步，忽然小跑起来，跑过一个垃圾台，跑过一个收了摊的早点铺子，跑进黑里不见了。像身后有火。

竺长生在楼梯上站着没动。

蒋阔从值班室跟出来，小声问：“师父，他的话，当真？”

“笔录给我复印一份。”竺长生往下走，走到值班室门口又停了停，“没有编号的那种，也给我。”

蒋阔应了。他回到桌前，把那页笔录又看了一遍，看到“左手拿手电”那一行，拿起铅笔想圈，笔尖悬了悬，又放下了。他一个代班的，连卷都立不了。他把笔录影印了一份，夹进自己的笔记本。

第二天一早，他去大队交班，路过档案室，看见竺长生正跟管档案的老何说话。老何翻着一本登记册，翻到某一页，两个人一起看了很久。蒋阔没进去，绕了个弯。中午他打开自己的笔记本，把“左手拿手电”那一行，又抄了一遍，在页角折了个小小的三角。

折角这个法子是师父教的。文件有疑点，折个角；疑点消了，把角抚平。他觉得自己这一页，大概要折很久。

后半夜下了霜。楼道的声控灯一层一层地灭了。

◆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竟陵一中。各班的元旦联欢都摆开了，走廊里全是瓜子壳和橘子皮的味道。

李文兰教了二十七年语文，班主任当到第三个轮回。她班上的联欢会摆在教室后半头，课桌拼起来，铺了报纸，报纸上摆瓜子、橘子、几瓶汽水。气球吹了三十几个，用透明胶粘在墙上，粘不牢，隔一会儿掉一个，滚到暖气片底

下。班长用毛笔写了节目单，贴在黑板上：独唱，相声，小提琴，翻跟头，最后一个节目写着两个字——茶艺。

有个女生提议玩真心话，转到老师这里，被否了。改成了成语接龙，接不上的表演学动物叫。教室里乱哄哄的，暖气烧得足，玻璃上一层雾。有人用手指在雾上画小人，画一个，擦一个。

联欢过半，停电了半分钟。整栋楼黑下来，尖叫起来又落下去。电一来，日光灯闪了闪，所有人都还坐在原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李文兰注意了一件事：讲台边上那只小泥炉的火头没暗——停电的半分钟里，唐穗借着炭火的光，把最后一杯茶分完了。

前面几个节目热闹。独唱跑了调，掌声照样响；相声抖了三个包袱，冷了两回场；小提琴拉《梁祝》，拉到一半忘谱，同学喊，没关系，接着来。翻跟头的男生把两个凳子叠起来跳，被李文兰一声喝住。

唐穗报名的节目排在最后。

她从家里带来的东西在讲台上摆开：一只小泥炉，一把铁壶，一包炭，一叠白瓷小盏，一只竹茶盘。每一样都旧，都干净。录音机是班里的一台双卡机，磁带是从念庐带来的，唐韵秋亲手倒到头，用铅笔卷过的，磁带盒上贴着白胶布，写着两个字：六羡。

灯关了一半。窗外飘着雪子，打在玻璃上，沙沙的。

唐穗烫杯，注水，出汤。动作不快，一个接着一个，袖口卷到小臂，一截白手腕在炉火光里晃。水将开，她把壶提离炉口，停一停，再坐回去，如此三回。炭是打碎的枣核炭，火苗不高，偶尔哔剥一声。

教室里静下来。静到能听见炭火声。

有人举着汽水瓶，忘了喝。翻跟头的男生坐回位子，嘴还半张着。李文兰站在后门口，看着那点炉火把一张张脸照得忽明忽暗，忽然鼻子发酸，低下头去假装捡瓜子皮。她教了二十七年书，头一回在一个联欢会上想哭。

录音里的古琴走了一个过门，有个很低的男人声开始唱。唐穗把茶一杯一杯分下去，从第一排分起，声音跟炭火一样轻：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一教室的人，一人一小盏茶。没有人喝，都捧着。雪子打在窗上，炭在炉里哔剥，谁咳嗽一声，又赶紧捂住嘴。

只有讲台边上多出来一盏。那是她出的头一盏，谁也没给，就搁在讲台的木沿上，冒着细细的热气。主持人问她这盏是敬谁的，她说：敬水的。大家没听懂，也就没再问。联欢散了，人走光了，那盏茶还搁在那儿，凉了。第二天值日生擦讲台，才把它倒掉。

李文兰后来在班务日志的角落里写了半行字：茶艺表演，成功。写完她把这半行划了。成功两个字，配不上那个下午，也配不上那盏没人端走的茶。

李文兰把那盏茶看了好几回。后来她想起自己小时候，家里老人讲过：头道茶不喝，敬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先人，一类是不在场的人。

联欢散了以后，陈晶晶留下来帮着扫地。扫到讲台边，她忽然直起身：“老师。”

“嗯？”

“穗表演的时候，眼睛里没有观众。”

李文兰问，什么意思。

晶晶想了想，把扫帚拄在下巴底下：“就是——她不是演给我们看的。她像是在给什么人上茶。”

李文兰问：“你跟她好？”

晶晶摇头：“我想跟她好。学不像。”她顿了顿，又说，“老师，学不像不是她的错，是我的错。”

李文兰看着这个丫头把地扫完，把簸箕磕干净，把扫帚放回墙角。做这些的时候，那丫头忽然利索得像另一个人。她把最后一只气球从墙上揭下来，气球的胶印留在墙上，一小方白。

锁门的时候，晶晶忽然问：老师，人能变得不像自己吗？李文兰锁抽屉的手没停，说，能。晶晶问，那原来的自己呢？李文兰说，锁起来了。晶晶哦了一声，走了。走廊里她的脚步声很轻，轻得李文兰回头看了看。

· · ·

一月中旬，期末。红榜贴出来，唐穗是年级第一。

奖学金是一千元，校友设的，红榜底下盖着章。散学典礼上，教导主任念了名字，唐穗上台，鞠躬。她鞠躬的角度不大不小，起来的时候校服上没有一丝褶。台下的掌声响了很久，她捧着奖状下来，坐回原位，把奖状在桌上放正，正得跟桌沿平行。

发奖那天下午，她在办公室领了信封，走出办公室，过了一支烟的工夫又回来了。

“老师，”她把信封放在桌上，“班里的图书角，都是连环画，缺字多的书。这个，给班上买书。”

李文兰说，这是你自己的奖。

“是班里的名次。”唐穗说，“名次是大家考出来的。”

她把信封搁下就走了。李文兰在班务日志上记了一笔，笔按得很重，纸背面都透出印子来。记完她在那一行底下画了一道横线，看着，又觉得这道横线多余。一千块钱，够买一架子带字数的书。她把信封锁进抽屉，钥匙转了两圈。

晶晶来办公室抱卷子，看见李文兰在看那张还没挂出来的合影的底片袋，凑过来，也看了一眼，看了很久。她什么都没说。两个看照片的人，一个教了二十七年书，一个刚满十三岁，都被正中那点亮，钉在了原地。

也是那个一月，公告栏贴出一张处分公告。五班学生沈嘉木，屡次无故旷课，夜进营业性网吧，给予警告处分。公告是打字的，落款盖着政教处的章，章盖得很正。

公告栏前围了几个人，念一句，议论一句。有人说五班的又如何，记过就记过呗。有人接了一句：他手工课的奖状——话没说完，就没了下文。人群散得很快，像怕沾上什么。

李文兰站在人流边上，忽然想起开学初点的名。那时念到这个名字，一个白净的男生站起来，应了一声“到”。那一声很轻，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公告贴出来那天中午，李文兰去食堂，路过公告栏。一个男生站在公告前面，戴一顶洗旧的鸭舌帽，帽檐压着眉。她认出是那个年年手工课全校第一的学生。他站了一分钟——她后来回想，不会更长——然后转身走开了。

背挺得很直。

人流从他两边过去，像水绕过一块石头。李文兰端着饭盒站在原地。她记得这孩子初一的时候交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只有半页，通篇没有一个字写人，写的是一把剪刀，摆在窗台上，太阳照着，影子落在墙上，比剪刀本身长。

作文的末尾只有一句话：它比人安静。

· · ·

一月下旬，散学典礼。典礼完了照合影，全班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排开，樟树底下，太阳很好。

红星照相馆的师傅背着相机来，海鸥牌的，皮腔都磨白了。排队形有规矩：年级第一站第一排正中。唐穗站在正中，手里捧着奖状。李文兰站在最后一排的正中，隔着一个班的距离看她。快门响的时候，操场上有麻雀飞起来，师傅说，好，这张带活气。

合影一拍完，队伍就散了。孩子们追着打闹，跑过樟树底下，惊起那群麻雀又落回来。唐穗是最后走的。她把奖状卷起来握在手里，沿着台阶的边沿下去，一步没有跳。

照片是在红星照相馆洗的。开学前，李文兰去取，一沓照片用皮筋扎着。她在照相馆门口站着翻，翻到班里那张。

每个人都有一点虚。冬天拍合影，呼出的白气糊着，肩挨着肩，正常。只有正中那个位置，亮得过了。那张脸比谁都清楚，校服的白领口干净得没有一丝褶，像单独打过一道光。她两边的人都有点偏色，发黄，她不偏，白得像另洗出来的一张。

那一点亮，不像合影，像海报。

李文兰把照片对着太阳看了看，又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相纸的暗纹，什么也没有。她忽然想起联欢会上那盏没人喝的头茶，想起家里老人讲的那两类人。想到这儿，她自己笑了一下，笑自己一把年纪，叫一张照片搅得心神不宁。

回到办公室，她把照片扣在桌上，先去给另一个班分照片了。分完了回来，照片还扣在那儿。她把它翻过来，用图钉钉在软木板上，钉在成绩单旁边。

一个寒假过去，她路过那块软木板，总会多看那一眼。多看的那一眼里，始终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凉。

◆

二〇〇八年岁末，小年那天，天门落了入冬第一场雪。

竺长生家在城北粮机厂的旧家属楼，三楼，阳台上挂满了年货。秀珍里里外外地忙，腌鱼，灌香肠，炸圆子，切豆丝，手上沾着米粉，嘴上不闲着。楼

道里邻居串门，一进门先喊，秀珍，你家的鱼腌得香。她拿豆丝回人家，拿得比给的多。

竺长生被支使得团团转，劈柴，擦窗，把腌鱼的缸从阳台搬到里屋又搬回阳台。他说，放哪儿不都一样。秀珍说，你懂什么，风向不一样。

豆丝是楼下摊子上现摊现切的，摊主两口子凌晨三点起来磨米浆，一冬天不做别的。秀珍买了三斤，又替武汉的儿子买了三斤，说寄过去。竺长生说，寄什么寄，过年他自己回来拿。秀珍说，你懂什么，寄出去的是豆丝，收着的是娘。

腊月二十六，他回了一趟老家。老屋早让叔伯家占了，他在村口站了站就回来了。回来的路上过汉北河，老桥封了，走的新桥。桥下的水瘦成一条线，河滩上有人在挖沙，挖沙机一斗一斗，把河底翻上来。他看了一会儿，心里没来由地沉了一下。

竺小江在武汉读医大，下午来了个电话，是宿舍楼下的公用电话打来的。

“爸，三十儿我值班，初二回。”

秀珍抢过话筒喊：带媳妇回来吃豆丝！小江还没对象，她照喊。喊完她把话筒递给竺长生。小江在那头压低了声音：爸，过年别老一个人熬夜坐着。竺长生说：知道了。又说，案子放着，人要过年。

其实小江还问了一句：爸，你那个箱子，过年搬来搬去做什么。他说，防潮。小江在那头笑：米缸边上还防潮，学内科的还是学法医的。他没笑，说，挂了。

挂了电话，秀珍问他说什么。他说，没什么。秀珍忽然想起什么，扭头朝厨房喊：米面柜怎么沉了？年前大扫除我挪了一下，闪了我的腰！

“放了些米面。”竺长生说。

年前局里整修档案室，各人的柜子都要清点，清点表要签字。他把那只牛皮纸包着的木箱提前搬回了家，公文袋套着，谁问就是过期的旧材料。搬箱那

天是个晴天，他在院子里站了一站，冬天的日头照在雪上，晃眼。同院一个老头问，搬家？他说，清旧物。老头说，旧物好，旧物压年。他不知道旧物还压年，笑了一笑，抱上楼了。他离退休还有十年，可是他不再信任局里那张办公桌了——抽屉换过锁，钥匙在文书那儿挂了一排，谁都能登记着借。东西放在明处，反而最暗。半块“剪纸班”的木招牌，他用报纸包了，锁在档案柜底层，钥匙两把，一把在身上，一把埋在窗台的花盆里。

箱子现在躺在厨房米面柜的夹层里。柜子是结婚那年打的，底下一层放米面，靠墙留着一条夹缝，原是留着放账本的，账本早不用了，正好放一口箱子。秀珍嫌他：米面柜里藏废纸，竺长生你魔征了。

他笑笑，不接这个话。

· · ·

腊月二十八夜里，他提着两包点心去看周法医。周法医退了三年，在天井里养兰草，见了他就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你个东西，嘴里是点心，眼里是卷宗。

“借您的手。”竺长生说，“翻拍。”

周法医把点心收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哪个案子？”

“就那一个。”

老头不说话了，进屋去了。再出来，手里端着家伙：海鸥相机，两只带罩的灯，黑绒布，显影盘。天井边的小屋腾出来，绒布一罩，灯一打，冬天夜里，屋里点起红灯。兰草搬了一盆进屋取暖，老头伺候草比伺候自己精细。

中途歇气，老头问：你这是何苦。案子挂在那儿，你也快挂了。

竺长生说：案子挂得住，人挂不住。

老头哼了一声，算是认可，把显影盘又摆正了一分。

两个人折腾了半晚上。周法医的手不抖，取景，对光，按快门，嘴里念叨：手别抖，呼吸匀。底片冲出来，再放大，一张一张过。竺长生站在红灯底

下，看着药水里的影像一点一点浮上来，像看一样熟悉的东西慢慢换了一副面目。

原先他们看那张现场剪纸，看了三年，看的是双童：男孩女孩，手牵着手，头顶上是树，树是老剪法，枝丫对生。

放大到六寸，放大到八寸，周法医用放大镜扫过树影，忽然停住："这儿。树底下。"

树影里还有东西。极小的一片叶子，一芽一叶，剪口比米粒还小，藏在两道枝丫的夹缝里。刀口很轻，轻得像顺手一带，一带，就是一个活物。

"两个人，一棵芽。"竺长生说。

周法医摘下老花镜："什么芽？"

"茶芽。"

小屋里静下来。红灯把两个老人的影子投在墙上。窗外的炮仗一声一声，是谁家孩子等不及了。

周法医又拿起放大镜，凑近了看那片茶芽，看了足有一支烟的工夫。

"这么小的口子，"他说，"得用多细的剪尖，得多稳的手。"

竺长生说："比你我稳。"

老头把放大镜搁下了，没再言语。红灯底下，药水的气味漫上来，把年味盖过去了一点。他把相纸夹起来，对着灯看，又放下："这剪纸的，是个细心人。剪给谁看的，怕只有剪纸的晓得。"

翻拍的还有一张：河埠头的鞋印，白灰上小半个脚印，旁边一支钢笔当比例尺。三十三码。石膏模是〇六年库房搬家后不见的，找了一圈，连装模子的木盒都没了，卷宗里就剩这一张照片。竺长生把它和剪纸并排放在灯下，看了很久。

干到后半夜，两个人轮着定影、水洗，相纸一张一张夹上竹夹，挂在绳上滴答。老头从抽屉里摸出半包炒花生，两个人就着红灯剥，壳扔在一个纸匣

里。谁也没提吃年夜饭的事，谁也没提那桩案子，手上都晓得做的是哪一桩。

洗到最后一遍水，老头捞出来一张废片，凑到红灯底下看了看，是五年前结案那年拍的材料照。他把废片扔回药水里，说，都过去了。竺长生说，没过去。老头说，没过去就对了。过去了，谁替他们泡这个纸。

临走，周法医把两张翻拍的照片让他挑，他挑了那张看得见茶芽的。老头说，另一张也拿去。竺长生说，够用了。老头说，拿去。他把两张都收下了。

从周家出来，雪停了。他踩着雪走回去，一步一步，听着自己的脚步。走到楼道口，他忽然想起二〇〇五年冬天的一间小办公室。

毛慧芳，两个孩子的小学班主任，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拢在袖口里，手指头绞在一起，绞得指节发白。她说：竺同志，这两个伢啊，像两扇关紧的门。钥匙呢，一个也不在我手里。

她后来又添了一句，声音更小：别的孩子丢了东西会哭。他们不哭。

那年他把这两句话都记在本子上，前后翻了几遍，没当回事。门关得再紧，他想，总有开的一天。他等了三年。

三年来他敲过的门不少，有的开了，有的没开。没开的那些，他都记得门框的样子。念庐的门框他没敲过，一次也没有。不是没去过。他在巷子口站过两回，一回是二〇〇六年冬天，一回是上个月。两回他都空着手站的，站了就走。

到家的时候，秀珍还没睡，在灯下叠包豆丝的纸包，说三十儿夜里把家里灯都点上，亮亮堂堂过年。他说，好。

· · ·

三十儿那天他真把灯都点上了，厨房一盏，堂屋一盏，写字台一盏。灯全亮着的时候，屋里暖烘烘的，像小时候。到了夜里，人都睡了，他一间一间把灯关掉，关到最后，只剩下写字台这一盏。

十二点整，全城的炮一起响，震得窗玻璃嗡嗡的。秀珍在里屋咳嗽了两声，翻了个身，又睡沉了。他坐在灯底下，听那片响，像听很远的一场雨。

秀珍睡了。阳台上的腊鱼腊肉在北风里轻轻地碰，碰一下，又不动了。

竺长生在写字台前坐下，台灯拧到一半亮。他从米面柜里取来私人笔记本，翻到新一页。这一页的前一页，是六月写的：我听到喊声才过去——底下那个铅笔圈，三年了，还是那个圈。圈里的字让岁月洇得有点毛，意思一点没毛。

他提笔，写得慢。

十一年后、二十年后的十一月十八日，我会不会后悔今晚没有敲开那两扇门？

写完，他看了一遍。看第二遍的时候，他把笔搁下，用笔杆上的橡皮头，把这一行从头到尾擦掉。

擦不干净。蓝黑墨水吃进纸里，一行字变成了灰蒙蒙的一道。他就着灯又划了一遍，划得纸背都透了。

然后他另起一行，写：

继续看。

三个字，笔画很短。他扣上笔帽，把本子合起来，跟那沓新翻拍的照片摞在一起，起身送回厨房，塞进米面柜的夹层，柜门掩上。掩门之前，他在黑地里站了两秒，听着柜子里那点纸的静。纸不响。纸等人。这句话是从徒弟那里听来的，他记住了。

回到写字台前，他伸手关了灯。

屋里黑下来。窗外最后一挂炮仗响过，雪又零零星星地下起来。厨房那边，米面柜安安静静地立在黑地里，像守着什么。

灯熄了。

第三章　雨前

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

二〇〇九年三月，竟陵老街落着冷雨。檐口的水线连成了帘，青石板上浮着一层油亮的光。

柳文霞家窗台上多了半条烟。红梅，拆开过，缺了三根，烟纸叫潮气泡得发软。没有字条。烟盒底下压着一小截红头火柴，是划过又没有划着的那种。

她隔着玻璃看了那半条烟一晌午。楼下泔水桶敞着口，木盖斜倚在桶边，叫雨点打得一跳一跳。

老街的人都认得这半条烟的来路。曲健，松风茶行从前的伙计，前年冬天回来过一回，酒喝得很凶，钱要得很急，年后就没了人影。风声紧了，债主的消息也紧了，他躲去的方向谁都知道，谁都不说。

前夜有人敲过门。三下，停一停，又三下。她躺在床上没有应声。半片安定就着凉水咽下去，人就沉进棉花里了。梦里有人隔着门板讲话，一句也听不清。

天黑前她开窗，抓起那半条烟，扬手丢进了泔水桶。盖子都没有盖。

后半夜她醒了。雨住了。她趿着鞋下楼，挽起袖子，从泔水里把烟捞出来，一根一根在围裙上擦干。楼道里一股酸气，她像没有闻见。火柴划了三根才着。她抽了一根，呛出一串眼泪，拿手背抹了。

“这条街上，我现在只恨得动他一个。”她对着黑黢黢的天井讲。

死人她恨不动了。茶行的门板钉过封条，后来换了个卖五金的，进出的都是生面孔。街坊的眼神她也恨不动了，背后的话像雨，落了两年多，落透了。

只有曲健——活着，跑了，还知道留半条烟。这样的恨，提得起来，放得下去。

她跟曲健的事，老街没有不知道的。王胖也知道。王胖从来不说。王胖只在她咳的时候，把凉茶换成热的，把她的鞋刷干净了摆在门边。

清早王胖蹬三轮出门，车铃上系的红布条吸了雨，贴在铃盖上。他出门前在灶屋里站了一会儿，听见楼上没有动静，才拉的门。他当她睡着。她也当自己睡着。

抽屉里那瓶安定，她数过，剩十一片。一天半片，能撑到入冬。她没有打算撑到入冬，她只是喜欢数，数着数着人就静了。

烟抽到半截，她摁灭在窗台上，剩下的塞进了灶膛。灶膛里没有火。烟就那么躺着，像躺了一条命。

烟灰她擦了，擦到一半停了手。窗台上留着那一小截灰，没有擦。像是要留给什么人看，又像是要看清楚自己抽过。

…… 二〇〇九年八月底，天还热着。柳文霞用手帕包了一沓零票，送嘉木去天门职高交学费。

中考差三分。成绩下来那晚她去学校问过，教导处的人拨着名单，头都不抬：分数线在那儿摆着。她再去，还是那句。交钱读一中，她拿不出那个数；曲健留下的钱，早填进债主的无底洞了。

职高的通知书来得快，红章，白纸黑字。她把它压在五斗柜的玻璃板底下，跟身份证、存折放在一层。夜里睡不着，摸黑也要看一眼。

职高校门口蹲着一排卖凉席脸盆的摊子。交钱的队排到传达室，她数了三遍零票，收据上盖了红章，红章洇了一点。她没有急着走，站在梧桐底下望那栋灰楼。楼上有一扇窗开着，谁家的凉席搭在栏杆上，水顺着席纹往下淌。

她站了很久。沈松庭在的时候给儿子算过命，讲这孩子是读书的坯子，手稳，坐得住。他爹自己没走过的路，攒着钱要他走。他爹还想让他接茶行，他

连茶的气味都不肯闻。如今他走的是另一条路。这条路他爹没走过，他也没走成他爹盼的那条。

嘉木住校，半个月回来一回。回来了也不大讲话，吃两碗饭，把碗筷洗净了倒扣在灶台上，第二天一早又走。文霞塞给他的零钱，他抽一张，剩下的推回来，推得很轻，像怕碰疼了什么。

入秋她害了一场重感冒，烧得下不来床。嘉木礼拜六回来，守了一夜，天亮熬了一锅粥，咸菜切得细。走的时候把药按顿分好，纸包上用铅笔写着早、中、夜，字写得横平竖直。她后来把那三个纸包摸了很久，没有舍得拆。

十月里他拿回一张奖状，汉字录入比赛，第二名。红皮的壳，烫金的字。文霞用饭粒把它贴在堂屋墙上，端着碗看了半顿饭。王胖收废回来，逢人就讲，看，我家嘉木，拿奖状了。嘉木自己看也没有再看它一眼。

夜里他屋里灯亮到几点，她不知道。她靠半片安定睡觉，睡过去就什么都听不见。只有一回起夜，她看见他门缝底下漏出一线灯光，还有很轻的沙沙声，像蚕吃桑叶。

她没有推门。第二天问，他讲赶作业。职高的计算机班她不懂，作业她更不懂。扫地的时候，她在他桌脚底下扫出一小撮纸屑，碎得只剩指头大，拢在一处，像有人特意归过堆。她拿簸箕撮了，没有问。

…… 二〇一〇年开春，嘉木捎话回来，讲学校补课，月假不回了。文霞把钱缝进他旧棉袄的内袋，托同乡一个后生捎去。棉袄没有回来，钱也没有信。

五月，嘉木回来住了一个礼拜，讲不读了。

文霞问他为什么。他讲学校教的，他都会了。

这话不像顶嘴，像陈述一件量过了的事。王春发——街上人都喊他王胖——蹬三轮收废回来听见，搓着手打圆场：男孩子学门手艺也是正路，省得熬坏眼睛。

那个礼拜，嘉木把屋子归置了一遍。剪刀磨过，纸样按大小归了类，码得四角齐整。走的前一晚，文霞看见他往帆布袋里装东西：两身换洗衣裳，一把用了几年的尖头小剪，一沓白纸。

“去哪里？”她问。

“广州。”他讲，“有个老师收我，管住，接着读书。”

“哪个老师？”

“远房的，你不认得。”

文霞信了一半。孩子肯读书，总是好的。她把卖废品攒下的三百块钱缝进他衣裳内袋，针脚密得拆不开。人走到巷口，没有回头。青石板把脚步声送出去很远，到了拐角，就听不见了。

墙上那颗钉子空了。从前挂着一把备用的小剪，归置屋子那几天，剪子不见了，钉子上留着一圈白印。文霞看了两回，没有问。

六月里，学校捎话叫她去签字，讲转学要办手续。她按了手印，纸上别的字，她没有细看。办事的人讲了句什么手续齐了，她也没有听真。

六月末，汇款单来了。广东寄的，两千元，附言一栏空白。绿单子是邮递员送上门的，邮戳蓝的，糊成一团。取钱要按手印，印泥是红的，她的指头红了半天。信封里夹着一张纸，薄得像书签：两片茶芽，一茎两片，芽尖对着芽尖，剪口干净得像刀刻的。

她去邮政所给广东回过一回话，汇款附言的栏小，写不下几个字。她写了好好读书四个字，一笔一笔，描了两遍。钱汇出去，像把话送出去了。

文霞把剪纸举到灯底下看了半天。这手艺是他十岁上下在文化宫学的，学费两块钱一学期，他学得最久。这几年，没有见他剪过一回。

她托同乡带过两回东西，一回是换洗衣裳，一回是一罐腌萝卜。话带回来，讲人都好，忙。带东西的后生讲，没有见着人，东西搁在门口，拿的时候门里有人应了一声。文霞想，读书的地方，规矩大。

带东西的后生收了她两块钱脚钱，讲一趟不容易，先坐车到武汉，再坐到广州。她听着那一路的地名，像听一段不认识的经文。

七月里，老街传来话：曲健死在广州，仓库走了水，人烧得认不得，靠证件对的名。闲话传了三天。云香居的牌桌上也有人讲，讲得有鼻子有眼。文霞正摸着一张好牌，听完把牌扣了，讲要回去做饭。郑胖婶在后头喊，你的牌钱！她已经出了门。当晚，她把抽屉里剩的半片安定掰成了两半，坐在黑地里等到天亮。

九月，职高开学。开学第三天，邻居捎话讲有个戴眼镜的先生寻过她，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那半天她在云香居替人看牌。郑胖婶给她端了一碗凉茶，讲文霞你手气背，替人看牌都替输了。她想，先生多半是走错了门。

秋深了，云香居的灯换成了亮的，牌桌上有人抽烟，烟雾在她眼里打转。她学会了在牌桌上睡，手还动着。

十月，深圳又来一笔汇款，还是两千元，邮戳换了地方。剪纸照旧夹在信封里，这一回是三片叶子。云片糕的纸盒里有了两张剪纸。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她拿出来看，看完原样放回去，盒子盖得轻轻的。

王胖有回想凑近看看盒子里是什么，她的手先按住了盒盖。王胖笑讲，我不看，我不看，你儿子的金贵东西。打那以后，盒子挪到了她枕头那一头。

“学校发的奖金。”她对王胖讲。

王胖信了，高兴得很，当晚割了半斤肉焖一锅，扒着饭讲孩子有出息，念书念出钱来了，比蹬三轮强百倍，回头把堂屋那张桌子腾出来给孩子念书。桌子他擦了三遍，擦出两块白印子，像两只眼睛。文霞笑着应了，一顿饭没有动几筷子。

罐子里的腌萝卜她倒出来一半，就着粥吃了三天。另一半放坏了，倒的时候她念了一句，作孽。念的是萝卜，也是别的。

月底，她揣着汇款单去了趟职高，想问问学籍档案几时转去广州，顺带给儿子留句话。班主任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名册翻过来，又翻过去，指头在第

七页停住了。

“柳文霞同志，”他把名册合上了，“沈嘉木的座位，早就空了。开学第三天我就去您家了，没人。”

“空了？”

“空了两个学期了。”班主任的声音放得很低，“转学？没有哪个学校来过函。学籍档案在柜子里锁着。桌上的灰，倒像是天天有人擦。”

文霞捏着那张两千元的汇款单，站在教务处门口，站成了一截木头。走廊里广播响着操，一茬一茬的孩子从她身边跑过去，鞋底把水磨石地面蹭得沙沙响。

校门外，卖凉席的摊子早撤了。梧桐叶落了一地，黄的。她一脚一脚踩过去，没有人替她扫。回到家，堂屋墙上那张奖状翘了一个角，饭粒干了，她按了按，没有按住。

◆

二〇一〇年九月，深圳。华强北的档口街，一到下午就闷得像口蒸笼。卸货的三轮车在巷子里横冲直撞，胶带撕拉的声响此起彼伏，喇叭里循环喊着高清碟片四个字，喊得走了调。

尹彦，二十四岁，天门皂市人，来深圳第六年。十四岁跟表叔出来，在天桥底下睡过半个月，在东莞的厂里拧过半年螺丝，后来跟着同乡上了碟片这一行。三米宽的档口，铁架顶到天花板，碟盒码得像两堵墙：电视剧全集、演唱会、卡拉OK；后柜另走一路货，行话叫压碟。

皂市跑广深线的一个司机早递过话：有个后生来投，手脚干净，能吃苦，天门口音，让他寻到华强北来。下午四点，人到了，站在档口外的阴影里，肩上一只帆布袋。日头那么毒，他站在阴影的边上，多一步都不肯挪。他等尹彦点完一单生意才开口。

“阿彦哥？”口音是天门口音，压得很平。

尹彦抬起头。十六七岁的后生，白，白得像泡在米水里长大的，连嘴唇都是浅色的。帆布袋放下，拉开，三样东西：两身换洗衣裳，一把剪刀，一沓剪纸。剪纸拿旧挂历纸包着，包了三层。尹彦的手伸过去，又收了回来。他自己也不晓得为什么收回来。

“叫什么？”

“阿木。”

尹彦在天门地界活了十八年，没有听过这个叫法。他没问第二句。出门在外，名字是身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他让阿木进柜台里侧，那里最暗。人一进去，就像墙上多了一块影子。他让阿木睡档口的阁楼，一个月两百，从工钱里扣。头三天不派活，让他自己看。第四天早上，阿木把档口的碟数报了出来：前排多少，后排多少，哪一盒压着哪一盒。一个数不错。

尹彦开始教他。教看货：碟面对着光转，看水纹，看压膜，看版号，版号对不上就是压膜货，压价收，拆开卖。他随手抽一张递过去：这张呢？阿木讲，压膜的，放到后头音画不同步。尹彦拿到灯底下转了半天，果然。

教抓货：上家在QQ上留话，几时、几号门、几件，点清了再给票子，当面点清，出了门不认账。教对暗号：生客问价，答按张；熟客进门，报片名，手指在玻璃柜上敲几下，敲几下就是几多件。

有个生客进门就问最贵的。阿木把人引到明面上的架子前，客人翻了两下，骂骂咧咧走了。尹彦后来跟他讲，那是探子的问法。阿木点头。第二天起，他也学会了先看手，再看眼睛。

阿木上手快得吓人。第三天，全城拿货的几个门口他记全了。头一个礼拜，左手点钞，拇指翻得比点钞机还快。有一回收一张货款，票子里夹了一张假的，他指尖一捻就抽了出来，不作声，还给那人，只讲，换一张。那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换了。

半夜尹彦上阁楼拿货，撞见过一回：阿木把一只碟盒拆开又装回去，拆了装，装了拆，练了二十几遍，桌面抹得干干净净。尹彦没有出声，退下去了。

生意上有人赖账。阿木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谁家几号门、欠几件、几时结，笔笔清楚。年底他翻着小本子一家一家收账，居然都收齐了。他不去吵，就站着。人后来都讲，阿木的面比法子好用。

有熟客进来，拍两下柜台，报个片名。阿木头都不抬，手指在玻璃柜上敲了四下。客人弯腰拿货，付钱，走人。一套下来，像演过一百遍。

有客问，老板哪里人。

“湖北，一个出茶圣的小城。”

同乡听了笑：茶圣故里，不就是我们那一块？他不接话，低头拿指甲划碟面。尹彦是皂市人，皂市归天门管，那座小城他闭着眼都走得回来。他没有点破。

有一回他问老代，这后生是哪条线上的。老代在电话那头顿了顿，讲，彦娃，有些货，问多了烧手。

尹彦带他吃宵夜，他只要白粥。散烟给他，他摆手。牌桌上有人喊他凑一脚，他讲看店。有一回尹彦喝多了，搂着他肩膀讲兄弟，将来发财了莫忘了哥。阿木把他扶到凳子上，倒了一杯酽茶，站在旁边，看着他喝完。

阿木不进网吧。有回尹彦进去查片源，回头喊他，人站在网吧门口的台阶下面，讲，我在外头等。灯箱把台阶照得雪亮，他站在亮的外头，脸在暗里。

尹彦他妈从皂市捎来腊肉腊鱼，他分了一半给阿木。隔了些日子，阿木回了一包东西，一包剪的窗花。他妈妈把窗花贴在皂市老屋的窗户上，逢人就讲，这是彦娃发的。

第三个月，斜对面赔钱的档口，东家急着回乡，阿木拿现钱接了下来。现钱，一沓，码得整整齐齐。哪来的钱，尹彦话到嘴边，想起一样东西，咽了回去。

那阵子隔两条街有人被端了窝点，货车拉走一箱一箱的证物，档口街安静了半个月。那几天阿木把后柜清空，只留明面，风头过了，才一箱一箱进回来。尹彦看着他清，没有教，也没有问。

十月里立下的。那晚盘账，阿木在烟盒纸上写了三行字，推过来：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写完指一指纸，指一指自己，又指一指尹彦。

尹彦看懂了。三行字，是给这后生自己立的，也是给他立的。他问，拍照呢？做生意见客要合影。阿木指第二行。他又问，货出了事寻谁？阿木指第三行。尹彦把烟盒纸抚平，夹进账本。蓝壳塑料账本，边角卷了，第一页还记着二〇〇四年冬天的第一笔货。字是他的，规矩不是。

街坊问他，彦哥，你这小工哪来的，看不懂的做派。尹彦讲，远房表弟。街坊讲，表弟好，表弟靠得住。靠得住四个字，在档口街是顶大的褒奖。

规矩立了，档口街照旧转。华强北的白天是电子的白天，柜台里摆满了新款的手机和播放器，碟片这一行一年比一年薄。有老同行劝尹彦转行，他讲，薄利也是利，薄船也载货。

阿木的第二个档口开起来，他不站前台，雇了两个伙计，一个看店，一个送货。自己夜里盘账，盘完了对账，对完了把小本子收进一只饼干盒，盒盖压在碟盒最底下。开张那天没有放鞭，没有请客。旧东家搬走前来讨了一杯茶，喝完讲了句好茶。阿木没有接话，把壶提走了。

有同行来串货，见了阿木，回头跟尹彦讲，你这表弟话少，路子正。尹彦笑了笑，没有认，也没有否认。表弟这个词，慢慢就在档口街叫开了。

尹彦的账本从此分两半，前半本记他自己的流水，后半本记两个档口合账。合账的页码上，阿木那一半永远清清楚楚，连三毛钱的胶带钱都记着。

阿木白天几乎不见人。市场顶上装着探头，他站柜台，人总在探头的死角里。档口的营业执照上、市管的登记表上，都没有他——市管来登记从业人员，尹彦填了自己表弟的名字。表弟在东莞打工，一辈子不晓得自己有个档口。

要打电话，他去巷口的公用电话亭，插卡，背对着人。十月末，尹彦在邮政所门口碰见他寄汇款，两千，收款人一栏隔着玻璃看不清。尹彦把眼睛挪开了。第三条规矩，不问来处。

有一回落雨，他撑伞送阿木去邮政所，两个人挤一把伞，伞还是偏的——偏他那边。走了两条街，谁也没有讲破。

年底结账造册，要写生日。尹彦问哪天。

“家忌。”

两个字。尹彦笔尖顿了顿，在册子上写了冬月。

深圳的冬天不下雪，只下冷雨。落冷雨的日子，档口街的人缩在棚子底下打牌，阿木坐在档口里，把玻璃柜擦一遍，再擦一遍。

阁楼的窗对着一堵墙，墙上绕着一根胶管。阿木在窗台上养了一盆蒜，不浇水，蒜自己发芽，长得很直。尹彦讲你这也叫养。阿木把蒜苗剪了一茬，炒了鸡蛋，两个人分了。

蒜苗割了又长，长了又割。有一茬长得太密，阿木把它们分了盆。尹彦讲，你连蒜都晓得给它挪地方。话出口，他愣了一下，像想起什么，又咽了回去。

快过年的时候，档口街的人心都往家里飞。阿木没有回。尹彦问他票买了没有，他指了指账本：停那一页。尹彦不再问。腊月二十九，尹彦塞给他两条烟，讲，给你爸带去。阿木收了，转手给了看车棚的老头。

…… 十一月十八日，天没有亮，阿木的小灵通就关了。档口拉了半边卷帘，贴一张条：今日盘库，不做散客。中午伙计讲，阿木哥交代了，停一日。

头一天夜里他就把第二天的账盘完了，便条贴在玻璃柜内侧，剪刀拿布擦过，归了位。像有人赶在年前，把屋子先收拾了。

尹彦翻账本。十一月十八日那页，阿木自己早用铅笔写好了一行：停，全天失联。

往后的每一年，这一页都有这一行。铅笔描过一回，又描一回。哪一年生意做到多大的场面，这一日都是死的。

尹彦原本当是乡下人的忌讳。做生意的，谁没个忌讳。

夜里十一点，他收了档，从斜对面过。卷帘门底下漏出一线灯光。他弯下腰：阿木坐在纸箱中间，头顶一只灯泡拿铁丝吊得很低，手里在剪纸。剪刀走得极慢，像在纸上裁一段夜。剪的好像是一座桥，又像一把伞，看不清。剪完一张，他举起来对着灯照了照，收进帆布袋。脚边的纸屑拢成一小堆，方方正正。

他喊了一声：阿木。

没应。剪刀的沙沙声没有停。

尹彦直起腰，想再喊一声，没有喊。灯光把阿木的影子钉在墙上，像一张剪纸。

后来的腊月里有一年，尹彦忙忘了这一天，第二天赶来，两条卷帘都关着。阿木那条上贴着新条子。他自己那条上，贴着一张剪纸：一只钟，针停在同一个地方。他把剪纸揭下来，夹进了账本。账本里有了一张钟，有一行字，有扉页上那三行规矩。他有时候翻账本，翻着翻着就停在这一页。

那张钟他拿给老代看过一眼。老代看了半天，讲，彦娃，你这兄弟，是码上不可知的人。尹彦问什么码不码的。老代讲，算了，喝酒。

年前盘账，两个档口的流水对出来，斜对面那间小店的进账，比尹彦三米宽的大档口还稳。尹彦盯着那页账看了半宿。稳在哪里？稳在阿木从来不催客人，也从来不欠客人。

开春，街对面的游戏机厅换成了碟片仓库，再开春，碟片仓库换成了服装档口。这一行像退潮，谁都在往岸上走。只有斜对面那间小档口，潮退了，它

还在。

只有一回，尹彦见他蹲在档口后头喂猫。猫是三花的，来历不明。阿木喂它，不用手喂，拿纸盒底垫着，人走远了它才吃。尹彦讲，你这喂法，喂不熟。阿木没有接话，把纸盒底换了张新的。

尹彦后来跟人讲，他这辈子看人，就走过一回眼。人问看走眼了？他讲，不是，是没看懂。

◆

二〇一〇年四月，广州。

灯饰城的后仓区有六幢仓库，红砖墙，铁皮顶。白天卡车吞吐纸箱，叉车倒车时会叫两声。夜里只剩两条狗，和一排试灯的样品间——玻璃罩子里的水晶灯白晃晃地亮着，照亮半条巷子，灯下飞着小虫。试灯一阵亮，一阵暗，整条巷子像在喘气。

仓区的活分两班，白班卸车，夜班码货。夜班的工钱多三成，本地人嫌熬，来的多是外乡人。灯是给别人试的，干活的只要一盏电灯泡，吊得高，照得人没有影子。

曲健在四号仓做搬运。四号仓的水晶灯一箱一箱，易碎，码箱看手上的分寸。他干了两年，分寸有了，腰也弯了。工头讲他老了，他讲，姜是老的辣。

四十五岁，脚上一双塑料拖鞋，腰上别一部诺基亚，按键上的字都磨平了，只会接、打、发短信。手机是他的脸面，头天晚上充满电，白天舍不得多看。工友借他手机给家里报平安，他借，站在旁边盯着。

他睡城中村，六个人一间，铁架床，上铺，翻个身整张床都响。巷子口的公用电话亭一到夜里排长队，都是给家里报平安的。曲健排在后头，轮到了，他插了卡，又退出来。没有可打的号码。

电话亭的玻璃上贴满了招工的小广告，一层压一层。最上头那张写着灯饰城招夜班，日结。他把这行字看了很久，第二天下了夜班就去报了名。工头讲，你不是四号仓的吗？他讲，换个仓，透透气。

他的账在天门就背上了。牌桌上先赢后输，利滚利，把一座屋的体面都输了进去。老娘前年没了，他回去磕了三个头，屋契押给了债主，从此往后，他没有家了。枕头底下压着一沓零票——三千七，他管这个叫命钱。走的时候，他在柳文霞的窗台上留过半条烟，没有敢敲门。

夜里工棚讲闲话，讲广州哪里招工，讲谁中了六合彩。曲健不讲。他的毛毯卷得很紧，像抱着什么。有人说梦话，喊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不是柳文霞，是更早的一个。

同乡搬运队里来了个新后生，姓什么没有人晓得，都喊他阿木。在隔壁三号仓帮闲，专上夜里的活，白天不大见人。工头讲他麻利，工钱日结，别的问不出来。

一个晚上，大排档，有人请客。塑料凳，炒粉，冰啤酒从泡沫箱里捞出来，瓶身冒着汗。同乡凑在一处，打听各家的收成，谁家的孩子考了学。有人端着杯子端详阿木，讲这后生像谁，讲了半天讲不出。曲健插不上话，多喝。他的眼睛跟着那张脸转。

灯泡在头顶晃。他凑过去看了三回，才敢认。后脖颈的汗毛一根一根立起来。

他想起茶行门口的青石台阶，想起沈松庭的算盘声。那年他三十九，在茶行帮工，按月拿钱，日子还成个样子。一晃，人都散了。

“沈家那个伢？”

阿木提壶，给他斟了杯茶。没有答。周围的人闹哄哄的，没有人听见这一句，也没有人看见后生斟茶的手——左手提壶，右手扶着杯沿，稳得像钉在那儿。

曲健在松风茶行帮过三年工。柜台后头那个白衬衫的小老板，抓茶、包纸、拨算盘，手稳得不像个孩子。沈松庭逢人就夸，讲儿子的手是天生吃茶饭的。一晃几年，那孩子长成了后生，漂在广州，黑户，没大人，白得像一张纸。

第二天他绕到三号仓外头，隔着窗缝看了一回：那后生蹲在纸壳垛边上歇气，灰工装，人瘦，坐得笔直。他心里那笔账又活了一分。

夜里他睡不着，上铺吱呀。他算自己的账：二〇〇五年，他被传唤过三回，笔录按过三回手印——排查排到他头上，是奸情的嫌疑。第三回是从牌桌上带走的，鞋上带着泥。那段日子他天天喝酒，河堤走了几十遍。有个东西他看见了：堤下的暗渠，手电的光柱扫过水皮，一个矮影子，一闪。

他没有敢声张。声张了，奸情的嫌疑就得换个人担。

酒后他讲过一回，只对一个人讲。这句话在他肚子里养了两年，养出了钱的形状。如今钱自己走过来了，穿着白衬衫。

他观察了几天：阿木夜里十点进仓，凌晨两点走，一个人，不走大路。他把这条夜路也摸熟了。他还打听到一件顺心事：这后生没有证件，睡桥洞，睡天台，跟城管的麻袋队躲来躲去。一个连觉都睡不安稳的人，一条短信就能拿住。他把这叫作天意。

后巷的野狗认了他，见了他不叫。他夜里蹲在仓库后墙根抽烟，烟头一明一灭，像给什么守夜。他不信鬼神，只信钱。钱到了，鬼神都让路。

过了几日，一个夜班散了，他在仓库后巷把阿木堵住。后巷两盏路灯，坏了一盏，剩下那盏忽明忽暗。狗在铁皮顶上叫。他先把烟递过去，阿木没有接，眼睛落在烟上，像落在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东西上。

“〇五年河边那个伢，是不是你？”他讲，“你妈给我五千，我就当梦话。”

阿木看着他。

看了足有十秒。不眨眼，不躲，也不怕。那双眼睛浅浅的，像两口井，看得见水面，看不见底。

曲健被那十秒看得心里发毛，往后退了半步，后腰抵上了墙。烟掉在地上。

阿木转身走了。走得不难看，不快不慢，像下了晚自习。走出那盏坏灯的光圈，人就看不见了。

曲健在后巷站了半晌，两只手全是汗。他弯腰把烟捡起来，烟纸瘪了。他骂自己：四十多岁的人，怕一个孩子。

那晚他做梦，梦见河堤，光柱一晃，他在梦里喊，不是我。人醒了，枕头湿了一片。

第二天他红着眼睛上工，工友讲他中了邪。他讲，想家。想家两个字一出口，他自己先愣了——他没有家。

…… 隔了两天，同乡捎来话：阿木讲，下周给钱。

曲健请了大排档一桌，挨个散烟。有人问发了什么财，他讲快了。他又多喝了二两，讲等钱到了，先还账，再换个好点的手机。人问换好手机做什么。他讲，要紧的人，找得着。讲完自己先干了一杯。

散了席，他扶着墙走回城中村。巷子里的灯一盏一盏在他眼前叠影。他想，等钱到了，先把腰直起来。人穷了，腰先弯。

他给工头递了一条烟，讲家里有事，月底想支两个月工钱。工头看了他一眼，签了字。字据上的数目是两千一。他数了数三千七，加上两千一，五千八。五千，够还清最后的账，剩下八百，买一张回去的票。他把数目在心里码了三遍，码得像仓里的箱子。

下周到了，钱没有到。他去三号仓外头转，窗缝里看进去，纸壳垛还是齐的，人不在。他等。等到第三个礼拜，同乡又捎来话：月底。他骂了一句，又把话咽了。钱这种东西，催不得，催跑了就什么都没有。

他去邮局问过一回汇款的规矩，柜台里的人讲，要汇款人的姓名地址。他站在窗口前，忽然不晓得该填谁。

他把诺基亚的时间对了对。广州时间，天门时间，一个样。

其实他夜里睡不实。他把那沓命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三千七，怎么数都是三千七。他把钱数和回去的日子摊在一处算：还了账，剩一千九。一千九能做什么。脑子里的账翻来翻去，翻到底，翻出一张脸来——柳文霞站在天井里骂人的样子，围裙上有皂角沫子。那年她的手是暖的。

那半条烟，她拣没有拣，他不知道。

他蹲在仓门口，就着灯，把一条短信在诺基亚上摁了半个钟头。发财两个字他改了三回，先打的赚钱，删了；再打的混好，删了；还是发财，踏实。摁错了两回，重来：等我发了财就回去接您家。

收信号码是旧的。她两年前就换了卡，旧号他一直没有删，尾号他记了很多年。短信发出去，像石头丢进湖里。第二天他翻出来看，还躺在发件箱里，前头一个红叉，发送失败。

他又发了一遍。还是那个红叉。他把发件箱里那两条红叉看了又看，忽然想，卡是换了，号呢？号是空了，还是换了人？他不敢往下想。想下去，接信的人就要换一张脸。

发件箱他清了两回，红叉清不掉。红叉钉在那儿，像两枚生锈的钉子。

他把手机揣回腰包，拍了拍，像拍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四月底，同乡里有个后生回了趟湖北，捎回来一包辣酱，分给他一罐。他挖了一勺拌饭，吃着吃着停了筷子。天门的味道进了嘴，账就算不清了：回去，还是等钱？他把罐子盖上，想，等钱。

五月初，仓里进了新货，夜班的活重了。他多要了几个夜班。工头讲他不要命。他讲，命不值钱的时候，多换几个是几个。

夜里搬完货，他坐在仓门口的石墩上歇气。远处样品间的灯还亮着一排。他数了数，十七盏。数灯是他这两年落下的毛病，数着数着，一晚上就短了。

四号仓的活计里，他最怕搬大灯——整箱的水晶灯，一箱比一个人还高。年轻时候他能扛，如今只能扶。扶箱的时候他常想起茶行里那些茶饼，一饼一饼码到房顶，沈松庭讲，压得住的东西才值钱。那些茶饼后来散到了哪里，没有人晓得。他帮着搬过最后一车，车板是湿的，垫了两层纸壳。

工友们凑钱买了台二手电视，夜里放港片。曲健不爱看，爱听。听到枪响，上铺的人笑，他不笑。二〇〇五年过后，他听不得响的。

…… 仓库里的日子照旧。阿木帮过一回夜班，码货码得邪性：纸箱棱对着棱，缝对着缝，一垛一垛，像拿墨线弹过线。曲健路过看了一眼，讲了句，这后生，手稳。阿木没有抬头。

半夜起夜，曲健见过一回三号仓方向有一星手电光，一晃就没了。他当是管理员查仓，翻身上铺，接着睡他的觉。

月底盘仓，他在场，帮着抬灯。管理员拿着本子一垛一垛点数，点到三号仓，站在那堆纸壳子跟前，嘟囔了一句：

“三号仓那堆纸壳子，怎么越码越整齐。”

◆

二〇一〇年七月，天门，闷得像一口倒扣的锅。柏油路面软了，自行车碾过去留一道浅印。

协查函是内勤送上来的。牛皮纸信封，广州一个分局的公函：辖区灯饰仓库火灾，死者曲健，男，四十五岁，湖北天门人，身份核实无误，请户籍地通知家属认领，函复。附件一页，现场照片两张——烧塌的铁皮顶，纸壳垛的残迹——消防认定意见栏空着。

附来的照片，一张是仓顶塌下来的大洞，一张是纸壳垛的残迹，烧得只剩半人高，断口齐齐的。他把两张照片的编号抄进本子。

函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内勤嚼着冰棍讲：曲健。〇五年，您传唤过的那个。

竺长生把函读了三遍。他的记性还认得这个人：三回传唤，三回笔录，眼神飘，手一直在抖，问到案发夜的去处，答得倒顺溜。函尾有一行小字备注：起火原因待查。

他把函件的编号和经办人抄进本子，给广州的同行挂了个长途，托他寻当地晚报，又托了一句：火灾那晚，仓里当班的都替我问一遍。同行讲，老竺，这是人命案的问法。他讲，就当我多事。

长途打完，他去财务报了电话费，单子上八块四。内勤讲，竺队，你这案子办得比工资还精。他讲，公家的钱，一分也是钱。

他把函复印了两份。一份按流程走，一份折进公文包带回家。先绕到档案室，把二〇〇五年的旧卷借阅登记了一行。管档案的小王讲，竺队，这卷子你一年借四回。他讲，写材料。

米面柜的夹层拉开，卷宗箱放进去，推严。箱子原是装画的木箱，他自己改的，加了锁。这套动作他做得很轻，像给什么东西掖被角。做完他站在厨房里听了听，秀珍在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报着天气。

秀珍问他哪儿去了。他讲，老街，看个旧同事。秀珍多讲了一句，讲他这些日子瘦了。他讲，夏天，都瘦。他没有讲，他夜里两点醒一回，醒了就睡不着。

第二天他去了教育局。管学籍档案的是个老同学，姓赵，一杯茶的工夫，复印件推了过来：沈嘉木，男，一九九四年二月生。二〇〇九年九月，入读天门职高计算机应用班。入学照一寸的，白衬衫，眼睛不看镜头，看镜头旁边一个地方。

成绩单第一学期还齐整，中等。二〇一〇年二月以后，册子上干干净净——没有旷课记录，什么都没有。离校申请一张，六月里办的，日期栏写着六月十一日，监护人签字栏三个字：柳文霞。笔画抖。学籍表上家庭住址一栏，写的还是老茶行的地址。茶行早就没有了。

“这孩子现在人在哪儿？”老赵问。

“活人在纸上学飞了。”竺长生讲。

老赵问他，你查这个做什么。他讲，写年度材料。老赵讲，你那个材料，十年了还没有写完？他笑笑，把复印件折好。老赵那台旧复印机咔咔响了六下。六张，他数了。他分了两处放，三张进公文包，三张进内袋。这是他的老习惯，鸡蛋不分篮，睡不着。

出门前他给职高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班主任，翻了半天名册：这学生，开春就再没有来过。末了补了一句，怪，他那张桌子，灰倒像有人天天擦。

竺长生捏着话筒，半天没有作声。天天擦灰的人，不是学生。学生在纸上飞了。他年轻时候住过集体宿舍，见人这样擦过桌子。窗外的蝉叫成一片。

挂了电话，他把班主任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后头画了个圈。圈子不大，比米粒大一点。

从教育局出来，日头正毒。他在路边的梧桐底下站了一会儿，看一辆洒水车过去，水汽在柏油路上腾起来，转眼就干了。纸上的东西也是这样，看着在，抓一把就没了。

…… 第三天，他去了老街，王家。

老街比五年前矮了——不是矮，是四周的楼高了。王家的院门换成了铁的，漆皮起了壳。他敲了两下，里头的拖鞋声拖了很久才到。

王胖蹬三轮出门了，院里摞着收来的旧电视和纸壳，半院子晾着别人的旧衣裳，一件女式外套的袖子叫风掀起来又放下。院墙根码着一垛纸壳，压得整

整齐齐。他多看了一眼——纸壳而已，天底下码得整齐的东西多得很。蜂煤炉上坐着水，水开了也不见人提。

柳文霞开的门，手在围裙上擦了两把，搬凳子，倒水，动作快得像在躲什么。茶是去年的，受了潮，她照样泡了满满一壶。

竺长生讲了句，水开了。她才起身去提。

例行回访的说法他用了。曲健的死讯，他也讲了。柳文霞脸上没什么："他死他的。"手却把围裙角拧成了一股绳，拧了又松，松了又拧。

他端着那杯受潮的茶，到底喝了一口。茶老了，苦味在后头，慢慢地回上来一点甘。他没有讲破。

桌上有个白塑料药瓶，标签朝里摆着。竺长生没有动它。二〇〇六年西湖里那桩"意外"，安定下在酒里，出处追到一张处方，就断在那儿。他当时没有证据，现在也没有。药瓶就在桌上，标签朝里。

问到儿子，她的腰板直了直："广州读书。有个远房的老师收他，管住。"

"老师姓什么？"

她的手停了停："没问过。孩子的事，问那么多做什么。"话讲出口，她自己先低了头，拿壶给竺长生续水，续得满出了杯沿。

"多久没有通电话了？"

"一年挂零。"她讲，"上回接他电话，还是中考完，问我要两块钱买笔。"

她进里屋，捧出一个装过云片糕的纸盒。汇款单一张，广东的邮戳，两千元，附言空白。底下压着一张剪纸：两片茶芽，一茎两片，芽尖对着芽尖。剪纸旁边还有一张奖状的复印件，汉字录入，第二名。她把奖状也递过去，讲，给老师看看，孩子有出息。竺长生接了，讲，好。

“汇款不讲多，也不讲少，”她忽然补了一句，“回回两千。像量好了的。”

他问，钱收着做什么用。她讲，存着，给他念书。讲到念书两个字，她的声音平了一遍。

堂屋的墙上除了奖状，还挂着一本挂历，去年的，没有翻。日子停在十月。他看了一眼，没有讲什么。

竺长生把那张剪纸举到窗口，看了很久。刀口极净。起刀在哪一边，他看得出来——左边。二〇〇五年那张双童奉茶，也是左边起刀。这两个念头之间，隔着一道他不肯迈过去的坎。

他没说话。末了把剪纸借去巷口，复印了一张，讲入卷宗用，原样还了回去。柳文霞没有多问。

临出门，她在背后忽然开口：“前年冬天，他回来要过一笔钱。酒后讲胡话，讲看见河边有个伢，左手拿手电。”

竺长生站住：“他跟你说这个做什么？”

“想要钱，封口呗。”她讲，“我当他钱想疯了。”

院门外，王胖的三轮车铃从巷子那头响过来，又一路响远了。竺长生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回头。影壁上爬着丝瓜藤，一只蜂在花上打转。

出了老街，他绕到望湖仓的旧址上看了一眼。五金店的卷帘门落着，门口的水泥地上，当年的痕迹洗过多少遍，早看不见了。他站了三分钟，走了。回家路过夜市，烤豆腐的摊子冒着烟。他买了一串，站着吃完，纸巾团进了口袋——他这些年，口袋里从来不缺纸团。

夜市尽头有个修鞋的摊子，灯泡吊在棚杆上。他坐在小马扎上，看了三双鞋怎样修完。修鞋的问他，同志，你那双要不要钉掌。他低头看自己的鞋，后跟磨偏了。他讲，钉。

…… 夜里，他把卷宗箱搬到台灯底下。

函件的复印件。学籍表，入学照那张他单独抽出来看了一眼：眼睛不看镜头。剪纸的复印件，奖状的复印件。还有他托广州同行寄来的一页当地晚报——灯饰仓火灾，豆腐块大，配一张照片，烧塌的顶棚像一页翻卷的纸。火灾是星期几起的，烧了多久，报上都没有。豆腐块只管豆腐块的事。

箱底还有一份最薄的：苏彩娥。一页现场照片，一页结案摘录。结论两个字：意外。这两个字他看了五年，越看越不认得。

笔记本翻到前头，前头记着二〇〇五年冬天的几页。有一页只有一行：现场剪纸，左手刀口。底下画了三个圈。圈是那年画的，墨都旧了。再往后翻，有一页贴着一张照片的复印件：河埠头暗渠的鞋印，三十三码。模子早丢了，照片还在。他记性里那张清楚：暗渠边，一个脚印，脚尖朝里。

他拿放大镜把两张剪纸看了一遍：二〇〇五年现场那张双童奉茶的照片，和今夜这张两片茶芽。两张纸。剪口都从左边起。黄纸对白纸，隔了五年，像同一只手在两头的黑暗里各落了一剪。纸质也对得上：都是手工的毛边纸，市面上少见。他把这条也记下了。

末了他做了一件事：把苏彩娥那一页上的结论两个字，拿铅笔圈了，想了想，又拿橡皮擦了。纸上留了一道浅浅的印，像话讲到一半。

他把三份复印件按年头排了排：二〇〇五，二〇〇六，二〇一〇。纸越攒越多，人对得上的越来越少。这句话他写进本子，又划掉了。

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他写了一行：

第一个人说他看见了伢。现在他死了。下一个会是谁？

◆

二〇〇九年九月，天门一中，香樟还绿得发黑。军训刚过，操场的白线还没有褪干净。

聂小雨从岳口镇考上来，全镇第一。她家在汉江堤根下，秋天涨水，她爸上堤守夜，一守半个月，回来一身泥。发榜那天镇上给她家道了喜，她妈把“喜”字贴在门框上，浆糊抹得太厚，纸都皱了。

开学前夜她收拾箱子，她妈往里塞了一袋炒米，讲出了远门，想吃家里的就泡一泡。她讲妈，是一中，不是武汉。她妈讲，都一样，出远门。

进了一中她才知道，第一名遍地都是。住校，八人间，箱子塞在床底下，普通话里带着洗不掉的乡音，英语听力像一堵墙。军训站军姿，她晕过一回，醒过来人在树荫底下，旁边蹲着一个白衬衫的女生，递来半瓶温水，讲了两个字，慢慢。

发新书那天，她把每一本的包书皮都包了，边角折成直角。唐穗看了一眼，第二天递给她一沓现成的书皮纸，讲是多的。纸是挺括的牛皮纸，边裁得一样宽。

第一次月考，小雨语文进了班级前十，英语在及格线上打晃。唐穗的英语卷子发下来，一百四十七。她把卷子摆正，摆得跟桌沿平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开学第二周调座位，她跟唐穗成了同桌。

第一眼她记住的是铅笔。四支铅笔削得一样长短，笔尖一样尖，像机器削出来的。橡皮没有一处缺损。白衬衫的领口是平的。桌角立一只玻璃杯，杯里的茶根根竖着，一缕香，讲不上来的香。同桌们喝碳酸饮料，咕咚咕咚，只有她喝这个。

玻璃杯里的茶她一天只泡一回，中午续三次水。有同学借去闻过，皱着眉头讲什么味啊。唐穗把杯子接回来，涮了，重新泡。从此没有人再动那只杯子。

教室的窗台上晒着一排杯子，谁的都蒙着水垢，只有那一只，透得能看清茶在里头立着。有值日生想帮她洗，她讲了声谢谢，说不用。从那以后，窗台上那一排杯子，中间空着一个位置。

入冬，全班一半人手上生了冻疮。唐穗的手一直是暖的，递过来的豆浆袋子就是证据。

冬天夜自习结束，走廊的水房结着薄冰。唐穗洗杯子，先拿冷水激一遍，再拿热水走一遍。物理课代表讲这叫热胀冷缩，杯子不裂。她把杯子举到灯底下看了看，透了。

小雨胃口浅，早读上到一半就发晕。第三天早自习，她桌肚里多了一袋还温着的豆浆，两个包子，底下垫着纸巾。保温袋是食堂的，扎口折了两折。她后来在食堂窗口看见过那个扎法，学着扎，扎不出那么齐。

第四天还有。她把钱压在唐穗的笔袋底下，第二天，钱原样回到她书里，夹在英语第三十八页。她再给，钱再回来。第三回她不敢给了。

小雨后来算过，一袋豆浆两个包子，一天一块五，一个月三十块。她把这三十块记在英语书最后的空页上，记了两个月，没有一个字敢跟家里提。

十一月的雨连下一周。放学共一把伞，伞一直偏着她这边。到了宿舍楼下她才看见，唐穗右边的肩膀湿透了半边，雨在那一半肩上洇出深色的痕。伞塞回她手里，人已经走进雨里去了，走得不快，也不打伞。

有一回伞折了一根骨，第二天唐穗换了一把新的来，旧的拿去修了，修好了，给了楼道里没有伞的别班女生。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雪，天门的雪存不住，落地就化。教室的玻璃上蒙着雾，唐穗伸手在上面写字，写的是英语单词，一笔一笔，写满一扇窗，擦掉，再写。下课铃响，雾又合拢，像没有写过。

小雨数学卡在第三步，卡了半节自习。唐穗不讲答案。她把答案拆成台阶，一步，一步，铺到小雨自己能踩上去。铺完一级，问一声，这级稳不稳。稳，再铺下一级。她从来不笑人问得笨，一次也没有。

期中考试，小雨的数学第一次及了格。卷子发下来，第一道大题就是卡住她的那道，步骤一步一步，稳稳落到了底。她把卷子折好，塞进书包最里层，像藏一张奖状。

那天放学她绕到食堂后头，把卷子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炊烟从烟囱里出来，笔直，到了半空才散。她想，做题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做——一步一步，别抄近道。这句话她没有讲给任何人听。

小雨觉得，自己这辈子交到了第一个真正的朋友。从前在镇上，朋友是抄作业的交情，是两包辣条的交情。这个不一样。这个像冬夜里有人替你把被角掖好了，一声不响。

她把这事写信念给家里。她妈回信讲，城里孩子心眼多，你别掏心窝子。信末又加了一句，镇上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讲好。她想了想，妈是对的。她把信念了两遍，没有当回事——后来她常想，人这一辈子该躲的坎，冥冥里都先给过你话。

…… 转过年来的春天，晚自习后那段路，常常三个人一起走。

蔡诚是篮球队的主力，也是理科第一。春天市里联赛，体育馆坐满了人，球鞋踩得地板咚咚响。小雨去看球，看的是十号。十号投三分，出手不看筐，进了球也不吼，转身就回防。唐穗替她占了位子，替她递水，瓶盖预先拧松过半圈。

蔡诚中场罚球前朝台底下望了一眼——望的是哪一块，小雨不敢确定，只觉得耳朵先烧了起来。旁边的陈晶晶拿胳膊肘碰她，小声讲，唐穗，你同桌命真好。唐穗那时在看球，手放在膝盖上，安安静静。

球散了，三个人在校门口吃锅盔。蔡诚一口气吃两个，给小雨买一个，给唐穗也买一个。唐穗掰了一半回递过去，讲吃不完。路灯底下，三个影子排开来，一长两短。

蔡诚讲他爸在深圳打工，讲得眉飞色舞，讲那边楼高，讲过年回来带过大彩电。唐穗听了一会儿，问了一句，深圳冷不冷。蔡诚讲，不冷，一件毛衣过冬。她点头，像记下了一件要紧的事。

有一回晚自习后绕到西湖边上走。湖心亭的灯映在水里，被风揉碎又拼上。蔡诚讲亭子的来历，讲得七颠八倒，唐穗听着，替他把年代一一摆正，摆

得他自己都没有察觉。

那天唐穗看了很久的水面。小雨问她看什么，她讲，看水几时开。茶树该追肥了，念庐后头两棵老茶树，谷雨前要松土。小雨听不大懂，只觉得这些话从她嘴里出来，像另一种普通话。

回宿舍的路上，唐穗讲了一句，水开了。小雨四下看，没有看见水。过了两天她才明白，讲的是春茶下山，水就是节气。她把这句记在英语书最后的空页上，跟三十块钱记在一处。

空页后来写满了，又从后头往前记。有一天翻到前头，看见自己头一个月记的那一行，字歪歪扭扭。她拿尺子比着，把它描直了。

蔡诚中了市里竞赛的奖，请全组喝汽水，递到唐穗面前的那瓶，她接了，没有开。蔡诚挠了挠头。小雨问过她怎么不喝。她讲晚上练茶，口要干净，练到水凉为止。

班里传阅一本同学录，传到小雨，她写了半页。传到唐穗，第二天还回来，那一页只有四个字：一路顺风。字落在纸上很稳，稳得像印上去的。

晚自习后的一段路，路灯一盏接一盏，唐穗总走在中间。路过小卖部，蔡诚买汽水，一买三瓶，唐穗那瓶她总要拧开又盖上，讲留着。蔡诚讲题讲得手舞足蹈，把物理讲成评书，小雨笑得直不起腰。唐穗也笑，那笑像摆好的一桌茶席，样样到位，不多一分。

她从不议论人。谁跟谁闹了别扭，谁的裙子短了，她一概不接话，只低头续自己的水。有一回陈晶晶咬着耳朵讲另一个女生的闲话，讲得眉飞色舞，唐穗听完，把杯子里的茶喝完了，只讲了两个字，凉了。那杯茶凉得人心里发空，从此小雨在她面前也讲不出人闲话。

她从不发脾气——有一回前排男生撞翻了杯子，茶泼了她半张卷子，她先拿纸巾去垫人家的书，再擦自己的。她也从不提家里。中秋前小雨问过一回，放假回哪儿。她把话头轻轻搁下：“唐老师那儿。”

她不提，她们也就不敢提。

成绩也是。她稳在前十，起落不超过三名，像用尺子画出来的。值日表上她那一栏，黑板永远擦得最干净，粉笔灰归成一堆，抖进簸箕，不乱飞。有一回学校查卫生，检查的老师在她们教室站了五分钟，末了在表格上打了个勾。班主任进来讲，就一个字，服。全班笑，唐穗也笑，笑得很浅。

期末评三好学生，全班举手，没有不同意的。唐穗站起来鞠了一躬，坐下的时候，椅子腿一点声都没有。奖状发下来，她把它卷成一卷，插在课桌右侧的空档里，像插一炷香。小雨的是进步奖，对折再对折，塞进了书包。两人在这一点上倒像：都不拿奖状当回事。

学期末大扫除，唐穗把窗户擦得透亮，抹布洗出来的水都是清的。小雨在底下扶凳子。两个人没有讲话，配合得像做过许多遍。

名字的事小雨问过一次。穗字的穗。唐穗在草稿纸上写给她看：稻禾抽穗的穗。

“家里取的。”她讲。

期末考完那晚，宿舍熄了灯。小雨打着手电，在带小锁的日记本上写下一行字：

“唐穗对我好得让我害怕。像菩萨，又像账房。”

合上本子，锁扣咔哒一声。窗外有人夜跑经过，脚步一下一下，像谁在数数。那一页之后，她隔了半个月才敢再写。日记本后来藏进了箱子最底下，上头压了两件冬衣。

◆

二〇一一年四月，谷雨前，一中的香樟落了一层碎花，扫也扫不尽。

期中成绩出来，小雨滑了十几名，唐穗还是原样。班主任找她谈话，讲最近状态不对。她讲家里有事。班主任讲，有事跟老师讲。她点头，什么也没有

讲出来。蔡诚进了竞赛集训队，走廊的公告栏里印着他的名字。小雨把那一栏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转身下楼。

那阵子唐穗在准备五月的省赛，晚自习后常去实验楼练茶。有同学讲在楼下听见过楼上倒水的声音，一滴一滴，像钟漏。

期中考前两个星期，图书馆老楼的天台开门晒书，竹竿上搭着白床单，风一过，床单鼓成帆。晒的书拿砖头压着，有一本叫风掀开了页，哗哗地翻，像有人在楼上急着找什么。小雨嫌宿舍吵，抱着单词本上去背。楼梯转到一半，她看见天台的门虚掩着。

风先出来了，掀她的头发。

天台上站着两个人。蔡诚靠着水塔的墙，唐穗离他两步远，校服的衣角叫风掀起来，又落下。他们讲什么，风一句也没有给她。也许什么都没有讲。可她看见唐穗在笑。真笑。眼睛里那层平时摆得平平整整的东西，没有了，像湖面化开了冰。

小雨抱着单词本，一层一层退下去，数着台阶。十九级的楼梯，她数到了四十一。退到二楼，单词本里飘落一页纸，她没有敢回头去捡。

回到宿舍，她把单词本从头翻到尾，一页也没有看进去。室友问她明天跑操穿哪双鞋，她讲随便。这两个字她讲了一晚上。

上铺的室友打呼，她数着呼噜声，数到三百，天蒙蒙亮。食堂的豆浆味从窗缝里挤进来，她把头蒙进被子。那天晚饭她打了饭没有吃，米饭在桌上凉透，结了一层壳。

这件事她试图像一片药一样咽下去。她试过告诉自己，那是同学间讲题，试了十遍。第十一遍没有试到——课桌里多了一封信。

白信封，没贴邮票，没写寄件人，封口没有粘，只折了一道。是第四节物理课中间发现的，前排传卷子，有人碰了她的桌肚，她低头，就看见了那只白信封。

三张拍立得，白边。更衣室里，她自己。体育课后换运动服，她背对着门。角度很低，从长凳底下朝上拍的，脸不完全，可那条洗得发白的校服裤，那双鞋，认得出是她。一张比一张近，第三张里，她按在柜门上的手，手上的橡皮筋都拍得清。照片上还有一股淡淡的药水味，像吐出来没有多久。

她的指尖一下子冷了。她把照片扣在膝盖上。那节课后背全湿了，粉笔在黑板上笃笃地敲，她的心跳跟着一下一下。

放学她一个人去了体育馆后头的更衣室。长凳，木格柜，高处的气窗开着一条缝。她站在那扇气窗底下，仰头看了很久。窗是实的墙，人翻不进来；能放进来的，只有镜头。门锁是坏的，一直坏，男生也打那儿过，从前没有人在意。

她跟体育委员讲了气窗该修，体育委员讲好。过了几天窗修了，上了新插销。她站在外头看着，不晓得自己是在防谁，还是在替谁善后。

更衣室对面是器材室，管器材的老头讲，那扇气窗前几天就开着，他关过两回，第二天又开。老头讲这话的时候在修篮球架，没有看她。她谢了他，一句也不敢多问。

信纸上只有一行字，笔画很稳，像刻上去的：

“离蔡诚远一点，照片会到您家爸妈手里。”

报警？拿什么报。谁放的，几时放的，怎么进的课桌，她讲不出。跟爸妈讲？岳口的家里，她能想出她妈的脸——先问的不是谁干的，是你怎么让人拍着了。跟唐穗讲？这种事，怎么开得了口。像把自己的丑，双手捧到菩萨手里去。跟蔡诚，更不能。他在准备竞赛，她的名字挂在他那一串名字里，扯一动，全动。

竞赛初赛那天，她在教室外头站了一阵。考场里安静，日光灯白得像雪。她从窗外绕过去，绕了一圈，又绕回来。最后一节晚自习，她请了假。

她在派出所门口过过一回，进去又出来，在台阶上坐了一节课。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她一个也不认得，一个也不敢认。

派出所对面的面馆她坐过一回，要了一碗素面，没有动筷。老板娘来收碗的时候讲，姑娘，面坨了。她讲，对不起。那三个字出口，她自己先愣住了——对不起是说给谁听的。

夜里宿舍熄灯，上铺翻身的响动她都数着。有人下床喝水，她的手心就出一层汗。第七天，她把一把削苹果的小刀压在了枕头底下。刀是她爸的。小刀没有用上。用上的是水——她开始喝很多水，把日子一口一口咽下去。

她按信上办的。

先换座位，理由是近视加深，新配的眼镜她也不戴——离唐穗隔了五张桌子。收拾桌面那天，唐穗帮她抱着玻璃杯送过去，放到新桌上，摆正，杯把朝右。两个人都没有讲话。换了座位，上课抄笔记要斜着身子看黑板，一节课下来脖子酸。她没有讲。酸是好的，酸了就不去想别的。

再不去球场，海报贴出来，她绕着走；公告栏换了新一期，蔡诚的名字还在，她绕到栏杆外头走。蔡诚在走廊里喊过她一回，她拐进厕所隔间，隔着门听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把那声喊里的失望都盖了过去。后来蔡诚托人递过一张字条，问她怎么了。她原样退了回去，字条角都没有折。

唐穗照旧把豆浆放在她桌角，不再放桌肚了——杯把还是朝右。那天放学，她把豆浆原样带出教室，倒进了垃圾道。倒进去那一瞬，眼泪毫无道理地下来了。

唐穗只问过她一句：“眼镜配了，怎么不戴？”

目光平平的，像看过一遍的答案。小雨讲，丢过一副，不习惯。唐穗没有再问，顺手把她桌角撞歪的书扶正了，书脊对齐了桌沿。

信和照片，她没有烧，也没有丢。夜里她把它们缝进冬衣的夹层，针脚密，密得像要缝进骨头里。

缝完那晚她做了个梦，梦里有人举着相机追她，追进一间没有门的屋子。她醒了，枕头底下的小刀还在，硬硬的一小块，硌了她半夜。

…… 五月，她请了长假。校医室她去了三回，第三回校医给她倒了杯热水，讲，回去睡吧，睡几天就好了。她讲好。她没有好。证明是舅舅从武汉寄来的，神经衰弱四个字，她看了很久。

长假在家的日子，她学会了补衣裳，把冬衣翻出来，一寸一寸地检查针脚。她妈在电话里讲，武汉热，带什么冬衣。她讲，带着踏实。

挂了电话她把冬衣叠成方块，一寸一寸检查完针脚，又拆了一条线重缝。缝纫是跟楼下舅妈学的，顶针戴在中指。顶针转一圈，日子就过去一截。

六月她没有怎么到校。七月，转学，去武汉舅舅家，手续是她爸跑了两趟办下来的，档案袋封了口，他抱在怀里，像抱一捆易碎的东西。她爸蹲在校门口等她，见她出来把烟摁了。父女俩一路没有讲话，到了车站，她爸讲，到了打电话。

离校那天她收拾桌面，装了一个纸箱。装到最后，桌肚最里头还有半袋炒米，是她妈塞的那袋，一直没舍得吃完。她抱着箱子在教室门口站了站，回头看了一眼那张空出来的桌子。

手续办完那天落了雨，父女俩共一把伞走到车站。伞也是偏的，偏她那边。她一路看着她爸湿掉的半边肩膀，一句话也讲不出。

长途站里人声烘烘，蛇皮袋子摞着走，广播里报着班次，报错了两遍。唐穗来了，隔着两步站定，递过来一只纸罐，封着红纸。

“些微之物，勿挂于心。”

小雨喉咙里堵着一团棉花，只点了点头。她想说的话有很多，哪一句都出不了口。想讲句对不起，出口成了一句再见。车开动的时候她回头，唐穗还站在原地，没有挥手，人像钉在一张照片里。

她哭了一路。哭到武汉，车进了站，眼泪才停。从此她再没有回过天门。

舅舅家的阳台朝北，看不见湖。夜里她听得见火车过桥的响动，一节一节，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八月末，信箱里多了一张明信片。邮戳是天门的，糊了，认不出日子。正面印着西湖，一湖的水，画报上常见的角度。背面光光的，一个字也没有。

她翻来覆去看了半宿，纸边都起了毛。没有落款。她去邮局问过，营业员讲，平寄的，没有寄件人，查不了。她把明信片压在茶叶罐口上，罐子搁上柜顶。武汉的天慢慢凉了。

舅妈问过她一句，天门还有亲人吗。她讲，有同学。舅妈讲，同学不是亲人。她没有接话，把碗端进厨房，洗了很久。

碗洗完了，天也黑透了。舅妈喊她吃西瓜，她讲不饿。西瓜切开来摆在堂屋桌上，红瓤黑籽，谁也没有动。到了夜里，表弟偷偷起来吃了两块。舅舅家的表弟上初中，问她一中好考吗。她讲，好考，也别光顾着考。表弟讲，姐你讲话跟我们老师一样。她笑了笑。

后来她认得了罐底那两个小字：雨前。红纸磨得发了白。

多年以后，在武汉，她只对人讲过一句：

“我这辈子最想不通的是，那罐茶我一直没舍得喝，也一直没敢喝。”

◆

二〇一一年五月，天门。

竺小江去武汉的医院报到，实习第一天。

走前一晚，他把白大褂叠了又叠，叠得棱是棱角是角，穿给秀珍看了一回。秀珍让他转一圈，看完讲，像样。钢笔别在胸袋上，背包带勒到最紧。他讲医院食堂难吃，妈你腌的萝卜干给我多装一罐。秀珍笑着装罐，装了两罐，又往他包侧袋里塞了创可贴和藿香正气水。

送他到楼下，秀珍踮脚替他理了理衣领，直起身的时候，腰上像别了一根铁丝，人定在了那里。她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摆摆手讲没事，坐骨神经，老毛

病。小江临走抱了一下他爸，抱了一下就松开了，爷俩都不习惯。秀珍在门口抹了一下眼睛，讲风大，迷眼睛。

走后第三天来了电话，小江讲带教老师凶，讲食堂的粉没有家里的好吃。秀珍举着话筒，一句一句地应。竺长生在旁边听着，没有接。挂了电话秀珍讲，儿子大了。竺长生讲，嗯。

他把儿子宿舍的照片要了来，同科室的师弟拍的：一张铁架床，床底一双拖鞋，摆得端正。秀珍看了半天，讲，鞋摆得齐，人在外头也齐整。竺长生没有讲什么，把照片收进了抽屉。

头一回犯。膏药贴了，热毛巾捂了，三天才直利索。竺长生看着她在灶台边直不起腰的样子，把买菜做饭的活接了过来。

他做黄潭米粉：清早去街口排队买鲜米粉，骨头汤烧开，姜丝撒进去，米粉在滚水里一汆，捞进碗，浇汤，撒葱花。第一回盐下手重了，咸了。他做了三十年案卷，没有做过三十年饭。秀珍照样吃完了，碗底见光，讲盐放得实在，压得住腥。第二回他少搁了盐，秀珍讲，这回又淡了。第三回他拿起了电话，订了街口的。秀珍笑了三天。

他又试了一回粉蒸肉，天门九蒸的路数。蒸肉米粉是拿擀面杖自己碾的，粗一阵细一阵。蒸出来秀珍尝了一口，讲，有嚼头。他听得出这是往好里讲。

街口米粉店的老板娘认得他了，讲竺队长最近会过日子了。他讲，退休倒计时。老板娘讲，还有七年。他讲，七年，很快。

老板娘又讲，你们干公安的，退了休也闲不住。他讲，闲得住，带孙子。话出口他自己先笑了——孙子还早，儿子才实习。

那天从米粉店出来，他在街口站了一阵。斜对面原来有个麻将馆，如今改成了快递收发点，门口的牌子是新的。五年前苏彩娥常在那儿打牌，案卷里记过的。

秀珍那几天翻出老照片来晒，一张一张摆在阳台上。有一张是小江满月的，有一张是他俩结婚的。她问他，哪一张放相框里。他指了指小江那张。她

讲，你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好看。他讲，现在也没有难看到哪里去。

下午，局里安排防溺水宣讲进校园。五月，河塘的水一夜一夜暖上来，年年淹孩子，年年初夏都是派出所的坎。排班表上本来没有一中，竺长生把别处推了，换了过来。

去一中之前，他先去了趟档案室，把二〇〇五年的卷子还了，又借了出来。小王讲，竺队，你这借了还、还了借的。他讲，怕你们把它归错了地方。

小王讲，竺队，你要不放心，我给你单独上把锁。他讲，不用，公家的柜子，公家管。锁该上在哪儿，他心里有数。

一中的礼堂坐得满满的。台上是年轻民警，放了一段防溺水的广播剧，讲自救，讲呼救，讲看见人落水先喊大人，台下一阵一阵地窃笑。礼堂顶上的吊扇转得很慢，是老式的，一开就嗡嗡响。香樟的气味从窗缝里渗进来，混着粉笔灰味。

讲座里有个细节他记住了：溺水的孩子救上来，先要判断呼吸，摸颈动脉，数十个数。台下的学生跟着数。他在门口跟着数了一遍。十个数，数得人心里发空。

宣讲散了，礼堂前头没有散。市里选拔中学生茶艺选手，长条桌后面坐了一排评委，学生轮流布席，一人一席，十来分钟。桌子是从教室拼起来的，铺了各自的桌布。

前头几个学生，有的手忙，有的水线断在半路，评委提笔又放下。轮到一个穿校服的女生，礼堂静了一层。

评委席边上站着两个陪考的家长，一个攥着保温杯，一个举着相机要照，叫工作人员拦了。这女生的席前没有家长。她一个人来，一个人布席，一个人收席。

竺长生本来要走的，脚步停住了。

温杯，置茶，注水，续水。手腕一沉，一提。水线细细的，从壶嘴里出来，不断不急，杯满七分，收住。收的时候壶嘴轻轻一扬，一滴不洒。奉茶给评委，杯柄转向人家的右手。

布席到收席，十一分钟，中途她抬眼看了一回墙上的钟——不是看时间，像是对了一下表。十一分钟里，礼堂的后门进出过三拨人，她没有回头看过一次。整套手法老成得不像十六岁。席签上写着茶名，两个字：雨前。

是唐穗。念庐那孩子。

评委席上有人点头，笔尖在本子上走。旁边一个评委低声讲了句什么，旁边的人点头笑了。评委里有一位是省里来的，五十来岁，喝水的动作也是内行。她翻着选手的报名表，翻到一页，停了停，问陪同的老师，这个孩子，家里是做什么的。老师讲，跟奶奶过，念庐唐家的。省里的评委讲，难怪。

难怪两个字落在礼堂里，没有下文。陪考的老师也不接。这一段对话，像茶席上一道没有上完的菜。

散场的人流从她席前经过，她低着头收席。收席的时候，省里的评委把她席上的方巾拿起来看了看折痕，又放了回去。竺长生把这一幕看在了眼里。懂行的人看折痕，跟他看刀口，是一个看法。

等人快散尽了，她穿过人流，径直走到竺长生面前，微微欠身。

“竺叔叔好。”

竺长生愣在原地。六年了。念庐他只去过一回，收养落户的例行走访，前后没讲满十句话。那天门口一双小号的布鞋，鞋头冲外，摆得整整齐齐。登记簿翻到那一页，“唐穗”两个字已经写好了，笔画稳稳的。

唐韵秋老太太应答滴水不漏，他当时在随身的本子上记了六个字：关系清，来路清。如今想起来，那六个字像一堵墙，墙这边是他，墙那边是他进不去的六年。那次走访回来，他在本子上另起了一行：遗孤安置，入校就读。底下画了一道横线。横线底下，六年，空白。

“二〇〇六年，您家来念庐做过登记。”她讲。

他想问一句你怎么认得我，话到嘴边，她已经回答了。剩下的路，是她替他把话走完的。

讲完又欠了欠身，转身回席上收茶具去了。每样归位，桌布抻平，方巾折成一四方。从头到尾，她没有多看他一眼，也没有少看他一眼。

竺长生在礼堂门口站了一会儿。五月的风从操场上过来，吹得防溺水的横幅哗啦响。操场上有学生在慢跑，一圈，又一圈。他年轻时候也这样跑过，那时候跑的是体力，如今数的是心神。上车的时候，他没有提这事。

回局的车上，蒋阔开着车。他跟了竺长生六年。蒋阔二十四岁进刑警队，跟他的第一课是蹲守，蹲了三夜，回来就问，师父，咱们蹲的到底是谁。他讲，蹲的不是人，是事。事比人有耐性。

蒋阔晓得哪些话问了白问，还是问了：“广州的回函到了，附件。”

路上他接了个电话，是他爱人催他下班买菜。他讲，晓得，买排骨。挂了电话，车里静了一段。

曲健火灾，最终鉴定。起火点位于三号仓无电路堆仓——纸壳垛。鉴定备注：原因不明。死者血液检出酒精。无电路，无明火隐患，常理上烧不起来的地方，起了火。

蒋阔的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老竺，广州的火，跟你那个抽屉有关系吗？”

竺长生看着窗外。陆羽大道两排新栽的梧桐，叶子绿得发亮。过了鸿渐路口，他把附件折好，收进内袋。

他没有答。

蒋阔也没有再问。车进了大院，他下车绕到另一边，替竺长生拉开车门。竺长生下了车，站定，讲了一句：小蒋，今天的话，出你口，进我耳。

蒋阔讲，晓得。

上楼的时候，楼道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在他们身后一层一层灭掉。竺长生走在他前头，影子比他先进门。

夜里，他把回函放进米面柜夹层的卷宗箱。放进去之前，他把箱子里的东西清点了一遍，像点名。点到第三样，他把台灯拧亮了一格。清点的时候，他又翻出一册旧笔记本，二〇〇五年的。里头抄着现场勘查的要点，最后一页夹着半张剪纸的拓样——当年他用铅笔蒙着照片描的。描得不像，笔顺倒是描对了，从左到右。

米面柜里有半袋新米，是秀珍前天买的，他先把袋口卷好，才推的夹层。

箱子里的材料，如今排得整整齐齐：苏彩娥一份。曲健一份。另有一张纸——两片茶芽剪纸的复印件。

箱子合上，夹层推严。厨房里静下来，静得能听见米粒滑动的余音。客厅里电视还亮着，秀珍在沙发上睡着了，遥控器攥在手里，梦话讲了一句：小江，慢点跑。竺长生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了。

关小了，没有关掉。楼道的灯灭尽之后，他在黑里又站了一会儿。米面柜的方向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知道它在，就像知道后槽牙里那颗旧牙在。睡前他去了一趟阳台，夜风把楼下的梧桐叶吹得哗啦响。对面楼有一扇窗亮了很久，后来灭了。他数着自己的呼吸，数到第几十下，才觉得困。

◆

二〇一一年五月，竟陵老街。

消息是杂货铺的陈老板捎进来的，人没有到，嗓门先到：省里比赛！一中那个女学生，全省第一！《六羡》！报纸在腋下夹着，一路拍人家的门板，另一只手拎了一包桃酥，讲是给先生添个嘴。

齐守拙那年七十八。裱了一辈子画，十六岁进裱画作坊，手上的浆糊味洗不掉，眼睛也熬花了。老花镜的度数两年里换了三回，配镜的讲，先生，再花

下去，就得换镜子了。

他如今每天清早还是裁几张纸，剪几刀。手上的活不能停，停了就真的老了。剪出来的纸片攒在一个木匣子里，逢着乞巧节、灶王节，老街有人来讨花样，他给两张，分文不取。

匣子里有一批花样是老底子传下来的，喜鹊登梅、连年有鱼。他照着剪，剪着剪着就走了样，走样的比原来的好看。从前徒弟们讲师父手潮，他不辩。手艺人到了这个岁数，辩这个做什么。

他把报纸在案头展开，戴上镜，又摘下来擦了擦，再戴。从头版看到副刊。报道看了两遍，第一遍看比赛，第二遍看照片。照片上领奖的高台是红绒的，女孩子捧着证书，捧得很正，站的位置不偏不倚，正对着镜头。

报道末尾引了评委一句评语：手法老成，气度沉静，不似少年人。他把不似少年四个字看了两遍，然后在“小茶仙”三个字底下垫了张废纸，拿镇纸压了压平。

压平了，搁在案头。那天夜里他没睡好。梦里是文化宫的走廊，灯笼亮着，剪窗花的孩子们坐了两排，他站在讲台上看不清脸。他在梦里喊了一声，都抬头。没有人抬头，剪刀的沙沙声不停。他醒了，天还没有亮。

梦里那两排孩子，他一个名字也叫不出来。教了一辈子书，记手不记脸，是他的一桩怪癖。裱画的师父讲过，脸会骗人，手不会。

陈老板坐了一阵，掰了块桃酥尝，讲省城商场里也卖这个牌子，就是不如老街的甜。齐守拙应了一声。人走了，满屋的桃酥味散不去。他留了两块，其余的拿油纸包好搁进柜子，想着哪天有放学的孩子来，给两块。老街放学的孩子都躲着老房子走，不来。

案头那张报纸他压了三天，又取出来看了第三遍。省报记者的名字他记住了，想着哪天托人打听打听，这孩子练茶几年了。打听这个做什么？他也讲不上来。

陈老板第二回路过，隔着门问了句，先生，报看完没？他讲，看完了。陈老板讲，看完给我，我垫柜脚。他讲，再放放。

文化宫的班是二〇〇八年散的。拆楼那天他去看过一回：瓷砖地起出来了，秋千架锯倒了，墙上还剩半张孩子们贴的窗花，叫风撕的，剩下的那一半褪成了淡红。班上三四十个学生，手最稳的有两个。

一个男孩子，左手用剪，剪啥像啥，下剪从不打稿。他记得有年冬天，那孩子剪了一屋子雪花，纸屑落了一地，他扫了两簸箕，孩子从头到尾没讲一句话。一个女孩子，稳，剪口比男孩子的还干净，剪花剪叶，叶子背面的筋都数得清，剪凤尾，尾羽一根一根，像风一吹就活。

散班前的最后一个暑假，他还开过半个月的班，来的人稀稀拉拉。那个女孩子来过一回，坐门边，剪了一下午凤尾，走的时候把纸屑带走了。那个男孩子来过一回，坐窗根，剪了一下午雪花，纸屑落了一地；他走的时候，地上干干净净，纸屑不知去向。

两回他都没有认出是谁家的孩子。老街的孩子都穿校服，校服都一个样。他只记得他们的手。手是不会认错的，手比脸诚实。

散班那天，别的孩子哭了，这两个孩子没有来。

他教了半辈子剪纸，没有见过那样的手。那样的手不该出现在一个县级市的少儿班里，像两粒好种子落在了瓦砾堆里，没有人看见，就自己发了芽。

样册跟他回了老街。蓝布面，他自己裱的，裱了三层，中间留着空腔。裱画匠的老手艺，本是为着防潮防蛀。封二上有一行小字，是他自己写的：随手剪来，聊博一笑。

从前班上挂过一盏纸灯笼，孩子们剪的窗花贴满一圈，傍晚点上，半条走廊都是红的。他年轻时在裱画作坊，师父在梁上吊一盏灯，众人在灯下做活，谁的手快，谁的手稳，灯底下见真章。后来他带班，也吊一盏。班散了，灯笼烧了，窗花他留了一抽屉。

暗层里头一张纸来的时候，他当是哪届学生落下的。展开一看，不是班上的路数，刀口太老，老得像他师父那一辈人的手。他把纸原样夹回去。从那以后，隔几天，他翻一回样册。

翻样册有翻样册的规矩。净手，关窗，背对门口。哪一条是哪条线传下来的，他也讲不清了，只晓得这样做，心里静。有几年他疑心样册的秘密守不住，想过把空腔封死。念头起了几回，一回也没有做。裱了三层的手艺，是他吃饭的手艺，也是他等信的信箱。

隔些日子，暗层里就会多出一张纸。他从没有撞见过人。头两年他当是风卷进去的。后来，他不当了。风卷进去的纸，不会叠得那么平。

他翻开样册。新的一张在里头，压得平平整整。

高台上的女孩。裙裾，两条手臂，手上没有话筒，剪的是十指，一根一根，稳稳地摊开。台下一个小人，仰着脸，双手举一盏灯。灯苗剪得很小，小得像一粒火。两个人隔着大半张纸，谁也不挨着谁。

纸是好纸，白净，厚薄匀，边口没有毛刺，是上了油的新剪剪的。刀口从左边起。他班上，没有一个孩子是左手用剪的。他年轻时学裱画，师父讲过：刀口是手的脚印，人过留痕，刀过留口。

齐守拙在灯底下坐了半晌。他把样册合上，又打开，又合上。第三次打开的时候，他在暗层里放了一小张白纸，压平。隔了一个月去看，白纸还是白纸。他笑自己：又不是鱼汛，等什么。话虽这样讲，下个月他还去翻。

白纸压在暗层里，像问路。问了三回，没有回音。老街的邮差从来不到他这层来——他的信，不在邮路上走。

然后他裁纸，取剪，回了一张：一盏灯。手抖了，灯剪歪了，罩子一边高一边低。第二天他又不服气，取出来重剪了一张，还是歪。他笑了，笑自己这双手，裱画的时候稳，剪灯的时候歪。他把歪的留在案头给自己看，把头一天那张——其实也不直——夹回了暗层，拿手掌压平，压了很久，像怕它飞了。人老了，能回的东西不多了。

两张纸并在一处，他忽然明白它们要讲的话：一个在亮处，一个在给亮处供电。

“灯跟灯芯，从来不见面。”他讲给屋里听。

屋里没有别人。只有桌角那包桃酥，油纸窸窣响了一声。

湖那边的工地起了几层，塔吊立着，像一只收拢了长脚的蜘蛛。有一回他遛弯走到湖边，隔着围挡看了一阵，打地基的坑大得吓人，水一格一格往上抽。围挡上刷着标语，讲了工期，讲了安全。有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朝他望了一眼，大概当他要讨水喝。他摆摆手，走了。

陆羽公园里那尊像他常经过，像座上的字叫人摸得发亮。有一回他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子在像前站了一会儿，走了。他后来在报纸上才对上是谁。

听讲那楼是照着《茶经》的章数起的，九层，一层管一章。他想起班上孩子们剪过数不清的窗花、桥、船，没有一个人剪过楼。那年头，谁剪楼呢，楼还没有影儿。老街人讲，往后旅游的人多了，老街的墙也要刷。他听了，没有接话。

他家的墙刷过一回石灰，白得晃眼。他让留了一面不刷。留出来的那面挂样册，日头照不进来。

回来的路上买了两个糖三角，一个就着茶吃了，一个搁在案头。案头的东西他向来不动，搁到第二天，糖三角硬得像块瓦。他把瓦扔了，甜味还在屋里绕了两天。

…… 年前他去澡堂泡了一回澡，回来路上买了三炷香。给谁的，他没有讲。点香那晚他想了一路：一炷给走了的人，一炷给没走的，一炷给谁，他自己也讲不清。香插在装小米的碗里，香灰落了两回。香烧到底，小米上留下三个洞，他用米把洞填平，填得很平。这一手，也是当年裱画养出来的。

年前小辈来拜了个早年，给他磕头，他给了红包。小辈问，爷爷，样册里是什么。他讲，是学生的作业。小辈讲，谁的作业留三十年？他讲，好学生的。

除夕那天，老街的爆竹屑红了一层。谁家的小孩拿竹竿挑着一挂小鞭，从街头跑到街尾。齐守拙扫完门前的碎红，煮了半锅炖萝卜，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唱着戏。隔壁喊他吃年饭，他讲吃过了。

黄昏关铺板，最底下那条缝里，塞着一张纸。

他蹲下去，捏出来，就着门灯展开。

老街的屋檐。檐下一张方桌。三个小人围炉，当中空着一个位置，凳子摆得端端正正，像在等人。炉子上坐着一把壶，壶嘴里剪出三缕气，一缕一缕，都朝那个空位飘。

齐守拙把纸凑到鼻子跟前。纸上有一股极淡的烟味，像刚从灯火旁边收下来。

他把纸对着灯看了半宿。老花镜换了又换，后来索性摘了，换放大镜看剪口的走向。三缕气，一缕不少；空位上的凳子，四条腿一条不歪。屋檐的瓦当，一片压一片，压法都对。这不是手稳，这是心里装着一座房子的人才剪得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这张纸，和案头压了大半年的报纸，一并收进样册的暗层。样册外头那层蓝布，褪得快看不出蓝了。

“伢们，先生的老花镜越来越花了，你们的手，越来越稳了。”

第四章　杀青

啜苦咽甘，茶也。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武昌，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剧场下午两点开场。何采采坐早班车过江，下车的时候天上落了几点雨，砸在柏油路上，一个印子一个印子，很快又干了。剧场门口挂着红色横幅，全省中学生茶艺大赛，底下站着一排带队老师，人手一面小旗，旗子让风吹得啪啪响。

安检，签到，领记者证。证件是新的，塑料膜都没有撕。她把证件别在胸前，进了场。

场内冷气很足。台上在走灯光，一排茶席从侧幕一直摆到台心：白桌布，矮竹几，素色茶巾，每张席前立一枚手写的席签，墨笔小楷。音响里在试一支古琴曲，试到一半停了，又从头来，调音的人蹲在台口啃包子。

她三十一岁，先前在广告公司写了八年文案，转行考进《楚天都市报》做见习记者，刚满半年。同批进来的实习生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喊她何姐。带她的老师临时被抽去医院口，把这场全省中学生茶艺大赛派给她，交代很省事：三百字简讯，配一张图，四点前发回编辑部。说这话的时候，老师已经在收拾包了，又说，这种稿子，图比字要紧，你挑张笑得好的。

参赛的队伍有二十三支。鄂州的姑娘穿了改良的裙裾，宜昌的抬上来一套仿青铜的茶具，十个人伺候一桌茶，音箱里的古琴弹得像下雨；黄冈队给茶艺配了诗朗诵，四个男生站在台侧，一人一句。签到处领队们交换名片，说场地，说空调，说评委席上有一位是从杭州请来的老茶人。评委席上摆着铜制的名牌，老茶人的名字排在正中。何采采领了一本节目册，在工作席上摊开，一页页翻过去。

天门队只来了一个人。领队是市文化馆的干事，把女孩送进侧幕就要走，说还得赶下午回天门的客车。女孩自己拎一只旧藤箱，箱子角上包着铜片，磨得发亮。报名表上写着：唐穗，十六岁。特长一栏填了两个字：茶艺。家长联系人和备注两栏，都是空的。

何采采在本子上记：十七号，天门，席名，嘉木。采访本的扉页上有她转行那天写下的一行字：先到场，后到稿。

观众席坐了六成。前几排是评委席和领导席，中间是各队候补，后头零零散散坐着些家长和举着手机的学生。媒体席一共两家，另一家是电视台的，机位架在正中，红灯一直亮着。何采采数了数，观众席上年纪最大的是后排三个老太太，自备了保温杯，杯子摆在栏杆上，一字排开。入口处立一块提示牌：请勿使用闪光灯。落款旁边画着一个相机，相机上斜着一道杠。穿红马甲的义工学生领着各队入场，一队一队报号，声音传到后台，就变成了嗡嗡的一片。

上午的场次她记了半本子。有人紧张，温杯的水泼在了桌布上，主持人打圆场；有人配乐放错了，放成了上一队的曲子，评委皱了皱眉，又松开。轮到天门队的时候，前头一支队伍正在撤场，茶渣洒在台板上，工作人员拿拖把拖了两遍。

主持人念到这个号码，她抬起头。

女孩一身月白，头发全部绾起，露出一段很白的后颈。她上架、温杯、弃水，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一点怯场，好像台上不是二十三盏灯，而是她家里的一张桌子。解说词印在节目册上，五道茶，各对一句诗：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

第一道水，她用的是一把小银壶。壶身很小，一次只够两个盏，她便一盏一盏地斟，不慌。第二道换成素白瓷盏，不施花纹。第三道用公道杯分茶，七分满，盏盏一样，分到最后自己那杯是浅的。第四道奉茶，两位评委先品。到第五道，她从席下取出一只粗陶小瓶，瓶口封着蜡，瓶身贴一张手写标签：竟陵西湖，四月。

满场安静下来，连翻节目册的人都停了手。她启蜡，注水。水线很细，落进盏里没有声音。古琴不知几时停了，没有人去开。空调的风把席签吹得偏了偏，她的手在签子上按了一下，签子就站直了。

收势的时候她直起身，两手交叠在身前，朝台下弯了弯腰。灯从上面打下来，她的影子缩在脚边，小小的一团。评委席上有人往本子上记着什么，笔尖沙沙的，隔着半个场子都能听见，记完，那人把本子合上了。后排三个老太太里，有一个悄悄跟旁边的说，这孩子吐纳是长的。另一个说，水也好。

掌声起来的时候，何采采正举着相机。掌声很齐，齐得像一个人鼓出来的。她拍了两张颁奖的备图，不知道为什么，把镜头往台侧摇了一下。第一次摇过去，取景框里是功放的黑背面；第二次，是几捆盘着的电线。第三次，取景框停在了台侧墙上。

台侧墙上有一扇小窗，配电间的气窗，铁框，离地一人多高，玻璃蒙着灰。窗里一台配电柜，柜面上一颗绿灯，一明，一暗，是那扇窗里唯一的光。窗后站着一个戴帽子的少年，帽檐压得很低，看得见一段下颌，白得像从没晒过太阳。他左手垂在身侧，捏着一把一字头的螺丝刀，刀尖朝下，从始至终没有动过。台上的灯全亮着，照不进那扇窗；他站在那一小块黑里，身体让窗框裁得只剩半个人，看着台上。

没有鼓掌。

周围没有第二个人朝那边看。连负责机位的是电视台的，机位也只追着冠军。何采采按了一下快门。就一下。她低头看了一眼机背上的小屏幕，屏幕上人堆是黑的，窗框歪着，她以为拍虚了，没有再拍第二张。直到深夜在电脑上，那张照片放大出来，她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

颁奖的时候，女孩站在台中央，捧一尊小小的陆羽瓷像，证书卷成一卷，系着红绸。前六名合了影，文联来的人授奖，横幅在头顶上绷得笔直。摄影师喊看镜头，喊了三遍，只有冠军一次到位。二等奖是个宜昌姑娘，捧着证书哭了，抹眼泪之前先朝观众席鞠了一躬。杭州来的老茶人做点评，说这孩子的茶

做得干净，杀青杀得尤其好——锅温一到位，叶子就定了形，定成什么形，一辈子是什么形，回不去了。台下笑，鼓掌。主持人把话筒递给冠军，问她有什么想说的。女孩对着话筒想了一想。

“水好。”

台下又笑，掌声比刚才更齐。镁光灯亮了一片。何采采拍下她捧杯的角度，忽然觉得这一片灯白得不真实，像把人钉在了纸上。

赛后采访挤了一小圈人。有人问学了几年，有人问师承哪里，有人问银壶是哪里买的。女孩收拾茶具的手没有停，答了四个字：家里教的。银壶她没有答，只用软布把壶身擦了一遍，擦完朝台口望了一眼。何采采排在最后，只来得及问一句那瓶水的事。女孩把粗陶瓶举起来给她看了看，说，水是四月从家门口的湖里打的，封了蜡，一直带着。何采采提出给她和那瓶水拍张合影，女孩把瓶子往席下收了收，摇了摇头。

散场的时候，她在剧场外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天放晴了，广场上的水洼一块一块亮着，风从长江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湿气。她把提纲写在节目册背面：第一名，天门，十七岁？十六岁。第五道水，自带。颁奖，掌声很齐。写到最后一条，她停了停，又添了一行：台侧，配电间，一个不鼓掌的人。

三百字的简讯，她决定写成特稿。这是她转行以来头一回自作主张。

散场后何采采绕到台侧。配电间的门锁着，门上贴一张临时用工登记表，姓名一栏签得潦草，认不出是哪三个字，用工时间一栏填着：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管场务的师傅说，电工是劳务市场临时叫来的，线路一验收就结账走人，这种日子一天能过三拨，走马灯一样。

“长什么样？”何采采问。

“没留意。”师傅锁上门，“白净，个子不高，话没有。手脚倒是老练。”

她在登记表前站了一会儿，想照着把那个潦草的签名描下来，描了两笔，描不出来，笔画是直的，又不全是直的。

她又在秩序册的工作人员名单里找了一遍。名单上只有组委会和评委的名字，没有电工。她走出剧场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台上的茶席已经拆了，白桌布一张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码在道具车上。她照着秩序册上的电话打去组委会，对方说要开介绍信，走公函。她把号码记在本子上，后来没有打第二次。

见报之后，报社接了两个找她的电话。第一个问，报上那个茶，哪里有卖。接线的人哭笑不得。第二个是个女学生，说是小茶仙的初中同学，找了很多年了，想联系她。电话转到何采采这里。她问了对方名字，记下来，说，联系方式不方便提供，有话我可以转。对方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什么话，就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挂了电话，何采采把那张字条夹进了抽屉里的名片盒。她后来偶尔翻到，都没有打。过了几天，有同行辗转来打听这女孩的联系方式，想约专访。何采采说，人家刚上高二，别去打扰。

当天夜里她在报社写稿。办公室只剩夜班和几个实习的，灯管白得发青。特稿比简讯长，写到一千二百字：写了那把小银壶，写了公道杯里七分满的水，写了那只封蜡的粗陶瓶；写了杭州老茶人那句关于杀青的话——叶子定了形，就回不去了。她把白天拍的照片倒进电脑挑图。颁奖那张很好：女孩捧着瓷像，笑容标准，背景虚成一片暖色。她往下翻，翻到配电间那扇窗。

照片里，前景是三个观众的后脑勺，虚成一片灰，把台上挡了个严实；窗框是斜的。窗后那个少年倒是清楚：帽檐，下颌，垂着的左手，那把一动不动的螺丝刀。配电柜的绿灯在他身后，一明，一暗。整张照片里只有他一个人是安静的，连灯都是喧哗的。

值班编辑老晏从她身后过，停了一下。

“这张不行。”老晏说，“主体没有冠军。画面里没有新闻。”

何采采想争一句，说这个少年有点意思。老晏已经走远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人是虚的，墙是实的，要登墙，印刷厂比我们专业。

稿子删回八百字。标题也是老晏改的：《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删稿的时候，她在采访本上另起了一页，把没写进稿子的东西一条条记下来：一瓶封了蜡的湖水；一句“水好”；台侧配电间里一个不鼓掌的人。记完，她把这一页折了一个角。

截稿前还缺一段人物收尾，她照着报名表上的号码拨了电话。

响了很久才接。她先问了句方不方便，那头应了一声。声音很静，静得能听见对方的呼吸，还有一点水声，很远，像有人在涮一只杯子。

“席签上的嘉木两个字，”何采采问，“将来要是做成品牌，是什么意思？”

她本来问的是茶席的名字。那头安静了一秒。

“南方之嘉木。家人取的。”

八个字，念得很平，像念课本。何采采追问，哪个家人。那头没有再出声，也没有挂断。何采采先挂了。挂了以后她把手机在手里握了一会儿，听筒里的忙音一格一格的，像很远的地方有一线蝉声。她把这一段敲进稿子，又删了。版面不够，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删。

五月十六日，特稿见报，配图用的是颁奖那张。老晏把报纸样给了她一份，说，头一回，留个念想。何采采在楼下的报摊买了五份，油墨味很冲，报摊老板说，这版卖得快，上午就来问过两回。那期报纸在报社里传了一圈，几个实习生围着颁奖那张照片看，说这姑娘笑得真甜。回报社，她把当天的照片全部拷进移动硬盘，新建文件夹：二〇一一·茶艺大赛。轮到那张废片，她单独存了一个文件。

文件名一栏，光标在闪，她想了想，敲了两个字。

台下。

那张见报的报纸，她折了两折，垫在了移动硬盘盒的底下。

◆

二〇一一年九月，汉口。舅舅家在硚口一片老宿舍的三楼，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厨房，一到饭点就飘辣椒呛锅的味。楼道里的声控灯要跺一脚才亮。聂小雨的行李箱底下压着一罐茶，天门带来的，临走前一天同桌塞给她的，说是家里自己炒的，败火。

她没有喝。接站那天下着小雨，舅舅蹬着三轮来接，行李箱绑在车斗里，一路上皮革套着雨点响。到家舅妈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蛋，说，压压惊。没有什么可压的，她还是把面吃完了。到武汉的第二个星期，她把罐子埋进阳台那盆半死的绿萝底下，埋得很深，上面压了两块碎瓦片。瓦片是阳台上现成的，边角让雨水啃圆了。

那年秋天，绿萝活了，爬了半面栏杆。

舅舅在运输公司开车，话少；舅妈在超市理货，话多。转学手续是舅舅托人办的，跑了两趟教育局，材料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封口盖着章。新学校的班主任把她领进教室，介绍说是天门来的借读生，底下没有人回头看她，只有前排一个男生扭了一下脖子，又扭回去了。进班前有一场摸底考试，她考了班里十九名，班主任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她坐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窗外是锅炉房的烟囱。

新同桌是个话多的女生，第三周就学会了不再问她周末做什么，改问数学题。那个女生借过她一次笔记，还回来的时候细心地包了层书皮。聂小雨盯着那层书皮看了很久。第一次月考，她排在年级一百一十名；期末，三十七名；高二结束，第十一名。她做卷子用铅笔，对完答案，错处用红笔描出来，看懂了，再把铅笔痕擦掉。卷子干干净净，像从来没有错过。成绩单来的那天，舅妈多做一道菜，舅舅多喝二两。有天舅舅喝了酒说，你舅妈嘴碎，心不碎。她说，嗯。饭桌上常有一道排骨藕汤，洪湖的藕，粉的，小雨每回喝两碗。舅妈说，武汉人喝汤，喝的不是汤，是讲究。

舅妈说到一半的话，常常自己停住，因为没有人接。小雨知道该接，她也在学着接，只是话到嘴边，总要先过一道秤。她在新学校不参加任何自发的聚

会，笔记不外借，也不问别人借。她喜欢一切有编号、有归处的东西——错题本按日期排，卷子按学科装订，角对角，连橡皮都用小刀切成两块，一块用，一块备用。

她不再坐末班车。晚自习下了，宁可绕两条街，走到大路上去坐头几班车。夜里窗帘拉得一丝缝也不留。舅妈给她买了一盏新台灯，她夜里看书，总把灯罩转得朝里，光只照桌面一小块。有回楼里停电，舅妈点了半截蜡烛，她坐在黑里没有动，两只手把校服下摆攥出两道褶。还有一回半夜，舅妈起来上厕所，看她房里灯还亮着，煮了半碗汤端过去，门是反锁的。舅妈把碗放在门口，第二天碗空了，摆回原处。

那几张照片，她后来再没有见过。没有人再来。她试着把这件事当成掉了一颗牙：缺口还在，但不疼了。多数时候不疼。舌头总会去舔那个缺口，舔到了，就知道还在，也就放下了。

上课她记笔记记得极全，像抄经。老师渐渐喜欢叫她起来回答问题，因为她从来不抢，也从来不躲。

· · ·

二〇一二年六月，高考。她没有让舅舅送，自己坐公交去的考场。考点门口全是家长，伞挨着伞，她从人缝里钻进去，没有回头。考完最后一场走出校门，太阳很大，她在人堆里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九月，她进了武汉大学，读档案学。选专业那天舅妈问她档案学是学什么的，她说，把旧的东西编上号，放到该放的地方去。舅妈说，那好，你自己的东西也归归置。通知书到的那天，舅舅多喝了两杯，反反复复说，好，武大，武大好。

报到一个星期后，天门老乡的新生群在线下聚会，就在武大牌楼旁边的小炒店，挤了两桌。一桌子湖北菜，辣得冲，藕夹和糍粑都点了双份。有人张罗着建了个QQ群，群名片一个个都改成了真名。蔡诚也在，电气学院的，天门一中的，嗓门大，挨个倒茶，倒到她那杯时问了一句：天门哪儿的。她说，竟

陵。他说，巧了，我家城东的。他又说，茶圣故里的，陆羽故园就在西湖边上，我小时候在那儿逮过蛐蛐，草窠子深得很。

满桌笑起来，纷纷认起门牌来，东门的，西关的，岳口的。有个喝得脸红的举起杯子喊，天门人在武汉，都是老乡。杯子碰了一轮。轮到聂小雨，她抿了一口，把杯子放回原处，杯底跟桌面的水圈对齐。没有人留意。

散席时下起了雨。蔡诚撑一把黑伞，顺路送她到公交站。

“你是聂小雨吧。”走到半路他忽然说，“高一下学期转走的那个。”

“嗯。”

“我跟唐穗同班。”蔡诚说，“你们从前坐同桌吧。”

雨点砸在伞面上，噼噼啪啪。她嗯了一声。

“她现在在华农，学茶。”蔡诚的语气轻快，“我们说好一起来武汉的。就是有一样——高中的事，她一句不提，连照片都少。报纸上登过她一回，我把那张报纸收着呢。高三毕业那回，她请全班喝茶，一人一小包，说是家里自己炒的。我泡了，没泡出味来。”他顿了顿，“你们天门真出茶啊。”

“出。”她说。

过了一会儿，他把话头绕了回来：“你们那两年，出过什么事吗？”

有句话在聂小雨喉咙里翻了个身，顶到牙后面：你莫沾她。

她说出来的是：“她很好。她一直都很好。”

蔡诚笑了一声，说是，她什么都好，好得让人没话讲。又说，改天几个天门老乡一起去华农找她，让她泡茶喝，你去不去。

“看时间吧。”她说，“群里人多热闹的话，我就去。”

公交进站，她上了车，没有回头。车过东湖的时候，她想，他迟早也会知道的。也可能不会。她把额头贴在玻璃上，玻璃是凉的，湖面上一片雨脚，白花花的，看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当天晚上，蔡诚通过群名片加了她的QQ。验证消息只有四个字：老乡，你好。她通过了，回了一个字：你好。从此两个人的对话框就停在那里，谁也没有再发过第二句。

十一月，她退了那个QQ群。退群没有提示音，像一粒米掉回米缸。群主私下问过她一句为什么，她回了两个字：手误。同一个星期，她在学校图书馆找了份勤工俭学的活，整理一批发黄的旧学籍档案，一张一张登记，编号，装盒。带教老师说她手稳，适合干这个。她也觉得适合。纸有纸的规矩：哪年入学，哪年离校，中间断了哪一年，纸都记得，纸不说话。那批档案里有一册是断档的，中间整十年，一格一格全空着。她把那一张登记卡单独放进一个空盒，贴了标签：待查。带教老师路过看了一眼，说，有些格子空着，一辈子就空着。她说，我知道。那个贴着待查的空盒，后来一直放在柜子顶层，没有人来查过。

· · ·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武汉落了那年第一场雪粒子。她住四人间，她的床铺靠门，室友们睡得晚，她睡得晚起得早，洗漱的声音都放在最轻。明信片是宿管阿姨从信报箱里拿上来的，夹在一沓考研资料中间。正面是印刷的风景：一座湖，湖上一座石桥，桥那头一段白墙。右下角一行小字：竟陵·西湖。

纸很厚，是好纸，边角裁得笔直，捏在手里有点坠手。楼上背单词的声音还在漏，一个词，又同一个词。

背面是空的。没有称呼，没有字，没有落款。邮票贴得端端正正，长城的图案，八十分的。邮戳糊成一团蓝黑，她对着台灯认了半天，只认出两个字：武汉。日子那一半，磨平了。

她在楼道里站了很久。楼上有室友在背单词，一个词重复很多遍，从门缝里漏出来。她去问阿姨，信是几时投的。阿姨想了半天，说，就这几天吧，信报箱这几天就你有信。她把明信片凑到窗光底下，正面那座湖的颜色很正，绿

得发蓝，不像景区门口卖的那些，颜色都是虚的。她想的第一件事是把它寄回去。寄回去，收件人写谁呢。

竟陵西湖的明信片，景区门口的小卖部才有卖。她想。天门那么远，武汉这么近。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又翻过去，想找指纹，想找折痕，想找一点笔压。纸上什么都没有，干净得像刚从印刷机上下来的。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晚上等室友睡了，她摸黑拿了桌上的打火机，去水房，把明信片伸进洗手池。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

纸卷起来的时候，火苗是蓝的。烧完她把打火机放回室友桌上，挪了挪，挪到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位置。

灰很轻。她用指尖碾了碾，拧开水龙头，看那小片黑打着旋，沉下去，没有了。

第二天她照常去图书馆上班。一箱一九五零年代的旧学籍册等着她编号，她编了一下午，手很稳，一个号都没有写错。编到一半她停下来，去水房把手洗了一遍，洗得很久。带教老师问她怎么了，她说，洗掉一点灰。水凉，她的指尖红了一小圈，很久才褪。

那夜她睡得很沉，一夜无梦。半年来头一回。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她没有再收到过任何东西。后来她想，这句话不像句空话，倒像一个承诺。

第二年开春，舅舅家阳台上那盆绿萝发疯了似的，藤子垂到了楼下三楼的雨棚上。舅妈把它分了两盆，送了一盆给对门的邻居。邻居说，这东西好养，给点水就活。舅妈说，是呢，给点水就活。舅妈又说，暑假带你回天门住些天，看看你姨。聂小雨说，看时间吧。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分盆剩下的那株浇水，水壶举得很稳。

◆

二〇一二年的深圳，雨季来得早。四月里华强北就泡在水汽中，赛格广场的玻璃幕墙上一层灰蒙蒙的光，清早拉闸门的声音此起彼伏，拖货的板车在人流里横冲直撞，保安挨着铺位收卫生费，票据撕得哗哗响。尹彦的三个档口，两个在赛格，一个在上步路；拷贝线藏在岗厦的城中村里，两套机器一天能出一千多张；那间屋子挂着厚窗帘，白天也开着灯，门口的鞋架上永远只有三双鞋；仓库租在笋岗，铁皮顶，夏天像蒸笼。晚上十点以后，华强北不清场，拉闸门的声音分两种：一种响了就回家，一种响完了，里头还有灯，人在后头数钱。那年街上流行一句话：一米的柜台，养一家人。

生意最盛的时候，一天走三千张碟。新片一上映，字幕组连夜出活，第二天中午碟就摆上柜台；连续剧按季打包，演唱会碟配海报，热缩膜机一响就是一天。尹彦有辆二手摩托，后座常年捆着两只空旅行袋，随装随走。进货走暗语，问价不问名，交货不过夜，仓库一个月挪三次位置，搬家都在后半夜。尹彦管人，管钱，管黑白两道的消息；货源是阿木的。

阿木是前年秋天来的。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尹彦没有问过。规矩第一条就是不问来处，这条规矩与其说是他立的，不如说是阿木来的那天就长在那里了。

阿木管货源，管得像老茶客报山头。哪部剧会火，哪个盘压得住，哪张碟成本几块几，他张口就来，一个数都不会错。尹彦试过一回，故意拿错单子考他，他头也不抬，报的还是对的那张。他话少，白，常年戴一顶帽子，档口里光线最暗的位置是他的座位。人多的时候他不出声，只在本子上写，写完撕下来递给你，条条清楚。他从不在档口喝水，渴了就去后头漱一口。贴墙根走路，下雨天不打伞，一步不让雨追上。他从不说自己住哪儿，收工以后人就没影了，第二天一早又坐在原处，像从来没走过。

三月里柜台缺个收银，同乡介绍来一个湖南妹子，姓周，叫周小奈，二十四岁，嘴甜，眼毒。家里一个弟弟在读高中，她按月寄钱回去，汇款单上的字写得歪，数目从不出错。她托人给弟弟带回去一台学习机，弟弟回信说她变了，学会乱花钱了。她把信念给尹彦听，一边念一边笑。念完她把信夹在收银

台的玻璃板底下，有人问就说是弟弟。头一天上班她就认出了便衣——那人装顾客翻碟，裤子是地摊货，皮鞋是公家发的。她找零的速度比点钞机还稳，有一回一沓钱里混了一张假的，她手指一捻就抽了出来。她碰碰尹彦的胳膊肘，朝外努努嘴。尹彦把新到的货收进了里间，顺手把招牌上最扎眼的那张手写海报取了下来。那天那人在档口前站了半个钟头，最后买了张五块钱的碟。小奈找的零钱，一张一张数了两遍，手稳得很。

夏天，他跟小奈处上了对象。小奈煲汤给他喝，教他两句湖南话，他学不像，她笑他舌头硬。小奈管赛格的租户都叫哥，唯独管阿木叫白毛哥——阿木头顶有一小撮头发是白的，其余乌黑，街坊都说是染的，只有尹彦知道没有染。白毛哥这个名字叫开了以后，连隔壁档口的小妹都跟着叫，阿木不应也不恼，像说的不是他。

档口的日子有它自己的等级。一楼铺面亮堂，卖的多是杂牌，看人下菜；十楼的写字间才是体面，玻璃门，饮水机，谈的都是大单。他们的档口在中间，不上不下，正好。中午各档口的小妹蹲在过道里吃盒饭，六块钱一盒，谁家加了个鸡腿，全层都知道。小奈端着盒饭过去，跟人换了一块排骨回来，放在尹彦手边。

她给阿木带过一回湖南的剁椒，玻璃瓶装，红得凶。阿木说了声谢谢。第二天，瓶子洗干净了，还回来的，摆在柜台角上，可以当笔筒。小奈拿起来看了看，里面干干净净，还带一点水珠。

前年冬天尹彦发过一场高烧，躺在出租屋里没出摊。第三天回去，桌上放着一盒退烧药，一杯温水，杯子底下压着半张纸条，纸条上没有字，只是把他缺席这几天的排班，重新排了一遍。尹彦说，那是他和阿木之间最长的一次对话。

阿木的账，尹彦见不着。谁也没有见过阿木的账本。有人说他全记在脑子里，有人说记在纸上又烧了。尹彦两样都不信，他猜，阿木的账记在他自己的规矩里。尹彦自己有个塑料皮的笔记本，记的不是钱，是规矩：不见光；不拍

照；不问来处。三条规矩写了两年，一个字没改过。本子锁在出租屋的抽屉里，钥匙他拿绳拴着挂在脖子上，洗澡都不摘。

十一月，他添了第四条。

每逢十一月十八日，全天停盘。

这一条下面，他用笔划了一道横线。别的条目下面，都没有线。

其实从二〇一〇年起，年年那一天都是这么过的。前一天晚上，阿木把三条拷贝线的电源逐一拔掉，电线一圈圈缠好，仓库落锁，钥匙分两把，一人一把。小奈想帮忙缠线，阿木拦了一下，让她去歇着。当天全天，档口拉闸，人各自散。一天下来少走的货，够交一个季度的铺租。尹彦心疼过一回，第二年就不心疼了。有一年新来的小工非要问个明白，第二天就被人辞了。辞人的话是尹彦去的，他心口一紧，又松了。小奈问过一回，明天怎么不开门。

“老规矩。”尹彦说，“盘休。”

“什么盘？”

“我们的盘。”

那天阿木一天没有露面。尹彦一个人坐车去了蛇口，在海边坐了一天，看船进船出，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想成。傍晚回来的时候落着雨，档口的闸还没有拉，阿木已经坐在原处了，帽檐上滴水，身上有一股纸和浆糊的味道。他在一张纸上写字，写得很慢。尹彦瞟了一眼，不是账，不是剧名，是一些细细的线条。阿木察觉了，把纸翻过去，压在茶杯底下。那天下午，尹彦在蛇口的堤上，其实远远看见过一个戴帽子的白净背影，沿着海边往西走，走得不快，也不停。他没有喊。回来以后，他也没有提。

九月里有过一回虚惊。傍晚闭市前，消息从三楼传下来：上来人了。各档口不动声色地拉闸。尹彦两条拷贝线的货装进两只旅行袋，从后巷提到一辆面包车上，前后不到二十分钟。小奈第一次跟着转移，坐在面包车里抱着一袋货，手心的汗把袋子焐潮了一角。车在城中村外绕了两圈才停。事后清点，货

一张不少。面包车是临时租的，司机从头到尾不知道自己拉的是什么。宵夜的时候小奈吃了三碗肠粉，谁也没提晚上那二十分钟。

风向是那年十一月变的。先是邻档口被带走查了三天账，回来人瘦了一圈，见谁都笑，笑得发木；跟着所里的人来量消防通道，皮尺拉了一上午，本子记了好几页。当天夜里，各档口把过道里的纸箱搬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一早，通道宽得能跑马。那三天，阿木没有出过档口，人都在仓库。第四天他把尹彦约到笋岗，指着靠墙一排空木架说，碟的利润，从下个月起，一半挪到这里。

“挪到这儿干嘛？”尹彦说，“我们又不开茶馆。”

阿木隔了一会儿才开口。

“碟会死，仓不会。”

尹彦没听懂。他后来想，说这话的时候，阿木的眼睛不在仓库里，在更远的什么地方。年底，阿木盘下笋岗隔壁一个正规仓，挂靠在一家货运代理名下，发票、报关单、租赁合同一应俱全，进出都有单据，连装卸工都签了字。法人不是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营业执照配了镜框，挂在仓库进门最显眼的墙上。小奈念了念法人的名字，问是谁。尹彦说，搭干的，花钱挂个名。挂招牌那天，阿木让工人把字挂正，自己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帽子底下看不清脸，站了有一支烟的工夫，转身走了。仓库过手的货什么都有：瓷器，电器，也有成件的茶叶。瓷器稻草捆着，茶叶棉纸包着，电器拿泡沫格子卡着，一样有一套护法。有一回过手一台旧缝纫机，尹彦多看了一眼，阿木说，抵账的。瓷器用稻草捆着，稻草味在仓库里经久不散，闻久了，人像站在一块田里。尹彦问过一次茶叶是哪个的生意。

阿木把布帘拉上了。

有一天后半夜，尹彦回仓库取落下的手机，门缝里有灯。他推开一条缝，看见阿木坐在灯下裁纸，裁得很慢，很匀，地上落了一层纸屑，白的。他把门轻轻带上，取了手机就走。第二天谁也没有提。

那年还有一桩小事。档口周年，小奈举着手机说，拍张合照，贴在柜台后头，喜庆。镜头刚举起来，阿木侧身进了里间，帽檐朝下压了压。小奈举着手机愣了半天，说，白毛哥上镜肯定好看。尹彦说，他不照的。

腊月的一个夜里，收了摊，三人在大排档吃砂锅粥。赛格的灯还亮着，一格一格，像一堵不会熄的墙。小奈剥着花生米，忽然问：“白毛哥到底图什么？赚了钱也不花，衬衫领子都洗破了，袜子后头全是洞。”

尹彦喝了口啤酒，想了想。

“图个安静。”

小奈撇撇嘴，说，安静值几个钱。又说，那你图什么。尹彦说，我图热闹。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像头一回想这句话。尹彦没有接话，又点了一碟花生米。那碟花生米摆到散桌，谁也没有动。粥面上浮着一层热气，把人的脸都糊住了。远处有火车拉货过去，一声长的，又一声长的，过完，夜还是那个夜。那晚阿木先走了，还是贴着墙根，背影走进赛格的灯底下，让一格一格的光吞了进去。

◆

二〇一二年入了秋，深圳还是热的。周小奈在柜台后面数零钱，数着数着抬头看一眼里间的门——不是为了防贼，是为了看人。

白毛哥这个人，她越看越觉得有意思。

排班表是阿木排的，精确到一刻钟：谁几点接柜，几点盘货，几点去银行，误差不许过五分钟。表格是他手画的，横平竖直，一格是一格，贴在柜台内侧的玻璃板底下。换新表的日子，旧表由阿木本人收回，一张不少。有一回她迟到了六分钟，阿木没有说话，只是把下周的排班表重新写了一份，她的名字往后挪了一格。她再没有迟到过。全档口的人也再没有迟到过。排班表上有一个名字是铅笔写的，写了擦，擦了写，玻璃板压出的印子都是重影。档口的规矩是阿木定的：迟到不罚钱，罚扫地。扫地的活不难，难的是当着全档口的

人扫。被罚过一回的人，都不想有第二回。小奈替一个迟到的小妹求过一回情，阿木把排班表往玻璃板下一压，没改。第二天早上，扫地的是阿木自己，从头扫到尾，扫完把扫帚放回原处。小妹后来哭了一场。

吃饭的时候，阿木永远坐在背光的位置，吃得很快，吃完把碗一推就走。他吃饭不挑，给什么吃什么，像是在给身体交差。跟人从不握手，递东西只用两个指头。点钞机坏的那天，她见过他手工点钱，一万八千块，左手，指头翻飞，比机器慢不了多少。她注意到他左手指腹上有两道茧，位置很怪，不在指节上，在指肚侧面，斜着的两道，像常年捏着个什么小东西磨出来的。

“白毛哥，你这手，”她凑过去，“是弹琴弹的？”

阿木没答，把钱装进袋子，起身下了仓库。

仓库里过手一批抵账的茶叶。他拆了两饼摆在柜台上，让她闻。一饼陈得沉稳，纸面发乌，有细细的帘纹，边角让虫蛀了两个小眼；一饼香得发飘，纸白得扎眼，折痕笔挺，像昨天才出厂。他不用手撕，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剪刀，裁开第二饼的棉纸，剪口笔直。剪刀底下垫着一块红绸子。小奈盯着那把剪刀看了两眼，又想起那两道茧。

小奈问过一回，他这手茶是跟谁学的。他没有答，把第二饼茶包了回去，包的手法又快又稳，四个角对得整整齐齐，像叠一床看不见的被子。她又问过一回，怕不怕有人来查。他没答话，只指了指柜台上的茶饼。

他敲了敲第二饼的包装纸。

“这饼是假的，纸太新。”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她，声音也不高，像在念一行库存。又说，做旧的人有两怕：纸怕太新，火怕太急。小奈似懂非懂，把这两句话记在心里，跟存折放在一个等级上。

后来一个夜里盘库，他在灯下摊开一饼茶，教她看。棉纸对着灯，能看见一道一道细密的帘纹，那是竹帘抄纸留下的，老纸有，新纸也有，但老纸的纹是糊的，像隔了年头的窗。他又让她捏饼身，松的紧的，声音不一样。再闻，

干茶有仓味，仓味是存出来的，装不出来。小奈掏出小本子记。他看了她一眼，说，记了就要忘掉。她愣了愣，把本子合上了。那天夜里她躺在床上把三条要领背了几遍，第二天就真的忘了，只剩下一点直觉——后来柜上来了新货，她扫一眼纸就知道老嫩，自己也说不清是怎么知道的。只有一句她记了很久：他说仓味分两种，一种退得掉，一种退不掉。是问出来的还是他自己说的，她想不起来了。后来她在夜市见过一个卖旧剪刀的摊子，一排剪刀摆在布上，她一个一个看过去，看它们柄上的包浆，看到摊主问她要哪把，她才走开。

十一月底的一天，盘完账，她扫柜台底下，扫出一张纸。纸夹在地板缝里，让扫帚齿带出来，边角卷着，她蹲下来捋平。

剪纸。素纸，不上色。一个男孩把一盏灯高高举过头顶，灯照亮一个女孩的背影，女孩的头发是一根一根刻出来的，细得像真的。刀口顺着一个方向，全是斜的，跟左手握刀的人一个使法。纸比寻常剪纸小一圈，边角磨圆了，像被人带在身上带了很多天。她第一眼想起的是她外婆——外婆也会剪纸，剪窗花，剪喜字，她十岁那年外婆下葬，棺材头上摆着一对纸鸳鸯，是她舅舅买的，不是剪的。

她当晚在出租屋里用台灯照着看了半宿，想用手机拍下来，手指悬在键盘上，又放下了。不拍照的规矩她比谁都熟。越看不真的东西，越要看。她把剪纸翻过来，对着台灯照——纸背面有另一个图案的印子，很淡，淡得只剩几道弯，像垫着别的纸裁的时候留下的。她认不出那印子是什么的轮廓。看完她把剪纸夹进一本过期的杂志，压在床垫底下，想让睡眠替她保管。那本杂志后来挪到了枕头边上，她睡前抽出来看两眼。

她捏着那张纸，站了很久。

她想，白毛哥心里住着一个人，住了很多年了。

他跟人说话也是排好班的。客人当面问货，他答得滴水不漏，一句是一句，跟排班表一样，几点说哪句，一句不多。有一回一个熟客多问了半句闲

话，问他老家哪里，他正低头裁纸，裁完那一刀才抬眼，说，货周三到。答的和问的，隔着十万八千里。小奈在旁边听懂了：这个人身上，连话都是锁着的。

又酸，又好奇。她把剪纸收进自己的铁皮盒——蓝罐曲奇那种铁盒，是她来深圳那年她妈给的，原装的曲奇早吃完了，里面装着存折、她妈的照片、一副银耳环、一张回岳阳的车票。剪纸压在最底下。

盒子里的东西，她闭着眼睛都数得出来：四样。剪纸进来以后，变成五样，她反倒数不清了——不是记性差了，是不敢常开。开一回，心跳一回。她给盒盖里面贴了一层棉花，剪纸放进去，不响。

她原本想找一天若无其事地还给他：白毛哥，你东西掉了。这句话她在回家的公交上练了四遍，练到嘴都不酸了。有天夜里她躲在柜台底下开铁盒看那张纸，楼板一响，阿木下来盘账。她一把将铁盒塞进最深的抽屉，抓过一沓票据压在上面，人站直了，心口咚咚地撞。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阿木在柜台外站了一会儿，数钱，记账，走了。自始至终没有看她。可她记得，他数钱的手停了一下，就一下。那晚她给阿彦打电话，什么也没说，就说想吃肠粉。两个人下楼去吃，她要了双份，吃到一半就不饿了，剩下的让阿彦吃了。

第二天她把还纸的念头掐了。就当替他收着，她想，收着收着，说不定就懂了。晚上她翻档口留底的旧排班表解闷，翻着翻着发现一件事：每一年的十一月中旬，表上都空着一格。她以为是记漏了，没有多想。

腊月里同乡姐妹聚会，大排档，珠啤一件。姐妹们吹各自的老板，吹得天花乱坠，又问她有没有对象，她说有，姓尹的，收银台后面的。有人笑她没出息，守着个收银台的，图人家什么。又有好事的追问，你们白毛哥到底长什么样，多大年纪，成家没有。小奈说，高，白，戴帽子，不大。成没成家，她答不上来。她忽然发现，这个天天见的人，她其实什么都答不上来。还是她替他

说了一句好话：年底他发台历，一人一本，台历做得精致，他连台历上的日子都要亲自过一遍。有个姐妹笑，说发台历的老板见得多了，发台历还自己看日子的，没见过。小奈没有接话。她喝到第四瓶，把杯子一顿。

“你们那些算什么。我们白毛哥——人家是湖北的，天门——”

话没说完，她自己捂住了嘴。

那两个字是去年冬天阿彦喝多了说的，半句，她记到了今天。规矩她懂：不问来处。她今晚差点自己破了规矩。桌上没人留意，还在笑，笑什么的都有。她把杯子放下，岔开话头问旁边姐妹的发货价，声音比刚才低了半截。回家路上，她把那两个字在心里又抄了几遍，像检查一枚来路不明的钞票，翻过来，对着灯。那晚她把弟弟寄来的成绩单翻出来看了一遍，看得很慢。她把剩下的半瓶啤酒喝完，冰的，一路凉到胃里。桌上的笑声大起来，把她那半句话盖了过去。

那晚回到家，她把铁皮盒往抽屉最里头又推了推，推到手指够不着的地方。夜里她梦见外婆剪窗花，红纸屑落了一地，外婆的手很稳，她怎么也看不清外婆的脸。醒来的时候窗外天还没亮，楼下有环卫车洒水，音乐放了一遍又一遍。

◆

二〇一一年九月，天门一中，高三的教室搬到了顶楼。窗外是操场，再远一点是陆羽大道，车声隔着两层玻璃，是哑的。教室后墙的排名表一月一换，唐穗的名字钉在最上面，像一枚钉子。黑板右上角的倒计时牌，一天撕一页，撕到后来纸边都卷了，蔡诚嫌它晃眼，上去把撕下来的纸叠成了方块。

蔡诚的座位在她后面。这个位置他向班主任请求了两次，班主任以为他要补习，批了。

高三的晚自习到十点半，教室里的灯是白的，谁的头一低，影子就长一截。有人说过，这灯把人照得没有影子才好。没人接话。高三教室里人人桌上

都摞着书墙，书摞得越高，越显得用功。只有唐穗桌上的书摞得最矮，五本，摞得整整齐齐，用完一本收一本。蔡诚有一回数过，五本。他从没见她翻过第五本以外的任何一本教辅。书脊包着牛皮纸，看不见书名。

约定是高二下定的。那晚停电，全校的教室嗡的一声炸开，只有他们那一角是安静的。两个人说话不多，最多的一件事是递水：她的水杯空了，他接过去，下了晚自习去灌满，放回原位，杯柄朝右，一年到头没有错过一次。有一回她感冒，嗓子哑了，第二天桌上多了一小瓶枇杷膏，没有署名。蔡诚说，我要考武大。她点了一下头，笔尖没有停。后来的两年，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张纸，谁也不提，谁都收着。蔡诚私下管这个叫约定。那天晚上来了电，全校的教室欢呼成一片，只有他们那一角安安静静，灯亮起来，照着两张低头的侧脸。

高三一年，蔡诚眼里的唐穗是这样的：月考的名次从不出年级前三，稳得像盖章。她的笔记全班传着借，还回来的时候，本子的边角都替她抚平了，有人还细心地包了层新皮，像归还神龛里的东西。她对人人都好，好得很匀，一人一份，不多不少。班里换座位换了三次，她的位置没有动过，好像那不是座位，是钉上去的。有一回蔡诚数学考砸了，趴在桌上，放学的时候桌肚里多了一本错题集，扉页上一行小字：先抄题，再改错，最后合上本子重做一遍。没有署名。他也没有问。那本错题集他用完还了回去，里面夹了一张字条：谢谢。第二天，字条回到他桌肚里，添了两个字：不谢。字很小，笔画很匀。

月考之后的班会，班主任照例念前十名。念到唐穗的时候，教室里会有一种特别的安静，不是敬畏，是一种心服，像秤砣落了底。蔡诚的名次从年级一百多名爬到三十几，再爬到十几。他知道爬得慢，但方向是珞珈山，慢一点也是爬。每回发成绩单，他先不去看排名表，先回头看她的——她自己从来不看排名表。

只是有一扇门关着。

他问过一次她家里的事，在放学路上。她往前走了两步，说，都在天门。再问，就没有了。蔡诚以为日子还长，长到那扇门总有一天会开一条缝。

蔡母是在云香居听到闲话的。麻将桌上有人说，唐家那丫头，你晓得她亲妈是哪个？西湖里淹死的那个。又说，沈家茶行老板死的那年，她家跟沈家走得勤。蔡母一夜没睡踏实，第二天专门去学校门口等了一回，隔着马路看了唐穗一眼：那丫头跟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都是看着人的，说话也是一句是一句。回来蔡母更睡不踏实了，跟蔡父说，不怕凶的，就怕稳的。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天，蔡母把蔡诚按在饭桌前。

“唐家那丫头，克父克母。”蔡母说，“我们蔡家三代单传，经不起。”

“妈，人家是全市前三。”

“名次能改命？”蔡母把筷子拍在桌上，“我打听过了，那丫头沉得很，笑也是那个笑，不笑也是那个笑。这种孩子，心是石头做的。”

蔡诚没有吭声。他知道反驳没有用，蔡母信的是云香居，不是成绩单。蔡父坐在桌角吃完了两碗饭，临走说了一句，女娃稳重是好事。蔡母瞪他，他又添了半碗。

过了半个月，牌桌上的话风向变了。有人又提起唐家丫头，蔡母把牌一码，说，人家丫头稳重，成绩搁那儿摆着的。打趣的人说，哟，这是要认下这门亲了。蔡母说，认什么认，娃娃们的事，考完再说。话是这么说的，牌打得比哪天都认真。后来她在云香居说漏过一回，说唐家丫头那天上门，穿的是洗白的校服，鞋倒是干干净净。牌桌上安静了一小会儿。蔡父后来跟蔡诚说过一回：人家丫头教你妈泡茶，你妈学了三成，天天在邻居跟前露一手。你小子以后有口福。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完接着切他的肉。

转机在第二年春天。蔡母生日，唐穗上门，拎一只小木匣。饭后她问，阿姨，我给您泡杯茶。蔡母说，家里只有白开水。唐穗说，我带了水。

她烧水，烫盏，注水，手稳得像雨夜里的一根线。秒针在墙上走，她不看表，水线一断就出汤，一滴不洒。第一泡的香霸道，一屋子都是，蔡父在阳台

上闻见了，探头问是什么，进来坐着喝了两杯。第一道茶蔡母没有喝，第二道抿了一口，第三道喝完了，把杯子放下，看了唐穗很久。

“这伢稳当。”蔡母对蔡诚说。停了停，又说，“比你还稳。”

蔡诚在门口差点笑出声。他看见唐穗弯了弯眼睛，把第一杯茶朝蔡母面前推了推，说，您家慢用。然后开始收拾茶具，动作利落，一块茶巾叠得方方正正。她来的那只小木匣一直搁在门边，从头到尾没有打开过第二样东西。

那天以后，蔡母不再提克父克母。有一回蔡诚回家，看见茶几上多了一罐岩茶。蔡母说，人家送的，说是配你爸的血压，喝着玩。隔了几天，邻居来串门，蔡母拿那罐茶待客，泡的时候照着唐穗的手法，水线拉得老高，烫了手，嘴里骂了一句，脸上却是得意的。

高考前最后一次班会，班主任让每个人说一句目标大学，说是图个彩头。轮到唐穗，班主任点她之前先停了停，她也只把桌上那支笔摆正了。班主任便跳了过去，像绕开一颗钉子。那学期班里流行在桌角贴倒计时，贴得花花绿绿，她的桌角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

· · ·

二〇一二年六月，高考。天门一中考点门口全是伞。蔡母塞给蔡诚两个粽子，说是前一夜在灶上煮的，火不能断。唐穗一个人来的，没有家长，校服洗得发白，领口立得整整齐齐。唐穗的考号排在他后面两个位子，隔着一条过道。两天里他们说过的话不超过五句，每场考完在树荫下碰头，说的都是同一句：考完了。数学考完，出考场有人哭，有人把草稿纸抛上天。她面色如常，把准考证夹回笔记本里，夹得平平的。蔡诚在人群里冲她比了个手势，她看见了，点了一下头。两天考下来，天门一中门口的伞从没断过，蔡母第二天换了把更大的，把她自己也罩了进去。伞沿上滚下来的水珠一颗一颗，砸得很匀。英语听力的时候，考点外的马路临时封了一段，全世界安静下来，只剩树上的蝉，不知收敛。

考完那天晚上，班里聚餐，饭馆包了两桌。唐穗没有去。席上有人问起，蔡诚说，她家里有事。说完他自己端起杯子，把一杯凉茶喝干了，像酒一样。没有人再问。

考完最后一场，人潮往外涌。蔡诚在人群里找到她，找到的时候，她已经站在树荫底下了，书包带子在肩上勒出两道痕。他问，怎么样。

“考完了。”

就三个字，别的一个字也没有。

六月下旬放榜，电话里查分，队伍从校门口的小卖部一直排到树下，人人手里捏着准考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往下按。查到分的人有笑的，有蹲下去的。唐穗排在队外，等蔡诚查完，两个人对了对眼神。蔡诚的分够武大，电气。唐穗的分更高，班主任说，够武大，随便挑。她填了华中农业大学，茶学。成绩条打出来，办公室里围了几个同学，有人捂着嘴看她，像看一件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东西。班主任把她的志愿表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劝她冲一冲武大，说什么专业都好。她说，茶学，只有华农有。班主任又问，为什么不填师范。她说，不想教人。旁边的老师接了一句，茶学好，茶圣故里的孩子，学茶，归宿。班主任把这句咂摸了一下，不再劝了，在志愿表上签了字，签完把笔帽按上，按得很轻。

蔡母在旁边听说了，念了两句佛，又补了一句：学茶好，学茶稳当。当天晚上切了一个西瓜，托人给云香居的牌友送了半个。

蔡诚倒觉得好。武大在珞珈山，华农在狮子山，中间隔一面南湖。他说，隔个湖，骑车二十分钟。唐穗没有接话，在志愿表上把每一个字都写得横平竖直，像在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

交表那天在学校机房，窗帘拉着，太阳进不来，一排排人的脸都是青的，风扇嗡嗡地响，键盘上有一层看不见的灰。提交之前，她忽然说了一句话。

“我要把茶做成产业，让天门记住一个名字。”

蔡诚愣了一下，问，哪个名字。

她望着窗外。窗外是操场，太阳很大，旗杆的影子短短的一截，跑到影子里的学生都是黑的。机房里全是鼠标的哒哒声。

她没有回答。交表确认的弹窗跳出来，她点了确定，她的名字进了系统。后来很多年，蔡诚想起这一天，只记得那个太阳，和那句没有答案的话。

◆

二〇一三年春天起，柳文霞就不大吃得下东西，一块肉在嘴里嚼半天，咽不下去。王春发说她瘦了，她说，上了年纪，正常。入了秋，眼白黄了，王春发不由分说拖她去了医院，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到了门口她说，要紧吗？他说，查查，查查不要钱。

化验单夹在病历牌上，箭头一列朝上。医生把诊断说得很轻：肝硬化，要静养，酒不能沾，气不能生。说这些的时候，走廊里推车过去了一趟，轮子在水泥地上响了一路。

她四十五岁，听完只问了一句，能拖几年。医生说，看保养。说这话的时候，医生的眼睛看着化验单，没有看她。她把化验单折成一个小方块，放进外套口袋。口袋底下缀着一块补丁，是她自己补的，针脚很密。出诊室的时候，走廊里有个老太太拦着人问，这病中医能不能治。

王春发在缴费窗口数钱，一张一张数了两遍，又说，有合作医疗。窗口里的姑娘头也不抬，说，先交这些。他把钱推进去，单据折好放进上衣口袋，口袋上还别着那杆杀肉用的粗笔，记账用的。柳文霞坐在走廊长椅上等他，看人来人往：推轮椅的，举片子的，蹲在地上打电话的。她说，回去吧，摊上离不开人。王春发说，今天不卖了，肉让隔壁帮着看一天。

天门市人民医院的内科住院部在旧楼的四层，走廊到下午就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有一盏总闪。走廊尽头的窗台上有人养了一盆蒜苗，绿得很倔。王春发白天在西湖路市场卖肉，收了摊，用碱水把手洗三遍，指甲缝里刷了又刷，拎着保温桶来陪床。他的肉摊在市场东头，摊板永远刮得干干净净，秤给

得旺，街坊都认他。他住院陪床这半个月，摊子托给外甥，隔一天去看一回，不摸肉，只看一眼秤砣松没松。有一回看完往回走，文霞在市场口等他，两个人沿着西湖路慢慢走了一段，谁也没有提病情。折叠床一撑，鼾声起得比吊瓶的滴速还匀。有一夜鼾声停了很久，柳文霞醒来，看见王春发在黑里坐着，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他重新躺下，鼾声又续上了。邻床的家属问，这是你什么人。柳文霞说，当家的。

夜里睡不着，她就数吊瓶，数滴数。一滴，两滴，数到一百，从头再数。滴得比她想象的慢，比她害怕的快。

同病房三床的婆婆夜里说胡话，一声一声喊孙子。后来孙子来了，拎着一兜橘子，坐了一下午，走的时候橘子忘了拿。文霞分了一个给王春发，王春发说，甜的。柳文霞睁着眼睛听，听到后半夜，起来帮人家掖了掖被角。护士来换吊瓶，说，你去睡吧，这里有我们。她说，睡不着，睡惯了——失眠是老毛病了，这些年她夜里从来不睡整觉，药瓶在包里，她没有拿出来。

王春发在病房里学削苹果，一条皮不断，削出来的苹果坑坑洼洼。他削一个递一个，柳文霞咬了一口，说，比你的刀口强。王春发嘿嘿两声，把剩下的半个自己吃了。三床的婆婆看着他俩，说，你们两口子好。柳文霞没接话，把苹果核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放进果盘。

夜里睡不着，她扶着墙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给儿子打电话。有一天她打盹，梦见儿子小时候蹲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个什么，背对着她，看不清。醒来天不亮，走廊的灯还在闪。号码她背得出来，十一位，一个一个按下去。

听筒里说：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她把十一位又按了一遍。还是停机。窗外的路灯照着一段围墙，墙头上有猫走过去，没有声音。

这不是她打的第一个电话。入院第一天一个，第三天一个，第七天一个，回回都是停机。她发过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妈病了。发出去，像一颗石子丢进井里，连个响都没有。她没有再发第二条。

钱倒是一分没有断过。每个月一张汇款单，数目不带零头，汇款人姓名一栏每个月换一个名字，地址也换：深圳，虎门，佛山，再往后她没有记。她只认笔迹：横平竖直，一笔是一笔，像刻出来的。邮局的姑娘说，阿姨，这名字对不上你儿子啊。柳文霞说，是一个人。只有一张汇款单的附言栏不是空的，写了两个字：保重。是儿子的笔迹，横平竖直。她把那张单子单独收着，没跟别的放在一起。有一年冬天，汇款晚了十天，她去邮局问了三回，问得姑娘都认识她了。第十一天，钱到了，数目比往常多了一截，像一句没写出来的赔礼。她没有再问过。

这些钱她一张单子一张单子收好，存根按月份排，用一只旧夹子夹住。夹子是儿子上小学时用过的，铁的，掉了漆。复写的字迹怕潮，她给夹子外面又裹了一层塑料袋。这些钱她一分没有动过。她想，儿子寄回来的，她一分不花，攒着。攒给谁，她没有想。

有一回她把那些地址抄在一张纸上，对着地图一个一个找。深圳，虎门，佛山，越找越偏，都是她没去过的地方。她把地图折好，放回抽屉，从此不找了。她认笔迹就够了，人走到哪里，纸从哪里来。

儿子不写信。剪纸来。

旧的一沓，是他小时候在工人文化宫跟齐先生学剪纸时带回家的，红纸的多，褪成了粉色：一座楼，一条船，一把茶壶。新的一张一张，是他南下以后寄的，一年两三张，从不落空，信封上没有寄信地址，邮戳天南海北，深圳的，虎门的，佛山的。纸上没有字。她也从不问。近两年的纸上多了些新花样，一盏灯出现得最多，灯下大多有一个背影。她把每一张都看了很多遍，看出一点规律：那盏灯，一回比一回举得高。住院部夜里九点熄大灯，留一盏地灯。她裹着外套坐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一张一张地看，手电用她那件旧棉袄罩着，光只落在一小块纸上。有几张纸放脆了，她翻的时候屏着呼吸。护士进来查房，她把手电往被子里一塞，像藏一样赃物。

红布是从一条旧裙子上铰下来的，那裙子她十几年没有穿过，一直压在箱底。十月末的一个夜里，王春发从家里把针线匣拿了来。柳文霞靠在床头，把二十七张剪纸按年份排开，一张衬一层棉纸，用铅笔在棉纸角上标了年份，然后缝进两块红布中间，沿边密密地走线。她让王春发帮忙按住布角。针脚很匀。她做姑娘的时候学过缝纫，那时候给父亲缝褂子，父亲说，你的针脚比机器还直。

缝到最后封口之前，她把红布摊开看了一遍，用铅笔在内侧写了一行小字：都是他的纸。写完把布对着灯照了照，字透到正面一点点影，像隔着很多年看东西。缝最后几张的时候，针尖扎了一下手指，血珠冒出来，她含了含，接着缝。

数到第二十七张，她忽然笑了。

“一年两三张，倒像在给我上坟。”

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砸在红布上，一个点，又一个点。王春发背过身去装睡，鼾声停了，又续上。那一夜她把缝好的红布包抱在怀里睡的，像抱一只猫。它比猫轻。

要不要告诉儿子，两口子在医院的后楼梯上商量过。楼梯间的窗破了一角，风从那里进来，把王春发手里的烟灰吹掉在台阶上。王春发说，要不，告诉孩子？柳文霞摇头。她说，他在外头做事，做成这样，不容易。别让他晓得。

王春发说，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那我明天多买点排骨。楼梯间的墙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又一个的“正”字，不知道在数什么。

下楼的时候他又问了一句，孩子多大了。她说，十九了。他说，十九，能扛。她没有接话，扶着栏杆一级一级往下走，楼梯很长，她走得很匀。转过二楼拐角，楼下不知哪层的急救铃响了，跑动的脚步声从走廊那头涌过来。两个人贴着墙站了站，让过去了。

灯在头顶闪了一下。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有些体贴，要过很多年才看得清里头是什么。他们没有那个工夫看，一个在数日子，一个在数肉摊上的账。

· · ·

出院前一天，柳文霞回了趟家。她让王春发把米缸挪到墙根——那口缸是王春发成家时置办的，缸耳上有一道裂纹，用了二十年，米没有断过。她从箱子底取出一小包红布，那把家用剪刀，她一直没能扔掉，红布裹着，边角磨白了。

她把红布又裹了一层，塞进缸底，压上木板，再把米一瓢一瓢倒回去，压得实实的。米落在木板上的声音很轻，沙沙的，像又一场小雪。

王春发蹲在旁边看，问，这是啥讲究。

“米缸里压剪刀，剪断病气。”

王春发哦了一声，伸手把米抹平，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屋子是白天没住人的凉，灯拉开，灯绳晃了两下才停。她舀最后一瓢米的时候，手在缸沿上顿了一下，缸耳那道裂纹，她用指腹摸了摸，摸了这么多年，早就是平的。

天门没有这个讲究。这讲究是柳文霞自己发明的。她就是要那把剪刀待在米底下——黑着，不见天，像压着一样活物，压它一辈子。

那天夜里她起夜，听见王春发在厨房舀米，舀了几下，停了，又轻轻放了回去。谁也没有问谁。

缝好的红布包，她收进箱子最底层，上面压了两床旧棉絮。

临走她回头看了一眼。米缸蹲在墙角，缸沿上一圈浅浅的米尘，像落了霜。

出院那天收拾东西，王春发发现保温桶落在病房了，转身要回去取。她拉住他，说，别拿了，桶是新的，留给下一个人用。王春发想了想，说，也是。两个人空着手下楼，倒走得快。

回医院的车上，王春发问她，明天想吃啥。她说，粥。他说，好，我熬，白粥，养人。车过西湖的时候，湖上起了雾，岸边的柳树只剩影子。车窗外的路灯一根一根往后退，她靠着椅背，把手放在小腹上，像捂着一碗刚出锅的东西。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深圳冷得认真。笋岗仓库的铁皮顶上雨声很密，天光从气窗里进来，照在一排排木架上，灰尘在光柱里慢慢地转。深圳人不会过冬，街上有人穿着短袖，有人裹着毯子，档口的小妹们凑单买了暖宝宝，一人贴两片，笑作一团。尹彦把那件厚外套从柜底翻出来，领口有一股旧年的樟脑味。

十二月初对账，笋岗仓十一月的出货款差了十七万，整整齐齐的一个整数。尹彦把账重新对了三个晚上，计算器按得啪啪响，电池按没了换了一回。对到第二晚，他把小奈的工牌从抽屉里翻了出来，塑料壳上她的照片笑着，露牙。对到第三晚，他不再对账了，去翻她的排班表——她的名字还在表上，一直排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她的手机关了三天。同乡说，她半个月前就把柜台辞了，说去昆明炒茶，那边有山，有茶厂，来钱快。柜台姐妹说，她走的时候买了一只新箱子，红色的，拉着走了，还回头挥了下手。

仓库的台账也少了东西。客户名单是纸的，锁在抽屉里，少了一页，裁得整整齐齐，是拿裁纸刀裁的。

第一个念头是报警，尹彦甚至走到了派出所门口，台阶上上下下都是人。他在台阶下站了一支烟的工夫，又走回来了——报什么警，卖碟的自己先进去。他去了小奈租的城中村，房东说行李全拿走了，押金也退了，走得干净。房东顺手说，房间过两天重新租出去，房租折你半个月。尹彦说，不用折。楼下肠粉店的老板娘认得小奈，说她最后一晚来吃过，加了两个蛋，走的时候还回身挥了挥手。回来他把小奈用过的收银台抽屉整个卸下来，倒过来抖了抖，

什么都没有，他又原样装回去。同乡圈里问了一圈，有人想起她提过一句，昆明有人收茶，出价高。还有一个夜宵摊的老板娘记得她最后一晚来喝过酒，喝多了，趴在桌上念叨，说昆明有人等她，等她带山头的货。老板娘学她当时的腔调学不像，只记得一句：她笑得很高兴。高兴这两个字，老板娘说了两遍。

他拿着对账单去仓库找阿木。阿木正在清点新到的货，棉纱手套，动作不快。尹彦把单子递过去，说，十七万，人也没了。

阿木把单子看完，还给尹彦，摘了手套。那天仓库的单据他一直核到天黑，一张没有错。核完他把单据码齐，四角对四角，用夹子夹上，放回文件盒里。

“人找到就行，钱不急。”

尹彦托了昆明的收货佬，姓杨，干这行的都喊他杨师傅。杨师傅在昆明的茶叶批发市场里有半间铺面，认得各路茶客和马帮。他找了七天，头六天，每天一条短信，两个字：没有。尹彦照常开档，照常进货，账照样做平，只是晚上睡得越来越晚，烟抽得越来越短。对账那三个晚上，档口的灯他都留到最晚，保安上来敲过两回门。对完账的那晚，他把小奈落在柜台的半支润唇膏扔进了垃圾桶，走两步，又捡了回来。杨师傅铺面的墙上挂着一张云南省地图，他找人那几天，地图上画满了圈。第六天，杨师傅的短信头一回多了字：再等等。尹彦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半天，回了两个字：不急。第七天下午，杨师傅又来过一个电话，说小区找着了，人还没有信。尹彦说，接着找。挂了电话，他把两间档口的存货重新倒了一遍地方，倒完了自己也说不清在防什么。

第七天夜里，来的是电话，背景音里有雨。杨师傅说话向来慢，这回更慢。

出租屋在城东，老小区，六楼，月租三百五。开门的是房东，屋里两天没有人应了。煤气灶上坐着一锅茶汤，煮干了，烧穿了锅底，人和锅都凉了。桌上两只杯子，一只有茶渍，一只干净的。

警方的结论，杨师傅是从物业嘴里听来的：初步认定系他杀，死者同居男友有重大作案嫌疑，在逃。

邻居反映，前几日有个瘦高男人上过楼，深色外套，帽檐低。有人说那口音是湖北的，再细听，楼里一个跑摩的说，是天门那一带。

尹彦握着电话，站在仓库外的雨棚底下，半天没有出声。烟抽了半支，雨顺着棚沿连成线，在地上砸出一排小坑。挂了电话，他把那半支烟抽完了，烟灰长了也没有弹。他想起她头一天上班认便衣，碰他胳膊肘的那点力道，很轻，像怕碰坏什么东西。挂电话之前，杨师傅在雨声里叹了口气，说，干我们这行的，人都得学着丢。尹彦说，学着丢。

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那个城中村。楼底下停着一辆收废品的三轮，六楼的窗黑着，晾衣杆上空空的，只有一根铁丝在风里晃。他在楼道口站了一支烟，上楼的楼梯窄得只容一个人，他数了数，一共七层。他没有上去。

第二天他去了仓库。阿木在，还是那盏最暗的灯。那天尹彦进门先拉了总闸，把仓库里所有的灯全打开了——他后来也想不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做。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货架的影子缩到墙根。阿木没有躲光，也没有看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像坐在另一盏灯里。尹彦站在货架这头，隔着两排木架，问了一句他这辈子问得最重的话。

“阿木，是你吗？”

仓库里静了几秒。灯管嗡嗡地响，有一只飞蛾绕着灯管撞。

阿木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看不出东西。

“规矩第三条。”

五个字。说完他低下头，继续点货。棉纱手套擦过纸箱，沙沙的，一下，一下。那天尹彦后来才发现，阿木惯常坐的那把矮凳不见了，谁也没有留意它去了哪儿。

第三条：不问来处。账本上就这一行。尹彦站在原地，把这四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来处不问。去处呢？账本上从来没有这一条。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没有问过的东西太多，多到像一间黑屋子，他一直没有敢开灯。他没有再问。他知道自己不会走的，这个念头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那几天他想过搬个地方住，行李都收拾了一半，又一件一件拆开了。他本来还想再问一句，她走的时候冷不冷。话到嘴边，出来的却是：你吃饭没有。阿木摇了摇头。尹彦去楼下买了两份肠粉上来，两个人蹲在仓库门口吃，谁也没有说话。肠粉凉得快，阿木那份只吃了一半。后来尹彦再没有买过那家的肠粉。

三天后，小奈的表姐从湖南打来电话。她去昆明料理了后事，遗体火化了。电话里她哭一阵，停一阵，念派出所给她的遗物清单，念得很慢，念完又念了一遍：手机一部；现金若干；钥匙一串；铁皮盒一个，内剪纸一张，字条若干。

尹彦在那行字上停住了。电话那头表姐还在往下念，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剪纸。铁皮盒。他在电话里教表姐，盒子里的东西一样别丢，纸也别丢。表姐在那头说，纸，谁要。尹彦又问，那些字条上写的什么。表姐说，没细看，像是账。

表姐说，小奈小时候家里穷，剪纸是跟外婆学的，剪窗花，剪喜字，村里办喜事都来讨。又说，她小时候偷穿过自己的高跟鞋，摔了一跤，爬起来还嘴硬。又说，东西寄存在昆明，路远，过了年再去取。尹彦说，好，取了给我打电话。挂电话之前，表姐问了一句，她跟你们处得好吗。尹彦说，好。表姐说，那就好，她这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挂电话前表姐又问，昆明那边要不要再回去个人帮着跑跑。尹彦说，不用，那边有朋友。挂了电话，尹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那句好。第二天，他按小奈留下的汇款地址，给她弟弟汇了下半年的学费，汇款人那一栏，他写的是小奈。

那晚他翻开塑料皮账本，从第一页翻起。第一条规矩是二〇一〇年秋天写的，笔迹生，笔画重，纸背面都透了。他一页一页翻到十一月十八日那一行的下面，添了一行字：

小奈走了。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写完他自己看了很久，像不认得这行字。他又翻回第一页，把第一条规矩用笔重新描了一遍。描完他发现，这一条如今读出来，已经换了一个意思。合上账本之前，他起过一瞬间的念头，把这个本子烧了。打火机打了三下，没有打着。他就把本子放回去了，压到了柜子最底下。

当夜，阿木失联。手机关机，住处没人，杨师傅又来短信问要不要接着找，尹彦回了两个字：不用。半夜他拿着自己那把钥匙去开档口的卷帘门，门从里面顶死了，拉起来一寸，又被什么东西抵住。他把手从门缝里收回来，在门外站了半根烟。第二天，他把那把钥匙收进了抽屉最深处。

第二天一早，尹彦提前到档口拉闸，看见阿木站在卷帘门前，帽子上落着夜露。他眼睛里全是血丝，手里捏着一摞剪纸，半指厚，摞得整整齐齐，边对边，角对角，一张都没有散。纸边还发着毛，像是刚裁出来的。

尹彦没有问那摞纸是哪里来的，也没有去数它的厚度。他弯腰开了闸。

“进来吧，外头冷。”

阿木进来，先把那摞剪纸锁进里间最底下的抽屉，上了两道锁，才去开他自己那盏灯。尹彦装作没有看见。

那天档口一整天没有放音乐。门楣上不知谁塞了一张房产中介的宣传单，阿木看见了，撕下来撕得很碎。有客人进来问货，尹彦说，盘库，下午来。一整天也没有下午来过。傍晚收摊，阿木进里间，把门锁了三道。尹彦在门外收拾东西，听见里面有一种很轻很轻的声音，像有人把纸一张一张抹平。他没有停下，也没有走开。那晚他梦见小奈在柜台后面数零钱，数着数着抬起头来看他。醒来的时候，窗外天还是黑的。

◆

二〇一三年还剩最后四天，天门落了今冬第一场雪粒子，落地就化。刑警大队的暖气片烧得不匀，靠窗的这一组是凉的，竺长生的桌子上常年放着一个搪瓷杯，茶垢很厚。档案室在二楼最里头，卷宗纸吸了三十年的灰，碰一下，呛一下，管理员说，竺队，你这年年来，跟上班似的。

年底积案清理，各队报数。清理的通知就贴在公告栏里，红头文件，他扫了一眼，把文号记住了。他把三份卷宗并上了同一张桌子。调卷登记本上写：积案清理，自用。管理员没有多问。三份卷宗他倒着年份读，从最新的周小奈，读到曲健，再读到苏彩娥，像沿着一条路倒着走回去。读完一份，把纸角抚平再合上，像给人掖被角。读到协查通报那一句，窗外天已经黑透了，他没有开大灯，只开了台灯。通报他复印了两份，一份进卷，一份夹进自己的手账。

第一份，苏彩娥，二〇〇六年一月，西湖，意外落水，本埠结案。卷宗袋的封皮上盖着一个早已停用的公章，红得发暗。卷内还夹着一张现场照片，冬天的西湖，湖面结着薄冰，冰从岸边往湖心长。卷宗里她的登记照复印过很多代，人脸都灰了，只剩眉眼的一点轮廓。卷宗里夹着一张约她出门的字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的，铅笔字，笔画很轻，轻得像怕留下痕迹。当年排查她是因为麻将债，排查曲健是因为别的，两条线最后都断在“无实证”三个字上。经手人一栏，签着他自己的名字。

第二份，曲健，二〇一〇年六月，广州，灯饰仓火灾，意外，当地结案，函复天门存档。认定书上只有一句话：起火原因无法查明，不排除电气线路老化。生前在本市松风茶行做过伙计，二〇〇八年冬天回过一趟天门，酒后说过一些不着调的话，录过一次笔录，笔录页边有一行竺长生当年的批注：此人怕火，话里没火。那一页上有一圈茶渍，圆的，杯底大小，不知道是谁的杯子放的。火灾认定书的红章盖歪了，压着半行字。

第三份是上礼拜的事。昆明，周小奈，出租屋，他杀，同居男友在逃。协查通报十天前发到天门——因为通报里有一句话：嫌疑人口音疑为湖北天门一带。通报的传真件字迹洇了，他把关键的几个字用钢笔重新描了一遍，描完把传真纸压平。

竺长生把那句话看了三遍，像有人在他后颈上轻轻哈了一口凉气。

他在白纸上画线，用的是三种笔：铅笔，蓝圆珠笔，红圆珠笔。桌上的台灯把三种颜色照得分明。苏彩娥，松风茶行的拣茶工。曲健，松风茶行的伙计。前两条线绕回同一个地名。第三条线从昆明起，经深圳，落到二〇一〇年秋天——沈松庭死后第四年，沈家那个少年南下走了，从此户口没动过，人没有音信。三条线，一个起点，一个去向，中间隔着他看不见的七年。三支笔里红笔最后用。画第三条线的时候红笔芯断了，他换了一支新的，把线重新画直。画完他把三支笔排好，笔尖朝着同一个方向。画完他把那张纸对着灯照了照，三条线在纸面上交成一个歪歪的结。这张草稿他后来带回了家，在厨房的洗碗池里撕碎了，拧开水龙头冲了下去。

还有一本案卷他没有并进来。二〇〇五年的那本，他每年年底都借出来一次，登记本上一串他的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年份，像上香。那本案卷锁在他家米面柜的夹层里，锁了八年。写进这份报告，就要从头再来，他还没有那个把握。写报告的那些晚上，他把三本案卷的要点抄在一个巴掌大的手账上，抄完锁进抽屉，钥匙挂在裤腰上，走路的时候贴着腿。家里米面柜夹层里那只手提箱，是一九九八年局里配发的，锁扣换过三回，箱角磨出了铁色。夹层里除了箱子，还有两袋米，他每回开柜都先数一遍袋数。

他写了八页《并案报告》，写得克制，只列疑点，不下结论：三起案件结案均以单一意外或单一在逃嫌疑人收束；三死者与松风茶行旧人旧事存在交集；建议并案复查，调取汇款及通讯记录。写完他工工整整誊了一遍，誊的那份字比草稿小一半。交上去一份，另一份锁进抽屉。

队务会上，报告传了一圈，十分钟退回来。年轻的副队长翻着复印件说，竺队，二〇〇六，二〇一〇，二〇一三，八年，两个省，您拿一句口音串起来？

“还有笔迹。”竺长生说，“苏彩娥案那张字条，从来没有鉴定过。”

“那张字条，”副队长又翻了一页，“看着就是个普通人的字。”

“普通人的字，”竺长生说，“也可能是一个左撇子写的。”

会议室里有人低头喝水，有人看表。主持人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老竺的认真是好的，证据要跟得上。有人问他要不要申请鉴定经费，他说，先立个项。没有人接话。会议室是长条桌，他坐的是老位置，桌腿短一截，垫了十年的纸板。副队长把复印件推回来，推得很轻，纸从他指尖滑出去半尺。散会的时候他把八页报告按页码理齐，才送回卷宗室。有人小声说，快退了还这样。意见栏里最终填了两个字：牵强。

从队里出来，他绕到曹德贵家。老队长退休八年了，在阳台上侍弄几盆辣椒，指头粗，掐尖的时候很轻。曹师娘在厨房炖藕，香气一阵一阵往外飘。

“还弄呢？”曹德贵没有回头。

“退回来了。”

曹德贵把水壶放下，在藤椅上坐了，看了他半晌。

“老竺，你这十几年就活在一张剪纸上面。值当吗？”

竺长生没有答上来。曹德贵家阳台的辣椒结了果，小小的一只一只，红得很正。他看了一会儿。曹德贵摆摆手，说，进来喝口热的。藕汤是排骨干的，曹师娘给他盛了一碗最稠的。他喝完了，把碗底最后一口也喝了。当年老头还有一句话，他记到今天：结了的案子比没结的多，魔征的人，他见得也不少。那句话不是吓唬，是心疼。临出门，曹德贵在背后又添了一句：真有东西，就给它锁结实点。下楼的时候曹师娘追下来，往他袋里塞了两个藕盒，还热着。

竺长生喝完那碗藕汤，出门的时候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声控灯灭了，他也没有跺脚。

晚上到家，秀珍在厨房择菜，把盐罐当糖罐，往碗里舀了两回。他开米面柜取挂面，手在夹层板上停了停——手提箱在里头，好好的。秀珍站在厨房门口看他，看了有一会儿，问，米不是前天才买的吗。

“看看生没生虫。”

她哦了一声，转身择菜去了。灯下她的白发贴着头皮，很薄。竺长生把柜门关严，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听她择菜的声音，一下，一下，很匀。

后半夜他起来喝水，厨房门口站着一个影子，是秀珍。她问他，怎么还不睡。他说，改完这份就睡。她站了一会儿，忽然说，你写字的样子，跟你爸一模一样。他父亲走了二十多年了。他说，嗯，睡了，妈。她应了一声，回屋去了。他把水杯放在灶台上，站了很久。白天他陪她去菜场，她把卖鱼的认成卖肉的，他一一应着，买了两斤鱼，回家才发现两个人都忘了讲价。晚饭他下了挂面，吃了两口，剩下的搁凉了。

三天后的早上，他拉开办公室抽屉，里面多了一份纸。他那份《并案报告》的复印件，右下角一行钢笔字：

队里不信，我信一半。字是钢笔字，笔压很重，纸背面都能摸出印子来。

走廊里蒋阔跟他擦肩而过，脚步没停，怀里的卷宗抱得很紧，只说了一句：竺队，天冷了，加件衣裳。第二天早上，竺长生的桌上多了一杯热茶，还烫着，泡得浓，过了火候，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话。队里没有人承认。那天晚上，走廊尽头蒋阔办公室的灯亮到很晚。那一夜他把退回的报告又读了一遍，读到牵强两个字的时候，用铅笔在上面轻轻点了一个点。竺长生把那份复印件放进抽屉最底下，用一沓旧简报压住。

· · ·

那天夜里，竺长生把报告原件带回了家。秀珍睡了。他把饭桌上的东西收开，台灯拧亮，先去洗了一趟手，用冷水。回来把三份卷宗的编号写在纸角上，然后在意见栏“牵强”两个字的下面，第一次把三个名字写在同一页纸上。

沈嘉木。苏穗。唐穗。

他看着这三行字，拿尺子比着，在三个名字下面画了一条线。线画得很直。中间那个名字住进了第三个名字里，像纸住进纸里。他在页眉添了一行小字：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于天门。

写完他把笔帽按上，关了台灯，在黑里坐着，听见雪粒子打在窗上，沙，沙，沙，像有人在外面裁纸。描名字之前，他先在一张废纸上试了试笔锋。写的时候他的笔顺是乱的：先落笔的是苏穗两个字，停了停，才在前面添上沈嘉木，最后添上唐穗。三个名字，三种笔迹的轻重。

他重新拧亮台灯，拿起笔，用笔尖把“沈嘉木”三个字描了一遍。

又描了一遍。

描到第三遍，笔尖把纸戳破了。他把那页纸对着台灯照了照，破口很小，像针眼。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份验尸报告上有一个创口的形状。他把这个念头按了下去，像按住一只往外爬的虫子。他把纸重新折好，放进手提箱，箱子推回米面柜的夹层，柜板合上，跟墙齐平。

◆

二〇一三年三月，武昌，南湖上的风还带着水汽。华中农业大学校门外新开了一条商业街，脚手架拆了一半，砖缝里还渗着水泥的灰，隔壁奶茶店在招暑假工，红纸上的字让雨洇花了。何采采把自行车锁在街口的树上，锁了两道，又晃了晃，晃不动了才走。

她转正两年了，跑教育口，相机换了一台，手里攒着一摞回访选题。三年前那篇《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数据很好，编辑点头让她去，说，榜样嘛，去看看出息了没有。选题会上这摞回访被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出息，何采采念题目的时候自己先笑了，念完没人笑，她就收了笑。去武昌的公交上，广播里在放交通提示，她把采访提纲又过了一遍，提纲很短，比别人的短一半：出息了没有，四个字，够了。

约的是上午九点。她在公交上背要问的问题，背着背着睡着了，坐过了一站，跑回来的时候出了一身汗。头一天她发短信过去约时间，回得很短：九点，校门口第二家。卷闸门升了一半，锁是新换的，锁孔还亮着。她到早了十分钟，在街口站着，看见门里头有灯影动了一下，很轻。她弯腰进去。里面没有装修完，白炽灯，一架铝梯，墙皮刷了一半，地上还堆着两捆电线，墙角摞着几个空纸箱，箱子上印着两个字：易碎。门楣空着，地上斜靠着一块木匾，黑底，四个字还没有描金：

嘉木茶事。

唐穗从里间出来，给她搬了张凳子，又烧水。两年不见，头发长了，挽在脑后，人没有变多少，只是坐得更静。她自带了一套旅行茶具，白布铺在没刷完的台子上，杯子一字排开，间距一样，连茶巾的折口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隔壁铺面的人探出半个身子，问何采采是不是来看店的，说这间铺子空了小半年，上一个做五金的，做了俩月走了。何采采说不是，来采访。那人看了看唐穗，又看了看地上那块匾，缩回去了。何采采跟着往铺子里扫了一圈：墙上没有奖状，没有照片，没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没有挂，白墙刷了一半，另一半空着，空得很匀。

何采采先拍了照。门头，木匾，卷闸门。拍完她看见玻璃门边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告示：

招店员三名。要求：手稳，嘴紧。

字很好，横平竖直，一笔是一笔。她多拍了一张。

采访在茶汤里进行。问冠军之后的三年，唐穗说，还在学。问为什么选华农，她说，有茶学。问店打算几时开，她说，看缘分。问还记不记得那年比赛，唐穗续水的手稳稳地移过来。

“记得水。”

何采采笔尖顿了顿，没懂，也没有追问。问同学之间处得怎么样，她说，都好。问平时除了上课做什么，她说，看叶子。何采采在本子上记：看叶子。写完自己看了看，把这一条也划掉了。问店员招到了没有，她说，快了。问打算几时开张，她说，先不开张。问为什么，她把茶则摆正了一点，说，纸还没好。问店员工钱怎么算，她说，面议。问一句，答一句，多一个字也没有，但每一句都对得上，像账。问毕业后回不回天门，她说，会回去。问她的茶跟谁学的，她答，水教的。何采采抬头看了她一眼，笔没有落下去。问她往后十年怎么打算，她答，一年一年过。问记性好不好，她把柜台底下一个小本子拿出来晃了晃，本子封皮磨白了，翻开，上面没有字，只有画的格子。问高中最好的朋友是谁，她想了想，说，同学都好。问家里人支不支持，唐穗把茶荷放下，放得很轻。

“我妈走了，她是老师。”

何采采写下：母亲已故，生前执教。写完那两个字，笔尖在纸上停了两秒。那两秒她后来一直记得，想不起来当时在等什么。她没有多问——这样的选题里，身世是最不值钱的部分，编辑只看今昔对比。她那时没有想过这句话哪里不对，就像她没有想过一瓶湖水为什么要封蜡。

茶过三道。她想起三年前电话里那半句，又问了一遍：招牌为什么叫嘉木。

“南方之嘉木。家人取的。”

一字不差，连那半秒的停顿都停在原来的位置上。何采采这回多追问了一句，哪个家人。唐穗笑了笑，没有答，抬手给她续了水。水面纹丝不颤。抬手的时候，她左手食指上露出一道浅痕，旧的，很短，像被线头勒过。

何采采指了指玻璃上那张告示，问，手稳怎么看出来。她答，碗洗过三十遍就知道稳不稳。何采采又指了指那行字，问，嘴紧是什么意思。

“嘴不紧，货就留不住。”唐穗说这话的时候在擦桌子，抹布绕着圈，一下，一下，很匀。收茶具之前，她把壶里剩的水倒进水盂，倒得很慢，像在给什么东西送行。收拾茶样的时候，她用一把小剪刀裁开棉纸包，左手，剪口笔直，剪完剪刀立刻归位，刀柄朝右，摆得跟来的时候一样。剪刀是旧的，柄上缠着一圈胶布，缠得很匀。茶则里剩最后一粒干茶，她拈起来，对着灯看了看，又放回去，位置没有动。何采采端着相机，把这一组动作都拍了，取景框里，白炽灯把人照得很白。

十一点，采访结束。唐穗送她到卷闸门口，替她扶了一下门沿，扶的时候手上没有用一点力。何采采弯腰出去，回头看了一眼：唐穗站在白炽灯底下收拾茶具，动作一下是一下，脸上的笑还没有收，收得很齐。

回报社写了千字稿，标题起了三个，一起交上去。稿子里有一句：三年前她说，水好。编辑回电话问，水好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也想问。誊稿的时候，她本来把手稳嘴紧那行告示也写了进去，写到一半，又删了。第二天邮件退回，正文四个字：题材太小。她打电话过去争，编辑在那头说，小何，榜样要有下文才有得写，她这叫什么？这叫没有下文。

隔了一天，内网传来退稿单的扫描件，右上角有日期：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老晏那一辈的编辑退稿喜欢手写，说过打印的字认不出错。他在批注栏里留了一行字，写得比平时潦草，像是写完自己又看了一遍。何采采把稿子存进一个叫回访的文件夹。那个文件夹里已经存了六篇，篇篇都发了。她数了数，这是第七篇。只有这一篇，发了，又收了回来。退稿单她没有删，也没有回。

那晚归档照片，何采采新建文件夹：二〇一三·嘉木茶事。电脑提示她还有七十多张没导入，她想了想，全导了进去。那天她一共拍了四十七张，选出来六张，真正用得上的只有三张。存完，她顺手点开旁边的旧硬盘，二〇一一·茶艺大赛的文件夹还在，文件一个个排下去，最底下是那张废片。

台下。

三年了，她没有再点开过。这一回她双击了。画面里，配电间的气窗还黑着，窗后的少年电工还站在阴影里：帽檐，下颌，垂着的左手。她放大，又缩小，还是看不清那张脸，只有一段下颌，白得反光。她算了算，那个人要是还在做电工，如今也该二十岁了。选出来的三张照片里，有一张就是那行告示。毙稿的时候，编辑没有提它。

她把两个文件夹拖进同一个目录，想了想，没有重命名。多年以后她换过三台电脑，这个目录一次一次搬过去，两个文件夹始终挨着，谁也不在谁里面。那张退稿单她复印了一份随身放着，原件锁在家里抽屉的最底层。关机的时候，退稿单还摊在桌角，屏幕的光灭了，台灯的光正好落在那一行字上。

老晏批注栏里留下的那行字，她后来看了很多年：

这个姑娘笑得太齐了，齐得像用尺子画出来的。

第五章　渥堆

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凌晨五点半，天门没有醒，茶经楼前的广场先亮了。

小何抱着讲解词从员工通道进场。新石板上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回头，保安在灯下冲她点头。再过十一个小时，这栋楼就要正式开门。

九层，五十三点八五米，立在西湖和陆羽故园之间。楼身收分，一层一层往上去，檐口在晨雾里只显出一个轮廓。讲解词她背了三个月：哪一层摆《茶经》哪一章，哪一只展柜里是复刻的二十四器，哪一级台阶底下留着沉降缝，她闭着眼睛也走得上来。

讲解词是她自己一笔一笔抄的，抄了三遍。第一遍抄在打印稿背面，第二遍抄在笔记本上，第三遍只抄那些数字和年份，巴掌大的一张纸，折成四折，揣在胸前的口袋里。

讲解员是面向全省招的，笔试面试下来，她是那一批里唯一的天门本地人。培训的老师说她普通话比武汉来的还标准。她外婆不识字，她把讲解词念给外婆听，外婆听完说：茶是喝的，不是念的。她说，外婆，这是我的工作。外婆说，工作好。

外婆那年冬天走了，没能等到开放。楼封顶那天她回来上过一回，冲着楼鞠了个躬，替她外婆。她跟自己说，等开放了，带一张门票去烧给她。外婆不要门票，外婆要的是她站在这楼里，好好的。

她入职那天带外婆来看过一回。外婆在楼底下仰着头，看了半天，说，这楼真高，高得茶都凉了。她说，下个月开放，我带您家上顶楼。外婆说，顶楼风大，你就站矮处。

《茶经》十章，摆进九层楼，六之饮与七之器只好同居一层。培训的老师说，茶事挤一挤，不要紧。她把这句话也背熟了，预备着救场。

广场扫过了三遍。红毯从台阶铺到旗杆，音响在调音，偶尔“噗”的一声。几个穿西装的人在旗杆下碰头，手里的对讲机响个不停。工人往门厅里抬最后几只展柜，气泡膜在晨风里哗哗地响。

一楼茶道本源殿正中，是陆羽的铜像。清早第一炷香已经上过了，香灰积在青瓷炉里，弯着，没有断。

六点半，广播试音，念的是开会通知，念错了两个字，全场笑。她跟同事站在殿门口看铜像，铜像的眼睛望着门外，谁进来都在他的注视里。同事说，陆子一天要看多少人。她说，他看惯了。

七点整，管委会的刘主任在一楼等着过稿。晨光斜进来，红笔很利索，划到第三页，停住了。

“这句删了。”

小何凑过去。那一行是：此地旧为西湖茶仓，湖光涵养，久有茶缘。

“主任，就一句。也不犯什么忌讳。”

“不吉利。”刘主任把笔帽按死，“大喜的日子，提什么旧仓。你晓得那仓里出过什么事？”

小何摇头。她九岁那年听说过西湖边死了人，一个茶行老板。大人们说得含糊，她没记住多少。

“不晓得就对了。删了。”

讲解词还给她的时候，删口那里掐着一道月牙形的指甲印。她把纸折好，放回制服口袋。

八点五十八分，剪彩。红绸从台阶上一路铺到广场，金剪刀托在绒布盘子里递过去，咔哒一声，绸断成两截。军乐，鸽群，快门声连成一片。省里、市里的领导挨个讲话，讲到“茶圣故里”四个字的时候，掌声最长。

陆羽国际集团的客商站在头排，西装和茶服站在一起。海外的茶人代表团捧着花，跟着翻译念碑上的字。省电视台架了三台机器，转播车停在陆羽大道边，白色的车身在太阳底下晃眼。

大屏幕上放着航拍：楼是新的，西湖绿得像一块老玉。

剪彩之后领导上楼。小何在电梯里讲标准解说词：陆羽，字鸿渐，复州竟陵人，一生嗜茶，精于茶道，著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有位领导问，茶经楼为什么是九层。她说，主体九层，内展陈十章，九章是楼，一章是茶。领导点点头，说这个说法好。

出电梯，她带客人看一之源。展墙上，头一句就刻在整面铜板上：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她把删掉的那一行跳过去，舌头没有绊一下。

贵宾们问楼有多高，问地基打了多深，问门票多少钱，问楼里供不供茶。没有人问这里从前是什么。

带客人上到五层，有人数楼层：不是九层吗，怎么摆十章。小何把背熟的那句端出来：茶事挤一挤，不要紧。贵宾们都笑了。顶楼是十之图，挂着一幅长卷，画的是从采茶到烹茶的全过程，采茶的人弯着腰，烹茶的人坐在泉边。小何讲到这里总要停一停，让客人自己看。

楼道里挂着各个年代陆羽故里的老照片，有一张是八十年代的西湖公园，湖边的栏杆还是木头的，照片角上卷了。有个客人指着照片问，这是哪里拍的。她说，就是楼下这个位置。客人哦了一声，把照片看了很久。

彩排那次她走完全程用了四十七分钟，今天人多，走了五十分钟，鞋跟磨得发热。四十七分钟里她要开十一次展室的灯，说二十七段词，答不知道多少个问题。答不出的时候她就笑，说，您这个问题，值得请陆子自己来答。客人多半也笑。少数不笑的，她就领他去看那幅长卷，长卷长得让人忘记问题。

楼里新，味道也新，漆味、木头味、展柜胶条的味道混在一起，是一栋楼刚刚出生的味道。

中午的盒饭在员工通道口发。她蹲着吃，看见几个茶农代表蹲在另一头，胸前还别着主席台发的红花。一个老汉把花摘下来，别到身边年轻人的胸前，年轻人又摘下来，别回去。两个人推了三个来回。

中午过后她在南门出口换班，看见了停车场。

望湖茶仓的旧址上画着崭新的白线，一格一格，车像茶叶一样码进去，一直码到围墙根。她小时候跟外婆来这一带洗过衣裳，那时候这里是一排仓库，卷帘门锈得发红，墙根堆着空茶篓，麻雀在篓沿上打架。现在卷帘门没有了，连地皮都是平的，白线画得笔直。

下午人流如织。有老人伸手摸墙，被保安劝住，手收回去，眼睛还贴在砖缝上。有孩子一层一层数层数，数乱了，从头再数。有个老太太提着小竹篮想往楼跟前走，被拦下，她也不恼，就站在警戒线外朝着楼作了个揖。

有孩子把脸贴在展柜玻璃上哈气，拿手指头画画，让大人一把拉走。有个中年人到登记处，说家里传下来一把锡茶壶，想捐给楼里。登记的人留了电话，让他等通知。他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像把一样东西真留下了。

卖锅盔的、卖黄潭米粉的摊子一直摆到陆羽大道口，纸碗摞得比人高。有个穿红袄的小孩举着糖塑跑过去，糖人在太阳里化得快。

她给高中同学发消息：我们天门，也有地标了。对面回了一串喇叭的表情。

天黑透之前，讲解员们轮流歇脚。她靠着消防栓喝了两口温水，听见身后两个观众聊天，说这楼风水好，背靠西湖，面朝大道。另一个说，可惜底下空。她说，底下不空，是地基。那两个人笑了笑，走了。她把没喝完的水倒进花坛，转身上楼，九层的灯在身后一层一层亮起来，把她的背照亮了。

傍晚，特邀表演排在亮灯前。报幕声在广场上空荡：全省中学生茶艺大赛冠军、茶圣故里特邀茶艺师——唐穗。

小何负责在侧台递茶器。她第一次近看唐穗，是在化妆间。

台上在走场，唐穗没有看台上。她站在窗前，望着南边那片停满车的广场，望了很久。

“我小时候，这儿是个茶仓。”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回头。小何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停车场，白线，一排一排的车。

“唐老师说笑，这楼是这两年才起的。”

唐穗笑了笑，低下头去理茶巾，把每一个角都捋平。她没有再说话。

小何注意到她的指甲修得极短，右手食指的指侧有一层薄茧。她见过弹琴的手，见过揉面的手，没见过这样的手。安静，但有主张。

她穿一身月白，没有戴一件首饰，头发拢在脑后，茶器是自己带来的竹器，一方素帕包着。小何递过去一瓶矿泉水，她道了谢，没有接，只用自己壶里的水润杯。镜子里那张脸安安静静的，像隔着一层玻璃。

暮色压下来的时候，广场上的人挤不动了。焚香点起来，一缕烟直直地往上走。唐穗上台，先朝楼行礼，再朝湖行礼，最后朝观众行礼，三个躬，幅度都一样。大屏幕把她的手放大到十几米：注水，水线细而不断；出汤，手腕稳得像焊在那里。

画外音念《六羡歌》，念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满场的人跟着轻轻了一声，像风过稻田。

有个老人跟着唱，声音不大，词不对，调是对的。旁边的年轻人问他唱的什么。他说，小时候满城的孩子都会。年轻人说，我上过茶艺课，老师没教这个。老人说，这个不用教。

小何在侧台看住了。她后来又看过很多场表演，再没有见过那样的一双手。

晚上八点，倒数的声音起来。五，四，三，二，一。

泛光灯从楼基一路亮上去，九层依次点亮，最上面一层最后亮，像替楼戴正了帽子。人群里“哦”成一片，孩子骑在父亲肩上，有人举着手机，有人只是仰着头。

“湖面亮得像铺了一层霜。”有人在小何身后说。

是个抱着孙子的老人。老人望着楼看了半晌，对怀里的孩子说：这里头，原先是个仓库。

孩子问，什么仓库。

老人说，茶仓。后来没了。

孩子又问，茶仓里有什么。老人想了想说，有茶，有账本，有算盘，有一杆秤。孩子问，秤称什么。老人说，称年头。

小何没有接话。散场的人流从她身边涌过去，往停车场去，车灯一对一对亮起来，像回巢的蜂。检票口的闸机早关了，人流从侧门出，礼宾的姑娘们站成一排鞠躬送客，鞠到最后腰都直不起来，还在笑。

出口的灯箱上打着两行字：茶圣故里，欢迎回家。她看了两遍，头一遍没觉出什么，第二遍看见“回家”两个字，站了一小会儿。

有个记者在出口拦住她，问这楼里最老的茶是什么。她答，展柜里那饼八十年代的边销砖茶，纸都脆了。记者又问，那这块地上从前是什么。她张了张嘴，想起口袋里那道月牙形的指甲印，说，从前，是个停车场。

记者笑了，说小姑娘会打岔。

回到通道，同事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同事说，你脸都白了。她说是站累了。第一天下来，她的嗓子哑了。同事给她泡了胖大海，她捧着杯子说，我今天说了八千字。同事说，你猜人家记住了几个字。她说，记住哪个都行，别记住停车场就行。说完两个人都停了一秒。那个词是她自己溜出来的。

人散得差不多了，大屏幕还在放白天的航拍。她看见画面里自己带着客人走过一层又一层的背影，小小的，走得很快。她看了一会儿，转身去关侧台的

灯。

她抬头看那栋楼。灯太亮了。亮得楼底下压着一个旧天门，谁也看不见。

她摸出口袋里的讲解词，指头在那一道月牙印上按了按。

此地旧为西湖茶仓。

不吉利。

夜里回家，她在公交上把讲解词又看了一遍。月牙形的指甲印还在纸上。她想，明天要跟主任提一句，把那句加回去。想完又笑，加回去做什么呢，念给谁听呢。车过西门桥头，她把纸折好，收回了口袋。

回到员工通道，她发了九张图，配了两个字：到家。看了一会儿，删了，重发，还是那两个字。

◆

十一月七日上午，西湖东岸的巷子里，王胖往三轮车的座板上又加了一层棉被，棉被外头再裹一条旧军毯。

柳文霞是天不亮醒的。她在床上躺了一阵，听王胖在院里给三轮车打气，气筒一下一下，像谁在很耐心地敲门。

她坐起来穿衣。先袜后鞋，鞋带打了两回才打成，手指头不听使唤，是药的事。她对着镜子把头发抿了抿。

柳文霞的病是五月里查出来的。肝上的事。医生把片子夹在灯箱上，看了很久，只说了四个字：想吃什么。

她不吃。她把呢子大衣从箱底翻出来，掸了掸，穿上。脚肿了半季，鞋大了一码，她垫了两层鞋垫。镜子里的瘦是大衣兜不住的，她就系上围巾。

药盒按早中晚分格。她把当天三顿的量各掰掉半片。疼起来的时候人像泡在冷水里，她不看表，也不哼。

出门的时候她没有拿药盒。王胖追出来，把药盒塞进军毯底下，没说话。

“我要去看热闹。”她说。

王胖没拗过她。王春发，牌桌上都喊他王胖，五年前娶她的时候就晓得，这个女人身上有些事，问不得。问了，日子就过不下去。

三轮车从巷子里出来，慢慢悠悠往广场去。路过云香居，郑胖婶在门口扫地，直起腰：文霞，今儿气色好。

柳文霞笑：出去转转。

巷口的早点摊子冒着白汽，油炸锅盔的香气追着车走了半条街。她今天什么也没吃，胃里像塞了团棉花。

车过西门桥头，湖风扑上来，带着水腥气。她把围巾又绕了一圈。堤上的柳条黄了半截，水面上有挖泥的船。

她年轻时在茶行拣过茶，一天一毛五。就是拣茶那一年认识松庭的。那时候她手脚快，拣得又净又齐，师傅夸她，说这双手将来有福。

她把袖口往手背上拉了拉。

王胖在前面蹬车，背影敦实，呢子帽压得很低。这个男人不会说漂亮话，求婚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跟我过，你家的事我不问。她当时就哭了。嫁过来才知道，不问，也是一种疼人。

天门这些年，就这一件体面事。她要来看一眼。人还没到，军乐顺着风一阵一阵地过来，鸽哨在头顶上绕。

三轮车停不进去。王胖把她扶下来，在观礼区外的台阶上寻了个位置，垫上军毯，自己守在旁边。人像潮水，一波一波从面前过。

大屏幕挂在广场那头，隔着人，隔着旗。上面放着航拍，放着剪彩，放着楼。

有人举着小旗带队，一面喊跟紧了。一个孩子问什么是茶仙，大人想了想，说，就是茶菩萨。孩子问，茶菩萨管什么。大人说，管你有茶喝。

队伍里有人认出她，隔着人喊，文霞，你也来啦。她应了一声，说，来看看热闹。那边说，改天来打牌。她说，好。两边都知道，这个好，多半不算数了。

牌桌她怕是不上了。郑胖婶说过，你要是闷，来店里坐坐，不摸牌也行。她说好。她现在什么都说好。人到了她这一步，好字最省力，也最实在。

邻座一个老太太跟同伴打听：这个小茶仙，是么湾的伢？

柳文霞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声音比平时高：我们天门的。陆羽故里，出了个茶仙。电视上都演过。

老太太笑：你倒内行。

她说：天门人，哪个不晓得两句茶。

她说这话的时候，腰是直的。病了半年，她没有直过这么久的腰。

特邀表演上来了。报幕的声音在头顶滚过去，她听见一个名字，唐穗。名字没有意思。她等着看热闹。

大屏幕上先出来的是手。

注水，水线细得像一根丝，不断。出汤，手腕稳稳地悬着，一滴不洒。

柳文霞的手在口袋里攥住了药盒，攥出一道棱。

二〇〇五年冬天，有一个晚上，她去茶行送饭。前头的铺面黑着，后屋亮着一盏灯，门没有关严，留着一道缝。

缝里，一个小姑娘在给松庭倒茶。背对着门，辫梢上扎一截红头绳。水从壶嘴里出来，又细又稳。松庭坐在那里，声音软和得很——她在自己家里，从没听见过那样的声音。

那孩子冬天里来过两三回，总赶在天擦黑的时候，站在后屋门口，不哭，也不闹。有一回她从巷口过，看见孩子捧着松庭给的东西，两只手捧着，捧得平平的。

那两年松庭夜里有不少反常，出门，回来，钱匣子时紧时松。她也有她自己的事要分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那天夜里她站了一会儿，退出来，把饭盒挂在门把上，回家了。这件事她谁也没告诉。往后的许多年，她把自己活成一个只往里收的人：睡不着，吃药，不看，不问。

屏幕上，那只手把茶杯端起来，向四方致意。掌声炸开，鸽子从楼顶惊起一片。

她盯着那张脸看。眉眼长开了，大了，可那双手不会变。手是骗不了人的。

她在口袋里把那片没吃的药摸出来，捏在指头间，捏着捏着，成了一小片碎末。

后背出了一层汗，风一吹，凉透了。她在鞋里把脚趾抠紧，抠得发疼，像这样就能钉在台阶上不动。

腰一点点弯下去。王胖见她嘴唇发白，伸手探她的额头。她挡开，说，风大，回吧。

回家的三轮车上她一路没说话。风从湖面上过来，一层一层掀她的围巾。王胖说，晚上还有亮灯，八点。又说，人真多，怕是有几万，比过年赶集还挤。说了三句，没有人接，也就不说了。

王胖后来跟牌桌上的人说起这一天，只说了一句：她那天从头到尾没有问他一句话。牌桌上的人说，没问就是心里有事。王胖说，不是，她是把话咽下去了，咽下去的话才沉。

车过老街，松风茶行的铺面早就改成了手机店，玻璃门上贴着大减价的字。三轮车从门前过的时候，她偏头看了一眼，很快收回来。

她坐在车斗里，背挺得很直，眼睛望着自己的膝盖。湖在左手边退过去，一栋亮着边灯的新楼在远处立着，越来越小。

到了巷口，王胖刹住车，回头看她。她还是那个坐姿。

王胖蹲下来给她拽了拽军毯的角。她的手从毯子底下伸出来，按了按他的手背，按了一下，收回去。两只手都凉。

夜里，她靠在床头上，忽然开口：

“二〇〇五年冬天，松庭带过这伢……”

后半句她咽了下去。屋子里静了很久，静得能听见堂屋的挂钟。

“我认错人了。”她说。

王胖给她掖了掖被角，把灯关了。黑暗里他睁着眼睛躺了半宿，一声没吭。他听见她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他数着，数到第七个，起身去堂屋，把那杯凉茶倒了，换了一杯温水端进去。她没喝，但手搭在了杯子上。

灯下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得像另一个人的。王胖站了一会儿，替她把灯拧暗了一半，退出去，把门轻轻带上。

半夜他起来喝水，看见堂屋还亮着灯，她坐在桌边，桌上摆着一杯茶，早凉透了，她一口没喝。

· · ·

安定她吃了半辈子。起初一片就够，后来两片，如今三片，也压不住了。人躺在黑暗里，眼睛睁着，天花板上有窗外泛光灯映进来的一点白。

她跟王胖交代过一句：走的时候，穿那件呢子大衣。王胖说，说什么胡话。她说，先说好，免得到时候你手忙脚乱。

王胖没接话。第二天他还是去了寿衣店，问了价，没买。回来的路上他在桥头坐了一会儿，看着挖泥的船来回了三趟。有些事，答应了人，就得先自己受着。

后半夜，她起来，开了灯，从樟木箱底捧出一只木匣。匣盖上的铜扣磨得发亮。

匣子里是儿子的剪纸。

从职高寄起，后来从深圳寄，一年一张，不定月份。花草，鸟兽，游鱼，一把油纸伞，一只小船，一盏灯笼。有一年那张剪的是伞，伞骨密得数不清。每一张都剪得干干净净，没有一处毛边。她一张一张数过去，二十几张，一张不少。

匣底还压着一张红纸，是儿子小学得奖的奖状边上剪下来的花边。她不记得是哪一年得的奖，只记得那天儿子把奖状举过头顶，从校门口一路举回家。

她把它们按年份排在床上，一张一张地看。指头贴着刀口走，像在读一封没有字的信。看着看着，数起了另一笔账：每年十一月十八，儿子要“病”一场。小时候是把自己关进房里，一整天不出来，饭搁在门口，凉了端回来。半夜里，门缝底下漏出沙沙的响动，磨刀似的。有一年冬天曲健喝多了，说沈家的孩子半夜磨剪子，她骂他酒后胡吣。

骂完那晚她自己也没睡。沙沙，沙沙，从儿子的房里出来，穿过堂屋，一直磨进她的耳朵里。她把被子蒙上头，对自己说，孩子学手艺呢，磨什么剪子，明天给他买套新的。

后来儿子南下，那个日子就换成电话打不通，人是活不见人。再过些天，邮差送来一张剪纸，邮戳一年比一年远。

最早的一张邮戳还是湖北，后来是广东，再后来字越来越小。有一张她拿到窗口让邮局的人认，人家说，这是昆明的。她问，他怎么到昆明去了。邮局的人说，那我们哪晓得。

她把那叠剪纸按大小理了一遍，理到最后，手停在最早的一张上。那张剪的是一只鸟，翅膀张开，飞的方向是门。那是职高第一年寄回来的，纸还新，黄得也慢。

十一月十八。

那个日子，是松庭走的日子。

她终于明白儿子为什么每年十一月十八日“犯病”。

她坐在床沿上，两手拢在袖子里，坐了很久。她不往下想。不往下想，日子还能过。

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儿子。二〇一〇年秋天，车站，他背着包，隔着人流朝她这边点了一下头，就进去了，没有回头。他上车前吃的是她煮的鸡蛋，剥下来的蛋壳她装进自己兜里带下了车。想起这个，她把手拢得更紧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摸出枕头底下的旧手机。直板的，按键上的数字磨浅了。儿子的号码她背了十年，换了几个手机，这个号码一直没删。她知道那是旧号了，人早就不用了。她还是一个字一个字按进去：

“嘉木，妈晓得了。妈什么都冇看见。”

发送。

屏幕亮着，映在她脸上。她等了很久，等到屏幕自己黑下去，再按亮，再等。

没有回音。她知道不会有了。

她把手机扣在桌上，到院里站了一会儿。天边有了一点白，湖那头的新楼熄了灯，只剩一个黑黢黢的影子，比夜里的楼还高。

她回屋，把手机后盖抠开，电池抠下来，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放进樟木箱最底下，压上冬衣。

只有一件事她不含糊。她把两串钥匙分开，一串日常用，一串用红布包了压在箱底。红布包的那串，是沈家老铺的门钥匙。铺子早就没了，钥匙她一直留着。留它做什么，她没有想过。

病来之前，她把这些东西收拾过一回，该烧的烧了，该扔的扔了。病来之后，她又把它们一样一样捡回来。人这一辈子，前半截扔，后半截捡，捡回来的都是烧不掉的。

窗外，西湖那边，天亮上来了。她背过身去，把灯也关了。

◆

十一月七日，观礼席设在广场东侧，政法系统的老名额，竺长生坐在第二排。

名额是政法委分下来的，一个单位两张票。秀珍说想去看亮灯，他说人多，别去。他自己来了，穿便服，笔记本揣在内袋里。

他提前一个钟头到，沿着警戒线外走了一圈。安检口传送带嗡嗡地转，医疗点的白帐篷支在东北角，输液架是空的。他跟医生点了头，医生不认识他，他也点头。

进门的时候，门卫老张从窗口探出头来：竺队，稀客。他说，看热闹。老张说，您家这叫看热闹，眼睛都不带眨的。

他今年五十六，还在职。进了任何广场，他先数出口：南门两个，北门一个，贵宾通道一个。保安站在什么位置，隔离带摆成什么角度，舞台电缆从哪块板底下过，他扫一眼，心里就归了档。主席台两侧各有一组消防栓，他记下了位置。

台上的人他还认得一半。台下有便衣，他数出两个，站姿是新一代的站姿，重心在脚掌前。他年轻时候也那样站。

台上领导讲话。陆羽，故里，文化名片，茶旅融合。这些词像湖面的光，晃眼，不留痕。他掏出笔记本，什么也没记，又合上了。

讲话到一半，风把讲稿掀了一页，主持人俯身替领导压住。他的眼睛从台上移到台下，又数了一遍出口。出口没变，人变了，人比排练时多了三成。

保安队的对讲机里偶尔冒出一句：东门正常。北门正常。他把这两个正常听进去了。正常是最好听的话，也是最不能全信的话。

学生方阵坐在广场西边，一条横幅拉得笔直。茶农代表披红戴花，站在风里搓手。

有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挤到警戒线边，孩子手里的气球飞了，哭起来。便衣中的一个过去，帮着把气球从旗杆边够下来。他记下这个人：手快，态度好，眼睛一直在人堆里。

特邀表演上来的时候，他坐直了一些。

大屏幕把那张脸放到十几米高。唐穗。这个名字他在二〇一一年的报纸上见过，小茶仙。那年全省的比赛他本要去看，后来让一桩盗窃案钉在了所里，秀珍还念叨了半个月。

他想起的是另一天。二〇〇六年一月，苏彩娥的案子，他去念庐回访。孩子刚没了妈，暂住在远房表姑家。堂屋里烧着炭盆，条案上一瓶白菊。

一屋子警察坐着问话。小姑娘进来，提着热水瓶，一桌一杯，倒得满而不溢，杯柄一律转向各人顺手的一边。

十一岁的孩子。手稳得吓人。

他干这行三十年，见过手稳的人。手稳的人只有两种：练出来的，和事情压出来的。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两头都挨不上。

那天临走，小姑娘把热水瓶提回灶间，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脚步让了让他，先过的他。他在门口站了一步，把这个动作记在了心里，没有记在本子上。

当年他在走访本的边角记了一个字：稳。那一页后来没有进卷宗，本子还在他家里。

现在大屏幕上那双手在注水，水线不断。满场喝彩，她躬身，幅度不多不少。眼睛里像隔着一层玻璃，玻璃后面有什么，看不真。他留意到一件事：她站的位置，从头到尾不背对西湖。

画外音念到“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他在心里跟着默了半句。这歌他熟，西湖边上的孩子都会哼两句。他念初中那阵，湖边还有渡口，摆渡的老

人一边摇橹一边哼，调子散，词只记得半句。后来渡口拆了，桥修起来了，调子就只有老人会了。

他忽然想，湖还是那个湖。湖底下沉着的东西，比楼底下的还多。

掌声很长。竺长生没有鼓掌，他的手放在膝盖上。

他两侧的人站起来鼓掌，他的视野一时只剩背影和手。等掌声落下去，台上的礼毕了，她收壶的动作干净利落，一秒不多。

散场后，单位的人喊他吃饭。他说家里有事。

出门的时候他与老张又打了个照面。老张说，竺队，不等灯了？他说，等灯。

他从贵宾通道出来，绕到景区南门。

贵宾通道两侧的盆栽是当天凌晨从苗圃拉来的，还带着土腥气。他放慢脚步，让身后的记者先走。记者们抱着机器小跑，谁也没有回头看一眼南门的方向。

望湖茶仓的旧址，如今是停车场。白线把土地分成一格一格，车停得满满当当。他沿着边走，走到原先大门的位置，站住。卷帘门的轨道还埋在水泥里，两道锈，像两道旧疤。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那扇门里抬出来一个人。现场铁盒里的现金，一张没动。卷帘门半开着，门里点着勘查灯，地上落着一张黄纸。勘查那天水凉，下暗渠的是个小个子的年轻民警，上来的时候嘴唇发乌，举着石膏模，像举着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那个小个子民警姓孟，如今在乡镇派出所，前两年还托人带话，想调回城里。暗渠口的位置，如今砌了花坛，一丛枯了的月季。他在花坛边站了站。

花坛是新砌的，水泥抹缝还没让雨水染透。当年的暗渠口就在这底下，涵管还埋在土里。城市长好了，把伤口包在土里，像树把疤包在年轮里。

他在原先大门的位置又站了一会儿。倒车的喇叭声，雷达的滴滴声，从他两边过去。他蹲下来，摸了摸水泥里那两道锈。锈很糙，割手。十年了，没有人想到把它起出来。

收线缆的临时工们散在广场各处，橘红的马甲，帽子，说话都压着嗓。有一个年轻人蹲在灯柱底下收线，左手拢线，右手只管搭着，线在他手里绕得很匀，一圈压着一圈，像是有尺寸的。

他下意识数了节奏。一圈，半秒，手腕不带晃。

二十米外，竺长生站住了。

那年轻人很白，帽子底下露出来的一截脖子白得晃眼。他收完线，把线圈往肩上一挎，站起来。走路的姿势很轻，像怕踩碎什么。他背着线圈走进楼的影子里，没有回头。

有人朝他喊了一句，是叫他搭把手。他应了一声，声音很低，隔着二十米听不清字。竺长生听见的是尾音，很短，落在喉咙里。他想起队里新来的辅警，答话也是这样，字在嘴里过一遍才敢出来。

他又看了一眼那人的手。指节匀净，没有烟茧，指甲剪得极短，虎口有一层薄薄的茧。那不是搬箱子的茧，是常年捏着什么东西磨出来的。

竺长生朝那边看了几秒，把目光收回来。广场上穿马甲的人有几十个。他对自己说，老了，别魔征。

话是这么说，脚还是慢了半步。他看着那件橘红马甲消失在楼影里，才把眼睛挪开。

他转身要走，脚边的台阶上有什么东西白了一下。

一张纸。黄纸。

他蹲下去，两根手指捏起来。剪的是一座楼：九层，飞檐，一层一层收上去，檐角的瓦当都剪了出来，窗棂是细密的直纹。楼基的位置，阴影里压着一

个小小的人。人剪得极小，小得要凑到眼前才看得清，可连头顶的发旋都剪了出来。

风的空档里，广场上的人声忽然显得很远。

他捏着纸，没有立刻起身。一张纸放在第七级台阶的正中，不偏不倚。风从东面来，纸没有动——四角各有一个极小的纸钉，也是剪的。

他把纸翻过来，借着灯看刀口。刀口从左边进，收得很稳，和记忆里另一种刀口，是同一路走法。纸背干干净净，没有胶痕，也没有折过。来的时候是平放着带来的，放下去，大概只用了一秒钟。

他捏着纸朝那栋楼比了比。层数，檐角，收分，都对。剪的人是照着真楼剪的，一层都没有错。

台阶上上下下都空了。收线缆的车刚走，尾灯在停车场口拐了个弯。

他把台阶前后左右又看了一遍。东面是花坛，西面是灯柱，正面迎着散场的人流。放纸的人挑的位置，是散场的人一定经过、只有蹲下才看得见的地方。

没有人看见纸是谁放下的。

他沿着湖走。泛光灯八点亮起，十点熄了一半，十一点全熄了，楼黑下来，湖面从一层霜变回一块墨。晚风把湖腥气一阵一阵送上来。

他摸出一支烟，点了，抽了半支，又掐了。一个环卫工推着车过去，问他怎么还不回。他说，等灯。环卫工说，灯早灭了。他说，就是等它灭。

环卫工推着车走了，走出十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嘀咕了一句什么。湖面上最后一点灯影碎了，又聚拢，又碎了。

十一点半，湖心亭的灯灭了。十二点，对岸小区的路灯灭了一半。他站在原地，像等一个迟到的人，不急，也不走。

他在湖边站着，从内袋里摸出笔记本，把剪纸端端正正夹进去。

这一夜他确认了两件事。

那个孩子看见了这场庆典。

那个孩子认得他，并且在跟他说话。

一个把话说给满场宾客听的孩子，不会往台阶上放一张纸。放纸的人，是只说给他一个人听的。二〇〇五年那张双童奉茶，是留在现场的；这一张，是送到他脚边的。留，是给所有人看的；送，是给他一个人看的。这话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他老婆，包括蒋阔。

回到办公室，他开了台灯，把纸取出来压平，又把二〇〇六年的旧走访本翻出来，找到那个“稳”字，两本本子并在一处。他提笔在空页上写：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他把两个日子剪在同一张纸上。

台历翻到明年。他在新台历的十一月十八那一天，用铅笔轻轻画了一个圈。画完，自己看了半晌，又把圈描深了一层。还有一年，他想，还有一年，这张纸就会告诉他，它等的是什么。

关灯的时候，剪纸在笔记本里露出一个白角。他把本子合严，放进抽屉最里层，钥匙揣好。办公室的抽屉他有三个，两个是公家的，一个是自己的。

◆

过了小雪，天门落了入冬头一场雨。市公安局三楼档案室没有暖气，纸的味道遇了潮，更沉。

二〇〇五年的命案卷宗在最里面的架子上，牛皮纸袋，棉线绕了两道，封口的钢印起了毛边。借阅要登记，押证件，管理员拿钥匙开了铁门，说，看完了原样放回去。

竺长生说，晓得。

登记笔没水了，他从自己上衣口袋摸出一支，签了名。登记本上，这一袋上一次被借走，是他自己，二〇一〇年。再往前，还是他自己。字迹换了三种

颜色。

管理员老葛快退了，端来两杯热水：三楼冷，喝口热的。说完坐回柜台后头织毛衣，毛线是酱紫色的，织了小半年了。

他问老葛，这层楼搬过几回家。老葛说，他经手的两回，他师傅手里一回。搬一回丢一回，纸这个东西，搬家就是过关，过不去的就散在半道上。

他一页一页地翻。现场勘验图，走访记录，排查名单，协查函。相纸卷了边，钢笔字洇进纸里，有几页是他自己的笔迹，年轻时的字比现在冲。排查名单上有曲健的名字，那几页笔录的页角折过，是谁折的，他记不得了。

现场平面图上，有他当年画的箭头，从门进，从窗看，从暗渠出。铅笔淡了，像一层灰。

翻到物证清单第三页，他的手指停住了。

石膏鞋模一具，三十三码。备注一行小字：登记在册，实物遗失。

再一行：二〇〇九年办公室搬迁遗失。

他打电话问当年的内勤。内勤早调去了外地，电话里说想不起来了。又问现在管保管的，保管员挠头：搬那年泡了水，扔了一批，谁想得到一双鞋模还有人要。

他又问，泡水的是哪几箱。保管员翻了翻本子：就是靠窗那两箱。靠窗。他在心里把档案室的格局画了一遍，靠窗的架子，雨天先受潮，搬迁那年先淋雨。鞋模不是丢的，是先死在窗边的。

物证没有腿。会走的从来不是物证，是人。他把这句想完，笔在纸上点了一个点。

他把清单翻回第一页，从头再点了一遍物证：黄纸一张，铁盒一只，茶篓一只，篓内红头绳一根。红头绳在。鞋模不在。少的偏偏是它。

他坐在档案室里，把那两行小字看了半天。窗外的雨点打在铁皮雨棚上，一声，一声。

三十三码。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站在河埠头的暗渠里，水位到脚踝，一步，又一步。脚印让水泡过，又让石膏收住。现在，石膏也没有了。

· · ·

隔天，他提了两斤橘子去看老宋。老宋退休八年，在家里侍弄一阳台的菊花，剪刀别在围裙上，正给一盆绿萼修枝。老伴走后他一个人住，屋里的摆设没动过，搪瓷缸还是一对。

老法医把老花镜架上，把翻拍的旧尸检照片摊在饭桌上，一张一张看。

“创角自左向右上斜。”老宋的手指点在照片上，“持械的，八成是个左撇子。力气不大，落点准，是顺手的东西，不是顺手的力气。”

“当年怎么没写进结论？”

“写了。口头汇报，你也在场。”老宋把照片推回来，“曹队说流窜作案，这些不带。人死了十年了，你们这些人的事，我不懂。”

“曹队也退了。”竺长生说。

“退了就退了。”老宋给他剥了个橘子，“案子没退。我晓得你咽不下。喏，吃。”

橘子是酸的。竺长生吃了，把核吐在手心里。橘子中有一个大的，老宋掰成两半，把大的那半递过来。两个人就着照片吃橘子，谁也没再说话。窗台上那盆绿萼开了两朵，香得很淡。

老宋家的挂钟走得不紧不慢，钟摆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是三十年前照的。老宋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说，人都齐着呢，在照片里齐着。

老宋收拾照片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案子要活过来，得有个由头。等由头的日子，比办案的日子长。上头哪天想起来，它哪天就活。

临走老宋送他到楼道口，说，竺长生，我这句话放在这儿：这案子要是有一天重活，你把照片翻出来，先看创角，再看落点。看懂了，你就晓得那天晚

上发生了什么。他说，宋法医，您这话十年前怎么不写。老宋说，写了，写在空气里。

他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宋在阳台上摆弄菊花，背驼下去，像一张拉满又松开的弓。

回去的路上雨又下起来。他在车里坐着，没有点烟。

老宋说创口走向当年描过一张图，在解剖记录后头。他回去翻了，图在，铅笔描的，淡得像烟。图上标了三个数据，两个清楚，一个让水洇了。他把能认的认出来，认不出的那个，凭记忆补在旁边，用虚线。

第二天上午，大队里人少。他把二〇〇五年的卷宗重新摊开，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钢笔灌饱了墨。

他写：持剪者：未成年，左利。

字不大，笔画很稳。写完他又读了三遍。九个字，改过两处：先写的是凶手，划掉，改成持剪者；先写的是人，划掉，改成未成年。

他从抽屉里取出私章，牛角的，磨得发亮，哈一口气，按下去。红得很匀。

按规矩，卷宗里不容这样的东西，查出来是要挨处分的。他按了。他快退了，处分追不上他几年。

其实他晓得，处分是小事。小事他才不怕。怕的是这一行字写下去，案子还是活的，人还是死的，而他能做的，只有让纸比人多活几年。

他合上卷宗，棉线绕了两道，打结，还是原来那个结的打法。

他又做了另一件事：把三十三码、左利、两个日期，抄进自己那本旧走访本，和卷宗分开存放。鸡蛋不放进一个篮子，这是老话。走访本上那个“稳”字旁边，他补了一行小字：二〇一四，十一，七。两个年头，隔着八年的纸，落在同一页上。

他算了算，这案子还剩十一年。他自己还剩几年，不好说。

小雪后第三天，柳文霞走了。肝癌，从查出来到走，大半年。消息是从牌桌上绕过来的。

竺长生想起二〇〇六年排查，她坐在云香居门口的矮凳上择菜，问一句，答一句，手一直没停，菜叶子在她指间掐得又快又齐。那时候她比现在白胖。王胖在一边搓着手，一口一个领导。

他在私人笔记本上记了一行：柳文霞，卒。

知情人又少了一个。这本账上的名字，划一笔，少一笔。他把名册从头看了一遍：曲健，火；周小奈，刀；柳文霞，病。有的名字底下画了线，有的没有。他看不出规律，只看得出，线越来越密。

他合上本子，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杯子在手里转了两圈，他又把本子翻开，把那一页重新看了一遍。有的账，看一遍是记不牢的，要看到自己都背下来。

他三十四岁接的这个案子，五十六岁还在接。接案的时候儿子刚上小学，如今儿子在武汉做医生，劝他退休。他嘴上应着，米面柜的夹层一年比一年厚。秀珍只当他囤米。

其实秀珍晓得不全，也不是全不晓得。两口子过了一辈子，谁的抽屉里锁着什么，彼此心里都有数。她不问，跟王胖不问柳文霞，是一样的事。

· · ·

夜里，他把米面柜夹层里的私人卷宗箱取出来。箱子不大，铁皮的，锁扣上包着胶布。他把箱子搬到床上打开。

现场剪纸的照片，双童奉茶，黄纸，左手刀口。鞋模的照片，他自己当年多洗的一套，边角让潮气泡黄了。曲健的剪报，二〇一〇年，广州，灯饰仓火灾，一死，日期用红笔圈过。昆明的协查通报复印件，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死者周某。一页走访笔录的抄件，毛慧芳老师的话：像两扇关紧的门。

每一样他都记得来历。照片是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洗的；剪报是托广州的同行寄的，信封上贴了两张邮票；协查通报用的是办公室那台旧复印机，第一张淡了，这是第二张。

最底下，是上个月湖边台阶上的那张剪纸。

他把它们在床上摊开，摊成一床。哪一张跟哪一张该缝在一起，他还不知道。可是针脚都在。

他把东西两两之间搁了一支铅笔，量它们之间的距离。纸上不到一拃，案上是十年。

他把那张新剪纸翻过来，对着台灯又看了一遍刀口，再放回原位，让楼朝着上，压着那个人。楼上九层，人只有指甲盖大。他把台灯拧暗了一格，人就更小了。他又把灯拧回原样。有些东西不能看小了，看小了，心就松了。

他把二〇〇六年的走访本也翻出来，摊在枕边，那个“稳”字向着天花板。

秀珍起夜回来，开了灯，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

“你这是纳鞋底啊？”

“嗯。”竺长生把鞋模的照片挪了个位置，让它跟剪纸挨着，“纳了十年了，还差一只鞋。”

秀珍看了他一阵，什么也没说，把他的降压药和半杯温水搁在床头柜上，替他把毛巾被拉上来一角。她说，小江今晚来电话，说过年带孙子回来。他说，好。秀珍说，你就一个好字。他说，那说两个，好，好。秀珍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关了灯。

两口子多年养出一个习惯：夜里的灯，谁先睡谁关。这些年几乎总是他后睡。秀珍有时半夜醒，看见门缝底下透出一线光，也不起来，翻个身接着睡。这线灯光，家里人都当它是长明的。

黑暗里，纸在床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像谁翻了个身。

◆

二〇一五年开春，漳州的雨下了半个月，城郊这条土路上，香蕉叶子让水洗得发亮。

骆驼三十二岁，本名没有几个人叫。前些年在厦门做茶叶批发，赶上了行情，也压错了行情，一仓库中端毛茶，价格一年掉一半，最后论麻袋出的手。账还挂着一半，老婆走了，就剩他一个人。

经标哥介绍，来给一个东家管仓。标哥说，事不重，钱干净，就是话要少。

见东家是在石码镇的大排档。那人很年轻，戴一顶鸭舌帽，皮肤白得晃眼，一顿饭没说满十句话，吃的是素面，不喝酒。结账的时候他数钱，点得极快，指头都不带停的。

骆驼那年三十二，看过的人不算少。他心里给这人划了三条：不贪杯，不贪话，手上有准头。有这三条的人，做什么都做得成，就看你做什么。

散的时候骆驼伸手想握一下，对方把两只手都插在兜里，冲他点了点头。

条件是标哥代讲的：月薪现金，十五号发，管吃住，仓里的事不过夜，嘴要干净。

骆驼说，中。

到仓的第一夜他睡值班房，床板一翻身就响。后山有野猪叫，老柯说，习惯了就好。他后来果然习惯了，听见野猪叫，翻个身接着睡。头一个月他夜里总醒，醒来看窗外，院墙上的监控红灯一闪一闪，像有人在暗处抽烟。后来他明白了，红灯是死的。

值班房里有一张旧桌子，抽屉里留着罐头厂工人的东西：一副线手套，半盒图钉，一本没发下去的考勤册。他把考勤册翻过来，在后头记自己的流水账。字歪，但一笔一笔都写满。

仓在城郊，旧罐头厂改的，一围院墙，墙头爬着牵牛花，门口装了监控，三个角各一个。后院三间大房，门后用毛笔写着规矩：不拍照，不外传，十一月十八休工。字很瘦，一笔是一笔。工友的手机进门锁进布袋，编号，出门再领。

头一间是洒水间，工友都管它叫渥堆间。外省拉来的毛茶堆成小山，大货车挂外地牌照，夜里来，蒙着布。院里有一口老井，井台的石头让麻绳磨出两道深槽。井水烧开，晾温，一把一把洒上去。水要匀，洒急了烂堆，洒轻了不转色。塑料布一蒙，堆心插着温度计，五天一翻堆。

翻堆用木耙。从堆底翻上来的茶冒着热气，气味一天一个样：先是青气，后来转酸，酸透了，泛出一股沉沉的陈味。翻堆那天气味最冲，往骨头缝里钻，衣服上洗三水都带味。老柯在这个间里干活，做着做着就咳，咳完了接着干。

东家每隔几天下到堆边，抓一把茶，捻开，凑到鼻子底下，再放回去。他从不说好，也从不说不好。

配茶的时候他不用嘴说。他拿铅笔在纸上写：七分做色，三分做味。骆驼问哪七哪三，他不说，把纸折起来烧了。

仓里不留账。进出全在纸上，纸用完就烧。骆驼管自己的流水，记得自己那一份就行。有一回他多问了一句，这个月出了多少饼。东家看了他一眼，说，你的是你的，仓的是仓的。从此他只记自己那一份。

账他记得平。心里那本账，他记得更平：谁多拿一把茶，谁多印一张纸，他都看见，也都不说。这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护身符。

出堆的茶摊晾，上蒸炉软化，倒进铁模，石磨压下去，一只只圆饼码上晾架。骆驼站在旁边看过一回，这跟老茶号的作法没什么两样，只是年头是捂出来的。蒸炉上白汽腾腾，铁模烫手。翻饼的夹子是老柯自制的，竹柄，用了十几年，油亮。一炉十二饼，一天四炉，码上晾架的时候，老柯挨个敲一敲，听声。

有一炉茶出来，声不对，老柯皱着眉敲了三遍。东家过来看，捏起一角，掰开，里头的芯还青着。他把那一炉扣下，单独堆回渥堆间，多焐了十天。十天后开堆，声对了。整个过程他没说一句话。

那一炉茶后来还是出了仓，混在好的里头，谁也挑不出来。骆驼问过老柯，那十天里东家翻了几回堆。老柯比了个数，三。骆驼不吭声了。等人来查的时候，谁会问一炉茶多焐了十天呢。

骆驼问老柯，这算做茶吗。

老柯把木耙拄在下巴底下：茶跟人一样，捂一捂，就老了。

第二间染纸。棉纸一刀一刀码在架上，整刀整刀地从云南发来。大锅里熬茶汤，茶渣再熬三遍，熬到色如酱油。新纸浸进去，提出来，阴干。干到七成，用手把纸揉出折痕，一道一道，折痕里颜色沉下去，像经了几十年的手汗。有的纸边还要点一点茶油，烘出深浅不一的油斑。阴干不能见日头，见日就翘边。

染纸房的门口挂两道棉门帘，帘子让茶汽熏成深褐色，进门先闻见茶香，浓得化不开。干完活出来，指甲缝里都是茶色，怎么洗都在。

女工大姐的手比纸厚，揉出来的折痕却比谁都匀。她说她揉的不是纸，是自家晒的萝卜干，道理是一样的。东家那天在场，听完点了点头。

发工钱那天，女工大姐的信封果然厚一点。她当天下午买了一挂香蕉挂在染纸房门口，谁路过谁吃。香蕉熟得快，黄了两天，就没有了。

第三间摆着两块梨木版。小的刻内飞，大的刻大票，字全是反的。印的时候拿茶汤调“墨”，棕刷一扫，纸覆上去，手掌压匀，揭起来，字像从旧纸里自己长出来的。内飞压进饼身里去，大票贴在饼面外头，一套一套，配得整整齐齐。

版的保养每月一回，上一遍桐油，油要薄。版背刻着两个字：不动。骆驼问过一次，版为什么不换新的，刻得再好也有磨损。东家拿铅笔写给他看：版老，字才老。写完把纸递给他，纸角折了一道。

版是东家自己刻的。有一天下午，骆驼看见他对着窗光补刀，手腕悬着，走刀极稳。刀口走向像剪纸，左边下刀。那一双手很白，不像做工的手。

收刀的时候，东家用拇指肚在刀刃上轻轻蹭了一下，试锋。骆驼看得头皮一麻。那一下，快，稳，不当回事。

骆驼后来试着用过一回那把剪刀，剪包装箱上的封绳。剪刀到手里才知道沉，刃口咬得住绳，不滑。他剪完，把剪刀按原样放回去，刀口朝里。

骆驼跟了他大半年，没见过他的整脸。有一回他摘了帽子挠下巴，那皮肤白得像纸。

东家给过他一沓单子，让他锁进铁皮柜。单子上盖着香港公司的章，一来一回，这批茶就成了从香港回流的茶。仓里有的是湿气，纸上有的是故事。骆驼看不大懂，也没有问。

有一回深圳来电话，是仓里那部座机响。东家接了，声音压得很低，骆驼隔着两步，只听清两个字：规矩。挂了电话，东家把座机的线拔了，拔完看了看线头，又插回去。第二天仓里添了条新规矩：打电话去外头，要么到镇上，要么不说。

每月十五，信封拿回来，他寄一半回去还账。剩下的钱存了一张卡，卡贴身放着。老柯笑他攒不住，他也不辩。仓里来来去去四个工友，走的时候，谁也没跟东家红过脸。

东家每周泡一回样，请老柯和骆驼喝，问一句：年份上，看得出破绽吗。两个人都说看不出。他就点头，把剩下的茶自己喝完。工友里没人见过他喝醉，也没人见他笑过。

入了秋，茶坯出仓，女工们戴着口罩分筛，筛出来的茶汤色一天深过一天。女工是附近村里来的两口子，阿灿是标哥的外甥，蹬三轮送货，一趟一趟，车斗里垫着蛇皮袋。院里养了一只猫，谁来了都睡，就是见着生人不挪窝。猫是阿灿从镇上抱来的，来了以后只认东家，别人喂它才吃。老柯说畜生认生，骆驼说，畜生认的是不出声的人。

吃饭的时候，东家自己另泡一壶自己做的茶，慢慢喝，从不评价，喝完把杯涮干净，倒扣在桌上。

· · ·

十一月十八，仓里歇工，门口那行毛笔字写的。傍晚骆驼去镇上打了酒，回来吃了几口就躺下了。后半夜起夜，看见印版房亮着灯。

门缝里，满地纸屑，白花花的，像下了场小雪。

东家坐在纸屑中间，背对着门，帽子也没摘。剪刀声很轻，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骆驼退回去，连咳嗽都忍了。他躺回床上，听着自己的心跳，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小时候看人写春联，也是这样，一下，一下。

第二天他照常开门，布袋编号，收手机。东家在院里站着，手里捏着一小片黄纸屑。风一过，纸屑飞了，他看着它飞过墙头，才回屋。

天亮以后，地上扫得干干净净，院角的灰桶里多了一层纸灰。谁也没提这件事。那天东家照常泡茶，骆驼看见他右手背上有一道细口子，纸割的，很浅。

骆驼问过标哥，那天为什么休工。标哥说，东家的家事。又说，你的规矩里没有的一条：这天别打电话。

过了几天，收工饭加了个菜。老柯喝多了，说明年想回老家盖房，问骆驼，东家这仓能做几年。骆驼说，问我不如问纸。桌上都笑，只有阿灿没笑，阿灿在算他姨父给的红包。老柯又说，骆驼，你信不信，东家这个人夜里不睡觉。骆驼说，哪有人不睡觉。老柯说，那你见过他打呵欠吗。骆驼想了想，真没有。

饭快吃完的时候，骆驼喝了两盅，问：老板，老家哪里的？

东家正在收剪刀。那手停了半秒。

“湖北，一个出茶圣的小城。”

骆驼“哦”了一声，没有再问。这是他自己的规矩：吃这碗饭，不问来处。嘴上不问，心里那杆秤晃了一下。出茶圣的小城，他念过书，晓得是哪里。他把那口酒喝完，压下去了。

那晚他睡得晚。他把信封里的钱数了两遍，数完把明年的打算想了一遍：账还清，就回厦门。这个仓是别人的，账是自己的。想完了，他吹了灯。

他想起头一回进仓那天，老柯指着三间房给他介绍：一间捂茶，一间捂纸，一间捂字。他当时听了直笑。现在他不笑了。三间房，捂的全是年头。

仓里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天热了，渥堆间的温度计往上走，翻堆改成三天一回；天凉了，再改回来。工友换了一茬，规矩一条没换。骆驼有时觉得，这仓里最耐放的不是茶，是那三条毛笔字。

他把这三条也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完，在底下添了一条自己的：钱要数两遍，话只说一遍。这是他在厦门赔出来的教训，比东家那三条，值钱多了。

窗外，甘蔗地里的风声一阵高过一阵。渥堆间的塑料布鼓起来，又伏下去，像什么东西在底下缓慢地呼吸。

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厦门那间仓库，卷帘门拉了一半，外头是海。醒来雨停了。院墙上的牵牛花开了一茬，蓝的，紫的，贴着监控的架子往上爬。骆驼站在院里看了半晌，觉得这院子比昨天旧了一点。

◆

二〇一五年秋，广州，琶洲的展馆里人声像涨潮。

茶博会一年比一年大，名山的名字挂满了各个展位，金字的，红字的，都说是古树，都说是纯料。简明堂被让到贵宾席上，半盏翁这三个字在行里值钱，他坐到哪里，哪里就围一圈人。

他今年六十七，头发白了大半，手上的茧比年轻人的还厚。徒弟拎着布袋跟在后面，替他背茶样。

开幕第二天，主办方请他做讲座，题目是他自己定的：老茶辨伪十条。全场爆满，过道里站着人，会场外有人在退票，说明年再来。黄牛把票炒到三倍，简明堂听说了，让主办方下一场换大教室，不要门票。

他讲纸要看折痕，讲汤要看活气，讲仓味和陈味怎么分，讲叶底是茶的最后一张嘴。台下记笔记的手一片。

讲座末尾有人提问：最难造的假是什么。他说，最难的不是做旧，是做出被岁月善待过的样子。满堂掌声里，他看见前排一个穿布衫的中年人没有鼓掌，低着头在记笔记。

“千羡”的展位不大，米色的布，一张条案，一座小屏风。屏风上讲着一个故事：香港老仓封存五十年，主人后人不识茶，如今整体回流，统售天下。

棉纸茶饼一列排开，签上写着：五十年陈，千羡熟普。

沸水一注，汤色红浓透亮，像琥珀里点了一盏灯。药香先起来，樟香压在底下，一层一层往鼻子里走。围看的人越来越多，快门声噼啪地响。

主事的是个穿布衫的中年人，口音像广东，又不太像。有人问年头，他说仓单可查；有人问来路，他说香港律师行作保；有人问工艺，他只说四个字：传统港仓。话不多，一句是一句。

头一泡让到简明堂面前。他上手先捻棉纸：纸旧得发哑，脆而不酥，折痕里沉着经年的茶色，油斑深浅有致。他心里先赞了一声。入口，汤滑过喉，喉底回甘，凉了半截的秋天又暖回来。

“好茶。”他说。

主事人躬身：先生过奖。

他把杯子放回原位，杯底的茶渍在灯光下转了一个圈。主事人添水的手很稳，滴水不洒。他多看了那只手一眼。

半盏翁的一句话，比任何广告都贵。当天下午，这批“五十年陈”被经销商押着全款订空，后来的人抱着现金排队，排到展位外的通道里。有人举着验钞灯照棉纸，紫光底下纸面泛着旧旧的黄，人群里一片啧啧声。有人订货加钱，只要一张仓单复印件，拿回去好对东家交代。

有个年轻人挤到桌前，问能不能赊账，过完年结清。主事人没恼，笑了笑，指了指墙上的牌子：现金或转账，当日结清。年轻人讪讪地走了，走到通道口又回头，看那张价签，看了很久。

徒弟在小本子上记：千羡，特号货，订空。

回程的车上，简明堂闭目养神，徒弟汇报今天的见闻，说到“他们连虫眼都有”的时候，他睁开了眼。他说，你记下来，今天的话里，这句最有用。

徒弟又问，那十条里，为什么叶底排第一。他说，纸和汤都能装，叶底装不了。茶死没死透，捏一下就晓得了。人也是，话说得再圆，手上的茧说不了谎。

夜里回酒店，他躺着，眼前又过了一遍那张纸。

旧得太匀了。

真老纸的旧，该是不均匀的：日晒的地方褪，手摸的地方亮，边角的地方酥。匀，是养出来的。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很细，扎在很深的地方。他翻了个身，没有去拔它。行里的老话，人家的茶又好又体面，你管它年头怎么来的。

可是他睡不着。爬起来给香港一个老友挂电话，问有没有听说过一家封存五十年的老仓，字号千羡。老友说，没有。香港哪有五十年的私仓，战后盖起来的楼，撑不到那么老。

纸骗不过楼。

他又给东莞的老友打过去，问那两饼货走的是谁的路子。老友说，中间隔了三道手，头一道就断了。他说，断了是故意的。老友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说，老简，你少管。他说，晓得了。挂了电话，他晓得自己不会少管。

睡是睡不着了。他披衣起来，在本子上画了一张表：左头写老茶该有的样子，右头写对方做出来的样子。两边一对照，像照镜子，镜子里那张脸比真人好看，好看得不像岁月给的。他把白天讲座那十条默背一遍，逐条写下：对方会怎么做。写满两页，最后一条是，叶底最难瞒。写完他自己笑了，像替对手下棋。

下到后半夜，他把信纸折起来，夹进随身的笔记本。本子里有一页写于十几年前，记的是老师傅教他的头一条规矩：茶是拿脚走的，不是拿嘴吹的。他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一道线。

· · ·

三个月后，腊月的汉口。一盏楼里生了炭炉，窗上全是水汽。

东莞的老友转来两饼茶，同一批货里挑剩的次品，不知怎么流了出来，行里叫二号货。老友在电话里说，便宜，收着玩。老友是当年在广州一起学看茶的，后来各走各路，他做仓库，简明堂看茶，三十年了，逢年过节通个电话。

简明堂烧水，撬茶，醒罐，一样一样来。干茶香是浮的，香在嘴上，不到喉咙。汤色够深，可是浊，像掺了半勺米汤。咽下去，喉底发紧，回甘是硬挤出来的。

叶底他用手捏：一捏就烂，像搁了三天的熟青菜，没有筋骨。五十年的叶底，该烂而不断，有活气。这饼茶，纸在替它说话，茶自己说不出话。

辨伪十条，他一条一条在心里过。叶底，破绽第一条。又看饼形：窝口是机器压的，规矩得过了头，签上却写着石磨手工。第二条。剩下八条，纸、墨、油斑、虫眼、折痕、汤色、仓味、故事，一条都没有破。做假做到八条不破，这不是生意，是手艺。

他把两饼茶全拆了，纸摊开在案上。徒弟在旁边记，他说一条，徒弟记一条。

茶色浮在纸面上，折痕里反而是净的。大票是木刻版印的，墨色匀得反常，像机器的事，又带着手工的稳。

拆到内飞，他用针尖挑出来，对着灯看。内飞的纸更薄，字更小，豁口也照样有。他把两张内飞并排放下，像一对孪生的证物。

针尖挑内飞的时候他屏着气。内飞嵌在饼身里，取出全凭手上那点分寸，重了破饼，轻了不脱。徒弟在旁边看，大气不敢出。他挑完，把针搁下，说，这门手艺，他们也有。

他取了放大镜。

光圈底下，“羡”字第三笔上有一道细小的豁口。他又从柜子里取出别人送看过的两张同路货，翻到大票，同一个位置，同一道豁口。

版的伤，就是版的胎记。

他用铅笔把那道豁口拓在拷贝纸上，装进牛皮纸袋，袋上写：癸字第一号。

他又在放大镜底下看纸。做旧的手太讲究了，讲究得像作品：该脏的地方脏，该亮的地方亮，连虫眼都咬得有章法。他做了四十年茶，见过造假的手，没见过这么有耐心的手。十条里挑得出两条破绽，已是难得；剩下八条，是照着老茶号的家底，一条一条做出来的。

他把那两饼次品包好，又从柜子最里头翻出自己存的一饼真老茶，隔着绵纸掂了掂。真的那饼轻，轻得像睡着；假的这饼沉，沉得像醒着装睡。

徒弟问，师父您怎么分。他说，上手。手上没有的话，嘴上一定有。

他从柜子深处取出一页真正的老票，五十年代的，活字排印，纸的毛边是岁月啃出来的。新老两页并排放着，像两代人。他让徒弟把两页纸拍照打印，贴在柜门内侧。徒弟问为什么贴柜门里。他说，开门就看见，关门也想着。

他把徒弟叫来，让他去芳村分头收货，每一批留样，牛皮纸袋编号，锁进柜子。柜子分两层，上层放真的，下层放疑的。他说，往后这个柜子，会比我

们任何一个人都活得长。

徒弟问，师父，要不要报官。

“先弄清楚，人家的手艺到底有多深。”

徒弟又说，师父，您今年六十七了。他说，所以让柜子长。徒弟不说话了，把柜子的钥匙串接过去，挂在了一盏楼最老的钉子上。

临走徒弟说，芳村的线我托了师弟，收货的时候只看不动。他说，对，只看不动。摸得越多，破绽越少；问得越多，人跑得越快。

他说这话的时候想起一个人。三十年前汉口也有一个造假的手，做高古瓷的，手艺比他还好，后来进了班房。进去那天那人只问了他一句：简先生，我错在哪。他没答上来。这件事他记到今天。

简明堂把放大镜装回丝绒套子，炉上的水正好开了。

“有人在铸造历史，铸得比真的还讲究。咱们这行，往后要跟造假的手艺人拼手艺了。”

夜里的汉口下了点雨，长江上过船的汽笛声很远。他站在一盏楼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楼的影子安安稳稳趴在原地。新造的历史到处走，老的历史趴在原地，他要看的，是会走的那个。

◆

二〇一五年，武汉的秋天很短。从珞珈山到狮子山，隔着一片南湖和三趟公交。

蔡诚认识穗，是二〇一〇年的夏天。两家母亲早年是牌友，在云香居坐过对家。他妈提过一句：穗的生母牌品好，输了不赖账。就这一句，再多没有了。

那个夏天的一顿饭，两位母亲说话，两个孩子吃菜。散席的时候他妈说，以后在城里，有个照应。穗跟着她养母，管他妈叫唐老师，叫得自然，他妈高

兴了好几天。他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唐老师挑的日子，两个孩子都放了假，两个母亲都方便。唐老师做事，向来是这样，不着痕迹。

此后是点头之交。高中三年，两个人不同校，只见过四回，都是母亲们安排的。第五回没有安排。那是大学头一年的秋天，武大的银杏黄了，他在图书馆门口看见她，她抱着一摞书站在台阶上问路。他说，你问吧，我闲。她说，往茶学实验楼怎么走。他说，坐我的车，我顺路。他那天骑的是借来的自行车。

后来他问过她，那天为什么问路问到他。她说，台阶上那么多人，你手里的书和我包里的书，是一本。他低头想了半天才想起来，那天他抱的是《茶经》的课外读物，图书馆三楼同一格书架上取的。

真正开始，是那年冬天。他在华农茶学实验楼底下等她，从六点等到九点，中间点了三支烟，又都掐了。她出来，手里端着一杯刚出锅的茶汤，塞给他捂手。杯子烫，两个人就那样站着，谁也没说为什么。

这两年，两个人处得像一家人。

她给他定过很多规矩：过马路牵左手；手机晚上十点以后不许打，除非急诊；她做的茶样，第一泡不许喝，要闻。他都照办。他妈知道了，说这姑娘管人有一套。他说，不是管，是省。省下解释的工夫，两个人都轻松。

她也有省的时候。她从来不说累，不说烦，不说夜里做没做梦。他问她什么，她都答，答得都对，只是不多一个字。

两个人也有吵的时候。吵不起来。他嗓门刚起来，她就看着他的领口，不看他眼睛，等他声音落下去，才说，说完了吗。他说，说完了。她说，那我洗碗。这事就算过去了。

穗的日程表精确到一刻钟，写在一个硬壳本子上，从来不用手机记。几点起床，几点进实验楼，几点给茶样换水，几点回他消息，本子上排得像列车时刻。字是竖排的小楷，一笔不苟。她做感官审评的记录本他翻见过一回，一页

纸上画着表格：香、汤、味、韵，四栏，每栏打分。他看得眼晕，她说，你睡吧，我记完这一页。

他生日那天，本子上写着：蔡诚，十九点，蛋糕取货。他看了直笑，她把本子抽回去，说，笑什么，误了取货要罚。

罚是真罚。有一回他迟到二十分钟，她罚他背《六羡歌》，背不下来不许吃饭。他在她宿舍楼下背了一下午，她坐在台阶上剥橘子，一瓣一瓣，剥得很慢，等他背完，橘子也剥完了，一瓣没让他吃。他说，你不讲理。她说，嗯。他后来跟人讲起这一段，人家都说他媳妇霸道。他说，对，霸道。语气里没有半点委屈。

只有一天例外。

十一月十八，她的手机整天关机。头一天晚上打过去，是关机提示音；第二天再打，通了，她的声音没有任何异样，像昨天没有被要求解释。刚在一起那年他问过一次：昨天怎么关机了。

她说：家忌。

两个字，像把门轻轻带上了。他没再问过。后来他翻见过那个本子：十一月十八那一页，从头到尾，一个字也没有。

又有一年，他在日历上把十一月十八圈出来，想着那天约她。到那天，她自己先打来电话，说，明天见。他捧着手机愣了半天，她怎么晓得他在想什么。后来他想通了，不是晓得，是她也在躲。

他想过去问她一次，那些年到底躲什么。话在心里过了很多遍，一句也没出口。恋爱教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些门，你越敲，关得越紧。

他鬼使神差在网上搜过她的名字。只搜出一条二〇一一年的旧新闻，配图里的小姑娘捧着奖杯。又搜“小茶仙”，还是那一条。当年贴吧里有一些帖子，盖到几百层，后来全删了。微信里有她，朋友圈一条也没有。像一个人在世界上只留了一道影子，脚印全叫人扫掉了。

他把搜索框里的字删掉，删到最后剩一个穗字，光标在后面闪。他盯着看了一会儿，也删了。

他旁敲侧击问过她华农的同学。都说她人好，就是不合群。宿舍四年，墙上只贴过一张课程表。课程表是打印的，四个角用图钉钉得端端正正。他想象不出她的宿舍，就像想象不出一间没有生活痕迹的样板间。

有一回她病了，重感冒，三天没去实验室。他买了药去看她，她隔着门缝把药接过去，说，睡了，你回吧。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下楼给她发消息：药挂在门把手上了。过了一会儿，门里传出很轻的一句：谢谢。他听得见，因为她就站在门背后。

他把这些归结为家教。书香门第出来的女孩子，规矩重。他甚至有点喜欢这个。

他妈让他带她回家吃饭。她带了两盒茶当礼，进门先给蔡家祖宗牌位鞠了一躬。他妈说，这孩子礼数重。走的时候她把茶盒放在鞋柜上，不放在桌上，说茶要立着放。他妈后来学给牌桌上的姐妹听，姐妹们都说，到底是做茶人家的孩子。

饭桌上她话不多，但每一筷子都往他妈碗里搁过一样菜。他妈后来总提这顿饭，提了三年。

· · ·

十一月底，武大老图书馆的暖气不足，窗玻璃上凝着雾。木楼梯走上去咯吱响，绿罩台灯一盏一盏亮着。管理员在门口织毛衣，认得他俩，抬抬下巴就算验过证。

蔡诚提前去占了她惯坐的那个靠窗的位子，把自己的书摊开占着桌面，等她。

等人的时候闲，他抽了她书包里露出一角的那本《茶经》抄本。

竖排小楷。他原知道她抄《茶经》，抄了很多年，进度很慢，一年只抄几页。靠前几页的字色深些，越往后越新，纸页间有几处压出茶印的痕迹，是夹过干茶又取走了。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扉页，手停住了。

扉页的夹层上，贴着一张剪纸。

两个小人牵着手，站在一棵树下。纸黄得很旧，边上毛着，剪树枝的刀口又密又匀，一棵树剪出几十根枝。两个小人没有五官，手却牵得很紧，牵得比任何五官都用力。

树是那种老式的树，枝干盘着长，像公园里才有的树。两个小人站在树的正面，脚底下剪了一排短短的草。草是黄的，人也是黄的，纸黄到这个地步，就只剩下剪痕还是黑的。

那纸的颜色，比穗的年纪还要老。

他想问纸怎么老成这样，话到嘴边，又把这句安慰自己的话咽了回去，喉咙里有点干。

楼梯口传来脚步声，很轻，节奏他熟。穗走到桌边，看见他手里的本子，看见他抬起来的脸。

她伸出手，把本子从他指头底下轻轻合上了。不快，也不慢。

“好看吗？”她笑。

“谁剪的？”

“一个老朋友。”

他说，能给我看看吗。她已经把帆布包的拉链拉上了。拉链的声音很短，像一句答非所问的话。

她把本子放进帆布包。包的提手上缠着一截红绳，旧得发白。

“走，吃饭去。”她说，语气平常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那天下午两个人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她做她的题，他看他的书，台灯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同一面墙上，中间隔着书立。

回去的路上他两次想开口，两次都咽了。她提着帆布包走在半步前，包随着步子一晃一晃，那截红绳在暮色里一跳一跳。

那天晚上他们在校门外吃的砂锅。她说实验的事，说下个月的茶样，说了很多。他数过，她一顿饭最多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一个也没问。他讲了他姨妈家装修的事，讲得很细，她听着，给他添了两回汤。蔡诚嗯嗯地应着，一直觉得砂锅不够烫。

砂锅店的电视里放着本地新闻，说天门茶文化节筹备的什么。他看她，她也在看那台电视，看了一小会儿，转回来，继续给他舀汤。

她说她毕业以后想开一间自己的茶室，就开在天门，西湖边上。他问，怎么算回家。她舀汤的动作顿了半秒，说，就是回家。他没问，她也没再说。

回家的公交上她靠着他睡着，到站都没有醒。他把她送到楼下，看她上楼，灯亮了才走。自行车棚里他的车胎瘪了，她蹲下来帮他把气打足，打气筒一下一下，很匀。他站在旁边看，忽然想起小时候看人补锅，也是这样，不声不响，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找出来。

气打足了，她把打气筒照原样挂回车把上，挂得很正。他后来每次看到那个挂法都会想起那晚。她的好，都是这样，一声不响，挂在最顺手的地方。

回到宿舍，他在台灯底下写日记。

十一月二十七日，晴。今天翻了她的抄本。那张剪纸，纸比她的年纪还老。她说“老朋友”的时候，是我认识她五年来第一次，声音有点哑。

他笔尖停了停，又添了两行：

她要开茶室，开在西湖边上。这笔账我在草稿纸上算过，门面、装修、周转，不是小数。我算得心热，想快一点毕业，快一点挣钱。

她要开在西湖边上。她说“就是回家”的时候，勺子在碗里停了一下。

我没有敢再问。

十一月过完，她给他织了一条围巾，藏青色，针脚密得像机器打的。他围上，她说，丑。他说，丑也围。她伸手把他围巾的褶子抻平了。那一晚的日记他只写了一句：围巾很暖，她说丑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的。

写完他忽然又想起那本《茶经》抄本。扉页上那两个小人，站在树底下，也是那么站着的，一个的影子靠着另一个。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想起这个。他把台灯关了。

◆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天门办陆羽茶文化节，主会场设在茶经楼前广场。

大队里点了他做安保顾问。这差事他推过一回，队里说，您不带带年轻人，谁来带。他就应了。经验这东西，写在纸上不值钱，站在广场上才值钱。

带的第一个年轻警察问他，师父，安保图上为什么要标暗区。他说，灯照不到的地方才出事。你要是只相信灯，就只看得见灯给你的东西。

他提前三天把广场走了一遍：几个出口，几处高点，舞台的电缆从哪里过，消防通道停着几辆车，他画了一张草图交到指挥部。草图是铅笔画的，一比五百，出口用实心三角，暗区打斜线。指挥部的小年轻拿去复印，复印出来的人都说，这张图比专业的还清楚。指挥部说，照办。

广场的井盖他掀开看了三处，文化节前市政刚检修过，封条是新贴的。舞台后侧的配电箱上了锁，钥匙在谁手里，他问了三遍才问明白。

应急预案会上，年轻人讲屏幕，讲对讲机，讲人墙。他坐在最后一排，散会时只说了一句：楼梯口别堆东西。会场上笑，他没笑。

演练那天他站在楼门口掐表，人流从九层下来，到广场集合，七分半。他一个人又走了一遍楼梯，从九层往下。楼梯间没有灯的地方一共十一处，他让电工装了八处应急灯，剩下三处，写进了安全须知：人多时不要跑。楼梯拐角有个烟头，他弯腰替人踩灭了。

把这些做完，他给蒋阔发消息：楼梯间的灯装好了。蒋阔回了一个敬礼的表情。他看着那个表情笑了一下，把手机揣回兜里。带过的兵里，蒋阔是最像他的一个，也最不像——蒋阔敢往前冲，他这些年，只会往回看。

开幕前一天，蒋阔来找他，递过来一份复印件。二〇一〇年广州那场火灾的协查回函，备注栏里一行小字：起火点位于无电路之堆仓，排除电气原因。

“师父，文化节要整理消防案例，我翻档案翻着的。”蒋阔说，“函在广州一个区里躺了五年，当年经手的人早调走了。这行字，没有人细看过。”

蒋阔又补了一句：起火点为什么叫堆仓，我查了，是当年堆灯饰纸箱和海绵的仓。海绵。竺长生把这两个字接过来，放在心里压了压，没有咽下去。

蒋阔今年四十，眼角有了纹，公文包的提手换过一次。他给师父泡了茶，把烟推过来，竺长生摆摆手。

竺长生把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电路的仓，火从中间起来。

“收好。”他说。

蒋阔临走说，师父，您那本子借我抄两页。他说，抄可以，拿走不行。蒋阔笑：晓得您的规矩。

蒋阔走后，他把那行小字抄进自己的笔记本，抄完，看了半晌，没有添一个字。晚上他把回函的复印件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拿一张白纸盖住上半截，只露那行小字，看了很久。整张函上还有一行抄送的地址，他也抄进了本子。

开幕那天，天阴，风从湖面上来，不冷。广场上论坛、签约、少儿茶艺，一茬接一茬。广场东侧搭了两排棚子，一家卖茶器，一家卖组委会的纪念饼。纪念饼的棉纸崭新，纸色白得扎眼。他拿起来看了看饼面的字，又放了回去。

卖纪念饼的姑娘问他要不要，说开过光的。他说，茶不用开光，茶自己就是光。姑娘愣了愣，笑了，说你讲话像我们老师。他说，我就是个老师傅。

观礼席上，竺长生挨着唐韵秋坐。老太太六十九了，围一条酱紫色的围巾，腰板挺直，手笼在一个黄铜手炉上。

开演前老太太同他说家常。念庐的枇杷今年结得好，摘了两筐，送了街坊。又说她批了三十年作文，批出来的毛病只有一种：不肯说真话。竺长生说，那您是见过真话最少的人。老太太笑出声，说，竺同志，你这张嘴退了休可惜。

又指着楼说，这楼盖起来，陆羽就不用在书里住了。

节目单印得很讲究，特邀嘉宾一栏里写着：茶艺表演《六羡》，唐穗。

他把那页折了个角。折角是老习惯，读档案折角，看节目单也折角。折过角的地方，他一定回头再看一遍。

台上在走场。唐韵秋看着台上，忽然开口：

“这伢的爹妈都走在她前头。命硬。”

语气平平，像在说天气。竺长生听出来了，这话不像她自己的话，像从别人嘴里借来的，借得久了，就成了她的话。

他想起卷宗里的走访记录。城里的闲话，当年就有：茶行老板娘的闲话，拣茶女人的闲话，如今轮到一个二十岁的姑娘。闲话不挑年纪，只挑够不着的人。

老太太接着说，闲话也是一种记性，比档案活得长。他侧过头看她，她看着台上，脸上的褶子在风里松松地搭着，看不出这是抱怨，还是叹服。

台上放彩排礼花的声音闷闷地响了两声。老太太的手炉换了一只手，又说了一句：人老了就爱看年轻人做事，看着看着，就忘了自己也没多远了。他说，您这话说得像诗。老太太说，教语文的，张嘴就是。

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像是说给竺长生，又像是说给自己：

“那年她一身白衣裳站在我面前，我以为是孝，后来才晓得是干净。”

老太太说完，自己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了。

《六羡》上场。大屏幕上，那双手起落如常，水线不断。台下的掌声一浪压过一浪，鸽子绕着楼顶飞了一圈，又落回去。

台下有个孩子问妈妈，为什么她的手不动也能把水倒出来。妈妈说，练的。孩子说，我不信。

表演完，唐穗下台，先到观礼席给几位老者奉茶。奉茶的顺序按长幼，一位不错。到了竺长生面前，她躬身，注水，出汤，杯放到他手边，杯柄转向他顺手的一侧。

“这是竺警官。”唐韵秋说，“当年去过念庐。”

唐穗把壶收进素帕，退后半步，微一躬身，下去了。自始至终，脸上带着得体的笑。

竺长生说了声谢谢，声音让军乐吃掉了。茶是本地秋茶，烫，香。他很多年没有喝过这么正的一杯本地的茶了。他端着杯子没有立刻喝，台上谢幕，灯一层一层灭，杯子里的热气往他脸上飘。他喝了一口，把杯底的茶喝干净了。

唐韵秋把那杯茶端起来，慢慢喝完了，把杯子递给身边人，说，托人捎话，让司机把车开到东门。走的时候，她朝竺长生点了点头。她的车从东门出去，汇进人流，车窗摇下来一条缝，一只手伸出来，挥了挥，不知是挥手，还是赶什么。

散场后，单位的车要送他，他摆手，说走走。

他没有走正门，绕到楼的北面。

穿过后场的时候，撤台的工人开始收电缆，一捆一捆从台上放下来，像给楼解鞋带。有人在喊编号，有人在拍打围挡上的灰。他从人缝里穿出去，拐上后头那条小路。小路是施工留下的便道，白天走材料，晚上没人。路面上的石子让雨泡松了，踩上去咯吱响。他把脚步放轻，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轻。

北面没有灯，楼影铺了半个院子，比夜更深一层。白天的人声隔在楼那一面，这里只有风，风里有一点湖腥气。配电箱、电缆盘、几块没拆完的围挡板，都靠墙立着。

墙根有一小堆烧过的纸灰，让风拢着。灰边有一小片没烧透的黄纸角，那个质地他见过。他没有再蹲下去，站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影子里，有人在扫台阶。

看不清人，只看得见扫帚划地的弧光，一下，又一下。不紧，不乱，每一下的宽窄都一样，像量过了。

他听出扫帚的走向：从东往西，一级一级，不跳级。扫地的人不急，像在给台阶计数。天底下扫地的人多了，这样扫的少。他把这句没头没尾的判断收了起来。

竺长生站住，没有出声，也没有走近。他在影子的边上站了很久，直到那声音扫过他脚边这一级台阶，又扫向下一段，一路扫进楼影最深处。

扫帚声停了一下。他屏住气。三秒，五秒。声音又起来了，还是那样，一下，一下。他也把悬着的那口气放下来，放得很慢。

他没有喊。问一声很容易，问出口，有些东西就散了。他站在黑暗里，像九年前站在卷帘门外一样，等。

风从院墙豁口里灌进来，把他的衣角掀起又放下。他数那扫帚的节奏，数到一百多，记乱了，重新数。数数这个法子还是年轻时蹲守学的，一蹲一夜，数着数着，天就亮了。

楼影的边缘有一条极细的月光，像谁用刀背在石板上划了一道。他站的位置，一半在月光里，一半在影子里。人老了就是这样，站在哪儿都要先想一想，哪半边站得住。他往月光里挪了半步，又退回影子里。

他回头看了看那栋楼。楼不说话。楼从来不说话。

扫帚划地的声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很慢地剪纸。

第六章　封仓

茶性俭，不宜广。

二〇一六年九月，天门西湖路。

门面原先是一家打印社，卷帘门卸下来那天，半条街都听见了铁皮的声音。装修用了四十来天。原木的柜台，竹的茶则，白墙上不挂财神，只挂了一幅字：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字是老板娘自己写的，小楷，一笔不抖。

招牌挂上去那天，蓝溪也在。黑底，金字，嘉木茶事四个字。她仰着头念了一遍，旁边卖锅盔的爹把烟从嘴上拿下来，说，这名字起得大，茶圣的字都敢用。蓝溪没接话。她还不知道，自己往后好些年，都要站在这四个字底下。

门脸朝东，早上七点，早市的气味先漫过来：油锅里的锅盔，骨汤里的鳝鱼粉，混着雨后青苔的湿气。验收那天，老板娘进门先站定，四面墙看了一遍，又蹲下去摸地面平不平，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可以。装修师傅私下跟蓝溪讲，东家这双眼睛，比甲方毒。

她十八岁，职高财会班毕业，没考上大专，在家帮爸妈看摊子。八月底，新店的玻璃门上贴出一张红纸：招店员一名。要求三条：手稳，识字，守店规。

面试就在装了一半的店里。没有桌子，只有一只空柜台。老板娘亲自面，年纪不大，白衬衫，头发收到耳后，说话不快。她问了三件事。

第一件，会不会烫到手。一杯滚水放到蓝溪面前，让她端着，从柜台这头走到门口，再走回来。水一寸没洒。

第二件，认不认得字。一张货单递过来，让她把品名念一遍。白毫银针，漳平水仙，凤凰单丛。蓝溪念得清楚，只有一个丛字卡了一下。

第三件，家里几口人。蓝溪答，三口，爸妈加她。老板娘点了点头，说，好。

就这样定了。工钱不低，管一顿中饭。蓝溪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三个问题怪：烫到手，问的是手；认字，问的是眼；家里几口人，问的是什么，她当时没有想明白。

入职第一天不教茶，先教规矩。

上班先学洗手。水要过三遍，指甲剪圆，冬天抹蛤蜊油。蓝溪起先不懂，后来才明白：茶从手里过，手就是最后一道工序。

后堂的小案上摆着一条棉纸，两指宽，毛笔小楷，三行字：

一、不问价值。 二、不问来路。 三、不问十一月十八日。

蓝溪把三条念了两遍，问，最后一条是个什么日子。

“店庆日。”

老板娘答这三个字的时候，正低头往锡罐里拨茶，声音不高，字与字隔得很匀，像称过分量。蓝溪还想问，店庆不是九月么，棉纸已经从她手里抽了回去，折两折，四枚图钉，钉在里间门背后。

从那天起，蓝溪每天开门头一件事，是看一眼门背后那条棉纸，像和尚过早课。

第二条她起先没有真懂。头个月就有教训：一个熟客要两斤银针，指名要金罐装的那种，蓝溪多嘴说了句这个罐子比茶贵。客人走后，老板娘把金罐收进里间，第二天起，店里一律用素罐。她没有批评蓝溪，只是那天的茶，蓝溪包得格外慢。晚上落锁，她在心里把三条店规默了一遍——第一遍为记熟，第二遍为记住：价值二字，轮不到她问。

· · ·

老板娘认茶叶，像认人。

新茶进店，她拆一包，摊在白纸上，只看，只闻，手背贴一贴茶身，就有了数。从不试喝。蓝溪问过她，不看汤色，怎么跟客人交代。她把手边的茶则搁下，讲了一句蓝溪记到今天的话——第一泡就见真心，那是外行话；真心在第三泡。

她称茶不用复秤。客人要二两，铜勺探进罐里，手腕一沉一提，纸上的茶恰好二两，上下不过一钱。包茶也好看，棉纸一折，一压，一收，纸角捏出一条直线，前后不过二十秒。蓝溪学包茶，学了半个月，指尖才不抖。

她教蓝溪认茶，不用课本。把茶倒在白纸上摊开，让她看蒂——春茶蒂小，秋茶蒂大；看梗——春梗乳白，秋梗发黄。教到后来，她把两泡茶冲了并排一放，什么也不说，只看蓝溪。蓝溪说不出名堂，她就再换两泡，直到蓝溪说出来为止。

腊月里进了批陈年普洱，纸箱上落着白霜似的茶末。老板娘开箱那天戴着白手套，一饼一饼过手，过完，手套翻个面，收进抽屉。蓝溪问那茶什么价，话出了口自己先愣住——老板娘抬眼看了她一下，没说话，把门背后那条棉纸取下来，在她面前放了一放，又钉回去。那晚蓝溪翻了半宿。第二天起来，她把三条店规在舌头上过了三遍，从此再没碰过那条线。

店门口站定了抬头，能看见茶经楼的檐角，九层，一层一层收上去，像一炷香。游客问路，问的都是陆羽故园。蓝溪指了路，回头看一眼账台，老板娘在拨茶末，头也不抬。

店里的客人，三教九流。有西湖路早市收了摊来坐一坐的贩子，有从故园那边问着路过来的游客，也有开着外地牌照的车来，进门不看价签，只问一句：有没有那个。每逢这种客人，老板娘往里间让，门帘落下。蓝溪守在外头，听见里面称茶的声音，一下，一下，很匀。这样的茶，蓝溪没见过装盒，也没见过记账。她守店规，不问。

执照挂在墙上。蓝溪擦玻璃的时候看过一回：法定代表人，唐穗。字是打印的，可那一笔一画的间架，跟账台上那笔小楷像是一个人。她没有问过老板

娘的名字怎么写，头一天喊老板，第二天喊老板娘，一喊就喊顺了口。

有一回，一位戴老花镜的先生捧来一饼茶，说是八十年代的普洱，请老板娘掌掌眼。老板娘接过去，看了大票，摸了饼面，撬一小块，对光看汤，前后不到五分钟。她把茶饼原样包好，还回去，只说了一句：茶是好茶。

先生千恩万谢地走了。蓝溪后来琢磨了很多年才琢磨出来，是好茶三个字，什么都没有说。

大雪天来过一个老主顾，中学里教书的，要给退休的老同事配一箱茶。老板娘问了三句：喝什么，什么口味，几时喝。问完配了箱，又叮嘱一句，粗水冲，细水品。老主顾走后，蓝溪问她怎么记得住这么多人的口味。她说，记不住人的，才要记口味。

店里有部手机，锁在账台抽屉里，一天响一两回。老板娘看完，把屏幕扣下，接着拨茶。蓝溪没见她回过一条。

冬天生意早收。落了雪的傍晚，街上只剩锅盔炉子的光。老板娘教蓝溪认茶，也认街：哪家的米粉汤头正，哪家的裁缝会补棉纸袋，谁家老人过马路要扶一把。蓝溪后来想，老板娘在这条街上，住得比谁都像本地人，可她从不说自己住哪儿。

店里管一顿中饭。老板娘的午饭在里间吃，一份素粉，吃得干干净净，筷子在碗沿上搁齐。蓝溪从家里带锅盔，头一回分了她半边，她吃了，说比街上买的新鲜。往后蓝溪每个星期带一回，她都收，只收半边，多一点也不收。

蓝溪头一回领工钱，是现金，装在信封里，信封口没有封。她数了三遍才敢揣进兜。老板娘的工钱日从不拖，逢十五，雷打不动。蓝溪后来跟同学讲，我们店里发钱，跟月圆一样准。

老板娘不吃糖。街上糖贩子路过，蓝溪买过一回麦芽糖，让她，她摆手。蓝溪当时就想不通：一个把糖塑留在墙上的人，自己不吃糖。

她有一样习惯。每天打烊前，把当天没卖完的散茶归并进一只素罐，罐上贴白纸条，写日子。写满一年，罐子换一只。蓝溪问旧罐子去哪了。她说，封

起来。封在里间的架子上，一排一排，像一小队上了年头的兵。得闲的时候，老板娘抄书，一部线装的《茶经》，抄一页，念一页。念到一之源，她停下来，拿铅笔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一道线，画完，把那页折了个小角。

每月月底盘账。老板娘把蓝壳簿子摊开，一行一行用小楷誊总，誊完，把一年进来出去的每一笔念一遍，念得很慢，像点名。蓝溪在旁边听着听着就明白了一件事：老板娘念的每一笔，都对着一样实物——罐子，纸箱，秤。账上的每一行，都有东西认领。

每晚关门，她亲自把卷帘门落下一半，弯腰进去，把灯一盏一盏数过去，数完退出来，落锁。整套动作不超过两分钟。蓝溪问过她数灯做什么，她说，灯齐，第二天才知道少了什么。

再后来，蓝溪把红纸上的招工要求、面试的三个问题、门背后的三条店规摆在一起想过一回，越想越觉得它们原是一套：手稳，才端得住滚水；识字，才看得清单据；守店规——店规的头一条，就是不问。老板娘招的不是店员，是一双安分的手。

十月半，开业。

没有花篮，没有鞭炮，没有剪彩。早上七点，老板娘把门背后那条棉纸念了一遍，不是念给谁听，声音很轻，像在跟三条规矩打招呼。然后开门，开门就是营业，仿佛这家店一百年前就开在这里。

头一单生意来了个后生，要买茶送丈人。老板娘问了三句：送谁，喝什么，几时送。问完配了一罐，教他用棉纸包出提手。后生临走回头问，能不能开发票。蓝溪刚要答，老板娘说，盖章的收据。后生走了，蓝溪问发票跟收据有什么分别。老板娘说，发票是给单位看的，收据是给自己留的。

头一个月生意淡。早市的贩子进来歇脚，喝一杯免费的粗茶，抹抹嘴走。转机是十一月里来的：一个从茶经楼那边散步过来的武汉口音，买了半斤红茶，隔了一星期领回来四个人。到腊月，账台后的锡罐添到三十六只，蓝溪每

天擦一遍，擦得能照出人影。老板娘看她擦罐子，说了一句：罐子亮，是茶的脸面。

蓝溪的么叔在庙会上吹糖塑，祖传的手艺。头天晚上她求了么叔大半夜，吹来一串：一个捧茶的书生，一条鲤鱼，一只葫芦，金黄透亮，糖丝在灯底下拉出细细的亮。她踩着凳子，把糖塑挂在账台后的白墙上，跟那幅嘉木的字并排。

老板娘从后堂出来，在那串糖塑前面站住了。

她看了很久。久到蓝溪把账台上的算盘拨了三遍，她还没有走。灯照着糖塑，糖丝的亮一闪一闪，映在她眼睛里。她垂在身侧的手指，轻轻蜷了一下，又伸开。

“留着，莫让它们化。”

蓝溪赶紧找来一只玻璃罩，把糖塑罩起来。老板娘转身进了后堂，脚步跟平时一样，不快，不慢。

入了冬，糖塑的颜色暗了一层，甜香倒还在。蓝溪隔着玻璃罩擦灰，那个书生捧着那盏茶，一直捧着。她那时候还不知道，凡是老板娘说了留着的东西，就真的会一直留下去——留到没有人记得，它是为什么留下来的。

腊月二十八，店里歇年。老板娘给蓝溪封了一个红包，红纸折得方方正正，四角对得齐齐的。蓝溪回家拆开，跟爸妈把一年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她娘问，老板娘人怎么样。她想了半天，说，好。好在哪里，她说不上来。有些人的好是安静的，像罩在玻璃罩底下的糖塑。

◆

二〇一六年冬至，汉口，一盏楼。

冬至前后，汉口落了雨夹雪。老租界的巷子窄，青石板让雨水浸得发亮。一盏楼在巷子中段，两层，木楼梯十七级，踩上去的声音是实心的。简明堂在

这条巷子里收茶、鉴茶、断茶，行里人叫他半盏翁，说他一眼半盏，真假立断。

这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三十年前有桩公案：一位港客拎来一提老饼，满楼的人说真，简明堂端起半盏，看了汤，放下，说，茶是老茶，饼是新压。港客拂袖而去。三个月后，同一批茶在广东出了事——那提饼，是拿旧茶汤煮过的新饼。从此行里送他这三个字。他自己不认这个雅号，说，眼睛哪有半盏的，看见了，就是看见了。

入冬以来，楼上来过一位客人，不买茶，也不送茶。头一回，递上来一张帖子，毛笔小楷，自报家门：唐穗，天门人，茶学毕业，想学鉴定。简明堂扫了一眼，让做饭的表侄女回话：打假的不见卖茶的。

一盏楼有楼里的规矩：客来先上一盏，喝完再说话。有客嫌这盏多事，简明堂说，这盏不是待客，是照人——茶到嘴边，人都卸了防。表侄女是远房的，管两顿饭，她私下观察：那位师姐吃饭不看人，看碗。吃完，碗里的米粒一粒不剩，筷子并齐，搁在碗右。

头几回，简明堂还想不明白她为什么挑中自己——满汉口会教茶的人多的是，她偏偏挑了最会打假的一个。后来有一晚他忽然通了：天下最懂假的人，才知道真长什么样。这个念头一闪，他后脖颈一凉。

第二回，是冬至那天。没提茶，提了一包天门的锅盔，说是家乡的酥饼，请先生尝尝。粗纸包着，一路从火车站抱过来，纸底洇出了油印，到手上还是温的。

简明堂让她上楼。十七级楼梯，她走得不响。

楼上是一间通屋，长案临窗，天光从老虎窗斜下来。案上一把茶针，一块用旧报纸包着的茶砖。简明堂把报纸解开，说，撬给我看。

茶砖是七十年代的边销砖，紧得像石头。她接过茶针，先看砖面，找层的纹路，针顺着纹走，手腕不悬也不死。撬下来的茶块完整，断口齐整，几乎不见茶末。

简明堂又让她烧水泡一盏。烫杯，投茶，注水，出汤，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也没有一个花哨的动作，干净得像操练过的。

他喝了那盏茶，把收徒的话讲了。三个条件：手稳，心静，不碰假茶。

他说一条，她点一次头。应得平静无波，倒像是早已背熟了的。

简明堂教过学生，没收过徒弟。他在茶里滚了五十年，眼力是三样东西喂出来的：早年间国营茶厂的仓，八九十年代过手的港饼台饼，这些年满天飞的假。他老了，一盏楼的手艺想往下传，传手艺，不传招牌。这姑娘手上的功夫是现成的，缺的是眼。眼可以教。

他只是没有料到，教眼这件事，会让他往后的觉，一夜比一夜短。

学徒从那年冬天起。

规矩也定下来了：一三五摸纸，二四六看汤，周日她不来，他歇。这规矩定下以后，谁也没有破过。她每天早到半个钟头，把长案擦一遍，炭炉生好。腊月里他咳嗽，她炖了梨端上来，搁三颗冰糖，不多，不少。

先学摸纸。棉纸的帘纹，纸浆的粗细，指腹一捻，年份段就出来了。她上手快得吓人：第三天，能摸出两张纸的先后；第五天，摸出了他故意混进去的一张机制纸。机制纸的帘纹是横的，匀得没有心跳。

简明堂把三张纸叠在一起递给她：一张民国纸，一张八十年代纸，一张新纸。她捻了三遍，排出先后，又让他打乱再排。排到第三遍，他收走纸，问她凭什么。她说，老纸的帘纹疏，浆里楮皮的长纤维多，指头捻过去，有毛茸茸的尾巴；新纸滑，滑得像刚剪的头发。他没有夸她。这样的答案，行里教不出来，是天生的舌头和指头。

再学辨山场。同是水仙，两泡对冲，哪泡是正岩，哪泡是外山，看汤色的油光，看叶底的软硬。她喝得慢，答得准，答完把自己那盏也喝干。

再学看汤。对窗的光，看挂杯，看冷后浑。她伏在案边一看半个钟头，起身时膝盖上两个红印。

冬夜楼冷，炭炉上坐着一只黑陶壶。学烹茶，先学听水。她说这三样声音，比看汤色还准。简明堂记得，经上有这一段，可他没教过——这一段，是她自己从线装书里揣摩出来的。

她问问题，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问这茶好不好，她问这茶为什么不能更好。

开春，他带她去逛汉口的茶市。一条街的老白茶，他让她自己走。她从街头走到街尾，回来伸出一根指头，点了三家。他一家一家地验，粗纸，汤色，叶底，验到第三家，他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她指的，全对。

入夏他还破例考过她一回。拿自己藏了多年的一款岩茶，年份、火功、山场，让她一样一样说。她说穿了，说得他后脊发凉。不是她错了，是她太对了——对得像一面镜子，照见他这五十年，一步一步，全走在明处。

三家的毛病，一家纸太白，做旧的黄黄得均匀，真老纸的黄是长出来的，有深浅；一家汤太艳，红得发亮，像上了漆；一家叶底一捻就烂，是烤过头又回了潮的。她当场一样一样说给他听，说得又快又稳。回程的公交上，她靠着窗睡着，手里还捏着那半张没看完的棉纸。简明堂把她的手提包往她怀里拢了拢，扭头看窗外，看了很远。

那天回一盏楼的路上，他问她家里做什么的。她说，做茶的。他问，生意大么。她笑了笑，没有答。他也就不问了。行里的水深，问了也听不见底。

有一晚讲到木刻版印的大票。他讲版的木料，讲刀口，讲墨怎么吃纸。她听完，问：“简老师，棉纸的老，能做出来吗？”

他答，做出来的老，是纸黄心不黄，帘纹里的包浆，骗得过眼睛，骗不过指腹。

她又问，炭火的老呢——炖得出枣香，炖不炖得出沉底的药香。再问，仓味的仓呢——高温高湿催出来的气，浮在面上，沉不沉得下去。

他每答一次，心里就沉一分。

教了五十年，他头一回遇上这样的学生。天分全用在刀刃上，问的全是刀刃反着光的地方。这伢的手，是吃这碗饭的；这伢的眼，让他这个吃了五十年饭的人不安。她学的不是鉴茶，是破案——从茶里破案。

柜底有一只饼干铁盒，里面存着他这些年看着不对的茶样：三张大票，两块茶样。其中一张大票上，木刻版印的羡字，第三笔有个针眼大的豁口，印出来，张张纸上都带着。行里没有人看出来过。这个豁口，他谁也没有告诉过。

有天夜里讲到假票，话到嘴边，他把这样东西咽了回去，只说了一句：看大票，先看版。至于版上要看什么，他留了一手。说不上为什么。手艺人的直觉和猎人的直觉是一路的——最要紧的那一眼，不教给看不清底细的人。

出师前一夜，他失眠，索性起来把柜里的茶样重新编了号。编到那张带豁口的大票，他把台灯拧暗了一格。他跟自己讲，教徒不教心，是师父失职；可把心教出去，兴许是更大的失职。想着想着，窗外的雪就停了。

表侄女私下跟他说，这个师姐勤快，吃完饭抢着洗碗，指甲缝里都是干净的。简明堂嗯了一声。干净不是毛病。干净得太严整，有时候才是毛病。

入夏，有个熟客上门，托简明堂掌一饼茶的眼，成与不成，都送三个点的谢礼。简明堂照例推了。客人前脚走，唐穗后脚问他：师父，要是茶是真的呢？他说，真的也不做。她又问，为什么。他说，一次是掌眼，两次是掌柜，到第三次，你的眼睛就学会替价签撒谎了。她点点头，把这句话记在小楷本子上。简明堂瞟见过那个本子，一页一页，行楷，记的全是他说过的话。

有一回他借来看。前半本是他的话，后半本是她自己的批注，批注比正文还密。其中一页的页脚，她写了一行小字：老，是学不来的，只能等。等字底下，划了一道线。他把本子还回去，一个字没提。那天夜里他把这行字想了半宿——学不来的老，只能等的老，她问这个做什么。教了五十年，他头一回觉得，自己看不懂一个学生。

· · ·

出师是在第二年深秋。

奉茶礼定在上午。她一早到的，换了素色衣裳，头发收到耳后。烹的是一道正路的十年陈白牡丹，来路清白，是她托同学从茶农手里直接收的。汤色杏黄，油光贴着盏壁走。

简明堂验他的徒。条索，汤面，香气落水，叶底，一路看下来，挑不出毛病。

他喝完那杯茶，把杯子翻过来，扣在案上。杯底一圈水痕，慢慢洇开。

半晌，他说：“以后您家的茶，我都要验过再喝。”

她双手叠在身前，弯了弯腰，应了一个好字，又说，先生教的东西，她都记下了。简明堂摆摆手让她去。她下楼，十七级，还是不响。

出师以后，她每月还来看他一回，坐一盏茶的工夫，照旧带一包天门的锅盔。有一回他问起她店里的事，她说，只卖新茶，不收旧茶。他哦了一声，没再问。那个月底，柜底的铁盒里，又添进去一张大票。

案上留下她的谢师礼：一包武夷山的正岩水仙，棉纸包着，纸角那条线捏得笔直。简明堂回了一杆小铜秤，秤盘磨得发亮，是他师父传他的，附了一张字条：手上的分量，秤比眼睛老实。

简明堂在案前站了一会儿，把那只扣着的杯子翻过来，收进柜子。然后他走到底柜跟前，把饼干铁盒取出来，打开，对着天光把三张大票一张一张看过，再原样放回去，扣上锁。

锁扣响了两声。他忽然觉得这楼上有点冷，起身去把老虎窗关了。

窗外，汉口飘起了那年冬天的头一场雪。雪落在青石板上，落一层，化一层。简明堂想起表侄女私下问过的话——师姐人这么好，先生怎么老防着她。他没有答。他这把年纪，防的从来不是人，是纸。可纸的背后，站的都是人。

◆

二〇一七年春分，漳州城郊。

仓是旧糖厂改的，三跨，高窗，水泥地上拉着石灰线防潮。漳州水气重，一年里两百天墙是潮的。做茶的人说，这种天，是老天爷赏仓饭吃。

骆驼管仓。他叫骆驼，是因为扛活——一袋一百二十斤的毛茶压在背上，他能不歇气走完整条坡道。仓里七个工人，两男五女，都是附近村里人，工钱现金，月月结清，比别处高出两倍。没人问东家是谁。问了也白问，骆驼知道的那些，他不说。

仓里的日子有它的板眼。上午翻堆，下午焙火，女工们坐在长凳上剥茶果，说谁家女婿的闲话。午饭在仓门口吃，一盆卤面一盆青菜，骆驼多一碟豆干。工人们背后管东家叫老陈，当面不叫——当面用不着叫，东家一年也来不了几趟。

东家姓陈。骆驼统共见过本人十来回，回回来，都背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袋。

头一批货是老白茶。头年腊月压的饼，开春发到广州芳村，三月里就断了货，前后加了两次单，回款快得反常。芳村来的茶贩子到仓里看过货，抓一把干茶摊在掌心，又让烫了一盏，喝完只说两个字：地道。临走在仓门口点了根烟，说，这个货，香港那边也有人接，你们这茶，故事讲得好。

贩子喝到第二盏，说了句醉话：茶是好茶，纸是好纸，就是茶比纸还新。骆驼当时没听懂。懂的时候，是几年以后。

装柜那天骆驼亲自压车。纸箱码了七层，唛头是打印的，一行英文一行中文，中文那行写着礼品茶。过磅，封签，拖车的尾灯在县道上一闪一闪。回仓的路上他买了几斤枇杷，分给女工们。那年春天，仓里换了新彩钢瓦，添了两台抽湿机。东家的钱，花在仓上的时候，比花在自己身上大方。

夏天第二单，贩子带来一个戴金链子的老板，进门就要现款提两百饼，说是香港的客户催得急。东家让他等了三天，一天都不提前。取货那天，金链子

老板把钱码在案上，数都不数。骆驼在旁边看着，心想这世道，越贵的假，买的人越不敢验。

骆驼不懂什么故事。他只管仓。

老婆在镇上开小卖部，问过他一回：你那个东家，做的什么大买卖，钱来得这么快。骆驼往嘴里扒饭，说，做茶的。老婆说，做茶的哪有不走账的。骆驼把碗一放，说，他的账你别管，我的工钱干净就行。老婆看他一眼，没再问。夜里骆驼躺在床上，把这话想了一想：他的工钱，是把纸做旧、把茶喂老换来的，按月拿的汗钱。这么一想，就睡着了。

货款现金结算，从来不过账。陈老板来了，后仓拉上帘子，帆布袋解开，一沓一沓码在案上，手指蘸着海绵缸点钱，点完，钱推过来，单子推过去。签收单上签的是骆驼的名字——仓管签收，天经地义。东家的名字，从不出现在任何一张纸上。发工钱也一样，骆驼从铁皮柜里把钱分好，一人一沓，女工们拿皮筋扎了，塞进袜子最里层。

有回剥茶果的女工问骆驼，东家是不是华侨。骆驼说，兴许。女工说，华侨好，华侨见世面。骆驼没接话。他见过东家点钱——那双手白净，稳，不像扛活的手，倒像拿笔的手。可他从没见东家碰过笔。

做旧这一行，骆驼是进了仓才看明白的。

棉纸要老。新纸刷上淡茶油，烘干，再用灯熏，边角拿鞋底细细磨毛，虫眼用香头一粒一粒烫。大票要旧。梨木的版，一天印三百张，印完贴着灶膛烘。茶要沉。高湿房里蒙上布篷，白天升温，夜里开缝透气，一遍一遍把仓味喂进去，再挪到旧米缸边上醒。阳光是可以用灯换的，风雨是可以用水管换的。纸黄了，汤红了，字旧了，一饼去年才出的茶，就有了三十年的腰杆。

价是东家定的，一口价，从不还。芳村的贩子还过一回价，东家没接话，收了茶样就走。第二天，贩子按原价把货提走了。骆驼头一回见识，原来最硬的底气，是不还价。

骆驼头一回看明白这些的时候，在仓门口站了半天。后来他想，纸是死的，可纸上的日子是能做的；做的日子用久了，跟真的日子，也就分不出来了。

四月里落了半个月的雨，高湿房的温度计一天看八回。雨一停，全仓抢烘，炭炉从早烧到夜，骆驼的眉毛燎了半边。

白茶做旧有一道工序，女工们叫还阳：夜里把茶摊开，吃一肚子露水，天亮再收进焙笼。真老白茶晒过几十年月亮，假老白茶，只能一夜一夜地补。骆驼不觉得这是坏。乡下人讲，纸就是给人写的，字就是给人认的。他没有想到，写出去的日子，别人会当真。

十一月十七，东家来得比往常早。

那天他在仓当灯下修版。梨木版摆在一块蓝布上，刻刀换了两回。版上刻的是大票，票头一行字里有个羡字。骆驼看惯了——那个羡字第三笔上有个豁口，印出来，张张纸上都带着。起先他以为是刻版先生手误，后来听芳村的贩子说，行里有高人专认这个豁口，认版如认人，一认一个准。

那天，东家一刀一刀，把豁口修平了。木屑吹掉，试印一张，举到灯底下看了半天，又让骆驼把旧版印的头一批大票，能收回的都收回来。

骆驼蹲在两步外看。刻刀走得不快，一刀是一刀，木屑卷起来落在蓝布上，像极小的刨花。修平的豁口再印出来，那个羡字就囫囵了，囫囵得跟别的字一样。骆驼当时只当是版旧了要修。这些是几年后他才咂摸出来的——那天他只看见东家吹掉木屑，把版包回蓝布里，动作轻得像收一件瓷器。

版刻成那天，试印过三张，东家挑了一张贴在墙上，看了三天。骆驼问贴着做什么，东家把那张纸揭下来，折好，收进了蓝布。

骆驼问，版坏了？

东家没抬头，手上的刀又走了一遍。

那几天，仓里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只当要出货赶工。只有骆驼看见，烧掉的旧大票里，有两百来张完好无损，一张都没用过。烧完好纸，这行里有个说法，叫断根。

十一月十八，全仓停工。

这是规矩。东家来漳州三年，年年这一天歇工，工钱照发。头天晚上口信就带到了：明天都歇，工钱照开。骆驼多问了一句，机器停不停。带话的司机说，全停，连抽湿机都停。骆驼愣了一下：抽湿机停一天，仓要返潮的。司机说，东家交代的，那一天，仓里什么都不做。工人们乐得去镇上吃卤面赶圩，仓里只剩东家一个人。

头天傍晚，骆驼看见东家从帆布袋里取出一只木盒。盒子上了年头，边角磨得圆润。东家当着他的面打开，里头三只杯子，旧白瓷，其中一只的杯沿有个小磕。东家用袖口把杯子一只一只擦过，又收回去，什么也没说。骆驼把目光挪开了。

骆驼在前头账房对单子，从高窗望进去，看见东家在仓当中烧了一壶水。小方桌，炭炉，三个杯子。

两只斟满，并排摆着；一只空着，挪开半尺，独独朝着门。

汤色深得发琥珀，是老白茶熬透的颜色。空的那只，杯底干净，像在等一壶还没烧上的水。

前两年也是这样独坐，骆驼只当是茶行的老例，没有多看。今年不知怎么，他多看了几眼。两杯满茶从上午摆到天黑，面上结了壳，东家一口没喝。他自己那只空杯，从头到尾没有斟。

他坐着一动不动，像仓里的另一件货。

骆驼在账房里坐着，账也对不进去。他抽了三根烟，烟灰缸满了，天就黑透了。仓里没有开大灯，只有炭炉一点红。他听见水开的声音，听见倒水的声音，之后什么声音也没有。漳州冬天的夜潮，从门缝里往里钻。后来有人问起这一天，他只讲了半句就停了——有些场面，讲全了，对谁都不好。

骆驼中间进去取过一回账本，脚步放得极轻。退出来的时候，他把门带上了。这是他自己的规矩：东家独坐的时辰，仓门随手关。

· · ·

东家是夜里走的。

司机把车开到仓门口，东家临上车前交代了一句：地上收干净。

骆驼推开门，在门口愣住了。仓当间满地纸屑——试印的废票、裁下来的棉纸边、还有头一批印坏了收回来销毁的旧大票，白花花铺了一地，灯一照，像落了一场小雪。

他先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手快过了脑子。照片发上朋友圈的时候，他想都没想，配了五个字：东家的一年一度。

三分钟后，他把照片删了。

删完，手机扣在桌上，心口还突突地跳。仓规没有成文，可谁都知道：东家的事，不上纸，不拍照，不出口。他犯了第二条。

其实照片里什么也没有。没有人脸，没有茶饼，只有满地的白纸屑和一角铁架。可规矩就是规矩，东家的事不上相册。他翻了翻手机里那个相册，两年统共三张：一张仓门口的对联，一张新换的彩钢瓦，一张今天。删到只剩空白，他心里那块石头才落了地。

他蹲下去，把纸屑一张一张拢成堆，捧进灶膛。火起来的时候他添了一根柴。灰是白的，一片一片落在灶膛口，倒真像雪化干净了。

那晚他睡得不踏实。天蒙蒙亮，他忽然坐起来，觉得灶膛里好像还有一张纸没烧透，趿着鞋过去看。火早熄了，膛里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腊月里封仓，骆驼带工人把茶搬上高架，一垛一垛码好，石灰线重新描过。门上贴封条，封条是骆驼写的，写完拍照，发给一个从没存过名字的号码。腊月二十几，东家又来了一趟，帆布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盒云片糕，说是给娃的。骆驼抱着那盒糕回镇上，像抱着一盆炭。

年底他娃拿了张奖状回来，他贴在账房墙上，正对着东家常坐的那把椅子。东家再来，看见奖状，盯着看了一会儿，从帆布袋里摸出一支钢笔，搁在案上，走了。笔是好笔。骆驼没舍得用，给娃收着。

◆

二〇一七年入秋，深圳，华强北。

阿彦的柜台缩了一半。碟不好卖了，看片子的人都在手机上看。整栋楼一家一家换招牌，上午还是碟店，下午就改成贴膜的。阿彦守着剩下半边柜台，摆数据线、转换头，主要心思早不在柜台上——阿木那边的生意一年大过一年，大到需要一门新的手艺了。

换招牌那天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工人拿螺丝刀卸“影音”两个字，笔画一个一个掉下来，落进蛇皮袋。柜台新来的仔问他，彦哥，你晚上都去哪。他说，跑货。仔说，跑货能跑出奔驰？他说，奔驰是贷款的，你别学。

十年前阿木南下投他，十六岁的少年，一个人一只包，眼睛比柜台上的监控还静。阿彦让他睡柜台后的阁楼，教他认货、压碟、看风声。那孩子学什么都快，快得让阿彦发慌——第三个月就能替他守柜台，验钞机都不用。后来碟的生意起了窝点，立了规矩，阿彦记账，阿木管事。再后来碟不行了，茶的生意起来了。人还是这两个人，账本还是这一本。

这门手艺，阿彦私下里叫它洗白物流。说出去不好听，干的活其实简单：给老茶编一份履历。

货从漳州上柜，拖到盐田，出关，到香港卸下来，转一圈，第二天再报进来。报关单上，启运港一栏写香港，一饼茶就有了港仓回流的身世。再配一张头程海运的提单，一张一九九八年出口转内销的旧式单据，一张五十年陈的大票。茶还是那饼茶，纸面上的年纪翻了几番。行里管这个叫讲故事，阿彦管这个叫造命——茶不会说话，纸替它说，说得比真的还圆。

单证上有一家公司，抬头印着两个字母，CM供应链。人，阿彦从没见过。电话里是一个男声，普通话很平，话极短，事极净，单子做得比真的还真。傍晚电话打过来，三句话挂断；第二天，牛皮纸信封寄到柜台，没有寄件人。阿彦问过阿木，这家靠不靠谱。阿木没接这个话，只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第一单试下来，货顺顺当当清了关，阿彦也就不问了。账本上记了一笔：CM，头程，日游，一件三百。

有一回他把一套单证摊开，给柜台的仔上课：一张茶饼的旅行——生在漳州，第二天到香港，第三天回深圳，第四天五十岁。仔听完说，彦哥，这不就是穿越吗。阿彦把单证收起来，说，所以叫物流。

拖车的司机是潮汕人，话多，一路讲他老家的功夫茶。阿彦听着听着问了一句：你信不信，一饼茶能有两个生日。司机说，信啊，我表哥就有两个身份证。阿彦没再讲话。这一行干久了，玩笑都像预言。

报关行的门路是阿彦一条一条跑出来的。皇岗的货柜过夜费多少，盐田的场站几点放柜，单证科的老熟人一支烟递过去能省半天。有一回柜子在香港压了三天，船期赶不上，CM那边一个电话过来，第二天柜子就顺顺当当进了闸。阿彦挂了电话，在后巷站了一会儿。他想不清那家公司到底多大，只知道它经手的事，连海关的章都盖得心平气和。

他给那个号码存的名字是两个字：纸先生。有一回他试探着问，你们公司叫什么，好开发票。那头静了两秒，说，不用发票。挂了。

秋天出过一回险情。一柜在口岸被布控查验，开了箱。阿彦三天没睡踏实，货最后放了——查验的人挑不出错。CM在电话里讲了一句：太齐，也是错。下一柜，做两处错。阿彦握着手机想了半天，想起小时候描红，先生总要留一两个笔画不描满。

他去香港看过一回仓。仓是真的：真的潮，真的白蚁，真的几十年没动过地的梁。只是茶进仓的日子，比仓单上的日子，晚了二十六年。回来的船上他把这事记在账本边角：仓是真的，日子是假的。

账本是个牛皮纸的本子，二〇一二年立的，到那年秋天记满了大半本。头一页写着四条：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每年十一月十八停工。阿彦记账有个讲究：只记规矩，不记为什么。哪天立的，哪天改的，哪条添的哪条废的，一笔一笔，像庙里记功德。几年下来，规矩没有废过一条。

立账那天是二〇一二年秋天，窝点刚起，两个人在一间出租屋里吃打包来的盒饭。阿木一条一条念，阿彦一笔一笔誊。誊完，那张纸在打火机上烧了。阿木说，纸烧了，账在。阿彦那时只当是行里的迷信，后来才懂，那四条规矩，条条是在保命——保他们的，也保东家的。

干这行以前，阿彦夜里睡不着。干上以后，他睡得着了。

他对着账本算过一笔账：一套单证做下来，一饼茶翻十倍的价。钱谁赚了？他赚一小截，东家赚一大截，中间还有一截，落进买茶人的体面里。有钱人买五十年的茶，买的哪里是茶，买的是五十年。这玩意骗的是有钱人的回忆——这话他在大排档跟阿木说过一句，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完，两个人都没说话，就着炒粉把啤酒喝了。

大排档的老板娘认得他们，每回多送一碟花生。阿木不喝酒，以茶代酒，茶是他自己带的，一小包，纸包的，拿老板娘的开水冲在玻璃杯里。灯光底下，那杯茶的颜色深得发黑。有一晚隔壁桌坐着几个做水货的，高声谈货谈钱，阿木把帽檐往下压了压，起身先走。阿彦后来想过一回：他那个人，连大排档的灯都躲，可他做的货，摆在全中国最亮的柜台底下卖。

那年秋天，阿彦在东莞买了房，车也换了。提车那天他给阿木打电话，说，人一有车，就不想走路了。电话那头静了几秒，传来很轻的一声笑。

还有一样，账本里记着，他从没跟人提过。每年十一月十八，东家的整条货路停一天：仓停，车停，单证停，电话打过去是关机。这个规矩立了几年，阿彦起初当它是茶行的老例。有一年他在漳州的朋友圈子里听了些闲话，才咂摸出一点别的味道。什么味道，他不去细想。账本只记规矩，不记为什么。

· · ·

阿木也在变。

从前他只问货，问价，问几时交。入了二〇一七年，他问的东西变了。

夏天，车停在坏掉的路灯底下，他问：“能不能搞到老报纸的扫描件？”

入冬，车绕过一处旧改的工地，他又问：“旧发票的纸，现在还有厂子产吗？”

阿彦笑他，说你这是卖茶还是修县志。阿木没有接这个笑，隔着挡风玻璃往外面看，看了很久。后来阿彦自己想明白了：阿木不是要卖假货，是要给假货修家谱。从前是给茶做旧，如今是给假做祖。

深秋某一天，阿木在车上说，往后的茶，要做就做有身份证的茶——单证、报关、大票、内飞，一样不缺，查得到，验得明。阿彦哈哈大笑，说茶又不是人，要身份证做什么。阿木也笑，笑得很短，转过头去看窗外。

阿彦后来把这话咂摸了几天。他们这行的假，从前是浮在面上的：纸黄一点，汤红一点，故事圆一点，蒙一个是一个。有身份证不一样。有身份证，是把自己的假，做成经得起查的真——不是瞒过人的眼睛，是收买制度的眼睛。阿彦不知道这算胆子大，还是算别的什么，想了几天，只想出四个字：深水行船。

还有一样阿彦看在眼里，没记在账上：五年了，阿木还是那张脸。白，瘦，帽檐压得低，袖口上沾着极细的纸絮。阿彦自己胖了十斤，发际线退了半指。阿木像是从时间里头绕着走的人。

有一年除夕，阿彦在东莞的新房里守着空屋看春晚，给阿木发消息，问回不回老家。过了半点钟才回，说不回。又过半点钟，又来一条，让他早点睡。阿彦对着手机笑了一下，笑完，把电视的声音调大了些。他给他娘拜了年，给他姐拜了年，拜完了，满城的炮仗响起来。他拉严窗帘，把屋里的灯一盏一盏全打开。

入冬阿木感冒过一回，电话里咳嗽。阿彦买了药要送去，他说不用，这边有。第二天见面，他鼻音重了，帽檐底下那双眼睛还是不红不肿，像没事的

人。阿彦想，这个人，连生病都生得省事。

阿彦也留了心：从前阿木听完汇报就走，二〇一七年起，他会多坐一会儿，把每个环节重新过一遍。问出口的，全是日子：几号装柜，几号到港，几号回款。阿彦跟人讲，阿木这个人，别的记性都平常，就是专记日子。

年底盘点，阿彦把两本账摆在一张桌上。一本明账，记柜台；一本牛皮纸的，记规矩。他翻开新的一页，笔尖悬了一会儿，落下去：

二〇一七年，他说要做有身份证的茶。我当时笑了。现在想想，他自己都没有身份证。

写完，账本合上，塞进床底的铁皮箱。他把箱盖压了压。这些年，箱子里躺过的东西越来越多：光碟的样货，几张存折，如今是一本规矩账。钱越挣越干净，账越记越脏——这笔账他算不清，索性不算了。

写那行字之前，他把笔帽咬在嘴里想了一会儿。想什么，没想出名堂。窗外轮子声停了，天快亮了。明账塞回抽屉，铁皮箱推回床底。天一亮还有一柜货要出，他给司机打电话，交代了三件事：柜号，件数，日子。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这一行干到底，人人都活成了纸先生。

窗外有拉着箱子赶末班机的轮子声，一茬一茬，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撕纸。

◆

二〇一七年三月，天门。

秀珍闪了腰，起不了床。医生说要静养一个月。竺长生把卷宗箱锁进米面柜夹层，跟队里告了假，学做家务。

三月的陆羽大道，早樱开了，落在公车顶上。他送完早点回来，路过陆羽公园，打太极的老头们认得他，喊他进去比划两下。他说改天。改天是刑警的口头禅，一改改了半辈子。

他这辈子头一回知道：拖地要把水拧到半干；蒸肉的粉子要先拌油；黄潭米粉的鳝鱼臊子，要现炒的才香。早上他到三蒸居门口排队，买两笼蒸包一碗汤，回来路上再称两根油条。

三蒸居的老板娘认得他，看他排队，主动让他插到头里：竺队长，你先买，家里有病人。他说不急，还是按规矩排。轮到他，点两笼蒸包一碗汤，又站在灶边等，看人家撒葱花的手势，回去自己学，学得七分像。秀珍吃着点评，说比昨天强，葱花撒早了。

晚上给秀珍熬鲫鱼汤，汤熬得雪白，鱼刺挑得干干净净。

最难得的是梳头。秀珍的头发白了大半，一根银簪别在脑后。竺长生坐在床沿，一手拢发，一手持梳，从前往后，慢慢地走。他握了半辈子笔录的手，捏起那把小梳子，稳当得很。

秀珍腰好利索以后，抢回了厨房，只留给他一个活：每天早上洗两只碗。他洗得很认真，碗底、碗沿、碗足，一处一处过水。秀珍说，你这是洗碗还是过堂。他说，过堂好，过过堂的东西，干净。

头一星期他也闯过祸。蒸肉的水添少了，锅底烧得乌黑，他蹲在灶前刷了半晚上。秀珍躺在床上指挥：粉子要先润油，肉要码在垫底的红薯上，上了汽再计钟点。他一样一样记在小本子上。秀珍笑他：记这个也用本子。他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只是从前记的是人，如今记的是肉。

秀珍从镜子里看他，说，老竺，你扫地像搜现场，梳头倒像个老保姆。

他说，搜现场靠眼，梳头靠心。

两个人都笑了。窗外的梧桐刚冒芽，麻雀在电线上排成一行。

儿子竺小江从武汉打电话回来，先叮嘱他妈的腰，再叮嘱他别累着。他说没事，队里有小蒋。秀珍在旁边说，你少往队里跑，你那点心思，瞒得过谁。

他在床边坐了半晌，没接话。

四月中，秀珍能下床了，他赴了一场酒。

请酒的是教育局的老彭，退居二线的，四十年的交情。酒过三巡，老彭说他们单位清理旧档案，准备搞数字化，翻出一九八〇到二〇〇〇年的学籍底册来。说着说着，说起一桩旧事。

老彭说，当年沈家那伢的转学手续有点怪。初中毕业的存根是齐的，迁出去的回执少一页——按规矩，迁出要两边存根合缝归档，他那边只有半张，骑缝章也只剩半个。老彭说，兴许是当年办事的人手潮，钉漏了，几十年了，谁还记得。

同桌还有两个老同事，话题早飘去了孙子的补习班。竺长生给他们倒酒，手上倒着，耳朵留在老彭这句话上。他没有追问——追问会让酒桌上的闲话变成证词，证词是要人认账的。他等酒又过了两巡，才像是忽然想起来似的问了一句：那伢，后来去了哪里。老彭说，听说去了南方。再问，老彭就摆手，说旧账翻它做什么。

竺长生问，沈家的伢，是不是望湖仓沈老板家那个。

老彭说，是。后来不是听说南下打工去了么，现在的伢，说走就走。

酒席散了，别人说的他都忘了，只记住半句：少一页。

隔了几天，他回请了老彭一顿，就两个人，要了一碟毛豆一份粉蒸肉。老彭姓彭，做事一辈子四平八稳，酒喝到二两就开始念叨单位的老黄历。竺长生等他念到学籍数字化，才把话头引回去。老彭这回没绕，第二天托人把那半张存根复印了一份，用报纸包着给他送来，说，老竺，我可是什么都没给你。他说，是，你什么都没给我。

复印件送来那天是个雨天。他把纸夹进笔记本，走回去的路上鞋里进了水。路过望湖仓，他停下来看了一眼围挡。围挡上喷着收二手车的电话号码，一串数字，白纸黑字，比谁的学籍都齐全。

第二天他去了教育局档案室。管档案的小同志把他领进去，樟脑味冲鼻子。底册的纸发脆，翻页要用指腹托着。他找到那半张存根：沈嘉木，一九九四年二月生，二〇〇九年六月初中毕业，当年九月学籍迁出，迁往本市一所职

业高中。骑缝章，半个。他把那半张纸对着窗光看了很久，纸背后什么也没有。

他又去了那所职业高中，找到退了休还返聘的老教务。老教务翻了翻记忆，说，那几年计算机班，是有一个白净的伢，话少，读了一年把就不见了，老师们说转学了。转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名册上他那一页，来的时候有，走的时候没有。

职高门口有一排香樟。老教务送他出来，指着第三棵说，那几年学生谈恋爱，都约在那棵树底下。他问，那个白净的伢呢。老教务想了想，说，那伢不跟人玩，也没人跟他玩，放了学就往北门走，走得比谁都快。

竺长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学生写字，用哪只手。

老教务端着茶杯想了想：左手。左撇子，板书抄笔记，笔顺跟别人反着来，力气倒大。有位老师纠正过，没纠正过来。

竺长生把笔记本合上了。窗外是职高的操场，上体育课的学生正在跑圈，口令声一阵一阵。十一年前，他在勘查记录的页脚写过一个词：左利。写完没有人当回事，连他自己都快忘了。今天，这个词从一间职高的教务处里，自己走了出来。

回队里以后，他把两条线并起来走。

队里的旧卷他都翻过一遍。二〇〇五年那份卷宗里，有一张现场剪纸的照片，黄纸，左手刀口。他把照片跟职高名册上那页并排摆在桌上，看了很久。名册上只有名字，没有照片。名字和刀口，在纸上隔着一个角。

户籍这条线：沈家户口簿上，户主沈松庭，二〇〇六年注销；柳文霞二〇〇八年迁出改嫁；沈嘉木那一页还挂在簿子上，空挂了八年，像相框里一张不许挪动的相。

户籍科的老部下把底卡调出来给他看。底卡上那页，照片是初中的：十五岁，白净，头发剪得短，两只手垂在身侧，右手半握着。他对着那张相片看了很久。十一年了，这个伢在他的卷宗里一直是个侧影——现在它有了眉眼。身

份证，从未办理。社保，无。医保，无。铁路购票，无。旅馆登记，无。二十三岁的人，在纸面上干干净净，干净得像一层新雪。

失踪人口这条线也走了。库里没有这个人——从来没有人报过失踪。流动人口登记里也没有。照片比对做了三回，比对组的人问，竺队，这是找谁。

他说，找一个活人。

比对组的姑娘后来又问了一句：这人多大。他说，按年份算，二十三。他把照片收回来，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手里这张脸，永远是十五岁。那个在纸上学飞的人，如今长什么样，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兴许连镜子都不知道。

一个大活人，在纸上学飞了。

· · ·

五月初，他把材料摊在桌上，叫了蒋阔。蒋阔刚装完婚房，请了半天假过来。看完，把最底下那张抽出来，又看了一遍。

蒋阔说，师父，一个二十三岁的人，没身份证，没社保，不坐火车，不住旅馆，他怎么活？

竺长生说，我也在问我自己。

蒋阔想了想，说，活在别人的户口里。

屋里静了一下。窗外有人骑车过去，车铃响了两声。竺长生看着他，蒋阔让他看得发毛，说，师父，我就是随口一说。竺长生摆摆手，把材料收了，说，随口的好，随口的留着。

蒋阔走的时候回头问，这案子要不要立。他说，立什么，人是活是死都不清楚，立什么。蒋阔说，那您查它做什么。他送蒋阔到楼道口，看着小蒋下了半层楼梯，才说，等它自己开口。楼道的声控灯应声亮了，又一层一层，暗下去。

过了一个星期，蒋阔又来过一趟，说想起一件事：二〇一四年茶经楼开放那天，会场的临时工名单还在卷里，要不要过一遍。竺长生想了想，说，不急，纸跑不了。蒋阔应了。后来好几年，蒋阔提起这句话，都要看他一眼。

他按程序写了一份情况说明，附在二〇〇五年的老卷后面。谁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说明的最后一句是：建议关注此人后续身份变动。写完他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像个给病人开检查单的医生，明知道病人在哪里，就是够不着。

那批材料的复印件，他折成四折，塞进米面柜夹层的卷宗箱。

秀珍出院那天，他把家里里外收拾了一遍，抹布洗得发白。秀珍环顾四壁，说，你这一个月，比当刑警像样。他嗯了一声。秀珍又说，米面柜里那口箱子，我早知道有，我不问。——他拿抹布的手停了半拍。秀珍已经转身去熬汤了，汤勺敲着锅沿，当，当。

锁柜的时候，院里晒着被子，拍打声一下一下。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这口柜子里的纸越攒越多，攒的全是别人的名字。想到一半，他把这一半掐了。这样的念头，不兴有。

有天夜里他说梦话，秀珍推他，他醒了，说的是半句卷宗里的术语。秀珍说，你梦里还在上班。他说，梦里不拿工资。两个人在黑暗里笑了一阵，笑完都睡不着，索性开着灯说话，说到天蒙蒙亮。开春以来，这样的夜有四五回。他不记账，可他记得。

夜里睡不着，他起来开灯，翻开随身的小笔记本。本子用了一半，前头记的全是年份、人名、数字。他翻到新的一页，笔尖悬了一会儿，落下去一行字：

死人不会蒸发。蒸发的是活人。

写完，他吹熄台灯。黑暗里，米面柜那边安安静静，像什么也没有装。

后半夜他又爬起来一回，从米面柜夹层里抽出二〇〇五年的那本笔记。纸黄了，字用力。他一页一页翻到卷宗号那一页，就着走廊的灯，在页脚补了一

行小字：二〇一七年四月，续查。写完合上，推回夹层。柜门阖上的时候，他把耳朵贴近听了听，里头安安静静。

◆

二〇一七年三月，武汉大学，樱花道。

三月的樱花道，人比花多。蔡诚提前一星期托了留校读研的同学，约了两张入校券。

樱花开到第七天，落得比开时快。老斋舍的绿瓦上积着一层粉白，风一过，整条樱花道像在下雪。游客举着自拍杆，一条一条从人头顶上过去。蔡诚拎着她的包，走在半步之后。人潮把他俩冲开，又送回来，像水绕过一块石头。

他和唐穗是同一年的，两家隔着两条街。他小时候常跟他娘去云香居，他娘在里头打牌，他在门口石阶上写作业。隔壁桌有个拣茶叶的小姑娘，把她妈的茶拣好、码好，再把她妈赢了的钱一张一张理齐。两个孩子一人守一边，谁也没跟谁说过话。

真正认识，是大二那年天门同乡会包饺子。她擀皮，他包，两个人手上的速度严丝合缝，一顿饺子包了三百个，别的人光吃不干。后来他送她回华农，公交过江，她睡着了，头一点一点。到站他叫醒她，她说谢谢，眼睛里像隔着一层玻璃。他那时就想，这个人心里收着事。收的什么事，他不知道，也从来不问。

毕业后他在武昌一家电力设计院画图，她在汉口学茶。隔一条江，他每个周末过江去。吃饭她吃得快，吃得干净，饭后把桌上的筷子摆齐——这个动作他看了一年，看不厌。他教过她用手机地图，她学得快，花哨的软件一样不装。她的手机里只有电话、短信、天气和相机，干干净净，像她的柜台。

那年秋天，他带她回天门见过一回蔡母。蔡母留了饭，饭桌上没说几句要紧话，饭后却把他叫进厨房：唐家的姑娘，眼睛太静，压不住。他问什么叫压

不住。蔡母擦着手说，你往后就晓得。回到桌上，唐穗正帮着收碗，收得又轻又齐，像在这张桌上做过一百回。

求婚的事，他盘算了一冬天。

樱花底下，人挤着人。他把她带到樱花道尽头，掏出盒子。

樱花道人多，他怕走散，让她拉着他的袖子。她不拉，只站在原地等，站在人堆里一动不动，像块礁石。人潮过去，她还在原地。他就是在那块礁石旁边掏的盒子。她仰着头看花，看了很久，久到他手心里全是汗。她说，等桂花开了再说。他把盒子收了，陪她往回走。那天她话比平时多，说茶，说楼，说桂花开了带他回天门喝桂花糖水。

盒子里那枚戒指，是他攒了十个月的工资加年终奖，托人在江汉路挑的，素圈，没有石头。他原本备好了一肚子的话，从大学的公交讲到云香居的石阶，一句都没用上。回去的地铁上，盒子在外套兜里硌了他一路，他没有掏出来看第二眼。

从樱花道出来，他在门口请她挑了一把糖画。师傅问要什么图案，他还没开口，她说，随便。师傅给她浇了一只凤凰。她举着凤凰举了一路，到家化了半边，也没有舍得吃。

桂花开了，他再提，她说快了。入了冬，他明白过来，快了，是家里那关没过。

蔡母的反对，从他俩的事一露头就没有停过。

蔡母年轻时在云香居坐桌，跟苏彩娥一张桌坐过。苏家的闲话，当年牌桌上讲了多少，蔡诚不知道。他只知道母亲提起那一家，从来只有三个字：那个家。

腊月里摊了牌。蔡母把话挑明：苏家的伢，命里的事说不清。娘是那样没的，孤老太婆带大的姑娘，根上就薄。你蔡家三代单传，克家的话，宁可信其有。

旧话里最毒的一句，是牌桌上的一件小事：那年苏彩娥赢了钱，给女儿买过一双新棉鞋。蔡母说，你看，命薄的孩子，才穿人家的喜鞋。蔡诚后来把这话学给唐穗听。她低头笑了一下，说，棉鞋穿过的，很暖。他从此不跟娘传话了。

蔡诚说，妈，那是意外。

订亲之前，蔡母还安排过一场相亲，对方是她同事的闺女，在银行上班。蔡诚去了，喝了杯奶茶就回来了。蔡母问怎么样。他说，人家挺好的。蔡母说，挺好你还愁眉苦脸。他说，妈，我认了。从那以后，蔡母再没安排过，只把反对的话，一句一句攒着。

蔡母说，意外？大冬天的西湖，说意外就是意外？你别忘了你是什么家的伢。

那晚蔡诚在江边走了两个钟头，回到出租屋，给唐穗发消息，打了删，删了打，最后只发了三个字：对不起。

第二天傍晚，蔡母来电话，声音变了。她说，那个姑娘今天来过了。

唐穗是那天下午去的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手里一盒点心：粗纸的盒，棉纸的衬，盒盖上毛笔小楷四个字，念庐手制。芝麻焦切、桂花麻糖、生姜糖，一样一样码得整整齐齐。她进门换鞋，坐下听蔡母讲话，从牌桌上的旧事听到年货的价钱，一句不接，只斟茶。头一泡，苦；第二泡，涩；第三泡下去，蔡母的话少了。

蔡诚下班到家，看见娘坐在灯下吃焦切，茶盒开着摆在桌上。娘说，点心的手艺是正经手艺。姑娘也稳当，话不多，是个过日子的人。顿了顿，又说，伢的事，随你们。

那盒点心吃到出正月。蔡诚后来问她，那天跟娘说了什么。她说，什么也没说，听了一下午。

后来他还听说，那天下午唐穗在蔡家坐了四个钟头。蔡母跟她小姑子讲过一回：那姑娘的话少，可耳朵全在。你说东，她点头；你说西，她也点头；你

讲到当年牌桌上的闲话，她斟茶的手，稳得跟没听见一样。蔡母讲到这里停了停，说：怕就怕这种稳。

· · ·

订婚宴摆在腊月，汉口老字号的小厅，两桌。

男方一桌：蔡母，舅舅姨妈，一屋子的热闹。女方这边，唐韵秋老太太坐主位，七十一岁的人，深灰呢子外套，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旁边帮着张罗的是店里来的姑娘——蓝溪，西湖路店里那个，扎马尾，端茶点，摆喜糖，手脚麻利。

蔡母原怕冷场，提前三天就排了席位。真到了那天，冷场的是她——女方那桌太静，静得有序：老太太动筷，桌上才动筷；蓝溪上菜，报菜名，声音不大，一字是一字。蔡母在男方桌上跟她小姑子咬耳朵：这家人的规矩，比咱们老。小姑子说，这叫大家风范。蔡母撇撇嘴，到底把腰坐直了些。

喜糖旁边摆了两盒茶，棉纸包着，盒面上印着嘉木茶事的字号。

敬茶的时候，唐穗双手把茶盏捧到老太太面前，按老太太那辈的规矩，改口叫了一声妈。唐韵秋应了。蔡诚看见，老太太的眼圈头一回红了。

第二回，是舅舅问起亲家。老太太说，穗穗六岁进我唐家的门，是我一口汤一口饭看大的。说到六岁两个字，她的声音停了半拍，端起茶盏抿了一口，眼圈又红了。

第三回，是蓝溪端点心上来。老太太尝了一块麻糖，说，这手艺，像我年轻时的做法。满桌人笑，老太太也笑，笑着笑着眼睛湿了，拿手绢按了按。

唐穗全程得体。斟茶，布菜，替老太太挡酒，笑得不多也不少。

舅舅们轮着敬酒。敬到老太太面前，老太太举茶代酒，有个表弟嚷嚷，姑奶奶这杯得是真酒。话音没落，唐穗抬手，把那杯酒接过去，自己喝了，杯底朝天，一滴不洒。满桌静了一下，又热闹起来。蔡母在桌子底下踩了蔡诚一脚，不知道是夸还是别的。

宴席过半，蔡诚去里间倒水。休息间的门虚掩着，蓝溪在里面收点心盒子，问了一句：您家没有别的亲人了吗？

门外，他听见自己未婚妻的声音：

“有。”

顿了顿。

“都在忙。”

蔡诚端着两杯水站在门外，没有进去。他想起自己这头，舅舅姨妈表弟挤了一屋，吵得人脑仁疼。他把那两杯水慢慢喝完了，才推门进去，脸上带着笑。

蓝溪收礼金，收一笔记一笔。喜糖是蔡母亲自配的，八块一包，讲究成双。蓝溪分糖数得仔细，多的退回去，少的补上。有个小孩闹着多要一块，蓝溪蹲下去，往他兜里塞了两块，说，别告诉你娘。

散席的时候，蓝溪跑来跟他学话，说礼单上她的字是店里练出来的小楷。蔡诚说，练得像刻出来的。

回来的路上，蔡母坐在车上看窗外，忽然说：那个苏彩娥，牌品其实不差，就是命苦。蔡诚握着方向盘，没接话。这是他活到二十三岁，头一回听娘说这句话。

选日子在年后。蔡母翻着老黄历，跟唐韵秋通了三回电话，把二〇一八年的好日子一个个挑出来，圈上。婚期定在五月。

送日子那天，两家一起吃了顿饭。席上唐韵秋话不多，临走拉着蔡母的手说，穗穗的亲事，往后拜托亲家母了。蔡母嘴上应着，回去跟蔡诚讲：你丈母娘那双手，凉的。蔡诚说，五月里就暖了。

送日子之前，他头一回进念庐。老宅的门槛高，天井里晒着陈皮，堂屋的条案上摆着一面相框，相框里的纸早就黄透了。唐韵秋给他的茶，第三泡才开

口说话，说的是：小蔡，穗穗夜里怕吵，往后卧室里别放电视。蔡诚笑着应了，把这句记下了。

席散了，唐穗只提了一个要求。

“莫选冬天。”

蔡诚说，冬天办酒，酒席还便宜些。

她笑了笑，踮起脚，替他把领带的结正了正，没有答。

窗外落着立春后的第一场雨。黄历摊在桌上，五月那一页，红圈画了两个。

◆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天门，夜。

晚饭后他出的门。秀珍在看电视，问他带不带钥匙。他说带，出去走走。

白天他照常上班。队里没有他的硬任务了，他帮着看两份旧卷。食堂的午饭是粉蒸肉，他吃了两碗。没有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连他自己，也只允许自己在天黑以后知道。

十二年，每年的这一夜，他都睡不成觉。头几年是硬躺着，数房梁，数到后半夜。后来他不跟自己较劲了，索性出门，把一条路从头走到尾，走完回来，才睡得着。这条路线，他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包括秀珍，包括蒋阔。

这条路也是一年长一截的。头几年他走到第二站就折返，走完四站，是近几年的事。蒋阔有回问他在忙什么，他说，在走一条旧路。蒋阔问，去哪。他说，路不远，就是长了点。

出门前他在阳台站了一会儿。楼下广场舞的音乐九点准时停，卖烤红薯的摊子也收了。他把小笔记本揣进大衣内袋——这已经是身体的动作，不用想。米面柜就在玄关旁边，他照例从柜旁擦身过去，没有开柜。这是家里的规矩，也是他自己的规矩：那口柜子，他从不当着秀珍开。大衣是秀珍逼他穿的，十

一月的夜风里已经有刀子。秀珍送到门口说，别走远了。他说，惯了，就那几步。

第一站，西湖的亲水平台。

十二年前的这一夜，湖面也是这样的雾。雾里来来去去的人，穿雨衣的，穿制服的，看热闹的。如今只剩他一个，还是穿大衣。

出门没多远，巡逻的警车从身后过来，放慢了。小年轻摇下车窗，喊了声竺队。他摆摆手，说，转转。车走了，尾灯在雾里拐过街角，像一颗慢慢熄掉的火星。

这个时辰湖上起雾，路灯的光进到雾里，一团一团的，像泡开的老茶头。对岸陆羽故园的门楼黑着，只剩檐角的轮廓。他站着，一站十分钟。看什么，说不清。雾底下十二年前泡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可他看的是雾。头一年走这条路的时候，他手里还捏着没递出去的讯问提纲；如今手里捏着的，是一杯自己泡凉了的茶。

十二年，湖岸修了步道，装了灯，栽了新柳。只有雾还是老样子，从水面上起来，不紧不慢。他有时候想，全城只有他一个人在过这个日子；有时候又想，这日子像湖底的桩，绊着谁，只有水知道。

第二站，工人文化宫旧址。

二〇〇八年拆的，如今是商住楼，底下三间门面，一间房产中介，两间卖手机。当年二楼的少年活动室，窗外正对一棵歪脖子柳树。剪纸班的孩子在里头学剪窗花，他有一年办案路过，隔着一条街听了半堂课的笑声。先生教的头一样是磨剪刀，他那时不懂，学剪子为什么先学磨。现在懂了——手上有没有分寸，全在磨的那几下。如今柳树没有，笑声没有，玻璃门里挂着房源广告：三室两厅，南北通透。

中介的玻璃墙上还贴着规划图。望湖仓那一片，红线画成了景观带，图例上写着四个字：文化设施。他在图前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这条红线落地的那一年，那片地上会立起什么。城市跟他打了个哑谜。

有一年他在这里碰见过当年剪纸班的一个孩子，如今领着自己的孩子在门口买煎包。两家打了招呼，谁也没提从前。从前是什么，文化宫三个字，如今连公交站牌上都不用了。

第三站，望湖仓。

围挡立着，铁皮的，锈成猪肝色。卷帘门锈死了，门缝里挤出一蓬枯草。他掏出钥匙串上的小电筒，照一照门楣。十二年了，年年照。门楣上什么也没有，他就照一照。当年警戒带就拉到这里，雨刚停，河埠头的淤泥里那串三十三码的鞋印，石膏模取了，后来模子在移送的路上遗失。鞋印没有了，泥早就干了，只有他记得尺寸。

他在围挡外站了一阵。兜里那包烟是十年前戒下的，戒了烟的人爱揣一包烟，不点，揣着。今晚他点了一根，就着围挡上的锈色，看烟头一明一灭。

案发那年冬天，他在这个门缝里守过整夜。守夜的人最容易相信，门会自己打开。门没有开。后来他懂了，门不是不开，是开的时候，守夜的人早就换了岗。

那年冬天过后，仓就再没有租出去。政府收储了，挂过牌子说要改文创园，围挡立起来，牌子又摘了，一搁十几年。他提过一句，这地方该立个案牌，哪怕一块字，写明此地曾经是什么。没有人接他的话。城市在往前走，往前走的城市，不看身后。

第四站，松风茶行旧址。

如今是一家连锁奶茶店，粉红的灯箱，音响里放着他说不上名字的歌。两个中学生趴在柜台边上写作业，等单的号排到七十几。他在队伍末尾站了一会儿，像排队。他看的是柜台后面那堵墙——当年松风茶行的账台就在那个位置。案发前一个月，沈松庭还在那里清过一回账，一块五一块五地数，数完用报纸包上。

两个学生写完作业，一人捧一杯走了，走过他身边还在争一道题，声音清脆。他侧身让了让。他想起秀珍说过，这世上的热闹，一半是给活人过的，一

半是给日子过的。他没问过她这话是从哪里听来的。

奶茶店的姑娘问他要点什么。他要了一杯最便宜的热的。菜单的灯箱上印着二十几样名字，没有一个字跟茶行沾边。他这一辈人管茶叫茶，现在的孩子管茶叫奶盖、三分糖。姑娘问，加珍珠吗。他说，加。甜得他皱眉，捏在手里，一路没喝完。

回程，他绕到西湖路。

嘉木茶事的门脸他听说过，城里的茶店拢共几家，这块招牌去年挂起来，听说生意做得体面。今夜他走近了才看见：卷帘门落了锁，玻璃门里黑着，门上端端正正贴着一张纸。A4的纸，打印的宋体，四角用透明胶带绷平：

本店年度封仓，十一月十八日。

全城的店，今天没有一家歇。只有这一家，把日子印出来，贴在门上，一年一度。

他认得这种贴法。年轻时候，红茶厂每年入冬封仓，门上贴红纸，毛笔字，浆糊刷四角。如今毛笔换了宋体，红纸换了A4，浆糊换了透明胶。贴的手艺没变，那个贴在门上的日子，倒是新的。

他站在封仓两个字前面，站了很久。那句话的措辞，他在心里又过了一遍：本店年度封仓。年度，是一年一度；封仓，是茶行的旧话。一家新店，两个旧词，用得一丝不苟。雾从西湖那边漫过来，落在肩上。奶茶店的音响在半条街以外响，玻璃门里的黑，像一口扣着的锅。老茶行有封仓的旧俗：一年茶事做尽，择一日封仓歇火，来年再开。可旧俗里没有写死日子，更没有把日子昭告在门上的。

他隔着玻璃往里看。白墙上挂着一幅字，小楷：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账台是原木的，台面空着，擦得很净。台后头有一样东西罩在玻璃罩里，金黄金黄的，隔着夜色看不清是什么。他看了一会儿，把电筒收了——人家店门关得好好的，他一个路人，隔着门玻璃看得太久，就成了别的。

他掏出随身的小笔记本，就着路灯写了一行：

他们把祭日，过成了店规。

写完，笔帽按上，很轻的一声咔。

这个本子是他的第十二本。前十一本都在米面柜的箱子里，一本一年，一年一条街。第一本的头一页他记得：雾大，卷宗号，还有一张他画的简图。往后每一年这一页，都只有四个字：今日无事。写到今年，他忽然不想写今日无事了。

队里的老人，只剩他一个还记着这条路。曹德贵退了以后不大出门，去年在菜场碰见，拉着他说，老竺，有些案子是留给老天爷的。他说，老天爷不办案。曹德贵笑了，说，你呀，还魔征。

他又把那张纸看了一遍，转身往回走。走到巷口回了一次头：A4纸在玻璃门里泛着白，像湖上的雾凝在了门上。

奶茶店的粉红，手机店的白，茶店的黑底金字，在雾里一盏一盏亮着。他在街口站了最后一会儿，把三块招牌并在一起看了一遍。雾大，每块招牌都毛了边。他拢了拢大衣往家走，到家门口才发觉，那杯甜奶茶一路被他攥在手心里，攥温了。

到家，钥匙插进锁眼之前，他在心里把今晚走过的街数了一遍：松风茶行，嘉木茶事，奶茶店。同一条街，换了三块招牌。他还数了步数：从西湖到松风茶行，一千八百步；从松风茶行到嘉木茶事，三百步。这些数字，他记得比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还熟。

秀珍在里屋问，回来了？他说，回来了，雾大。

秀珍说，雾大就早点睡。

他把手里那半杯凉透的奶茶倒了，杯子洗干净，倒扣在沥水架上。做完这些，他站了一会儿。他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洗这只杯子，就像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走那条路。有些习惯养出来，不问来历。

他应了一声，躺下。黑暗里他想，那家茶店，他从来没有见过老板娘，记得住的只有门上那张纸，和玻璃罩里金黄金黄的一团。明年不必派谁来，他还要亲自走一趟。这条街记得的事，比这条街的人多。

◆

二〇一七年冬，竟陵老街。

腊月里，兰州的学生寄来一张剪纸贺卡，剪的是黄河铁桥，剪口毛毛的。齐守拙戴着老花镜看了半天，高兴了一下午。文化宫二〇〇八年拆了，剪纸班散了，学生丢在天南地北，年年只有两三张卡片来。他一张一张收着，收在堂屋的抽屉里，压在装裱刀底下。

他记得班上有个白净的男伢，左手用剪，剪的喜鹊尾巴一根一根，比女娃还细。散班那年，他给每个学生发了一把小剪子、一颗水果糖。那伢把糖含在嘴里，剪子揣进书包，出门前朝讲台鞠了半躬。另一颗糖的去处，他后来在样册的暗层里见过——有人把它剪成了一颗糖的模样，纸的边角，还带着糖纸的锯齿。

他的糖塑摊子早就收了。装裱的活也少了，手抖，浆糊刷不匀，眼却还亮。老街两间平房，堂屋摆着装裱案，案上糊着旧报纸；里屋睡人，樟木箱里睡着他的样册。

腊月的老街，早上有打霜的声音。他起得早，把两间屋的火生起来，堂屋一盆，里屋一盆。街坊隔着墙喊，齐伯，你这不是过冬，是炼丹。他笑笑，不接话。

兰州那张贺卡的背面，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齐老师，我现在教我的闺女剪窗花。他看了三遍，用镇纸压平，收进抽屉最上层。

样册是他自己装的。蓝布面，三十六页，页页有套层——当年在汉口学徒，师傅教的第一手绝活就是夹层：纸里套纸，册里藏册。蓝布面如今磨出了白边，他不换。旧的布面认纸，新的布面压纸，这是行里的讲究，也是他的私

心。文化宫的那些年，样册摆在讲台上，孩子们一人剪一张贴进去。拆迁那年，他把样册抱回老街，暗层里的纸，跟着他搬了家。

从那以后，暗层里的纸，只多，不少。他从来没有撞见过送纸的人。

那些纸的剪口，他认得，有两种：一种起刀在左，一种起刀在右。像一问，一答。

起初他当是哪两个学生的恶作剧，查过，问过，没有结果。后来他不查了。纸来，他收；纸去，他递。十几年，他成了这条看不见的路上一截桥。装裱匠一辈子跟纸打交道，知道纸的脾气：纸不说话，纸记事。这两沓纸记下的事，等它们肯开口那一天，他怕自己不在了。所以他一页一页，收得整整齐齐。

暗层里的头一张纸，他也记得。剪的是一扇窗，窗棂里坐着个看书的小人。那天他给全班讲夹层的手艺，下了课，纸就在夹层里了。他追出去，操场上只有跳皮筋的女生，皮筋的高度一层比一层高。

除夕那天，他自己打了浆糊，贴了春联，把灯笼点起来挂在门口。灶王爷是年前就祭过的，一盘糖瓜，三炷香，嘴里念念有词：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念完他自己笑了——灶王爷管人间烟火，管不了纸上的事。

春联是他自己写的：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写完退后三步看了看，说，老了，捺不出锋了。街坊路过说，齐伯，比街上买的强。他说，那是你没见过我年轻时候。

灯笼是他自己糊的，竹篾的骨，皮纸的面，晚上一点，巷子里透出一团暖红。灶上煨着藕汤，午后包了一屉汤圆，芝麻馅的，搓得溜圆。对门的小两口来请他吃年夜饭，他摆摆手，说灶上有汤，你们年轻，热闹你们的。

下午他睡了一觉。醒来日头偏西，索性去陆羽公园走了一圈。茶经楼的檐角上落着雪，湖边有人在拍全家福。他站在陆羽像前看了看，铜像捧着书，不捧茶。他想，茶圣要是晓得，两千年后有人拿他的字当招牌，不晓得念不念得对。想完自己先笑了，笑自己多嘴。

回来把剪子磨了磨。手抖，磨不动，就用手在磨石上比划比划。案头的红纸裁好了一沓，留着初一剪福字，方胜纹的边，里头一个篆书的福。他这个年纪，画样子比剪还慢，可他不肯省这道工序。

他这个人，年过得素净，可一样不缺：春联，灯笼，汤圆，福字。一个人过年，过得像一套工序。

天擦黑，门缝底下进来一张纸。

傍晚巷子里有孩子跑过，他叫住一个，塞了一张福字。孩子举着跑了，像举着一面小旗。

薄薄的，从门槛那道缝里滑进来，停在他的布鞋尖前。他弯腰捡起来，就着灯笼光一看，是一张剪纸：一位老人坐着，一个小人捧盏奉茶。老人的衣纹用了排剪，细得像装裱排刷上的毛。

他的手抖了。不是怕。是认出来了——起刀在左，收刀在右。这双手，他认了十几年，只是从来没有见过这双手的主人。

他把门拉开。巷子里，家家的灯笼都亮了，鞭炮碎屑铺了一地。巷口立着一个人，戴帽子，瘦，年轻，朝这边望了一眼，转身走了。

齐伯追了两步，喊了一声，没有喊出名字——他不知道名字。第三步腿不行了，扶住墙。那个背影在巷口的灯笼光里拐过去，再没有回来。

他兜里其实有糖。剪纸班散了这些年，他兜里常年揣着两颗水果糖，改不掉。等他摸出来的时候，巷口只剩灯笼光。两颗糖攥在手心里，攥出了一点黏。

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对着空巷子说：

“汤圆给你们留着。”

巷子里没有人应。远处谁家的炮竹响了两声，灯笼光在青石板上晃了晃。灯笼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影子比他高，也比他直。他看了一会儿自己的影

子，说，你还行。他举着灯笼照了照门槛。门缝那道口，里外都扫得干净，没有脚印，没有霜。纸是怎么进来的，跟十几年来的每一张一样，没有答案。

· · ·

夜里，他把那张奉茶的老人收进样册。

样册从樟木箱里请出来，摊在灯下。他翻开暗层，要把新纸放进去，手停住了。

暗层里已经多了一张新的。

剪的是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微微地回头。男孩身后是亮的，剪出一片开阔的白；脸是暗的，整个剪空了，只剩一个轮廓。剪口极稳，稳得不像夜里的活。

暗层里的纸他收了十几年，早摸出了规律：起刀在左的手，多剪物件，楼，桥，船，灯；起刀在右的手，多剪人物，捧茶的小人，打伞的老人。今夜这张，起刀在右，剪的却是一个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一个从不曾在这沓纸里出现过的，人。

什么时候放进来的？他这半个月没有翻过样册，樟木箱的锁好好的。十几年了，纸只多不少，送纸的人一个也没有露过面。今夜巷口那个背影，和这张纸，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他掰扯不清。

剪空的脸，他替它想了一夜。想来想去，想起那个白净的男伢，小时候就爱把帽兜拉起来，天不冷也拉着。他把这个念头按下去，像按住一张不平的纸。

他把那张纸举到灯下，前前后后地看。装裱匠看纸，先看纸的气色。这张纸有霉气——不是受潮的霉，是一种沉在纸里化不开的暗，像好宣纸叫烟火熏过。他想起暗层里别的纸：双童，奉茶，灯笼，一座楼，张张都是干净的。

他找出一只小樟木匣，把那张戴帽子的男孩单独收进去，扣上盖，又把匣子搁到案头最高的一格。

那只小匣，从前装他的刻刀和印泥，出师那年师傅给的。如今装一张纸。他想，师傅要知道，准得骂他暴殄天物。可师傅要是看了那张纸，也会让他收起来的。

他对着空屋说了一句：“纸不吉利，不能压在好人底下。”

说完，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围裙是几十年的旧物，洗得发白。他想，人这一辈子，也就是一块围裙上的功夫。

奉茶的老人放进暗层，跟那些纸睡在一处。收纸之前，他把两张纸并排放在灯下，一张起刀在左，一张起刀在右，比了又比。装裱匠看纸如看人，这两张纸挨在一起，像两个人隔着一盏灯对坐，一句话也没有。翻样册的时候，他在某一页停了很久——那一页夹着一张剪纸的灯笼，剪于很多年前。他把灯笼对着电视的光举起来，灯笼里透出红。他跟灯笼说，又一年了。

他把样册合上，掌心在蓝布面上放了放。这册子跟了他几十年，装过学生的窗花，装过他自己的习作，如今装着两个伢半辈子的悄悄话。纸这东西，看着最软，存起事来，比石头还硬。

十二点未到，春晚正热闹。电视里的人唱歌，唱的什么，他听不清。唱到一半，炮竹先响起来，把歌声盖住了。他把电视的声音调大，像跟谁抢一句话。硝烟味从门缝里一丝一丝挤进来，满屋都是过年的味道。

灶上的汤圆用温水煨着。芝麻馅是年前现炒现磨的，香得很。他想，两个伢都瘦，要多吃一口甜的。他抱着一摞样册坐在藤椅上，像抱着几十年。灯笼还亮着，光透过窗纸，屋里一团暖红。

零点的炮竹轰然而起，满城的狗叫成一片。老人在藤椅上睡着了，样册从怀里滑下来一半，一只手还搭在上面。

暗层里，新剪的纸还带着剪刀的凉。

第七章　做旧

茶为累也，亦犹人参。

二〇一八年五月，汉口花园酒店。

婚礼定在中午。蔡诚天不亮就醒了，躺在床上听中央空调的风声，听楼下早点铺卸卷帘门，哗啦一声，天就亮了。

他这辈子头一回穿西服，领口勒得慌。化妆师往他脸上扑粉，说新郎别眨眼。伴郎们举着手机在身后拍，拍一张，笑一场。

上午接亲，堵门的姐妹们出了三道题：背诗，数茶，认糖。背诗那一关没人过得去，最后红包开路。认糖那一关，桌上摆一盘天门糖塑，龙、凤、石榴，让新郎挑出凤凰。伴娘是穗店里的店长，圆脸，姓蓝，板着脸当门神，红包塞够了才放行。

签到台摆在宴客厅门口，礼金簿摊开着。蔡诚排队的时候，扫见旁边那张手写的席位表，桌号、人名，全是她的字，收笔干净，没有连笔。他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头一回见她写的字。字跟人一样，端正，见棱见角，笔画之间谁也不挨着谁。

穗坐在床沿上等。一身白，脚上一双平底的鞋。有人起哄让新郎找鞋，找了半天，鞋就在床底下，摆得端端正正，鞋尖朝外。

酒店三楼宴客厅，司仪在台上念串词，念一句，台下笑一片。串词里说：新郎，武汉大学高材生；新娘，茶圣故里的名片。

大屏幕上放照片。婚礼公司的模板，别人的婚礼都从满月放起，一路放到大学，放到求婚。穗十二岁以前的照片只有三张：一张百日照，胖得看不出眉

眼；一张背着书包站在西湖路早市口，手里攥着半只锅盔；一张站在领奖台侧面，灯光打在她背后，只照出半张脸。

十二岁以后，照片多起来。放得最久的一张，是十七岁的她坐在茶台前。侧脸，手腕悬平，注水成一条线，线不粗不细，从头到尾没抖。照片底下一行小字：《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本报记者何采采。

台下有客人小声说：跟真人一个模子。又有人说：郎才女貌。蔡诚站在台侧笑，手心全是汗。

他和穗不算熟。初中同校，不同班，毕业以后各上各的学。前年冬天，他母亲翻出一桩旧关系来，说云香居的老牌搭子里，论起来有一位远房的唐老师，唐老师身边带着个女儿，就在汉口学茶。母亲说：她妈手气臭，人好。

就这一句，算保媒的话。

见了三面。第四面是蔡诚求的婚。后来同事起哄，问他图什么，他喝多了说了句实话：跟穗坐在一块儿，像坐在一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里，你舍不得把脚跷上茶几。

拜堂敬茶，敬到男方这桌，穗把茶盏举过眉毛，改口叫了声妈。蔡母眼圈一下红了，红包塞过去，手在抖。

敬到主桌，唐韵秋穿一件深灰旗袍外套，头发抿得一丝不乱。轮到她讲话，她说她教了四十年书，最后一课是学生教的，教的茶。她端起杯子，念了一句：〝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念完，先敬亲家，再敬小两口。杯子放下去的位置，跟端起来的时候分毫不差。

她说：我把她交给你，你记住这句话。

回礼是一支旧钢笔，笔帽上的镀金磨没了。她说这枝笔写过四十年教案，写字的人，笔要旧，字要新。

交换戒指。司仪问新郎，蔡诚说我愿意，声音大得自己吓一跳。问新娘，她隔了两秒才点头，声音不大，字字清楚。

婚纱白得像一张纸。婚后蔡诚在日记里改过这个比方：不是纸，是棉纸，还没压过茶饼的那种，灯一打，透光。

敬酒从主桌敬起。穗的杯沿永远比对方低一寸，话不多，敬到谁，谁就多说两句。一圈下来，客人喝高了，她一滴没沾，脸也没红。婚鞋是平底的，她穿了整整一场，背挺得笔直。

伴手礼是一小罐茶，白棉纸封口，罐身上印三个字：嘉木茶事。蔡诚的同事掂着罐子小声问，这茶金贵吧。他说，家里开的店。

宴席过半，有客人举着手机凑过来，屏幕上是十年前那篇报道，标题旁边的少女和台上的新娘叠在一处。人家问，你媳妇就是当年那个小茶仙？他说是。人家说，那你可有口福了。他笑笑，没接这句，给人家把酒满上。

天门那桌散得最晚。他母亲跟几个老姐妹讲天门话，讲一阵，笑一阵。蔡诚过去敬酒，母亲拉住他，压低声音：穗这孩子，稳当。

后来他去添茶，回头看见两位母亲坐在了一处。蔡母的手在唐韵秋手背上轻轻拍着，讲得亲热，讲的大约是云香居，是麻将，是哪一年落过的雨。那是两个女人头一回坐在一起。蔡诚隔着两步远看着，只当是天门老乡见了亲。

合影的时候，摄影师喊，两边父母站拢一点。蔡母和唐韵秋挨着站了，一位烫着卷发，一位头发一丝不乱。快门响之前，蔡诚看见穗的视线从取景器那边收回来，落在她自己的一双手上。

敬到最后一桌，是他武汉的同学。一帮人起哄，非要小两口牵手碰杯。穗把手伸给他，手心干的，凉凉的。他的手心全是汗。两只手握在一起，谁也没提这件事。

散席的时候，蔡诚在走廊里看见穗跟酒店的经理对账。单子一页一页翻，酒水、餐位、服务费，一笔一笔划掉已付的。经理的头越点越快。签完字，她把单子折好交给蔡诚：收好，回头发你邮箱。蔡诚接过来，忽然觉得这场婚礼从今天起，就归档了。

目送宾客，酒店门口的风一吹，彩带贴了一地。

· · ·

婚后住汉口，两居室，离蔡诚单位两站路。

家里精确。玄关挂一只圆钟，穗陪嫁带来的，比北京时间快五分钟。蔡诚对过三回，回回快五分钟。他说要调，穗说：″早五分钟，一辈子不用迟到。″

她自己的表也快五分钟。

后来他习惯了。开会、赶车，他成了全处室到得最早的人。

他把打了三年的游戏也卸了。不是穗催的，穗从不催。他打到半夜出来倒水，客厅一定留着一盏小灯，书房门关着。第二天早饭照常出现在桌上，粥的温度刚好入口。他忽然觉得没意思，就把游戏卸了。

卸了游戏，晚上多出两个钟头。他试着看书，看进去的没几页，倒把家里看熟了。这个家像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电路，每条线都有绝缘皮，每个接点都拧得很紧，走电走风的可能微乎其微。他是学电气的，晓得越是这样，越难找出毛病。

衣柜按色阶排，从白到灰到青到黑，像一排渐变的茶汤。他的在左，她的在右，中间隔一块樟木。茶几上，遥控器贴着桌沿，杂志压住遥控器一角，压住的那道边，永远一样宽。

厨房抽屉里有一本账，柴米油盐，一笔一笔。超市小票按月份贴在后面，贴得平平整整。蔡诚翻过一回，翻到自己都忘了的一笔：相亲那天，他多找给出租车司机的十块钱，她记了，备注是：补。

家里的东西坏了不修，换。灯泡、水龙头、纱窗，穗像会算命，总在坏之前把备件买好，搁进储物间，标签朝外。蔡诚说这叫过度操持。穗的理由是，过日子的诀窍，是把意外提前买回来。

穗睡前把第二天的衣服搭在椅背上，抚平袖子，关灯。蔡诚看书看得晚，合上书的时候，身边的呼吸匀匀的。他从来不知道她是几点睡着的。她总等他先睡。结婚以后，他没见过她睡着的样子，也没听她说过一回梦话。

她的午觉睡在书房的躺椅上，门掩着。等他下班到家，人已经起来了，毯子叠成一块方砖，躺在椅面上。

秋天他重感冒，烧到三十八度五。穗请了两天假，水温两小时一换，药按顿分好，粥熬到米开花再滚半刻钟。夜里她坐在床边的小凳上，不开灯，隔一阵探一探他的额头。病好那天，他躺在床上，居然有点失落，像一件东西被修好送回了原处。

他的应酬她从不跟去。他喝多了的晚上，进门能看见玄关搁着一杯温的蜂蜜水，杯子底下压一张便签，写着他明早要带的东西。同事都说他娶了个好老婆。他也这么觉得。

有一回同事聚会带家属，散场落大雨，别人的媳妇都挤在走廊里等伞，穗站在檐下看雨。别人叫她，她回过身，先帮着把湿伞收好，再把裙摆上的水珠抿掉。就这么两下，蔡诚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婚礼上唐老师放杯子的那一下。一模一样的稳。

家里那把裁纸剪刀，她用完就用皮筋把两片刃扎起来，放进抽屉最里面。

穗每年两次体检，报告回来，她拿夹子夹好，按年份排在书房的文件格里。蔡诚的那份她也管，哪一项箭头朝上，第二天家里的油和盐就换了牌子。他的衬衫领口磨薄了，第二天衣柜里挂着新的。他的日子过得没有褶皱，像一张熨过的纸。

每年十一月十八号，穗把自己关进书房，一整晚。第二天出来，手上有一股淡淡的浆糊味。蔡诚问过一回，那天是什么日子。她说，盘点。后来他在网上查过店里的注册信息，注册的月份是九月。

他没再问。有些事不问，不是不好奇，是问了就得接话，他还没想好自己要说什么。

有一回他半夜渴醒。客厅没开灯，书房门缝底下也没有灯，他听见很轻的一声——咔。像剪刀合拢。

他站了几秒，回房了。

第二天早饭，他把粥碗往嘴边一放，状似随意：昨晚你在书房？

穗往他碗里添了半筷子菜：″梦见了吧。″

笑得很稳。

蔡诚也笑。人做梦，哪能做出声音来。这话他没问第二遍。

书房角落立一只铁皮柜，灰绿色，半人高，挂一把黄铜锁。钥匙穗随身带，跟车钥匙拴在一起。柜顶不许落灰，穗每周擦一遍。蔡诚从来没问过里面是什么，她也从来没提。

有一回他帮着收拾书房，想顺手把柜顶也擦了。穗从门口过来，接走了他手里的抹布。那个柜子，她不假手于人。跟泡茶一样，跟剪指甲一样，跟这个家里的所有边角一样。

十月底，丈母娘查出肺上的病，住进了医院。打那以后，穗的周三固定去了汉口的医院。蔡诚说要不陪她去，她让他周末好好休息，说她一个人去就行。

年底，蔡诚在日记本上写了一页。工科生的字，一笔一画：

她照顾我，像照顾一间店铺。铺面很好，我只是不晓得打烊以后，里面还有没有灯。

其实十一月底还有一条，更短：十一月十九。昨夜书房灯到很晚。今早她手上又有浆糊味。我装作没闻到。

写完从头看了两遍，把日记本塞进抽屉最底下，压在一摞电器说明书中间。

窗外落了那年冬天的头一场雨。

◆

二〇一八年十月，汉口，一盏楼。

简明堂的一天比整栋楼早一个钟头。六点，烧水，烫壶，投茶，头道洗茶倒进水盂。窗外长江还压在雾里，茶汤已经在桌上亮了。

老伴还在睡。三十年了，他泡茶的声音她从来听不见，倒是楼下面包店的烤炉，五点五十准时响，她嫌吵。两个老人，一个守着老手艺，一个守着老觉，井水不犯河水。

一盏楼临街两开间，门脸小，进深大。柜上不卖茶，只做两样生意：看茶，讲课。看茶一次三百，讲课一年两班，每班十二人，多了不收。门楣上悬一块小木匾：半盏翁。

上手有三条规矩，徒弟们背得滚瓜烂熟：白手套，当面说真话，照片不出门。

简明堂十六岁进汉口的老茶庄当学徒，师父教的第一课不在茶上，在一张人参图上。师父说，茶经上讲了，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人参拿芥尼冒充，吃坏的不过一个人；茶拿新充旧，骗走的是人家的岁月。这句话，他记了五十四年。

秋班开课那天，十二个学员坐满里屋。头一课不看茶，看手。他让每个人把双手摊在灯底下，说，看茶先看手，手上没有茧子没有茶渍的，趁早改行，做个喝茶的福气人。底下笑。有个学员问：简老师，如今假茶做到什么份上了？他说：纸能做旧，版能做旧，仓味能做，一样一样都能做。学员问：那还剩什么？他端起茶杯：还剩我这双眼睛。

开课第二天，有位老主顾拿来一饼号称文革时期的砖茶。简明堂上手看了半刻钟，退回去，说，东西是好东西，茶是好茶，就是年轻，顶多十年。老主顾不服，说卖家拍了胸脯的。他说，他的胸脯保他的钱，我的眼睛保我的脸。你要听好话，汉口有的是地方；你要听真话，就这三百块。老主顾坐了半天，临走把三百块压在桌上，说，下回还带东西来。

傍晚关店，又来了个熟客，把一饼茶搁在案上，不说话，只看他。简明堂看茶，看完了，抬头。熟客说，外头都传，您给一〇七号背了书。他说，我写

的意见在图录附录里，一个字一个字，你自己看。熟客看了，半天，说，老爷子，您这样，迟早得罪人。他把茶推回去：得罪人的从来不是真话，是假话。

十月十二，江城拍卖行来人，请他出山给秋拍做品鉴嘉宾。图录当天送到楼上。重头拍品编号一〇七：一九五八年千羡水桩，一筒七饼，附原装大票，标注港仓回流，传承有序。起拍价，三十六万。

简明堂把图录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千羡两个字，取自《六羡歌》。好名字。拿的是陆羽的诗。

当晚拍卖行设宴，山珍海味，主宾的位置给他留着。他称胃病，推了，让柜上的小伙计去替他坐了半个钟头。小伙计回来学给他听：酒过三巡，一位副总拍着胸脯讲，简老那边有我，一句话的事。小伙计问，师父，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意思是他们要的不是鉴定的真话，是鉴定的名气。

预展设在酒店宴会厅，射灯打得雪亮。简明堂戴着白手套，把那一筒茶请到灯下。竹篾包裹，篾色黄得温润，是拿茶油一手一手养出来的旧。解开篾条，剥开两层棉纸，破口处露出茶饼，饼面油亮，条索压得匀。棉纸上的茶油斑，一片一片，都长在该长的地方。

他心里先给了半分。

预展门口排着队。看客里穿人字拖的，穿西装的，举着自拍杆的，一筒茶围在玻璃柜里，射灯打下来，像一块新出土的碑。有人隔着玻璃问价，工作人员报了起拍价，那人咂咂嘴说，一筒茶叶，够我十年工资。旁边有人笑他：人家卖的不是茶叶，是一九五八年。

再看大票。木刻版刷的朱砂墨，字口清爽。他举起放大镜，从右下角往左上角，一个字一个字地过。看到羡字，他停住了。

第三笔，一道竖。笔直，干净。

他见过这道竖不干净的样子。二〇一五年，一筒号称五十年代的茶从他手里过，大票上这个羡字，第三笔中间有个豁口，米粒大，像刻工手滑，又像老版年深日久崩的。他当时拓了一张样，夹进私人册子。

现在，豁口没有了。补上了。补得极细，不拿指腹去蹭，只当是纸纹。

简明堂把放大镜放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来。同版。他把这两个字在心里按了又按。补掉的不是豁口，是二〇一五年留在那块版子上的记号。

品鉴席上，拍卖行请他讲两句。他讲得很少：茶经上说，啜苦咽甘，茶也。这一筒，苦是真苦。甘不甘，各位自己喝。

台下笑，鼓掌，一排手机举起来拍他。

散了预展，他借整理展品的工夫，又回到一〇七跟前。手机贴上微距镜头，拍棉纸纤维的翻边；紫外灯下看油墨，不发光。老墨本该不发光，可新墨调了茶汤也不发光，这一条作不得准。作得准的是纸色：四边深，中心浅，折痕里的色深得发黑，像拿茶汤涮过一遍再阴干的。

他站在灯下，把纸和茶分开看。纸是老态，茶是壮年。让纸老的，不是年头，是别的。

仓储的推演他也做了，借一位做仓的老朋友的路子，问了两句话。急燥仓高湿高温，三个月顶十年，催出来的是浮香，香气往前跑，跑得太快，叶底跟不上，一泡就散；再转干仓慢养两三年，面上收光，里子还嫩。老朋友打了个比方：像拿吹风机吹出来的皱纹，远看有，近看底下没有纹。末了老朋友问，老爷子，你问这些做什么，要打假？他说，我要存档。

拍卖行送了嘉宾茶样。回楼当晚，他开汤。汤色倒像样，入口只有苦，咽下去半天，喉头发紧，没有甘。他在灯下坐了很久，又想起那句：啜苦咽甘，茶也。

第二天起，他把自己关在楼上三天。蓝布面的私人册子摊开，跟了他四十年。他给这批货起了个名字记上去：千羡桩。底下一条一条地记：

棉纸，染旧，折痕积色，纤维未老化。木刻版，同二〇一五年所拓，羡字第三笔豁口已补。油墨无荧光，不作准。仓储推演——纸老茶壮，先急燥仓催陈，后转干仓做旧面。

最后一条，他换了一支小楷笔：

此人懂茶，懂纸，懂版，懂人心。手艺是好的，路是黑的。

写完，他把这几年过手的所谓回流货在心里过了一遍，像点一屉笼馒头。有个年轻的名字冒了冒尖。他把它按了回去。没有证据，名字出不了口。

他又把二〇一五年那笔旧账翻出来。那筒茶的货主是个中间人，名片还在盒子里，一家贸易公司，地址在福田，一查，注销了。再往上问，说是香港一位茶商的货，行号在上环，二楼。他托人去看过两回，一回锁着门，一回换了招牌。一条线，两头都是断的。他在册子上把这条线描了一遍，描得很轻。

一盏楼的里间有一整柜拓片，都是这些年过手的版子留下的。每拓一张，他洗一遍手，像医生进手术室。册子的前头记过许多桩做旧案：九几年的湿仓饼，零几年的做旧茯砖，一几年的高仿号级青饼。手法一年比一年细。前头的那些，他一眼看穿；这一桩，他看了三天。册子上有行旧字，他划掉了，又重新写上：这一批不像生意。

预展最后一天，拍卖行送来品鉴意见的空白页，抬头印着权威品鉴四个字，请他落笔。他捏着那页纸看了半天，写了一行：纸色老于茶性，年份存疑处，请藏家自酌。管招商的经理看了，脸上的笑像被熨斗来回烫过。他签字，用印，把笔帽按上，说了句：字我写了，话我留了。

那天晚上他多喝了半杯茶，睡不着，索性起来在学员群里发了条消息：下期加一课，讲棉纸。底下秒回一排好。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新课，是遗嘱——趁眼睛还在，把能教的都教下去。

成交那天下小雨。一〇七号从三十六万起拍，两个电话委托咬到四十万，场内一位穿夹克的先生举牌到四十五万，最后是电话委托，四十七万，落槌。掌声很响。拍卖官说：感谢各位，向时间致敬。

落槌的那一声很脆。买家是谁，全场没人知道，电话委托的号码显示是一串零。场内那位穿夹克的先生把号牌扣在桌上，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

了一眼那一筒茶。简明堂不认得他，只记得那个眼神，像看一口刚买下来的棺材，舍不得，又害怕。

简明堂坐在品鉴席上，手拢在袖子里，一滴茶也没喝。

散场，停车场出口有人等他，是那位管招商的经理，笑容很客气：老先生，您的退休金，可都压在拍卖槌底下，别砸了自己的锅。

简明堂也笑：槌是你的，眼睛是我的。

回到家，他把这句话原样记进册子，底下添了四个字：威胁存档。

老伴从厨房出来，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写字，说：饭都凉了。七十岁的人，何苦呢。

简明堂合上册子：我鉴了一辈子茶。茶假了，是我的脸；历史假了，是大家的账。

老伴把汤给他盛上，嘟囔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也没问。

其实他听清了。老伴说的是，隔壁楼的老周，茶没喝几年，人先进了医院。他把这句话就着汤咽了下去。

夜里躺在床上，他想，人这一辈子，总要守住一样东西。师父守住一间茶庄，老伴守住一个家，他守住一双眼睛。眼睛老了，还没瞎，就还得看。

睡前他把册子翻回第一页。第一页是他三十岁那年写的，也只有一句话：鉴茶如鉴人，先看骨，后看皮。他摸到柜子底下，把那张拓片抽出来，对着台灯又看了一遍。豁口里积着灰，他没有吹，用指腹把纸抚平，放回去，柜门关严。

册子放回柜子最底层，压在一摞拓片底下。最上面那张拓片边角起了毛，羡字的豁口拓得清清楚楚，像一只闭着的眼。

◆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汉口，某三甲医院肿瘤科，住院部十一楼。

顾念在这层楼做了五年护士。肿瘤科的规矩，别处学不来：话说三分，脚步要轻，翻身单上两小时一个记号，一个都不能空。

三十二床是十一月中旬收进来的。唐韵秋，七十二岁，肺上的病。片子拿进来那天，胸外科的年轻医生在走廊上把家属叫去谈了半个钟头，谈完出来，家属脸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老太太本人倒客气。问病史，答得像念课文；喊护士不喊名字，喊姑娘。床头柜上摆一册字典、一份报纸、一副老花镜。查房的时候她总坐起来，把病号服的领子抿好。

治疗方案定得快。靶向药先吃着，一个月后又上了一期化疗。化疗那几天她吐，吐完漱口，把假牙摘下来冲干净，再戴上，头发拿小梳子梳顺。她的药分装在一只旧文具盒里，铁皮的，分格，每格拿钢笔标着星期几。顾念说医院有分药盒，她说这个用了三十年，装过粉笔头，装过图钉，如今装药，正合适。

顾念后来想，这层楼里，病人分两种：一种天天问自己还能活多久，一种从不问。三十二床是后一种。

家属只有一个，养女，姓唐，叫唐穗。

每个星期三，上午九点整，病房门准时被推开。风雨无阻。

十二月有一回落冻雨，全城的电动车都趴了窝，公交晚点，顾念自己都迟到了十分钟。九点整，病房门还是准时响了。穗站在门口，裤脚全湿，手里的保温壶是干的。

她进来先给母亲擦脸，热毛巾从眼角往两鬓走，一下是一下。然后梳头，然后剪指甲，手指十个，脚趾十个，小剪刀贴着肉走，又轻又匀。顾念换药的时候看过那个小本子：几号，什么药，几毫克，几点体温三十七度二，记得比护士站的还全。

有些细节，顾念记在了心里。穗走路没有声音。护士鞋的鞋底都响，她的鞋底不响，人已经到了床边，你才看见。她读报纸给老太太听，读到老太太睡

着，就把报纸折起来，折痕对齐上回的折痕。她不坐医院的陪护椅，自己带一只小马扎，坐在床尾靠窗的位置，一坐一下午，腰始终是直的。

有一次顾念看她剪指甲，随口说了句，唐老师有福气。穗抬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标准，弧度刚好，像是从什么地方领来，随手用用的。

有一回下大雨，穗的伞在楼下吹坏了，她拎着一把湿伞上来，头发没乱。顾念递给她一条干毛巾，她道了谢，先给老太太的手腕擦干，再擦自己的。老太太睡着，她就把电视打开，调到静音，配上字幕。顾念站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老太太耳朵一点没背，电视是开给她自己的，让她不必坐着干等。

顾念干这行五年，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家属。像一张查房表成了精。

老太太跟顾念有话讲。讲她教过的学生，哪个当了工程师，哪个回了天门教语文；讲念庐院子里那棵蜡梅，说今年冻得狠，开春花一定香。讲到从前往事，她不讲了。她从来不讲自己年轻时候的事。

一月里，老太太精神尚可，拉着顾念认字玩。顾念在草稿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老太太看了一眼，说，念字好，今字底下一颗心，心上有个今，就是念。又说，你这一竖写得浮，做人写字，一竖要立得住。顾念把那页纸带回了家，夹在值班本的最后一页。

顾念还发现一件事。床头卡的家属联上，只留了穗的电话，再往下，紧急联系人一栏，空着。她问要不要再填一个。老太太想了想，说，填她一个人就够了，她不会错过电话的。这话不像夸，像保证。

二月初，病房里过了个年。老太太指标不稳，回不了家。除夕那天穗拎着保温桶来，排骨藕汤，几样小菜，摆在小桌板上，又拿干净饭盒装了一份，托顾念带给值班的医生。晚上八点穗走了，说家里还有事。老太太靠在床头看窗外的烟花，烟花很远，是城郊放的，一朵一朵，开在玻璃上。她跟顾念说，姑娘，过年好。顾念说，唐老师过年好。

开春头一个周三，穗的保温壶旁边多出一只窄口瓶，瓶里插着一枝蜡梅，黄的，香气不高不低。老太太问哪儿折的。穗说，家里院里那棵，挑了最壮的

一枝。老太太把脸凑过去闻了很久，说，念庐的蜡梅，比汉口的香。那枝花在床头立了一个多礼拜，落一瓣，穗收一瓣，拿手绢包着带走。

三月里，人瘦得脱了形，反倒清醒了几天。

那几天话也多。老太太让顾念拿纸笔来，写了一行字，看了看，又划掉了。问顾念老家哪里，爹妈做什么营生。听说她父亲也是教书的，老太太高兴，说教书人家的孩子，手干净。又问她处了对象没有，叮嘱她找婆家，先看对方家里怎么对待老人。顾念一一应了。临走，老太太把枕头摆正，说，麻烦姑娘了。

后半夜两点，顾念换液体进去，老太太忽然睁着眼，一把拉住她的手腕。手劲大得吓人。

"我对不住一个人……"老太太的气音贴着她的耳朵，"我收了一个伢，不是收养，是收账……账要还的。"

顾念按了呼叫铃，医生来看过，说是夜里脑缺氧，老年人常有，是病话。她给老太太掖好被角，老太太已经又合了眼。

顾念没当回事。这一层楼，什么样的胡话她没听过。

三月二十一日，晴。

那天下午，老太太的精神忽然好了些。让穗把窗户开了一条缝，风进来，吹动床头的挂历。她闭着眼听了一阵，说，是南风，要落雨了。穗说明天落。她说，明天落就明天落。顾念进来换液体，老太太还朝她笑了一下。现在想起来，那不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是亮的。那更像一盏灯，油见了底，火苗自己矮下去，安安静静的。

晚上九点，穗来了，白衬衫，头发扎得一丝不乱，保温壶换成了新的一壶。老太太白天睡得多，这会儿醒着，母女俩说话，声音都很低。顾念进来送水，听见老太太在问蜡梅开了没有，穗答了，说开了，替她看过。

九点三刻，穗看了看泵上的余量，出来跟顾念说：″药液快空了，麻烦你去趟药房。″

止痛泵的药液确实见底了。药房在另一栋楼，过一条连廊。顾念拿了单子就走。

来回，她记得很清楚，四分钟。

她推门回来的时候，监护仪已经在叫了。医生护士从四面涌进来，抢救车推到床边，心外按压，推药，除颤。穗站在床尾的墙边，让开所有的路，双手交叠在身前。

二十二点十六分，主治宣布临床死亡。心电图那条线，平得像一根拉直的铁丝。

顾念后来在抢救记录上看到那几个钟点。九点五十一分，监护仪报警。她来回正好四分钟。怎么算，都差着那么一点。她不敢往下想，想了也白想，病人本来就到了日子。

签字的时候，穗接过笔，手没有抖。死亡证明书上的字，一笔是一笔。

她给主治医生鞠了一躬。转身，给收拾床铺的护工也鞠了一躬，腰弯下去的角度，顾念在旁边看着，跟方才那一躬分毫不差。最后给抬担架的师傅也鞠了一躬。

家属等候区的长椅上，穗坐下来填单子。顾念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双手接了，道了声谢。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樱花的白花瓣一片一片往里飘。凌晨顾念下班，路过大厅，看见穗还坐在原处，腰板挺直，像一件没有被使用过的行李。

她太平静了。顾念干了五年肿瘤科，见过嚎啕的，见过晕厥的，见过攥着医生袖子不放的。亲妈走了，一滴眼泪都没有的，她头一回见。可人家哭不出来，也怪不得谁。

隔壁床走人的那晚，家属哭得整层楼都听得见，儿子在走廊上嚎，说妈你睁眼再看我一回。护士站没人说话，护士长把门带上，声音闷在门里头。顾念想起三十二床，那边安安静静，只有听不见的脚步声，和一次一次弯得分毫不差的躬。两扇门之间隔着一条走廊，像隔着两种人间。

第二天整理遗物。老花镜，保温杯，一册翻毛了边的字典，叠得方方正正的几件衣裳。顾念对着单子清点，忽然觉得少了一样东西。少什么，她说不上来。

她想起来是那张相片。十二月底的事。那天给老太太翻身，枕头底下硌着一个硬角，她抽出来看了一眼：一张旧相片，一家茶行门口，一排人穿着新衣裳，她一个也不认得。相片右下角反着一点光，光里有个小男孩，只照出半张脸，眼睛望着镜头外面。相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乙酉年正月摄。她当时不晓得那是哪一年，后来查了，是二〇〇五年过年。老太太当时把相片按回枕头底下，一句话没说。

现在，枕头底下是空的。柜子、箱子、床垫，都没有。

遗物袋封口的时候，顾念数了两遍单子。她想起那晚老太太攥着她手腕说的收账。她把两件事放在一处想了想，又赶紧分开了。

穗最后一次来医院，把陪护用的小马扎擦干净，还到护士站，说借了几天，谢谢。顾念接过来，马扎的布面上一点褶子都没有，四条腿擦得发亮，像还回来一件从没用过的东西。

结账那几天，穗每天来一趟。没拆封的化疗药，她一支一支对过批号，该退的退，该留的留。医院的走廊很长，她走路听不见脚步声。顾念有一次在电梯里遇见她，电梯里人挤人，唯独她周围空出一小圈，像水绕开一块石头。

那几天顾念夜班多。有一晚三点多，病区的灯全灭了，她一个人坐在护士站，鬼使神差地把三十二床的护理记录翻出来，从头看到尾。记录干干净净，体温、给药、翻身，一格一格，全在点子上。挑不出毛病，也记不住任何东

西。她合上本子，忽然明白自己不安的是什么：这个人做什么都对，对得像提前排练过。

下了夜班，同事在更衣室问她，三十二床的事想什么呢，人都走了。她说，没什么，想起一封信没寄。其实没有信。有些不安没有名字，寄不出去，只能自己收着。

结账窗口的手续单递回来，与死者关系一栏，穗填了两个字：女儿。

字写得端正极了。

◆

二〇一八年三月，天门，市公安局小礼堂。

荣誉退休仪式开得简单。横幅是打印的字，一束塑料花，一张合影。轮到竺长生讲话，他站起来，手里没拿稿子。

"我这辈子结了三百多起案，只欠一起。"

台下一片笑。前排就坐的老局长曹德贵笑得最响，笑完了拍拍他的胳膊：回去享福。

散会往外走，曹德贵在走廊上又追上他一步，压低声音：老竺，那年……他等着。老曹张了张嘴，终究摆了摆手，转身走了。两个老人隔着一条走廊，谁也没把那句话说完。整个礼堂里，只有坐在第二排的蒋阔没笑，手里的笔在本子上，一个字也没记。

散会前有个环节，青年民警代表献花。蒋阔捧着一束向日葵上去，站得笔直，敬礼的时候下巴绷得发白。合影的时候大家喊，竺队，笑一个。他笑了，笑得比哭还紧。

交接那天，他把警号、门禁卡、配枪一样一样交上去。门禁卡注销的时候，机器滴的一声，短促，干脆。配枪他擦了一遍才递出去，管枪械的小年轻说，竺队，这支枪您用得最久。他说，枪没感情，人有。警号摘下来，六位数

字，磨得发亮，晚上秀珍拿手绢包了，放进五斗柜最上层，跟结婚证搁在一起。

当晚竺小江来电话，说爸，光荣退休，儿子敬你一杯。秀珍把免提打开，老两口就着一杯白开水跟儿子碰了碰。小江说，您那箱宝贝，该放下了。竺长生说，什么宝贝，破烂。挂了电话，秀珍问，什么宝贝。他说，旧报纸。

办公室清出一抽屉东西：半板创可贴，两本翻烂的电话簿，一张二〇〇五年的火车时刻表。窗台上那盆君子兰，他抱到蒋阔桌上，说照顾它跟照顾证人一个道理，少折腾，多看着。蒋阔帮着把东西搬到楼下，眼睛从他手里那只牛皮纸箱上扫过去，什么也没问。

箱子里是些结了案的东西，还有些没结过案的。他清点过一回：现场照片的翻拍，二十来张；走访记录的复写件，一本；法医摘录几页；还有一张剪纸的翻拍照，黄纸，两个小人捧着一只碗。每年十一月十八，他会把箱子拿出来，一样一样过一遍，像给它们上坟。过完，再放回去。三十三码童鞋印的翻模记录也在里面。模子当年做了，后来遗失了，连遗失都遗失得不明不白。

三十年的老刑警，谁手里没有一只这样的箱子。师徒之间，隔着一箱纸的默契。

退休第一年，竺长生学会了买菜。清晨的西湖路早市，藕要挑九孔的，鱼要看眼睛。他挎着布袋子跟摊主砍价，砍得像审讯。早市上人人都认得他，卖藕的老汉给他留最粉的，卖鱼的大姐帮他刮鳞，问他，竺警官，退了休闲不闲得慌。他说，闲。手上剥着豌豆，脑子里过的还是旧案，过完了，豌豆也剥完了。

腊月里他大扫除，从阳台的旧纸箱底下翻出一沓剪报，都是二〇〇五、〇六年的本地新闻，他自己当年剪下来的：茶行命案告破无期，西湖边妇人落水意外溺亡，工人文化宫启动拆迁。一张一张，剪口都齐。他把这沓剪报抚平，用牛皮纸包了，放进夹层，跟箱子和本子放在一起。家里能证明那些年的，就剩这几张纸了。

下午他去陆羽公园听戏。听不太懂，就坐着看人下棋，看人放风筝。西门有个茶摊，粗茶一碗，他天天去坐一个钟头，坐成一个固定景点。

戏台底下有几位老茶客，讲起从前的松风茶行，讲起那年冬天茶仓里出的事，讲几句就散了，像怕讲多了折寿。竺长生坐在边上听，不搭腔。他这些年听惯了，真话都藏在换话题的那一下里。

老伴秀珍的记性一年不如一年。降压药一天吃两回，她能吃出三回的间隔来。存折藏进了米缸，他找了一个礼拜，最后是闻着米味儿找到的。他没舍得说她。老人藏东西，藏的是安全感。

入夏出了一回事。秀珍晌午出门买菜，到天黑没回来。他把半城的街巷跑遍，最后在陆羽公园西门找到她。她坐在茶摊边上，跟一桌生人讲得热热闹闹，说我儿子在武汉的大医院当大夫，你们要有病就去。看见他，她还不急：你急什么，我又不会丢。回去的路上，她的小手在他手心里，凉凉的。那晚他没睡，把夹层里的东西检查了一遍——箱子锁得上，人锁不上。

那一年剩下的日子，他按部就班：买菜，听戏，给秀珍按顿分药，在药板上标好星期。夜里秀珍睡了，他偶尔起来，摸黑到厨房，把活动板掀开一条缝，借手电看一眼。布包在，本子在，箱子在。看一眼，合上，回去睡。像小孩子夜里清点自己的糖。

冬天最冷的那几天，米面柜返潮，他抱出布包晒了一晌午。太阳很好，粗布晒得蓬松，那点铁腥气淡了些。他掂着布包想，里头的东西在等，他也得等，两样东西比着谁熬得过谁。

他自己的东西，也藏在米面柜里。

那是一只老式木柜，下层装米，上层囤面粉，底板之下还有一层空腔，抽掉一块活动板就是夹层。蓝皮的私人笔记本搁在最底下，压着牛皮纸箱。笔记本第一页写着日期，一九九八。最后一页没写完。前一半是历年旧案的笔记，后一半，全是同一年：走访的名字一个个都在，谁说了什么，谁后来改了口，

谁搬了家。有个名字后面画着圈，有个名字后面画着叉。他自己的字越往后越重，最后几页，笔尖几乎要划破纸。

· · ·

九月里一个晚上，八点多，有人敲门。

猫眼里站着个胖子，五十来岁，脸上堆着笑，笑得比哭难看。竺长生开了门，那人却往后退了半步，站在楼道里，不进来。

"竺警官，我姓王，王春发。"胖子搓着手，"文霞……柳文霞，您记得吧。她留了东西，我不敢碰。"

"进来坐。"

"不进了不进了。"王春发连连摆手，"我就是来说一声。东西在我这儿，我夜里睡不着。您看什么时候方便，我给您送来。"

他往下说了几句文霞。说二〇一四年冬天，文霞病得不行了，非要去看湖边新起的那座楼，说他背也要背去。真去了一趟，回来人就不行了。临了糊涂，眼睛一直往窗口瞟，说楼起来了，楼起来了。王胖说到这里，喉咙里像卡了东西，半天，说：竺警官，我就见过您一回，我怎么就想着把东西给您呢。

竺长生说：因为你不敢给别人。

王胖把这句话在嘴里咂了半天，像咂一块硬糖。他说，竺警官，您眼睛毒。文霞在的时候讲过，当年那拨人里头，就您看她的眼神不像看嫌疑犯。她说，就冲这个眼神，东西迟早是你家的。

王胖愣了愣，点头。点着点着，眼泪下来了。他抬袖子抹了一把，转身下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层一层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灭下去，像有人从楼上把黑暗拎着往下走。竺长生趿着鞋追到巷口，只有一辆三轮车的影子拐出了巷子，人早没影了。

回到家，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布包。

粗布，靛蓝色，四角打的结又死又旧，像在谁家里压了很多年。不重。他掂了掂，隔着布，摸出一样长条东西的轮廓，还有一沓薄薄的、纸的样子。拿手电照了照，布缝里露出一角红。有米味，有樟脑味，还有一点旧铁器的腥气，很淡，淡得像错觉。

秀珍问，谁的？

他说，老同事的。

秀珍没再问。老太太有老太太的直觉，只叮嘱了一句：放高一点，别返潮。

他把布包放在饭桌上，泡了杯茶，坐下来，看了它一个钟头。没打开。

还不是时候。他干了半辈子刑警，知道两样东西最经不起等：一是案情，二是人心。可他也知道第三样：一根线头，接不进链子，就只是一根线头。这个布包里不管装着什么，它现在什么都不是。要让它成为证据，得先有一个能立案的日子，或者一个能立案的人。

他掰着指头算过一笔账。故意杀人的追诉时效是二十年，从有刑法那年就立下的规矩。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二五年，整整二十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这几年，他一年一年地数，像数一副牌里还剩几张底牌。案子里的人会老，会死，会忘，只有这个日子长着牙，一步一步往前咬。

只有这个日子长着牙，一步一步往前咬。

退休证办下来那天，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红色的小本，封皮上印着退休两个字。他把门禁卡剪了，退休证收进抽屉。从今往后，他没有立案的权限，没有侦查权，连调一份旧卷宗都要开介绍信。他能用的，只剩一双眼睛，和一个公民打电话的权利。

他还查过那枚石膏模的下落。移交登记上写着：转技术中队留存。他去问过一回，技术中队翻遍了库房，查无此物。经手的人，有的调走了，有的退休了，还有一位已经过世。一枚鞋印，就这样在登记簿上活着，在世界上死了。

那之前几天，蒋阔来过一趟家里，拎了两斤新茶。师徒俩喝了半天，说的都是闲话。临走蒋阔在楼道里站住：师父，那箱子……

竺长生说：哪箱子。

蒋阔笑笑，下楼了。声控灯一层一层亮下去，把他的背影送出门洞。

那年冬天蒋阔又来过一趟，送新挂历，顺便杀了一盘棋。蒋阔输了，输了也不悔棋。竺长生盯着棋盘想，这徒弟什么都好，就是不肯在他面前赢。他把棋子一颗一颗收进盒里，说，明年再来。蒋阔说，明年一定。竺长生站在门口想，这小子心里明镜似的。明镜似的，也得等。他这才明白，做师父的留给徒弟最大的东西，也许就是等。

夜深了，他起身，把布包放进米面柜的夹层，跟蓝皮笔记本摞在一起，推上活动板。

柜门合上的时候他站了一会儿。米里压着两代人的心事。

◆

二〇一九年三月末，天门，西湖路。

唐老师的丧事，蓝溪是去帮了两天忙的。

办得体面，又快。头三天在念庐设的灵，花圈不多，来的人却个个有用处：天门一中的老同事来了七八位，社区的主任来了，几位老茶客来了，鞠躬，上香，安慰老板娘几句，走的时候脚步都很轻。挽联是老板娘自己写的，字端正，墨色匀净。蓝溪站在旁边看了半天，觉得那不像办丧事的字，像誊课文。

灵堂的回礼是一小包茶叶，白棉纸封的口，跟店里伴手礼一个包装。来吊唁的人捧着那包茶出门，脚步都不由自主放轻了。蓝溪看见一位老同事把茶包捧在手里看了又看，像捧着唐老师批改过的最后一本作业。

老板娘通身重孝，从头到尾没掉一滴泪。蓝溪递纸巾，她接了，放在案角，码齐。

守灵那两晚，蓝溪陪着折纸元宝。锡箔纸在老板娘手里听话得很，折出来又快又匀。后半夜没人了，老板娘就坐在灵前，看遗像，一看一整晚，脸上什么都没有。蓝溪起夜路过，被那样子看得心里发毛——不是冷，是一种太齐整的静，像一片没下过雪的雪地。

第七天早上，蓝溪到店里的时候，卷帘门已经升起来了。老板娘在泡茶，白衬衫，头发一丝不乱，见她进门，点了下头，让她把架子上新到的货对着单子再核一遍。

蓝溪应了一声，鼻子有点酸。

蓝溪是一九九八年生的，二〇一六年秋天进的店，工号零零一。来应聘那年她刚满十八，中专学的电子商务，以为当茶艺师要先考泡茶。老板娘没让她泡，只把三条店规讲了一遍：不问价值，不问来路，不问十一月十八号。问她记不记得住，她说记得住。老板娘说，好，明天来上班。

后来她才知道，她前头走掉两个姑娘，都走在这三条上：一个问了一饼茶卖多少钱，一个问了一饼茶从哪儿来。老板娘没辞她们，是她们自己走的，走的时候工钱结清了，还多给半个月。

蓝溪老家在岳口，汉江边上，爸妈在渡口旁开了个小卖部。她来天门投奔表姐，表姐在超市理货，两个人挤一间出租屋。头一个月的工钱，她寄回去一半。老板娘知道了，没说什么，第二个月给她涨了三百，只附一句话：手艺人的钱，寄回去要拿得出手。

蓝溪把这句话记了很久。她寄钱的方式也变了，不再塞在信封里，学会了去银行打一张回单，抚平了夹在信里。表姐笑她讲究。她没解释。有的讲究是学来的，有的讲究，是店里那盏灯照出来的。

平日店里清静。上午没客人，老板娘就在里间审茶，审完写档案，一饼一档。老板娘教她审茶，只教了两回：先看纸，再看底，最后看汤。纸会撒谎，

底会撒谎，汤最后撒谎。把三样谎话对起来听，才听得出真话。

每天早上九点开门，仪式是一样的：卷帘门推上去，玻璃擦一遍，烧水，温壶，把台面上三只样罐摆正。老板娘不在的日子，蓝溪一个人做全套。做完了，站在柜台里头，看阳光从门口斜进来，落在茶台上，像每天给这个店上一炷看不见的香。

有一年冬天起，每周三，老板娘雷打不动去汉口，店里放半天假。蓝溪不知道她去做什么，只知道周三的店门，要等到下午四点才开。

四月初，店里接下品牌第一个大单：武汉一家商场的专柜，四月中旬进场。老板娘带着她跑了两趟武汉，签合同，选样品，定陈列。动车四十几分钟，老板娘一路在看资料，笔在纸上轻轻点。

车上有个抱孩子的妈妈，孩子哭个不停。老板娘从包里摸出一小袋茶糖递过去，孩子含上糖，不哭了，那位妈妈连声道谢。老板娘笑笑，把袋口折好收回去。蓝溪后来在店里见过同款袋子，摆在客人的茶点旁边。老板娘身上带的东西，好像永远是为别人备的。

专柜的首批货，蓝溪亲手点的。每一箱都贴着报关标签，箱号、批号、原产地，一样不缺。她对着台账一箱一箱核过去，核了两天。老板娘在旁边看着，说，货要走得干净，单要跟得干净。蓝溪当时只当是生意上的讲究。

商场那位招商经理姓周，人精明，话也漂亮，说唐总这个牌子进我们三楼，是三楼的福气。老板娘不接恭维，把价目表推过去，说，价钱不还，账期三十天，做得到就签。周经理愣了愣，笑了，签了。回程的动车上，蓝溪问她为什么不还价。老板娘望着窗外说，茶不打折，时间不打折。

供货单上有一栏写着香港回流。蓝溪的眼睛在那一栏上停了停，翻过去了。不问来路。

专柜亮灯那天，背景音乐很轻，老板娘站在灯下给客人行茶，白衬衫外面罩一条烟灰色的围裙。蓝溪站在两步外看着，忽然觉得这个背影像谁给她的光单独调过色，比别人的清楚，也比别人的远。

开起来头一个月，蓝溪每周去武汉对一次账。商场冷气足，专柜的灯亮，试茶的客人不少，掏钱的少。老板娘不急，说柜台是脸面，脸面立住了，生意在后头。月底盘下来，账面上头一回过了六位数，老板娘请她吃了顿饭，三文鱼一片一片吃得干干净净，米饭剩了一半。

· · ·

五月，念庐要交还给社区代管，老板娘回去收拾旧物，叫上蓝溪帮忙。

念庐在天门城西，离西湖不远，两进的小院，天井里铺着老青砖，砖缝里长苔。院角一棵蜡梅，花期刚过，叶子绿得发黑。堂屋条案上摆着老花镜和一方砚台。

收拾了三天。四十年教案，按年份捆好；学生作文本，红笔批语密密麻麻，一摞一摞码进纸箱，捐给一中。蓝溪搬箱子的时候，眼睛被红笔批语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带过去，像替一个不认识的人，把一辈子重新念了一遍。

里屋是唐老师的卧房。老式架子床，白纱帐拆下来洗过，叠得像一块豆腐。梳妆台上立着一个相框，黑白的，相片上的老先生清瘦，戴眼镜。蓝溪拿抹布擦到相框，老板娘说，那个不用动。声音不高，也不低，就是不让动。

唐老师的书房占了一壁墙。语文教学的书不多，多是字帖和字典，一部《说文解字》翻得脱了线。书桌上砚台洗得干干净净，笔挂上悬三支笔，笔锋朝下。蓝溪一本一本往外搬，搬一本看一眼扉页，好些本上都有同一个人的题赠，落款的年头不一样，字一年比一年轻。

院角那棵蜡梅，老板娘站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说，这棵树，也交出去吧。

天井角落有一口小水缸，接了半缸雨水，水面上漂着两片蜡梅叶。蓝溪要倒掉，老板娘按住缸沿，说，留着，走之前浇最后一回。蓝溪的手停在缸沿上。她忽然觉得这院子像一个人，五脏六腑都是齐的，只差挪一口气的工夫。

樟木箱搬到最后一层，箱子底上躺着一只铁皮盒。旧饼干盒，印着牡丹，边角磕瘪了，上着一把小铜锁。蓝溪拿起来，坠手，里头有东西轻轻地响，纸蹭着纸，中间还夹着一点金属的轻响，像钥匙，又不像。

"老板娘的百宝箱？"她开了句玩笑。

"这里面是我的简历。"

蓝溪笑了一声，就过去了。老板娘没笑，把铁皮盒用旧报纸裹了，放进随身的布袋。回程的车上，布袋抱在膝盖上，一路没有松手。

蓝溪没问。三条店规里其实还有半条没写出来的：不问老板娘不想答的话。

钥匙是蓝溪陪着交到社区的。一串，信封装好，封口粘了三道。社区主任说，房子空着可惜，先给街道做个书报角。老板娘点头说好。她自己只留走了一只樟木匣，一臂长，四角包铜，铜色磨得发亮，看得出常被手摩挲。上车的时候蓝溪伸手想帮着抬，老板娘侧了一下身，自己抱上去了。

车开动的时候，老板娘没有回头看念庐的大门。一眼都没有。

打那以后，蓝溪再没听老板娘提过家这个字。有客人闲聊，问老板娘老家是哪儿。答案只有两个字：天门。

· · ·

六月底，店里年中盘点。库房最里头的架子上，蓝溪清出一口没贴标也没封条的木箱，七饼装，棉纸包着，纸色深得反常。

她搬出来问：老板娘，这箱是什么货？

"是我上学期的作业。"

蓝溪笑了，说老板娘还给自己留作业呢。

老板娘没接这个笑。她把箱子搬上推车，一个人推进了里间，落了锁。

那口箱子蓝溪后来想起过几回。正常的货走单，单号连着报关，报关连着船期，船期连着一家香港公司的抬头，一层一层，链条亮堂堂的。那口箱子上什么都没有，像一个人从没上过户口。她在盘点表的备注栏里写了一行：箱，未贴标，无单。写完看了看，又拿橡皮擦了，改成：已入里间。

那天下班，蓝溪在公交车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想不明白，就不想了。三条店规像三道门槛，她迈进来三年，早习惯了门槛里头的暗。只是到家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西湖路的方向，店里的灯还亮着一盏，像一只不睡觉的眼睛。

那晚她躺下又起来，去店里看了一趟。里间的门锁着，锁是好的。她隔着门缝闻见一股很淡的味道，像老纸，又像陈茶。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去，就像说不清一箱没有户口的货，为什么让人睡不着。

蓝溪站在货架中间，手里的盘点表捏出了一道折。老板娘早就毕业了呀。哪来的上学期。

◆

二〇一九年，漳州，郊区的一座旧仓库。

阿彦每年要去三四趟。年底这趟最要紧，对账，看仓，发工钱。

他和阿木认识在二〇一〇年的华强北。那年阿木背着个双肩包来他柜台修一台刻录机，话少，钱给得爽快，一来二去搭上了伙。阿木这个人，白，出门戴帽子，做事用左手，饭桌上转盘子都用左手够。深圳这些年，阿彦见过他发火，没见过他高兴；见过他给钱，没见过他收礼。市面上叫他阿木。姓什么，哪里人，阿彦不知道，也没问过。规矩是一起立的，立规矩的人自己先守。

仓库外表不起眼，红砖墙爬满薜荔，铁门上的漆掉得只剩底漆。进去才知道深：三进库房，麻布帘一道一道隔开，温湿度计挂在每道帘子口。海风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带着咸味，到了仓里，全变成樟木和陈茶的味道。

管事的叫骆驼，八三年生，汕头人，十六岁进茶行当学徒，正经学过三年手艺，后来怎么流落到这一行，没人问。他话少，手黑，一双眼睛像两粒秤砣。夜里睡在仓里，床板上摞着茶样，床头贴一张节气表，谷雨那天，他会把窗户开一条缝。

工人翻仓，茶饼一提一提倒面，动作要有节奏，急了断饼，慢了误工。骆驼背着手在过道里走，谁的手乱了，他眼睛一扫，那人就慢下来。

做旧是一门手艺，阿彦这些年看懂了一半。

棉纸要过三道茶汤。骆驼说，一道上色，一道去光，一道压味。染好阴干，竹竿上晾成一排，远看像揭下来的旧旗。虫眼要拿针斜着扎，直了骗不过人，一饼三百六十个，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

饼要渥。木箱垫竹匾，喷水，盖麻袋，温度拿手背试，热了翻，凉了盖，一夜一夜守着，像伺候月子。油斑不能画，画出来是死斑，要拿茶油薄薄地养，养够三个月，斑才是活的。炭炉烘茶，火不能见明，余温吃到骨子里，闻起来要有仓味，仓味底下要压一丝日头味。

骆驼有句话，阿彦记得牢：做旧不是做旧，是把日子缩短。日子缩短了，脾气不能改——老茶的脾气是驯出来的，新茶的脾气是烈的。

"假一罚十，罚的是外行。"骆驼说这话的时候，正拿针扎饼，手稳得像老中医。

九月里，刻大票的版子出了毛病——前两年补过的那道胶裂了，羡字第三笔上又现出一线细纹。骆驼请来老师傅，把旧胶剔净，重新填过。阿彦那天正好在场，看老师傅填胶、修光，吹了吹，举起来对着灯。

"版子老了。"骆驼在旁边说，"补一回，少一回。"

阿彦多看了一眼那个羡字。他不懂版，只觉得那道竖补得真干净，干净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一年是假茶链的高光年。港仓回流的招牌立住了，报关单能对，物流能查，每一饼还配一张防伪的传承证明，编号上网一输就出来——网站是阿彦找人搭的，服务器在香港。广州一个茶商订了一批七十年代的青饼，验货那天，对方拿茶针撬开一饼，闻了闻，说了三个字：有仓味。当晚全款。

十月里，阿彦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新闻，江城秋拍，一筒一九五八年的茶，落槌四十七万。配图里棉纸油斑，竹篾温润。他把图片放大，看竹篾的编法，再放大，看大票右下的羡字。第三笔上干干净净。他把手机递给骆驼，骆驼凑近看了两眼，说，篾是照咱们的手法养的呢。阿彦把手机收回来，摁灭了屏幕。四十七万里头，转到他们手里的，不到五万。

后来那筒茶的买家辗转托人送来一饼样茶，请骆驼掌掌眼，看是不是同一批的货。骆驼闻了闻，还给他，只说了四个字：纸对的，茶新。人走之后，骆驼把仓库的钥匙又多配了一把，挂在贴身的裤腰上。

单子的源头在香港。阿彦去过两趟上环，一间二楼的老铺面，铜招牌，潮州口音的老板，见人先沏茶。货从深圳出去，绕香港回来，一来一回，报关单上的出生日期就老了三十年。头一趟阿彦心虚，手心的汗把单子洇湿了一角。老板看了一眼，讲了一句粤语，后来有人翻译给他听：纸会讲古，纸也会讲大话。

腊月前有一批客要来验货。北方来的茶城老板，进门先看手，看阿彦手上有没有茧，再看骆驼的，最后才看茶。验货有一套规矩：白棉布垫桌，茶针斜撬，先闻饼面，再闻内飞，最后开汤。一泡下来不说话，第二泡还不说话，第三泡，客人把杯子搁下，开始谈价。回去的路上骆驼跟阿彦讲，这些人里头，一半知道是假的。阿彦问，那另一半呢。骆驼说，另一半，装着不知道。

月底发工钱，现金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工人一个一个进来签领。有个小工多领了一封，骆驼在门口把他叫回来，当着众人的面拆开，数出多的一沓收回去，让他重新按了手印。没人说话。阿彦在旁边看着，觉得这仓里最不像假的东西，是这些手印。

分红下来，阿彦在东莞买了房，一百二十平，写的老婆的名字。老婆从老家来看房，楼上楼下走了一圈，说了句，比村里祠堂气派。他给侄子包了个大红包，给妈换了台大冰箱。晚上一家人在楼下沙县小吃吃饭，妈说，阿彦，做正经生意就好。他嗯了一声。正经生意，说出口的只有这四个字。

买房签合同那天，售楼小姐夸他眼神好，一眼选中采光最好的户型。他笑笑没接话。他在华强北的柜台后面坐了快十年，看东西先看光，什么料子什么成色，光底下藏不住。这也是阿木教的：看东西，先看光。

十二月里他称了一次体重，掉了四斤。老婆说他瘦了，他说跑账跑的。夜里躺在床上，他算一笔算不清的账：仓里的东西，市面上过一道手，翻十倍；再过一道手，再翻十倍。钱像水，从山里流出来，越流越浑，也越流越快。他站在下游，不知道上游哪一天发大水。

过年他带老婆回了一趟老家。鞭炮放完，他妈在灶屋里跟他讲，村东头谁家孩子考上了公务员，谁家在县城买了铺面。他嗯嗯地应着，一个人出门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麦子青着，风一过，一浪一浪。他想起阿木。那个人讲话从来不超十个字，可每个字都往骨头里去。

货款不走一张卡。两头的公司各走各的账，中间隔一家贸易行。阿彦的账本上从不记数目，只记规矩和日子。他说不清这算谨慎还是胆小。东莞的新房里，老婆问他到底攒下多少，他说，够你和孩子安稳。别的他没说，也说不清。

他抽屉最里面压着一张昆明的明信片。没写收件人，也没贴邮票。他从来没跟人说起过。

秋天，他给阿木打了电话。夜里的天台，风大，他把手机护在衣领里。

"钱够了。"他说，"收了吧。您家到底图什么？"

电话那头安静了有一支烟的工夫。

"图一个人不用再害怕。"

″哪个人？″

又是长久的安静，长到阿彦以为断了线。然后那头说了四个字：″规矩第三条。″

电话挂了。

那晚他睡不着，把两句话翻来覆去地过。图一个人不用再害怕。规矩第三条。前一句像话，后一句不是话。第三条说的是不问来处——问他图什么，答不问来处，等于说，图的那个人，就在来处里。

他想起昆明的雨。雨里那个卷了钱的姑娘，走之前在柜台上笑，说阿彦哥，等我赚了大的回来请你吃早茶。他没等到早茶，等到了一纸协查通报。这些年他不问来处，头一回，他想问问来处了。

他想过再拨回去。号码按到最后一位，拇指停住了。账本上没写这一条，但两个人都懂：不追问。他把手机扣在茶几上，起身把昆明的明信片翻出来，看了半天，又原样压回抽屉最底下。

他站在天台上把烟抽完，下楼，翻开那本牛皮纸壳的规矩账本。一年一页，第一页记在二〇一二年，字是他写的，规矩是两个人议的：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每年十一月十八停工。头两年他以为停工是忌讳，后两年他以为是习惯，到今年，他知道那是一个日子。

中间有的年份只有一行字。一三年十二月那页，写的是：停工三天。为什么停，他没写，也不敢写。

第三条，不问来处。

他在那一行底下画了一道线，笔尖顿了顿，又添了一行：来处。来处，是谁的来处。

年底盘点完，他在二〇一九年这一页的最下面，添了新的一行：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他说了图什么。二〇二〇年，我要问他图谁。

· · ·

十一月十八那晚的事，阿彦后来是这样记得的。

每年这一天，全仓停工。工人一早放干净，骆驼也走了，铁门落锁，钥匙一人一把，谁也不问谁在哪。十年了，他从来没在这一天撞见过人。

今年，最里头那间库的卷帘门落了一半，门缝底下漏出一线灯光。

他本该走的。车都打着火了。想起一份发票本落在值班室，进去拿了，出来的时候，鬼使神差地又凑近了些。

灯下坐着一个人，帽子没摘，戴着手套，案板上摞着一叠纸片。那人把纸片一张一张取下来，用一块老茶砖压平，压一会儿，换一张。压纸角用的是左手。纸片边上露出一点红，像红纸，又像剪纸的边。

灯很小，是工地上用的那种行灯。案板一角搁着一只白瓷碟，碟里立着小半截红蜡，烧了一半。那人压平一张，就拿到灯边上看一看，像在检查什么工整不工整。

阿彦没出声，也没进去。

门缝里飘出来很低的一句话，一句话的碎片。他听不完全，只辨出四个字的轮廓——

马上，就好。

阿彦退出去，在黑地里站了一根烟的工夫。海风把仓库的铁皮檐吹得咔哒咔哒响。他把烟摁灭了，摁得很慢。

◆

二〇一九年九月，天门，竺长生家。

那个粗布包在米面柜的夹层里睡了一年。一年里，竺长生搬过两回米，掀开活动板，看见它在，又合上。像看守，也像共谋。

这一年里，他按老习惯，把王春发的底细捋了一遍。六六年生，皂市乡下出来的人，跑过运输，扛过棉花包，无前科，无存款，如今租住在城郊，给一

家棉纺厂看仓库。邻居讲他人不坏，就是闷，一年到头难得说十句话。柳文霞是二〇〇九年带着一只旧嫁妆的红皮箱嫁给他的，没生孩子，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像合租。二〇一四年冬天文霞走了，他一个人过到现在。

王春发第二次上门的前一天傍晚，竺长生把堂屋的灯全拧亮了，电视关掉，让秀珍进里屋看她爱看的戏曲频道，八仙桌擦了两遍。干了一辈子刑警，他晓得有些客人来之前，屋里的样子就是脸色。

王春发第二次上门，是九月里的一个傍晚。这一回他进了门，在八仙桌边上坐下了，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胶鞋换成了新布鞋，头发白了一半。

竺长生给他倒了杯水。

王胖捧着那杯水，捧了好一阵，忽然就哭了。没声音，眼泪顺着腮帮子往下淌，滴在裤腿上。他抬袖子抹了一把，抹出一道湿印。

"那年你们去问话，"他说，"就您给文霞倒了杯水。"

竺长生没说话，把水杯往他跟前又推了推。

"去年我不敢。"王胖说，"今年想通了。文霞走了五年，这东西在我手里一天，我夜里就醒一天。我不识字多，我不晓得它算个什么。我只晓得，它该给该管这案子的人。"

他把那只粗布包放在八仙桌中央，解开四角的死结。粗布里是一层红布，红布洗得发白，看得出陪嫁的颜色。

"米缸底下起出来的。"王胖说，"红布裹了三层。文霞在的时候就交代过，哪天她不在了，给竺警官。"

王胖坐在桌边，两只手在裤缝上蹭来蹭去，一边讲文霞最后那两年。夜里不睡，坐在灶屋的小板凳上，一坐坐到后半夜。问她坐什么，她说坐坐清醒。剪刀就是那阵子从米缸底下翻出来的，他差点当废铁卖了，文霞红着眼睛跟他急，他才知道这剪刀动不得。剪纸是搬家的时候在一只饼干铁盒里翻出来的，文霞一张一张数过，数完拿红布一裹，再没打开过。

〞这些话她跟谁都没讲过。〞王胖说，〞就跟我，酒后，一点一点漏给我。我笔头笨，她说一句我记一句。〞

红布摊开在桌面上。三样东西。

头一样，剪纸。二十七张，大小不一，有红纸有黄纸也有白纸，最旧的一张黄得发脆。王胖说，文霞数过数，二十七张，一张没丢过，搬了两回家都没丢过。

竺长生一张一张往桌上摆，像发牌。公鸡，鲤鱼，胖娃娃抱莲花，茶壶茶碗，一架瓜棚。折叠对称的纹路，细密的锯齿，是工人文化宫剪纸班教出来的路数。有几张一看就是孩子的手，歪着，却敢下刀。

有一张剪的是两扇门。门对着门，门缝里留了一条细缝，缝里什么都没有，又好像有什么。竺长生捏着那张纸对灯照了照，纸背是密的。他把这张单独放在一边。

他的目光又在另外几张上停了停。那几锯齿的斜口，进刀的方向都朝一边。他没说什么，把它们归成了一摞。

第二样，一把剪刀。家用剪，木柄包浆，双叶，一尖一钝，尖头那叶崩过口，又磨平了。红布原来就是裹它的。竺长生用两根手指捏起来，掂了掂，又放下。剪刀磨得很薄，薄得能铰绸子，也铰得动别的。

第三样，一个小学生作业本，铅笔字，一笔一划，是王胖自己的字。口述笔录，一条一条：

一，沈家伢半夜磨剪子。文霞说的，说那伢十来岁的时候，半夜里磨，磨得很慢，不点灯。

二，文霞酒后讲过一回，嘉木五岁那年讲过，爸的茶苦。是五岁还是七岁讲的，王胖记不清了。这话什么意思，王胖不敢问。

三，她说松庭走的那晚，嘉木的鞋底是湿的。文霞原话：十一月十八，落过雨，伢半夜回来，鞋底是湿的。我给他烘鞋，他坐在灶膛边，坐到天亮。

竺长生把本子看了三遍，又让王胖把三条口述了一遍。对得上，一个字都对得上。

念到第三条的时候，王胖的声音低下去，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念完了，屋里静了一阵，座钟走针的声音都听得见。竺长生给他续水，手很稳。续水的手稳，接剪刀的手也稳，只有夜里一个人的时候，那双手才敢抖。

磨剪子。茶苦。湿鞋底。三个词，他在案卷堆里泡了半辈子，头一回觉得三个词这么轻，又咬得这么紧。走，是走的哪个走，笔录上没写。王胖也说不清。

他起身进了里屋，把那只牛皮纸箱抱出来。二〇〇五年的尸检摘录，复写的，纸都脆了。当年法医的结论他背得出：双叶锐器，创角一钝一锐，创缘整齐。他把桌上那把剪刀放在摘录旁边，拿卡尺量了双叶张开的宽度，又对着创口的描述看了半天。

量完他把剪刀搁回红布上，去洗了手。肥皂打了两遍。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洗什么。

同类器械。就这四个字，再多一个字都没有。不是同一把，也不能断定不是同一把。够不着立案，够不着传唤，连够着个嫌疑都难。一个死人酒后的话，一个寡妇的收藏，一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用剪刀。

他又从箱底翻出一样东西：现场那张剪纸的翻拍照。黄纸，两个捧茶的小人。他把照片摆在桌上，跟眼前二十七张里最旧的那几张放在一起。纸的黄色不一样深，可都是同一种毛边黄纸，文化宫旁边那家纸店卖了二十年的那种。两张纸挨着，谁也不说话。看了很久，他把照片收回去，手在桌沿上按了按，才把那点抖按下去。

他把桌上的东西归了三堆：纸一堆，剪一堆，笔录一堆。归完了，又觉得这么归不对，把三堆混在一起，拿手拢了拢。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拢成一堆，倒有点像一个案子的样子了。可惜案子不是拢出来的，是证出来的。

王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住了，说：竺警官，这些东西在我那儿是祸，在您这儿是东西。您看着办。它要什么用都没有，就当我来看过您一趟。

竺长生送他下楼。楼道的声控灯还是去年那样，一层一层亮，又一盏一盏灭。

那晚他去了阳台。

烟没有点，就是坐着。对面楼的窗户一格一格黑下去，最后剩下月亮。他把十四年前那个现场在心里重新走了一遍：铁盒现金没动，剪纸压在门板底下，黄纸，刀口是从左往右走的。还有河埠头暗渠里那枚鞋印，三十三码，石膏模子后来遗失了。曹德贵当年说：小孩子的案子，结了的多，你别魔征。

——你别魔征。这几个字他记了十四年，今夜才知道，老曹说的可能不是没道理，是没胆子。

楼下不知谁家在教孩子背课文，一句一句，教一句跟一句，背的是秋天，果子熟了。竺长生在阳台上坐着，听着。烟在手边烧完了，他也没觉出来。

他还翻出当年走访本上的记录。柳文霞，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问话记录：当夜孩子在家，九点睡的。签名，按印。他记得清楚，问话的时候她一直搓围裙角，搓得起了毛边。当年他在本子上批了四个字：情绪稳定。现在这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割他的手背。一个母亲当夜就学会了撒谎，然后撒了十四年，撒到最后，把真话留给一个倒过一杯水的陌生人。

他想起王胖笔录上那行字：坐到天亮。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坐在灶膛边，鞋底是湿的，坐到天亮。文霞给他烘鞋，烘了一夜，什么也没问，又什么都知道了。她把剪刀包上红布压进米缸，把儿子的剪纸数得清清楚楚。这算什么呢。这是判官笔下都不好落的一个情字。

从警四十来年，竺长生头一回觉得手抖。不是怕，是冷。像守着一座装满了水的坝，明知底下漏，手里却连一块像样的石头都没有。

天快亮的时候起了风。他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数了一遍：一把同类的剪刀，一本外行记的笔录，二十七张剪纸。像一个案子被拆成了零件摆在桌上，每一

件都对的，拼起来对不上。差的那根轴，在十四年前的雨夜里，被人连壳端走了。

他想起小时候在皂市乡下，看老人腌菜，石头压下去，缸沿一圈水，封得死死的。一年之后开缸，菜是好的。有些东西封得住，有些东西封不住，封不住的，迟早顶开石头。

凌晨两点多，他摸出手机，给蒋阔拨过去。响了四声，他挂了。这个钟点，徒弟在值班，接了也接不住。案子死了。证据不能死在他手里，也不能活在别人嘴里。

他开灯，在蓝皮笔记本上写：

再等等。等一个能立案的人，或等一个能立案的年代。

搁笔之前，他又添了一行：剪刀不入柜，不入检材。等它有一天能入的时候，它得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写完合上本子，天已经有点泛白。红布包还摊在八仙桌上，他懒得收了。

清早秀珍起来，看见桌上的红布，叠得方方正正，鼓鼓的一包。她凑近看了看：″谁家的鞋垫？″

竺长生说：″一个妈妈的。″

秀珍哦了一声，没再问，转身给他下了碗粉。黄潭米粉，鳝鱼臊子，烫了两棵青菜。

粉上来，秀珍站在桌边看他吃，自己那碗忘了下。他把自己碗里的拨了一半过去，她也不推，坐下小口小口地吃，忽然说：粉要趁热，人也一样。竺长生抬起头看她，她已经低头吃粉了，像什么都没说过。

◆

二〇一八年冬天，天门。

龚一凡拖着一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回到天门的时候，三十四岁。在深圳做了十年，从电子厂做到电商公司，人跟着厂子搬了五次家，宝安搬到龙华，龙华搬到坂田。最后做内容的整个部门被一锅端，散伙饭在城中村的大排档吃小龙虾，十二个人吃完，各自去赶不同的地铁。

离深那天，他本来把工牌扔进了机场的垃圾桶，走出十米又折回来捡上。他跟自己解释，铁牌能卖钱。其实是习惯。他这个人，东西不拍照不存档，就跟没存在过一样。

赔偿金谈下来，他在深圳北站的候车厅坐了两个钟头，买了回汉口的车票，再转动车回天门。车过汉北河老桥，他隔着玻璃拍了张照，糊的。

他在老城区租了个一楼的套间，月租五百，设备全是二手凑的：一台旧单反，一支稳定器，一支麦克风，加起来三千出头。开了个号，叫竟陵旧事，先在公众号写图文，后来学着拍视频。选题只有一类：消失的老地名。第一条正经视频拍的是自家楼下的修鞋摊，老鞋匠做了三十年，摊子要拆了。播放两百多，评论区有一条：这是我们小学门口的老张。

他盯着那条评论看了很久，忽然明白了这个号该怎么做——拍没了的东西，替记得的人存档。

他妈问他：三十好几的人，拍这些有什么用。

他说：有用。东西没了，得有人记得它长过什么样子。

做鸿渐路那集，他在市图书馆泡了三天。路是一九九几年改的名，纪念陆羽，陆羽字鸿渐。老住户讲，从前这条路上有家副食店，柜台是木头的，打酱油要自己提瓶子。他把老照片和如今的街一张一张叠在一起剪进片子里，有个本地号转了，加了句评语：年轻人愿意回头看，路就没有白改名。

做汉北河老桥那集，他在桥墩底下蹲了两天。桥是六几年修的，墩子上凿着一行字，字口让水汽吃得只剩个浅影。他问了三个老人，拼出半句：为人民——后头没有了。片子的结尾他没配解说，就让河水流了两分钟。有个同行留言说，这两分钟最贵。

老地名系列做满一年，后台的数字从两位数涨到了五位数。市里一所中学的老师留言，说把他的片子放给学生看，当乡土教材，问能不能授权。他回了两个字：随便。对方要付钱，他不肯收，最后收下一样东西——那所学校自己编的乡土读本。他把它摆在书架最顺手的位置。

入夏他拍了一集糖塑。城关最后一位做糖塑的老艺人，挑着担子出摊，铜瓢，糖稀，竹签，一口气吹出一只金凤凰。老艺人说这手艺传了六代，到他这儿，收不着徒弟了。

拍糖塑那天下小雨，老艺人的担子歇在骑楼底下。龚一凡问他，这手艺有传人吗。老人往糖稀里吹了口气，说，传人要从小熬，熬得住穷。龚一凡把这句剪进了片尾。片子发出去，是他播放量最高的一集。有人留言问，凤凰还在吗，想去买。他替老人回了三个字：在，趁热。

第二年开春，他做文化宫选题。工人文化宫二〇〇八年拆的，拆之前楼里有间少儿剪纸班，办了七八年。打听了几个人，都把他指到竞陵老街，说班上的齐先生还在，装裱铺子还开着。

铺子门脸一间半，进门一股浆糊味，混着淡淡的霉和老木头的味道。墙上挂满裱好的字画，案子上摆着裁刀、排刷、一盆浆糊。齐守拙八十六岁，耳背了一半，手不抖，说话慢，声音却稳。

采访拍了两个下午。齐伯翻出一本相册，剪纸班的孩子，一年一张合影。他一张一张指：这个后来读了大学，这个去深圳打工，这个留在了本地教小学。拍特写的时候，老人的手按在相册边上，指甲缝里还有经年的浆糊，黄得像琥珀。

第二天下午，齐伯给他露了一手。一张红纸，对折两道，剪刀在指间转了几转，展开是一只蝴蝶，翅膀上的锯齿纹一根是一根，牵连不断。老人说，剪纸讲究千剪不断，一根线断了，整张就散了。又说，剪刀下去之前，样子要先在心里成了形，心里有，纸上才有。

他又问：齐爷爷，剪纸班后来怎么就散了？

老人说，文化宫一拆，班就散了。手艺不怕停，怕断。停下来，还能接上；断了，就没了。

再问，老人不答了，低头摆弄案上的裁刀，把刀刃在旧皮子上蹭了蹭，蹭得发亮。

龚一凡问：齐爷爷，带了多少徒弟？

老人想了想：记不清了。手上过的，总有几百个。

问：还记得起名字的吗？

老人报了几个名字，报着报着，慢下来。收机器的时候，龚一凡弯腰去关三脚架，听见老人在背后说了一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门外：

"我有两个徒弟，一个把纸剪进了楼里，一个把纸剪进了夜里。"

龚一凡直起身，问：齐爷爷，这句什么意思？

老人摆摆手：老了，胡话。你别写进去。

成片剪出来，那句原话留在第三分四十秒。视频发出去，标题是《消失的文化宫，和它最后一间教室》，播放量三千出头，评论里说爷爷好可爱，说小时候也在文化宫学过画画，说天门怎么没有文化宫了。给剪纸那段点的赞最多，没人留意第三分四十秒。龚一凡把原始素材拷进移动硬盘，贴了标签：文化宫，原片，勿删。

铺子门口有一样东西他没拍明白。每天擦黑，齐伯在门口挂出一盏纸灯笼，天亮收回去。有人问，老人说，给晚归的人照个亮。可老街上根本没有晚归的人，天一黑，半条街都睡了。

后来他留了心，连着去了三个晚上。第一晚，灯笼挂出去，街上没人。第二晚，还是没人。第三晚落小雨，他躲在对面屋檐下，看见齐伯站在灯笼底下，朝街两头望了一阵，收灯，插门。像在等什么人，又像早就知道等不来。

龚一凡把灯笼也拍了进去，一秒的空镜。

· · ·

老地名系列做到夏秋，他常去云香居麻将馆采风。老麻将馆，烟、茶、汗三种味道搅在一起，牌声哗啦哗啦，讲古的声音就压在牌声底下。

郑胖婶是老板娘，五十往上，嗓门大，记性极好，哪年哪月哪张桌上出过什么事，她都记得。客人打完牌散了，她就抹着桌子跟熟客讲古。龚一凡头一回去，赶上讲西湖的旧八景；第二回去，赶上了老茶仓。往后他常去，坐角落，点一壶最便宜的茶，听。

听了一个月，郑胖婶给他抓了一碟瓜子，拍在他面前：你这后生，听得比我们讲得还认真。瓜子不要钱，茶钱照付，这是馆子里的规矩。他笑着掏钱，心里给这个馆子又添了一条记录。

郑胖婶拿眼睛扫他：后生，你老来听老古董做什么。

他说：胖婶，你们讲的这些，书上没有。

"那仓里死过人，你们晓得的。"一个老倌压低声音，"死在十一月。柜里的现金，一分没动，就留了张红纸剪的花。邪性。"

"流窜的。"另一个说，"那几年流窜的多。"

"流窜的拿钱不拿命。"郑胖婶接了话，"要我说，是仇杀。做典当生意的人家，账上没有干净的。"

"后来仓拆了。"最老的那位说，"拆得好。那地方，夜里路过都发麻。"

有人起了个新话题，讲别处拆迁分房，老茶仓就沉下去了，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

角落里一个一直没说话的老倌忽然开口：那仓拆之前，进去过的人讲，墙上还有印子。什么印子，他不讲了，端起茶缸喝了一口。牌桌上静了一瞬，随即哗啦一声，新的一圈牌推了出来，把那点静盖了过去。

龚一凡当晚回家，打开手机备忘录，新建一个文件。文件名想了想，敲的是：2005_1118。

底下记了几行：老茶仓，西湖边；十一月；现金未动；一张剪纸；各执一词；待查——原址在哪条巷，问郑胖婶。

他把云香居那晚的录音也归了档。洗澡的时候他在想，一个案子的传说能在牌桌上活十五年，说明它没有死透。没死透的东西，总有一天会翻上来。

敲文件名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牌桌上没人把日子讲准过，有说十一月中，有说入了冬。这个日子，是他自己的手先敲出来的，像它一直在那儿等着。

年底的一个夜里，他正剪下一条片子，顺手刷了刷旧视频的评论。三千播放的评论区冷清，忽然多出一条新的：

齐爷爷的徒弟，一个是我同学。

账号名：晶晶。头像是系统默认的灰色剪影。

他手一抖点了刷新，那条留言沉进了全部评论里。再翻，翻不到了。他点进那个账号，零关注，零动态，像一间没住过人的屋。

他在评论区回了一句：你好，同学，方便聊聊吗？第二天再看，回复还挂着，那条原评论已经找不到了，像从来没有过。

睡前他把移动硬盘从包里翻出来，插上电脑，把文化宫那一段原片又看了一遍。第三分四十秒，老人说那句话的时候，画面在焦点外，只有一只手和半只蝴蝶剪纸。他把进度条拖回去，又看一遍，再拖回去。看完，硬盘塞进床底下的收纳箱，跟深圳带回来的旧物放在一起。

龚一凡对着屏幕坐了一会儿，在备忘录里又添了一行：晶晶。同学。齐先生有两个徒弟。

发条评论的这个人，他记住了。

◆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腊月二十八，天门。

竺长生提着两只布袋从西湖路早市回来。一袋藕，九孔的，炖排骨；一尾鳊鱼，还在鳃一张一合；一条腊肉，请摊子上帮忙剁成了段。卖鱼的大姐照旧给他留鱼，说竺爹爹，年下的鱼要挑眼睛亮的。路过蒸笼铺子，白汽一涌一涌，粉蒸肉的香料味漫了半条街。

糖塑的摊子也在街角。做糖塑的老汉捶着腰说，今年是最后一年出摊了，儿子不让他做了。竺长生买了两只糖凤凰，一只给秀珍，一只预备给小江。小江回不来，就搁在盘子里，看个红。

面案前的队伍排得老长，蒸糕的甜气混着油条的油气。卖春联的摊子支起来半天，红纸金字晃眼。有个穿校服的孩子帮家里守摊，冻得直跺脚，还在跟人找钱，一分不差。竺长生看了一会儿，多买了他两副小对联，给孩子开张。

二十九那天，蒋阔来过一趟，只到门口。放下一副对联、一袋水果，站了五分钟，连门都没让进——所里在调人手，他去支援卡口。走的时候在楼道里立正，敬了个礼：师父，过了这阵子，我来看您，好好看。竺长生在猫眼后头看着那个礼，直到楼道的灯灭了。

贴春联是老规矩。烫金的印刷春联，上联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春满乾坤福满门。秀珍搬了小板凳坐在旁边指挥，说左边高了，右边低了。福字要倒着贴，她把这个讲究又讲了一遍，一字不差，跟去年讲的一样，跟前年讲的也一样。

贴完春联，他又把家里上上下下查了一遍：煤气阀，插线板，阳台的花盆。秀珍跟在后头笑，说，你查贼呢。他说，防火防盗。其实是老习惯，大年三十，他总要把一年的尾巴收拾干净——这是警队的规矩，也是他的规矩。

竺小江来电话，说医院排了班，过年回不来。

"忙什么？"秀珍凑在免提边上问。

"发热的病人多。"儿子在那头顿了顿，"您跟我爸别往武汉跑。家里都好。"

挂了电话，秀珍去厨房，把儿子的碗筷照旧摆上桌，摆在他从小坐的那个位置。一个晚上，她问了三遍：小江到底回不回。竺长生答了三遍，一遍比一遍轻。

睡前小江又发来一段视频。秀珍凑在手机屏幕跟前，儿子穿着白大褂，身后是医院的走廊，一盏一盏的灯。她说，小江，瘦了。儿子笑，说妈，科室的盒饭管饱。视频挂了，秀珍把屏幕擦了擦，还给他，说，如今这东西好，人能从里头钻出来。竺长生把手机充上电，心想，人要是都能从里头钻出来，就好了。

下午秀珍翻出一本旧相册，坐在沙发上一张一张地看。看到小江小学的奖状，她喊他：长生，你看，小江又评上三好了。他凑过去，奖状的纸黄了，边角卷了。他说，好，贴墙上。她说，贴墙上，客人来了都看得见。家里已经几个月没来过客人了。他把奖状端端正正贴在客厅最显眼的那面墙上。

电视里在播新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武汉，有一批发热病人。主播的语速平稳，字斟句酌。晚间又加播一条：专家研判，存在人传人现象。字幕在屏幕下沿走了两遍。

竺长生坐在电视机对面，手里剥着橘子，剥着剥着就停了。

老刑警的直觉没有道理可讲。四十年里，凡是让他后脖颈发紧的案子，事后没有一件是小事。这个年，怕是不太平。

他把这条新闻的日子，用铅笔记在了挂历背面。这是老习惯，凡他觉得要出事的日子，都记一笔。挂历背面已经记了一串日期，最早的那一笔，是二〇〇五年。

他起身进了厨房，拉开米面柜的下柜。活动板推开，粗布包和蓝皮笔记本都还在。他找出四颗木螺丝，把活动板四角固定死，又从工具盒里翻出一把小铜锁，装在柜门内侧。钥匙配了两把，一把拴上他的钥匙串，另一把放进警校纪念章的铁盒，压在最底下。

那只铁盒秀珍擦过许多回。盒里一枚铜徽章，一张四个年轻人的合影，黑白的，四个人勾肩搭背站在警校门口，最边上笑得最歪的是他。另外三个，一个病故了，一个去了南方，还有一个，是老曹。他把铁盒放回柜顶，站了一会儿。这世上能跟他对账的人，越来越少了。

秀珍在门口看着，问：米柜上锁做什么？耗子又没有钥匙。

他说：过个年，紧一紧。

除夕上午，小江又来过一个电话，声音是哑的。说科里抽走了一半人支援发热门诊，口罩发了两盒，让他爸妈出门戴上，别凑堆，别串门。秀珍抢过电话问，那你吃什么。儿子在那头笑，说食堂开门。挂了电话，秀珍站了一会儿，转身去厨房改年夜饭的菜单，加了儿子爱吃的粉蒸肉，想了想又划掉，换成好存放的藕夹和鱼块，说，万一解封了，回来吃得上。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电视里滚动播出武汉的通告：公交轮渡长途客运暂停，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十点整，通道正式关闭，画面里是空荡荡的候车厅。

二十四日一早，天门的汽车站贴出停运告示，公交也停了。广播里的原话是封闭交通，街上的人嘴里说得直白：封城了。

年的味道一下子薄了。社区的通知贴出来，拜年活动取消，庙会取消，走亲戚不聚会。宣传车在街上慢慢开，喇叭里一遍一遍地劝。

下午竺长生下楼倒垃圾，一条街走下来，只遇见三个：一个社区干事，抱着一摞告示；一个药店店员，往门上贴口罩到货的红纸；还有一条狗，拴在理发店门口，冲他摇尾巴，主人不知去了哪里。回家的时候，巷口老太太硬塞给他一把青菜，没要钱，说，过年好。

晚上业主群里热闹起来，问哪家的超市还开门，问白菜多少钱一斤，有人转消息，说明早六点某超市到口罩，限购。他潜水看着，一句没发。秀珍凑过来问，群里说什么。他说，说菜价。其实也有说口罩的。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扣得很轻。

除夕夜，城空了。

晚饭前他在阳台上看了一眼全城。往年这个钟点，天上是烟花，地上是车灯，西湖边上的路走得挪不动。今年，天黑得干干净净，只有路灯一根一根立着，像被点名之后站直的兵。

天上偶尔过一架飞机，灯一闪一闪，不知道飞去哪里。往年除夕的航班最挤，今年不知还剩几班。他仰头看了一会儿，脖子有点凉。城空了，天没空。他心里想，这天，看着比人沉得住气。

团年饭两个人吃，桌上摆了三副碗筷。菜是老几样：藕汤，鱼块，粉蒸肉，一样是儿子的。电视里放着晚会，声音调得很低，歌舞的字幕在静音里滚。秀珍吃了小半碗就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看他，忽然问：长生，你年轻时候是什么样子？

他想了想，说：比你现在看到的瘦。

她点点头，像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吃完饭，秀珍收拾碗筷，他擦桌子。桌上的三副碗筷，她洗了两副，第三副单独搁在一边，说明天接着用。竺长生没纠正她。有些错，将错就错，比纠正过来暖和。

饭前还出了一回事。秀珍炖藕汤，火开着，人去看电视，锅底熬糊了一层。竺长生把汤倒了，重新添水炖上，一句没说破。秀珍站在厨房门口问，汤呢。他说，多炖一会儿，更烂。她哦了一声，回去了。灶上的火苗蓝汪汪的，稳稳当当。

禁鞭许多年，除夕夜本就没什么响动，这一晚更是静得出奇。楼下路口，一辆警车慢慢开过去，没有警笛，只有顶灯在转，红的蓝的光扫过一排排黑着的卷帘门，一明，一暗。空街上，那点光亮得扎眼。

蒋阔晚上发来一条消息：师父，所里全员在岗，初几再来看您。您和师娘别出门。

竺长生回了一个字：好。想了想，又补一句：值班注意安全。

那边回来一个敬礼的表情。他看着那个表情想，等年一过，这阵风声过去，该找蒋阔好好谈一次了。不是谈箱子，是谈人。一个能立案的年代太远，一个能立案的人，得先是个活着肯听的人。

十一点多，他上了阳台。西湖的方向没有灯，只有风从湖面上过来，带着水汽。夜太静了，静得能听见湖边上冰碴子碎裂的轻响，一声，又一声，像有什么东西在冰底下慢慢翻身。

十二点的风换了向，从湖上直灌过来。楼下的警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世界静得像一口扣住的锅。他想起下午贴的福字，想起秀珍讲了两遍的讲究，想起米面柜上那把新锁。都是小东西。可他干了四十年刑警，最信的就是小东西——大事情来的时候从不打招呼，都是小东西先动。

夜更深了些。屋里电视的待机灯一红一灭，秀珍在里屋发出匀净的鼾声。他从阳台的门缝里退进客厅，把阳台门带严，又伸手摸了摸米面柜上的锁——锁得很好，钥匙贴身放着。冷气顺着门缝钻进来，他把袖口拢了拢。

零点刚过，手机亮了一下，是小江发来的：爸妈，新年好。配着一张照片——值班室的桌上摆着一盒饭，电脑旁边贴了一副小春联。竺长生把照片看了很久，回了三个字：新年好。想了想，又补上：看好自己。

里屋的挂钟走到十二点，新的一年来了。没有钟声，没有鞭炮，只有挂钟自己走动的声音。

秀珍披着棉袄出来，往他肩上搭了一件：″站这么久，进屋。″

他还站着。看着湖的方向，看了一会儿，说：″今年怕是要过两个冬。″

秀珍没听清，问：你说什么？

他说，没什么，进屋吧。

灯熄了。

第八章　洗茶

江水取去人远者。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除夕，天门西湖路一条街上没有一个人。

蓝溪是上午接到语音的。穗说，年前对完账她就回武汉，店里这些天托给蓝溪，方便面多囤两箱，水也囤一点，莫慌。一分钟，一秒不多，像掐着表说完的。

下午一点，公交停运。高速口封闭的消息是社区群里发的，一张红头文件的照片，糊得看不清落款。蓝溪站在店门口，把卷帘门拉下一半，又推上去，反复了三回，最后还是拉到了底。

群里紧接着有人问，初几解封。没有人答。隔了一阵，有人发了一个作揖的表情。蓝溪把手机揣回兜里，进店给穗那盆绿萝浇了水，又把茶样柜从里到外抹了一遍。

西湖对岸，茶经楼安安静静。一层压着一层，像一摞没人用的碗。

仓里压着年前卖出去的四百多份货。最后一个礼拜，熟客和网店的单子挤成一堆，她用那杆老秤一单一单称过去，称得手腕发酸。快递停在腊月二十九。四百多份茶，出不了这条街。

那杆秤是二〇一六年开店时置办的。蓝溪来面试那天，穗没问学历，也没问会不会待客，只把一包茶推到她面前，说，称一斤二两。她称完，秤杆平平地挑着。穗看了一眼，说，你留下了，工号〇〇一。四年了，柜台挪过三回，秤底下垫的那块绒布没换过。

穗留下的账本在抽屉里，一年一本，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一样的字，横平竖直。蓝溪闲下来就翻，翻到二〇一九年那本，最后一笔账停在腊月二十

八，页脚有一行小字：年后第一件事，盘仓。她把这一行看了两遍，拿铅笔在旁边打了一个小小的勾。

店是门面带里间的老结构，里间有张小床。她换了床单，把穗留下的一床薄被搭在窗台上晒。被面上晒出太阳的味道，她抱着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该给自己弄点热的。

店里的夜比街上好过一点。茶罐一排一排站在架子上，黑暗里有木头和纸的气味。挂钟走针的声音很大，西湖那边偶尔有水鸟叫一声。她睡得浅，半夜醒了，就着小夜灯看一会儿账，再睡。

社区在小巷口支了张桌子，两个人守着，一支体温枪，一个登记本。轮到她，枪口对手背，三十六度七。守桌子的婆婆认得她，问，你家店里那个老板娘呢。她说回武汉过年去了，封在里头了。

婆婆把登记本往回收了收，说，那你要把店看好，里头都是钱。

她说晓得的。

街对面的药店开着半扇门，人隔着一米排队，队伍拐了个弯。蓝溪排过一回，买酒精和口罩。前头的老头买了三盒药，店员隔着一张桌子把药递出来，找零用托盘装着。人在门里，话在门外。

正月初一早上六点，语音准时来了。一分钟：退单怎么回话，哪些老客先打电话安抚，房租水电哪天交，一条一条，头尾都掐着秒。末了添一句家常，问方便面还剩几桶，问窗台上那床被子夜里冷不冷。

蓝溪回微信，说都好。发出去才想起，忘了问老板什么时候能回。她盯着对话框看了一阵，到底没有问。

初八的语音里多了一条：老客户里有独居的老人，三天打一个电话，问茶，也问饭，记在册子上，谁家没人接，隔天再打。蓝溪照办。册子记到第十一页，有个汉口的周老爷子跟她讲了一下午一九六几年的收成。

直播间里慢慢有了熟面孔。一个上海阿姨，每天准点来，说听水开的声音好睡觉；一个广东的后生，问东问西，买走了两饼陈茶；还有几个天门老乡，散在外地回不来，进直播间就为听一句乡音。蓝溪讲普通话，讲到锅盔两个字，自己先笑了。

正月十五那天，语音末了多说了一句：煮碗汤圆，再敬一杯茶——是念庐老太太在时的规矩。蓝溪照做了。汤圆是团购来的，冻得裂了口，煮出来倒还甜。她没问念庐老太太是谁。店里有些事不兴问，这也是规矩。

她一天出门两趟，一趟倒水，一趟看街。街口的红绿灯照常变，绿灯亮半天，没有一辆车等它。街对面的锅盔摊卷着门，卷帘门底下积了薄薄一层灰。一只橘猫从街这头走到那头，在太阳里躺下，又走回来。一个礼拜过去，它胖了一圈。

社区的宣传车一天过三趟，喇叭里的女声把不出门、不聚集念成了天门的调子。念到第三天，橘猫听见喇叭也不躲了，趴在店门口的台阶上，尾巴一甩一甩。

她妈从乡下打电话来，问回去不。她说店离不开人。她妈骂了一句，骂完又叮嘱口罩省着戴，想想不对，又叮嘱口罩别省。挂了电话，她掰了半块面饼下来，煮了。

过几天她妈又来电话，不催了，改讲村里谁家姑娘相看了人家，谁家彩礼给得多。蓝溪嗯嗯地应。她妈末了说，你也是，守着个店，把自己守老了。她说，妈，我二十二。她妈说，二十二怎么了，你像二十二吗。她照了照玻璃，没有答话。

西湖上往年这时节是有游船的。今年船拴在桩上，雪白的鸥鹭落在船篷上，一只，两只，一排。她站在店门口看，看多久都没人赶。

· · ·

二月十七，下午，蓝溪把手机架在补光灯前。

灯是店里拍货样用的，穗买的时候挑了最便宜的一款，架子松，拿胶布缠过。头一回开镜头，她紧张，画面里只有额头，挪了三回，才把一张脸和一张茶桌都装进去。她不知道两只手往哪里放，索性烧水，泡茶。

第一场，十一个观众。有个叫“白鹭”的，头像灰扑扑一张，是一只站在浅水里的鸟。他从头到尾不说话，也不走。她讲棉纸怎么摸，讲仓味是个什么味道，十一个人安安静静。下播一看，四十分钟，十一个人，一个没退。

水开的时候，她把头道水浇下去，茶叶在盖碗里翻了个身。头道不喝，倒掉。她对着镜头说，这一道是叫醒茶的，茶醒了才算数。有人发弹幕问，倒掉不心疼吗。她说，茶跟人一样，睡久了都有灰气。

第二场，四十几个人。第三场，七十几个。她定在每天下午两点，讲完茶，顺带报一句店里的近况：单子退了，账平了，米还够。手机发烫，她拿夹子把它夹在凉过的水杯上，接着讲。

她讲的东西，一半是学的，一半是看穗做下来的。穗泡茶，每一道水几时起、几时落，都像量过。直播里她学不像，就照实说：我学不来老板那个手，各位将就看茶。弹幕里笑倒一片，人气反倒上来了。

有天直播到一半停电，整条街黑下来。她找出半截蜡烛点着，把那场播完，观众反倒多了一倍。弹幕说，姑娘，你身后有烛火，像从前的茶馆。她回头看了一眼，火苗稳稳的，把茶罐的影子拉得很长。

白鹭场场都在，一个字不打。有一晚她说睡了睡了，下播前扫了一眼在线名单，那个头像灰了下去，退了。像有人起身，替她关了灯。她后来养成个习惯，下播总看一眼名单。白鹭的名字永远挂在最后一位，像散场的时候，最后一个走的人。

有一晚直播间涌进来几十个陌生号，乱发链接。她不会管理，就把链接一条一条举报了。乱糟糟里她瞥了一眼在线名单，白鹭还在，灰灰的头像，稳稳当当。等清静下来，她踏实了些——这话说出去没人信，她也就没说。

有一回她问穗，直播间那位白鹭，要不要寄份茶样。语音那头停了两秒，说，随他。两个字，再没有别的。

社区群里开始接龙团购。白菜、土豆、米，十斤一袋。蓝溪帮三号楼的婆婆捎东西，把米扛上四楼。出来的时候，婆婆往她兜里塞了一把炒花生，壳上还带着火气。

橘猫后来让守桌子的婆婆收了去。蓝溪每天出门，在台阶角留一把猫粮。空街上有了一桩每天要办的事，日子就有点像日子了。

有天早上六点，她把语音条放到第二遍，听见背景里有一种声音，很轻，一下，一下。像剪刀。清早六点，能剪什么呢。她想不出来。后来她习惯了，那声音跟秒针似的，一下，一下，把一天从头剪开。到了二月，六点的语音从一分钟变成过一分半——统共就那么一回，那天，背景里的剪刀声也响得久一些。

她也讲存茶：离地，避光，隔异味；讲梅雨天要关窗，讲茶罐不能拿洗洁精洗。有观众拍自家老茶的照片来问，她看不清就说看不清，不装。穗的语音里有一条是这个意思：不懂的就说不懂，不要说满。

弹幕里也有不客气的。有人说她讲得浅，有人说这茶价位虚。她不恼，一条一条回：讲得浅，是怕误导人；要比价，全网比去。回完，那边反倒没声了。

也有较真的观众，把她开播的时间截了图，说这家店雷打不动，下午两点，风雨无阻。蓝溪看见截图笑了。雷打不动四个字，是跟穗学的。这个店里的规矩，比她见过的任何地方都多，也都软。

· · ·

进了三月，穗的语音里多了一件事：年前那四百多份单子，能退的全退，茶样另寄，一分钱不许多留。蓝溪退到半夜。退到最后一个是黄石的老客，说

什么也不肯收，说要等解封了亲自来店里拿。她把地址抄在纸条上，贴在秤后头的墙上。

茶样一份一份往外寄。物流刚通的那几天，快递员在店门口收件，收一件，拿消毒水喷一件。蓝溪包茶包得慢：棉纸抻平，茶饼居中，四角折进去，不松不紧。这是穗手把手教的，说茶出门在外，包装就是脸面。

也有人反过来找她。市里两家单位订复工的茶礼，三十份，五十份。她报了价，穗的语音里回：让三成。又说，这个年大家都不容易，账要算，情也要算。蓝溪照办。签单子的时候，对方问她店里怎么称呼，她说，嘉木茶事。对方说，好名字。

三月头上，穗的语音里又添了一件事：今年的头采春茶，全做预售，先款后茶，发了货才算数。蓝溪把预售挂上直播间，头一天卖出去两百多份。有人问，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直播。蓝溪说，快了。快了两个字说出口，她心里其实没底。

直播间的数字一天天往上走。有同行来她这儿蹲直播话术，她不会藏，全都讲了。穗的语音里说，讲了就讲了，手艺长在自己身上，不怕人看。

三月的一个晚上，在线人数头一回过了千。弹幕滚得看不清字。有人问：老板娘是茶圣故里的？又有人问：小茶仙是不是你家老板？

蓝溪对着镜头，愣了两秒。

“我们老板姓唐，名穗。茶圣故里，人杰地灵。”

下播前她给穗发微信，把这晚的数据报了过去。穗回了三个字，知道了。隔了一分钟，又来一条，让她煮碗好茶，犒劳自己。蓝溪对着那两行字看了半天，笑了笑，鼻子有点酸。

那晚她多播了半个钟头。下播以后，她在里间坐着，半天没动。挂钟走到十一点，整条街黑得很干净，只有茶经楼的轮廓立在湖那边，比夜更深一点。

三月二十五号，群里炸了锅。蓝溪把卷帘门整扇推上去，站到街当中，站了一会儿。街还是那条街，风是新的。

当晚她烧了最后一点水，给自己泡了一杯。头道浇下去，倒掉。热气从门缝里挤出去，街上没有人接。

穗在语音里讲过：头道是给茶的，不是给人的。她把杯子洗干净，倒扣在架子上。茶醒了，才算数。旧年也一样，醒过一遍，倒掉，日子才算重新开始。

她拉灭灯。黑暗里，那杆秤放在老地方，秤杆平着。

◆

二〇二〇年二月，天门竟陵，印刷厂老宿舍。

蔡诚是被封在娘家的。腊月二十八他休假回天门，穗留在武汉对账，说初五回来。初五没到，城先封了。一个在竟陵，一个在汉口，隔着一条封住的高速。

娘家的老宿舍楼层薄，谁家咳嗽一声，半层楼都听得见。天亮得早，六点来钟，鸟把香樟吵得嗡嗡的，街上没有人，消毒水的味道一天比一天重。

小区招志愿者那天，他在楼下站了一阵，去居委会报了名。居委会问他会什么，他说，我有力气。

活不难，难的是细。团购的菜到了，他按楼栋分装，三号楼到七号楼归他，一层一层爬。白菜要挑掉烂叶，土豆要捡出发芽的，米袋子上七楼，中间歇两回。袖子上永远是消毒水的味道，回家洗两遍都在。

他的早晨从五点半开始。先去巷口接菜，回来分装，再挨家挨户敲门，喊人下来拿。九点站到小区门口登记测温，下午跑腿买药，晚上对一遍账。睡前把第二天的单子在脑子里过一遍，像过一遍考试。

一道做志愿的，有个退休的数学老师，有个跑快递的小哥。三个人分了工：小哥管跑腿，老师管记账，蔡诚管爬楼。收了工，三个人蹲在单元门口分一保温桶粥，隔着口罩说笑。蔡诚结婚以后，很少跟人这样坐过了。

六楼的鲁爹爹八十一了，独居，儿子在上海。降压药吃完了，药店没开门。蔡诚拿着居委会的证明去医院代取，来回四站路。药送到，鲁爹爹非要塞给他一把水果糖，糖纸都潮了。老头说，小蔡，你比我儿子来得勤。

鲁爹爹有个铁皮烟盒，里头不装烟，装糖纸。水果糖的纸，他一张一张抹平了，摞在一起，攒了几十年。老头说，从前日子紧，一块糖含半天。蔡诚听完，回去把自己抽屉里乱塞的发票也理了理。

后来他教鲁爹爹用智能手机。老头的儿子从上海打来视频，看见爹爹的脸，半天说不出话，末了说，爸，你气色好。挂了视频，鲁爹爹把水果糖一把一把往蔡诚兜里塞。

菜送得多了，鲁爹爹留他坐。老头耳朵好，就是闷，一开口全是从前：竟陵老街的青石板，工人文化宫的露天电影，文化宫里办过的剪纸班——教剪的老先生姓齐，一手绝活，娃娃们排队报名。蔡诚嗯嗯地应着。他在天门长了十八年，这些事一样也没听说过。

蔡诚下楼的时候，脚步是轻的。他长到二十六岁，头一回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他管登记和测温。登记本三天用完一本，字越写越快，落笔却越来越稳。这是他从前没有的东西——他从前的事，都是别人替他安排好的。

有天夜里，隔壁单元拉走了一个人。救护车没闪灯，悄悄来的，悄悄走的。第二天整栋楼都安静，垃圾都提着下楼，没人再嫌电梯慢。

三月落了两场雨。他披雨衣送菜，爬到七楼，护目镜里全是雾。开门的婆婆不让他进门，把一篮鸡蛋挂在门把上递出来，篮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菜钱先欠着，解封了一块儿给。他下到一楼，站在楼道里把那张纸条看了两遍。全楼的欠账，他都记在手机备忘录里，谁家多少，一笔一笔，像另一本账。

代购药的名单也越来越长。降压的，降糖的，失眠的。他把药名一个一个抄在纸上，去医院代取，一排窗口问过去。回来按名单分好，一家一袋，袋上用记号笔写着楼号。

每晚十点，视频十五分钟。

穗那头的画面永远是那个构图：一整面书架，一盏暖黄的灯，桌角一杯茶，热气斜着往上走。像演播室，也像别人家的年。书架上有一排书他数过，各种版本的《茶经》，至少七个。蔡诚这头，背后是爹妈的药盒和腌菜坛子，有时候他得举着手机在屋里走，找一点不乱的背景。

有一晚她把镜头转向窗外，给他看武汉的空街：对面的楼黑着一半，亮着的那一半，一格一格的窗。她说她们那栋楼有个姑娘，每天傍晚在阳台上拉小提琴，拉得不好，全楼没有一个人抱怨。镜头转回来，书架还是那个书架，灯还是那盏灯。

还有一晚，她在那头咳嗽了一声。蔡诚的水杯停在半空，问，感冒了。她说是茶粉呛的，让他别一惊一乍。那一晚的十五分钟，他讲话格外轻，像怕震着她那一头的麦克风。

再一晚，画面右上角多出来一摞纸箱。他问那是什么。她把镜头偏过去一点，说，给社区的。他还想问，她已把话头带回团购上去了。

有一晚她转身去够书，他看见书架最上层立着一个相框，背对着镜头。他问那是谁。她说是家里的长辈。两个字，他没有再问。

她问他爸妈的血压，问他社区的团购，叮嘱他口罩别省。他讲鲁爹爹的水果糖，讲分装的白菜。她听着，隔几句应一声。十五分钟到了，她会朝镜头外看一眼时间，说该下了。一分钟都不拖。头一年蔡诚把这当体谅，后来慢慢品出别的味道来——像一种客气。夫妻之间的客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不上来。

有一天他说：“等解封，我们要个孩子吧。”

屏幕里静了三秒。

“解封再说。”

后来他没再提。那三秒的沉默，他夜里翻来覆去地想，想不出那一眼里她是在看表，还是在看书架。

爸妈腊月里回了皂市乡下上坟，封在村里。蔡母隔两天来一个电话，说分居好，分居见人心。又说村里祠堂贴了封条，又说他表舅家的鱼塘没人管了，又说等解封了让他回乡下摘红菜薹，炒腊肉，一薹到底。又说村里有人家娶媳妇，婚车只放行了一辆，鞭炮改成了喇叭，半座村子都听得见。蔡父不爱讲这些，接过手机，只问一句：“她那个店，亏不亏？”

蔡诚握着手机，答不上来。

结婚两年，他没问过。穗也从来没说过钱的事。家里的开销她安排，他签字，像批一张跟自己没关系的单子。蔡父在那头等了几秒，说，晓得就好。挂了。

蔡父不会打字，学会了发视频。有一晚他把镜头对着鱼塘，水面全是天光，一只白鹭站在塘埂上。他说，你看，今天来了个客。镜头晃了半天，那只鸟飞了，视频也就完了。他把那条视频看了三遍。白影飞走以后，水面平了很久。

那天晚上十点，视频里她还是那个构图。他看着看着，忽然问：“店里的账，你一个人对得过来吗？”

她说对得过来，说蓝溪在看着店。声音从听筒里出来，很近，也很远。他有时觉得，自己像在跟一段语音过日子。

三月中，单位来电话让他等通知，说复工要审批。他把这话原样说给视频那头听。她说，正好，家里蹲着，也别乱跑。两个人隔着两百公里，商量出一种过日子的口吻来。说完，各自愣了一下。

翻手机的时候他发现，婚礼照片之后，两个人几乎没有合照。他们武汉的家里，鞋柜里她的鞋摆得像专柜，客厅的茶具按客人多少分成三套，样样妥帖。只是找不出一点乱糟糟的、过日子的痕迹来。

他翻出婚礼那天的视频，看了半截，关了。他发现自己不记得她那天脚上的鞋是什么颜色，只记得那双手，端着一杯茶，从敬茶到收席，稳稳当当，一滴没洒。

· · ·

二月底，社区办出入证，一家一证，两天出门一回，要结婚证和身份证。他翻箱倒柜，翻出穗婚前落在蔡家的一只饼干铁盒，证件都在里头。盒盖内侧一圈茶渍，是头一年装过年货留下的。当时他只抽了结婚证，铁盒原样扣上。

四月初，天门解了封，武汉还没解。穗托他把铁盒里的证件拍个清单发过去，复工要用。他一样一样拍：身份证，户口页，茶艺师证，普通话证书。拍到最底下，是一张复印得发黄的学生证。

华中农业大学，茶学，二〇一二级。

照片上的女孩至多十八岁，头发比现在短，衣领有点歪。他端详了很久，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后来明白了——照片里的眼睛是活的。

每晚十点屏幕里那个女人，得体，精确，笑意不多不少。照片上这个女孩，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判若两人。

他想给她打个电话，看了看表，才下午三点。他们之间很少有白天的通话。白天的她，像住在另一个时区。

他把那张复印件看了很久。结婚两年，她的事他知道得不多：不吃香菜，冬天手冷，睡觉极轻。再往前，是一片空白。他从来没觉得这片空白有什么要紧，此刻，纸上十八岁的脸在灯下望着他，他头一回掂出了空白的分量。

他把铁盒扣上，又打开，从自己那摞东西里抽出一张毕业照。照片上他站在第三排，笑得没心没肺，眼睛也是活的。他爸的旧工牌在抽屉最底下，黑白的，那张脸他认得，眼睛也是活的。原来人人都是从眼睛是活的时候过来的。

他把所有东西原样放回去，铁盒扣好，在床沿上坐了一阵。

当晚十点，视频接通。他几次想问一句什么，问出口的却是：“明天你们那边降温，加衣服没有。”

屏幕那头应了一声，说加了的。

挂了视频，屋里全黑。他坐在黑暗里，觉得那三秒钟的沉默，比封城还长。

◆

二〇二〇年二月，天门竟陵，鸿渐社区。

王春发五十四岁，街上人都喊他王胖。他生得富态，肚子先进门，这些年瘦了些，肚子还在。封城第二天，社区喇叭喊人手，他把那辆三轮电动车推出来，里外擦了一遍，报到去了。居委会的人看见他乐了，说王叔，你这车比我们的面包车还顶用。

社区的单子靠微信群接龙，接到半夜，第二天清早汇成一张总表，打出来两页纸。白菜多少棵，萝卜多少斤，米多少袋，鸡蛋按板算，谁家加了急，红笔圈出来。他念一句，装袋的姑娘勾一句。

他年轻时在粮站干过，会看米的成色。抓一把，搓一搓，凑到鼻子跟前闻一下，新陈就分出来了。分米的时候他给街坊挑得明明白白：新米煮饭，陈米熬粥，谁家也不吃亏。

凌晨五点去蔬菜批发点接菜。批发点四点就亮了灯，大秤邦邦响，点钞哗哗响，人人隔着一层口罩喊价。王春发把单子递过去，人家要帮他装车，他拦下，自己重数一遍——白菜的棵数，萝卜的斤两，一袋一袋过手。老板笑他，说老王你这脾气，适合管国库。

回来按单子分装，一家一袋，挂在车斗两边。哪栋哪户几口人，谁家老人牙口不好，谁家孩子上网课要吃口热的，几天他就记全了。

分装的时候，烂叶子他全挑掉。有人客气，说王叔你挑这么干净做什么。他说，菜蔫了是菜的事，送到人手里不能蔫。

装袋的姑娘是社区的小刘，手脚麻利，就是嘴快。她问，王叔，你家嫂子怎么从来不听你提。他说，走了。小刘说，走了，是回娘家了。他说，走了就是走了。小刘看了他一眼，不再问了。

五号楼有个坐月子的媳妇，他多给配了两根排骨，钱照旧。有人要塞烟，他不接。烟酒他都戒了，戒了六年了——一四年那个冬天以后，一样一样戒的。

七楼的婆婆眼睛看不清，他送菜上门，婆婆伸手摸一摸他的袖子，就知道是他。婆婆说，你的袖子永远是潮的。他说，消毒水。婆婆说，你是个细人。他从兜里摸出两个橘子放在婆婆手边。橘子是上一家硬塞的，他又转手送了人。

顺带的事也归他。三号楼下水堵了，他趴在楼道里捅了半个钟头；六楼灯泡坏了，他揣着新灯泡上楼。他说，反正顺路。街坊们过意不去，这家塞一把蒜苗，那家塞两个咸鸭蛋。他的车斗常常空着出门，满着回来。

文霞在的时候，家里那一小块天地是齐整的。抹布叠成方块，排成一排；冬天她手上生冻疮，晚上让他给焐着，焐着焐着就骂他手粗。她走了以后，屋子一年乱过一年。他懒得收拾。收拾了，反倒空。

文霞腌得一手好腊肉。她走后，他再没有腌过。今年封在屋里，闲得慌，他买了几条五花肉，照着记忆里她的路数，炒盐，抹盐，用棉绳穿了挂到阳台上。腌得成不成，他说了不算，得等风。

他总觉得自己欠文霞一场葬礼。那年十一月，她走得急，后事办得草草，花圈是邻居凑的，娘家人只来了一个远房。落葬那天雨夹雪，他抱着盒子滑了一跤，膝盖磕在墓碑角上。这些年他一想起来，想的不是疼，是那天娘家人看他的眼神。

那年守灵，他一杯接一杯。他跟自己讲，往后要补她一场体面的。这一补，补了六年，补到这场封城里来了。

空街上三轮车响，是这条街每天最早的声音。一月底起，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街上连个车影子都没有，只有他这辆挂了通行牌的三轮，来来回回。保安亭的灯还亮着，他跟守夜的打一声招呼。早点铺子全关着，他从家里带两个馒头，就着保温杯里的热水，在车座上吃完，一天的活就算开了头。

守夜的保安老周跟他熟了，说，王叔，白天你的车一响，我们睡觉都踏实些。王春发说，那是。晚上回家，他跟文霞的照片念叨这句话，念叨完自己先笑了。照片上文霞不笑，他也当她说好。

二月底米紧，有一早接了三十袋米。三轮车分两趟，他一袋一袋扛，扛到后来胳膊发抖，在批发点的台阶上坐了一阵。批发点的老板说，王胖，你图什么。他想了想，说，图个踏实。

二月中，手机里天天在转一个说法：天门的病死率，排在全国最前头。一张表，天门的名字在最上面。数字他没细看，看不得。他把手机扣在桌上，在屋里转了两圈，把电视也关了，转到阳台上。

楼里有户人家的独子在外地没了，不是这个病。社区去人帮忙料理，他也跟着抬了一程。回来他在楼下坐了很久，摸出一支烟点上——戒了六年，又点了一支。烟是苦的，抽了半支他掐了，从此再没碰过。

那几天他拉菜，绕着医院那条路走。不是怕，是不忍看。绕路要经过云香居的巷子口，麻将馆的卷帘门锁着，玻璃上贴一张停业告示。从前他来找文霞回家吃饭，就在这个巷口等。他站了站，走了。

傍晚，天阴着。湖上黑得早，一条船影都没有。他朝着西湖的方向跪下去，磕了一个头。楼下的空街上没有人，只有一只塑料袋贴着地皮跑。

“文霞，城里苍生都在还账。”

磕完他撑着栏杆起来，膝盖响了两声。晚饭他煮了一锅白粥，就着一块腐乳——文霞从前爱吃的那一种，他吃了一直没换牌子——慢慢吃完了。

夜里他睡得晚。躺在床上，能听见远处偶尔过一辆车。文霞从前爱站在阳台上看西湖，说湖对岸的楼一天一个样。如今楼还是那些楼，湖上连一条船都没有了。窗外有月亮，惨白的一小片，从楼缝里慢慢挪过去。

半个月后，阳台上那几条腊肉腌出了酱色，他切了一块蒸了，肥的地方透亮。他夹了一筷子，朝着阳台的方向举了举，说，文霞，手艺没丢。

· · ·

三月初，他凭着社区开的通行条，绕去老城区看了一眼沈家老屋。通行证是塑料壳的，挂在脖子上，边角磨得发白。

卷帘门锈死了，锁眼堵成一个小小的锈球。门缝里长出来的草，去年枯的，今年又从枯草里冒出新的。墙根一溜青苔，绿得没人心疼。他把耳朵凑到门缝上听了听。里头什么声音都没有，连老鼠都没有。风从缝里出来，带着灰的味道。他在门口站了一阵，从车斗里提出一袋米，十斤装，挂上门把手。

“算我替文霞看着家。”

这话是对着门说的。说完他退后两步，看那袋米在风里晃了一晃，稳住了。他推着车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米袋子的提手勒在门把上，像给这扇门行了个礼。

巷子里有个收废品的老头，蹲在墙根下晒太阳，问他，这屋还有人没有。他说，没有人。走出两步，又回头补了一句：有，在外头。

三月末，社区通知登记亲属在外地境外的情况，说是侨乡防疫要摸底。表格一张一张发下来，一家一张。发到他那条街的时候，他正在车斗边上分鸡蛋，蛋壳上还沾着草。

王春发自己这一栏好填。上头没了老人，底下没孩子。兄弟在岳口，电话打得通。

笔尖停在“直系亲属长期在外”那一栏上。

文霞的那个儿子。她活着的时候，跟人说儿子在广州做工。地址，她没讲过，他没问过。十年了，年三十桌上多摆一副碗筷，人从来没有回来过。

那孩子在他家住过两年。半大的一个男孩，话少，屋檐底下站一站就是半天。搬走那年，行李卷得整整齐齐，桌面抹得干干净净，像从来没住过人。

十年来各式各样的表，这一栏他从来空着。这一回，他悬了半天笔，落下去，写了两个字：不详。写完，他把笔帽按上，咔哒一声。窗外一只鸟落在电线上，叫了两声，飞了。

收表的小姑娘看了一眼，问：王叔，这一位是……

“继子。”他说，“问了也白问。文霞走的时候，他连信都没有一个。”

小姑娘把表格夹进文件夹。他把三轮车推出巷子，空街上又响起那串不紧不慢的电流声。

解封以后，他又去了一趟老屋。米袋还挂在门把上，没人动过，袋子上落了两片枯叶。他把旧米提下来，换了一袋新的挂上去。提下来的那袋，拎着还挺沉。他想，米这个东西，挂在门上，一年就陈了。人也一样。

旧米他拎回家，淘了三遍，煮了一锅粥。新陈掺着的米，粥照样熬得稠。他吃完了，把碗洗了，倒扣在碗架上，跟文霞从前摆的一个样。

五号楼那家孩子满了月，媳妇的婆婆追下楼，往他车斗里放了六个红鸡蛋。他推不过，收了。当晚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算给自己过了个节。车座底下还有半包喜糖，也是那家硬塞的，他含了一颗，甜得眯了眼。

傍晚他给岳口的兄弟打了个电话，问了几句米价。兄弟问，哥，你那边怎么样。他说，都好，米还多。兄弟在那头说，给他留了两袋新米，等车通了给他捎去。他说，捎来做什么，我米挂都挂不完。兄弟沉默了一下，说，哥，你那个米，挂给谁看呢。

王春发没答上来。挂了电话，他在院子里站了一阵。米挂在门把上，是挂给一条巷子看的，也是挂给一个走了十年的人看的。这话他没有跟人说过。

天边最后一点亮沉下去了。他把车斗里的空袋子叠好——明天，还要用。

◆

二〇二〇年二月，天门竟陵，竺长生住的老楼。

小区门口一张折叠桌，一个登记本，一支体温枪。竺长生戴着老花镜坐在桌子后面，袖套套在棉袄外头。居委会本意是让他挂个名，他天天准点到，比上班的人还齐。

他住的那栋楼是老粮食局的宿舍，一梯两户，楼道里堆着邻居的白菜。二月半落过一场雪子，打在小区的雨棚上沙沙响。他把登记本揣进怀里，跟那支体温枪放在一个口袋。

体温枪到了冬天不准，打出来人人三十四度多。他把它在怀里焐着，隔一阵换一个口袋。桌肚里搁一只热水袋，下午三点换一回水，这是他自己想的办法。登记本上他的字一笔一划：几号楼，几口人，出去买什么，回来几点。有个年轻人嫌麻烦，隔着口罩嘟囔。他从老花镜上头看人一眼，不说话，把本子转过去，指给他看头一页——那一页登记的是他自己家。

劝口罩他也有一套。一个老爷子不肯戴，他把自家备用的拿出来，双手递过去，说，您戴上，我腰杆硬一些。老爷子盯着他看了半天，戴上了。后来那老爷子天天来桌前报到，替他看半晌桌子。

也有人记不住日子。三号楼的老太太天天问他今天几号，他一天答一遍，答完，在心里把日子替她再过一遍。把日子记牢，原来也是一门手艺。

有天夜里十点多，三号楼一个孕妇见红，家里的车出不去。他打社区值班电话，又打指挥部电话，半个小时，一辆车开到楼下。他站在车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着车走远才回屋。第二天那家人提来一兜苹果，他收了，转手挂在岗亭的钉子上，写了个条：谁值班谁吃。

小区里有一户从外地回来的，居家隔离十四天。他天天帮着扔垃圾、送菜，隔着门说话。门里是个年轻后生，隔着门道谢，说，爷爷，难为您。十四天满了，门上贴出一张纸：谢谢竺爷爷。他把那张纸轻轻揭下来，夹进登记本里。

儿子竺小江在武汉一家医院的感染科。视频约在每周三晚上。镜头里那孩子瘦了一圈，口罩在脸上勒出两道印子，头发剪得极短，背景是驻点酒店的走廊，墙上一行字：清洁区。

“缺什么，从家里寄。”竺长生说。

“不缺，够用。”小江说，“爸，你少出门。”

“我站岗。”

“站岗也少站。”

他寄过去一袋晒好的萝卜条，一罐剁椒，写信报了平安。东西到不了病区，能到酒店也好。小江回消息说，萝卜条到了，分给了同事，抢着吃。他看着那行字笑了一下，把手机扣在桌上。过几天，小江从武汉寄回来一盒口罩，正规渠道买的，盒里压着一张字条：爸，站岗戴两层。他把字条压在老花镜盒底下。

有一回视频，他问儿子累不累。小江说，还好，就是下了班想不起白天做过什么。竺长生说，我懂。办大案的时候也这样，人像在别处过了一遍。小江在那头笑，说爸你都退休了。他说，退了，手艺还在。

有一回视频断在半截，他打回去，占线。他在桌前坐了一个钟头，水开了又凉。直到回拨过来，小江说，病房里忙，没事。那晚他没睡踏实，半夜爬起来，把萝卜条又切了一簸箕，摊开，摆到阳台的月亮底下。

挂了视频，他对着黑下去的屏幕坐一会儿，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一擦，再戴上。

秀珍的病是去年起头的。先是炒菜放两回盐，后是出门认不得楼栋。医院里的说法他听懂了，回来的路上一句话没说。今年封城，家里就剩老两口，她的记性像退潮，一天退得比一天远。

秀珍认旧人倒还认得。翻老相册，她点着一张泛黄的合影，说这是她做姑娘时的姐妹，隔了五十年，名字一个不差。只是昨天的菜，她记不得买没买。

她的手也比脑子记得牢。封城里，她把三十年前的拿手菜一道一道做出来：粉蒸肉，蒸鱼，蒸茼蒿——天门人过日子，蒸笼不歇。她垫着纱布撒米粉的手势，跟年轻时照片上一个样。竺长生吃得很慢。他想，她忘掉的，手都替她记着。

三月头上出过一回事。秀珍早上出了门，晌午还没回。他把半个小区翻遍，最后在楼后的小花园里找着——她坐在冬青边上，安安静静，说等小江放学。他没有拆穿，挨着她坐下来，一直坐到日头偏西。回家的路上，她的手搭在他胳膊上，一路都很轻。

她一天问几遍：“小江回来没有？”

“没有。他在医院上班。”

“打仗的医院？”

“差不多。”

她点点头，过一阵又问一遍。竺长生一遍一遍地答，像登记本上一笔一划的字。后来她又问过几遍那两个孩子，有时候隔一天，有时候隔一顿饭。他每回都答，快了。她每回都说，快了好。像一句只有他们两个对得上的话。

有天下午他在阳台上看报纸，秀珍从里屋出来，站在他跟前，问了一句不一样的话。

“那两个伢，找到了吗？”

他手里的报纸响了一下。

秀珍看着他，眼神干干净净，像在问一件搁在天边的家务。二〇〇五年冬天，他办完现场回家，一夜没睡，早上她端了碗面过来，看见他的脸，什么也没问。这一问，她揣了十五年。

“快了。”他说。

“快了好。”秀珍转身去厨房，“找到了，要给他们屋里大人讲一声。”

竺长生在阳台上坐到天黑。报纸摊在膝盖上，一个字没看进去。有些话他没跟任何人讲过，她全是从他那张脸上读下来的。人老了，记性往回走，越远的越清楚。

那天早上她端来的那碗面，他吃得干干净净。十五年，他没有拿这桩案子跟她换过一句话。往后，他打算还是这样。

米面柜的夹层，他夜里才开。箱子里的东西他一样一样过手：现场照片的翻拍，鞋印模子遗失前的照片，还有那个从王春发手里接过来的红布包。箱底压着一张剪纸的翻拍，黄纸，双童奉茶。这张纸他看了十几年，每一回看，都像头一回。看完原样收好。红布包他往里推了推，推到最里头。夹层推平，柜门合上，米袋子压回去。

有一晚他刚合上柜门，秀珍起夜，趿着拖鞋从门口过。他站在柜子前头没动。她看了他一眼，说，面缸里的面不多了，明天记得买。他说好。她回房去了。他听着里屋的呼吸匀下来，才把灯拉灭。

又有一夜，他正开夹层，里屋忽然说了句梦话。他停住，等了半分钟，里屋没有再响。他把箱子放回去，这一夜没有再开台灯。

有一晚他给蒋阔打了个电话。徒弟在市局，封控执勤，声音里全是熬出来的沙。他问身体，徒弟说好着。徒弟问爹你少站岗，他说好。两个人东拉西扯了五分钟，谁也没提那桩案子。挂了电话，他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有些事跟火候一样，急了，反倒生。蒋阔末了说，爹，等消停了，我来看您。他说，来。来了把你手里那点陈案也带上，我帮你瞄两眼。蒋阔在那头笑了，笑声沙沙的。

· · ·

三月二十五日，解封头一天。

竺长生没告诉任何人，一个人沿着西湖走了一圈。出门前他数了数抽屉里用完的登记本，三本半。柳树绿得很新，湖边的长椅隔一把坐一个人。亭子里有老人拉琴，拉的是《洪湖水》，断了三回，没人笑。

湖那边的空地上，有两个孩子在放风筝，线放得老长，风筝只有巴掌大。大人坐在轮椅上仰头看。竺长生站住看了一阵。一个冬天，没听过小孩这么高的声音。

湖边的椅子上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剥橘子，一瓣一瓣递过去。竺长生走过的时候，老太太也递给他一瓣。他接了，道了谢。橘子是酸的，他吃得很慢。

一辆三轮电动车从他身边慢慢过去，车斗里的菜码得整整齐齐，白菜压着萝卜。他认得蹬车的背影。谁也没有停。一个往前蹬，一个往前走，像两条并行的水。

陆羽故园的大门锁着，铜像的基座上，摆着几枝不知谁放的迎春。

湖边有年轻人拍照，举着手机原地转圈，转到他跟前，说，师傅，帮忙拍一张。竺长生接过来，横平竖直地给他拍了。年轻人看了一眼成片，说，您这构图，当过美术老师吧。他说，没有。画过现场。年轻人没听懂，道了谢走了。

湖边“嘉木茶事”的门面还锁着。卷帘门底积着两个月的灰，玻璃蒙尘蒙得发毛。他本来走过去了，又退回来。

玻璃灰上有道划痕，指尖划的，一道。划的是一棵树：树冠圆圆的一团，底下一条短柄，像小孩子画里的树，五笔就完了。

他左右看看。街上没有人，鸟倒是有一只，落在对街的电线上。他不知道是哪个划的，什么时候划的。可能哪个过路的小孩，可能哪家等在门口的大人

闲得慌。也可能，什么都不是。

他抬起袖子，把那块玻璃擦干净了。灰在藏蓝色的袖口上留了一道横印，像粉笔。擦完，玻璃里头映出他自己：老花镜，白头发，身后半条空街。

他把袖口的灰拍掉，接着往前走。走到湖对岸回头看了一眼，那面玻璃亮了一小块，像一只睁开一半的眼睛。

解封当晚，他给儿子发信息：“武汉解封了，好生吃饭。”

儿子回了个敬礼的表情。

竺长生对着手机看了一会儿，低声说了一句：“爹这边，也快了。”

里屋秀珍睡下了，呼吸匀匀的。他把手机充上电，把老花镜收进抽屉，顺手压了压抽屉角，像压一份卷宗的封皮。窗外，解封头一个夜晚的竟陵有狗叫，远远的，一声，又一声。他听着听着睡着了。这一觉没有梦。

◆

二〇二〇年三月，天门的城是空的。安静得能听见红绿灯变灯的咔哒声。

龚一凡三十五岁，独居，靠一台旧相机和一夜一夜的剪辑过日子。封城头一个月，他那个号掉了两成粉，剩下的人里，倒有一多半是天门老乡，散在各地，回不来。这半年的素材，比过去三年都多。他也奇怪，城里没有东西可拍，他反而拍得最凶。后来他想明白了——空了的城，什么都藏不住。

龚一凡领了张防疫宣传志愿者的红袖章，把相机挂在胸前。袖章是居委会发的，顺带发了一瓶酒精、一包口罩。发东西的小姑娘问，你拍这个做什么。他说，拍下来，往后好有人信。

社区喇叭里的宣传录音，就是居委会找他录的。他的声音天天在空街上飘，从街这头飘到那头：不出门，不聚集，勤洗手。有回他在巷子口碰见守桌子的婆婆，婆婆说，小龚，你的声音我天天听，比你人都熟。

他拍鸿渐路的十字路口。红灯变绿，绿灯变红，没有一辆车等它。他拍三蒸居，卷帘门上贴着歇业告示，告示让雨水泡出了边，门缝里探出来一丛葱，长得比什么时候都旺。他拍西湖路早市的空架子，拍竟陵老街的石板。拍陆羽故园闭着的大门——门口那尊铜像，不知哪个给戴上了口罩，他拍下来的第二天，口罩让管理处摘了。后来他从门缝里望过一眼，园子里草长过了石阶，铜像手里还攥着那卷竹简。他想，这位老人家看西湖看了一千两百年，头一回，看这么干净的湖。

天门南站的站前广场他也去拍了。广场大得空旷，一块电子屏还亮着，滚着到站信息，一条一条，全是停运。他在电子屏底下站了一阵，拍了十分钟，一条素材都没要。

医院后门外的卡口他也去拍。雾里一盏灯，一张桌，两个穿雨衣的人，一支体温枪举起来，又放下。他站在马路对面，隔着一条空荡荡的斑马线，按了三次快门，回去把三张全删了——他觉得那不是他能拍的。

卡口的志愿者倒拦过他一回。他把红袖章和相机一起递过去。对方翻了翻他的号，说，你就是拍楼那个。他说是。对方把东西还他，说，拍吧，拍亮一点，叫外头的人看看，我们这儿没乱。他说，好。这句话他记了很久。

空城有个好处，鸟多了。西湖上白鹭一排一排地落，落在游船的篷顶上，落在亭子的翘角上。他拍了很久的一段：一只白鹭单脚站在解缆的船头，船晃，鸟不晃。

他把无人机从床底下翻出来，前年买的，统共飞过三回。想了想，又塞了回去。这种时候飞那个，算什么道理。还是两条腿，一个取景框，走到哪儿，拍到哪儿。

汉北河老桥他也去了。桥还是那座桥，桥下的水绿得发暗。他在桥上站了半个钟头，一辆车都没有。风从河面上过来，掀他的衣角。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这桥下游泳，让大人拿竹竿追。那时候的桥，吵得跟菜市场一样。

他给自己也拍过一条。相机搁在路口，他自己戴着口罩从画面里走过，从街这头走到那头，从头到尾一个人。配的字是：今天，全城的镜头里，只有我一个行人。那条播放量最高。有人评论问，你不怕吗。他回，怕。怕，就更得拍下来。

夜里他从西湖大堤上过，看见茶经楼亮着。

景区闭园两个月了，楼里没有人，灯却每晚亮着。物业在搞照明试运行，时控开关设定好的，天一黑就亮，亮到十一点。整座城黑着，就它亮着，一层一层，像谁家守岁，忘了关。

他支起三脚架，拍了三十分钟，一动没动。成片里只有风声，远处一声狗叫，灯下的楼纹丝不动。白天他又去拍了一回：大太阳底下，那楼也亮着灯。没有人看它，它也亮着。

他把两段素材剪成一条片子，没有配乐，字幕打到最后一帧才出。标题想了很久，最后敲下五个字：《白天也亮着》。

从前拍夜景，他等的是灯灭，灯灭了，城市才睡。这一回，他等的是灯亮。全城的灯都灭了，才轮到那一座楼说话。

那晚他在堤上站到灯灭。十一点整，楼上的灯一层一层熄下去，最后黑成一座山的影子。收三脚架的时候，手冻得不听使唤。回看素材，最后十秒，有一扇窗又亮了一下，随即灭了。他反复看了几遍，认定是反光。可心里有个地方，让那一下点亮了一下。

片子发出去，看的人不多。有人留言问，楼里是不是住了人。他回：灯是设定好的，人不在。

片子最后，他放了一张截图，是物业那张照明试运行的通知。有人问，为什么要放这个。他回：免得有人以为楼里住了人，也免得有人以为，灯是为人亮的。

有一条评论顶得最高：楼是给陆羽点的灯。他回：不是，是电费按时交。回复底下笑倒一片。他看着那些笑脸，把这条也置顶了。

有同行私信他，问那条楼的片子用的什么滤镜。他回：没有滤镜，是楼自己亮。

有个留言从国外来的，说家就在三蒸居隔壁，看了片子，一夜没睡。他把这条留言置顶，又在片尾添了一行字：城是空的，家还在，等你们回来。

有天深夜他剪片，顺手刷到一个卖茶的直播间，西湖路上的店面，主播是个年轻姑娘，正把头道茶往水盂里倒。姑娘说，这一道是叫醒茶的。他听了三分钟，退出来，走到那面墙前，把“嘉木茶事”那张便签往正中间挪了一格。

后来他又点进去过两回。姑娘讲茶不吆喝，卖得慢，弹幕稀稀拉拉。他看出一个细节：每回下播前，她都要把那杆秤里外擦一遍。他把这条也记在便签上。

他想给齐伯打个电话。拨了，又按掉。老头子耳朵背，电话里讲不清，讲急了要发火。等解封，他要上老街去坐一坐，把这两年的照片给老头一张一张过目。老头子去年讲的那句话，他抄在纸上，压在白板下头。

有一夜他梦见老头子坐在藤椅上剪纸，剪刀开开合合，没有声音。醒来他把这个梦也记在便签上，贴在墙的最角落。梦不值钱。但梦里那把剪刀，是真的。

· · ·

墙上的便签越贴越多。

他那间小书房重新收拾了一遍：一面墙，一块白板，一台旧笔记本。备忘录里有个文件夹，名字是2005_1118，两年积下来的东西，他一条一条誊在便签上，往墙上贴。毛线是从旧毛衣上拆的，红得旧了，钉在墙上，过路的风从窗缝里进来，影子一晃一晃。

茶仓命案。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现场剪纸，双童奉茶。

齐伯的样册。去年老头子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记在本子上，又誊到便签上：一个把纸剪进了楼里，一个把纸剪进了夜里。那句话是去年秋天讲的，老

头子坐在老街的藤椅上，那天太阳很好，讲完就打了个盹。他站在旁边，把这句话在心里抄了三遍。

小茶仙。二〇一一年，全省冠军，一折六羡，报纸上有照片。二〇一四年，茶经楼开放那天，报纸上也有她。

嘉木茶事。西湖路的门面，店规三条，每年十一月十八日闭店。

白板左下角，他多贴了一页复印件：二〇〇五年冬，望湖茶仓命案的旧报道，铅字小得像蚂蚁。他把那一页的四角压得平平整整，跟别的不一样。

毛线从一张便签牵到另一张便签。小茶仙牵到嘉木茶事，他隔着七年对过脸，不会错。二〇〇五的剪纸牵到齐伯——老头子这些年零零碎碎给过他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墙上有几样东西，是从老人那里来的。

线牵到头，有一根悬在半空，什么也没连上。

妹妹小凡从广东打视频来，问他是不是又熬夜。她说哥，你一个人在那种空城里，我看着都慌。他说城里安静，适合干活。小凡说，你别光顾着干活，饭要吃。他嗯了一声，把镜头转过去给她看锅——白粥，一碟咸菜。小凡在那头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挂之前她说，哥，你那个拍楼的片子，我们厂里人都转了。他说，转了好。转了，外头的人就知道，天门的灯还亮着。

挂了视频，他站到白板前。

小凡临挂前又问了一句，哥，你到底在查什么。他说，一个日子。小凡说，日子有什么好查的。他说，日子背后都有人。

日子他已经确定了。白板右上角，他把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九年的十一月十八日，一年一年列出来，画了十五个圈。十一月十八日，一年一年，像口钟，到点就响。可是剪纸是双童，老头子的话里也是一双——他数来数去，墙上的线只牵出一个人。

他拿起笔，在白板正中写下四个字：

“缺一个人。”

写完他退后一步。窗外整座城黑着，只有远处湖边上那一座楼亮着。他把台灯拧暗了一格，让那四个字在黑暗里显得更白。临关机，他把备忘录里那个文件夹点开，又关上。

◆

二〇二〇年二月，深圳，华强北。

霓虹还亮着，人只剩三成。阿彦走过天桥，桥上卖手机膜的小贩收了摊，铁皮箱子锁着，锁眼上蒙灰。

阿彦的档口开了半边卷闸。隔壁小马在门口架着手机直播，耳机搭着口罩卖，一天喊到晚。小马喊他入伙，说彦哥你这张脸往镜头前一坐，比我强。阿彦说，我这张脸，见不得光。

他是二〇〇六年来的深圳。华强北的柜台一米宽，他守了六年光碟，眼看一行当从抢手到烂大街。档口换过三回，招牌上的字从音像换成数码，再往后，换成现在这块空着的。铁闸上贴着一张转让，贴了两年，纸都黄了。

他给他娘汇了钱，报了平安，说过年不回了。他娘回他四个字：活命要紧。他把这四个字看了两遍，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兜里。

这是老话了。十二年了，他的规矩就四条：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每年十一月十八日停工。一年一页，记在账本上。今年这本翻到二月，页眉上他照例写好年份，笔顿了顿，在年份后头添了两个字：封年。

这四条规矩，头一条是那个人定的，后三条是两个人凑的。定规矩那年，阿彦问过一句，你到底躲什么。那人隔着帽檐看他一眼，没有答。从那天起，阿彦不再问了。

账本第一页写着那四条规矩，十二年前的钢笔字，笔画压得深。每年十一月十八日那一栏，他都画一个圈。二月里他打电话过去，问今年还停不停。那头只说了两个字：照旧。他挂了电话，在封年后头又添了三个字：照旧停。

账本是老式的软皮本，一年一本，在抽屉里码成一摞。他有时候翻，不翻账，翻每年头一页自己的字。二〇一二年的字最野，越往后越规矩。他想，人跟着账长。只有一年例外——有年除夕，阿木破天荒托人带过一句拜年的话。那一年，他在账本边角多记了一笔：他也晓得过年。

十二年前他在华强北收留过一个不肯见光的年轻人。夜里搬货，白天睡觉，帽子压到眉毛，一手好剪子——包装膜、塑封、纸盒，到他手里三两下就齐了。后来那个年轻人有了自己的路子，茶的路子，阿彦跟着转到这条道上，一转十二年。光碟死透了，账本还活着。

除夕他一个人在档口楼上煮了速冻饺子，给相熟的老客户群发拜年短信，回的不到一半。回的那一半里，又有一半问的是货。他一条一条答，答完把手机扣下。楼下的空街上一辆车都没有，霓虹灯照旧一闪一闪，闪给谁看呢。

货运是二月里最难的一段。司机困在服务区，一困十几天，方便面吃到反胃。柜子压在口岸，单证卡着一层又一层。阿彦在电话里跟司机一句一句对货，把日子一天一天往后挪。

司机老赵在电话里嗓子是哑的，说彦哥，我这辈子没想过，拉一趟货跟坐牢一样。阿彦说，你比坐牢强，坐牢有人送饭。老赵在那头笑，笑完咳了半天。

他开车给困在服务区的司机送过两回东西。方便面，火腿肠，一袋橘子。司机隔着两米远接，说彦哥，等放开了，我给你拉一年货，不要钱。阿彦说，要的。车费单开，我记账。

行情反倒疯了。网上都在讲疫后要抄底老茶，讲手里有老茶的趁早捂住。回流的老茶一路往上涨。买家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问货压在哪里。阿彦照着讲熟了的戏本，一层一层往上加码：货在境外压着，单证层层加码，入仓延期，急不得。

有个买家要一口吃三十饼，点名要疫前出仓的老批次。阿彦报了个价，那头眼都没眨。挂了电话他算了算，这一年，比过去哪一年都好过。好过得他睡

不踏实。他爬起来翻账本，把这一年的进项核了两遍。账对得上。对得上的账，这些年越来越少见。

有个跟了他八年的老买家打电话来，先问他的身体，末了说，彦哥，我这辈子喝的茶里头，有你一半单证的功劳。阿彦笑骂，说有你一半是运气好。挂了电话他想，这话不假，也不全假。哪一半是真，他从来不细想。

账是替人记的。茶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不见。十二年前他说好的，他只管单证和账，别的按规矩来。十二年，规矩没破过一回。

有同行劝他，把生意搬到线上去，直播卖茶，说这是风口。阿彦说，我们这行，见不得光。同行说他迷信。他说，不是迷信，是规矩。风口上飞的东西，落下来的时候，都摔在同一块地方。

· · ·

年底，十二月，东莞。

仓在一条河汊子边上，挂的招牌是仓储服务。院子里三排库房，铁皮顶，空气里是纸和陈年木头混在一起的味道，闻久了，喉咙里有点甜。阿彦的车开进去，看门的都不抬眼——他来过十几年，回回走同一个门。

院里两棵香樟，看门的老头在树下生了个小炉子，煨着茶，招呼他喝一口。他摆摆手。老头说，你这个人，十几年了，一口茶不喝我的。阿彦笑笑。不是你的茶不能喝，是他的茶不能喝——这一句，他没说。

走的时候，老头往他车上塞了一小袋橘子，说路上吃。阿彦收了，回去吃了一个，剩下的摆在档口窗台上，从东莞摆回深圳，一直摆到过年。

阿木在后头第三排库房等他。

库房的灯，阿彦只拉亮一半——十二年的老习惯，那个人不让多照。阿木站在两垛货架中间，帽子压得低，露出来的一张脸白得透明，像在暗房里泡过了头的相纸。他比去年又瘦了些，两只手拢在身前，指头很长。

对账对了一个多钟头。阿彦念一笔，他应一笔，声音很轻，尾音都收着。他看单子上的字，看得极慢，一行一行，像在听纸讲话。末了有一笔出仓的对不上，阿彦把单子翻过来倒过去，急出一头汗。阿木伸出一根指头，点了点单子上一行小字。阿彦凑近一看，对上了。

“你这记性。”阿彦说。

阿木没接这话。

对账中途，阿彦烧了水，泡了两杯茶，推一杯过去。阿木端起来，凑近闻了闻，放下了。十二年，阿彦没见他喝过一口茶。水汽从杯口上去，把那半边灯照着的一小片地方熏得发白。

阿木从帽檐底下看了阿彦一眼，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牛皮纸的，不厚，边角压得很挺，封口没有封，只折了两折。

他把信封推过来，说，哪天他不在了，让阿彦把仓里的纸烧了。

阿彦捏着信封掂了掂。他没问是谁的仓，也没问为什么。规矩第三条。

他只问了一句：“几时还用得着我？”

阿木摆了摆手，说了四个字：马上就好了。

阿彦把信封揣进内袋，贴着胸口那一层。上车前，他把杯里那口没动过的茶倒回壶里——不兴糟蹋东西，这也是老习惯。上车他摸了摸，牛皮纸的角硬硬地硌着。安全带他拉了三回才扣上。

临走，阿木跟到库房门口，站住了。

十二月的风从河汊子上过来，带着水腥气。阿木回过头，把满墙的货架望了一遍，一垛一垛，望得很慢。然后问了阿彦一句，茶放久了，会不会想家。

“茶冇得家。”阿彦说。

阿木笑了一下，说是他讲错了。

他转身走进巷口的阴凉里。十二月太阳不大，他还是挑阴面走，帽檐压着，一步一步，走得像怕踩着什么。阿彦看着那个背影拐过去，才上车。

回深圳的高速上没什么车。两边的路灯一杆一杆往后退，照见空荡荡的来时路。他把车载音乐关了，听了一路风声。信封他掏出来看了两回，没拆。他不拆。规矩里没有这一条，但他晓得，有些东西拆开了，就还不回去了。

他猜过信封里是什么，猜了两回，都作罢了。规矩第三条，问了白问。其实他真正想问的不是里头是什么，是另一句：纸烧了，然后呢。这句话他咽回去了，像一块烧不透的炭，搁在心底。

他想给阿木发个信息，打了半行，删了。那个人不用固定号码，电话来他就接，挂了就没了。十二年，他没有存住过一个号。

到家是半夜。信封放哪里，他想了很久：抽屉第一格，保险柜，床底下的箱子。想来想去都不踏实。最后他拉开冰箱，冷冻层里只有两条带鱼，冻得梆硬。

他把信封塞进去，跟鱼放一块。

带鱼是他年前买的，本来说年三十煎了吃。后来是一个人过的年，就忘了。

第二天他去市场又买了两条。摊主说，老板，年才过又买带鱼。他说，家里有人爱吃。

后半夜他起来喝水，顺便去看了一眼。冰箱门一开，冷冻层的灯亮了一下，照见牛皮纸的一角，压在带鱼身上。

他忽然想起库房门口那句话。茶放久了，会不会想家。他当时答得快，此刻在黑黢黢的厨房里，倒想给那句话添个下半句——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窗外有环卫车碾过空街，刷子转动的声音一格一格的，远了。

他把冰箱门关严。冰箱嗡了一声，像很远的地方，有一列夜车开了过去。

◆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天门。

报社的选题单上，“复工复产先锋”排在头一栏，头一个名字是嘉木茶事。部主任说，你是跑茶这条线出身的，你去。采采把二〇一一年那篇旧稿调出来看了看，订了第二天的车。

采采四十岁了，跑了十几年社会新闻。二〇一一年那篇小茶仙，给她挣过一个省级奖，也给她留了一桩心事——有一张片子她拍了，稿子里一个字没提。这桩心事她搁了九年，像搁在柜顶的一只箱子，不常开，但知道它在。

天门活了过来。西湖路早市支起来了，锅盔摊子重新飘出焦香，三蒸居门口排着队，队伍的间隔画着线。她从长途车上下来，拖着箱子沿西湖走，湖面上有游船在跑，船尾拖着白亮亮的水。

出租车司机一路给她讲：这个嘉木茶事，市里推得厉害，直播搞得好，老板娘年轻，人和气。我们天门现在拿得出手的，一个是蒸菜，一个就是这个茶。采采在后座记了两个字：名片。

出站口有人查健康码。她把手机举起来亮了亮，绿的。这一年的绿字，金贵。

到店那天早上下着细雨。西湖水汽往上冒，茶经楼在雨里只剩一个淡淡的影子。早市的摊子收得早，地上留下一摊一摊的深色水渍。她撑着伞走过湖，走得慢。这一趟，一半是差事，一半是私心——柜顶那只箱子，她想开一开了。

嘉木茶事把隔壁两间门面也盘了下来，打通了做直播基地。玻璃擦得发亮，门头的字新描过金。里间辟出半间茶教室，一排小课桌，墙上挂着研学基地的铜牌。茶教室另一面墙是新做的展示栏，照片、奖状、聘书，其中一份红头聘书上印着青年联合会几个字。采采的目光停了一秒，移开了。稿子里没打算写这个。

开门的是个年轻姑娘，利落，围裙上别着两支笔，工牌上两个字：蓝溪。她正在打包台后头称茶，秤杆挑得平平的。采采报了名号，姑娘说，何老师，老板候着您。

唐穗从里间出来。

七年没见。她比电视上瘦，头发挽着，一件浅灰的羊绒开衫，袖口挽到小臂，干净得没有一根线头。她笑着伸手，说何老师，稀客。手势是请往里让的那一种，掌心向上，抬得很轻。

采采递名片，她双手接了，看了一眼，搁在茶巾上，压在杯垫旁边。不收进包，也不塞口袋，就搁在那儿。采采做了二十年记者，头一回看见有人这样搁名片——妥当得近乎郑重。

茶桌在窗边。她烧水，烫杯，投茶，动作跟七年前一样，每一下都像量过。第一道水浇下去，她端着盖碗晃了晃，倒进水盂。她说，头道是叫醒茶的，醒了才算数。

第二道分客，第三道她自己先闻了闻盖碗，给采采续上，说这是简老师教的——真心在第三泡。

采采端着杯子，把“简老师”三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汉口一盏楼那位老先生，她采访过。出了师的人，回头把师父的话原样递出来，不多一个字。

她还注意到一件事：穗说话不用长句。一个意思，三五个字，停一停，再往下。像每个字都在里头拣过一遍。

等茶的空当，采采问蓝溪跟了老板几年。蓝溪说，四年，从工号〇〇一开始。采采笑问，工号还有〇〇一？蓝溪说，老板定的，第一杆秤是店的根。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上不停，一张棉纸包一饼茶，棱角折得像刀裁的。

直播间的玻璃隔断里，蓝溪下午两点准时开播。隔着玻璃，采采看她一个人对着镜头又泡又讲，手势比平时还利落。玻璃上映着货架，映着灯，也映着她自己。她想起从前跑社会新闻的日子——热线电话，深夜蹲点，也是这样隔着一层玻璃看人。玻璃这边的日子是亮的。那边的，不一定。

采访在茶桌边做了两个钟头。直播基地，专柜，研学团，带动就业十几个，数据穗报得清清楚楚，日期精确到天。采采问，今年最难是哪一段。穗

说，二月。答案像早就备在那儿，只等人来取。她又说，二月里账上还有钱，人心就慌不起来。说这话的时候她正给采采续水，手腕稳稳的，一滴没洒。

封城那两个月，这家店给社区捐过三批物资，方便面、米，还有一批茶，货单都留着底。经手的店员姓蓝。

去直播间之前，她绕到市百货看了一眼那面专柜。红木的柜，灯打得讲究，一饼一饼的茶码得像书。营业员说这个牌子卖得好，回头客多，年底研学的订单也排到了明年。采采指了指最贵的一饼，问卖什么价。营业员报了个数。她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够她自己跑半年采访。

采访中间，穗接了一个电话，是店里供货的事。她讲了三句话：先给那边补一批，账挂到下个月，让蓝溪把单子理出来。三句话，事情就落了地。她把手机扣回桌上，对采采笑了一下，说，接着来。

说着说着，一批小学生来上研学课，围着她学行礼，齐声念：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她站在孩子们中间，弯腰替一个孩子正了正杯沿。

有个孩子举手，问茶为什么要倒掉头一道。穗蹲下来，跟孩子平视，说，把头一道倒掉，是对后面几道的客气。孩子似懂非懂地点头。采采在旁边把这个画面拍了下来。她拍过太多摆好的画面，这一张，是活的。

收工前，采采问，为什么想着做研学。穗说，孩子进门的时候东张西望，出门的时候会站直——就为这个。这句话后来没有进稿子。稿子装不下。

临收工，采采合上本子，随口问了一句：唐总，不讲茶了，讲讲你自己。唐穗这个名字，当年是谁取的？

唐穗笑了一下。

“家人取的。”

四个字，不多，不少。采采握着笔，耳朵里嗡了一声。当年那段录音她后来听过很多遍——也是这四个字，连语调都一样，像从同一条轨道上，又开过来一趟车。

采采没有追问。做了二十年记者，她知道哪扇门是虚掩的，哪扇门是上了闩的。这一扇，上了闩。

送她出门的时候，那个姓蓝的姑娘还在打包。唐穗立在门口说，何老师，慢走。玻璃门合上，把店里那点暖光齐齐地切在门里。

回到车上，她发现包里多了一盒茶。没有字，棉纸上什么印都没有。大概是道别的时候，人家塞进去的。

· · ·

稿子见报是半月后。标题让总编改了，改成《茶圣故里的春天回来了》，比她原来那个响亮，也比她原来那个空。部门群里一片好评。她把自己的稿子从头看了一遍，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她关掉文档。柜顶那只箱子，还悬在那里。

回武汉以后，她挑了个周末，去了单位的底片库。

底片库在老楼地下层，铁柜一排一排，钥匙在资料室挂了十几年没人动。保管室的老师傅从一串钥匙里挑出那一把，说，你自己开灯，里头黑。灯管闪了三下才稳住。底片袋的味道混着防潮剂的味道，一进鼻子，九年前的编辑部就回来了：热线电话，烟味，主编拿红笔敲桌面。

她翻了两个下午，按年份找二〇一一。牛皮纸袋上写着那场颁奖活动的名字。她把底片对着灯，一张一张过。

找到了。

灯光里，白衣女孩捧着奖杯，侧着身，笑。舞台侧幕的黑影里站着一个戴帽子的少年，靠着幕布，两只手垂着，没有鼓掌。那年的说明文字一张也没写，稿子毙了，理由是构图散。

当年主编把底片推回来，就添了一句：人物之间没有关系。她争了一句，说他们有关系。主编问，什么关系。她答不上来。九年了，还是答不上来。

她把底片插进扫描仪。机器响了很久，吐出一张图来。图她存了三版：原版，调亮的，调暗的。调亮的那版，少年的帽檐下露出一点眉眼，还是看不清神情。调暗的那版，女孩的白衣浮出来，像纸剪的。最后她用的是原版。有些东西，一动就假了。

文件名她打了删，删了打。日期，人名，活动名称，都不对。最后她敲下一行字：

后来我再没见过这两个人同框。

存好，关机。地下室的灯管嗡嗡地响。她把底片袋原样放回铁柜，锁上，把钥匙送回资料室。

夜里，她重听了当年那段采访录音。录音里自己又快又兴奋，问东问西。单是名字的来历，她当年就换了三种问法，问了三遍。录音里，三遍的答案一模一样，连口气都没有变。那时候的她只当是孩子怕生。现在她按下暂停。录音笔的电流声沙沙地响，像很远的地方有水。她听完了，把录音文件拖进一个新建的文件夹，想了想，命名为：竟陵。

当晚十一点多，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时间：二十三点四十七分。那晚她本来打算写稿，文档开了，标题打了，一个字没敲。手机就是那个时候响的。

陌生号码。她接起来，没出声。

对面也没出声。

一秒，两秒。她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竟陵。

她又贴回耳朵上去。那头有很轻的风声，远远的，像空旷的水面上过来的一阵风。她数着，数到十一，对面挂了。

她的职业病是抢话。做了二十年记者，头一回，她把一句话在嗓子眼里搁满了十一秒。她到现在也说不上来，那一晚自己为什么不出声。

她坐在灯下，把那串号码回拨过去。关机。

她从书柜底下抽出二〇一一年的采访本，翻到那一页。钢笔字写着：白衣，女孩，十七岁。旁边一行小字：侧幕有个不鼓掌的，电工。她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把本子合上。

她把那串陌生号码存进通讯录，名字那一栏想了想，只填了两个字：竟陵。

窗外是武汉的夜，十二层楼下有车流的声音，一浪接一浪。她把屏幕按灭，屋里黑下来。黑下来以后，那张扫描的图还亮在她眼睛里——半明半暗的一格舞台，一道幕布，两个隔着一层光的人。

第九章　出汤

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

二〇二一年二月的最后一天，汉口落着冷雨。冷静期第十一天，蔡诚搬家。

搬家公司是他自己叫的，来了两个中年人，套着鞋套进门，动作麻利。纸箱不用买，储藏室里正好摞着四个空的，大小合手，连胶带都是没拆封的。他当时只当是巧。

房子归他。她只带走两只箱子、一把壶、一袋茶。行李收完，屋里看不出少了一个人，沙发垫上连个坐痕都没有。阳台的绿萝倒浇过了，土是润的。

他在玄关帮他按住翘起来的一角封箱胶带，又在电梯口弯下腰，替他把最沉的那箱书立正，拍了拍箱盖上的灰。动作不重，也不轻，像掸一件与她无关的东西。

他这才留意到，四个纸箱的箱盖都被她重新封过一遍，胶带压得平平整整，转角处叠成对齐的三角。他帮人搬过不少家，头一回见人封箱子封出这种章法。

电梯下来了。他抱着箱子侧身进去，转过身，她还站在门外。楼道的声控灯刚好灭了一半，照着她半边脸。

她说：″往后好走。别回头。″

门合上了。楼层数字一层一层往下跳。蔡诚在那一小格下坠里咂摸这句话，咂摸到一楼也没咂摸明白——谁家送人，不送进电梯？她是怕电梯里那三十秒没话，还是怕自己多说半个字？

雨棚底下等车的时候，他想透了。这句话不像祝福，像驱魔。

车来了，他把四箱书塞进后备厢，绕到驾驶座，坐了一会儿才拧钥匙。雨刮器摆了两下，又停了。搬家的尾款是他扫码付的，付款成功的提示音，在空下来的车厢里响得很脆。

· · ·

三月十一日，雨停了。江岸区民政局，蔡诚和唐穗并排坐在三号窗口前的塑料椅上，中间空着一个位子。叫号器响，两个人进去，签字，按手印，各领一本暗红色的小证。窗口里的人顺嘴说了句恭喜，说到一半，改口说再见。

出来的时候她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抬头看了眼天。天灰得很匀。她说不用送，坐公交两站就到。蔡诚站在台阶上看她过了马路——没打车，往地铁站走，走得不快，一次也没有回头。

台阶下有个卖花的姑娘，抱着一把白菊问他们买不买。蔡诚摆了摆手。姑娘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嘟囔了一句，你们不像来办事的。他没接话。再抬头，唐穗已经走过了路口。

证是下午在单位打印室复印的。复印到最后一页，店员多问了一句：见证书这一页要不要一起印？他这才看见，离婚协议后面附着一页律师见证书，落款日期，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他捏着那页纸站了很久。冷静期里他把协议从头到尾看过三遍，居然没翻到这一页。二〇二〇年七月。那时候他连离婚两个字都没有说出口过，人家的稿子已经拟好了，律师都请好了。

他给那家律师所打过一个电话，想问当初是谁委托的。接电话的姑娘查了登记，说委托人不愿透露，按规矩不能讲。他说好，谢谢。挂了电话他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连打听都打听不着——这张网收口的地方，一个线头都不留。

比例他也到这时候才回过味来。房子归他，车归他，存款她拿四成。他还劝过一回，让她拿对半，她摇头，当着律师的面把数字又核了一遍。他当时只

当这叫厚道。夜里睡不着，他把那个比例掰开来量：首付是婚前他家里出的，车贷是婚后两个人还的，存款大头是她店里的流水。多一分，他会起疑；少一分，他会不甘心。这个数不是分出来的，是量出来的，量的正是他不好意思开口去争的那个尺寸。

这桩婚姻从头讲起，其实没有几句话。两家原是隔着两条街的老街坊，他小时候去云香居找他娘，常见一个小姑娘蹲在门槛上写作业，写得极慢，一笔是一笔。有一回他的气球飞上云香居的房梁，是她搬了条凳，拿晾衣杆挑下来的，气球上还留着她两个指印。这些事他早忘了，冷静期里倒一件一件全想了起来。人真是怪，过日子的时候什么都记不住，散伙的时候，记性忽然好得吓人。后来在武汉的一场同乡聚会上又碰上，她刚开店，他刚进设计院。谈了两年，二〇一八年五月在汉口办的酒。敬茶的时候，唐老太太坐在主桌，把杯接了，说这孩子命硬，往后你让着她。他当时只当是长辈的客气。

婚礼上还有一幕，他后来才想起。敬完茶换敬酒，唐老太太先离了席，说楼下有人等。他在楼梯口碰见老太太出门，老太太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凶，就是深，像一口井。转过年初春，老太太在汉口病逝，他陪穗回去奔丧。灵前她站了一夜，没掉一滴泪。他当时只当她悲极。现在想来，有些泪，落下来的地方不在眼睛。

还有钟留留。二〇二〇年十一月，穗打电话，说汉口店电表要增容，物业要业主对接，你是学电气的，帮我去看一眼。他去了。物业派来对接的是个姑娘，天门老乡，姓钟，叫钟留留，说话干脆，笑起来眼睛弯，微信还是穗当着他俩的面张罗着加的。那天中午穗组了个饭局，留留坐他斜对面，穗坐他正对面。

电表增容的事，后来没有下文。上个月他路过那栋楼，顺嘴问了物业一句，物业翻了登记簿，说没接过增容申请。

面馆里坐到天黑，他把自己这三十年从头捋了一遍，捋出一个让他后颈发凉的结论：这一段人生里，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留留是递到手边的，稿子是

提前拟好的，连搬家那四个纸箱，都像提前替他备下的。他不是被推开的，他是被安排着走出去的——安排得这样妥帖，他连摔一跤的机会都没有。

手机震了一下，留留发来消息，问他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新开了家湖北菜馆。他盯着吃饭两个字看了很久，回了个好。回完把手机扣在桌上。连他往下走的那一截路，都替他接好了轨道。

冷静期那三十天，他照常上班。家里那套茶具原样摆在餐边柜上，他一口没动过。婚后三年他学会了喝茶，是穗手把手教的，水温，注水，出汤的时辰。领证这个下午，他在打印室泡了杯速溶，苦得直皱眉。

冷静期第十九天，穗来过一回电话，说蔡母托她在店里备的降压药到了，让他顺路取。他去了店里。她正教一个客人看茶，头也没回，只抬手朝柜台指了指。药在他从前放钥匙的抽屉里，摆得整整齐齐，底下压着一张便签：一日三次，饭后。他娘的药，她记得比他还清。他拿着药出门，回头望了一眼，她还在教客人看茶，灯光落在她半边侧脸上，像一张没给人留座位的相片。

回去的公交上，他把药盒捏在手里，塑封还没拆。他想起协议里的一条小字：各自名下医疗、保险自理。连他娘的药，她都可以不管——可她管了。这份周到没有一处能用得上，又没有一处是多余的。他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很凉。

· · ·

第二天他请了年假，回天门。

蔡母在厨房剁排骨，听见换鞋的响动，没回头，只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

刀没停。蔡诚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进去帮着烧火。一顿饭，母子俩没说第二句相关的话。

饭桌上蔡母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蒸菜，又夹一筷子，压得实实的。天门人不会说话的时候，就用碗说话。他埋头吃得很快，眼眶有点热——不为委屈，

为的是这世上还有人不管不顾地给他夹菜。

为什么，他问过一回。定亲那年，他问过。蔡母当时在拧抹布，拧得水一线一线往下淌，说：云香居的水深。再问，她起身晾抹布去了。

蔡母年轻时在云香居打牌，牌桌上三教九流，什么人没有。这门亲她当年拦到哪一步，一个字没提过。她只是把那句我早就说过，说成了二十年的家常。

那几天蔡母变着花样做饭，排骨藕汤，蒸肉蒸鱼，天门九蒸的规矩一样不落。他吃得出来，这是娘的路数——话不落地，饭要落地。夜里蔡母到他房里坐了坐，没开灯，就坐在床沿上。她说，钱要是缺了，妈这儿有。他说不缺。她说，不缺就好，男人不缺钱，腰杆就断不了。她坐了一会儿就走，棉拖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很轻。

夜里他睡在自己高中的旧床上，床短了一截，腿得蜷着。蔡母临睡前抱来一床新晒的棉被，说家里就你的床还是老尺寸。前年封城那两个月，他在汉口，她在天门，隔一条长江。解封以后，她回天门的日子越来越多，他没问过为什么。这桩婚姻的最后一截，是两个人隔着一条江各自过日子，日子都过得挺好。

睡不着，他起来翻东西，翻出两大本影楼做的婚礼相册，红缎面，烫金的字。

他就着台灯，一本一本翻。

翻到第二本，他停住了。他发现一个规律：每一张合影里，她都站在最亮的地方。

婚礼上，主灯正打在她脸上；店里开业剪彩，闪光灯追着她走；天门的家宴，她坐的位置永远在灯底下；连去黄鹤楼拍照，她站的台阶都正好是逆光最匀的一格。三年，几百张照片，没有一张例外。像有人提前替她量好了光位。

他又给自己找了件事：找一张她在看他的照片。

翻到后半夜，没有。她的眼睛要么落在镜头上，要么落在镜头后头更远的地方。最亮的地方，最空的地方。

相册底下还压着一张散照，是店里新装监控那天的试拍，穗打印出来给家人看的。照片里她站在柜台后面，灯光从头顶罩下来，把影子钉在身后那面墙上，影子比人瘦。他把这张照片收进了书桌最底层，压在结婚证下面。收的时候他没多想，后来才明白为什么收着：那张照片里，她一个人，脚下没有别人。

天快亮的时候，手机在枕边亮了一下。是嘉木茶事的员工群——他一直没退，也没人踢他。

唐穗发了一条，八个字：今晚封仓，明日开门。

群里立刻热闹起来，鲜花，爆竹，掌声，老板娘辛苦，一串一串往上冒。隔了十来分钟，蓝溪出来两个字：收到。前头隔着一长串热闹，就这两个字，干干净净，像一杆秤坠住了什么。

蔡诚盯着封仓两个字看了很久。

老板娘离婚的日子，别人用词，是结束，是开始，是放下。她用的是封仓。茶行老家的老话：仓一封，里头的东西就不再见人，也不许再问。

他把离婚证从枕边拿起来。暗红色，比结婚证薄。

窗外的天一点一点白了。楼下早市支起摊子，卖锅盔的炉子头一个生火，白汽贴着地皮走。他想，明日开门。开门做什么呢，谁都照旧过日子。只是从今往后，两本账各记各的，中间那条线，是用他看不见的尺子画出来的。

◆

二〇二一年九月，天门，茶圣故里小镇项目招商会开到第三天，最后一站安排在茶经楼看现场。

签到墙立在景区南广场，红毯从游客中心一直铺到楼前，各县市来的考察团举着小旗合影。罗成峰下了动车直奔景区。四十九岁，市文投集团副总，汉口的写字楼里坐了十一年，项目跑了小半辈子。天门这地方他来过四回，回回都是考察。九月的太阳还毒，茶经楼九层，金顶在光里像一块烧化的糖，楼底下的广场上拉满了红色条幅。

他的职业习惯改不掉：见人，先找对方要什么。招商会上来来去去两种人，要钱的把嗓门吊得很高，要名的把姿态放得很低。他站在人群最后一排，抱着手臂听完两场，慢慢喝完了半瓶水。

前两场他都听得走神。一场讲元宇宙文旅，幻灯片做了六十页；一场开口就要三千万启动资金，讲到一半自己先笑了场。台下有人打哈欠。九点半，秘书发来提醒：十点，重点企业陈述，嘉木茶事。他原本打算听十分钟就走。

会场后排坐着各路文旅公司的调研员，人手一册参会名录，翻得哗哗响。这种场合他见得多：台上讲得热闹，台下各自盘算，散了会谁也不认识谁。他把名录卷起来，握在手里。

第三场，本地企业，嘉木茶事，唐穗。

讲台边摆着一张素色茶席，一个年轻姑娘守着，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只温杯、候汤、分茶。唐穗站在茶经楼底下，讲台是临时支的，话筒偶尔啸叫，她不等啸叫过去，把声音放低半度，啸叫反而止住了。月白上衣，头发拢在脑后，没有稿。罗成峰在人群里找了半分钟，才把眼前这个人跟名录上的照片对上——照片上看是个精明的年轻老板，真人站在那里，像从画里走出来的人。

名录上她的履历只有三行，比她店里任何一款茶的评语都短。他后来才知道，这三行还是她亲手删过两遍的。

她讲二十分钟，数字不超过十个，每一个都有出处。客流，出处是景区两年的闸机数据；客单，出处是西湖路三家店的流水；做研学，连孩子平均停留四十七分钟都有出处，出处是店里两年的登记簿。讲到合作构想，她说，茶圣故里缺的不是茶馆，是一个让外地人肯停下来的理由。理由怎么造？她只讲了

一条：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种茶事，做给谁看，几点开门，几点封炉，排得像一张课表。

有人当场发难：文旅项目十个九个亏，你这一块凭什么三年不亏？

她没有正面接，只把成本表的最后一页翻给大家看：头三年的账，她自己贴。广场上安静了几秒，几个交头接耳的考察团成员直起了腰。

又有人问，铺面几时落地。她说不急，先做一年内容，让小镇先有声音；铺面是长在地上的，声音是长在人身上的。听众里有人笑，笑着笑着，都把这行话记在了本子上。

罗成峰听路演像看体检报告，哪里薄弱，一眼就到。他在她身上找薄弱，找了二十分钟，没有找到。不是没有破绽，是她的破绽不摆给他看。轮到分茶，姑娘提壶过来，给他面前那盏续上，汤色很浅。他后来在汇报材料里写了一行：该企业具备成熟的茶事执行能力。写完自己看了一遍，只当这行字虚。可是再虚，也想不出第二行。

散场时出了个小插曲。邻市一位做老茶生意的客商拦住她，说天门的茶好是好，就是水太深，前些年有人拿做旧的茶充老茶，砸的是整条街的招牌。周围的人都替她捏一把汗。她听完只点了点头，答了句做旧的茶骗得过嘴，骗不过日子，又报了对方两款茶在她店里的回购率，四成。一个数，替人把话全说了。客商愣在原地，半天没接上。罗成峰在后头听着，把这句话记进了手机备忘录。他的备忘录，平时只记数字。

晚上他跟同事打电话，说那不叫路演，那叫砌墙，墙缝里插不进一根手指。

下午小范围洽谈，谈框架。嘉木茶事成为小镇文旅线的战略合作方，先做茶文化内容，铺面往后放。谈到体验项目的分成，他的助理报了个行业惯例的数。她摇头，报了个更低的。

助理愣住了。她把理由一条一条讲完：小镇前三年要养客，茶事不挣钱，挣的是来的理由；三年后租金随客流重议，写进补充条款，白纸黑字。每一条

都对，对得挑不出缝，也对得让让步显得像集团赚了便宜。罗成峰签了字。签完他明白过来：让步是她让的，人情是她给的，他从头到尾，只是在自己的方案上签了个名字。

签字笔递过来，他签完递给她。她接笔用双手，落笔之前，把协议翻到补充条款那一页，逐行看过去，看得很慢。满场都是快节奏，只有她一个人，把慢留给了白纸黑字。他后来交代法务：跟嘉木的合同，一个字都不要动。改一个字，她就知道我们改过心。

法务小周听完没吭声，出去跟同事讲，罗总看人，真准。

· · ·

框架公示以后，集团党委会上有人提意见，说把文旅线绑在一家民企身上，风险太大。罗成峰把那张节气课表拍在桌上，说我看了十年项目，头一回见有人把头三年的亏损自己背走。会就散了。

也有别的声音。饭局上有人递话，说唐穗年纪轻轻，背后没有人。罗成峰把杯子放下，说，背后没人的，才把所有的事自己扛；背后有人的，扛谁的事。那晚的酒局散得比往常早。

中间那几个月，他两头跑。汉口的集团，天门的工地，动车单程四十多分钟，比他头一年来考察坐的大巴快了三个钟头。工作餐上他说过一回，这哪里像商人，像一位校长。一桌人都笑，他没有笑。校长两个字不是随口来的：她店里跟来两个年轻人，上菜、添茶、退席，都看她的眼色。那眼色极轻，像教室里老师把粉笔停了两秒。

洽谈间隙他观察过她的手机，锁屏是全黑的，一个图标都不摆。助理开玩笑，说唐总的手机比集团内网还干净。她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像合上一本账。

十月里他头一回带美佳来天门。前妻走了五年，美佳怕生，躲在爸爸身后不叫人。唐穗蹲下来，蹲的高度掐得很准，刚好跟孩子平视。她教美佳温杯：

水太烫，先烫杯子，再倒掉，杯子就干净了。美佳手没端稳，烫了一下，没哭。她没有安慰，只重新倒了一杯温水递过去，让慢一点。

那天下午，美佳学会了捧杯不翘小指。临走，店里送了她一枚指甲盖大的茶饼挂件。回汉口的车上，孩子问了他三个问题，个个都是唐阿姨。打那以后，他每回来天门，美佳都要问一句：去不去唐阿姨那里。那枚小茶饼，她用橡皮筋绑在书包带上，一直没摘。

头一回回汉口的车上，孩子问了他三个问题，个个都是唐阿姨：唐阿姨的店几点关门；茶饼挂件能不能一直挂着；明年还来不来。他答了两个，第三个没答上来。他从后视镜里看，孩子在后座把那枚小茶饼攥在手心，睡着了也没松开。

他自己的心思，他管得很紧。四十九岁的人不信心动，信合衬。合衬是两只碗摞在一起的声音，闷，实，不响。有两回签约的饭局散了，她的车从他的后视镜里折出去，他把后视镜掰正——动作做完了，他在车里多坐了一会儿，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坐。亡妻那本账他从不翻，只记得恩施项目那年，电话是在高速上接的。欠账还不上了，只能还给别人看。

集团里都说罗总冷。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冷，是怕——怕对活人再上一次心，再欠一回账。所以他把日子过成了报表，每一栏都填得满满的，唯独空着的那一栏，他假装看不见。

他对唐穗的了解，止于她的得体。得体是墙皮。他敲过一次，敲在家这个字上——饭局上有人问她，家里知不知道她一个人跑两地。她说家里没有别人了。说这话的时候，她正给人续茶，水线又细又稳，一滴没洒。

· · ·

签约宴摆在十一月，景区里的酒店，两桌，集团来了一半班子。

酒过一巡，罗成峰举杯，问了那个满桌人都想问的问题：嘉木两个字，什么讲究？

她放下杯子，答了四个字：″家人取的。″

满桌都说好名字，好出处。罗成峰也说好。他说，《茶经》开篇头一句讲的就是树，树是嘉木，人借树名，压得住。她微微颔首，替他把杯续上了。

席间有位外地客商喝高了，非要与唐总换大盏，话越说越满。她起身，把自己那盏茶推过去，说是入乡随俗，以茶代酒，先干为敬。一圈敬下来，那人自己先坐下了。罗成峰看见她的杯子从头到尾温着，茶一直满着，礼数一步不缺。

只有一处他没有漏掉：席间蓝溪在旁边斟茶，听见这四个字，手停了半拍。罗成峰只当是茶烫。

这顿酒他多喝了半分。回房的路上他想，家人取的，多体面的答案，把问题原样退回来，包装得比原来还齐整。至于哪一位家人——他没有问。体面人，不对别人的墙根刨土。

签约后第三天，集团宣传口的年轻人把通稿送来签发，后面附着一页检索结果。年轻人眼睛发亮：老板，现成的故事。唐穗这个名字，报纸上最早出现是二〇一一年五月，一篇旧报道，标题叫《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记者何采采。十年前的小茶仙，十年后的战略合作方，天赐的稿子。

罗成峰把那页纸看了半分钟。配图印得模糊，颁奖台上的小姑娘捧着一柄茶壶，领口别着一朵红花，台下乌压压的人头糊成一片。他让年轻人把原报找来复印存档，通稿标题圈了第三个：《从茶圣故里走出的年轻人》。批完，又在检索页右上角落了两个字：可用。

按上笔帽的时候，他站在窗前看了会儿汉口的天。天赐的稿子，他想。这天送下来的，不知道是礼，还是账。

那页复印的旧报道，他夹进了项目卷宗的扉页。卷宗后来在集团流转，翻的人不少。有天他出差回来，发现扉页被人折了一道浅浅的角，展开，正是那张糊成一团的颁奖台照片。他不知道是谁折的，把它抚平，夹了回去。

◆

二〇二二年十月，汉口，一盏楼。

老巷子里的三层旧宅，楼下做店面，楼上存茶。楼梯的木扶手磨得发亮，一盏楼三个字的匾挂在门楣上，字是几十年前一位老先生写的，笔锋瘦，像冬天枝头的雀。简明堂这辈子立过三条规矩：鉴茶不鉴人，收徒不收礼，卖茶不卖老。第三条最难——满汉口的茶庄都卖老，就他不卖。也正因为这条，汉口的老人家买老茶，宁可坐一个钟头公交来他这儿。

平日里一盏楼一天做不了几单生意。老主顾进门不问价，把茶往柜台上一放，说简老板您看。他看完了，值多少说多少，一分不多。有人劝他学学年轻人做流量，徒弟都动了心，他说，我这把年纪学人吆喝，学得来腔，学不来心。

十月九号晚上，徒弟在柜台后头支起手机，补光灯是借来的，支架晃，拿两饼茶压着脚。直播间的题目挂了七个字：做旧十鉴·第七讲。师母搬个小凳坐在楼梯口，不进画面，手里纳着鞋底。

简明堂七十四岁，坐下来先把袖口挽齐。开播前徒弟问他要不要看看弹幕，他说不看。讲茶的人看茶，不看人。

开播前三分钟，他喝了两口温水，清了清嗓子。徒弟倒数的时候，他闭了一会儿眼——半个多世纪前头一回站柜台，他也是这样闭一闭眼。睁开眼，灯亮着，人来了。师母的小凳往楼梯阴影里又挪了半尺，像挪走最后一点多余的热闹。

第一鉴到第六鉴，前头几场讲过了：看饼型，看条索，看汤色，看叶底，看香气，看仓味。今天讲纸。老茶认一张纸——大票，内飞，那是茶的身份证明，跟人一样。假老茶，先做纸。他从樟木柜里取出两张棉纸，铺在案上，一张一张指给镜头看。真的老纸，脆而不糟，黄是从纤维里头泛出来的，像人脸

上一辈子攒下的风霜；做旧的纸，茶水煮过，烟熏过，砂纸打过，黄浮在面上，像刷了一层浆。

弹幕刷得飞快，有人说听不懂。他说，那我讲人话：真老是从里往外老，假老是从外往外老。人也一样。

有弹幕问，纸做旧能不能骗过仪器。他说，仪器认得出年份，认不出心思。做纸的人摸得清仪器的脾气，专拣仪器看不见的地方下手。所以要靠人，靠一双看了一辈子纸的眼睛。这双眼睛要是不在了，话就更得趁早留下。

讲到最后一段，他停了停，从柜里请出一饼茶，双手托着，凑近镜头。他说，最近市面上有一款老桩茶，自称五十年代的东西，包装上印着千羡万羡西江水。我不说是哪一家，我只讲一句：它的纸，比它自己的岁数年轻；它的饼，比它的纸还要年轻。

直播间人数破了三万。弹幕开始刷同一个牌子，刷得铺天盖地。徒弟脸色变了，伸手要去关评论，被他按住。他说，我讲的是茶，不是人。谁自己对上了号，那是茶在讲他。

下播的时候，徒弟数评论数到手软。他摆摆手，让把灯收了。楼下巷子里有卖馄饨的挑子走过，竹梆子敲了两声。

下播前有个弹幕刷得凶，说他收了同行的钱，专门碰瓷。徒弟念给他听，念完他端起保温杯呷了一口，说，替我谢谢他。肯花钱骂我，说明有人怕。徒弟问，这话不怕传出去？他说，要的就是传出去——怕的人听见了，才知道我怕不怕。

· · ·

下播第七天，律师函到了。

函是省城一家所里发的，用词很客气：涉嫌商业诋毁，请删除视频，公开致歉，协商赔偿。徒弟念完，问回不回。简明堂把函纸压进茶样柜的玻璃底

下，跟几张几十年前的老茶票排成一排。他说，函上留了地址，就是给人回的。我不回，让它等着。

函他又读了一遍，读得极慢。落款的律师他认得，二十年前还是个实习生模样，来一盏楼买过一回茶。他把这一条也记下了——不是记仇，是记人。记人，是这一行的老规矩。

当晚他把直播回放看了一遍，看自己在镜头里的那双手。手比十年前抖，落盏还是稳的。他跟徒弟说，设备可以借，手艺借不来；等我这双手停了，一盏楼的牌子摘不摘，随你们。徒弟说不敢。他说，不是敢不敢，是到时候，你要看得清自己。

第十天，一盏楼门口来了二三十个人，横幅拉在巷口，写着还老茶一片真心。有拍视频的，有喊话的，话喊得很齐，齐得像排练过。徒弟要报警，他摆摆手，说让他们站，今天太阳好。

站到晌午，人走了多半。下午剩三四个，进店转了一圈，买走两饼真茶。打烊以后他在楼上泡茶，跟徒弟说，堵门的里头有三个生面孔，进门先看柜子后看我，那不是买主，是踩点的。真买主进门，先闻茶。

徒弟问，踩点的人踩什么？他说，踩我的柜子，看值多少钱；也踩我的巷子，看我几时出门。一个七十四岁的老头，人家肯当回事，这是抬举。

徒弟问，师父不怕？

他说：″我七十四了，输得起真话，输不起假话。″

第二天他照旧开门营业，茶样照摆，价钱照旧。有一个堵门回来过的生面孔进店转了一圈，什么都没买。临出门他叫住人家，塞了一小包今年的新茶，说，白站了一上午，润润嗓子。那人接了，耳朵红到脖子根。

徒弟又劝了一句，说唐总是您一手带出来的，这一竿子下去，师徒情分就没了。他端着杯子，隔了很久才开口。他说，我的手艺，教的是把茶看真，没教把茶看假。她要是干净，这一竿子打不疼她；她要是不干净，这一竿子替她疼。

二〇一七年到二〇一八年，穗在他楼上做了一年学徒。他记得她擦楼的背影，记得她洗手的动作，记得她从不试自己不买账的茶。学徒一年，她没带过一个朋友上楼，没提过一个家里的人。婚宴办在汉口，师父坐主桌，她敬酒敬到这一桌，杯沿压得比谁都低。他那时候只当这孩子知礼。如今他想，那不是知礼——那是没有可带来的人。

· · ·

十月底，匿名快递到的那天，落着小雨。

箱子是快递员送上楼的，单子上没有寄件人姓名，只有发件网点的代码。拆开，防震棉，一饼茶，一张对折的牛皮纸。

茶是千羡枉，批次印得规规矩矩。他撬了个角，凑到鼻子底下——烘火的香底下压着一丝闷味，纸里泛着一点化学的亮。他这把年纪的鼻子，很少失手。

牛皮纸里是张黄纸，剪的。一个老人，跪着，面前一堆纸。刀口全部朝一个方向，齐得像拿尺子比着下来的。他用镊子把剪纸夹到灯底下看：纸是老棉纸，黄得匀净，跟他存着的一张民国茶样包纸一个成色。他明白了，剪的人用的料，跟做旧仓里的纸是一路的——那种老纸，用一张，少一张。

剪纸对折过两次，折痕压得很实，像一封没有字的信。他把纸举到灯下看，折痕里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有。不写字，是他这些年遇过的对手里最叫他发怵的做法——字会招供，纸不会。

拿一张老纸，剪一个磕头的老人，寄给一个鉴定老纸的人。他把这层意思咂摸了半晌。是挑衅——你在明，我在暗；也是警告——你再翻，翻到底下的东西，先埋进去的是你。

他让徒弟取出放大镜，又从保险柜里请出两张存了多年的大票，并排铺开。木刻版印的羡字，第三笔上各有一个豁口，豁口的位置、深浅，一模一样，像刀走到半路被人叫走了。徒弟问，师父，这是什么？

他说，是一个签名。版子会重复，人不会不长年纪。这句话，他谁也没告诉，压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的地方，要留给一个对的时候。

他原先打算把这句话带进棺材。风声紧起来以后，他改了主意——话带进棺材是陪葬，话留在纸上才是传家。遗嘱里那句样品归公，归的就是这句话的下半截。

楼上的樟木柜里，他专辟了一格，放这件事的东西：两封律师函，编号一，编号二；堵门那天的照片，编号三；半夜里没有声音的电话，录音转的盘，编号四；门缝里塞进来的、他走在巷口买早点的侧面照，编号五；一盒不知谁寄的上好真茶——寄好茶是告诉他，好茶我有的是，犯不着造假——编号六。今天这张剪纸，编号七。

徒弟在旁边看着，问，到第七件了？

他说：″威胁，编号第七。″

当晚，他让徒弟把师母从房里请下来。楼下的灯只开一盏。

他说：″我要立个遗嘱。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这批样品就成无头案了。″

碳十四的机构他问好了，费用他留出来了，纤维比对的门路也托了人。就一样——他死了没人催，事情就烂在柜子里。遗嘱里要写明白：样品归公，不归人；鉴定做不做、几时做，白纸黑字。

徒弟说，师父，您写的这不是遗嘱，是遗命。

他说，那就是遗命。

师母问，要是他们都不肯照办呢。他说，不用他们肯，肯是活人的事，我死我的。师母说，呸。他说，呸得好。

师母进厨房烧了碗面，三个人谁也没动筷子。面坨在碗里，热气一点点塌下去。师母忽然开口，说七四年你收第一个徒弟，也是这盏灯。他说，嗯，那

时候灯泡比这个亮。她说，不是灯泡亮，是你眼睛亮。他说，现在眼睛不行了，心还亮着。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看皮影戏，灯在幕后，人在幕前，哭的笑的都是假人，提线的手从来不露面。他做了一辈子茶，到老才发现，茶行也是一台皮影戏。三个人把那碗坨了的面分着吃完了。师母收碗的时候说，遗嘱立了，往后你就不能死了。他说，行，听你的。这句玩笑说得很轻，落地却很沉，谁也没再接。送师母上楼以后，他在楼下又坐了一会儿。巷子静透了。他想着下个月讲第八鉴，讲火。真相这东西跟出汤一个理——水不到二沸，怎么按都按得住；二沸一到，满锅的响，谁也捂不住。

他把编号七的袋子压平，锁进樟木柜，钥匙拴回腰上。

◆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天门，老棉纺厂改的文创园。

园子二期停工半年了，塔吊还吊在半空，风一大就吱呀响。龚一凡的工作室在园子最里头，是他拿视频收益租的，水泥地，铁架床，一张旧办公桌，墙上钉着一块半价从装修队手里买来的工程白板。白板右上角贴一张打印纸，纸上一行字符：2005_1118。

对外的名目叫城市记忆。竟陵旧事更新到第五十六期，拍老街，拍手艺人，拍桥，粉丝两万多，不算多，胜在都真。镜头背后另有一条线，只有他自己知道：把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那件事，从老人们嘴里一个字一个字抠出来。

设备是二手的，稳定器掉漆，话筒用了三年，海绵套发黄。他妈来看过他一回，站在工作室门口不肯进，说园子里吊着那么大个铁家伙，你不怕？他说怕。怕就不拍了？他妈走后，他把白板往墙角挪了半尺——挪到塔吊砸下来也够不着的地方。

案发那年他二十岁，在武汉读大专。寒假回天门，长途汽车站出口的墙上刷着悬赏通告，他娘拽着他的袖子快走，说看什么看，看一眼要做一夜噩梦。他到底看了一眼。通告右下角印着一张剪纸的示意图，双童捧着一只茶壶。那年冬天，全城的茶铺子都提前打了烊。

后来他毕业，进厂，辞职，拍视频，绕了一大圈回到天门。二〇一九年文化宫拆平，他站在废墟上拍了回乡的第一支片子，一夜之间几十万播放。评论区都在问：文化宫的剪纸班呢？他盯着那行问题看了半宿，改了账号简介——竟陵旧事，记录正在消失的东西。消失的名单，第一条是他自己添上的：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一个访的是曹德贵。年近八十的人，坐在城西院子里晒太阳，腿上盖着毯子，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唱着戏。老人见客不惊，先把一个橘子掰成两半，分他一半。老人的记忆是散的，讲二〇〇五年，三段话互不挨着：一段讲那年棉价好，一段讲局里分房子，讲着讲着，忽然插进来一句：现场有张剪纸。老班子讲，剪纸压在命案上头，不吉利。

龚一凡问，什么剪纸？

老人摆手，说记不得了。黄纸，就记得是黄纸。

他没敢问第二遍。这种年纪的证人，问第二遍，人就起身进屋了。临走老人叫住他，说：小龚，旧案翻不动。翻动一根梁，塌一屋子人。

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老人的一句话。他问过老人，当年为什么定流窜作案。老人把橘子皮捏在手心里，捏了很久，说，那年头要的是稳，稳字当头，一滩浑水摁成一潭死水，就没人往里扔石头了。说这话的时候，老人眼睛望着收音机，像在望一位老同事。

临出门，老人忽然又说了句不相干的：那年茶行里丢过一样东西，伙计们翻了三天。他问丢了什么。老人说，一把剪子。顿了顿，又摆摆手，说记岔了，许是算盘。他再问，老人已经讲回棉价了。回去剪片子的时候，他把剪子

两个字消掉了——没有旁证的话，进不了片子。可他自己记下了，记在了一个单独的文档里。

第二个访的是毛慧芳老师。退休多年，客厅的玻璃板底下压着历届学生的照片，来一个客人她能讲一下午。搪瓷缸给她自己续水，给客人另泡一杯茶，茶叶放得极省。聊到某几届学生，她想了很久，说了句让他回来做字幕时手停了一下的话：这两个孩子，像两扇关紧的门。

他问是哪两个孩子。她不答，转头去讲文化宫的冬天，讲剪纸班的窗户上结不结冰花，讲孩子们剪的双童奉茶贴了一窗台。临走她在阳台指给他看：文化宫拆的时候，她捡回一截雕花窗棂，如今垫在花盆底下，漏水快，花反而养得好。她说，东西没了用处，就只剩下结结实实。他听出话外有话，没敢接。

玻璃板底下那些照片，她一张一张能叫出名字。叫到某一个角落的时候，她的手指会跳过去，像跳过一格跳棋。他看见了，没有问。干他们这行的都懂：跳过去的那一格，往往才是要紧的。

片子里他没把这句话剪进去，剪进了片尾。弹幕有人问哪两个孩子，他没回。

第三个访的是郑胖婶。云香居的麻将馆还开着，牌桌上码牌声噼里啪啦，她坐在柜台边上，手不停，话不停。出事那晚她收摊，端着炉灰出门去倒，看见河堤上过去两个孩子的影子，一高一矮，走得不快。她当是谁家孩子贪夜玩。第二天满城都在讲茶行的事，她把炉灰的事讲给男人听，男人说，麻将馆还想不想开了。这一闭嘴，闭了快二十年。

码好的牌哗啦一推。她说，小龚，我这张嘴欠了二十年，你录走，就当我还了。

她又补了一句，说凭什么记得一高一矮——那天河堤上没有灯，高个儿手里那只手电的光，从她眼前扫过去，往下游去了。她说，人老了，别的不中用，眼睛里存的东西，越存越清楚。录完他请她吃了碗牛肉粉，她多要了一勺

辣，说年轻时候跟沈家老板娘抢过生意，抢来抢去成了牌搭子。人这一辈子，牌搭子也好，仇搭子也好，走了一个，另一个就欠着话。

· · ·

回到工作室，他把三段采访的截图打印出来，钉上白板。茶仓命案，现场剪纸，文化宫剪纸班，小茶仙，嘉木茶事，十一月十八日封仓，嘉木等于《茶经》开篇——纸头一张一张往上钉。又在白板上沿拉了一条横线，二〇〇五到二〇二二，像一条时间的脊梁，往线上钉钉子：二〇〇六，有人溺亡；二〇〇八，有人改嫁；二〇一一，小茶仙；二〇一四，楼成；二〇一六，店开；二〇二〇，直播。钉完退后一步看，所有的针脚都踩着点。

他把这几年的顾客随手拍剪成一条四十秒的短片，连配乐都没加。发出去，有人留言：老板娘家里有事，年年同一天？有人回：谁家还没个忌日。他盯着忌日两个字看了很久，截了图，钉上白板，正钉在横线二〇〇五那个点的下方。

中间有一枚图钉是空着的——二〇一九年他采访过齐守拙老人，老人一句话他抄下来贴在横线底下：一个把纸剪进了楼里，一个把纸剪进了夜里。当年他只当是手艺人的感慨。如今这句话贴在这儿，像一条判词。

钉到中间，他在企业信息平台上调出了一份注销登记。

松风茶行，二〇〇六年注销。清算报告上股东两名：沈松庭；沈嘉木，出资时未成年。附件里有一份声明，二〇〇六年签署：放弃继承。监护人签字，柳文霞。

龚一凡盯着放弃继承四个字看了一晚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把自己名下的一切签字放弃，握着他手的是他的母亲。他想起毛慧芳那两扇门。门后头，有人替孩子把字写好了。

他又去查注销登记的受理日期，二〇〇六年四月。他把日子记进文档，后头打了个问号。十二岁的孩子放弃继承，要过三道手续：声明，公证，清算。

每一道手续都要孩子到场，或者，都要一份孩子的委托。他越想越冷，合上电脑，下楼买了一瓶汽水，站在文创园门口喝完了。塔吊的影子罩下来，把汽水瓶的影子拉得老长。

他去了一趟竟陵老街，打听沈家。老街坊说，沈老板娘早改嫁了，跟个做瓦匠的王春发，后来得了病，二〇一四年冬天没的。线索到坟头为止。回来的公交车上，他给柳文霞这个名字建了个文档，文档里只有一行：二〇〇九改嫁，二〇一四故。

敲完这行字，他给文档起名字。想了想，叫：到站。线索一条一条进站，站台上始终没有他要等的那个人。

十月底他看了简明堂那场直播，回放看了三遍，截了那饼五十年代老桩的图，钉上白板。钉在哪个位置，他想了一夜，最后钉在嘉木茶事旁边，隔半指宽。

十一月十八号，他照例去了西湖路。卷帘门落着锁，门缝里干净得过分。他拍了一段视频，配文只有日期。评论区有人骂他蹭流量，有人问这家店为什么每年这一天歇业，店方从来不答。他翻了前几年顾客的随手拍：每年这一天，这条街少一家开着的店。

发短片的第三天，有个账号私信他，只有四个字：劝你善良。他截了图，归进一个新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起得很平：留意。他这行干久了，知道骂人的是看客，劝人的多半不是。四个字不咸不淡的，才是自己人。

· · ·

月底最后一个晚上，工作室就他一个人。暖风机嗡嗡地吹，桌上一碗泡面坨了，他没动。

白板上几十张纸头，围着一小块空白。他把三张黄便签重新摆了摆：左边一张，唐穗的收养链；右边一张，沈嘉木的蒸发；上头一张，十一月十八日。三张摆成一个三角，中间空一格。

摆完他又看。三个角各拉一条线，线在中间交叉，交叉点空着。中学几何老师讲过，三角形最稳。可他这个三角形，三条边全是虚线，只有中间那个空格是实打实的。空格里头年待过一支马克笔，笔帽丢了，笔干在里头，像一个人守一个位置，守到干。

他拿起笔，在空格里写了四个字：缺一个人。

写完退后两步，看白板。看了很久，他忽然又拔开笔帽，把那四个字划掉，在底下补了一行——不，缺的那个不是人，是时间。他在替谁保管时间？

写完他把笔一扔，对着空荡荡的工作室，把那个问题又说了一遍。头顶的塔吊吱呀了一声，像替谁应了。

他给自己立过三条规矩：只拍公开的东西，只讲公开的话，只访自愿的人。这三条护着他，也限着他。有粉丝私信，说想看猛料。他回：猛料是别人的命，我这儿只有旧事。

发完他看了看时间，凌晨一点。窗外塔吊的轮廓在夜空里黑黢黢的，像一头搁浅的鲸。他把暖风机关小，忽然听见楼上有水声——文创园的管道夜里自己会响，咕嘟一声，又咕嘟一声，像谁在很远的地方，煮着一壶永远不开的水。

收工前他把白板整面拍了照，传了三个网盘。他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有个直觉：这些纸头迟早要出事。出事的那天，得有东西替它们活下来。

◆

二〇二二年四月，西湖路店，蓝溪接到任命。

没有仪式。穗把一串钥匙和一摞单据放在柜台上，说，从今天起，报单你签。蓝溪当了六年一号员工，头一回知道，签字比卖茶重。当晚她把那摞单据翻到半夜，税票，水电，物流，员工社保，一分一厘都要过她的名。她发消息问穗，要不要两个人再对一遍。穗回了四个字：你签，我认。她盯着这四个字

看了很久，关了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六年了，她头一回在打烊以后的店里，听见自己的心跳。她的工牌编号是〇〇一，二〇一六年入职那天穗亲手别上去的。招工那天穗问她会什么，她说会等。穗说好，卖茶先要学会等。她是岳口镇来的姑娘，那年二十二岁，站在西湖路门面里，看穗把一杆小秤挂在柜台里侧，从此再没摘下来过。

每天早晨八点，她卸门板，擦柜台，烧水，泡当天第一壶茶。第一壶不卖，端到店门口，朝着西湖的方向倒掉，这是穗教的规矩，叫醒茶。茶醒了，人才开张。六年，她没漏过一天，封城那两个月例外——门板卸不了，她就隔着卷帘门，朝西湖的方向坐一会儿。

她妈从岳口打电话来，说女孩子家管账，眼皮子要沉。她说晓得了。

挂了电话她算过一笔账：店里的流水，员工的工钱，自己攒下的嫁妆。账算到一半停了——她的钱存在穗发工资那张卡关联的户头里，利息跟着店走。她妈问她几时回岳口相亲，她说店里离不开。这话说了两年，她妈不信了，她自己也快不信了。

秋天，品牌上了新线：封仓系列·年限茶。十年陈，十五年陈，二十年陈，每饼拴一张小卡，卡上写着封仓的日子。海报文案是穗自己定的，一行字：时间到，茶就到。

定价单出来那天，蓝溪倒吸了一口凉气：二十年会所，一饼抵她半年工资。穗把定价单从头看了一遍，一个数字没改，只让把小卡上的字体调小一号，说，年份大了，字要谦。

别家卖茶讲山场，他们家卖茶讲年头。年头这东西，账本上从来不问出处——店规第二条像专门替它留的门。三条店规压在她头一年的工资袋里，纸都压黄了：不问价值，不问来路，不问十一月十八号。

首发放在直播间。直播是蓝溪的事，穗不上镜。手机支在柜台上，一盏补灯，她一个人对着三百饼茶讲封仓。弹幕问老板娘呢，她说老板娘信不过镜头。满屏哄笑。年货节那一场，四百单，四十一秒，她盯着后台的数字往下

跌，手心全是汗。下播后她一个人对着满柜的空格子坐到半夜，退单只有三笔，她把三笔原因一条一条抄进售后本。

其中一单的退货理由写着四个字：日期不对。她对着那行字看了半天。年限茶卖的是日子，客人挑的也是日子，日子不对，茶就白搭。她在售后本上回了一个字：换。第二天安排快递取回，换了一饼卡上日子早一个月的。客人后来的好评里写：这家店的日子是真的。她把这条好评截了图，存在相册最深处，跟那条两个字母的备忘录隔得远远的。

每场开播，在线名单第一个亮起来的总是那一个号：白鹭。灯牌是最早一批的，头像是一只鸟。一句话不说。有一场是补录的库存场，镜头里根本没有人，只有她在打包，下播时她翻名单，白鹭还在线。场场在，从不说话。

有一回她把在线名单截给穗看。穗看了两秒，把手机还给她，什么也没说。她也不敢问。往后她习惯在下播前把名单拉到底，那两个字总在最前头，像一盏没人点的灯。

她还做过一回验证。某天借用朋友的号，去播别人家的茶山直播，播了一个钟头，白鹭没有来。回到自家直播间，那两个字又在名单最前头了。她盯着屏幕，后颈起了一层细汗。验证出来的事，就得跟自己交代；交代不了，就当没验过。她当没验过，可后颈那层汗，一年比一年容易起。

开春盘账，她顺手数了数：六年，店铺直播四百二十一场。白鹭的场次她没数。不用数。

· · ·

十月对账，蓝溪头一回翻到供货那一页。

页上一个长期户头：CM供应链。开票方是家贸易商行，货品名统写茶原料，规格数量笼统；结算不走对公，现金和承兑票各半，经手签的都是穗自己的名字。这个户头月月有，笔笔清，像一个人按时吃饭。

她多看了几眼，还看出些账本外的事。这家户头的货，送货总在夜里，蓝色卡车，外省牌照。司机卸完货不进店，签收单从门缝里递出来。她见过那单子一眼，字很小，笔画很轻，轻得像怕压坏纸。

她把CM那一页折了个角，想提醒自己下月细看。过了几天又觉得不妥，把角抚平了。折痕留了下来，一道白印，像没长好的疤。此后每月对账，她的手指都会在那道折痕上停一下，像摸一摸旧伤。

她问过一次，就一次。她指着那一页问，这家的料，走的什么山头。

穗正把茶则归位，最长的归最长，最短的归最短，手没停，答：″供货商的隐私也是隐私。″

蓝溪从此没再问。她学着穗的样子，在户头旁边画了个小勾。画完自己看了半天——那个勾，怎么看怎么像画押。

当晚她在手机备忘录里建了一条，只记了两个字母：CM。记完她想删，手指悬了悬，按了锁屏。有些字，写下来是给自己壮胆的，删了，就只剩害怕了。

她还给自己立了条规矩：备忘录只在夜里看，看完就关。白天店里有客人，有穗的脚步声，有茶香，日子是甜的。只有夜里，那两个字母才敢睁眼。人和备忘录，昼伏夜出，倒像一对共犯。

· · ·

邮局的事，她是撞见的。

店隔壁三十步就是邮局。每月十五号下午，穗准点锁半小时店门，蓝溪起先只当见客户。有回落雨，她撑伞送过去，隔着柜台玻璃看见穗在填单。寄件人一栏，端端正正三个字：蓝溪。

她站在雨里没进去，伞也没送。回店以后穗问伞呢，她说找不着了。

地址那一栏隔着玻璃看不真，只看清头一个字，漳。漳州，做茶的地方。她想起前年穗收走过她的身份证复印件，说是给员工办补充医疗。复印件后来

去了哪儿，她没问过。不敢。

打那以后她绕路走，宁可多过两个红绿灯，也不从邮局门口过。有一回非过不可——店里的一封挂号信——她把头偏向另一边，走得飞快。柜台里的营业员叫了她一声，她只当没听见。

打那以后，每月十五号，她都提前把柜台理出一段空当，好让老板娘走得安心。做完这些，她自己也说不清图什么——大概图老板娘回来的时候，脸上还是那副让她踏实的样子。

还有一件事，她数过。每年十一月十八号，店休一天，工资提前结，全体放假。头一年她不习惯，第二年懂了不问，第三年起，她学会在那一天把手机调成静音。整条西湖路都知道，嘉木茶事的门，一年就关这一回。

休店那天，老板娘去了哪儿，没人知道。蓝溪只记得有一年年底对账，翻到十一月的水电单，那天的数字跟平常日子一样。也就是说，那天店里开着灯。开着灯，关着门。她把这个念头摁了下去，摁得指节发白。

腊月里盘库，店里开着取暖器，橘红色的光烤着账本。她把全年的供货页摊开，一格一格数CM。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数到十一月，空着。她又翻前几年的：二〇一九，十一月空；二〇二〇，空；二〇二一，空；二〇二二，空。五年，五个空洞，像一排掉完的牙。

天门的冬天最旺茶，他们家的年货节一天顶一个月。偏偏这个户头，专挑旺月断粮。

她试着替这个户头圆过几个说法：路断了，账期崩了，人病了。圆来圆去，每个说法都落在十一月。天下的病多的是，专挑同一个月份犯的，只有一种——心事。她妈说眼皮子要沉，她这会儿的眼皮子，沉得抬不起来。

她在备忘录那两个字母底下，一个字一个字敲：冬天生的病，冬天犯。

敲完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没删，也没发给任何人看。她把手机扣在账本上，去关店。三百饼茶卖空了，新的一批在仓库码着，每饼都拴着封仓的日子。落锁的声音比平时响。她忽然分不清，他们卖的年头，到底是谁的年头。

过年前，她收到穗发的红包，备注两个字：辛苦。她回了一个笑脸，又把那条两个字母的备忘录点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加了锁。那把锁，是给她自己上的，也是给穗上的——上了锁，她才敢继续留在这个店里。她舍不得走，这一点她认。

大年三十下午，店里最后一个客人是位老太太，买二两高末，说给老头子煮茶叶蛋。蓝溪没收钱。老太太出门的时候回头看她，说，姑娘，你眉眼跟我闺女年轻时候一模一样。蓝溪笑了笑，把卷帘门落下一半。她想，明年这个时候，她还在这儿。至于为什么一定在这儿，她不往下想。

◆

二〇二二年三月，天门市一医院，神经内科。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压不住窗外的油菜花香。医生让秀珍画个钟。她画了个圆，十二个数字全挤在右半边，像上班挤车。医生转过身，对他讲：阿尔茨海默，初期。药要按时，人要看着。

竺长生把诊断书折成四折，放进上衣内袋，跟这些年攒下的票据放在一层。其实头年冬天就有征兆：秀珍把盐当糖搁进粥里，一锅粥咸得发苦；半夜起来，把关好的灶又拧开——他闻着味进厨房，从那以后，总阀每晚睡前摸一遍。他那时只当她上了年纪。确诊这天，他把这些事一桩一桩串起来，像当年串一条案情。串完他坐了半晌：原来病早就在敲门，敲得很轻，跟当年那条案情一样。缴费窗口前排着长队，他站在队尾，腰板还是当年在队里站姿的样子。轮到他，收款的姑娘多看了他一眼，像是认出来了，又像是没认出来。

回家的路上他绕到北门，买了两个锅盔。秀珍吃了一个半，说今天的锅盔酥。他说是。锅盔是老方家的，三十年没换过手。

从那天起，他的时间切成小块。白色药片一天一次，他分进七格的塑料盒，格子上贴着星期。傍晚绕西湖一圈，她走里圈，他走外圈，靠着湖的那一侧永远是他。走到茶经楼底下，她有时停住，仰着头问，这楼是给谁修的。他

说，给茶圣。她说，茶圣享福了。再走一段，她又问一遍，他还答一遍。一遍和一遍之间，她不记得问过，他也不说破。湖边的风一年四季不断，把两个人的头发都吹得花白。

有一回迎面走来当年刑警队的老同事。老同事张嘴要喊，他先递了个眼色，老同事改口，喊了声竺师傅，钓鱼去啊。他说，去。两个人擦肩而过，谁也没回头。秀珍问，那是谁。他说，卖鱼的。她说，他家鲫鱼好。这个谎撒得圆，秀珍记住了鲫鱼，忘了发问。四月里她走丢过一回——出门倒垃圾，倒到陆羽公园去了，坐在陆羽像底下数鸽子，数到天擦黑。派出所来电话，接他的小民警看了他两眼，说，您是不是竺队？他说是。填登记表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

小民警后来跟蒋阔提过一嘴，说那天老爷子签字签了三回。蒋阔听完没作声，下了班绕到师父家楼下，站了半根烟的工夫。他不会抽烟，那根烟是散给看门老头儿的。

她坐在像座上朝他招手，喊他师傅，你也来数。他应了一声，坐下跟她数，数到天黑透。回来当夜，儿子小江从武汉寄的定位手环到了，他给她戴上。她问这是啥，他说好看。

他又做了张卡片，塑封好，缝进她外套的内袋：家庭住址，两个电话，一个是他，一个是小江。缝的时候他戴上老花镜，缝三针直一次腰。这套针线是当年跟她学的——她纳的鞋底，一针挨一针，密得能挡水。

小江每个礼拜天来电话，说的都是药名和复查。有一回说，爸，您也当心，这个病，照顾的人先垮。他说我垮不了。他没提那口箱子。

他学着她当年的样子照顾她。他年轻时不着家，她把粥坐在锅里最小火上，人睡了粥不糊。如今他也把粥坐在最小火上。她当年替他记事，卷宗号、限期、老人的药，全在一个蓝皮本上，喊他吃饭摇一只铜铃。如今铃铛挂上了门框，夜里一响他就醒——她夜游，开门不开灯，铃一碰就动。她当年替他守

夜，如今轮到他守她。轮到他记她的账：新本子，第一页写，三月九日，锅盔，一个半。四月二日，走失，陆羽公园。四月九日，把手电筒藏进米缸。

米缸这个位置他熟。他从米里往外摸手电的时候，手在米底下停了停——他自己的那口铁皮箱，从前就睡在米面柜的夹层里。

四月末，蒋阔来看他，拎了两盒明前茶。

电视里放着戏，师徒两个一人一杯茶。蒋阔说了些队里的事，说上头要有大动作，清积案。老人续茶，不接话。秀珍从里屋出来，看见蒋阔，招呼他坐近点，往他手里塞了个橘子，一口一个小江地叫。蒋阔应了，把橘子接了，剥开，吃得很慢。老人看着，没有纠正。

蒋阔坐了半天，问：″您家那口箱子，到底想等什么？″

竺长生把他的杯续满：″等它自己开口。″

蒋阔还要说什么，秀珍已经靠在藤椅里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半个橘子。他出来，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些。蒋阔走前在门口站了站，说，师父，队里如今查个电动车盗窃都兴用大数据，没人肯听老案子了。老人说，新刀新案，旧刀旧案，刀换了，手上的茧还在。蒋阔没听懂，也没敢再问。蒋阔坐到天黑走人，两盒明前茶留在茶几上。他收进米面柜，收进去才想起那个位置空了，又取出来，搁在柜顶上。

那两盒茶他一直没舍得开。他如今喝茶喝得省，药盒就摆在茶盘旁边，一排药，一排茶，一样白。给秀珍分药的时候，他也给自己倒一小盏。两只杯子并排搁在窗台上，像一副没下完的棋。

· · ·

入夏以后，秀珍开始翻箱倒柜。翻出来的东西不认得，藏回去的地方也不对：遥控器进了糖罐，存折进了针线笸箩。五月里，他从她枕头底下摸出剪刀，一把，两把，三把，用手帕包得整整齐齐。他一把一把收进五斗柜最上

层。秀珍坐在床沿看他，问，我的剪子呢。他说，钝了，拿去磨。她说，磨剪刀要紧。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浅，五斗柜那边一有响动他就醒。

有一夜他做了个梦，梦见柜子里那三把剪刀自己张开了，在黑地里排成一行。醒来他去摸手电，手电不在枕头底下——在秀珍手里。她攥着手电睡着了，灯没开。他轻轻抽出手电，替她把被角压好，又在床沿坐了很久。天亮他想，人老了怕什么。他这辈子怕过的东西，比一把剪刀沉得多。

箱子也是那阵子搬的。从米面柜的夹层里出来，压进床板底下，棉被垛在箱子上。道理他想明白了：家里越乱，箱子越安全。厨房她天天去，床底她不去。

入冬，他往箱子里添了样新东西。一本旧挂历纸壳改的剪贴本。从二〇〇六年起，每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一天的《天门日报》，他都托报馆的门路留一份，早年缺的年份，从图书馆的合订本里补齐。每年这一天，报纸上凡是沾着茶字的消息，他剪下来贴上去。头一本的第一页最薄，只有半版殡葬广告和一场婚庆促销，他剪的时候想，这一年，全城都在过日子。往后多数年份也只有一行豆腐块：茶文化节筹备，某茶庄开业，茶艺展演。有的年份连一个茶字都寻不见，他就把整版广告贴上去，让白纸黑字替他记着：这一天，全城照常。

本子攒到第七本，纸壳磨圆了角。秀珍有一回翻见过，问，这是什么。他说，账本。她问，谁家的账。他说，咱们家的。她点点头，说，那得记清。说完这句话，她转脸就忘了。他记得。

二〇二二年这一页，贴的是半版广告。封仓系列·年限茶，时间到，茶就到。右下角印着日子：十一月十八日，嘉木茶事，全城首发。

剪这个广告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剪刀口在封字上豁出去半分。他把豁口对着台灯看了半天，用浆糊照原样粘好。浆糊是他自己打的，面粉加水，小火，顺一个方向搅——这也是她教他的，打浆糊不能乱搅，乱了劲就散。搅的时候，他的手很稳。四十多年前她教他的时候，手比这还稳。

浆糊干得慢，他坐着等，坐了半宿。二十来份《天门日报》摞进箱子里，最早那份二〇〇六年的，纸已经黄脆，边一碰就掉渣。他把每份都包了牛皮纸，写上年份，码得整整齐齐。小江回来看见过，问，爸，这堆旧报纸卖废品能卖二十块。他说，不卖。小江问，留着干嘛。他说，留着等一句话。

小江临走帮着贴了副春联，上联下联贴反了，揭下来重贴。秀珍站在边上看，忽然说，福字倒着贴。小江说，妈，您从前非讲倒贴俗气。秀珍愣了愣，说，是吗。他插进去说，今年倒贴。福字倒过来，端端正正贴在门心。秀珍看着，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他接住了。

· · ·

十二月初的一个夜里，他起来给秀珍掖被子。

她忽然睁着眼。那双眼睛亮了一下，亮得他站住了。

她说：″长生，二〇〇五年你回家那晚，脸白得像纸。你是不是晓得，那不是流窜作案？″

他握住她的手。窗外的风刮过晾衣绳，一下，又一下。

半天，他说了两个字：″是伢。″

秀珍点点头，像早知道，又像头一回听说。过了一会儿，那点亮像退潮一样退下去。她说，锅里给我留粥没有。他说，留了。她翻个身，睡了。

他坐在床沿上，握着她的手，握到那只手从他手心里轻轻抽了回去。桌上的剪贴本摊着没合，二〇二二年那半版广告朝着灯。天亮他起来熬粥，把火坐在最小上。秀珍坐到桌边，问他夜里冷不冷。他说不冷。她没再问——夜里说过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汉口，罗家。

周老师二十七岁，做家教第三年，一个人租住在老城区的旧小区，备课本随身带两本，一本给学生记功课，一本记她看不懂的事。经熟人介绍进的罗家。罗成峰十一月调回集团总部，孩子从天门转学过来，插班六年级，功课落下半截，需要一个每周来五个下午的人。

面试那天是罗成峰亲自谈的，十分钟，问了三个问题：带过几家教，孩子哭闹怎么办，家长里短的闲话讲不讲。她答：三家，冷处理，不讲。罗成峰点头，说，课时费比行价高两成，只有一条——家里的事，出了这个门，谁问都不知道。她当时只当是名门的规矩。后来才明白，这不是规矩，是习惯。

她头一回见到罗美佳，孩子站在玄关，书包带子攥在手里，像来借住的客人。书包上挂着个小挂件，一枚指甲盖大的茶饼，茶饼上两个米粒大的字：嘉木。挂件的绳是红绳，编得细密，收口藏得一点不露。周老师做学生时学过中国结，看得出这不是市面上买的活儿。

插班考的作文题是《我的家》。美佳写了三百字，写汉口的江，写天门的湖，写江上的雾和湖边的灯，没有写一个人。周老师看完，一个错字没扣，只在末尾批了一句：湖也写得很像人。

作文本发下去，美佳捧着看那行批语，看了很久，第二天把本子带回了家。周老师后来在唐阿姨家见过这本子——摆在书架第二层，和那本包布的旧书隔着两层格。孩子的字，进得比人快。

罗家的房子很大，空的地方也很大。家政阿姨姓刘，五十来岁，管饭管接。罗成峰出差的日子，晚饭桌上只有三个人：美佳，刘阿姨，周老师。客厅里找不到一张女主人的照片，只有一张三口人的旧合影，收在玄关柜最下层，压在孩子的奖状底下。周老师带过三家孩子，头一回看见把照片收成这样的家。

唐阿姨是后来出现的。周六上午来，拎一只素布袋。起初美佳把自己关在房里，唐阿姨不敲门，也不勉强，走的时候把一小碟茶点放在门口的矮凳上。

第三周，房门开了一道缝。第五周，美佳跟她走了——去唐阿姨家，说那边茶器全。

十二月中旬，赖了两周床的美佳，忽然自己起了，说快点，别迟到。刘阿姨在厨房抹眼泪。后来周老师才晓得，那天早晨是唐阿姨顺路来接的，车后座放着一小袋干桂花。到了学校门口，桂花归美佳，书包归唐阿姨，拎了一路。

周老师跟着去过一回。唐家在江边，客厅一面落地镜，茶桌靠窗，器物摆得像仪器。一整面墙的书，一半是茶书，《茶经》十几个版本排在一起，其中一本最旧，边角用布包着。美佳伸手要翻，唐阿姨按住书的封面，说，那本不翻，翻别的。

唐家没有电视，客椅也少，来几个客人坐几个座，多出来的站着。周老师头一回见这样的客厅，像这屋子的主人早把多余的热闹都请出去了。墙上的挂钟走得很准，报时的声音轻，可一到整点，满屋子都听得见。

泡茶的时候，水将开，唐阿姨把壶提起来，离火，静置。美佳问，为什么不等它大开。唐阿姨按着她的手背，让她听：壶里的响声，先是碎的，像鱼吐泡；后来连成串，像珠子滚盘；到了珠子这一步，就离火。她说：〞水开了要离火，人也一样。〞

那节课以后，美佳周六早上自己定闹钟。

课程表是唐阿姨手写的，一张贴在罗家冰箱上，一张贴在唐家茶桌侧面。从识茶到煮水，从煮水到候汤，从候汤到奉茶，一共十二课。最后一课的名字空着，只画了一条横线。美佳问最后一课学什么。唐阿姨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周老师看见那条横线，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考卷——最后一题也常常空着，那是留给最难的。

第十一课是奉茶。美佳先练给刘阿姨喝，再练给周老师喝，最后练给爸爸喝。罗成峰捧着那盏茶，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周老师也喝过一回，是上上周唐阿姨顺手递的，汤色清亮，入喉有一点回甘，压着一点说不出的紧。散席的时候罗成峰给她们一人递了一盒点心，说是唐阿姨店里拿的。纸盒上印着一行

小字：时间到，茶就到。周老师后来把这六个字抄进了备课本。卖茶的话说给茶听，倒也熨帖——可这六个字更像一句应许：日子到头了，人就到了。

唐阿姨从不发脾气，也从不说重话。十二月月考，美佳的数学砸了，卷子折成小方块藏在袜子里。周老师知道，唐阿姨也知道——她只让周老师把错题类型报给她，一个分数没提。周末的茶课照常，只多了一节：把错字订正得跟帖一样齐。美佳订正到第三遍，自己先烦了，把笔一放。唐阿姨把笔捡起来，削好，搁回她手边，接着烫她的杯子。美佳又拿起了笔。

一个学期下来，美佳的背直了，说话不抢了，见人先喊人。罗成峰出差回来，在楼道里愣了半分钟，说他闺女站有站相了。

那晚罗成峰请周老师和刘阿姨吃了顿饭。饭桌上他话不多，多数时候在看手机里美佳的成绩单，看一遍，锁屏，再看一遍。周老师说了句孩子在长，别催。他抬起头，眼圈有点红，说，老师，谢谢你。三个字说得极慢，像每个字都过了一遍秤。周老师清楚，这半年真正管住这孩子眼睛的，不是她这个讲习题的。唐阿姨管孩子像做茶，看的不是对错，是火候；火候到了才出手，出手只有一下。

不止站相。美佳原来写作业咬笔杆，现在不咬了；原来跟刘阿姨呛声，现在会说麻烦您了。周老师私下给这半年记账：孩子的变化，一分是她的，两分是时间的，剩下的七分，都在那位周六上午才出现的唐阿姨身上。

周记是周老师带的功课，美佳写完给她看。十一月那篇里有一句：唐老师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笑到眼睛里。

十二月那篇里又有一句：唐老师眼睛里没有我。她眼睛里有水汽，有茶，有她自己的手。

再往后翻一页，还有一句：唐阿姨说，拍照先看光。光不对，人就不真。

还有一页只有一行：我问唐阿姨为什么一个人住，她说，怕吵。周老师在这一行上停了很久。怕吵的人，家里安静；安静的人，不一定怕吵。这孩子把两句话贴得这样近，她自己还不知道。

周老师把本子合上，坐了一会儿，把这几句抄进了自己的备课本，抄完锁进抽屉。她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认定这些话重要。孩子夸老师的话都一个样；孩子看老师看到骨头里的话，她带三年学生，头一回见。

那天夜里她把备课本翻开又合上。从前带过的一个孩子跟她说过：老师，大人不骗小孩，是因为懒得跟小孩说谎。她当时没懂。现在她有点懂了，懂的那个地方，正是她不敢往下想的地方。

· · ·

腊月里一个周六，周老师送美佳去唐家，约好五点楼下接。

进门换鞋的时候，美佳看见了那面落地镜，跑过去摆姿势自拍。周老师在玄关挂大衣，一抬眼，从镜子里看见：小姑娘身后的矮桌上，立着一张剪纸——两个小人，手牵着手，剪得极简，连脸都没有。

剪纸插在桌上的旧笔筒里，黄纸，边角毛而不乱。镜子里还照得见玄关的伞架，照得见茶桌的一角，那两只杯子并排摆着，像在等人。剪纸上两个小人，一个高些，一个矮些，手牵在中间。笔筒边搁着一小截剪刀套，皮的，磨得发亮。这个家里什么东西都干净，干净得像随时等人来查。

落地镜擦得一尘不染，镜面正对着茶桌。喝茶的人一抬眼，就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周老师后来想，这面镜子照过谁、没照过谁，各有各的位置——这话她没敢细想。

美佳回过头去找实物，举着手机问：这是谁剪的？

唐阿姨正烫杯，头也没抬：〞一个老朋友。〞

美佳又问：是阿姨的……那什么样的人？

唐阿姨没有回答。她走过来，把美佳举着手机的手轻轻按了下去，按得极慢：〞先拍照，莫问。〞

周老师站在玄关，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看见唐阿姨按住那只手的时候，眼睛始终落在茶杯上。可那一下按得又轻又准，像按住的不是一只手，是

很多年前的一张纸。

五点，美佳在楼下等她，外套穿得整整齐齐。周老师问拍了什么，美佳把手机递过来。相册里就一张：镜子里的小姑娘，和桌上那两个牵手的纸人。

美佳说，唐阿姨不许把剪纸发出去。周老师问为什么。美佳想了想，说，她没说为什么，她只是把我的手按下去了。

按下去了——这四个字，孩子说得很轻，像在讲一件比她大得多的事。

两个人往公交站走，江风很硬。周老师把美佳的围巾往上拉了拉。她想起日记里那句唐老师眼睛里没有我，忽然明白，那不是委屈。那是孩子看见了什么，还说不出来。

等车的时候，美佳又说，那两个小人，矮的像我，高的像唐阿姨。周老师嗯了一声，没接话。车来了，孩子上车，隔着玻璃朝她挥手。她站在站牌底下没动，想起那面镜子——她在玄关站着的时候，特意站到了镜框照不见的地方。她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要避开那面镜子。

◆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市局刑侦支队，三楼走廊尽头的会议室换了一台新投影仪。

会议室的百叶窗拉了一半，冬天的太阳斜进来，在投影幕上照出一层浮灰。这一排椅子坐过三任大队长，蒋阔是第四个在这间屋里讲积案的人。他进门之前，把大衣上的雪粒子掸干净了才坐下。

投影仪是新配的，遥控器还包着塑封膜，开机的风扇声盖过清嗓子的声音。他站起来讲了二十分钟，讲完才发现，攥遥控器的那只手，指节全白了。

十二月头上开过动员会，横幅从楼顶垂到二楼：命案必破，积案必清。台下坐满了人，年轻民警举着手机拍幻灯，照片进了工作群，配着拳头图标。散会时支队长拍了拍蒋阔的肩膀，说了句老案子里出老将。他笑了一下，笑得比

哭还费劲。公安部部署命案积案攻坚，市局排着队报盘。轮到蒋阔，他把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西湖茶仓命案报了上去，附的是老队长竺长生二〇〇六年的并案报告。牛皮纸袋在档案室躺了十六年，借阅栏上，他是第一个名字。

头天夜里他在档案室坐了一下午。卷宗不厚。现场图是手绘的，铅笔线都淡了：仓房三间，茶堆后头画着一只铁皮箱，旁边标注两个字——未动。死者的位置，创口的方向，一个箭头一个箭头标得清清楚楚。报告页边有一行钢笔小字，是老队长当年的手迹：持剪者疑为左利，年未及冠。十六年前写下这行字的人，如今在家里熬粥。

档案室的空调嗡嗡响，纸页脆得像酥饼。他戴着白手套一页一页翻，翻到现场剪纸的照片时停下了。照片上那张黄纸拍得清楚，双童奉茶，刀口齐得瘆人。他把要点抄进自己的本子——原件不许带出档案室，这是规矩，他一条不破。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守规矩守了二十多年。守规矩的人最清楚，规矩漏风的地方都在哪儿。

抄到最后他合上卷宗，在借阅栏签了名，签得很慢。管理员说，蒋队，这案子有年头了啊。他说，比我警龄都长。管理员问，那还能破吗？他把笔帽按上，说，破不破是上头的事，记不记是我们的。管理员还想说什么，他提着袋子出了门。走廊尽头的窗台上，不知谁的一盆绿萝冻蔫了，叶子搭在玻璃上。他路过时把花盆往里挪了挪。这个动作他做惯了——队里的花，队里的案子，他见不得东西离冷的地方太近。

附件他钉成一册。其一，现场提取剪纸一幅，黄纸，刀口单向，法医认定致死创口系剪刀类锐器，手法同源。其二，外围河埠头暗渠提取童鞋印一枚，三十三码，石膏模后遗失，卷宗存照片四张。其三，二〇〇八年十一月，茶行旧伙计曲健回天门，有酒后言语记录，称案发夜在河边见过一个拿手电的男孩；此人二〇一〇年六月死于广州灯饰仓火灾，已结论意外。其四，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昆明协查，在逃同居男友操天门口音，协查回执在卷。

册名他打了四个字：并案之请。

目录他排了七遍，最硬的放最前，最软的垫底。放最前的是剪纸，垫底的是口音。老队长在报告末尾写过八个字：物证不语，唯刀有言。他当年抄这八个字的时候不懂，如今懂了——刀不开口，不是不想开口，是开口的时机没到。

评审前他去了师父家。他想要一件东西——二〇一九年王春发烧过来的那把家用剪刀，红布包着，形制与创口同类。他想送省厅，做金属微观痕迹，做DNA。胜负手，就压在这一件上。

进门的时候秀珍正看电视里的戏，看见他，招手叫他过去，往他大衣兜里塞了两块糖。糖纸是老式玻璃纸，他小时候含过。老屋的挂钟嗒嗒地走，他忽然不忍心开口了。可他还是开了口。

老人在灯下擦老花镜，擦了很久，说：″时机不熟，打草惊蛇。″

蒋阔头一回跟师父红脸。四十七岁的人，嗓门在自家师父面前失了控：″您家这是拿私情压公家！″

竺长生把眼镜搁在桌上，玻璃片朝上，像两只闭上的眼睛。

他说：″我拿的是二十年的判断。你把刀递出去，换回来的可能是证据不足四个字——案子就真的死了。″

蒋阔说，攻坚的窗口就这一回，专项有经费，有专家组，过了这村没这店。

老人说，窗口是人家的，案子是死人的。死人不赶时间。你把刀递出去，图的是个交代；我按着刀，图的是个案子。

蒋阔盯着桌上那副老花镜看了半天，玻璃片朝上，映着灯，像两口小小的井。他忽然问了句不相干的：师父，您后悔当过刑警吗？老人说，后悔。后悔没早生十年，赶得上好使的家伙什。说完老人自己先笑了，牙都露了出来。蒋阔也笑，笑完眼眶热了一下。

蒋阔走的时候大衣没穿好，在院子里站了一阵。二楼的灯没亮，老人没有送。

· · ·

评审会开了三天，过了十一件案子。有惊天大案的，有靠一枚足迹锁定真凶的，有从二十年的血衣里验出结果的，掌声一阵接一阵。投影翻页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像翻日历。二〇〇五案排在最后一天最后一个。

蒋阔讲了二十分钟。有人问，现场指纹？答，两枚模糊掌纹，比中未果。有人问，作案工具？答，未起获。有人问，当年排查的两名重点，如今人在哪里？答，曲健二〇一〇年死于广州火灾，结论意外；苏彩娥二〇〇六年一月溺亡，结论意外。

会议室静了几秒。带队的支队长摘下老花镜：小蒋，你这案子里的人，自己把自己灭干净了？

蒋阔说，报告上写的是巧合。

支队长说，巧合太多，就不是巧合，是没法立案。最后表决定调：关键物证缺失，未入选。散会前支队长多交代了半句：材料留下，案子挂住。挂住两个字什么意思，蒋阔懂——不办，也不销。

散会的时候支队长留了他一步，说，小蒋，我知道你不服。二十年前你师父在这个院里，也是这样不服。后来呢？后来他把不服腌成了咸菜，一顿一顿就着饭吃，吃了二十年。你呢？蒋阔说，我胃好。支队长难得笑了一声。

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支队长又补了一句：材料我留下了，会转给省厅的专家组看看。别谢我，是你那册钉得好，钉得像我年轻时候看的卷宗。蒋阔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这句话，他等了一下午。

懂归懂，他不甘心。二十分钟的陈述，他改了十一稿。讲到第三稿，他自己先信了；讲到第九稿，他以为自己能赢。

材料退回那天，他在封面退回理由的打印字样底下，手写了一行小字：物证在老竺家米柜里。

写完他想涂掉。笔尖悬了一会儿，终究没涂。这行字不合规矩。可这十六年，哪一行合过规矩。

有一瞬间他想过去找老队长摊牌——把剪刀要走，送检，宁肯吵翻。可他想起师父搁在桌上那两片朝上的镜片，又想起秀珍塞进他大衣兜里的那两块糖。有些仗不是打赢的，是等赢的。

他把退回的材料重新装袋，塞回档案架最里层，跟十六年前一样。关灯的时候，档案室的空调还在嗡嗡响，像替谁叹气。出来的时候天擦黑，雪籽落下来了。他把车停在巷口没熄火，暖风把挡风玻璃外的世界吹得歪歪扭扭。媳妇发消息问几点回。他说加班。媳妇回：又陪你的老案子过夜。他回了个笑。婚姻里的戏言，有时候比案卷还准。雪籽打在车顶上，沙沙的，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翻纸页。

他点开白天评审会的录音，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支队长那句自己把自己灭干净了，然后关掉，闭眼靠了一会儿。挡风玻璃上，雪籽化成的水一道一道往下淌，像有人在玻璃背面写字，写完又抹掉。

· · ·

回到队里，走廊里的人散尽了，声控灯一盏一盏灭下去。他在窗前给师父发短信。窗外落起今冬第一场雪籽，打在玻璃上沙沙响。他打了一行，删了；再打，再删。最后留下来的，是最不像汇报的一段话。师父的手机是他去年给换的，只会接打电话、看照片，短信要一条一条翻。老人会一条一条看完的，他知道：

师父，攻坚结束了，案子没进去。但我会一直记着它。

按发送键的时候，他想起二〇〇五年，他进队没几年，跟在师父后头勘察那个茶仓。师父蹲在地上看一枚鞋印，看了整整一上午，起身时腿麻了，扶着

他的肩膀站了半天。他那时认定，天底下没有师父破不了的案子。四十七岁这年他才明白，师父不是破不了，是舍不得破——破错了，比不破还狠。

发完他去开水间接水。回来的时候，手机在窗台上亮着。

回信只有两个字：〝莫散。〞

第十章　分茶

啜苦咽甘，茶也。

二〇二三年四月，汉口，鄱阳街。一盏楼关了店，阁楼的灯亮了一夜。

打印机在凌晨三点退最后一份报告，纸出来的时候还带着热。简明堂没有马上去拿。他坐在藤椅里等纸凉，像等一壶滚水降到能入口的温度。老伴在楼下睡，呼吸声顺着木楼梯浮上来，一起一伏。

报告一共二十六页，结论压在最后，只有两行：涉案棉纸含机械木浆纤维，属二〇一〇年以后市售工业纸浆；“大票”油墨的连结料为聚氨酯丙烯酸树脂体系，相应商用配方投放市场不早于二〇一五年。

那饼茶，号称五十年陈，市价一饼十九万八。

碳十四给的是纸的年纪，纤维分析给的是纸的出身，油墨给的是印的年份。三样咬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没有给传说留下一口活气。他这辈子给博物馆掌过眼，给拍卖行断过真假，没有一份报告做得这样干净——干净得像有人提前替他把刀磨好了，递到手边。

这是第三遍。第一遍在自家阁楼，显微镜下看纤维；第二遍、第三遍，小样拆成三份，匿名送了两家实验室，其中一家用加速器质谱仪测的碳。三份结论摆在一起，一个字都不差。

他第一次留意到那道豁口，是二〇一五年。老主顾从南方带回一饼“五十年陈”请他掌眼，茶汤是琥珀色的，挂杯也好，可棉纸一上手他就停住了——纸太顺，顺得不像熬过半个世纪的光。再放大镜底下看，“羡”字第三笔有一道月牙形的断口。后来他又上手过两饼，两饼都有同一道断口，深浅一致，位置分毫不差。

同一块版，同一路刀，同一个磕碰。木刻的版会老，会裂，会把自己的伤口一遍又一遍，盖在时间的脸上。

天亮之前，他把三份报告的扫描件一字不动地挂上了“一盏楼”的公众号。标题想了半宿，最后只用了九个字：《千羡水桩，我验了三遍》。发布时间，凌晨四点十一分。

发完他去漱口。镜子里的老头眼窝深了一圈，下巴上的胡茬白了半边。他对镜子说：简明堂，你七十五了，还干这种得罪人的事。

镜子不回答。楼下过早的热干面香飘上来，芝麻酱的味道很老实。

十七年前他第一次上手“千羡水桩”的时候，只当是普通的以新充旧。三年前第二饼送到他手里，他开始留照片；今年开春第三饼进门，他把三张照片钉在一块软木板上，钉成一个三角。老伴问钉的什么，他说：一桩案子的三面墙。墙齐了，就等证人自己走进来。证人果然来了，带着律师。

早上六点，阅读量过了十万。茶圈炸了。有人转，有人骂，有人说老先生倚老卖老蹭流量，也有人把他三十年的鉴定记录一条一条翻出来数，数完又骂。骂得最凶的一个账号，签名是“做时间的朋友”。他一概不看。老伴问他到底图什么。

他说，图个睡觉踏实。

发文后的第三天，一盏楼来了两拨不寻常的客人。一拨是退货的，抱着两饼“千羡水桩”，进门把茶搁在柜台上，一句话不说，看看他，走了。另一拨是媒体，电话打到座机上，问他敢不敢上镜。他说不上镜，货是真的假的，报告里都写着，自己看。

老同行也有电话来。一个电话劝他：老简，都这个岁数了，水底下的事，让它沉在水底下。他握着话筒听完了，说了三声好，把电话挂了。挂了以后，他往盖碗里续了一道水，把那句话当茶叶渣，闷在里头。

律师函是第九天来的。大徒弟接的快递，拆开看了一眼封皮，脸色就变了，双手捧上楼来，像捧一块烧红的铁。律所的名头很亮，函件二十三页，附

着厚厚一沓公证书，索赔的名目是名誉权，数字后面跟着一串零。第二份函换了措辞，叫“协商解决”。第三份没有函，只有一个电话，约在江对岸一家酒店的行政酒廊。

谈判谈了两轮。第一轮，对面四个西装，进门先递名片，名片都很厚。他们不谈茶，只谈法条：证据链，传播量，商誉减损。简明堂听着，偶尔点头，像在听人念一份与茶无关的说明书。

对面递过来一份《品牌方观点书》，铜版纸，印得很讲究，中心思想只有一句：百年工艺，童叟无欺。简明堂翻完，把它摆正，推回去，从布包里摸出自己的东西——一册一九八九年的鉴定手记，纸黄了，边角起了毛，里头夹着三十年间他经手的茶样记录。他把册子摊开在桌上：“我做这行的时候，你们老板还没出生。茶这个东西，骗得了舌头十年，骗不了纤维三十年。”

对面几个人对看了一眼。那一轮没有谈拢，但散的时候，为首的律师伸手跟他握了握，握得很用力。他明白，那一握，是价钱谈拢的前奏。

第二轮，条款落定：删帖，赔偿，双方对检测过程与结论互不评述。白纸黑字，落款按印。

第二轮谈完那天，他起身出门，回头看了一眼。玻璃门外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女人，深灰色的衣裳，头发一丝不乱，没有进来。

他教过她一年。

六年前，她在阁楼上练盖碗，出汤的手腕是他一寸一寸掰正的；练废的茶饼摞在墙角，她一块块码好，临走带走，说不能糟蹋东西。拜师那天她递上拜师帖，帖上两个字，唐穗。她也是这样站着的，隔着一张茶案，向他鞠躬。

阁楼上那一年，她比谁都舍得下力气。三伏天守着炭炉练煮水，手背上烫出两个疤；练废的茶饼一块块码在墙角，临走那天码得整整齐齐，非要带走，说糟蹋东西要遭报应。他在阁楼门口看着她把那些茶饼一趟一趟搬下楼，出了满头的汗。

教到最后一年，他心里有数，这个徒弟的手，早就用不着他了。她学他，像学一座桥——过桥的人，不会在桥上住下。

签字定在第三天，律所的长会议室，长桌能坐十二个人。对面三个律师，轮流念条款，念得又慢又稳。念到“保密义务”四个字的时候，走廊里那个女人进来了——不，她还是没有进来。她隔着玻璃站定，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弯下去，停住，直起来。幅度一分不差，还是师门的礼数。

直起身的时候，她隔着玻璃说了一句：“对不住您家。”

玻璃很厚，声音进不来。可他看口型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像有人蘸着水在玻璃上写字。

她说完就走了，没有等他回应。走廊的地毯厚，脚步声一点也没有留下。

对面的律师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年长的那位清了清嗓子，把条款翻到下一页，声音放得又轻又平，像怕惊动什么。

律师把签字笔递过来，德国造，很沉。简明堂接了笔。全场的目光都在纸上，没有人注意他把名字签得比平日慢，一笔一画，像在给谁留凭据。签完他抬眼问了一句：她还好吗？三个律师互相看了看，年长的那个答：唐老师很好。四个字，公事公办，像念条款。他没有再问。问出来的话不值钱，看出来的才是真的——刚才那一躬，弯下去的时候，没有一丝犹豫。全程他没有提那个豁口——“千羡水桩”大票上“羡”字第三笔的断刀，是他留给自己的东西。协议管得着嘴，管不着眼睛。

他跟闻讯赶来的大徒弟说：“我的棺材本赔得起官司，赔不起徒弟们的饭碗。”

徒弟红着眼说那报告白做了？他说没有白做，纸没有白拆。

协议一式四份，他留了一份。徒弟们想复印，被他拦了：“留着看的，不是留着传的。谁传出去，谁自己认。”徒弟们不敢了。只有大徒弟问了一句：师父，到底是谁家的货？

简明堂收拾着放大镜，半天说了一句：货是“千羡水桩”的。人，是老夫半路捡来的徒弟，又自己走成路人的。

赔偿金到账当天，他原数捐了出去，收款方是省茶叶学会，备注栏空着。徒弟们后来问他对方什么阵仗，他说：三个律师，加一个法务身后的女人。

徒弟们私下管那笔赔偿叫香火钱。简明堂听见了，没有纠正。捐款回执他收在一只牛皮纸袋里，纸袋上写着两个字：收讫。他这辈子给人出过几百份鉴定书，头一回给自己出了一份：兹证明，简明堂，认输一次，心证未消。

还有一件事他没有跟徒弟们讲。签字回来那晚，他翻出半罐学生留下的茶样——六年前她毕业时孝敬师父的，他一直没舍得喝。他泡了一盏，喝了一口，剩下的倒进了水槽。茶没有变。变的是喝茶的人：如今他端起任何一盏茶，先想起的不是香气，是纤维。

· · ·

当天夜里，他上了阁楼。三份报告的电子档按协议删了，回收站清了三遍，云端也清了。删完最后一遍，电脑屏幕暗下去，映出他自己的脸。

他留下另一样东西：检测的方法学部分——仪器型号，标准物质，纤维图谱，碳十四的前处理流程——从头到尾三十页，不含委托方信息，不含样品来历。这是科学，不是官司，白纸黑字签不走的。谁也签不走。

他把这三十页复印了一份，撕掉页眉，装进一只铁皮饼干盒，用保鲜袋裹了两层，勒紧。然后他拎着盒子下到厨房，拧开米缸的木盖，把米舀开一半，将盒子平放进去，再把米一捧一捧覆上来，末了用饭勺把米面抹平，抹得很慢。

老伴端着灯站在门口看他，没有问。

他十二岁学徒那年见过这一手。那年月风声紧，师父把一册祖传印谱用油纸裹了三层，塞进米缸，压在米底下。师父说：米要常淘，缸要常翻，藏东西

的地方，得天天有活人经过，才算藏得住。死地方藏不住东西，活地方才藏得住。

徒弟们都说师父抠，一盏楼的米缸裂了口都舍不得换。现在，他也成了把命根子藏进米里的人。师父那辈如此，他这辈也如此。米不说话，米只管养人。

睡前他把饼干盒的位置在心里画了一张图：从中线往左三指，垂直向下两指。这张图他默了两遍，跟背帖一样。第二天早上他真的去淘了米，淘米水浇了阳台的兰草。老伴倚在厨房门口看他，眼神像看一个刚学会藏东西的孩子。

淘米的时候他想起一件事：师父走的那年，米缸交到他手里，缸底压着一张字条，只有一行——米在，人在。他那时不懂，如今懂了。他找了一张纸，也写了一行，压进缸底：米在，账在。纸条对折两次，塞进缸底的缝隙。纸要经得住米压，字要经得住年头。他细心了一辈子，只在茶上，栽过一个跟头。

睡前他掀开木盖又看了一眼，米面平得像没有动过。他把盖子盖回去，对老伴说：往后淘米，我来。

老伴应了一声，忽然又站住，问他：就是签字那天，玻璃外头鞠躬的那个？

他点头。

老伴说：一进门就赔礼，倒叫人发毛。

他把灯关了。黑暗里他说：“她那一鞠躬，比律师函吓人。”

◆

二〇二三年六月，天门，滨湖路。周老师到罗家做住家家教的第二年，带的是美佳小升初的数学和英语。

她本科学师范，二十九岁，有个记事的习惯：每个孩子一本，写观察，写进度，也写些看不出名堂的细节。美佳这一本，扉页上是去年九月写的第一

行：聪明，怕黑，爱笑，笑起来右边有个梨涡。

夏令营是罗成峰报的名，军事加户外，十天，在外省的山里。走之前美佳兴奋了整整一个礼拜，把行李箱收拾了三遍，还列了一张单子，最后一行是：给唐阿姨带一块石头。夏令营的十天里，美佳往家里发过三回语音，声音都是敞的：住的是山里的营房，八个人一间；教官教打绳结；山里的星星比城里多。唐穗把三段语音一条条听完，回音叮嘱孩子石头挑轻的，太重拎不动。

谁也没有想到，十天的好月亮，回来一落地就黑了。

接回来那天罗成峰在出差，唐穗去接的。周老师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晚的饭是唐穗做的，四菜一汤，摆得整整齐齐，自己没上桌，就坐在美佳旁边，给孩子剥虾。

变化是从第三天夜里开始的。

周老师睡在客房，隔壁就是美佳的房间。后半夜，隔壁传出喊声，一声连一声，喊的都是两个字：别拍。她披衣过去，孩子蜷在床角，一身汗，眼睛睁着，瞳仁缩得很小，认了半天才认出她来，认出来就抓住她的袖子不放，抓得指节发白。周老师抱着她坐了半宿。孩子睡沉以后，她去查了窗，查了阳台门，又把客厅里一切反光的东西挪进储物间——一面小镜子，一个相框，一只玻璃糖罐。做完这些她站在客厅中央，忽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个家教，管功课，管饭点，没有哪一本手册教过她怎么管害怕。

一连三夜。第三夜最凶，孩子指着窗户喊，窗户关得好好的，窗帘纹丝不动。

白天也不对了。先是说肚子疼，不肯去学校的期末复习周；后是洗澡反锁门，水声停了半天也不出来，家政阿姨喊两声才应，应一声，又没了动静。饭量掉了一半，爱吃的东西剩在碗里。手机也变了：以前随手放在桌面上，现在扣着放，充电器挪到了枕头底下。

周老师在观察本上记：六月五日，随堂测三十题，错九题，去年她是全对的孩子；六月七日，午睡，隔着门听她在里面小声数数，数到一百，又从一开

始；六月八日，问她还去不去夏令营，她握着笔，笔尖把本子戳出一个洞。

六月九号夜里，美佳在客厅沙发上睡着了，手机落在扶手上充电。屏幕亮了一下。

周老师本不想看。可那个头像她一眼就忘不掉：一张空白的拍立得相纸，黑框，当中灰白的一小块，什么都没有，像一块贴在聊天框上的、打了码的沉默。

对话不长。六月三日，那个账号说：营里的照片拍得不错。六月五号：照片在我手里。美佳回：你要多少钱。对方回：钱？我不要钱。再往后，美佳没有再回，对方也没有再发字，只在六月六号发过一张缩略图，蒙着马赛克，点开要密码。

周老师的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停了很久，没有点。

她把手机原样放回去，连充电线的角度都摆回原来的样子。下楼的时候她扶着楼梯扶手，手心全是汗。

那天夜里她给自己立了条规矩：可以看，不可以留；可以报，不可以审。她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她只是一个知道了一点点事情的大人。大人知道了事情，头一件事，是把它交给更扛得住的大人。

第二天中午，她给罗成峰发消息，只说要当面谈谈孩子的状态。罗成峰下午两点到家，听完，脸色变了三变。他在客厅中央站了一会儿，像一棵被人锯了一半的树，然后拿起手机，报了警。

报警之前，他先给唐穗打了电话。周老师听见他在阳台上压着嗓子说：孩子出事了，你过来一趟。那头回了几句什么，她没听清，只看见罗成峰挂了电话，肩膀松下来一半。后来她常想起那半个肩膀——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人先把一半扛走了。

下午派出所来了两位民警。受案回执是当场打印的，一式两份。做笔录的是个年轻女警，问得很细：账号，时间，原话，截图，一张一张核对。美佳的谈话由女警单独做，在所里专门的房间，罗成峰以监护人身份在门外等。周老

师隔着门玻璃看了一眼：孩子坐在小桌子那头，两只手抱着自己的胳膊，抱得很紧，女警隔着桌子，把自己的茶往孩子那边推了推。

当天夜里，唐穗又来了。进门先蹲下来，跟美佳平视，声音低得像哄一只受惊的猫。然后她带来一套洗得软软的新睡衣，陪孩子拼拼图，一千块的那种。周老师端着水果进去的时候，拼图已经拼了大半，是湖上的一只白鹭。美佳不说话，一块一块往湖面上拼。拼到最后缺一块天，两个人找遍了地毯都没有找到。唐穗安慰她说，缺一块不怕，下回它自己会出来。美佳看着那块空白，忽然说：它不会回来了。唐穗的手停了一下，把手里最后一片按进了湖里，按在了一个不对的位置上。美佳没有纠正她。

周老师端着果盘站在门口，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她教孩子改错题改了七年，头一回看见一个大人往错的地方拼，孩子不吭声。那一晚的日记她只写了一句：这个家里，懂事的人太多了。

后半夜，周老师起来倒水，看见阳台上唐穗的背影。她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背对着客厅。周老师只听清了四个字：

“按流程走。”

她端着水杯退回客厅，心口跳得厉害。倒不全是因为那四个字——是因为打这通电话的时间。夜里一点半。一个还没过门的女人，在别人的家里，替别人的孩子，在深夜调度着什么。调度得又稳，又顺。

周一报案，周二补证据，周三下午就有了结果。

来反馈的还是那位年轻女警，唐穗陪着一起上的门。民警说得很快：人在邻省一个高速服务区拦下的，三十来岁，外地口音，流窜“拍客”，后备箱里全是摄影器材，长焦镜头三支。营区外围的监控里，此人前后出现过四次。车里搜出一台拍立得相机和几盒相纸，相纸里有夏令营的孩子，大多是别的营员，其中三张是美佳的背影——营服，号码牌，食堂门口。此人对偷拍行为供认不讳，照片当场监督删除，出具了收缴清单，人依法行政拘留。威胁用的账号是一张不记名的卡，发完最后一条就停了机，落地查无此人。

反馈完了，周老师多问了一句：那个账号，查得出来是谁在用吗？

年轻女警说：卡是外面买的，实名不是本人的，落地在外省。人抓了，卡就停了。这类案子，多是图财，图不成就散了。

周老师又问：他跟那孩子，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图什么？

女警看了她一眼，说：这种人，不为什么。孩子往后少拍照。

出门的时候周老师回头看了一眼。派出所的院子里晒着几床藏蓝色的被子，一切都平平常常，平常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罗成峰在处罚决定书上签字的时候，手抖得签了两次，第二次笔画都出格了。

周老师站在旁边，替他扶着那张桌子。

她的不安是从签字之后开始长的。

她教数学，知道什么叫概率：茫茫几千里高速，一个没有名帖的外地人，七十二小时，一拦一个准。她回家搜了“拍立得”，跳出来的词条全是“怀旧”“复刻”，二手平台上要价比新的还贵。二〇二三年了，谁还拿这东西吓唬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还有那个账号，从此再也没有亮过——像一个只为这一次而生的东西，用完就熄了。

还有几件小事，她一条一条写进观察本里，写完自己看了一遍，又觉得都是小事，可笑得很。可有一条她划不掉：抓到人的那天上午，她在学校门口等美佳放学，隔着铁栅栏，看见唐阿姨站在街对面一辆深色轿车旁边，跟车里的人说了两句话，车就开走了。车窗贴着膜，看不清人。

唐阿姨不在罗家的关系图上，却在每一件事的边上。

报案的是罗先生，做笔录的是民警。可跑前跑后、端茶送水、带孩子拼拼图的，是唐阿姨。连反馈结果，都是唐阿姨陪着民警一起来的，进门前还先给民警递了一瓶水。

当晚她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

“处理得快得像剧本。可是谁写的剧本呢？”

写完她看了一遍，没有划掉。

美佳慢慢回了学校，期末考完，夜里不喊了，改成开着灯睡。家政阿姨私下跟周老师说，孩子现在只肯跟唐阿姨睡，唐阿姨不来的晚上，她能靠在沙发上靠到天亮，谁碰跟谁急。唐阿姨来的晚上，孩子八点半就睡，睡得像一块落了地的石头。

那半个月，罗成峰把公司的应酬推了三场，天天准点回家。有一晚周老师备课到十点，听见他在美佳房门外站了很久，没有进去，又下去了。第二天她看见客房的床头柜上多了一部新手机，屏幕上贴了一张纸条：美佳专线，只接一个号码。

罗成峰送周老师出门那天，在楼道里忽然站住，眼圈是红的。他说：“这世上真心待美佳的，除了我，就是她。”

周老师嗯了一声。声控灯灭了，谁也没有跺脚。

放暑假前最后一节课，美佳送了她一幅画。白纸的下缘画着一排绿草地，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牵手的两个人只有巴掌大，裙子涂得很用力；女人背后立着一个人，高出两个头，占掉了半张纸，肩膀宽宽的。

那个人没有脸。头发、衣裳、手脚都有，唯独脸的地方，是纸的白。

“这是保护我们的那个人。”美佳说。

周老师问：牵手的，是唐阿姨吗？孩子点头。她又问，背后那个是谁。

美佳把画按在胸口，想了很久：“就是保护我们的那个人。”

回去的公交上，周老师把画夹进日记本想压平，指腹擦过那片空白，才发现纸面起了毛边——像是先用铅笔画过一张脸，又用橡皮，一遍一遍，擦了很久很久。

周老师把那一页折了个角。她教了七年书，见过怕老师的孩子，怕考试的孩子，怕黑的孩子。她头一回见着，一个孩子怕一个人，又舍不得说出来，还

要把那个人画在纸上，画得比谁都高。

合上日记本之前，她把六月九号到六月十二号四天的页码抄在扉页上。做教师的都知道：考试会过去，分数会过去，有些日子不会过去。

◆

二〇二三年十月，天门，西湖边一家酒店的草坪。订婚宴设在室外，请柬上印着“茶叙”两个字，不摆香槟塔，摆一张长茶案。

请柬的名单是罗成峰亲自过的，过了三遍。十二只盖碗在长案上排成两行，嘉木茶事来的年轻店员们戴着白手套司茶，温杯的手势整齐得像一个人。草坪尽头就是西湖，风把水汽一阵一阵送上来。湖对岸，茶经楼立在天色里，九层，飞檐，像一枚竖起来的印章。

场地是他定的，主题是她定的。婚庆公司先后报了三个方案，一个比一个热闹，她只提了一个要求：有茶的地方才办茶席，有水的地方才点灯。最后定下这张草坪，西湖的水汽漫上来，茶席不用加湿，茶汤自己就活。对接的策划是个小伙子，前后跑了三趟，回去跟同事说：这位准新娘不试花，不选纱，只问了一句——草坪的灯，九点能不能准时关？

亲友四点入席。罗家的人到得齐：二叔，姑妈，表嫂，还有几个一年见不了一回的远房。二叔的保温杯是新的，茶垢是旧的。

开席之前，亲戚们聚在草坪边上说话，声音都不高，可罗成峰一句一句全听见了。这也是他的本事，做了半辈子项目，谈判桌上练出来的耳朵。

二叔端着保温杯：“茶商的女儿。”

姑妈的声音压得更低：“抱来的。”

表嫂笑出声，又赶紧捂住：“还离过一回。”

罗成峰端着杯子走过去，站定，把三个人的眼睛挨个看了一遍。

“她把一座楼的故事做成了产业，你们哪个做得到？”

草坪上安静了几秒。远处喷泉的水声忽然显得很大。二叔拧上保温杯盖，说了句菜不错，把话岔开了。表嫂低头去看手机，屏幕亮着，没有内容。

这是罗家的规矩：话不投机，就吃菜。冷盘上了八个，热炒上了四个，还有一道湖里的鱼。二叔吃了三筷子鱼，把鱼刺在碟边码成一排，码得整整齐齐——罗家的男人，嘴上不服的时候，手上都要讲个整齐。

罗成峰把杯子里的茶喝干，回头给三个长辈一人斟了一盏。茶是司茶的姑娘们下午现沏的，老白茶，性子软。二叔端起来闻了闻，没说话，喝了。老一辈的嘴，往往就服一盏茶。姑妈接杯子的时候，捏的是杯底，不是杯身。这个细节罗成峰看见了，没有说破——挑刺的人，手总是比嘴诚实。

仪式五点开始。交换戒指的时候，戒指戴上去，不松不紧。她的手很稳，稳得让罗成峰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谈合作，合同上的数字她也是这样，看一眼，点头，落笔。草坪东侧第七把椅子空着，椅背上系了一束白菊——那是他给亡妻留的位置，这是他跟自己的交代。她经过那把椅子的时候，脚步慢了半步，微微颔首，像跟谁打了招呼，然后继续往前走。后来婚庆的快剪里保留了这半秒。罗成峰看过很多遍，每一遍都对自己说：这是教养。教养这两个字，他把前半生都托付给了它——他相信教养，就像相信混凝土的标号。

乐队奏的是《茉莉花》的变调。她听着曲子，目光越过人群，落在很远的湖面上，像在看一场只有她看得见的烟花。曲子完了，她的目光收回来，正好赶上跟他交换戒指。

美佳穿着小礼服，捧着茶盘，走得很认真。

罗成峰的致辞很短。他说自己前半辈子修路架桥，拆的多，建的少；遇见她以后，才学会一件事——有些东西不能拆，只能守。台下鼓掌，二叔也鼓了，鼓得比谁都响。她站在他旁边，向台下四面各欠了一次身，幅度一样，不多不少。

上到第三道茶点，美佳拽了拽穗的衣角，把她拉低。孩子踮着脚，凑在她耳边，说得又快又轻。

周遭人声嘈杂，罗成峰还是听清了。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大人们都听见了，大人们都没听懂。二叔笑问这是什么暗号，罗成峰也笑，揉了揉美佳的头发，说是孩子的客气话。那道目光他后来又想起过一次。订婚后他带美佳去游乐园，孩子在旋转木马上忽然回头，朝同一个方向看了很久。他问看什么，孩子说，没什么。他现在才明白，孩子说的没什么，和大人的没什么，不是一个没什么。

她直起身，冲美佳笑了笑，没有说话，只把一块茶点往孩子盘子里拨了拨。

美佳没有笑。孩子的眼睛越过她的肩膀，看向草坪外面，看了很久。罗成峰顺着那道目光看过去：草坪外面是喷泉，喷泉后面是酒店的车库，车库门口停着几辆婚车，扎着红花，什么都没有。

那天下午美佳一直很乖，乖得不像她。司茶的姑娘们喜欢她，教她用茶夹，她学得快，把客人们用过的杯子一只一只夹进消毒柜，轻拿轻放，没有磕响过一只。散席前姑娘们收拾茶案，美佳跟在后面帮忙，一个人抱着一只空托盘，像抱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罗成峰远远看着，跟身边的姑妈说：这孩子跟着她，比跟着我有出息。姑妈哼了一声，没接话，往嘴里塞了一颗虾。

傍晚有一项剪彩。宴会厅门口立着“茶圣故里”文旅展板，红绸子，金剪刀，礼仪小姐托着托盘。她执剪，摄影师蹲了一地，闪光灯连成一片。

咔嚓一声，红绸落地，掌声起来。罗成峰站在人群外围鼓掌。掌声里他听见姑妈跟旁边的人咬耳朵，声音黏黏的，听不清词。他听着那阵低语，忽然想起六月里那场风波之后，也是这些亲戚，抢着往家里送东西。孩子一好，人心就齐；孩子一好，人心就开始算账。这两件事，隔了不到四个月。

剪完彩，她把金剪刀放回托盘，放之前用托盘里的绸布擦了一下剪刀柄——只擦了柄，刃没有擦。礼仪小姐愣了一下才想起来接。这个动作快得没有人留意，罗成峰留意了。当时他没有多想。宴席散前他去了趟洗手间，镜子里

的自己西装笔挺，鬓角的白头发比去年多。他对着镜子理领结，理了很久。领结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他还没有词汇。

九点整，湖对岸茶经楼的景观灯按时熄了。楼暗下去，像一座忽然合上的黑色塔印。草坪上的灯还亮着，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 · ·

夜里十点，婚庆公司把当天的素材链接发了过来，附言说快剪明早给，先请二位过目。

罗成峰在客房的笔记本电脑上一段一段看过去。婚礼航拍，草坪全景，敬茶，切茶点，交换戒指。

敬茶那段里，美佳给她鞠躬，她伸手扶孩子的手腕，教她端杯：虎口朝前，小指压着托。慢放里，孩子的梨涡露出来，又收回去。这一段他看了两遍，看的是美佳——孩子这一个夏天瘦掉的那点分量，正在一寸一寸长回来。

然后才是剪彩那一段。他把进度条拖回去，又看了一遍。

金剪刀举起来的那个瞬间，她的手腕放得很平，剪刃斜垂，落下去之前，有一个极短极短的停顿。

他莫名想起一部老电影。刽子手举刀之前，也有这样一个停顿——刀要先让所有人看清，它是举着的。

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他把进度条再拖回去，放大了看：剪刀是塑料镀金的道具，刃是钝的，绸子断开的那声脆响是后期配的音效。红绸落地，花瓣飞起来，满屏的喜庆，喜庆得挑不出一根刺。

素材里的时间戳，比他记忆里的节奏慢了半拍。婚庆的机位多，角度多，同一场宴席，剪出来竟像另一场——更亮，更满，更没有缝隙。他忽然想，多年以后，这就是他们两个人唯一的影像了：一场剪辑过的、不透风的团圆。想到这里他把后半句掐掉了。有些话在脑子里过一遍就够了，说出来就成了判词。他现在还不想给她下判词——他们是快要成亲的人。

他告诉自己：道具就是道具。

他关了电脑。过一会儿又打开，把剪彩那一段素材单独存了一份，存进一个名叫“工作”的文件夹。为什么存，他没有细想。有的念头不能细想，细想了就要生根。

十二点，他上了顶楼天台，抽了一支烟。湖对岸什么灯都没有了，只有茶经楼的轮廓压在水上，比白天矮，也比白天重。烟抽到一半他掐了。医生让他戒，他戒了十年，只有搁着事的时候才摸打火机。

天台上能看见酒店后院。后院有一盏灯还亮着，她的车停在那盏灯底下，车头朝着出口的方向。他记得今天她自己是开的车。车头朝外，是随时能走的人的停法。他把这个发现，跟烟头一起摁灭了。

十点半，他下楼，想去帮她一起收拾。

宴会散场是九点半，客人走尽，草坪上只剩服务生在拆灯架。她换回了自己的衣裳，在长茶案那头弯着腰收杯子。

他往旋转门走，第一次回头，她在收杯子，每只盖碗倒扣进托盘，托盘码得整整齐齐，像列队。

第二次回头，是他在门口跟酒店经理道谢。隔着一草坪的灯，她还在收杯子，动作不快，一下是一下，杯底的余茶倒进一只小桶，一滴不洒。

第三次回头，人已经走进旋转门了。玻璃反着光，她的影子还留在茶案那头，不慌不忙，把最后一只杯子扣进最后一只托盘。

后来他才明白，她不是在收杯子，是在确认所有人都走了。

大堂里，婚庆的姑娘还在加班剪片，抬头喊了声罗总，问他成片要不要加金句字幕。他说不要字幕。姑娘说那就留白。他说，留白好，留白像茶。回程的车上他给她发消息，让她早点休息。回复来得很快，礼貌，得体，像盖章。他盯着屏幕看了一路，忽然希望自己问的，是一个不需要盖章的问题。

◆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一日，天门，鸿渐路。奶茶店十点开门，龚一凡九点五十就到了，坐在门口的老青石台阶上等。

台阶是老物件，边缘有一道独轮车压出来的浅槽，被几十年的鞋底磨得发亮。铺面翻修过三回，台阶没舍得换——老板娘说，老东西压着门面，日子稳。

龚一凡做城市记忆短视频六年，账号叫“竟陵旧事”，粉丝小二十万，最火的一条是茶经楼封顶那天拍的。这条线索他追了三年。三年前他在养老院采访过齐守拙，老先生的一句话他记到今天：一个把纸剪进了楼里，一个把纸剪进了夜里。当时他不懂，只觉得这句话像一枚钉子，钉在脑子里，拔不出来。

三年里他顺着那枚钉子往外拔东西。养老院的采访他去了四回，齐守拙给他看过样册——一册剪纸的底样，纸页间夹着几十年的碎屑。老人翻到某一页的时候，手停了一下，说这一页不展。他没看清那一页是什么，只记得纸的颜色比别的页深，黄得发沉，像被很多只手摸过。

他还跑过三个镇，访过七户老街坊，录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音。视频做了十几期，粉丝爱看老街旧铺，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在找什么。他的账号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摆旧事，不下结论。有粉丝在评论区骂他吊胃口，他回：老城的旧账，急不得，急了就错。这条回复被顶到了最上面。顶它的人不知道，吊胃口的人自己，天天被胃口吊着。

后来他就开始画那个三角。

他要访的人在这家奶茶店后厨帮工，姓秦，七十三岁，耳朵背，嗓门大，五十年前在松风茶行打过包。奶茶店老板娘是他的粉丝，一口答应，还提前给秦婆婆递了话：就是聊聊天，不带货。

秦婆婆拎着炸串的夹子出来，围裙都没解，话东一句西一句，说到茶行，节奏就慢了下来。

“松风茶行，沈老板的铺子。前头卖茶，后头放账——谁家急用钱，拿茶饼来压，到期不赎，茶饼就归他。跟当铺一个路数。铺子里常年一股陈茶味，

隔着一条街都闻得见。”

“二〇〇五年冬天出的事。人在西湖边自家仓库里没的，铺面钉了封条，木头封条，白纸黑字，第二年就注销了。”

“现场留了张剪纸，黄纸的，剪的两个童子捧茶。街上传了好些年，说是双童奉茶，说是天意，说是报应。”

“老板就一个独子，出事那年十一二岁，文文气气一个伢——哦，一个娃儿。后来跟着他妈改嫁走了，再没回来过。”

秦婆婆又说，那女人是续弦进的门，进门的时候街坊都去看过，说女人带个半大孩子，孩子瘦，站她后头，半张脸藏在门框后面。

“再后来呢？”龚一凡问。

“再后来，茶行倒了，女人改嫁，听讲嫁的是跑运输的。娃儿跟她走了。打那以后，这条街就再没有人提松风两个字。你今天不问，我都想不起来我在这打过包。”

龚一凡把录音笔往她那边推了推，凑近了问：“他叫什么，您还有印象吗？”

秦婆婆想了半天，夹子在手里转了两圈：“小名好像带个木字……哎，记不清喽。那时候我眼睛就不行了，只记得那伢——那娃儿挑茶拣得比大人都匀。”

中午他在店里吃了个锅盔，就着柠檬水，把上午的录音听了两遍。两遍听下来，他把秦婆婆的话拆成七个信息点，记进手机备忘录：茶行，放账，封条，剪纸，独子，改嫁，消失。第七个点他标了星。做旧闻的人都知道，前六个点满街都是，第七个点，是山洞口。下午他去了市场监管局的档案室，调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底档。管理档案的大姐先要他登记，再要他说明用途，最后趴在柜台上跟他一起看。登记卡就一页纸：松风茶行，一九九六年开业，二〇〇六年注销。注销原因一栏四个字：经营者死亡。

钢笔字，蓝黑墨水，洇了一小点。

他把登记卡拍了照，关掉闪光灯。档案室很静，静得能听见除湿机的喘气。他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像一座桥：一头是二〇二三年，一头是二〇〇五年，中间隔着十七年的灰。

大姐说，这种卡库里有几千张，你怎么单单调这张？他说，我拍视频。大姐说，哦，竟陵旧事，我看过你。

大姐给他找纸箱的时候说，你们做视频的，翻这些老黄历干什么，多拍拍新楼。龚一凡说，新楼年年有，老黄历翻一页少一页。大姐想了想，把他的登记表收进抽屉，临走多送了他一支铅笔。

真正的东西是晚上到的。他在报社的数字报库里泡到闭馆，一页一页往回翻，翻到了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的《天门日报》。中缝，声明公告栏，夹在寻人寻物和遗失登报中间，火柴盒大的一块——

放弃继承声明。正文很短：沈松庭之子沈嘉木，自愿无条件放弃对其父名下全部遗产之继承，永不反悔。落款有签名，有手印，有公证处的骑缝章。日期是十二月九日。

那一年十一月，沈松庭的遗孀病故。十二月，儿子登报放弃继承。遗产没人要，公证处把最后一道门也关上了。

放弃继承。他念了三遍。活人才需要放弃，死人的继承是自动的。这四个字像一份公开的讣告，只不过死的是名字，不是人。

龚一凡把那一版报纸打印出来，用红笔把三个字圈住：沈嘉木。

回到出租屋，他站在白板前面。三角他画了七年：顶点是死者沈松庭，左下角是那张剪纸，右下角一直空着。七年里他补过很多东西——茶行的账目，柳家的改嫁，齐家样册的下落，唐家收养的日子——右下角始终空着，像一颗掉了的牙，舌头总忍不住去舔。

他把马克笔的帽咬在嘴里，在右下角一笔一画写下三个字。

写完，扣上笔帽，退后两步，看了很久。

十一年。这个孩子从登记册上蒸发，蒸发得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他托老同学——在中学管档案的——旁敲侧击问过一句，答复只有一行：零六年学籍迁出，迁往学校那一栏，空的。

学籍迁出，查无此人。一个被放弃的孩子，最后连自己都放弃了自己。

他想起二〇二〇年春天，他戴着口罩拍过一座空城。西湖路上所有店都关着，只有那间茶行旧址上的铺面卷帘门拉得严丝合缝，门缝里探不出一粒光。后来解封了，铺子一间间亮起来，那间店也开了，日子过成了规矩。

空城他都拍过。人心的空城他拍不了，那不是机器拍得出来的。

空城那组视频里，播放最高的一条评论只有一句话：楼是空的，账是满的。他当时没看懂，点进那个账号，对方只发过这一条评论，头像是灰的，注册日期就在视频发出后第二天。他把这条评论截了图，存进了“问过的人”。

晚上十点，他整理素材，顺手又核了一遍那个日子：西湖路的嘉木茶事，每年十一月十八日拉下卷帘门，歇业一天。七年，没有破过例。有顾客在网上留言问过，店里回复两个字：盘点。再问，就没有人回了。

二十年前的一个日子，二十年后的店规。

他把七年里每一年的同城热榜翻了一遍。没有一条提到这间店。一座城在每年同一天少做一天的生意，没有人发觉，连算法都没有发觉。这种安静，不是歇业，是守灵。

他给这条线索起了个代号，写在计划本的扉页上：灯芯。理由他想了半天，最后写：谁家有灯，谁家就有人；谁家的灯二十年不灭，谁家就有守夜的人。守夜的人不一定是凶手——但守夜的人，知道凶手睡在哪间房。

十一点半，他新建了一个文档，文件名叫“终章”。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打：

“二十年前的剪纸，二十年的封仓日，一个蒸发的人，一个发光的人。他们把祭日过成店规，把名字穿在身上。我只是不明白：一个是仇人之后，一个是仇人的猎物，怎么会变成同一个人？”

他把文档从头读了一遍。读到最后，光标在问号后面一跳一跳，像在等一个答案。

他起身接了杯水，站在窗前喝。夜里的文创园只剩塔吊的灯，红一下，红一下，不紧不慢，像给这座城的旧账打着重音。回到桌前，他在文档开头补了一个标题栏。标题空着——他想好了，标题等二〇二五年再起，起早了，就旧了。

存档之前，他把“终章”两个字删了，改成“答案”。想了想，又改回“终章”。答案是可以提前知道的，终章不行——终章要等人齐了才能念。他把打印稿又读了一遍，读到最后一句，把“怎么会”三个字圈了出来。怎么会变成同一个人。这个问题他答不了，他只负责把问号举起来，举给二〇二五年看。

他给文档加了最后一行小字：发布时间，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年，一天不早，一天不晚。

文档存进加密盘，又打印了一份，锁进抽屉。铜挂锁咔哒一声，钥匙扔进铁皮铅笔盒，和曲别针响成一片。

关灯前，他看了一眼桌角的拍摄计划本。周三夜里那栏写着：文创园，塔吊，试新到的无人机夜航。无人机是上个月咬牙买的，两千八，为了拍一组城市天际线。他在“备件”一栏记着：备用电池两块，存储卡两张。写完他又把“备件”划掉，改成“必带”。做视频六年，他丢过三张存储卡，从此只信一个理：机器会坏，人会偷懒，只有清单不会。

窗外远处，文创园工地的塔吊亮着航空障碍灯，一红一红的，像有人蹲在上头抽烟。

他没能等到二〇二五年。

◆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四日，凌晨四点半，天门市人民医院。龚小凡冲进急诊通道的时候，白布已经盖好了。

电话是工地的值班门卫打来的。门卫在她哥哥的钱包里翻出一张卡片，卡片上是她自己的字：紧急联系人，龚小凡。

她后来总想这件事。哥哥连钱包里都替她想好了，就是没想过自己。

门卫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比她还哆嗦，翻来覆去只有一句：我巡夜听见响动就跑过去了，跑过去就……他说不下去，蹲在急诊走廊的墙根，把脸埋进两只手里。小凡在他旁边站着，没有哭。她后来跟人说起那一晚，说眼泪这个东西认床，换了个地方，就出不来。

后面三天她都是这么过来的：该签字签字，该排队排队，该磕头磕头。别人哭的时候她扶人，别人扶她的时候她道谢。到了第五天夜里，她一个人在哥哥的出租屋里整理硬盘，整理着整理着，抱着膝盖在地板上坐到天亮。天亮以后眼睛肿得像桃，她对着镜子笑了笑，肿着，也像在笑。

她掀开白布一角，看了一眼，放下了。三十八岁的人，脸上有灰，像小时候在工地疯玩回来，蹲在门口等着一顿骂。父母走得早，是哥哥把她带大的。带大的意思是：她小学的家长会他去过，她大学的学费他挣过，她出嫁那年他哭得比爸还难看。现在轮到她来认他了。

从急诊到太平间的路不长，她是数着地砖走完的。九十七块半，半块是门槛。这半块她记了很多年，比结论文本上任何一个字都记得牢。

太平间的管理员让她签字，笔递过来，她才发现自己的字跟哥哥的很像，瘦，往右上方挑。她签完看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学哥哥写字的人。

天亮以后，是警察的时间。

她做了三回笔录，见了三拨警察。事实拼起来是这样：哥哥深夜独自去文创园在建工地采风，从塔吊的爬梯攀了上去，在三十多米的高处坠落。发现时间是凌晨一点二十，门卫巡夜听见的响动。

塔吊爬梯装着防坠器，安全钩呈开启状态。警方的解释是：通过爬梯休息平台时需要解开挂钩，此刻防坠保护是断开的。深夜，独行，攀高，失手——现场没有搏斗痕迹，衣物完整，钱包、车钥匙都在。手机不在身上，也不在现场周边。警方沿路打着手电找了两天，调了三个路口的监控，没有找到拾获的人。

结论往“意外”上落。

第三回笔录，警官问她：你哥最近有没有反常。

她想了想，说有。哥哥十月底退了两个商单，钱不少，退的时候没有解释。哥哥还把阁楼的杂物间收拾了出来，装了一扇新锁，她以为他要租出去。

警官又问：有没有买过保险。

有。三年前买的意外险，受益人写的是她。警官把这一条记下了。小凡看着他记，忽然明白这一条是往哪个方向记的。她说：“警官，我哥要是想给我留钱，犯不着用命。他给别人留后路留了一辈子，钱包里那张紧急联系人的卡，就是我。”

警官的笔停了停，把这一条也记下了。

临走她问警官：安全钩开着，你们查过开钩的人吗？警官说：塔吊夜里没有值班司机，钩是攀爬的人自己开的。她说：那就是说，除了我哥，还有一个人知道他上去了。警官合上本子，说：可以这么讲。也可以讲，是他自己开的。两句话，她说不出哪一句更冷。

“我哥恐高。”小凡把哥哥的体检表拍在接待室桌上。既往病史一栏有她妈当年的字：眩晕症，恐高。“他拍城市拍了六年，所有上不去的机位，都是无人机飞上去的。他在家换灯泡都让我扶梯子。你们告诉我，他自己爬了三十多米？”

接待的警官很年轻，笔在本子上停了停，说：会记录在案。

后来的结论文本里，这一条也在。恐高史三个字印得很清楚，只是排在“意外”两个字后面，像一个注脚。结论的最后一行是程序性的话：排除他人加害的可能。

排除。她把这两个字看了很多遍。她不是学法律的，可她知道，排除加害，不等于排除掉的那只手不存在。

有人劝她认了。邻居说，姑娘，人在高处出事，十有八九是意外，你哥那个性子，说不上哪天就上去了。姑妈说，别熬了，人都领回来了，闹下去有什么用。

她不吵。她把结论文本打印出来，钉在哥哥白板的旁边，每天出门看一眼。她跟自己讲：哥哥用命换的东西都在云盘里了，她要做的不是哭，是把这份东西用出去。二十周年太远，她要把它搬到眼前来。

她自己去了一趟文创园。塔吊静静地立在基坑边上，像一具被抽走声音的骨架。门卫换了人，前一个门卫请了长假。她在围挡外站了一下午，把塔吊从底到顶看了十几遍：爬梯是竖直的，每一节都有防坠器，正常人爬，要开三次钩。风从基坑里上来，带着水泥和铁锈的味道。她拍了照片，发在只有自己可见的相册里，配了一个字：问。工地的工人三三两两收工，路过她，都放慢脚步看一眼，又快步走开。出过事的地方，工人们比谁都懂忌讳。

第三天，消防中队把挂在塔吊大臂上的无人机取了下来。机身上一道刮痕，桨叶断了一支。电池早已耗干，存储卡里只有一段素材：起飞后第七分钟，风大，镜头磕在大臂上翻了过来，朝天。

之后整整一夜，画面里只有黑的天，一闪一闪的红色障碍灯，和风声。四十七分钟，什么都没有。

小凡戴着耳机听完了全程，一个字一个字地听。风声里有过一阵好像是人声的东西，反复听，是风过缆绳的呜咽。

她宁愿里面有什么。

那段风声她后来又听过几遍。有一遍她把音量开到最大，闭着眼听，听见第四十一分钟的时候，风里有一声很轻的金属响，像工具碰了一下爬梯。她把这一秒反复听了三十遍，做不出别的解释。她把这一秒单独剪出来，存进自己手机，命名的那天，是哥哥的头七。后来她又把四十七分钟的素材导成音频，设成了闹铃。每天早上六点半，风声把她叫醒。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图记得。人一舒服就想忘，她不给自己舒服的机会。

哥哥的出租屋她没有退租。房租交到年底，钥匙挂在门后，白板蒙了一块干净的布。她每周去开一次窗，给那盆半死的绿萝浇水。绿萝是哥哥直播间里摆过的，叶子朝东南。她说不上来自己在守什么——守着守着，就守成了习惯。

手机失踪，云还在。她用哥哥的电脑登进云盘——密码是她妈的生日，他十年没换过。同步的进度条走到后半夜才满。最大的一个文件夹排在最上面，名字是一行字符：2005_1118。他惯用的日期格式，下划线隔开年份和日子。

七个G，十几个子目录：报纸扫描件，访谈录音，地图标注，还有七张照片——西湖路那间店，每年十一月十八日拉下的卷帘门，一年一张，机位都一样，连门缝里探出来的那截卷帘都长得一模一样。文件夹最底下，压着那份报纸打印件的翻拍，红圈里三个字：沈嘉木。

还有一个子目录，叫“问过的人”，存着三十多段录音，每段的开头都是同一句：您好，我是竟陵旧事。她一段一段听下去，哥哥的声音从三年前一直排到三个星期前——最后一段录音的日期，是九月十日。

九月十日那段她听了三遍，三遍都停在同一处——哥哥问对方：文化宫拆迁之前，你手里那批底样，最后去了哪儿？对方没有答上来，录音在这里断了，断得干干净净，像有人掐着的。她把三十多段录音按日期排成一张表，钉在白板左上角。哥哥的习惯是钉地图，她的习惯是钉时间。表钉上墙的第一晚她就看出一件事：三年里，哥哥的提问越来越短，越来越准，像一支越削越尖

的笔。到最后，他不问是不是了，他问在哪。问在哪的人，离谜底只剩下一步，或者一堵墙。

白板就在电脑桌旁边。三角的右下角，三个字立在那里，哥哥的字瘦，笔画往右上方挑。

她伸出手指，把笔画描了一遍。指尖是凉的。

描完，她拿起桌上的马克笔，照着那三个字又描了一遍，让它们粗一点，结实一点。好像这样，人就不容易被潮气洇掉。

遗物不多，她三天就清完了：两台相机，一箱子硬盘，半柜子方便面。钱包她原样收着，那张紧急联系人的卡片，她拿去照相馆塑封了。塑封机压下去的时候，店员问她还要不要塑别的，她说不要，就这一张。出殡那天来了不少粉丝，举着手机在灵堂外录像，她一个都没拦。有人哭着喊凡哥走好，她站在门口挨个鞠躬还礼。队伍散了以后，她把手机支架收进包里，包带上挂着哥哥买的挂件，一只小小的木雕猫头鹰，眼睛是两粒黑豆。有一台相机的存储卡是满的，最后一张照片拍于九月十三日傍晚：一碗牛肉粉，筷子架在碗沿，热气糊了半幅画面。配文只有两个字：开饭。

· · ·

出殡前夜，灵堂里只剩她一个人。遗像是哥哥自己选的，汉北河老桥上回头的侧脸，逆着光，看不清表情，符合他一贯的拍法。

她给遗像上了三炷香。香插进炉里，笔直的三根。

“哥，”她说，“你等的是二十周年。我等不到那么体面了。”

香灰落下来一截。

她把“竟陵旧事”的后台登录密码改了，头像换成了那块白板的照片。然后她朝遗像鞠了一躬，弯得比灵堂里任何一个来吊唁的人都深。

灵堂顶上有一支灯管坏了，光一闪一闪的，像很远的地方，塔吊上的红灯。

◆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六日，汉口，沿江大道一家酒店的宴会厅。“嘉木茶事”秋季发布会的门票，是竺长生在公众号上抢的，茶友场，三百二十块一张。

票是半个月前抢的。推文他看了三遍，看的时候把老花镜摘了又戴。抢票要实名，他填了自己名字，一个字母都没有改。填完他坐着想了想，觉得这样也好——她要认出他，太容易了；他不打算躲在暗处看她，他想让她看见自己来看。

儿子竺小江以为他来武汉是陪老伴复查。复查排在十七号，协和的专家号，小江托了人。十五号夜里到的家，十六号一早，他说去老同事那里坐坐。小江把伞塞给他：预报有雨。

早饭是白粥和蒸蛋。老伴的病来得安静，忘人，不忘饭，一顿能吃一碗。饭桌上小江交代了两遍复查的注意事项，又问他：爸，你那个老同事住哪一片，要不要我开车送。

他说不用，汉口他熟。

小江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他认得——他审了一辈子人，认得各种藏起来的眼神，唯独儿子这一种，他到今天也拿不准，是像他，还是像他妈。

小江送他出门的时候，又把伞塞了一遍。电梯里父子俩都不说话。到了一楼，小江说，爸，你最近瘦了。他说，老了都瘦。小江说，不对，你是心事重。他拍了拍儿子的手臂，走出电梯。雨还没有下，天压得很低。

他到得早，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全场讲“时间的味道”，大屏上一片暗色的茶山，“封仓系列”四个字浮在山尖上。台下的年轻人们举着手机，屏幕的光星星点点，像另一种香火。签到处排着队，伴手礼是一只素色布袋，装着茶样和一枚书签，书签上烫银的字：时间的味道。三个直播机位架在厅

侧，红点一闪一闪。主持人在台侧压着嗓子彩排，念到“封仓系列”四个字的时候，特意放慢了一倍。

他入座的时候，邻座来了两个举着手机的主播，压低声音跟粉丝打招呼。整场发布会，主播的话比台上还多。竺长生听了一阵，听明白了：台上卖的是茶，台下卖的是急——怕慢，怕冷场，怕人走。只有台上那个人不急。她讲话像煮水，鱼目，连珠，鼓浪，一步一步来。开仓仪式抬上来一只木箱，封条是仿宣纸的，她亲手揭的，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主持人说，这箱茶压仓十六年，港仓回流，今天开仓分茶。

分茶。这个词让竺长生在椅子里坐直了一点。

茶汤分进十二只斗笠杯，端给前排的嘉宾。他坐在最后一排，闻见一点若有若无的老茶香，像雨天的旧木头。价签他没看见，只看见前排有人举着手机扫码，抢“开仓纪念饼”，一饼的数字抵得上他小半年退休金。

他旁边的年轻人扫码抢到了，转头问同伴：这个价钱，喝的是什么？同伴说，喝的是一九七几年的仓。年轻人说，那我喝的不是茶，是户口本。周围的笑声压着。竺长生没有笑。他们说的，比他们知道的更准——他们喝下去的，确实不是茶。

散场前有抽奖环节，送十饼开仓纪念饼。中奖名单念到第九个，大屏忽然卡了一下，黑了半秒，又亮起来。人群里有人惊呼，有人笑。竺长生借着那半秒的黑，把台上看清楚了：她站在光里，纹丝没动，像一杆立着的秤。

发布会最后一项，叫彩蛋。

灯暗下去，大屏亮出三个字：嘉木堂。接着是一张选址图，一个红点，落在茶经楼景区的南广场。

台下一片手机的反光。有人在低声念：南广场……那不是望湖仓那块地吗？

竺长生没有动。

他的后背慢慢沁出汗来，贴在椅背上，凉得像一块铁。十九年前封存的那个仓库，十九年后要在原地张灯结彩。他坐在这场光里，像坐在别人的心跳上。

灯亮回来，掌声像潮水。有记者站起来追问：南广场的物业，什么时候签？主持人笑着把流程递过去：敬请期待。她站在台侧，隔着人群，朝最后一排的方向看了一眼——也可能没有看，聚光灯打在人脸上，什么都看不清。

散场的人流往门口涌。一个戴耳麦的年轻姑娘逆着人流走到他面前，微微欠身：“请问是竺长生先生吗？唐老师请您后台喝茶。”

购票要实名。他看着那张年轻的脸，客气，职业，什么都不知道，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他跟她走了。

后台的墙上贴着流程表，A4纸一张一张，时间精确到分钟。姑娘一边走一边用耳麦回话：“对，嘉宾签收完了……好，B口备车。”到了条桌那头，她把两把凳子摆正，退出去的时候脚步放得很轻，像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消失的人。

条桌上还搁着一张登机牌，明早六点的航班。他扫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目的地是两个字：漳州。他不知道漳州有什么，但这两个字他记住了，像在别人家的墙上，看见一把自己家丢过的钥匙。

后台是一条长走廊，化妆间的门开着一条缝，衣架上的礼服罩着防尘袋，镜子的灯还亮着半圈。走廊尽头支了张条桌，桌上一把铁壶，一只电陶炉，一只玻璃公道杯，两只白瓷杯。窗外正在落今天的第一场雨。

她站在条桌后面，换了身便装，头发扎了起来。见他过来，她朝对面的凳子抬了抬下巴。

他坐下。

她当着他的面烫杯。滚水注进杯里，手腕一旋，水贴着杯壁走满一圈，倒进水盂，一滴不洒。注水的时候壶嘴离杯口三寸，水线细得像一根线，定点低

斟，茶叶在杯里立起来，又倒下去。出汤倒到最后一滴，壶嘴在杯沿轻轻磕了两下，磕掉挂壁的水。

然后她把杯子放到他面前。放之前，杯子在掌心里转了半圈，把花纹的正面对向他；放下之后，她退了半步，侧过身去，不以背对人。

十九年前，工人文化宫。

也是冬天。案发后的排查，他替队里去剪纸班找齐守拙了解情况。下课的钟点，孩子们从教室里涌出来，有个小姑娘落在最后，双手端着一盏茶出来，先敬先生，再敬他这个站在门口的生人。

转盏，退步，侧身。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他当年只当是谁家家教好，说了句这孩子真讲究，转身就把这事压进了卷宗的边角。十九年后，同样的转盏，隔着一张条桌，摆在他面前。

手法不认人。手法记得人。

他端起杯子，热气糊了老花镜。他喝了一口。茶是好茶。他慢慢喝完，把杯子轻轻放回桌面，杯底和桌面没有一点声音。

她先开的口。

“竺叔叔身体还好？”

“还好。”

“阿姨的病，好些了吗？”

“老样子，药不能停。”

“退休金，够用吗？”

“够用，饿不死。”

他答一句，她点一下头。电陶炉上的水响着，响得很轻。窗外的雨也落得很轻。从进门到这会儿，她没有问一句您今天怎么来了；他也一个字没有提自

己来做什么。两个人把一壶茶喝得像一场排练了很多年的戏，谁都不肯先错一个字。

水开了第二遍。她提壶，给两只杯子各续了浅浅的半盏，先他后己。续完，她把壶放回炉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桌沿，安安静静地等。电陶炉的红光映在杯壁上，映了半天，谁也没有端那半盏。

炉上的水慢慢凉下去。远处宴会厅开始撤展，桌椅拖动的声音隔着墙一阵一阵传过来。两个人的沉默不是没话说——是话太贵，谁都不肯先开口去破。茶续到第二道，滋味正好；再泡下去，就要苦了。她把壶提离了炉子。这是收席的意思。他懂了。

临走，她弯腰从条桌底下提出一只铁罐，双手递过来。

“竺叔叔，上火。”

他双手接了。指尖碰到罐底的时候，罐底的茶陷了一下，硌着一片薄薄的东西。

他没有动声色，掂了掂，是明前绿茶的分量。她叫他少喝。他点了点头。

雨下起来了，打在后台的高窗上，一声一声。她送他到走廊口，没有再往前走。他走出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条桌那头的灯还亮着，她已经转回桌前收拾杯子，两只杯子扣在一起，扣得很轻。

回程他没有赶高铁，去客运站坐了大巴，挑了靠窗的位子。车过长江大桥的时候，全车的人都在打盹。

他把铁罐拧开，手指探进茶里，摸出那片薄薄的东西。

黄纸。剪的是一个老人，坐在一把矮竹椅上，面前一盏茶。茶烟剪成三缕，一缕比一缕细，最细的那一缕，散成了几根发丝。

一个老人，一盏茶。

他把剪纸举起来，对着车窗的光看了很久。玻璃外是长江，江面上拖着一艘货轮，慢得像不动。

邻座是个回乡的贩子，编织袋里装着腊鱼，一路上打了两个电话，都是生意。车到服务区，贩子下车买了一瓶水，回来分他一颗糖，说这糖软，不费牙。他就接了。糖在嘴里慢慢化，甜得很迟，甜得很淡。

过了江，城市的灯退到身后。他闭上眼假寐，罐子搂在怀里，铁皮贴着肋骨，一路凉，凉到最后竟像有一点温。人老了才知道，凉的东西搂久了，是会骗人的。他想起自己这十九年：一只卷宗箱，一沓被退回来的报告，一场等不到立案的官司。他以为自己在暗处。原来暗处一直有人给他记着账。

他从帆布包里摸出笔记本，翻到二〇二三年这一页，写下：

“她知道我是谁。她守了这件事多久，我就守了多久。”

笔尖顿了顿，他又在下面添了半行小字：南广场，望湖仓。

大巴下桥的时候，桥身的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扫过去，像数不完的格子。他把那罐茶抱在怀里，双臂环着，像抱着一枚还没响的雷。

◆

二〇二三年十月底，天门市局刑侦支队的旧档案库搬来了新邻居——积案清理专家组，五个人，占了档案库隔壁的两间办公室。蒋阔每天上班，都要从档案库门口走过，门缝里透出来的旧纸味，和二〇〇五年他跟着师父扒开望湖茶仓那扇门时闻到的，是同一种味道。

二〇〇五年他三十岁，跟着师父进的那个仓库。他负责封存现场的纸箱和那双三十三码的鞋印模子，师父蹲在那张剪纸旁边看了半个钟头，起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案子不结，我这辈子睡不踏实。

后来案子结了，结在“流窜作案”四个字上。师父退了休，他升了职。只有那扇仓库门，在他梦里一直虚掩着。门里头的东西，他这些年见了无数次：卷宗里见过，照片里见过，证物袋里见过。唯独梦里的那扇门，他从来没有推开过。他怕推开了，里头什么都没有——空仓库比凶案现场，更让人睡不着。

材料是蒋阔送去的。

牛皮纸档案袋，不厚：五页目录复印件，三十三码童鞋石膏模的照片，红布剪刀的照片，柳文霞酒后语录的笔录复印件，二〇〇六年的并案报告，还有二十年的报纸剪贴目录。每一页他都读过一百遍，闭着眼能背。

材料来源一栏，他犹豫了一支烟的工夫，写下四个字：工作中掌握。

登记表签完，他把笔帽按了两次才按上去。

这批东西的来路，只有他知道。二〇二二年积案攻坚，师父破例让他看过一回箱子——只许看，不许动。那天师父先把厨房的窗关了，再掀开米面柜的夹层，动作轻得像给病人翻身。目录五页，工工整整，每页页脚都有师父的签名和日期，像一本不许外借的账。他当天用手机把五页全拍了下来，照片在手机里存了一年多，像一块捂着的炭。

那一年他把能调的都调了：老户籍，老学籍，茶行的进货账，西湖沿岸十年的水位记录。每一条路都走成了断头路。管涉密档案的老同事跟他喝了一顿酒，酒后说了句实话：小蒋，这种案子，缺的不是勤奋，是活口。

活口。他把这两个字带回去想了一夜。第二年，他把师父的箱子当成了活口——箱子里锁着的不是纸，是一个老人十八年的呼吸。下这个决心之前，他戒了三天烟。第四天把材料送了出去。妻子问他怎么突然戒烟，他说，攒钱。妻子问攒钱干什么，他没答。攒的不是钱，是脸——等哪天案子破了，他要拿这张脸去见师父，看师父还认不认。

他知道这叫什么。他入警第一天，师父教他的第一句话是：证据的链条，比案子金贵。他三十岁跟着师父勘查二〇〇五年的现场，师父让他负责封存石膏模，叮嘱了三遍：模子在，脚印就在。后来模子丢了，他难过了半年。现在他亲手在链条上撬开一道缝——可链条断了十八年，不断它一下，永远接不上。

专家组收了材料，看了二十天。他一天去问一次，问到第五次，组长把茶杯往桌上一放：小蒋，材料在这儿，结论在路上，你天天来，路也不会快。

专家组的五个人，两个省厅来的，三个市局的，平均年龄比他大十岁。组长是搞痕迹出身，左手缺半根小指，看材料不用老花镜。收材料那天，组长翻到石膏模照片，停了停，问：这个模子，当年丢的时候，追过责没有？他说追过，保管链断在移交环节，经手人两个亡故，一个调走。组长哦了一声，没有再问。出门的时候，组长叫住他，问了句题外话：你师父身体怎么样？他说，还好，就是记性差了。组长说，让他记性好一点，别把要紧的东西忘了地方。这句话什么意思，蒋阔想了三天。

意见书是十一月八日出来的，两页纸。前一页是结论：

“经审查，所附材料均为间接证据；无涉案人生物样本；不具立案条件。”

后一页是附注。附注的末尾，有一行钢笔字，是蒋阔自己添上去的：

“唯一能打破‘零’的是人——若沈嘉木尚在人间，请把他找到。”

意见书落款的日期下面，他用红笔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日子：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故意杀人，追诉时效二十年。倒计时，还剩两年零十天。

红箭头画完，他后退一步看这张纸，像看一张病历。病历上写的是别人的病，催的是自己的命。他把意见书锁进抽屉，钥匙挂在钥匙串最里面的一格——那一格，以前挂的是师父送他的第一枚勘查章。

等意见书的二十天里，他把二〇〇五年的卷宗又从头过了一遍，用铅笔在页边写了很多批注，写完又一张一张擦掉。擦下来的铅屑他用纸包住，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多年的习惯：想过的东西可以扔，不能留。有天夜里他妻子被他吵醒，看见他坐在客厅里翻一本旧相册。相册里有一张二〇〇五年的合影，队里年末聚餐，师父坐中间，笑得很开。他看了半宿，第二天把相册收了回去。有些照片是照片，有些照片是债。

· · ·

十一月十六日，他带着意见书去了天门，师父家。

他在楼下的水果店站了十分钟，最后只买了一兜橘子。上楼之前，他把这兜橘子在两只手里换了好几次位置——拎在左手太像送礼，拎在右手太像公事，最后夹在腋下，不伦不类地上了楼。电梯里他看了一眼怀里的意见书，纸的边角把信封顶出一个角。他把意见书抽出来重新折过，折成师父当年折目录的方向——朝左。折完他就想明白了：折角这种事，瞒得过纸，瞒不过折纸的人。他忽然不紧张了。

师娘开门，叫他小蒋。阿尔茨海默初期，有的日子认人，有的日子不认，这天认得，还嫌他瘦，要给他下碗面。师父摆摆手说中午吃过，把师娘安顿在电视机前，戏曲频道，声音开得很小。阳台上有一盆兰草，师父蹲在那儿给它松土，听完脚步声，没有回头。

师娘还是把面下了。三个人谁也没有动筷子，面坨在碗里，热气慢慢散了。师娘坐在电视机前看戏，看到热闹处回头问他们笑什么。师父说，快了，马上就好。蒋阔低下头，分不清师父说的是戏，还是别的。

他把意见书放在茶几上，站在旁边，像当年在队里交作业。

师父把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接过本子，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看得很慢。戏曲里有人拖着一个长音，拖了半分钟才落下去。

看完结论页，师父没抬头。翻到附注页，看到那行钢笔字，停了很久很久。

然后师父开口了。

“你去抄我箱子的那天，我就晓得了。”

蒋阔的血一下子涌到脸上。

“师父——”

“二〇二二年，你拍照那天，目录第三页有个折角。我的折角从来朝左。你放回去那天，折角朝右了。”

师父把老花镜摘下来，折好，压在意见书上。

“你摸着良心讲，那道缝撬得对不对，我拦没拦，有什么两样？”他看着阳台外面，天色灰白。“箱子里的东西再贵，贵不过一个活人。去查他吧——但是蒋阔，记住：查他可以，莫惊她。一惊她，证据就都成灰了。”

蒋阔弯下腰去，弯得很低，半天没有直起来。他有很多话：对不起，没法子，只剩这条路。每一句都是真的，每一句都说不出口。

“您知道他在哪儿？”他哑着嗓子问。

“要是知道，就轮不到你半夜睡不着了。”师父说。

他又问：要是我查着查着，惊着她了呢？

师父端起自己那杯凉透的茶，喝了一口，像喝一味药。

“那你就当她把东西都烧完了，从头再来。”

他说，师父，这句我记下了。师父说，别记这句。他说那记哪句。师父朝阳台抬了抬下巴：记兰草那句——土要松，水要少，太勤快的人养不活它。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在说他。

蒋阔收拾东西要走。走到门口，身后的声音叫住他。

“剪刀你带走吧。该送检了。”

师父已经进了厨房。米面柜的柜门开着，夹层的木板掀在一边。师父捧出那个红布包，稳稳地放在他两只手上。

红布洗得发白，四个角还是齐的，布上沾着两粒米。隔着布，他摸得到剪刀的轮廓：家用剪，剪尖磨得很薄。

“签收吗，师父？”

“签什么。东西是要给你办案用的，又不是给我留的。”师父把柜门合上，木板放平，抹布在柜面上擦了一把，像擦掉一段日子。

物证袋上要写提取人。他写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师父的。写师父名字的时候他停了停：师父，写您的名字，行吗？

师父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写。这个名字十八年没上过纸面了，让它上一回。”

那一行字签在物证袋上，笔画很重，透到了背面。

下楼的时候他把那兜橘子留在了茶几上。师父没有让带走，也没有说留。有些东西放在那里，就是收下了。单元门口的桂树早过了花期，他站在树下深吸了一口气，什么味道都没有，他还是站了一会儿。

蒋阔下楼，把红布包装进物证袋，封口，编号，贴上标签。每一步都按规矩来。单元灯一层一层地亮上来。

守了十九年的东西，师父亲手递了出去。

走出单元门，他回了一次头。五楼的窗户亮着，窗帘动了一下，像有人刚从窗口转身。

◆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天门。汉口“一盏楼”的牌子在腊月初摘下来，交给了大徒弟。

交楼那天徒弟们要办酒，简明堂没让。他只带走了三样东西：用了四十年的放大镜，一杆戥子，一摞复写纸。他七十五了，同行说这叫金盆洗手，他说这叫搬家。搬家的人不看老房子，看新地方。

搬家的那天早晨，他照旧第一个到，烧了最后一壶水。徒弟们要给他磕头，他摆摆手，说活着就看不得这个。大徒弟把匾擦了三遍，他说不用擦，灰也是日子。他站在街对面看了一眼那块匾——一盏楼三个字是他师父题的，笔画瘦，像三炷香。看了这一眼，他就走了，没有回头。临出门，大徒弟还喊了一句：师父，过年回来喝茶。他摆了摆手，没有应。喝茶这件事，他眼下做不到了——不是手不行，是心里那杆秤，还没有校平。

动车四十分钟到天门南，出站打车。司机一路当导游：“您知道茶经楼吧？九层楼，楼里一层对应一部《茶经》。讲解员开口第一句就是‘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讲的就是咱这座城！”

司机一路讲：讲西湖要起雾，讲锅盔要吃刚出炉的，讲沿河的房子涨了又跌。讲到最后问他：师傅您是来旅游，还是来看亲戚？

他说，来对账。

司机笑：对什么账？

他说：一笔旧账，本金三十年，利息不计复利。

司机没听懂，哈哈笑了两声，把车开得很稳。车进城的时候，雾散了一半。他看见街边有挑担子卖甘蔗的，有校门口接孩子的，有一家新开的奶茶店在装修，喇叭里放着促销。活人的声音。他这些日子听惯了死账本的声音，一时竟有点不习惯。

他这辈子给南七省的茶掌过眼，没来过茶圣故里。第一次来，是来看一座楼的。行家的坏毛病：看不懂的东西，要亲眼看。

他把上午留给了茶经楼。一楼是茶道本源殿，陆羽坐像眉目清瘦，捧盏，像在等水开。他一层一层往上走，展陈按《茶经》十章分楼布设——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每一层他都走完，不落一角。讲解员跟着他，讲到第三层的时候发现这位老先生看展签比她背得还熟，就闭了嘴，安静地跟着。

一楼的本源殿里，陆羽的生平刻在四面墙上，从竟陵孤儿写到茶经传世，字数不多，每一句都有出处。二楼陈着历代茶书的影印本，他在一册清代刻本前站了站：纸是后配的，内容是真的。三楼复原了蒸青的作坊，木甑的把手被摸得发亮——游客的手和岁月的手，摸的是同一个位置。

在“四之器”那一层，他停了最久。

风炉、鍑、碾、罗合，一比一复制的唐代茶器，恒温柜里一字排开。他在风炉前站了半个钟头。

炉身是翻模翻的，接缝有模线。可他看得出，翻模用的母范是老东西——纹饰的刀口有包浆，腿足上留着真火痕。布展的人下过本钱，也下过功夫，没有糊弄。复制的人敬着原件，原件就活在一层一层的复制品里，像香火。

碾是橘木的，罗合是竹的，规程里写得分明。讲解员说，这批复制品做完以后，馆里请了三拨老匠人来挑毛病：第一拨挑出七处，第二拨挑出两处，第三拨看了一天，只留下一句话，像。

简明堂懂这个字的分量。复制品到“像”为止，是敬意；越过“像”往下走，去做旧，去充真，那是另一门手艺。门里门外，隔着的不是手艺，是心。他见过门里的人，也见过门外的人。门外那个人做出来的东西，能让门里的人签下保密协议。说完这句话，他在肚子里笑了一声：门里的人就是他自己。七十五岁，签了字，捐了款，藏了米缸。他的师门里走出一个门外的高手，这事说出去，够同行笑十年。他不怕笑。他怕的是这门手艺传下去——手艺是种子，落进土里，就由不得人。

管理员过来提醒了两回闭楼时间。他掏出手帕，把玻璃上自己呵的雾擦掉，说了声对不住。

这座城把茶当真事在办。可偏偏，把时间造假卖钱的生意，也出在这座城。楼是真的，楼底下走的货是假的。真假挤在同一座城里，像一口锅里的生水和滚水，看着是一锅，底下分层。

他后来又上了九层的观景台。扶着栏杆把全城看了一圈：西湖，老街，汉北河的方向，一片灰白的屋顶。往南看，广场不大，围着一圈蓝色的围挡，围挡里头堆着几垛黄土。他看了一会儿，把目光收了回来。一块地被围起来的时候，和一块地被藏起来的时候，样子是一样的。下楼的时候他数了数：九层楼，他走了两个多小时。楼是二〇一二年完工的，那年他六十四，在汉口的鉴

定室里头一回听说这座楼。十二年后，他站进了楼里。有些账走得再慢，也算到了。

出楼是黄昏。冬天的喷泉干了，池底躺着几片落叶。南广场围着蓝色的围挡，喷着“景区提升工程，施工请勿靠近”，围挡缝里漏出切割机的声音，一停一顿。

保洁的电动车停在池边，车斗里码着几袋落叶。广场上游客散尽，只剩摄影爱好者在三脚架后面等天光。等天光的人不知道，黄昏的光对这座楼最不客气——逆着光，楼就成了一个影子，威严落尽，只剩轮廓。简明堂就是在这时候下的楼。他看见的茶经楼，就带着这一身轮廓。围挡外立着一块效果图，喷泉，树阵，还有一间店，只露出半角飞檐。他掀开蒙布看了一眼，又轻轻放回去。他不知道那间店将来卖什么。他只知道，把效果图蒙起来待价而沽的东西，向来不是小东西。广场边上有几个临时工在收扫具。

其中一个把竹扫帚一把一把归进铁架。右手只扶着架子，左手一压一收，尼龙扎带一勒到底，一下比一下紧。

简明堂站住了，多看了一眼。

干了一辈子鉴定的人，眼睛总是快过脑子：那双手的劲全喂在左手上，右手像副手。使剪的、使刀的、使刨子的手，才养得出这样的左手。临时工的手，不该有这样的记性。

那人直起腰，朝这边看了一眼。工地黄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脸上一半是暗的。

简明堂先移开了眼睛。陌生人对视，不看第二眼，这是老礼数。

等他再回头，人已经抱着扫帚进了围挡的缝隙，像一滴水退回了水里。

后来他在出租车上想了想，自己当时为什么站住。不是扎带，不是扫帚，是那个动作的顺序：右手扶，左手压，收，勒紧，四下。包茶饼的棉纸，四角收紧，也是这个顺序。他年轻时在茶庄学徒，看老师傅包饼，师傅说：右手是客人，左手是主人——客人只管看，主人才知道劲往哪里使。

这些话他四十年没有想起过。黄昏的天门街头，一双左手替他记了起来。他又想起那道豁口。“羡”字第三笔，月牙形，断口。刻版人当年那一下手抖，抖了十八年，一路抖到他签下保密协议的这一天。行家的眼睛躲不掉这种东西：看见了，就再也没法当没看见。

上车前他绕了一段路，从西湖路走过去。那间叫嘉木茶事的店，他听徒弟提过，说货做得漂亮。他隔着街看了一眼：橱窗里一盏灯，照着一只青花的罐，罐子旁边立着价签，数字不大不小，刚好卡在看得懂的人不问、看不懂的人不敢问的位置。店堂里没有客人。他站了一会儿，走了。

出租车上，他给大徒弟打电话。徒弟问天门好不好，楼高不高，茶香不香。

他说：“这座城的茶，香得不对。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洗过。”

徒弟在那头笑：“师父，洗过不好么？”

他没有接话，报了站名，挂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问：大爷，您是来投资的？他说不是。司机说，那您是看楼的？他说不是。司机说，那您来干什么呢？他说，来还一笔旧债。司机笑了，说这是他今天听过的最客气的说法，别人都说来要债。

回汉口的动车上，他翻开随身的笔记本，找到“千羡桩”那一条。条目还是二〇二二年十月立的，两行字，之后三年没有动过。

他在条目底下补了一行：

“货源：南方。版刻：北方刀法。东家：没见过。直觉：见过。”

写完，他合上本子。过了一站，又打开，把“见过”两个字描粗了一遍。

车窗外的灯一串一串向后跑。他把手按在笔记本的封皮上，像按着一个终于肯开口的证人。

邻座的姑娘戴着耳机看剧，屏幕的光一跳一跳映在他手背上。他想起签字那天，玻璃上那两个字的口型。对不住。他对着车窗里自己的影子动了动嘴，

无声地把这三个字还了回去：不碍事。茶要陈，账要清，人要往前走。

◆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西湖路。嘉木茶事的店堂九点打烊，仓库的灯亮到后半夜。

蓝溪把年终盘点的表格拉到最后，十二个月，一行一行往下合计。年营收第一次过了亿。她在那一栏看了三遍，没有念出声。条码枪搁在手边，电池换过一次，防潮帘升起来又放下，热风机的声音在库房角落里嗡嗡地响。

盘库的顺序她定了七年：先贵后贱，先干后潮，先近后远。礼盒区先盘，年终的团购礼盒出了三千二百盒，账实相符；临期区第二，有十一饼去年的春茶要调价，她贴了黄签；然后是老茶区，一排排棉纸的饼，灯下看过去，像一堵码起来的旧墙。老茶区有一排是老板娘亲自码的，饼与饼之间垫着棉纸，方向统一朝里。蓝溪入行头一年学码饼，怎么码都歪。老板娘说，不是手的事，是心的事：心不齐，饼不齐。她练了一个月才明白这句话不是玄学——手稳的人，心都长在手腕上。

盘到三号仓之前，她在台账上签了九个名。第十个名没有签成——三号仓B区，四个托盘，账上那一栏，从头到尾是空的。

众人喊她唐老师，蓝溪喊她老板娘。蓝溪是二〇一六年九月进店的第一名员工，工牌编号001，店规三条她记了七年：不问价值，不问来路，不问11月18日。

她的直播间叫“白鹭”，做了三年，粉丝几万，主要播开汤和审评，年度场观最好的那一场是春季头采。今晚没开播——每年最后一夜她留给盘库，这是店规之外她给自己立的唯一的私规。

台账翻到供货那一栏。

代号“CM”的供货方，七年老关系。第一批货是二〇一六年冬天到的，棉纸包的茶坯，箱子上没有寄件人，只有一枚章。七年里对方只以函件往来，从不见面，从不出席，款走对公，货走物流，准时得像节气。

蓝溪只跟对方打过一回交道。二〇一七年有一批货磕了角，她按流程发函索赔，对方的回函三天就到，措辞客气，全赔，另补了百分之五。她在回函里找过称呼，找了三遍，通篇没有“你”也没有“您”，像一个人对着空气说话，又像空气在说话。那枚章她拓过样：圆形，圈里两个字母，C，M。入行那年她问过这两个字母是什么意思，老板娘说，是个牌子。她以为是茶叶的等级。七年后她再想这两个字母，想出了三十几种可能，每一种都对不上，每一种都吓人。拓样她夹进台账的塑料膜里，跟七年的函件放在一起。函件按年份码好，一年一沓，越往后越薄——不是货少了，是对方的话越来越短。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话短有两种：一种是熟了，一种是防着。

十二月八日，对方来函：产能调整，二〇二四年度供应量减半，价格上浮。一砍就是一半，没有解释，没有缓冲，函尾连个署名都没有，还是只有那一枚章。

她拿着函件去问老板娘。老板娘正在店里对账，看完，把函件折成四折还给她，点了点头。

“要不要备一点替代的货源？”

老板娘摇头，接着对账。蓝溪回到库房，把“CM”那一栏的年度合计重新核了一遍。减掉的那一半，够三年的“封仓”出货。她拿铅笔，把这一行轻轻框了起来。

框完她想起入行头一年，带她的老库管说过一句：账上突兀的一行，不是写错了，就是有人要它在那儿。老库管去年退休回了乡下，临走把自己的旧算盘留给她。算盘她一直挂在库房门后，今晚路过，算珠轻轻响了一声。她伸手把算珠按了回去。库房静下来，只剩热风机。她忽然很想给老库管打个电话，拨到一半又挂了。乡下老人睡得早。何况这件事，说给谁听都像疯话。

· · ·

十月十六日，汉口。

秋季发布会的直播是她播的，账号挂的白鹭，在线人数峰值十四万。大屏上打出“嘉木堂”三个字的时候，弹幕把画面糊住了，她把镜头稳住，手心全是汗。选址图：茶经楼景区，南广场。

那天的机位是她自己布的，主灯偏了半度，她调了三回。峰值的那几分钟，弹幕滚得像暴雨，翻来覆去都是两个字：想要。她把镜头稳得很直。十四万人想要的东西，散场的时候，老板娘一眼都没有多看，只低头检查了桌布的四个角。彩蛋之前，主持人念过一段品牌故事，念到“把时间封进茶里”的时候，蓝溪在镜头外低头看了一眼提词器。提词器上没有这句。这句是老板娘临场自己加的。她后来在日志的页边想：一个人的话要是总比稿子准，那她心里那本稿子，不知道写了多少年。

彩蛋放完，台下有本地记者站起来问：南广场，是不是老望湖仓那块地？主持人把话筒切了。

散场后收拾物料，蓝溪蹲在后台打包。老板娘过来帮忙叠桌布，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她问了那个憋了一路的问题：南广场地价是景区最贵的，游客多，茶客少，淡旺季能差出一半——为什么是南广场？

老板娘把桌布的最后一角掖平，直起身。

“我欠这里一柱香。”

蓝溪当时以为是句漂亮话，是给品牌故事收尾用的。返程的大巴上，她在工作日志十月十六日那页记完当天的数据，把这六个字抄在了最下面，字写得比正文大。她想，老板娘偶尔也会说这样好听的话。

写完她往回翻，把十月里的排班、销量、直播场次数了一遍。数完她在这页的页脚画了一把小小的茶壶，是她记账时的旧习惯：凡是想不明白又不能问

的话，就画一把壶，壶嘴朝着谁，问号就压给谁。这把壶的壶嘴，朝着窗外。窗外是汉口的江，江水往东，她的家往西。

车到天门是夜里十一点。她在站前广场站了一会儿才打车。县城的夜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湖水拍岸。她想起老板娘那六个字，头一回试着琢磨字面上的意思：欠一柱香，就是有一桩事没有交代。她不敢想那桩事是什么。

· · ·

后半夜两点，她盘到三号仓。

三号仓在库房最里头。B区的四个托盘是老板娘亲自安排的：不入账，不盘点，不动。托盘上码着没有贴标的茶饼，棉纸的颜色深深浅浅，像一摞摞旧信封。

今晚，B区空了。

地上留着四个方方正正的托盘印，印子边上的灰一动没动，印子里的地坪却是干净的。叉车胎的印子从B区一路碾到卷帘门，胎纹很新。门禁系统里，三十日夜里十一点四十六分有一次出场记录，没有对应的进场。后门的摄像头十月份就坏了，报修单还压在物业那里，打过两次催，都说年后安排。

她先把台账翻回去查了三遍，又把B区的四个仓位号一个个念出来，像点名。没有人应。

她绕到库房后巷。巷子里没有雪，只有风，风把一只塑料袋吹得贴在墙上。她抬头看后门上方的摄像头，外壳蒙着灰，镜头上停着一只不肯走的蛾子。她拍了一张照片。回库房的路上她给物业打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凌晨两点半，没有人接才是对的。

回到B区，她做了一件七年来没有做过的事：伸手把叉车钥匙从挂钩上取下来，看了一眼电量。电量掉了两格。叉车停在老位置，车头朝外，摆得整整齐齐。

用车的人，把车擦了。她把钥匙挂回挂钩，挂了两次才挂上。手抖这种事，七年里她只在两种时候有过：盘出大金额差错的时候，和现在。前一种丢的是钱。后一种丢的是什么，她还没敢命名。

蓝溪站在空出来的仓位前面，手里的盘点枪嘀了一声，屏幕上跳着四个字：无待盘项。

她在那里站了很久。仓库的顶灯很亮，亮得人影发白。

她头一回对老板娘生出害怕来——不是怕她做什么，是怕她已经做了什么，而自己帮着搬过。

B区那些没有标签的茶饼，去年春天人手紧，是她开着叉车从货运车上卸下来码进去的。棉纸的霉味蹭了满袖子。她当时想的只有四个字：店规第二条。不问来路。

卸货那天很冷，货运车迟到了三个钟头，老板娘站在雨棚下等，伞都没有打。车来了，驾驶员没有下车，帆布掀开，托盘推下来，单子递出来，车就走了。老板娘从头到尾没有问一句货是谁的。蓝溪当时想，老板娘真是镇定。今晚她换了一个词：熟练。

盘完最后一个仓，她在台账最后一页写盘点小结。笔落到“异常项”三个字上，停住了。写异常，明天就要走流程，就要问，就要惊动。写正常，就是她一个人替这间库房守了密。笔尖悬了很久，在纸上洇出一个墨点。

面试那天，老板娘只问过她一句话：怕不怕麻烦？她答不怕。七年了，她一直以为麻烦就是活多，货重，账细。她今晚才知道，麻烦可以是别的样子。后半夜三点，库房的热风机停了一次，又响起来。她给值班的保安发消息，说三号仓盘库到天亮，让后门留个人。发完她盯着屏幕，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三十号夜里搬家的人，保安看见了吗？她把这条消息删了，重新打了一条，只问排班。问法变了，说明胆子还在。

回到店堂，她把工作日志翻开，准备写二〇二三年的最后一页。

翻页的时候，十月十六日那一页从指间过去，又被她翻了回来。

最下面那六个字还在，是她自己的笔迹：我欠这里一柱香。

当时她以为，那不过是一句漂亮话。

很多年后她才知道，这一页纸会被人从日志里裁下来，编号，复印，装订进一册卷宗，印在扉页上作引语。经手的警官在旁边批注，只有四个字：原话照录。

而这一天夜里，蓝溪只是把这一页压平，翻过去，在新的一页写下二〇二三年最后一行：

年终盘点，一切正常。

写完她把笔帽扣上，又拔开，把“正常”两个字描了一遍。描完她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下一半，站在门缝里，看了很久的雾。

窗外，西湖上起了雾。茶经楼的灯九点就熄了，黑沉沉地立在雾里，像一炷还没有点燃的香。

第十一章　焙火

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五十，深圳。

台风前脚刚走，华强北的低洼处还积着水，档口的灯牌泡在水里，红一块绿一块。蒋阔站在赛格广场侧巷口，耳机里，指挥部的声音干了二十个小时，终于吐出两个字。

收网。

三天前的作战会开在省厅指挥中心，任务卡一人一张，三省五地共用一个时间戳。会上翻来覆去只交代一句话：人要抓活的，链子要从尾捋到头，捋断哪一节，责任算在哪一节。散会的时候，带队的支队长把烟掐了，说了句：这条链子养了十年，肥得很，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

蒋阔的任务卡很简单：随队，观察，记录。他在这张卡上看到的不是活儿，是一个十九年没合上过的卷宗在朝他招手。

行动代号“溯洄”，部督集群战役。同一分钟，福建、广东、湖北三省同步动手，收的是一条横了十年的假老茶链：漳州做旧，深圳中转，账面上流转十年，再往上游去，只剩一个代号——CM。

蒋阔不是主办。链条最末梢那家品牌店，注册在湖北天门西湖路，他是销售地来的属地刑警。主办单位客气，给他留了个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说，跟着学卷。

五点整，液压钳剪断挂锁，卷闸门哗啦啦卷上去，仓库顶灯亮起来。纸箱码到梁下，撬开，上层是茶饼，棉纸做旧，酸味冲鼻；下层垫着旧光碟，塑膜都脆了，一水儿十年前的货。

尹彦睡在档口阁楼上。灯亮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坐起来了，三十八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半，白得很突兀。

他没有跑，也没有碰门。手铐合拢的时候，他偏过头，朝里屋那台旧冰箱看了一眼，喉结动了动，什么也没说。

档口里间还有一道木梯，通着阁楼。楼梯窄得只容一人侧身，上面一小间：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折叠椅。桌上没有电脑，只有一只铁皮饼干盒，盒里几十张电话卡，每一张都从中间掰断过，断口整整齐齐，像用尺子比着掰的。抽屉里的现金少得可笑，两千出头，没有一张欠条，没有一本票据。

带队民警说了句怪话：这哪像做了十年生意的窝点，像个修行的地方。

蒋阔蹲在饼干盒前数了一遍。四十七张卡。一个人要是存心把自己从世界上抹掉，抹到这个份上，抹的就不是一个电话号码，是一整条命来路。

清点拉了两个钟头的单子。茶饼、包装棉纸、三台封口机、两台打码机。蒋阔蹲在光碟堆前翻了翻，纸箱侧板上有铅笔写的年份，一年一格，从二〇一二排到二〇二四，笔画很轻，排列很齐。

“码得跟切片面包似的。”主办民警笑了一声。

蒋阔没笑。那排铅笔字像有人按年份腌的一坛菜。十二年，一年不落。

他让登记的民警把年份逐一抄进清单。抄到二〇二四，格子是空的，今年那一格只有一层薄灰。

清点完，货拉去暂扣库。过查验区，一箱茶饼摔了角，滚出来一饼，棉纸黄得沉着。取样的人说，光这张纸就够查一阵：老纸上做新霉，霉斑是茶汤一遍一遍刷出来的。

蒋阔把那饼茶掂了掂。四百克，压得再实，也不过是树叶子。可就是这些树叶子，十年里把多少人的血汗钱，变成了别人的厂房和楼。他想起师父说过的一句话：茶是干净的，不干净的是人给它编的岁数。

九点，第二拨人持搜查证进了城南的握手楼。见证人到位，执法记录仪开机，扣押清单一式三份。屋子干净得过分：没有照片，没有信，没有一件多余的家什，墙上连钉子眼都用牙膏补平了。

邻居扒在门缝上嘀咕，说这人住了七年，没吵过一回楼，垃圾都掐着点丢。屋里能带走的东西少得反常：几件换洗衣裳，一口锅，半袋米。米缸见了底，缸底压着一张超市小票，日期是八月二十七日——收网前一天，他还下楼买过一趟米。

要跑的人，不买米。蒋阔把这张小票看了几秒。这个人不是没想过跑，是笃定自己不用跑。

冰箱立在墙角。冷藏层几乎空着，只有半瓶开了封的腐乳。冷冻层结着白霜。

技术员小桂戴着手套，起出一只牛皮纸信封。信封冻得梆硬，磕在桌沿上像磕一块砖。尹彦站在客厅中央，眼睛跟着那只信封走，从冰箱到证物袋，一步没挪。

按程序问他冷冻层里有什么。他答：一样东西。问什么东西，他说：你们看了就知道，是别人托管的。托管两个字，他说得像在念房契。

信封里两样东西。一把棉纸包着的小剪刀，尖头，刃口磨得发亮，木柄上有经年的包浆。半页手抄的《茶经》，老纸，黄得沉着，字瘦而直，只抄了一句——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包剪刀的棉纸是十字折，老药铺包药的手法，折角对齐，棉线绕了两道，打的结是外科结。剪刀通身没有一点锈，刃口新磨过，磨石留下的细纹一圈套一圈，细得像树的年轮。谁会给一把剪刀磨出这么齐整的纹路，又把它冻进冰里？

小桂把半页纸对着光看。纸的背面有极淡的铅笔印子，横横竖竖，像垫在底下剪过什么。

床底起出一只铁皮盒，盒里一本账本。牛皮纸封面，麻线装订，纸边起毛。第一页四行字，笔画压得很深：

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每年11月18停工。

“这哪是账。”小桂咂了咂嘴，“行为艺术般的流水。”

账本里的日子全用数字，货名用代码，金额精确到角。蒋阔借了一支红笔，把写有11.18的行一行一行圈出来。圈到后半夜，数了一遍：十四处。十二个年度条目，首页规矩里一处，还有二〇一四年那年多出来的一小行——补记。

每个年度条目后面，都缀着同一笔：500，封仓。

除此之外，整本账上再没有一个大写的人名。

· · ·

提审在漳州，押回去的第三天。同一夜，漳州那头也动了手，收上来的仓是座空仓，人走了，炉膛还是温的。这话是交接的民警说的，蒋阔记在了本子上。

审讯室的空调滴水，底下接了一只矿泉水瓶。尹彦坐得很直，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像等着听一堂很长的课。

他的档案蒋阔头天夜里看了三遍。湖北人，早年随亲戚南下，华强北闯了半辈子，未婚，无房，名下一辆旧面包车。登记照片上的人笑得有点憨，隔着格子衫都看得出是个好脾气。

好脾气的人，把一条脏了十年的链子管得井井有条。这两件事摆在一起，本身就是案子。

盗版的事实他认得干干净净。哪年进货，哪年出货，流水多少，一笔一笔，报得比账本还齐。认罪认罚意向书签得也快，签完自己把纸角抚平了。

散场的年轻民警在走廊里嘀咕，说这人爽快得不像话。带他的老民警哼了一声：越爽快的越要留神。假账好查，真心难查。你看他签字的手，一点都没

抖。

涉嫌侵犯著作权，涉嫌销售伪劣产品。办案民警一条一条过，他一条一条点头。

问到假茶，他认。

问到上线，他停了。

“电话卡。”他说，“一个月一换。号码是别人打来的，我没见过人。”

“卡呢？”

“用完就掰，掰碎了冲进下水道。规矩。”

“谁定的规矩？”

尹彦把嘴闭上了。再往下问，他就讲光碟，讲茶，讲报关，一环一环讲得极细，细得像故意搅浑一缸水。唯独绕开那两个字的上头。

下午又提了一场，讲的是二〇一五年，讲他怎么从光碟转到茶上。说是那年阿木让他去漳州看仓，他以为是正经茶叶生意，去了才知道是做旧的营生。他扭头就走，在深圳躲了半年，末了还是回去了。

“为什么回去？”主办民警问。

“欠了情。”尹彦说，“有一年我进医院，阑尾炎，夜里开的刀。醒来窗台上一袋洗好的橙子，削好的，泡在盐水里，没人认账。我在那行里滚了半辈子，就认这一回情。”

蒋阔在旁边做记录，笔尖顿了一下。他见过太多把软处包起来的，少见这样把软处亮出来给人看的。亮软处的人，往往是在告诉你：他不是不怕，他是比怕更深的东西拴着。

“后来呢？”

“后来橙子吃完了，账接着记。”尹彦说，“一年一年记，记到你们来。”

半页手抄的照片摆到他面前。他看了足有一分钟，肩膀慢慢塌下去一截。

“纸是人家存我这儿的。”他说，“交代过，冻着，别开。”

“存了几年？”

“记不清了。反正在冰箱里的年头，比我租这屋子的年头长。”

笔录打出来，他一页一页看完，签在指定位置，指印按得又圆又实。按完最后一个，他忽然抬头问了一句：“你们天门来的？”

蒋阔没接。

“口音像。”尹彦自己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提审结束，他在笔录末页又停了一次笔，问能不能加一条。办案民警说讲。

“档口那些老光碟，别当垃圾处理。”他说，“有几张绝版了，是正经东西。”

民警说，都这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个。

“东西是东西。”尹彦说，“我认罪，是我卖了假的。可里头有几张是真的。真的东西，不该跟着陪葬。”

蒋阔把这句记进工作手记，笔按得很重。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在分真假。他忽然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能在那条链子里活十二年——他把货的真假分得那么清，唯独没分清自己守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散场已是后半夜。办案点走廊的声控灯坏了半排，蒋阔一路走，灯一路灭。回到房间，他把账本从证物袋里请出来，从最后一页往前翻。

账是拿圆珠笔记的，一笔是一笔，字不大，笔画深。有的年份只有一行：雨，停工。有的年份长些：雨。阿彦病。停工。五百，封仓。二〇一六年那一条多了三个字：迁仓。像怕日子把自己忘了，每一年都来点个卯。翻到二〇一四年那年，多出来的补记只有四个字：补去年漏。再没有别的解释。

蒋阔算了一笔账。十二年，十四处十一月十八，五百乘十四，七千元。一条数百万流水的链子，全部账目里最经不起钱看的一笔，恰恰是最不肯断的一笔。

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笔迹比首页深，力道大得压穿了纸背——

账都在你那儿，一个字莫动。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后颈一点点凉上来。案卷里的尹彦认罪认罚，爽快得近乎干净，像把口袋整个翻出来给人看。可这本账不是账。是一个活人替另一个人守了十二年的门。

蒋阔一九七五年生人，干刑警二十多年。二〇二二年积案攻坚，他啃过天门那桩旧案，没啃动。旧卷里有一个前缀大队长的批语，四个字：流窜作案。还有一个没人理会的附页，写着两行小字：现场剪纸为左手刀口，河埠头提取童鞋印，三十三码。

他把十四个红圈又数了一遍，合上账本，抽出一张便签。红笔，字压得很重：

本案上线代号“CM”。建议并案。理由：此人在替另一个人保管时间。

便签背面，他添了一行小字。是二〇〇五年天门一桩旧案的卷宗编号。

天快亮的时候，他站在办案点的窗前。深圳的天灰得早，江海交界的地方起了雾。他忽然想起小时候看大人焙茶：炭火埋在灰底下，不到火候不起明火；等哪天满屋子都是香了，就是火到了。

火到了，就再没有一星火星子埋得回去。

他把便签贴在案卷首页，抚平，合上。

◆

二〇二四年九月上旬，办案点设在漳州市局旧楼，小桂的工位在走廊尽头，靠着一扇打不开的窗。

小桂一九九六年生，计算机专业考进技术室，拆硬盘像拆外卖。三块扣押硬盘两块有加密，他做了镜像，只读，算好校验值，一层一层剥。加密用的是一款十年前就停止更新的老软件，密钥是一串生日样式的数字，他试了半宿才试中。剥了九天，剥出五年间的一个电子账备份，和账本对上了七成。

恢复出来的东西干净得反常。没有聊天记录，没有相册，没有收藏，删掉的和没存过的一样齐。小桂在检验记录的备注栏里写了一句自己的话：空白也是痕迹。敢把一部手机洗成这样的，防的不是警察。

剩下三成在银行流水里。依法调证，调出来的是一张网。

“CM”名下的收款矩阵铺了十年，数百万的流水，进账即取现，取现即分账，一笔钱在六个账户里跳一个来回，落地就成了现金，无迹可寻。小桂用透视表把几万行数据翻来覆去地切，切出一句话跟组里汇报：这条链子最讲究的地方，是它不讲任何人情，只有货、码、钱。

为了说明这句话，他把流水走向打印出来贴满一面墙，几百条资金线汇进汇出，远看像一张河汊图。同事们站在墙前看了半天，说像水系。小桂说不对，水系有源头，这个东西没有，钱进了图就蒸发了，像泼进沙地。

他把这张河汊图拍下来存进手机。夜里加班回去的路上翻出来看，看出一点不对：所有的线都通向取现，可取现那天，账面会留五百块零头，凑整的手法。能留零头的人不是不会算账，是算得太清楚——清楚到每一笔脏钱里，都要留出一块干净的地方。

唯一的反常，是他凌晨三点撞见的。

每年11月18日，一个固定支出：五百元，备注“封仓”。

十四笔。从二〇一〇年到二〇二三年，一年一笔，一天不差。头两年比账本还早——账本是从二〇一二年记起的，流水不是。

收款方换过两次，都是做白事纸货的小店，一家在城中村口，一家在殡仪馆后街。店主的笔录说得含糊：年年这天来一回，人不高不矮，不爱讲话，买一刀纸、一对烛，东西拿走，钱扫给店里。

会商开在第二天上午。小桂把十四笔支出按年份钉成一条线，钉在白板最上头，底下挂流水走向图。主办民警拿激光笔从头扫到尾，扫完了说：几十万条数据里，就这一条是人干的事，其余的，都是钱自己在走。

散会时，那条线就按备注起了名：封仓线。

散会时有个老侦查员多看了白板一眼，说了句：十一月十八，我怎么听着耳熟。旁边人笑他，说涉茶的案子哪年没个十八。小桂没笑。他回头把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这个日子悄悄查了查，查完在底稿边上记了一行字：天门，茶仓，命案，未破。

记完他把这一页折了角。

那天夜里他把账本的扫描件又过了一遍。翻到首页那四行规矩，他试着从技术角度找茬：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条条都对——对得像一套系统设计，输入、输出、异常处理，全有预案。唯一没有预案的，是写规矩的那个人自己。他把自己从所有变量里删掉了。

散完会小桂又回工位翻店主的笔录。翻到末页有个细节，先前谁都略过去了：老板娘说，那人买纸只买黄纸，黄的不要那种又亮又滑的，要粗的、老的，说烧起来才实在。钱给得爽快，多的不要找。

黄纸。小桂把这两个字圈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圈完手指有点凉。

阿彦的补充交代也是那两天补齐的，小桂负责把几本笔录扫进系统，顺便读完了。

问体貌，笔录里写：中等身量，白，从来不上镜，出门换帽子，帽子压得低。左手虎口一枚厚茧，像常年使剪。问剪什么，答：说不上来。问那人手工夫细不细，答：细得吓人，包装的折角永远对齐。

小桂读到这里停了停。干技术的人对“折角永远对齐”这五个字有本能的敬意——机器对齐不稀奇，人的手要对齐十二年，那就不是习惯，是修行。他把这一页复印了一份，钉在自己的底稿后面。

问行踪规律，笔录里写：每年11月18日，失联。手机关机，全城找不着。第二天自己出现，像没事人一样。

这一条底下，尹彦还讲了个比方，笔录原样记着：像家里有个人，每年出趟远门，你不知道去哪，回来也不说，但你知道他准回来，就得给他把饭温着。十二年，饭温了十二回，一回没洒。

再往深问，笔录里记了一句原话。办案民警问那人图什么，尹彦隔了很久，说：有一年喝酒，我问他图什么。他说——图一个人不用再害怕。

小桂把笔录合上，又打开，把这五个字看了十遍。

图一个人。哪个“人”？笔录里尹彦说，他一直以为是阿木自己。小桂把这五个字抄在了工作底稿的页眉，抄完觉得笔尖发沉。

那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一面白墙，墙上开一扇窗，窗里有人背对着他剪纸，剪一阵，往墙上糊一张。他醒来把这个梦记下来，又在底下添了一句：做梦的人，比我先醒了二十年。

“封仓”两个字，他查了半宿。茶行话里有这一说：茶焙好了，入仓，封仓，等它自己变老。可五百元买一刀纸一对烛，这不是封仓，这是烧给什么人。

他找出书来两条对着读。一条讲焙火：火功到了，香气才收得住。一条讲仓储：封仓之后，天地不问，让时间自己做工。他合上书，忽然明白这条线为什么叫全组人都不舒服——他们追的是假的年份，可那五百块钱，像有人老老实实在给一个真年份上供。

上供给谁，纸货店不知道，流水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层层上报。部里把涉“CM”的线索单独立了二组，牌子挂在省厅，办案主力落在湖北——品牌端注册在天门，消费端的口子也开在天门。蒋阔进二组，任侦查员。

授牌那天没有仪式。一间拉了遮光帘的会议室，白板正中写着两个字母，CM。二组对外不叫这个名字，叫涉茶系列案第二侦办组，编制十九人，平均年龄三十四岁。蒋阔领了新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通讯录，笔尖悬了一会儿，先写下三个字：竺长生。看了看，又添一行注：暂不打扰。

他师父退休那年，跟他交代过一句话：我这块地你有用得着的时候，就来看我；用不着，就把我忘了。蒋阔六年来一次都没“用得着”过。现在他抱着调阅申请走出局机关大门，觉得时候到了。

调阅二〇〇五年旧卷的申请，是蒋阔亲手写的。卷宗发下来那天夜里，他把附页看了又看，第二天一早跟小桂说：走，去见个人。

“见谁？”

“我师父。”蒋阔把旧卷抱进怀里，“这条线上要是真有十一年十八这回事，天门地面上，没有人比他更熟。”

去天门的路上，两个人在服务区各吃了一碗热干面。小桂问：蒋队，CM到底会是谁？

蒋阔搅着面，半天，答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干我们这行，最怕两种案子。一种破不了；一种是眼看要破了，时效先到了。

小桂说他答非所问。蒋阔笑笑，说，到了地方你就懂。天门地面上，有人替全城记了二十年的账，今天我们去对账。

傍晚到的天门。老居民楼，五层，没有电梯，楼道口的灯泡蒙着蛛网。花坛里种着葱，一片一片，齐得像用尺子裁过。蒋阔在花坛前停了一步：老爷子种葱，一垄是一垄，跟他做笔录一个脾气。

蒋阔在楼下站定了，没往上走。

三楼的窗子亮着，纱帘映出两个人影。老先生坐在藤椅上，老太太坐在他对面的小凳上，脊背挺得很直，一动不动。老先生手里一把木梳，从上往下，一下，一下。梳完了，用手掌把她的白发压一压，压平了，再从头来一遍。

老太太不说话，也不回头，任他摆布，脸上是一种很远的安静。

小桂要往前走，被蒋阔一把拉住。

“等等。”

“上来吗？”

“再等等。”

两个人就在花坛边上站着。天从橘红收到灰蓝，楼里的油烟味一层一层漫出来，谁家在煎鱼。窗子里那把梳子还在走，一下，一下，不紧，也不慢。

楼上忽然传出一句含混的话，隔着纱帘听不真切，像是老太太在问什么。老先生的声音跟上去，很稳：下班了，回家吃饭。那边静了几秒，又冒出半句：菜呢。老先生说：买了，鲫鱼。

小桂听得眼睛发热。那语气不像哄病人，像哄一个等了他一辈子的姑娘。等人的等法千种万种，最长的一种，是把病人等成家里人，再把家里人守成日子。

他想起自己刚进技术室那年，老主任说过：破案靠两条腿，一是跑，二是等。他那时不懂什么叫等。这个傍晚，算是补了一课。

小桂看看表。蒋阔抱着卷宗，在楼下站了整整半个钟头，一次也没有抬头看那扇窗，又像是把那扇窗看进骨头里了。

半小时后，蒋阔把卷宗换了个抱法，转身往回走，脚步放得很轻，像怕惊动楼上的什么。

“明早再来。”

下楼的时候，小桂忍不住问：蒋队，为什么不上楼？

蒋阔走了几级台阶，停下，回头看了一眼三楼那扇窗。

“现在上去，两手空空，是让师父看笑话。”他说，“等我把旧卷的工夫做足，把该问的列成单子，堂堂正正敲门。”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再

说，他家那位，天一擦黑就不认人。老爷子一天里，就傍晚这半个钟头是自己的。”

小桂没再问。楼上的灯还亮着，把两个人的影子叠在花坛边上，叠了一会儿，又分开。

小桂跟在后面，回头看了一眼。纱帘上，梳子还在走。

他忽然明白了楼下这个人为什么不上楼，也隐约明白了，蒋队的师父——那个在楼上给老伴梳头的老刑警——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

一把梳子，二十年。有些案子不是没结，是结不了，只能天天给它梳头。

回程的车上，蒋阔一路没说话。快到办案点，他让小桂靠边停车，自己下了车，又弯下腰回来，隔着车窗交代：今天楼下的事，不许写进任何材料，不许跟任何人讲，包括我将来问起来，你也只说没看见。

小桂点头。车开出去老远，他从后视镜里看见蒋阔还站在原地，仰头望了一会儿天，才转身进门。天边压着晚霞，红得像一炉封好的炭。

◆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午后，天门。

电话是头天晚上打来的。老竺在电话里只说了两句话：案子立了？立了就好。带上立案的手续，来家里。

蒋阔握着电话愣了几秒。二组挂的牌子没有见报，立没立案，师父从哪儿知道的？电话那头像是看穿了他，慢悠悠补了半句：你们门口的牌子，白底黑字，我遛弯看见的。

放下电话，蒋阔在办公室坐到后半夜。他知道这一趟去，收的不是线索。师父攒了二十年的东西，攒的时候就没打算自己留着。

下午三点，蒋阔带着二组的手续和一沓空白清单上了楼。小桂留在楼下看车。楼道里凉，声控灯坏了一盏，蒋阔摸着扶手上去，像二十年前出勤一样，

脚步放轻。

门开着。竺长生系着围裙开的门，围裙上有面粉。里屋静着，门缝里看得见一张床，蚊帐放下来了，帐子里的人睡着，呼吸很匀。

“她后半夜不睡，白天补。”老竺把围裙解了，叠好，搭在椅背上，“说话声放小。”

堂屋一张方桌，老竺先用湿抹布擦了三遍，铺上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

擦桌子的水换了两回。第二回拧抹布的时候，他在水池前站了一小会儿。这些动作他昨夜对着空桌子比划过：先铺哪一角，后摆哪一样，顺序都排好了。二十年才用上一回的仪式，不能出岔子。

米面柜是樟木的，半人高，柜门上嵌着纱网，靠墙立了几十年，边角都圆了。老竺把面缸端下来，又把底层隔板整个掀起来——隔板下面不是柜脚，是一层暗格，一只军绿色的铁皮箱卧在里面，旧日杂公司装饼干的箱子，四角包着铁皮，锁是一把铜挂锁。

钥匙用红绳拴在他的钥匙串上。他解钥匙的时候，手很稳，只是慢。

箱子提出来，他先把厨房的窗子关小了些。起风了。这个夹层他开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挑秀珍睡熟、小江不在家的日子。儿子在武汉，一年回来三回，回回抢着扛米，他总拦在前头自己扛——扛米的手不能抖，一抖，儿子就要起疑。

箱子抬到方桌上，比看上去沉。老竺把手续接过去，一张一张看完，在接收凭证上签了名，才把铜锁打开。

“二组立的是‘CM’，我要交的东西比‘CM’老。”他说，“你按年份清点，一样一样登。”

蒋阔打开执法记录仪。老竺摆手：“关了吧。东西都在这，跑不了。你眼睛看，比机器看得住。”

记录仪关了。箱子开了。

箱盖掀开，一股陈年纸张的气味涌出来，干燥，微甜，像旧书库。蒋阔在这股气味里站了几秒——他在师父退休那年的办公室里闻过一次，那时卷宗箱还锁着，老头说，纸自己会讲话，就看你肯不肯蹲下来听。

最上面是两本剪贴簿，报纸裁的，浆糊贴的，从二〇〇五年冬天的《悬赏通告》贴起，一直贴到这个八月的收网消息。中间夹着二〇一一年那篇《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版面发黄，标题下的照片上，领奖台侧边站着一个没鼓掌的少年，脸只有指甲盖大。

第二层是一摞学生练习簿，十九本，每年一本，书脊上用钢笔写着年份。蒋阔翻开第一本第一页，日期是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只有一行字：

持剪者，手小。

再往后翻，每年的十一月十八日那一页都有字。有的年份只有一句：湖上没有风。有的年份是一行记录：王春发酒后言，沈家伢半夜磨剪子。存疑。二〇一四年那一页写着：楼开了。锣鼓声传到对岸。隔两页，另起一行：柳文霞走了。四十六岁，肝癌。

十九本里，字迹从壮年写到暮年。二〇〇六年一月那页：苏彩娥溺亡，判意外。字底下压着一道重重的横线，纸都划毛了。二〇〇八年那页：文化宫拆了，齐先生走，样册随人。二〇一一年五月那页：小茶仙领奖，台侧少年不鼓掌，照片存底。二〇一九年九月那页：王春发交布包，剪纸廿七，剪刀一把，语录三则。二〇二三年九月那页只有四个字：塔吊，坠，存疑。

蒋阔一页一页翻，翻得手指发凉。这不是笔记本，这是一个人拿二十年光阴做的台账，年年年底结一次账，年年结不平。

第三层，三张泛黄的相纸。石膏模的照片，鞋印三十三码，拍在河埠头暗渠的淤泥上，纹路清清楚楚。老竺在旁边说：原模在二〇〇六年所里搬库房的时候丢了，登记表上有，东西没了。这三张是当年翻拍的底片，我私留了一套。

第四层，几页小学生作业纸的存根。蒋阔认得，这是二〇〇五年排查时班主任毛慧芳上交的，正规手续存了一份在卷里，这几页是留底的底子。

“不该留的。”老竺说，“我留了。”

红布包在最底下，布角磨出了毛边。打开来，一把家用剪刀，中号，刃口有磨过的斜面。红布里还裹着一只牛皮纸袋，袋口用棉线缠着，线头上拴着一张小纸条：廿七张。老竺把纸袋解开，剪纸一张一张摆在蓝布上，全是孩子的手笔，拙，但是稳，走刀一律从左往右带钩。

二〇〇五年的案卷里，现场那张剪纸的照片，蒋阔闭着眼都能画出来。

蒋阔从卷里抽出一张翻拍照片，放在剪纸旁边。黄纸，双童奉茶。刀口的走向，和眼前这些一张一个方向。

他又把照片凑近了些，看收针。左手运刀，线条收尾全带左向的钩，二十七张，张张如此，像约好了的。剪纸按年头排，最早的一张背面有铅笔小字：二〇〇一。

那年，两个孩子七岁。

堂屋静了很久。窗外有收废品的喇叭声过去，又远了。

蒋阔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三个钟头。中间老竺沏了一壶茶，他一口没动。看到剪贴簿里二〇二三年九月那则塔吊事故的报道，他的手停了停；看到今年八月的收网消息，正好贴在便签那行编号的旁边，他终于出了口长气。

“师父，”他说，“您这一箱，比我们二组半个月的工作量还重。”

“不是重。”老竺说，“是沉。重的东西搬得动，沉的东西搬不动，只能背。我背了二十年，今天交给你，你接着背。”

蒋阔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茶泡得极浓，苦得很正，苦过之后，喉咙里回上来一点甜。他想，这就是师父的日子：二十年的苦，咽到今天，才舍得回一点甘。

“师父，您想知道那条链子那头管账的人，账上每年十一月十八记的是什么吗？”

老竺端杯的手停在半空。

“封仓。”蒋阔说，“五百块，备注封仓，十四笔。账本上，十一月十八出现十四次。”

老竺把杯子放下，放得很轻，杯底磕在桌面上，还是响了一下。堂屋里那口老挂钟正好敲响，一声一声，把这一下盖了过去。

“师父，你早就抓到他喽，你只是冇得手铐。”

老竺没接话。他把二十七张剪纸一张一张收回去，棉线缠好，动作像在给什么东西穿衣裳。

收到最后一张，他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那是一张两个人抬一只茶篓的剪纸，篓画得比人大。他看了两秒，收进去，棉线打了三个结。

“手铐好打。”半晌他说，“证据难打。这箱子搁在我家二十年，我天天祷告它一辈子用不上。”

剪刀和三张石膏模照片，第二天由二组办了手续，送省厅物证鉴定中心。

封样那天老竺也在。红布包拆开拍照，剪刀进物证袋，袋口贴封条，骑缝签名。登记表上“来源”一栏，蒋阔斟酌了半天，写：二〇一九年王春发上交，竺长生保管。老竺在旁边看着，说写得好，来路清白，东西才硬气。

办完手续，蒋阔问他要不要同行去省里盯检测。老竺摇头。

“东西在哪儿检都一样，我就在家等。”他说，“这回我跟它耗得起。”

从家里出来，蒋阔回头望了一眼。老爷子立在窗后没走，朝他摆了摆手，转身进屋去了。那个背影比半年前又矮了一点。

微量物证那一路先回了话：剪刀洗过，一洗再洗，又过了十九年，刃部、柄部、轴缝，提取不到可用检材。这个结果没人意外，老竺听完，只点了点头。

等待的那些天，日子照旧。清早买菜，上午给秀珍梳头，下午去湖边坐一会儿。有一天秀珍扶着厨房门框站了半天，忽然问：面呢？

老竺把面缸端下来给她看：在这儿，吃完了再买。

秀珍盯着空了的柜底看了很久，像在找一件记忆里的东西，没找着，也就忘了。老竺把面缸放回去，隔着柜门，用手掌在柜面上轻轻按了按。夹层空了，他的心反倒定下来——东西在它该在的地方了。

又过了十几天，痕迹那一路的鉴定意见到了。蒋阔是在办公室拆的信封，拆完没说话，揣着直奔老竺家。

意见书一页纸，结论一行字：送检剪刀为锐器，其刃部特征与二〇〇五年尸检记录之创口特征相符，系同类器械所形成。

同类。不是同一。

老竺伸手把意见书拿过去，从抽屉里摸出老花镜戴上，一个字一个字读完，然后要了纸笔，把结论那一段手抄了一遍。抄完，两页纸并排放着，一页是盖红章的公文，一页是他自己的字。

“我这人认死理。”他说，“东西要过一遍手，才进得了脑子。当年现场那道伤口的示意图，我抄画了不下五十遍。”

师徒俩把那两个字盯着看了很久。十九年了，头一份盖着红章的文书，肯把二〇〇五年那个伤口和眼前这把剪刀写进同一行字里。

“够了。”老竺说，“够开一扇门缝了。”

随文书附来的还有一张送检回执，回执下方印着一栏：送检人。

蒋阔拿笔要填自己的名字，笔杆被按住了。

“写我的。”老竺说。

“师父，按规矩，”

“规矩我懂。”老竺把笔接过去，笔帽拧开，在那一栏里一笔一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三个字写得很慢，像刻。“这个案子欠我的，就欠在这个格子里。

今天它还我一格。”

蒋阔没再争。他把回执收好，抬头的时候，听见里屋蚊帐响了。

“长生。”老太太的声音隔着帐子飘出来，很远，“天要黑了。”

“哎。”老竺应了一声，把手在门框上按了一下，“黑了就点灯。”

他回头对蒋阔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还留着方才那点东西。

“回去吧。”他说，“往后这案子，就像那年库房里最后一批茶。火候都到了，就差焙这一把火。焙好了，香气自己会走路，走多远都带着记号。”

蒋阔点头，提着包下楼。楼梯间的声控灯今天全亮着，一层一层，把他送出门去。

◆

二〇二四年十月中旬，漳州，雨下了半个月。

骆驼被控制的第七天，办案民警带他回仓里指认现场。面包车出了城，沿国道走二十分钟，拐进一片老厂区。那里原先是糖厂，改制后租给人存茶，八字门楼，门楼里两排桉树，树底下堆着空周转筐。

仓房的西头是染纸房。如今只剩半边墙，焦黑从窗洞一直漫到檐口，房顶塌进去，露出烧变形的桁条，雨水顺着断口往下滴，滴在灰堆上，一个坑一个坑。桉树靠火那面的叶子全卷了，一碰就碎。

焦灰里有没烧尽的棉纸残片，风一掀，露出一角烫金的字。取证的技术员拿镊子一片一片夹起来，装袋，编号。一上午，装了十七袋。骆驼站在警戒带外看着，心里一页一页地翻：这一角是大票，那一角是内飞，这撮灰是染缸里起出来的茶汤渣。十年的手艺，一夜的灰，十七个袋子装完。

他本名叫什么，仓里没几个人叫过。二〇一五年招工，面试只问一句：夜里敢不敢一个人看仓。他说敢，我在老家看过瓜地。第二天他扛着铺盖进了老

糖厂，因为能驮，一次四袋茶上三楼不换气，众人喊他骆驼，喊着喊着，本名他自己都懒得应了。

面试他的人坐在八字门楼的树影里，白，年轻，声音很轻，问完递他一瓶水：仓里的东西比人娇，你人糙不要紧，手不能糙。

那瓶水他没舍得当場喝，搁在宿舍窗台上晒了一天，晚上才开。这一开，就是十年。

那场火是八月末烧的，收网后第三天的后半夜。消防的结论写的是线路老化，引燃纸堆。办案的人后来把笔录推到他面前，让他自己看那晚的事。

那晚十一点，他手机响了一下。短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两个字：封仓。

他按规矩没回，也没问。仓里连夜来了两辆车，他把染料的桶、纸样、两块印版抬上去，轻拿轻放，像抬祖宗牌位。车走了，他锁门回宿舍。后半夜有人喊起来，说西头红了天。

抬印版的时候他多看了一眼。一块大票版，一块内飞版。大票版上那个“羡”字平平整整，第三笔溜圆，一点豁口都没有。他当时想，东家连版都修得这样干净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消防车来的时候，染纸房的房顶已经塌了。水枪打上去，腾起的不是白烟，是灰。后半夜火烧尽了，现场拉了警戒带，第三天结论就出来了：电路老化引燃纸堆。快得像有人提前把章都刻好了。

他没有救火的胆子，也没有跑的胆子，最后还是跑了。临走绕到仓房后头看了一眼，染纸房塌了半边，火星子在灰堆里明明灭灭，像一地睁着的红眼睛。

封仓。他入行十年，头一回在这两个字底下发抖。人这一辈子怕的东西会换，先是怕穷，再是怕事，最后怕的是自己心里那点没处搁的明白。

躲到十月十二号上午，两个便衣从饶平茶城的铺子两头走过来，喊他名字。

他放下手里那把茶则，站起身，把袖口捋平了，跟他们走。

“我等你们等了四十多天。”骆驼对民警说，“躲的滋味，比你们想的难受。”

提审安排在市局。权利义务告知书念一遍，他签得很快，字大，笔画粗。

仓里的日子，他讲起来一套一套。湿度计挂七处，一天三看；茶饼离墙离地，翻堆按节气；染纸的房里一年四季捂着桂皮和茶梗的气味，外人闻着冲，他们闻着踏实。染纸房里那一套，他讲得最细：棉纸要拿普洱茶汤打底，反复刷，阴一天，晒半天，再拿米汤拖一道做旧色；刷子的把儿都磨圆了，怕挂纸。徒弟们背地里管这叫给纸熬中药。他纠正过：不是中药，是岁数。纸跟人一样，得一点一点老。

做了十年的“老茶”，最老的一批，纸比仓里一半人的岁数都大。

“知道是假的吗？”办案民警问。

“知道。”骆驼说，“可东家定的规矩是真的。十年，没亏过谁一文钱，没欠过谁一天工。这话我今天讲出来丢人，但它是真的。”

问仓里的规矩，他说东家的规矩比海关还细。货不见光，纸不过夜，染好的棉纸要在米汤里拖一道，晒到半干再阴干。问东家本人，他坐直了一点。

“一年就来一回。”他说，“来那天不进门，先站在八字门楼底下看桉树，看半支烟的工夫，再进来。进来也不多话，看茶饼，只翻不说。走前要在印版上动一刀。”

“动什么刀？”

“大票版上‘羡’字，第三笔有道豁口，师傅们管那叫胎记。有一年他来了，蹲在印台边上，用刻刀把那道豁口一点一点补平了。补完举起来对着灯

看，看得很久。”骆驼比了个手势，“像老木匠给自家梁头补榫头。从那以后，胎记没了。”

问东家来那天仓里是什么光景，骆驼扳着指头数。头天全仓大扫除，水泥地要扫出本白；当天上午手机统一收进铁皮柜，谁也不许拍；人来了，从东头看到西头，一饼一饼翻过去，不说话。看完了，在印台边上坐一会儿，有时动一刀，有时只喝水。走的时候从后门走，车不停正门。

有一年梅雨，东家来的时候正赶上翻堆，全仓的人都顶着雨干活。他在檐下站了一会儿，没说话，第二天仓里多出一箱雨靴，一人一双，尺码都对。没有字条，问谁谁不知道。

“你说这样的人，算什么人？”骆驼问办案民警。民警不接。他自己答：“是东家。可东家两个字，说到底也是个壳，跟陈小满一个样。”

“他来那天，你们都见着他？”民警问。

“见是见了。”骆驼说，“可没人敢正眼瞧。他往那儿一站，你眼睛自己就往地上落。十年，我连他手上的纹路都记熟了，愣是想不起他鼻子长什么样。”

问体貌，他的笔录里有一段话，后来二组的人来回传着看。他说：

“白。年轻得不合规矩。十年冇变样。左手使剪刀。”

问怎么认得是左手，他说拆包装的时候见过，也见过他修印版，刻刀往左走，稳得不像人手。

“电话里声音也年轻。”他补了一句，“十年了，声线都没挪过窝。”

问通讯，他说东家不上微信，不出现在任何合影里。仓里进门正墙上有一行字，印在铁牌上的，新来的都当是茶经装饰：茶性俭，不宜广。干久了才明白，那是给全仓立的规矩——货不能多，路不能宽。

还有灯。仓里省电是出了名的，过道灯泡瓦数都换小过。只有东家来的那天反着来，全仓的灯亮一夜，一盏不熄，亮到天蒙蒙亮，车走了才关。

“我守了十年仓。”骆驼说，“守的其实就是那点灯。灯亮着，心里就踏实，觉得这行当再黑，上头有个人看着。”

问合同问账户，他说纸上全是三个字：陈小满。法人陈小满，房东合同陈小满，连仓里那张银行卡也是陈小满。可谁也没见过陈小满的身份证。

问到东家的报酬怎么结，他说一年一结，现金，装在茶叶罐里，罐底垫着棉纸。每年腊月里那一次，钱数得极齐，连旧钞新钞的搭配都像排过。

“东家一年给您多少？”

“第一年八万，去年四十万。”骆驼说，“可我一年到头花不到两万。钱在手里压着，像替人存着。你说怪不怪——他给得越多，我越不敢走。”

十月二十号，技术队从他手机里还原出一张图。那条朋友圈是二〇一七年发的，发出去不到两个钟头，电话就来了，就俩字：删了。他删得比谁都快，删完手抖了半宿。图上是一地做废的棉纸，白花花铺满仓房，像落了一场雪。纸雪里立着一个人，背对镜头，帽檐压着，肩不宽，站姿很松。

技术队讲了个中缘由。图删得再快，手机的缓存和腾讯的服务器都留有底子，依法调取，一纸文书的事。骆驼听完叹气：他什么都算到了，就忘了我们也活在网里。

办案民警把两张照片并排摆在桌上。左边是那张背影，右边是户籍系统里调出来的陈小满：白底证件照，男孩，圆脸，十四岁，照片底下两行小字，出生一九九四年，殁于二〇〇八年车祸。

骆驼盯着看了半天，把两张照片推开了。

“这不是一个人。”他说，“左边这位来仓里那年，看着三十出头。右边这是个伢，伢的骨头还没长开。”

民警告诉他，陈小满这个人，二〇〇八年就死了，户口一直没销。这两年，一个死人名下在全国开了十几家公司，账面干干净净。

“户口哪来的？”骆驼问。

“外省一个县。孩子没了，爹妈常年在外打工，销户的事拖黄了。二〇一四年，有人把这个空户口买了过去。”民警说，“怎么买的，还在查。”

骆驼点点头，问了一句外行话：买户口犯法，卖户口呢？

“也犯法。”

“那当年给他上户口的环节呢？”

民警看了他一眼：问得好。二十年前经手的链条，有的断了，有的人不在了。这条线在倒着捋。

骆驼半天没说话。雨还在下，敲着提审室的铁皮雨棚，一声一声。

“户口是死的，人是活的。”他终于开口，“拿死人的壳，装活人。”

“你们能查到他，能查到他的名字吗？”他忽然抬起头，眼睛里那点浑浊的东西定住了，“我们叫了他十年阿木、陈老板，冇得一个人晓得他姓什么。”

没有人答他。

隔了一会儿，他自己往下说，声音低下去。

“我没点火。那晚我连烟都没抽完。”他说，“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火是火，我是我。可我跑了，跑了就有罪，这个我认。”

他提出给家里带句话。办案民警按规矩记了：跟他老娘说，冬至不用给他留饺子了。记完这一句，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像卸下一袋扛了半坡的茶。

“他来的那晚，全仓的灯亮一夜。”隔了半晌，他又说，“我一直没想明白，一个一辈子不见光的人，为什么单要那一夜亮。”

车开出八字门楼，他把脸转向窗子，没有再说。

面包车过收费站的时候，雨停了一阵。骆驼隔着车窗看见路边山上有片茶田，绿得发假。他想起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从这种绿得发假的绿里，一垄一垄走进去的。

他伸手在车窗玻璃上抹了一把，抹出一小片亮，看了外头一眼，又把脸转回车厢。车厢里暗，暗得踏实。他这辈子头一回觉得，暗一点好。

到办案点下车，雨又下了起来。他仰头让雨点砸了几下脸，才跟着民警往里走。走廊尽头有一扇小窗，窗外是山。他想，仓里那点灯，往后是没人给他点了。

◆

二〇二四年十月末，天门，城北。

“竟陵旧事”的工作室还在哥哥租的那栋旧民房里。龚小凡把哥哥的遗像擦了一遍，摆正，然后坐回他的旧椅子上。椅子他坐了六年，扶手磨出了包浆。屋里还是他的格局：三脚架靠墙立着，备用硬盘码在架子上，白板上留着最后一遍采访提纲，蓝色笔迹，写到一半。

哥哥的手机到今天也没找回来。小凡接手的，是四十七万粉丝，一间租来的民房，一屋子设备，和一桩没有凶手的坠楼。头一个月她夜夜梦见塔吊，后来不梦了，改梦见一堆纸，风一吹，满屋乱飞。

她把第一篇稿子从头读到尾，读了三遍，点了发送。

系列叫《剪纸的男孩》。第一篇发在十月三十一日，题目是《现金未动》。她只用了公开材料：当年的报道存档、悬赏通告的影印件、知情者愿意出面的部分。她写：茶仓里那具尸体旁边，铁盒现金一张不少，凶手带走的东西，小到卷宗里只留下一句话——现场遗剪纸一张，黄纸，双童奉茶。

文章末尾她写：现金未动，剪纸为记。凶手不是来求财的，是来留话的。

写第一篇的那个礼拜，她去过云香居麻将馆。郑胖婶六十九了，牌桌边支着电暖气，见了她先摆手：录像莫对到我。谈了一个钟头，老太太一句案子都没接，只顾打她的牌。临了送到巷子口，她压着嗓子说了一句：那年的冬天，夜里没人敢走河埠头。

小凡把这句话写进稿子，没提名字。

一夜之间转发过了十万。天门本地的群像烧开的水，出租车电台里司机在讨论，三蒸居的早上有人拍桌子。也有人骂她，说她是拿死人的血给自己的账号引流量。小凡把骂的评论截了图，存进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叫“哥哥挨过的骂”。

骂声里最难听的一句是：你哥从楼上掉下去，你倒会踩着找饭吃。她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回了三个字：会继续。发完把手机扣在桌上，去阳台站了十分钟。楼下的桂树开着二茬花，香得很沉。哥哥出事前一晚跟她说：查案的人不怕死，怕的是死了没人问。

“有人问了。”她对夜色说，“哥，接着问。”

第二天她去了市图书馆，把二〇〇五年十一、十二月的本地报纸一页一页翻成扫描件。胶片机嗡嗡地转，转出来的字带着毛边。管理员问她查什么，她说查一桩旧案。管理员说这些年查旧案的人不多，你是第三个。她问前两个是谁，管理员想了想，说：一个是个子很高的老同志，一个是扛摄像机的年轻人。

她把扫描件按日期排好，一张一张看。旧报纸上的天门很小，小得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过同一条街，都上不了同一版面。

第二篇发在十一月七日，题目是《两扇关紧的门》。出镜的是毛慧芳，二〇〇五年那届学生的班主任，退休多年，一个人住在一中旁边的老楼里。镜头前老太太穿着深蓝外套，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开机前她让小凡等了十分钟，回屋换下家居服，又把头发抿了抿。她说上镜是大事，当年进教室上课也这样，衣冠不整不站讲台。

小凡的第一个问题是：二〇〇五年，您信过流窜作案的说法吗？

毛慧芳摘了眼镜，擦了很久。

“这两个伢，像两扇关紧的门。”毛慧芳说，“坐在我班上的时候就这样。门关着，你敲不开，可你知道里头有人，人在里头好好活着。”

记者问她后来呢。

“后来我就退休了。”毛慧芳说，“我这辈子教过两千个伢，记性最坏的是分数，最好的是脸。”

关机之后，老太太把小凡送到楼下，忽然回身交代了一句：孩子的脸，莫打码。

“为什么？”

“他们的脸，叫人打了二十年的码了。”毛慧芳说，“总得有一回，清清爽爽给人看一眼。”

小凡下楼的时候，老太太在背后又喊了一声：丫头，纸里头有人。莫怕纸，怕人。

她回头，老太太平静地看着她，把门带上了。

小凡在稿子里照做了。播出那天夜里，齐伯的原片重发了。那是哥哥二〇二〇年春天拍的，在养老院，老人坐在窗边剪纸，剪刀很小，纸是黄纸。拍的是一只灯笼，剪完举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放下，又剪下一只。片子留到最长，九分钟，没有配乐，老人没有看一眼镜头。

小凡把片子看了四遍。第四遍才看明白哥哥为什么不剪短——老人不是在表演剪纸，是在过他的日子，日子没法剪短。她给片子起的题目叫《剪进夜里》。

第三天，播放量破了一百万。

评论区涌进来几万条。有人认出了文化宫的楼梯，有人讲糖塑艺人，有人只留一句：竟陵人报到。还有一条顶得很高：二〇〇五年，我上初中，那年冬天大人不让我们去河边。小凡一条一条看，看到后半夜。

三天里，两家平台的编导、四家报纸的记者找上门来。她一律只回一句：材料都在帖子里，公开的随便用，采访不开。有人问为什么，她说，我哥的号，从来只有画面和纸，没有我的脸。

说这话的时候，窗外不知谁家娶亲，放了一挂鞭炮。她听了一会儿，把窗关了。

她去养老院外围找过一次齐伯。传达室的护工很客气，说老人耳朵背了，不接受采访，就是天天要剪纸，一天不剪手痒。她隔着香樟树望了一眼，三楼一扇窗开着，晾着一排剪纸，风里轻轻动，像一排白色的鸟。

她在门外站了十分钟，没有进门。有些门不是不敲，是敲了也是白敲，还惊了里面的人。

“嘉木茶事”的官方账号全程没有出声。小凡翻遍了那个账号，能翻到的只有一间直播间，ID叫“白鹭”。最新一场回放停在十月三十日，画面里店长蓝溪在摆杯冲水，弹幕刷得密密麻麻，问的全是同一件事。

小凡把回放从头看了一遍。四十分钟里没有一句话提案子，蓝溪只管泡茶，水温手劲都有讲究。弹幕一路刷，刷到第三十分钟，有一条慢慢浮上来：老板娘还好吗。没人接。画面里蓝溪的手停了半秒，又续上水，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她给“白鹭”发了条私信，石沉大海。

第二天夜里，“白鹭”的回放忽然更新了一场。没有预告，没有话术，蓝溪对着镜头泡了一道茶，从头到尾没说话。泡完，洗盏，擦台，关灯。全场十一分钟。弹幕问这是哪款茶，没人答得上来。小凡把回放下载了下来，文件名只存了日期。

她在素材文档里给这场直播标了一行注：她看见了所有的问题，一个也没躲。

十一月十二日，官方账号发了两条声明，一共两行字：嘉木堂定档十一月十八日开业，一切如常。

声明底下关了评论。有好事的人截图转发，配的字是：心真齐。当天，日期被顶上同城热榜，挂了一整天。

当天夜里，一个自称店里前员工的账号给小凡发来私信。私信只有几行：改期的事，店长提过的，提过不止一次。唐老师只回了一句：“日期是借的，要还。”

小凡把这句话看了很久，没有转，也没有写进稿子。

她回了一条：方便通个话吗。对方再没应过。第二天那个账号注销了，从头像到注册，拢共活了三十几个小时，像专程来送一句话的。

十一月十四日，挂号信到了。信是她在小区门房代收的，单据显示天门本地寄出，寄件人签名一栏是两个连笔的字母，认不出是什么。她打电话问邮局，对方说挂号信不记名，正常。

正常。她挂了电话想，这两个字，今年她听过很多回了。

信封里没有信纸，只有一张剪纸：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孩，走向一座楼。楼是九层的，一层一层，剪得极齐。

无字。

小凡戴上手套，把剪纸夹进文件袋，在桌前坐了半宿。她想起哥哥说过的话：查案的人最怕两种东西，一种是没有痕迹，一种是有痕迹却没有字。前者是聪明，后者是笃定——笃定你看得懂。

天亮后她去了相馆，挑了最素的框，把它裱起来，挂在哥哥遗像旁边。

“我不怕纸。”她对遗像说，也像对那个没留名字的寄件人说，“我怕的是你们只敢用纸说话。”

朋友劝她报警。她想了想，去派出所登了个记。接待的年轻民警看了看照片：没有文字，够不上恐吓，先备案。她道了谢，出门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天冷，呵出的气是白的。

连恐吓都做得这么体面。她把这句话咽了回去。

终篇她写了三天。第一稿八千字，删成四千；第二稿删成两千；最后发出去的只有八百字。哥哥教过她：查案的稿子，字越少，每个字越重。

删稿删到最后一晚，她把哥哥的名字输进去，又删掉。终篇里一个“龚”字都没有。有人劝她打着哥哥的旗号，传播量来得快。她没接茬。旗号是给别人扛的，她只想把这条路走到头。

十一月二十日夜里，第三篇发了，也是终篇，题目《剪进夜里》的后记。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二十年了，凶手没有名字，只有一把剪刀。可剪刀是人拿的。我哥把那个“人”找出来了——现在，轮到纸开口。

点发送的时候是夜里十一点五十。后台的数字开始跳，一分钟几百，几千，几万。她盯着屏幕看了十分钟，眼睛发涩，然后合上电脑。

屋里只剩遗像前的灯。窗外的西湖路上，晚风吹着招牌，哗啦，哗啦。

睡前她把三篇的后台数据截了图，存好。然后在“哥哥挨过的骂”那个文件夹旁边，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命名的时候，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秒，敲下五个字：哥哥没看到的。

◆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夜，天门。

这一夜竺长生从来睡不踏实。从二〇〇五年那个冬天起，每年到这一天，他都要在半夜醒过来，醒得干干净净，像有人在他耳边吹了口哨。

晚饭的时候秀珍把两双筷子摆成笔直的两行，他没纠正。这个病把她的日子过成了一条直线，他就不去拗，顺着直线走，她心里安稳。饭后他洗碗，她搬个小凳坐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一直看到他擦完最后一只碗，说：好了。她才满意地去睡。

里屋蚊帐放得好好的，秀珍睡熟了。他轻手轻脚穿衣，把大衣的领子立起来。出门前他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替她把被角掖了掖。

鞋柜第二层，手电筒。老式的，铁皮的，二〇〇五年配发的旧物，灯头磨得发亮。他掂了掂，揣进大衣左边口袋。右边口袋里是一张翻拍照片的打印件：黄纸，双童奉茶。

手铐他没有。退休六年了，就算在职，今夜这一趟，也不是带手铐的差。

出了家属楼，往西走就是西湖。夜雾从湖面上漫起来，路灯浸在雾里，一团一团昏黄。茶经楼立在湖岸上，轮廓灯十一点就歇了，只剩一个比夜更黑的影子，九层，一层一层，安安静静压在雾上。

他沿湖走了半圈。芦苇枯了大半，风一过，响成一片。有个夜钓的人蹲在石凳后头，头灯的光一点一点映在水里。

二〇〇五年那个冬天，他就站在前面那段湖岸上指挥排查。那年他四十七，头发黑得像上过釉，自认为这辈子破得了世上所有的案子。如今隔着十九年回头看，湖水还是那个颜色，深处发乌，浅处发绿，什么也没告诉他。

十九年，他学会了一件事：湖不动声色，人要替它记账。

从湖岸折向工人文化宫旧址。文化宫零八年就拆了，如今是一片收费停车场，铁杆栏杆，入口的岗亭黑着。只有门口那几级石阶还是旧物，水泥磨得发亮。当年二楼东头的教室，窗子朝南，剪纸班的孩子们一排排坐着，剪刀声细碎得像春蚕吃叶。

他在石阶上站了一会儿，没有上去。

当年剪纸班的花名册，他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摸排过。三十七个孩子，家长、老师、街坊，问了个遍。花名册早随卷宗归档了，名字他却还记得几个，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像点名一样在心里过一遍。过到最后，总有两个名字过不去。过不去，他就起来喝口水，回来接着睡。

再往南，穿过两条街，是养老院的外围。铁艺大门锁着，门柱上的灯箱换成了新的，蓝底白字。传达室亮着一盏小灯，护工在里面打盹。院内几棵香樟，黑黢黢的，三楼有一扇窗没关严，暖光淌出来一线。

窗子里晾着什么，隔太远，看不真。他记得白天小凡那篇稿子底下有人拍过：养老院的窗台上，一排剪纸，像一排白鸟。

老人也还没睡。

传达室的电视没关，声音拧到最小，屏幕的光一闪一闪，映得护工的半个脸发蓝。老竺在栏杆外站了一阵。九十一岁的老人了，剪纸剪了八十年，耳朵背了，眼睛花了，手还在动。他想起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里，他在文化宫门口问过齐先生一句：您班上哪个孩子手最稳？老先生想了想，答：手稳的孩子多。心稳的，就那么两个。

今晚再想这句话，像谶语。老竺把大衣裹紧了些，继续往南走。

最后是望湖仓旧址。

围挡立起来一年多了，蓝白铁皮，一人多高，顺着旧仓的地界圈了一大圈。围挡上喷着效果图，楼不高，飞檐，檐下一块匾，匾上两个字，嘉木。效果图下面一行标语：

欠这里一炷香。

塔吊停在半空，像一只收拢了翅膀的大鸟。工地静着，只有围挡缺口那边透出一点光。

缺口是运料口，白天过车，夜里留人。看守的小屋黑着灯。老竺白天来踩过点，知道这缺口夜里不锁——今晚这围挡里外，像特意留了一道缝。

他在马路这边找了个位置。这个位置他白天挑过：路灯照得到他，照不透他；对面工作灯的光斜过来，正好打在缺口那一片。这是当年蹲守的老经验，如今用来散步。

他等。等是什么，他懂。二〇〇五年那晚他在河埠头守到天亮，等一块石膏模干透。这十九年他也都在等，等一件东西自己走到灯底下来。

十一点四十分，缺口那边出现了动静。

缺口处有个人，电工打扮，藏青工装，反光背心，正蹲在地上收线缆。一圈，一圈，收得极齐，线缆盘得像出厂的货。旁边立着工具箱，一只卷尺，一盏工作灯，灯罩斜着，照亮方圆几步。

收线的法子很规矩：先掐头，再理顺，顺着线自身的弯，一圈压着一圈。电工收线图快，盘得糙，这个人收得像收藏。老竺在马路对面看着，忽然想起二组卷宗里那句笔录——包装的折角永远对齐。

距离二十米。这个数字是竺长生的职业病，一眼就量出来了。

他没有过马路，也没有掏手机。他就在路灯底下站着，大衣领子立着，像任何一个夜里散步的老人。

风把湖上的雾一阵一阵送过来。他数着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慢下来。蹲守的人懂这个：你越像背景，对面越容易变成前景。十九年前他教徒弟的第一课就是这个，今晚，他自己用上了。

蹲着的人手停了。

停了两三秒，那人直起身，先没有回头，把手里的线缆头掖好，拍了拍手上的灰，然后转过来。

转过来的动作不快，也不设防，像转给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看。

灯在他身后，脸有一半在光外。竺长生看见那人抬手，把鸭舌帽摘了下来。

白。瘦。很平的一张脸，眉毛淡，眼睛不躲，就那么隔着二十米，隔着一条马路，看着路灯底下的老人。冬夜的风把工作灯的光吹得晃了晃，那张脸在光里没有动。

竺长生的心跳得很慢，很沉，像有人在很深的井底一下一下撞门。他这一辈子见过的脸不少了，垂死的、耍横的、喊冤的，都记得。可眼前这张脸他等了十九年——不是等它露出什么马脚，是等它长成大人，站到他够得着的地方来。

现在它来了，安安静静，站在光边上。

竺长生认得这张脸年轻的时候。审讯室的单面玻璃后面，一把小椅子上，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就是这么坐着的，脊背直，手放在膝盖上，不哭，也不问。

十九年，那张脸长开了，长定了，还是白的。

那人把帽子拿在手里，朝他弯下腰去。

弯得很深，很慢，停住，又更慢地直起来。整个过程里没有一句话，连风都像是歇了。然后那人戴上帽子，转身走进围挡缺口，工作灯的光在铁皮上晃了两晃，人就不见了。

自始至终，没有人说话。

竺长生在原地站了很久。他看了一眼表，十一点五十六分。再过四分钟，这一天就过完了。那件反光背心在灯下碎碎地亮，像撒了一把星子的灰。

他忽然明白过来，今夜这个人不是在收线，是在守时辰。线收得再齐，也要等楼起了才用得上。他等的不是工程，是这一年一度、只有一夜的时辰。

他摸了摸左边口袋——手电在。右边口袋——照片在。手铐不在，没有任何一张纸在。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二十年了，他知道的可从来都不是名字。

马路还是那条马路。他等车流过去，慢慢走过去，站在缺口外面往里看。塔吊，钢筋，水泥桩，没有人影。

工作灯还亮着。工具箱开着盖，线缆盘码得整整齐齐，像一个提前收了工的工地。

台阶上放着一张剪纸。

黄纸，就摆在第一级台阶正当中，压着半粒石子。他拧亮了那支老手电，蹲下去照。黄纸上剪着两个人，一个站得直，一个弯着腰，弯腰的那个，手里递出去一支手电筒，光用镂空的线条剪了出来，一道一道，细得像头发丝。

走刀从左往右。他看得懂。

镂空的地方剪的就是光。剪的人把手电筒的光剪成了十几道，一道一道，从一个人的手里出来，落进另一个人的手里。老竺数了数，十七道。他不知道这个数有没有讲究，只觉得这张纸在掌心里，比在台阶上时重。

他没有戴手套，用两根手指把剪纸拈起来，对着灯看了很久，然后合拢手掌，把黄纸护在掌心里，像捂一只刚出壳的雀。

回去的路上他绕了湖岸那条远道。走到半途，他把左口袋的手电掏出来，拧亮，朝前照了照，又拧灭，揣回去。路灯一片一片从他身上扫过去，谁也没有多看他一眼。一个深夜遛弯的老头，兜里揣一支手电，在天门，再平常不过。

到家十二点半。秀珍睡得沉。他换鞋的时候，帐子里忽然飘出一句梦话：回来了？

“回来了。”他应。

“吃了没？”

“吃了。”其实没有。这半碗谎话，留到明早煮两碗面，替她圆上。

他在台灯底下把笔记本翻到十一月那一页，把剪纸夹进去，抚平，然后拧开钢笔。

他写：他晓得我看了他二十年。这一躬，是谢，也是告别。

笔停了停，他又添了一行小的：今夜他来收线。楼还没起，灯先在收了。来年这个时候，就是万家的灯了。灯这个东西，我追了一辈子，追到今天才明白，有的灯是照人的，有的灯是记日子的。

写完他没有睡。他把台灯关了，靠在椅背上，坐在黑里。窗外偶尔有夜班车过去，光在天花板上扫过一道，又暗下去。掌心里那张黄纸的触感还留着，薄的，韧的，边角裁得一丝不苟。

他想，这像守着一炉火。火还不能见亮，得用灰埋着，埋到该起的那一天。

临睡前他又摸黑起来一趟，把夹在笔记本里的剪纸重新压了一次。压完他站在窗前。城南那边黑着，工地的航空灯还在一明一灭。

明天得给蒋阔打个电话。他想好了头一句：老蒋，十一月的账，我记上了。

窗外起风了，晾在阳台的旧窗帘鼓了一下，又落回去。他想起一句老话：灯不挑不明，账不翻不清。今夜两样，都有了。

◆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初，漳州，看守所。

漳州的冬天不下雪，冷得又湿又钻。高墙里两排老榕树落着细叶，放风的场子是水泥地，扫得再净，墙根也积着一层黑绿的苔。

他的编号是一串数字，他自己记成一个日子。管教点名，他答到，声音不大不小。同监室的人说这人怪，进来几个月，反倒胖了一点。

“心宽。”他解释，“账有人管着，我睡得着。”

他睡觉脸朝里，薄被一直拉到下巴。老管教看得多，知道这种睡法叫守东西——人睡了，身上还替谁扛着一样看不见的行李。

尹彦进所三个多月，批捕九月里就下来了。他守监规，不出声，吃饭不剩，同监室的人换了三拨，管教说他不像进来服刑的，像来进修的。

监室里有个二十出头的，因为帮人跑分进来的，闲得慌，问他外头干什么营生。他说卖茶的。小年轻来了兴致，让他讲讲茶。他就讲，水怎么烧，茶怎

么醒，什么茶配什么碗，讲了一晚上。末了小年轻问：最贵能贵到什么份上？

“贵到刑期上。”他说。小年轻不问了。

后来那孩子换了监室，走前把半块肥皂留给他。他收下，说记你一笔。孩子笑：记什么账？

“人情账。”他说，“这个最长。”

从那以后监室里都喊他茶老板。放风时他沿着墙根慢慢走，一圈，又一圈，不掺和牌局，不凑人堆，谁也不知道他在数什么。

后来管教找他谈过一次，问他要不要跟家里联系。他说家里没什么人了，一个妹妹，早断了来往。管教问断几年了。他算了算：从我跟他干那天起。

管教没听懂这个算法。他也没解释。

律师是家里凑钱请的，五十来岁，做事四平八稳。

会见的常规问题他都答，量刑、退赔、家属会见，一条一条清楚。唯独每回问到有没有要补充检举的，他都摇头，摇得很慢。律师看得出来，那不是对抗，是舍不得。

九月里头一回会见，他只问了律师两件事：外头有没有人找过你；家里那台冰箱，搬走了没有。律师说都没有。他哦了一声，靠回椅背，像卸了担子的挑夫。

律师后来跟同行提起这个委托人，说那是我见过最配合也最沉默的当事人——配合得像认命，沉默得像守灵。

十二月三号的会见，律师先讲程序：案子已经移到审查起诉那一步，认罪认罚，退赔做得好，量刑建议不会轻，也重不到哪儿去。

尹彦点头，说晓得了。这些话每次会见都听一遍，他都背得出。

律师收拾卷宗的时候，忽然停了手。

“有人托我带句话。”

尹彦抬起头。

“账都在你那儿，一个字莫动。”

会见室静了。铁桌的一角，不知哪一任嫌疑人用指甲刻了几个正字，一笔一笔，磨得发亮。

“谁托的？”尹彦问。

“我不能讲。”律师说，“职业道德。”

“男的女的？”

“不能讲。”

尹彦盯着桌面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声。笑着笑着，声音就变了。他伏在铁桌上放声大哭，哭得整间屋子嗡嗡作响，走廊里的管教敲了两回门。三十八岁的人，哭到打嗝，哭到干呕，最后扒着桌沿直不起腰来。

律师坐在对面，没有劝。干刑辩的人见惯了哭，可他后来跟同行说，那天的哭他忘不了——那不是怕刑期的哭，怕刑期的哭是瘪的；那是被人从背后叫了一声名字的哭。十二年的闷，全从那一声里漏了出来。

十二年的账，那天上午决了堤。

哭完了，他用袖子把脸抹净，坐直，跟律师把没讲完的程序讲完。走的时候他跟管教说了句怪话：麻烦把今天的饭留一下，哭空了，得补上。

那两天他话少，饭照吃，吃得干干净净。管教例行谈话，问他有没有想不通的。他说想得通，就想通了一件事——有的人对你好，不是图你，是图你手里替他拿着的东西。

说完他又摇头：不对。他要是图东西，早把东西取走了。

二〇一〇年九月他头一回见着阿木，在华强北的柜台后头，白得晃眼的一个年轻人，说话轻，出手快，算账不用计算器。光碟的行当里滚了五年，规矩一条一条立起来：不见光，不拍照，不问来处，每年11月18停工。后来行当换了，规矩没换。他替他管账，管了十二年，账比他自己的存折还干净。

他一直当自己是懂他的。不抽烟，喝白粥，手常年是凉的，冬天跟人握手都缩着。每年那一天关机，谁也找不着。第二天自己出现，眼底下带一点青，像刚从很冷的地方回来。

有一年台风，档口进了水，两个人半夜起来搬货。搬到后半夜，坐在货箱上喘，谁也没说话。天蒙蒙亮的时候，阿木先开的口，说了一句跟货完全不挨着的话：你说，纸会不会比人活得久？

他说不会。阿木没争，笑了一下。那个笑，他记到今天。

补充交代是第二天主动提的，管教往上报，办案单位加了两次提审。他要求全程录像代笔，自己不肯落一个字。

“习惯了。”他说，“不留字。”

录像代笔的交代做了整整四天。十二张电话卡的尾号，他一个一个背出来，哪年办的，哪年掰的，掰在哪个路口的哪个下水道口，全在脑子里。记录的民警打字跟不上，请他慢一点。他说不用慢，我又不是想不起来，我是怕你们记不完。

报关那套鬼戏码，他一样一样倒了出来。茶饼从漳州装柜，头程报工艺品出港，到境外换柜、换单、换名头，三个月后二程进来，报关单上写的是港仓陈年普洱，后头附一整套做旧的仓单：某年某月入仓，某年某月翻堆，纸面拿茶水染过，虫眼拿香头烫的。一套履历做全，一饼茶就有了别人的一辈子。

“我们管这个叫给茶上户口。”他说，“上着上着，我自己都分不清哪张脸是真户口了。”

他还交代了账路。货款永远走现金，账本上的数字他对得整整齐齐，一分不差。民警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做本假账。他说：

“账要真，人才敢假。账要也假，咱们早散伙了。”

另一场提审，桌上摆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冷冻层那只信封，一张是信封里那半页字。

“这个字，你见他写过吗？”

“没有。”尹彦说，“十二年，我没见过他写一个字。规矩，不留字。”

“剪刀呢？”

“信封冻在里头，我没开过。人家交代的话，我守了十年。”

“你就不好奇？”

“好奇。”尹彦说，“头一年好奇，后头就只剩怕了。这回看见是剪刀，我倒踏实了——剪刀认人，不认我。”

民警让他辨书写习惯。他把照片端起来，对着灯看了很久。

“是使左手的人写的，起笔都从左边带。”他放下照片，又说，“他的手就那样，左手虎口一枚茧。打牌摸出来的。”

民警问：什么牌？

“麻将。”尹彦说，“他只会一种打法，缺一门。问他为什么，他说小时候就这么学的。牌桌上少一门，心里稳。”

民警记了。这类话对定罪没用，对认人有用——它给那张纸上的字，添了一副骨头。

笔录打到末页，签字之前，他停住，要求补一句话。民警问哪一句。

“我连他身份证都冇见过。”他说，“他是个纸人。”

笔录末页他按了指印。按完，他把手翻过来看了看，像在检查一枚用旧了的图章。

那天夜里他在铺板上睁着眼。熄灯以后，铁窗外头的天灰白灰白。他想起有一年除夕，仓里就他们两个，一锅白粥，一小瓶酒。他问：跟你干这行，图什么。隔了半天，那句：图一个人不用再害怕。

他当时碰了杯，以为那个“人”是阿木自己。

现在他睡不着，把这五个字拆开来，又装回去。图一个人。不用再害怕。那个“人”，未必是说话的人自己。

是谁，他不敢往下想。想下去了，这十二年就没处安放了。

第二天放风，他仰头看天，看着看着，想起阿木带他去过一回海边。漳州的海，灰蒙蒙的。阿木在礁石上站了很久，说：海底下什么都有，就是不说话。

当时他以为说的是茶。现在他站在这四面墙里想，那句话说的是海，也不全是海。

第二次律师会见，程序讲完，尹彦把手平放在桌上。

“您家跟我讲，一个人要是有二十个名字，他真名字在哪？”

律师没接。

“在他妈坟头。”尹彦自己答了，“年年有人替他去看。他去不了，我也去不了。”

律师收拾卷宗的手停了停，终究没有接话。

会见结束，尹彦被带了回去。经过放风场的时候，他仰头看了一眼天。漳州的冬天，天灰白灰白，叫高墙裁成窄窄一条，像一张没剪过的纸。

回到监室，小年轻凑过来，压低声音：茶老板，外头是不是有人给你递话了？

尹彦在铺板上坐下，半天，笑了一下。

“递了。”他说，“嘱咐我守账。”

“那你守不守？”

“守。”他说着躺下去，把薄被拉到下巴，“账在人不在。人总得有个搁东西的地方，我就是那个地方。”

熄灯了。黑暗里他睁着眼，把那五个字又数了一遍。图一个人，不用再害怕。数着数着，人睡着了，五个字还没数完。

梦里他回到华强北的档口。冰箱门开着，冷气一团一团涌出来，他在里面翻，翻出一袋橙子，削好的，泡在盐水里。他捧着袋子四下看，档口里没有一个人。

他想问一句谁送的，梦里没问出来。醒来的时候天刚亮，监室的水泥地上落着一线白。

◆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汉口，沿江大道。

文投集团十一楼的尽调会议室，落地窗正对着江。江上起雾，货轮鸣笛，笛声也是湿的。

尽调的名目印在文件首页：关于“嘉木茶事”品牌合作暨高管关联事项的合规审查。集团的规矩，高管婚姻有重大变动计划，与合作品牌之间的资金往来、供应链、涉诉情况，一律过法务。婚事原本提上了日程，合规这关，谁也替谁绕不过。承办人一栏写着：小周。

启动会开在十一月最后一个周一。合规部念函，审计口列清单，投影上打出六页尽调框架。罗成峰坐在主位，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话：照章办事，涉及本人的环节我回避签字，你们对事不对人。

散会的时候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对小周说：该查到哪一层，就查到哪一层，莫替我省心。

小周应了。走出会议室他才发觉，自己手心也是潮的。老板越体面，事情越大——这是他入职三年学到的第一课。

小周一九九〇年生，入职第三年。入行时带他的老师傅说过一句话，尽调做的不是生意，是假设最坏。他把这句话贴在工位隔断上，贴了三年。

他花三天拉出“嘉木茶事”近五年的供应商名录，三百多行，一层一层剔，剔到最后，茶饼与老茶的货源集中在三家漳州公司。三家公司在八月那场收网里都上过新闻：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立案侦查。

他调了三家公司的工商登记。历史法人、股东、监事，翻来覆去都是同一个名字——陈小满。这个名字名下关联的企业，全国还有十几家，注册时间挤在同几个月，注册地址是同一栋楼的不同房间。

他给那栋楼属地的人打电话核实。对方查了半天，回他：那个地址登记在册的企业有四十一家，实地一家也找不着。小周道了谢，挂了电话，在底稿上写：壳，套壳，壳连壳。

写到第三个壳，他把笔放下了。干这行三年，他头一回觉得“合规”两个字这么沉——合规是做给人查的，可有的人，从起步那天就没打算让人查。

发票也有异常。品名写“茶叶-陈年”，金额又整又大，物流单据显示从漳州发出，货款到账，隔天原路转出，末了汇进一个个人账户。小周把这条线在底稿上描红。财务上管这个叫资金回流，税务上管这个叫虚开，刑事上管这个叫什么，他没敢往底下写。

再往细里核，破绽更密。发票品名写陈年茶饼，物流回单上写的却是茶坯，一进一出对不上；三家公司的开票员是同一个人，社保却分别挂在三个省。舆情监测送来的报告也到了：品牌关联词热度陡涨，排第一的词是“做旧”，排第二的，是“塔吊”。

小周把报告合上，在封面写了两个字：存疑。看了看，又添了一个问号。

下班时同事约他打球，他摆摆手。坐进车里没打火，把白天的记录本翻开又看了一遍。老师傅那句话的后半截，他今天才听懂：根，就是钱最后停在哪儿，人最后停在谁身边。

访谈排在周二。他开车去天门，到西湖路时早市刚收，锅盔炉子还冒着热气，甜香的焦壳味漫了半条街。店面不大，玻璃门内侧贴着一幅开业那年的剪纸窗花，褪色了，没换。

他把车停在街口，步行十分钟过来。街对面就是西湖，湖面有雾，茶经楼在雾里只露一个顶，像浮在半空。他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觉得选这个铺面的人心里有数：买茶的人抬眼是湖，湖那头是楼，楼里供着茶圣。这生意做的不只是茶，是人心里那点想靠近干净东西的念想。

越是这样，他手里的提纲越沉。

蓝溪系着围裙出来，二十六岁，话不多，先给他倒了一杯茶。

茶是好茶，头一泡就出汤利落。小周端起来喝了一口，烫，没放下，又喝了一口。访谈先喝完人家一杯茶，是他的规矩，也是试对方的规矩——她把茶递过来，站在边上等，说明她的规矩比他的大。

果然，问题单头一页走完，蓝溪一句废话没有。

问题顺着提纲走。进货渠道，答：合同都是唐老师签的，我只管店。账期，答：财务在我之上。涉诉，答：没有。问到“陈小满”三个字，蓝溪端杯子的手停了半秒。

“没听过。”她说。

那半秒很短，小周看见了。他在记录本上画了个圈，没有追问。访谈这行有句行话，第二遍问出来的话，只值第一遍的一半。

访谈进行到一半，有个老主顾推门进来，买二两今年新的毛尖，顺口问：十一月十八店里有活动吧？搞个品鉴会？

蓝溪说没有，那天封仓。老主顾笑了，说你们这规矩比法定假日还硬。蓝溪也笑，没接话，低手给客人称茶，秤杆抬得平平稳稳。

老主顾走的时候，蓝溪送到门口，回身把玻璃门上的铜铃扶正。那铃很旧了，响声却清。小周看着，忽然想起家里那把落了灰的吉他。有些东西不常响，可一响，你就知道它没坏。

小周把这一幕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全店上下，把那一天的闭店，过得像过节一样郑重。

访谈结束，蓝溪送他到门口。门帘挑起来的时候，她忽然说了句题外话：周律师，你们查你们的，别吓着客人。这条街的生意，是一茶一叶熬出来的。

小周说好。他听得出这不是威胁，是托付。威胁可以交给法律，托付只能交给良心。

最后他问店里的经营习惯。蓝溪说店有店规，三条：不问价值，不问来路，不问十一月十八。

“十一月十八怎么了？”

“封仓是唐老师入店的规矩，比品牌还早。”蓝溪把茶则摆正，声音平平的，“那天闭店一天。谁问都不开门。”

“唐老师自己那天来店里吗？”

“不来。”蓝溪说，“她定规矩，不是修假。封仓就是封仓，人不到，店也关。”

小周在本子上画了第二道线。一个品牌的创始人，旗舰店开业在即，偏偏约定这一天人不到、门不开。合规上这叫内控缺陷，他受过训练的脑子这么告诉他。他受过训练的胃，可不这么觉得。

出门前他问了最后半个问题：开业的事，唐老师最近来店里多吗？

蓝溪擦着茶则说，不多。她讲话办事都在电话里，见面少。

“那你们不怕出错？”

“店规在，错不了。”蓝溪把茶则收进柜子，锁上，“我们这行，规矩比人牢靠。”

小周走出店门，回头看了一眼那块褪色的剪纸窗花。太阳出来了，街上的锅盔炉子又支起来了，白汽一股一股往上冒。他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上，忽然很想吃一口热的。

回汉口的高速上起雾，雨刮摇了一路。小周脑子里过了三天的东西，都是碎的，拼不拢，可每一片都是凉的。

夜里他在数据库里检索“嘉木”两个字。跳出来的第一条是二〇一一年五月的地方报道，《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报道写冠军的茶席，茶旗上绣着“嘉木”二字。记者问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十六岁的冠军答：家人取的。

第二条是那个博主妹妹的系列，《剪纸的男孩》，终篇后记的转发量过了百万。他顺着目录往前翻，在第二篇里撞见一句：被害人沈松庭，其子沈嘉木，时年十一岁；二〇一〇年起，下落不明。

他没有停手，接着搜出第三条：前年十月的选址公告，嘉木堂，落子望湖仓旧址。配图的规划图上，项目红线正压着河道与老仓的地界。新闻末尾引了一句答复，问她为什么选这里，四个字：欠这里一炷香。

小周把三样东西各自打印出来，并排摆在桌面上。左边一张，茶旗“嘉木”，“家人取的”。右边一张，死者之子，沈嘉木。底下垫着那张选址公告。

台灯底下，三张纸安安静静。他把手机也摆上去，屏幕亮着，是那篇终篇后记的截图。四样东西凑齐了，像一个还没人敢念出声的案由。

他又抽出一张便签，写下两串日期。十一月十八，封仓日。十一月十八，命案日。写完这两行，他的手心出了汗。四个词在台灯底下排成一个方阵，谁也不挨着谁，谁也躲不开谁。

他干这行三年，头一回想给委托人打电话退货。这单尽调查下去，退婚都算是轻的。

窗外江雾漫上来，对岸的灯一盏一盏糊掉。他把两张打印纸对齐、叠好，锁进抽屉最底层，然后拿起手机。

“罗总，有事，当面说。”

对话框跳了两下，回来两个字：上来。

小周把手机扣在桌上，起身去茶水间接了杯热水，没喝，捧着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江雾把轮船的汽笛泡得发闷。女朋友晚上发来消息，问他周末回不

回，他打了个“忙”，删了，改成：这两天有事，忙完去找你。

有些字，要趁手还没抖的时候发。

窗外，江上最后一班轮渡拉了一声笛，很长，像叹气。

小周收起手机，在电脑上新建了一个尽调文件夹。他先敲了“善后”两个字，光标闪了三秒。

他删掉，改成“还账”。

◆

二〇二四年岁末，十二月三十日，天门，市局。

鉴定回函是下午到的。省厅物证鉴定中心的文字检验意见书，一页纸：编号，检验过程，特征比对表，末尾是结论。

检材：手抄《茶经》半页，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搜查扣押。样本：沈嘉木小学作业存根三页，二〇〇五年原始卷宗附卷，经二组依法调取。比对意见：两者书写水平虽随年龄自然增长，但起收笔动作、运笔方向、字的结构等习惯特征符合点众多，质量高，系同一人书写。

附注一行：书写人存在稳定的左手书写习惯。

比对表附了六页，左右两栏并排。左栏是二〇〇五年那个十一岁的孩子写的生字，右栏是十九年后那半页《茶经》。横还是那个横，收笔还是往左下带。有一处工程师用红笔圈了出来：两个“茶”字，木字旁的竖钩，一个写得重，戳破了纸；一个收得极轻。不同的力气，同一条运笔的路。

蒋阔把结论那段念了两遍，把意见书摊在桌上，用手掌压平，像压一张会飞走的纸。

送检对接的文检工程师在电话里解释过原理：人的书写习惯一旦定型，跟嗓音一样，装不了半辈子。隔着十九年，笔画会老，结体会松，可起笔藏在左

边的那个劲儿，磨不掉。工程师末了说了句题外话，说他做了半辈子文检，头一回见检材是一句《茶经》。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工程师在电话里念了一遍，说，“这半页字，定一个人的生死。”

“不是生死。”蒋阔说，“是在不在。在，就还是刑事案件；不在，就只剩一份关于失踪的备案。”

“人还活着。”他挂了电话，跟办公室的人说，“从没走远。”

办公室里没有人接话。窗外操场上，年轻民警在跑圈，号子声一阵一阵传上来。

信封比想象中薄。蒋阔把它重新装好，站了起来——多年养成的习惯，要紧的东西，站着送。他抓起外套往外走。

“去哪？”小桂问。

“送信。”他说，“这种信，不能用电话念。”

车开到一半，他在路口停了停。红灯，雨刮慢慢摇。他想起十九年前自己在现场说过的一句话：字越少的文书越重。今天，这句话回来了。

老竺是傍晚在家里看到意见书的。蒋阔送上门去，他在方桌上铺开蓝布——移交那天同一块——把意见书摆在正中，戴上老花镜，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读完进厨房烧水，给蒋阔沏了一杯茶。茶是新开的罐子，平时舍不得。

“蒋阔，”他说，“你师娘要是还明白事，今天该给她也倒一杯。”

蒋阔接过茶，没敢多问师娘的病，只问了句夜里睡得好不好。老竺说好，睡得跟年轻人一样。两个人都没戳破：这个病，越到后半夜越清楚。那不是睡得好，是老光阴回来找她。

第二天的专案调度会开在三楼会议室。战果通报不长：尹彦案移送审查起诉；骆驼的交代逐条固定完毕；账本、流水、十四笔“封仓”支出全部入卷；

漳州火场提取的物证还在检。

老竺坐在角落，面前摆的不是发言席的牌子，是一张列席证。二组上个月聘他做顾问，聘书是蒋阔送去的，他推了三天，最后收了，说：顾问费不要，给个能坐进会议室听的位置就行。

通报里有一条排在末尾，念的人一带而过，坐在角落的竺长生却听住了：纸货店的走访补齐了，老板娘指认了历年那个买纸的人——只要黄纸，不要又亮又滑的，一年一回，风雨无阻。今年八月以后，再没来过。

黄纸。老竺在笔记本上把这两个字圈了一圈。现场那张剪纸是黄纸，冷冻层包剪刀的棉纸发黄，那半页《茶经》也是老黄纸。这条链子上的人，认准了这一种颜色。

表格翻过一页，年尾的数字就冷下来了。

“下面讲时限。”蒋阔站起来，拔掉白板笔的笔帽，“故意杀人，法定最高刑死刑，追诉时效二十年。本案犯罪行为终了之日，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时效届满之日，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届满之后呢？”有人问。

“刑法第八十七条。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蒋阔在白板上写下“核准”两个字，笔迹压得很重，“案子不撤不销，改挂攻坚。查人不结案，力争时效内突破。核准比破案难。我们的窗口只有一年。”

角落里有人举手，问了个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当年不是立过案吗，立了案还受时效管？

“第八十八条讲的是立案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时效限制。”蒋阔说，“那要求当年就把人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这案子二十年，卷宗里连一张像样的嫌疑人画像都没有，靠不上。别抱侥幸，就当没有那条路。”

会议最后一项，是两案证据的对账通报：二组与二〇〇五案原卷的比对清单，列物证四十一项，可复核的十九项，已排期；原卷里那份“流窜作案”的倾向性意见，按程序启动内部复核。另外，调取尹彦案全案材料的函，当天发出；对齐守拙老人的走访排在下周——老人九十一了，耳背眼花，专案组怕等不了太久。念到这里，主持会议的人停了一下，补了句：当年定那个调子的老领导，去年过世了。

会场静了静。老竺在角落里记下两个字：下周。笔压得很重，纸背都透了。他没有快意，也不觉得晚。这笔账不是这么算的——二十年的欠账，从来不是哪一个人的，是所有绕着它走的人，一人欠了一截。今天开始，一截一截还。

会议室散了。白板上那两个日期还没擦，挨得那么近，像同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老竺把笔记本合上，跟着人流往外走。

走廊里人还没散尽。蒋阔追上来，与他并排走。

两个人下了两层楼。楼道里贴着年终总结的光荣榜，蒋阔的名字在第三排。老竺瞥了一眼，忽然说：你二〇〇二年刚进来那会儿，比现在瘦。

蒋阔笑：您记性真好。

“不是记性好。”老竺说，“是有些人，一眼就记住了。徒弟一样，案子也一样。”

“师父，若真突破了，您家想先讲哪一句？”

竺长生走了几步，站住。

“我想问他，冷不冷。”

蒋阔看着他，没有再问。两个人继续往前走，皮鞋声在空走廊里一下一下。

“师父。”蒋阔忽然开口，“这章为什么叫焙火，您知道么？”

“焙茶去水，存香。”

“对。火候不到，茶是青的，存不住；火候过了，一炉全焦。”老竺看着窗外，“这个案子焙了二十年，这几天，正是闻见香的时候。闻见香的时候，手最不能抖。”

蒋阔站定，朝他弯了弯腰，没出声。

夜里到家，玄关的灯亮着，是秀珍睡前给他留的，十几年没断过。她在里屋睡熟，呼吸很匀。老竺到床边看了一眼，替她把露在外面的手放回被子里。

他热了半碗剩粥，吃完，把台灯拧到最暗一档。

米面柜的夹层空了。铁皮箱连同铜锁都交了上去，钥匙串上的红绳磨得起毛。他开了半天柜门才想起来开什么——柜里只剩面缸和米缸，缸沿一圈浅浅的灰。夹层空了十九年头一回露底，像一个人把心口的东西掏干净了，反倒站得直。

笔记本的原件也在移交清单上。蒋阔照原样复印装订了一套送回来，他收下了。复印件上，当年笔画压穿纸背的地方，只剩一个浅浅的灰影。

“字是我自己的字。”他跟蒋阔说，“力气是别人的力气。够用了。”

他把装订的笔记本翻到第一页。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九日，钢笔字，笔画很重：

持剪者，手小。

那半行字底下，空了十九年。他每一年都翻到这一页，每一年都想过添点什么，每一年又都合上了。没有证据的字，写上去，就是脏了这一页。

窗外，城南方向的工地上，塔吊顶端的航空灯一明一灭，红光透雾，像一炉蒙着灰的火。十九年，那行字没有老，老的是他握笔的手。

今天白板上那两个日期，把十九年的空格推到了头。他想起走廊里蒋阔问的那句话——先讲哪一句。他想了一下午。告诉那孩子，你的手我们看了十九年？说不出口。想来想去，天底下只有一句问话，配得上这身穿了三十年的警服，也配得上围挡外那一躬。

不是你认不认。是冷不冷。

写完这一笔，他没有立刻合上本子。窗外那点红光还在一明一灭。他想起白日里意见书上那两栏字：左边十一岁，右边三十岁，中间隔着一整段没人看得见的路。这条路他是看不见了，可它的两头都钉在纸上，一头钉在作业本的格子里，一头钉在《茶经》的第一行。

他拧开钢笔，在那行旧字下面，添了半行新的——

手没变大，人长大了。

第十二章　茶凉

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上午，鸿渐路东段罗氏置业十七楼的会议室里，空调的热风嗡嗡地响。长桌上摆了二十几只白瓷茶杯，全是满的，全是凉的。

罗家开家族会议，主位那把红木圈椅永远空着——那是爷爷的位置。爷爷走了十一年，椅背的包浆一年比一年亮。罗成峰坐在下手第一位，面前一只牛皮纸袋，袋口缠着棉线。叔伯姑舅到了九个，角落里还坐着罗家的法务小周，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像抱着一台X光机。

老三罗成海摘下老花镜，开始念纸。念得极慢，一字一顿，像宣读什么判决。

"第一条，品牌方嘉木茶事的上游供应商，登记名叫陈小满。这个身份证号码项下的人，二〇〇八年已经死亡注销。一个死了十七年的人，前年还在福建签仓储合同。"

"第二条，漳州那间做旧工坊，去年冬天起火，账册茶货一并烧净。起火的日期，与福建警方控制绰号'骆驼'的仓管的日期，前后不差七天。火不是天火。这是小周团队的原话。"

"第三条。"罗成海顿了顿，把老花镜重新架回鼻梁，"品牌的'嘉木'二字，头一个出处是《茶经》开篇，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风雅，没得挑。第二个出处——〇五年松风茶行命案，死者沈松庭的独子，名叫沈嘉木。这个名字，从那年冬天起，天门再没有人用过。"

会议室静得只剩中央空调的风声。墙上挂着爷爷当年和省里领导的合影，玻璃框反着白光。二姑把亮着的手机屏摁灭了。大哥罗成岭用指节敲了敲桌面。

″成峰，该你说话了。″

罗成峰把牛皮纸袋拉到面前，解开棉线。里头是小周带人做了四个月的尽调报告，三册，资金一册，人脉一册，名字一册。每一页他都看过，不止三遍。

三遍看完，他仍然相信唐穗是清白的。

逻辑上她清白。品牌注册在她个人名下，上游一出事，合同切割得干干净净，违约金的追索从未碰过嘉木茶事的账户；养母的医药费、离婚分出去的房子，每一笔进出都对得上号，干净得像教科书。

人心上她也清白。这一年网上的话刀刀见血，她一句不辩；给山里小学寄茶寄了三年，汇款单上的署名永远是″一个卖茶的″；去年冬天城关下冻雨，她把店里所有姜茶拉到火车站，摆了一夜免费的热水摊。

可她连危机公关都是完美的。

道歉的时机、沉默的长度、露面的角度，精确得不可思议。罗成峰做了半辈子文旅，见过太多人当众塌房，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手忙脚乱，删帖、控评、买热搜，越扑越黑。只有她，每一次都像彩排过的。退职的员工没有一个出来说她的坏话，离开的经销商没有一家撕破脸，连火灾这么大的事，舆论居然三天就翻了篇。

完美得像提前知道剧情。

有一回他试探过她。饭桌上，他状似无意地提起漳州的火。她给他续了茶，说，火里烧掉的都是纸，茶在明处。他等下文，没有下文。就这一句。这句话他后来想了半年，越想越不知道是清白，还是攻防。

去年冬天，龚小凡那部《竟陵旧事》更到第六集，讲到十一年前，天门一中有个女生被拍立得照片威胁，转学走了，此后再没开过口。那一夜罗成峰没睡。美佳夏令营更衣柜里那几张拍立得，当时全家都当成恶作剧结了案，报警记录还躺在派出所的抽屉里。同样的手法，隔着十四年，先是别人家的女儿，再是他家的女儿。

两条路他都想不下去：要么唐老师护过美佳，要么吓过美佳。哪一条是真的，另外半条就更可怕。

"解约函我签。"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得像在念别人的事，"婚是我退。不用家族出面，不请律师谈条件。她要什么，给什么。"

罗成岭盯着他看了半晌。"文投那个项目呢？国资那一头，年底要审计。"

"项目重新招标。我引的线，我负责退干净。"

"你信她是干净的？"罗成岭又问了一遍，声音低了。

"我信证据。"罗成峰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页纸指到她身上。"

"纸指到她影子身上了。"二姑低声说，"这不一样么。"

没人接话。

"小周，你说句公道话。"三叔开了口，"从法律上讲，这位唐小姐有没有问题？"

小周合上电脑，想了三秒。"报告里没有一个'涉嫌'。但有十六个'无法排除'。"

"十六个。"罗成海把眼镜摘了下来，"做买卖的都懂，一个'无法排除'就够要命了，十六个，是要命的要命。"

三年前他第一次见她，就是在文旅项目的评审会上。别人讲方案都盯着投资方的脸，她不。她的视线落在每个人眉心那一点上，不多一寸，不少一寸，像在给全场的人逐个装订。轮到她发言，她只说了一句：陆羽的一生是一条动线，我们把游客放进去走一遍。那天整个会议室的人都鼓了掌，罗成峰也鼓了，鼓完才发现自己的茶杯不知什么时候被续满了，温度刚好能入口。

订婚宴摆在二〇二三年十月，茶经楼下的酒店。她给罗家每个人备了礼，礼单细到二姑家的猫都写了名字，写的是猫的乳名，一个字都不差。二姑当时拉着罗成峰说，这孩子细心。如今最先主张退婚的，也是二姑。

还有一件小事，他谁也没说过。去年秋天两家人一起吃了顿饭，席上美佳不肯动筷子，唐穗把自己的碟子往孩子面前推了推，什么也没说。美佳低头，把那碟菜吃完了。回家的车上，罗成峰夸女儿今天乖。美佳看着窗外说，爸，我是害怕。他问怕什么。美佳想了半天，说，不知道，就是不敢剩。一顿饭吃出这样的规矩来，他当时只当是孩子认生。这半年来，那碟菜在他心里翻来覆去。

人心翻面，比茶凉快多了。

散会时，二十几杯茶一口没动。人走了，茶凉在桌上，杯壁内缘留着一圈浅痕，像谁画了一半又擦掉的线。

· · ·

晚上回家，美佳在饭桌前写作业。台灯罩着一圈黄光，草稿纸上的字迹又轻又密。退婚的事家里没打算瞒她，她也没问过一句。

"下个月你跟你姑去武汉住几天。"罗成峰说，"换换空气。"

美佳的笔尖停了一下，没有抬头。

"爸爸，我今天想起我妈的一句话。"

"哪句？"

"妈妈说，有的人眼睛里只有一面镜子。"美佳说，"唐老师眼睛里就有。"

罗成峰拎着水壶的手停在半空。壶里的水开了，呜呜地响，他像没听见。

"什么镜子？"

"照我们的。"美佳说，"我们哭，她就知道我们怕了。我们笑，她就知道可以往前走了。"

孩子她妈走了六年，走的时候美佳才八岁，母女俩一天也没见过唐穗。这句话不知是十四岁的脑袋自己长出来的，还是从哪个梦的边上捡回来的。罗成峰没敢再问。他怕一问，孩子就要认真解释，而孩子的认真，他承受不起。

美佳低下头继续写作业。台灯照着她的侧脸，眉毛像她妈妈，睫毛也像。罗成峰在门口站了很久，把到了嘴边的那句"不许胡说唐老师"咽了回去。

那句"想起我妈"在他耳朵里响了一夜。他翻来覆去地想，想不起来妻子说过这话。他甚至怀疑，妻子根本没说过。有些话是孩子替亡人说的，亡人在那边看不清了，托孩子带一句。

这一夜他睡了不到三个小时。梦里没有脸，只有一面一面的镜子，镜子里的人都在笑，笑声像玻璃相碰。

第二天上午，他把文投的项目文件拉回了家，关起门看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给市里写了一封信，主动提请对茶圣故里项目启动复盘审计，落款处按了私章。这一按，把自己的半生前程也按了进去。他倒不觉得亏。这些年他见过的好人不少，见过的聪明人更多，两头都占的，他只见过她一个。两头都占的人，往往两头都不是。

· · ·

解约函签在三月二十一日，律师楼的小会议室。唐穗那边没有来人，来的是一份签好字的文本，和一句口信：不追究，不解释，祝好。

违约金她一分不要。连罗家备好的补偿方案，也被她的律师原样退回，附一张便签，一行小字：项目是给天门的，不是给罗家的。

签字的时候，对面律师说了句场面话：唐女士说了，罗总是个好人。罗成峰笔尖顿了顿，问，她还说什么了。律师说，没了，就这一句。好人在她嘴里，比什么都重，也比什么都凉。

签完字出来，走廊尽头是一整面窗，望得见汉江方向灰白的天。小周抱着文件站在他侧后方，半年来第一次没穿正装，皮鞋上沾着没擦净的泥点。

罗成峰在窗前站了一会儿，忽然开口："小周，我问你一句。如果我装作冇看见呢？"

小周收拢文件的手没有停。

″那我就要装作不认识您家。″

罗成峰笑了一下，笑得比不笑还难看。″这是威胁么。″

″这是辞职预告。″小周说，″报告我做完了。做完，就交给该收的人。您签您的字，我送我的信。两不相欠。″

罗成峰点头，没有回头。他听懂了。小周的报告里那三册纸，此刻正躺在小周的包里，早晚有一天会离开罗家的抽屉，走到他管不着的地方去。他奇怪的是自己竟然松了一口气——像替一个背不动柴的人，卸下了担子。

两人在走廊尽头分了手。小周往电梯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从包里抽出一页纸，放在他手里。是那首《六羡歌》，打印的，底下用铅笔标了一行小注：她店里所有包装的衬纸上，都印着这一首。您看看最后一句。罗成峰看了。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当晚他把车里那盒没拆封的茶拆了，衬纸在。后来他把全家的茶都拆了一遍，衬纸收了一抽屉，谁也说不清那算证据，还是算念想。

戒指是当天下午退的。罗成峰没让人跑腿，自己开车去了西湖路。老店的玻璃门里灯还亮着，他隔着门望见柜台后那个身影正低头给客人包茶，棉纸折得棱是棱、角是角，包好的茶包摞成一列，像一队等待点名的小兵。他把绒盒交给前台，只说了一声″给唐老师″，没留名，没上楼。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灯还亮着，玻璃上映着他自己，一个渐渐变形、渐渐淡去的人影。

回到自己办公室，天黑透了。他拉开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想把这几年的私人物件归置归置。抽屉最深处，两盒样品茶的底下，压着一饼茶。

前年冬天乔迁，她送的贺礼。当时一屋子人，礼一堆，谁也没当回事。她当时只笑着说了一句，茶要压得紧，才经得住年头。

他把茶饼取出来。棉纸让茶油沁得半透，内飞上一行小字：千羡水桩·壹玖伍捌。

简明堂公开质疑过的那个桩。碳十四实锤做旧的那个批次。市场上炒到八万一饼、又在一夜之间无人敢认的那个名字。

罗成峰捏着茶饼，在台灯底下站了半分钟。

她为什么偏偏送这一饼？贺乔迁，还是存一件东西在他这里？是随手，还是托付？饼茶压得紧，经得住年头——现在想来，这话像谜面，也像谜底。他忽然发现自己从头到尾没弄明白过这个人，一点也不明白。

他把茶饼放进保险柜最上层，又手写了一张字条压上去。想了想，只写了两个字：

物证。

柜门合拢，锁舌进槽，咔哒一声。钢门上映出他自己的脸，五十三岁，鬓角白了一半。那张脸望着他，像一个刚从梦里醒来、还不知道梦外更冷的人。

窗外，阴了一冬的天，滴滴答答落起雨来。

◆

二〇二五年四月，西湖路的老店比往年空。

橱窗里那套"千羡水桩"撤了下来，换上粗陶罐插干荷。进店的客人少了三成，进来的也多半不买，站在门口看一眼"嘉木茶事"四个字，又退出去，像怕沾上什么。有熟客远远绕开这条街，宁可多走两百米。

舆情是从三月烧起来的。小凡的《竟陵旧事》更到第九集，弹幕里有人把"退婚"两个字刷成瀑布；本地论坛的帖子标题起得刻毒：《茶圣故里的女老板，连罗家都不敢要了》。跟帖里翻旧账的、编故事的、装好心劝人避雷的，一天几百层。平台的限流通知下来那天，客服姑娘哭了——不是委屈，是松了口气，她说她一天回八百条私信，回到最后不知道自己在替谁道歉。

先是经销商。襄阳的万总、宜昌的陈姐、荆州的胡总，三份解约函前后脚到，措辞一封比一封客气，客气得像白事。万总还多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叹了三口气，说了一句人话：蓝店长，不是我们不讲情分，是货架上摆不住说不清来路的东西。

然后是自己人。主播小蔓走了，运营老周走了，仓库的关叔把钥匙压在前台，说了句"老板娘是个好人"，也走了。走的人一个比一个轻手轻脚，好像这里不是辞职，是逃难。

招聘启事在玻璃门上贴了两个月。来的两个人，都在试用期内走了，走的时候连当月工钱都不敢要。

留下的人也不好过。三月里攒下的订单，四月退掉了一半，退货的纸箱在仓库门口码成一堵墙。有一箱是从东北寄回来的，箱底压着张字条：茶是好茶，可我现在喝不出好了。蓝溪把这张字条收进抽屉，收到后来，抽屉里的字条越来越厚，她索性换了个铁盒。她替唐老师挡了三次采访。第三次，记者在门口守到晚上十点，她递出去一瓶热水，记者接了，道了谢，什么也没拍。第二天帖子只发了一行：店里有个替人挡事的小姑娘。

话是这么说，账不会陪人念旧。四月的房租、五月的货款、六月的工资，样样照旧。蓝溪盘过现金流，撑到开业没问题，撑到夏天就难说。她把三份续约合同压到唐老师桌上，房东的、茶园的、印刷厂的。唐老师一份一份签完，签得又快又轻，像在替她把往后的路，一段一段铺平。

四月中，蓝溪把辞职信写好了。写了撕，撕了写，最后留下的一版只有三行：唐老师，我家里有事，做到月底。对不起。

她把信压在枕头底下，压了四天。这四年夜里，她一躺下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一下一下，像有人在敲门。

写不下去的缘故，她也说不清。论理，店里这光景，走是唯一聪明的走法；道理她全懂，脚不听。前年最难的时候她也写过一回，唐老师看完，没说话，递给她一把剪刀、一沓棉纸：帮我包完这批。两个人坐到天黑，包了三百包茶。信呢？信后来垫了茶罐。

第五天早上，她把信放在了唐老师桌上。

唐老师正在二楼的小间里泡茶。泡的是最便宜的口粮绿茶，玻璃罐上连标签都没有。九年来蓝溪没见她喝过一次店里货架上的茶，最贵的、最老的、最

有来头的茶，她只用来待客。她看完信，没有一句挽留的话，先把信折好——沿着蓝溪写过的每一道折痕折回去——压在茶则底下，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文件袋，推了过来。

文件袋里是一份《开业事务全权委托书》，签名和印章都已齐备，落款日期是昨天的。

离职信还没递出去，授权书已经打印好了。

"店是你的了。采购、定价、用人、开业流程，你说了算，我只管到场。"唐老师说。她给蓝溪续了水，自己那杯从头到尾没动。"茶坏了，不是茶的错。你要是走，才是我的错。"

蓝溪后来用了很久都想不清，那天留下，是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还是被这两句话套住了。这两句话像一双极合脚的鞋，她一穿上，就再没脱下来过。

分不清，就是她的病。

那天夜里她把这两句话拆开来想。茶坏了，不是茶的错——这话对，茶没有错，错的是做茶的人、卖茶的人、把年头当生意做的人。可这话从唐老师嘴里说出来，又不对，像把一屋子人的错，轻轻扫到了一个谁也看不见的角落。你要是走，才是我的错——这话更对，也更不对。对在她是真舍不得，不对在唐老师从来不说舍不得的话。

她想了一夜，没想出答案。天亮的时候只想明白一件事：这两句话，一句往左，一句往右，她被夹在正中间，动不了了。动不了的人，就只好留下。

九年前她来应聘，简历只有一页，问的却只有一个问题：你怕不怕一个人守店。她答不怕，第二天就上了班，工牌上烫着零零一。上岗第一天，唐老师教她店规三条：不问价值，不问来路，不问十一月十八。她当时以为最后一条是歇业日，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年里唯一一天，店门上锁，人也找不到。再后来教她识茶，第一课就一句话——啜苦咽甘，茶也。那时她不懂，如今懂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她不敢懂。

九年里她搬过两次家，工资涨过五次，每一次调薪的通知单都是唐老师手写的，字压着格子写，一笔不多。她妈催她相亲，她把工牌拿给她妈看：零零一。她妈说，一个卖茶的，编号倒像国营厂的。她笑笑，没解释。有些地方给不了人大富大贵，可它记得你来的是哪一天。

二楼小间的墙上挂着店里唯一的照片：一位老太太站在念庐门口，手里拢着一把紫砂壶，笑得很淡。蓝溪没见过那位老太太，只知道唐老师每年清明前后会带一饼茶出门，回来时茶没了，壶底是湿的。

留下来的那个晚上，她开了直播。直播间还是那个号，白鹭，九年没换过。二〇二〇年春天封在店里，她就是用这个号开的第一次播，那时候满屏都在问什么时候解封，如今满屏都在问你还走不走。她没上货，就坐在店里喝茶，喝的是关叔走那天没带走的半罐毛尖。进了三万多人，评论刷得像下雪。有个老粉问：白鹭姐，你是不是也快走了。

她把评论关了，私信关不掉。有个ID每晚都来，不发一言，下播前送一枝电子玫瑰。连着几年了，账号年年换新，送礼的时间总在十一点十八分。蓝溪起过疑，又骂自己多心。今晚，玫瑰照旧来了，十一点十八分，一秒不差。她盯着那枝玫瑰看了很久，截了图，存进一个从不打开的相册，相册的名字就叫：十一。她不知道对面是谁，也不知道这算陪伴还是清点。九年了，有个人比谁都熟悉她的下播时间。这念头让她后颈发凉，又莫名心安——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谁，每晚确认她还在。

下播以后，她一个人洗了八个茶杯，洗到第七只，水凉了。

· · ·

五月初盘库，为开业调货。城西库房三排货架，一排饮品，一排器物，七号库在最里头，恒湿机嗡嗡地转。台账上那批代号"作业"的货——做旧的老茶，漳州的来路，店里的暗语——整库是空的。

地面上留着托盘拖过的四方印子，灰上有印，印是新的，一共二十四个方印，码得整整齐齐。卷帘门的挂锁好好的，锁身上连一道新划痕都没有。库房

钥匙只有两把，她一把，唐老师一把。

蓝溪蹲下去看门轴。门轴上有油，新上的。她的目光又落在墙角的监控上——七号库的探头去年报过修，维修单压在总务那里，一直没批。这库，是个盲区。

温湿度记录仪挂在门后，屏上的曲线干干净净，从上个月十号起是一条直线。仪器没坏，是被人关过又打开的。蓝溪把日子抄在手心，又把手心的字搓掉。有些日子，落在纸上就是证据，落在心里才是心事。

电子台账干干净净，出库记录一条没有。像那批货从来没存在过。可是搬空一库茶要连夜跑七趟，要车，要人，要时间。谁干的，什么时候干的，货去了哪里，答案其实只有一层窗户纸。

蓝溪举着手电，在空库里站了很久。手电的光柱里浮着灰，一粒一粒，慢慢落回去。她想起店规三条。九年了，头一回，她想问。

她想问的话在喉咙里滚了一滚：谁搬的，搬去了哪，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三问都到了嘴边，又被第三条店规压了回去。店规是唐老师定的。可她头一回觉得，这三条规矩护的未必是店，是店里的某一个人。

盘点表拿回办公室，那一栏她的笔尖悬了半天，最后写了两个字：在途。

没有报，没有问，没有提。她把盘点表订进文件夹的时候，手指稳得连自己都陌生。九年里她学会了不问。今天她学会了更坏的一样：知道了，不说。

下午唐老师来店里对开业流程，照旧问了销售额，问了装修，问了直播排期，问得又细又稳，一样没落下，一样也不多。蓝溪一件一件答。答到末了，唐老师说，辛苦。转身下楼的时候，蓝溪看见她在楼梯口停了半步——就半步，像有什么话到了嘴边，又被她自己咽了回去。

晚上蓝溪核对开业账目，把一张张单据过了一遍。过到最后一张，是唐老师私人垫付的一笔运费，三千二，垫了三年，从没提过报销。她把这张单子单独收好，收进铁盒最底下，和那些退货的字条、和店志，睡在一处。

她也有秘密了。有秘密的人，走路都轻。

那天晚上，她把七号库的钥匙用红绳缠了三圈。钥匙还是那把钥匙，分量不一样了。

那天夜里她在店志上写了一段话。店志是她的私人日志，从入职那年记起，记了九年。她写：

"我跟了她九年。九年里我学会的第一件事是不问，最后一件事是不问。今天我想学着问一句：老板娘，您家的'简历'，写完了吗？"

写完，她把店志合上，压进柜台最底下的抽屉，和九年来的钥匙、票据、工资条睡在一起。

窗外西湖的水黑着。对岸茶经楼的轮廓灯十一点准熄，像一句准时咽回去的话。

写完那句问话，她自己吓了一跳。九年了，这是她头一回在心里给唐老师起了个新名字——简历。人人都有一份简历。唐老师摆出来的那部分那么干净，干净得让她想起七号库地上的二十四个方印：东西搬走了，印子还在。

◆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汉口，一盏楼。

老洋房的百叶窗只开了两扇，光柱里浮着茶末。柜台后头的博古架上，七只茶盏按七个徒弟出师的年份排开，最末一只空着——第八个徒弟，他一直没肯收。简明堂七十七岁，签收挂号信的手已经很稳了。做了一辈子茶鉴行尊，手稳是吃饭的本事，也是害人的本事——手一稳，就容不得假。

一盏楼不做门面生意，只做鉴定。行里送来一罐茶，他上手、开汤、看底、验纸，三天给话，给的话就是行话里的秤。楼里常年养着三样东西：一杆黄铜秤，一只旧炭炉，一摞退回来的茶。退回来的都是他验过说不好的，卖家不肯要，他就在后院码着，码了半墙。有人笑他存一堆破烂。他说，这不是破

烂，是判例。往后谁再拿一样的假货来，他就搬一饼下来，摆在人家面前，一个字不用说。二〇二二年秋天，他把千羡水桩的疑点写成公开信发出去，一夜之间，半条街的茶庄把他的电话拉黑，另一半请他喝茶。他哪儿都没去。那年冬天家里年夜饭，晚辈敬酒，说爷爷是茶界的清官。他喝了那杯酒，夜里没睡踏实。不是酒的事，是"清官"两个字，像一顶帽子，压得他想起该办没办的事。

信是邮局转来的，两份。一份打印公函，抬头"竟陵旧事工作室"，落款龚小凡，公事公办，请求公开二〇二三年那批检测的原始数据与方法，函末附着律师的名字。另一份手写，只有几行：

"简先生：我哥龚一凡，二〇二〇年在您楼下的茶摊上听过您讲'羡'字。他说天门茶圈里，只有您的耳朵认得出做旧的嗓子。哥哥没了，案子还在水里。求您把尺子借我们一用。"

字是圆珠笔写的，笔画收得急，像写的人不敢写长。字是圆珠笔写的，笔画收得急，像写的人不敢写长。

他把信在桌上摆正，又去柜子里翻出一本旧登记簿。二〇二〇年秋，来客一栏他记过一笔：天门，龚姓兄妹，问羡字。字迹是他的，日子没记全，只记得那天楼下卖凉面的摊子出摊晚。人老了，脑子里的日子都散了页，可有些页码，手一摸就知道在哪儿。

第三遍看完，他起身去里屋，捧出一只樟木匣。匣里锁着二〇二三年四月那场和解的协议。

和解是签过的。那年春天，碳十四和纤维检测实锤了做旧，舆论哗然，对方赔了该赔的，他也签了字。签字那天他心里发凉：行家的官司打赢了，茶客的舌头却输定了。第七页第九条，他当年一笔一笔读过：双方不得披露检测对象、交易条件与对方身份。

他没有律师，但有老朋友。电话打到上海路一家所里，老潘在那头把协议翻了十分钟，笑了一声："白纸黑字，禁的是对象、身份、条件。没禁方法。方

法是人类共有的。″

″那就给方法。″简明堂说。

老潘又补了一句：报告你随便给，别人拿了去做什么，与你无关。他说，与我怎么无关。老潘说，刀是铁匠打的，用刀的事，铁匠管不着。简明堂挂了电话，想了想，又拨回去：那要是有人拿这把刀，去量我量过的东西呢。老潘在那头笑了：那不正好，两把尺子，量出一个准数。

他用了一个星期。碳十四的取样部位与预处理、棉纸纤维的染色对照、内飞木刻版的刀口比对，逐项誊清，绘图，拍照。凡涉及对方的一律涂黑，涂黑的地方他用了同色墨补底，远看是一页干净的纸。

誊到第三天，老花镜换了两次。有一页纤维图谱，他年轻时一眼能认的染色差异，如今要在放大镜底下看足十分钟。他不用年轻人代笔。这些字必须从他自己的手里过一遍，像出诊的大夫，病人的脉要自己搭。报告末页他附了一张放大照片：伪印″羡″字第三笔上那个豁口，像一颗缺了的牙。

又附了一页手写的《致看报告的人》：此法人人可用。用之于茶，茶幸；用之于史，史幸。写完他自己笑了——七十七岁的人，措辞像个侠客。

这个豁口他记了十年。二〇一五年，第一批假″五十年陈″过他手，他就是被这个豁口硌了一下牙，从那天起再没咽下过一口糊涂茶。行里人说他魔征，他不辩。天下的真话，开头都像魔征。

公开信发出去那年，有人半夜往他楼道里泼过一次油漆。他第二天照常开门，坐在楼下的茶摊上，给过路人免费看茶，看了一个冬天。茶摊后来成了小有名气的摊子。龚家兄妹来喝过，一坐一下午。老人记得那兄妹俩——哥哥话多，妹妹话少。妹妹临走问了一句：简爷爷，假的茶喝多了会怎么样。他说，喝多了，人就不认得真的了。

省城的实验室是他一个老学生主持的。五月下旬，老学生开车来接他，一路上劝：您这个年纪，何苦。他不答，只在过江的时候摇下车窗看了一眼水。

到了实验室，质谱仪嗡嗡地转，冷气开得很足，他把手揣进白大褂，像个新来的学徒。

留样是他私存的。和解那年，对方送检的样他在指缝里扣下三撮，包在桑皮纸里，贴身放了两年，纸包上的汗渍洇出了深浅不一的黄斑。仪器吐数的那天下午，他在机房坐到天黑，中饭是老学生给带的盒饭，凉了他也没动。

″数据是死的，仪器是活的，我这条命是闲的。″他对老学生说，″闲人的事，就是再跑一遍。″

数没有变。数不会变。变的只是肯不肯看的人。

回程的车上，老学生又劝：老师，数据您也有了，方法您也给了，剩下的事让年轻人去跑吧。简明堂看着窗外，江面上有船，一艘跟着一艘。他说，我十九岁进茶行，师傅教的第一课是看底。底看了一辈子，最后看明白的是——茶有没有底，要看人有没有底。老学生不说话了，把车开得很稳。

过江的时候堵了一刻钟。江对岸的高楼滚着巨幅广告，某品牌老茶，一九四八，尊享过往。简明堂看着那四个字笑出了声。一九四八，他出生那年的事，广告比他本人还清楚。历史进了广告，就剩下四个字，像把一条江压成一枚邮票。

回汉口的第二天，有年轻记者打来电话，问他怕不怕被告。他在电话里笑，笑完说：″我鉴了一辈子茶。假的茶，毒不死人；假的年月，毒死历史。″

记者又问，图什么。他望着窗外的梧桐，半天，说了两个字：对账。

记者追问：对谁的账。他没答，把电话挂了。对谁的账？对写《茶经》那个老头子的。人家一千二百年前就把话写明白了，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人参假了要命，茶假了，要的是命底下的年月。

挂了电话，他又给省台一个老熟人打电话，只交代一句：这两天要是有人问起一盏楼，照实报，别加花头。老熟人在那头笑：简老爷子，您这是要出名啊。他说，我不是要出名，我是怕人把我写小了。一把年纪，就剩这几两真东西，经不起掺水。

那天夜里他睡不着，用手机看完了《竟陵旧事》的第九集。看到那个坐在塔吊阴影下讲哥哥的姑娘，他关了屏幕，在黑屋子里坐了很久。他这辈子签过字、赔过钱、守过约，他一直以为守约就是守住体面。现在他知道自己守住的是什么了——是一口没吐出来的痰。

· · ·

六月初，他去了趟邮局。

老邮局的绿漆掉了大半，柜台里的大姐戴着套袖，头顶的吊扇摇得吱呀。前面排着三个人：一个寄汇款单的汉子，一个寄腊肉的婆婆，一个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的姑娘。轮到他，他买了挂号信封，把报告的复印件装进去，压实，封口，又在封口的骑缝处签了名——老规矩，防人半路拆看。

收件地址一栏，他一笔一画写：天门市公安局。

收件人一栏，他想了想，写四个字：积案专班。

寄件人三个字：半盏翁。

营业员大姐瞥了一眼，问，寄公安的？要不要保价。他说不用，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顿了顿，又说，里头的东西，比钱贵。大姐没听懂，惯常地笑，图章敲下去，三联单撕给他一联。

他把回执折好放进内袋，走出大门，又折回来，要了一张寄件存根。大姐笑他：爷爷，您这是寄信还是存证。他说，都是。

出了邮局，他没叫车，沿着江边慢慢走，走一段，停一段。七十七岁的腿，今天的劲格外顺，像卸下了什么。路过江滩，有孩子在放风筝，线放得极长，风筝小成一个点。他站着看了一会儿，想，线那头有人牵着，风筝才敢往高里飞。他今天放出去的这一只，线头攥在谁手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线是结实的。

走出邮局，落着六月的细雨。街对面茶馆里人声正沸，讲古的讲古，斗茶的斗茶。他要了一壶最便宜的粗茶，一个人坐在角落。茶泡老了，苦得发涩，

明早多半是要挨行里人笑的。他没续水，把一壶凉茶慢慢喝完了。

邻桌两个年轻人在斗茶，一杯正山，一杯外山，争得面红耳赤，末了请他断。他各呷了一口，说，都是真的，别争了。两个年轻人欢天喜地。他想，年轻人赶上好时候了，真茶还多得是。可他们不知道，真东西的年月，是能被人一饼一饼做出来的。他没说。有些话说出口，像往新茶里呵气。

啜苦咽甘，茶也。他教过七个徒弟。天门来的那一个，手最稳，问得最少，三年学徒，没打碎过一只盏。出师那天，她敬的最后一道茶，是敬给亡人牌位的。如今那孩子做什么生意，新闻里天天有。他一个字没点破，一个字也点不破——协议像胶带，封着他的嘴，封不住他的手。

那天夜里他又做了三件事。把一盏楼的老主顾群解散了；把柜里代卖的寄售茶全数下架退回；把那只空着的第八只茶盏从博古架上取下来，洗净，倒扣在案头。徒弟们打电话来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事，师父要出趟远门。

尺子已经借出去了。总有人量得出真的。

◆

二〇二五年十月中旬，竟陵老一中旁边的顶楼出租屋。

隔音棉钉满四面墙，窗帘常年拉着。龚小凡在这间屋里住了两年。白天她在城东的快递驿站分拣包裹，夜里剪辑。驿站的工作是她挑的：分拣不用说话，扫码枪滴一声，一件，再滴一声，又一件。她哥以前笑她，说这双手天生是拿剪刀的。现在这双手白天分拣包裹，夜里剪片子，剪来剪去，都是同一个字。

驿站的同事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这姑娘不讲话，分拣最快。站长说她上辈子是管仓库的。她听了也不恼。白天她谁也不是；夜里，她才是替哥哥守夜的人。两个身份隔着一顿晚饭，谁也不认识谁。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大事年表，从〇五年冬一直排到去年：哪一年谁出的事，哪一年哪份卷宗合上的，哪

一年视频下架的。纸边卷了，针眼密了，最末一行空着，留给她还没发出去的终章。

年表是她一根线一根线接起来的。有的格子能填上日期，有的只能画问号。她哥的遗物里有一本工作笔记，字越到后面越潦草，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灯不是从外面点亮的。再往下一行，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纸背都透了。

桌上有三件东西。

第一件，牛皮纸袋，装着简明堂寄来的方法学报告。碳十四怎么取，纤维怎么染，刀口怎么比，一条一条，像把尺子拆成了零件交到她手上。老人在扉页附了半行字：数据不会替人说话，但会说真话。她把这句话用图钉钉在了年表正上方。

第二件，一只没有寄件人的信封，邮戳糊了，只看得出是外省。里头一页协查流转单的复印件，边角有涂改带盖过的痕迹。一个叫陈小满的人：一九九四年生，天门乡下人，二〇〇八年车祸死亡，户口注销。可二〇一四到二〇二四，这个人在福建租仓、签收、开票、给工人发工资，字迹十年不老。是谁从哪一级卷宗里把这一页抽出来寄给她的，她不知道。她也不敢猜。这一页像一块从别人家墙上递出来的砖，递砖的手，她看不见。

第三件，一张存储卡。她哥的。二〇二〇年春天，他扛着机器拍空城，说是这座城欠自己一个明白。之后四年，他拍工棚，拍茶仓，拍旧楼，拍到二〇二三年九月。九月之后，机器还在，人没了，手机也再没找到。

塔吊那片文创园，她后来去过一次。塔吊还在，黄漆剥了皮，风一过，缆绳呜呜地响。她在警戒线外站了一下午。监控她申请看过，看得最清的一段里，她哥的背影走进画面，然后画面跳了十七秒。十七秒。她把这十七秒想了两年，想出过一百种可能，每一种都通向同一堵墙。官方结论下来那天，她把结论读了十遍，一个字一个标点地读，读到最后只读出四个字：勘查存疑。

存疑，就是没关死。她替他把这道门缝守着。

她哥做了八年自媒体，账号叫竟陵旧事。账号简介是他自己写的：把这座城欠自己的，一点点讨回来。他有个规矩，素材双备份，一版在硬盘，一版在网盘，密码是妹妹的生日。出事前一个月，他把网盘密码改成了妹妹的生日后头加一串零。小凡当时骂他无聊。现在她懂了，那串零是保险柜的门轴，转得越慢，锁得越深。

两年里她接到过三个匿名电话。第一个问，你还要发吗。第二个说，女孩子家，何必。第三个没说话，只有风声，很近的风声，像有人站在楼道里。她没有换房子。她把一把剪刀放在了门口鞋柜上。不是防身，是提醒：这个家现在剩一个人了，走不得。

存储卡里有一段二〇一九年冬天的素材：文化宫拆迁剩下的半堵墙前，齐伯坐一张小马扎，手里一刀红纸，剪一刀，说一句：

〞一个把纸剪进了楼里，一个把纸剪进了夜里。〞

画面糊，风声大。她哥在镜头外追问了一句什么，老人没答，低下头继续剪。这一段她剪进终章的片尾，一秒都没敢动。

素材库里还有一段她一直没敢用的：一四年十一月，茶经楼开放那天，她哥挤在人堆里拍了两分钟。画面晃得厉害，人声嘈杂，忽然静下来——是个孩子在台上表演茶艺。她哥的镜头在那孩子身上停了三秒，就三秒，然后移开了。她试过很多次，都下不了狠心把这三秒剪进片子。这三秒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像属于这部片子。

终章的名字，她早就定了：《二十年的灯》。

名字是她哥的。他生前最后一篇没发出去的稿子，标题就是这个，正文只有一段，写二〇二〇年空城那夜，他在茶经楼底下站到天亮，看见楼是黑的，湖是亮的，天亮前湖上过来一条小船，船头挂着一盏灯。他写：灯在人手里，从来不是照自己的。

三十二分钟。开头是〇五年冬天的卷宗封面照片，公开部分，一帧一帧；中间是做旧的链子——方法学的刀口，陈小满的死与活，一场火，一本账；结

尾，是"嘉木堂"的开业海报，十一月十八日，一盏灯等你。

她把海报和卷宗封面叠在一起看了很久。二十年前死人的日子，如今是开业吉日。这座城把这一天过成了庆典，请柬印得喜气洋洋，没有人记得它原来是什么。她哥记得。她替他记。

三十二分钟，她删了十一稿。有一稿，她把一个"唐"字剪进去过，剪进去，又删了。她哥的规矩：只摆纸，不点人。纸会说话。人一开口，事就变小了，变成恩怨，变成流量，变成两天热搜。她要让看的人自己走到那张纸跟前，自己停下来，自己睡不着。

发布时间，她定在十一月十七日夜里二十三点整。

选这个钟点，她算过。二十三点发布，刷到的是睡不着的年轻人；后半夜，截图会自己长脚，爬进每一个家族群；等到十八号早上，请柬和片子会摆在同一张早餐桌上。她想不出比这更公道的座位安排——让喜帖和讣告，挨着坐。

"明天他们开业，今夜发。"她对着空屋子说。墙上她哥的照片不置一词，笑着。

· · ·

十一月十七日夜，二十二点五十三分。

发布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做完，服务器排队的绿点亮着。就在这时，邮箱弹出一封新信。

无主题。发件地址是一串没有意义的字母。附件一张图，附件名只有五个字：1118.JPG。

她点开。一张剪纸的照片，拍得极正，像证件照。

一个女孩，双手举着一盏灯。灯罩里，关着一只蛾子。

剪工细得吓人。蛾子翅上的纹路一根一根都剪了出来，细得像怕吵醒谁。女孩的辫梢、灯座的卷云，全是同一路刀口。她认不出这是谁的手，可她认得

这种细——她哥的硬盘里存过齐伯的剪纸，一脉相承的细，细到让人脊背发凉。

她第一反应不是怕。是懂了。

蛾子是她。灯，是明天要亮起来的那一片灯。有人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告诉她：扑火的人，火已经在等你了。

她回信。退信。地址不存在。她查了发送头，查了路由，一路查到一堵墙。墙上什么都没有，像对着雪地喊话。

她把截图存进她哥的网盘，和存储卡的备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的名字她想了一会儿，敲了两个字：回信。

关电脑之前，她把那张照片又放大了一次。灯罩里的蛾子，翅膀是张开的，不是扑上去折断的样子，是停在里面的样子——像住在灯里。她忽然说不清这张纸是恫吓，还是挽留。可无论哪一种，都说明一件事：对面在看着她。看着，就还有对峙；对峙，就还没输。

她盯着那只蛾子看了很久，久到屏幕自动暗下去，屋里只剩窗帘缝里漏进来的一线路灯光。驿站的夜班闹钟在枕头边走，滴答，滴答。

然后她打开了网盘，新建了一个文档，收件人填她哥用了十五年的旧账号——那个账号去年起再也没上线过。她设定时发送：二十年后。

〝哥，蛾子是我。灯是他们的。可你教过我：扑火也是一种作证。〞

定时存好，绿点亮着。她把终章的发布确认键摁下，起身去烧了一壶水。水开的时候，二十三点整，窗外这座城安安静静，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她知道，有些话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她给自己也倒了一杯水。太烫，她就那么端着，站在窗前。城南那片天黑得干干净净。她哥说过，发这种片子要挑夜里，让睡着的人第二天醒来，像从别人的梦里醒过来。她挑好了。今晚全城都会睡得很沉。明天醒来，茶圣故里会多出一件谁也咽不下去的事。

那杯水她一直端到凉透，喝完了。两年了，她头一回睡了个整觉。睡前她把闹钟拨到七点。八点开门，九点人齐，她要挤在头一波客人里进去。她哥教过：到了现场，就别当记者，当个记性好的普通人。

睡前她又把终章的标题页打开看了一眼。《二十年的灯》。灯字她描了三遍，描得比别的字都粗。她哥说过，片子是给人看的，标题是给人记的。这一夜过后，这座城想忘，也得先记住这三个字。

窗外，这座城黑得踏踏实实。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早晨七点半，茶经楼景区南广场。

寒潮刚过，广场上的风像刀子。活动板房搭的筹备处前，工人正在挂横幅，红布在风里抖得哗哗响。蒋阔把警车停在路缘，下车第一眼看见的，是围挡上那行烫金大字：嘉木堂，十一月十八日，一盏灯等你。

安保对接会开在板房里。主办方报备的大型活动，预计人流量三千，公安依法对接。景区管理处、供电、消防坐了一排，主办方来的是个年轻店长，姓蓝，手里的文件夹包着塑料膜，问什么答什么，条理清得像本账。

问消防，她答，四个疏散口，指示牌今天下午全部换新，演练记录三份附卷。问医疗，她答，广场东侧设两个点，市医院出诊，药师带岗。问临时用工，她答，一百三十七人，名单、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明一式两份，下午送大队。蒋阔抬眼看了看这个姑娘。他办了半辈子案子，见过太多人被问三句就冒汗，这姑娘被问到第一百句，眼皮都没多眨一下。要么心里没鬼，要么鬼住得深。

蒋阔问一句，记一句。楼顶：嘉木堂两层，屋顶不安排人；茶经楼九层，夜间不开放，楼顶只有航空警示红灯。配电间：南广场地下，两路市电，外加一台发电车。临时工：一百三十七人，从北便门进出，挂牌上岗。停车场：东侧出口，单向通行。

会开到一半，他出去透气，站在广场边上点了根烟。风大，烟烧得飞快。他低头，看见脚边有一块矮碑，字迹让岁月磨得只剩浅痕：望湖仓旧址。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二十多岁的蒋阔跟着师父从这块地向北勘到河埠头，鞋印、石膏模、铁盒里的现金，一样一样过手。那时师父四十七岁，蹲在这里抽了半宿的烟。如今师父六十七了，这块地上面，立起了一座灯牌。

他掐了烟。二〇〇五年那晚，师父蹲在这块地界上说过一句话，他记了二十年：现场干净得不像没来过人，像来过的人把"来过"两个字也带走了。那时他不服，年轻，觉得证据不会说谎。后来他懂了——证据只说被人留下的话，留下的越少，说的越多。

供电的同志递来一份《试灯时间表》：十七日二十一时，内场试灯；二十三时五十分，景观照明预亮；零点整，全网联调满负荷一分钟，随即熄灭。

蒋阔把这张纸看了两遍，折好，收进内袋。他说不清为什么，这两行字让他不舒服，像一张写好了时间的战书。

散会时供电的同志问他，蒋队，夜里联调要不要警力配合。他说要，零点那一分钟，给我两个人守配电间。供电的笑了，说一分钟的事，至于么。他没笑。他说，我这半辈子，就是一分钟一分钟熬出来的。

小桂在旁边记完最后一行，合上本子问，阔哥，你说明天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他想了想，说，人多。人多，眼睛就多。这话没头没尾，小桂记下了，没懂。

下午回到大队，临时用工名单审核。

名单是下午四点送到的，蓝店长亲自送来的，牛皮纸袋，封口盖了章。蒋阔接的时候留意了一下：姑娘的手很稳，指甲修得很短。他照例说了一句，名单如有错漏，责任在报送方。姑娘说，我知道，所以我自己又核了一遍。说完就走，鞋跟敲在走廊上，一声一声，不紧不慢。

一百三十七个人，前科筛查跑完，绿灯一片。小桂伸着懒腰说阔哥这下能睡个整觉了。轮到第九十六号，系统卡了一下，弹出一行红字：

【该身份号码持有人：陈小满，男，1994年2月生。2008年8月16日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户口已注销。】

小桂凑过来看了一眼：″系统坏了？″

″系统没坏。″蒋阔说。他盯着那行红字，声音放得很平，″死了十七年的人，明天要来给嘉木堂接电。″

办公室里静了两秒。小桂的懒腰僵在半空。

他把招聘表调出来。照片上的人白，戴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紧急联系人一栏空白。

他又查了这个号码名下的近况。社保，没有。信贷，没有。航班车票，没有。一个活人，活成了一团空气。可就是这团空气，明天要爬上梯子，亲手把电送进那片灯里。蒋阔在草稿纸上画了一个人，看看不像，又把人涂掉，画成一顶帽子。他又调福建警方协查卷，骆驼的笔录他两年前就背熟了——问长相，答：白。左手使剪子。十年不见老。

签名比对。漳州二〇一四年租仓合同上的″陈小满″，和明天要进场这个″陈小满″的招聘表签名，并排放在一起。同一个″满″字，连收笔那个钩的深浅都一样。十年，一个人可以换脸，换名字，换口音，换不掉收笔的钩。

十年不老。蒋阔后颈的汗毛立了起来。

小桂问，要不要现在就把人控了。蒋阔说，控什么，你连他是谁都说不出口——名单上一个电工，死了十七年，你喊谁的名字。小桂的脸白了。蒋阔让他做三件事：截屏存证，封存原始台账，把福建协查卷调来。做完，不许对任何人讲，包括队里。小桂走的时候脚步都是轻的，像端着一碗滚水。

蒋阔又把嘉木茶事的工商档案翻了一遍。注册，变更，许可，一页一页过。干净。太干净了。开公司的都知道，一家做了九年生意的店，档案里没有一页皱纸，就像一个人照相永远只照左脸。他把这句心得写在便签上，想了想，又撕了。写下来就成了倾向。办案子的人，倾向比错漏危险。

他给师父发了条短信。师父退休七年了，这案子是师父追了一辈子的。短信只有一行：十八号，南广场，队里布控。

回得很快，两个字：快了。

他把师父这些年给他的短信翻了一遍。二十年，一共二十三条。头一条是二〇〇五年的：小阔，鞋印拓完没。最后一条是前天的。中间那二十一条，多半只有四个字：再等等看。这一次，师父说，快了。他忽然鼻子一酸，起身去接了杯水。

蒋阔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半天。没看懂，又像看懂了。

他翻出二〇二二年的旧卷。那年积案攻坚，他重启过〇五年案，三个月，一无所获，最后写了一份《无法立案情况说明》。师父在说明的复印件上用铅笔写过一行字，一直夹在卷尾：不是没有证据，是证据没有长大。这两年，证据一天一天长大了——福建的账本，漳州的口供，罗家的名字。现在它长成了。就差明天这一夜。

傍晚，请示的电话打上去。他汇报了两种方案：一，十八日一早，以身份核查名义现场控制；二，放长线，只盯不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他以为断线了，那头才说了一句：证据链呢。他答：明天之前凑不齐。那头说，知道了。就挂了。

挂了电话，他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亮下班的人流。二十年，这座城的灯换了好几茬，白炽换节能，节能换新式灯管，只有他手里这个案子，还停在〇五年那个冬天，连一丝光都没换过。

天黑前，书面批示传了回来。就两行，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时前，一切手段合法。过了这个夜，什么都晚了。"

蒋阔把批示读了三遍，锁进抽屉最上层。

锁抽屉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他从警二十多年，见过各式各样的批示：有画圈的，有打问号的，有批"依法办理"四个大字的。这一份不一样。这一份

像一句耳语，从很高的地方俯下身来，贴着他的耳朵说：去吧，去吧，就在这两天。

他把抽屉钥匙揣进兜里，走到窗前。大院里，值夜的灯还亮着一半。二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院子，白炽灯泡，水泥地，师父蹲在台阶上抽烟。那时他以为，冤有头债有主，天网恢恢。现在他知道，天网是真的，只是网眼，得有人一寸一寸去量。

小桂在旁边小声问，阔哥，为什么非这两天。他把椅子转过来，给这个九六年的年轻人上课。

"故意杀人，追诉时效二十年。"他说，"〇五年十一月十八，到十八号夜里十二点，整二十年。过了这个时效，再想追诉，得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太平年月的案子都未必批，何况一件凶手到今天都没到过案的旧案。"

"所以明晚十二点之前，是法律留给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天。"

小桂不吭声了。办公室的灯管有一根在闪，一下，一下，像谁在暗处数拍子。

那天夜里他没回家，睡在值班室。躺下之前给妻子发了条消息：这两天忙，别等我吃饭。妻子回了个睡觉的表情。他盯着天花板想，二十年前他也这么跟她说过一回，那一回，他半个月没着家。这一次，他在心里说，最多两天。

睡前他又把《试灯时间表》拿出来看了一遍。二十三时五十分预亮，零点整满负荷一分钟。他在这一行底下画了道杠，在旁边写了四个字：人最齐时。写完自己都觉得邪性。他把布控图和时间表并排钉在墙上，退后一步，像站在一个巨大的谜面跟前。

钉图的时候，他把明天的口令在心里过了一遍。北便门两个，配电间两个，广场便衣四组，停车场出口一组。茶经楼夜间闭园，楼顶上不去，只有那盏警示红灯，夜夜亮着。他忽然想起卷宗里那些剪纸——每一张里头，都有一盏灯。他使劲摇了摇头，把这念头摇散。办案子的人，不能自己先入了戏。

夜里十点，蒋阔把布控图重新描了一遍。主入口一道竖线，南广场两道横线，配电间补一小块，停车场出口斜斜一提。红笔道道，横竖撇点。

他起身，退后两步，想整体看看有没有漏。这一退，他愣住了。

图上那些红道道，凑成了一个字。

封。

他自嘲地笑了一下：″他娘的，连布控都是他家的剪纸。″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城北松鹤养护院。

竺长生在西湖路早市口买了两根油条、一袋豆浆，用旧报纸托着。天冷，呵出的气是白的。早市的摊贩正收摊，锅盔炉子的余温飘到街心。他六十七了，走路比从前慢，但方向从来不变——这个月第三趟。

护工王姐在楼下迎他，压着嗓子说：老爷子这两天糊涂得厉害，夜里不睡，翻来覆去喊寄信、寄信；白天手里那张纸剪了又剪，劝都劝不住；每顿饭端上来，他先舀一勺搁在门边上，说给寄信的人留的。

竺长生问，寄信的人是谁。王姐说，谁知道呢，问了就摆手。又说，老爷子清醒的时候净讲些没人听得懂的话，什么纸会老，信不会；什么他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替人收信。竺长生站在楼道里，半天没动。二十年里，他把这个老人翻来覆去排查过、怀疑过、排除过，最后归入″无关″两个字。此刻这两个字，烫得他手心发麻。

阳光房里，齐守拙坐在藤椅上，膝头一块木板，木板上一刀红纸。九十二岁的人，腰塌了，手上的剪刀却稳。剪完一张，看一眼，放到脚边的簸箕里，再起一张。簸箕里已经积了半簸箕，一张摞一张，像在给一棵树数叶子。

″齐伯，我是竺长生。″竺长生蹲下去，把豆浆放在他手边，″天门的竺长生，来看你了。″

老人抬起头。眼睛浑浊，像蒙了灰的玻璃。他望着竺长生，望了足有一分钟，低头继续剪。

竺长生陪着坐。油条凉了，豆浆凉了。阳光房外头，护理员推着轮椅一列列过去，笑闹声隔着玻璃，像另一个世界的电台。他想起二〇〇八年文化宫拆迁，这个老人抱着一摞样册站在瓦砾上，谁劝都不走，最后是抱着册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的。十六年过去，老人剪了一辈子，剪到只剩纸。

二〇一九年冬天，有人来录过这个老人，录下了他两句没人懂的话。片子竺长生去年才看到——儿子转给他的，说网上有个姑娘在讲一桩旧案。他看完了，一夜没睡，第二天照常买菜。他那时就隐约觉得，那两句疯话底下压着东西，像水面下的石头。今天，水放干了。

就在竺长生起身想告辞的时候，老人忽然开口了。

"竺警官。"

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竺长生回头，看见一双完全不同的眼睛——浑浊褪尽了，清得像水底的鹅卵石。

老人从藤椅边上的布袋里，摸出一个蓝布面包着的册子。蓝布磨得发亮，四角包浆。他双手把册子递过来。

"暗层。您家自己看。"

说完这五个字，那双眼睛里的水光慢慢又漫上灰来。老人低下头，拿起剪刀，继续剪他的两个伢和一棵树，好像刚才那一分钟不存在。

竺长生抱着册子，在阳光房角落的长椅上坐下来。

暗层是夹页。纸与纸之间另有一层，薄得像呼吸。每一张剪纸都小得能从指缝里漏下去。页角有铅笔写的年月，一笔一画，是齐伯的字，像怕后来的人认不出。

最早一页，纸黄得发脆。男孩剪的：一间塌了的屋子，屋脊断成两截，断口处两根椽子翘向天。铅笔字：〇五、冬。

竺长生的手指在那一页上停了很久，才翻过去。

下一页，女孩回的：雪地里一个小人，双手捧着一只碗，碗口上剪出一缕热气。铅笔字：〇六、一。

一月。他记得那个一月。西湖捞起人的前一夜，他在河堤上踩了三圈雪，什么也没踩出来。

再往后，齐伯回的：一盏灯笼，灯笼里两点小小的火。

他一页一页翻下去，越翻越慢。

齐伯回过一轮月亮，月亮底下半个窑口。铅笔字：〇七、五。五月，废砖窑。那一晚他到场的时候，月亮就是这样，白得不近人情。现场那半枚石膏模，后来在物证室里下落不明，他找了二十年。

男孩剪过一只手电筒，光柱斜斜捅出纸外。铅笔字：〇八。王春发交上来的语录里有一句——河边有个伢，左手拿手电。〇八年冬，他盘过这句话，没盘出东西。此刻纸上的光柱，和那句酒话，严丝合缝。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些年错在哪。他把这些纸当饰物、当签名、当疯话，只有人把它们当信。当信看，每一张都有抬头，有落款，有日子。抬头是塌下来的天，落款是递过去的手。日子，是二十年里每一个他到场又空手而归的日期。

女孩回过一把伞，伞骨十一根，根根分明。

伞这张纸他看了很久。伞骨剪成单数，行里叫独骨伞——一个人替另一个人撑着，撑伞的人自己淋着。是谁教过老人，还是老人自己懂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本册子里，没有一张纸是随便剪的。女孩还剪过一座高台，台上一个小人举着灯，灯罩里剪出极细的纹。铅笔字：一四、十一。十一月七日，茶经楼开放。他那天就在楼下，人堆里拾到一张剪纸——一座楼，楼底下压着一个小小的人。

原来那天夜里，一封回信已经进了暗层。寄出去一张，这里就收着一张。

齐伯还回过一盏灯，灯焰笔直，不偏不倚。铅笔字：一五。那一年前后，回信忽然勤了，灯笼换成了灯，火光从两点变成一点，更亮，也更孤单。

女孩还剪过一位奉茶的老人，衣袂用月牙形的刀口排出来，像风自己画的。竺长生在那一页前坐直了身子，回头望了一眼阳光房藤椅上那个一直剪纸的背影。

男孩剪过一个背影，背上一只鼓鼓的米袋，走在一条看不见头的桥上。铅笔字：一二。这一张，他对不上任何一桩卷宗。也许不是案子。也许只是日子。

最后几页，纸新了。

男孩剪的第二只手电筒。这一回不是自己攥着，是递向纸外的，笔直递出来，像要递到看纸的人手里。铅笔字：二四、十一。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工地围挡外，他弯腰拾起的那张剪纸——一个人把手电筒递给另一个人——和这一张，一模一样。

有人把寄出的信，另抄了一份，放在了收信人以外的路上。放在他脚下。

它的对面，女孩回了一张：一个小人，回头。只有那么一个动作，一条辫子甩在肩后。铅笔字：二四、十一。

最末一页。铅笔字：二五、除夕。

三个人围着一桌喝茶，壶嘴朝着门口。桌边空着一个座位。空着的那把椅子，椅背上搭着一条围巾。剪围巾的纸比别处厚，像剪的人怕它冷。

竺长生把样册合上，又打开，又合上。窗外护工在喊老人们吃午饭，喊了两遍，他没听见。

十九年。一问一答。问出去的，全是塌下来的天；递回来的，全是递过去的手。而这个坐在藤椅里的老人，把每一封回信都收进暗层，收了十九年，像替两个孩子守着一座谁也不知道的邮局。

他们从未同过一天的光。他们把一生拆成了纸，你来，我往。

阳光房里，剪刀声还在响。嚓，嚓。一张。嚓，嚓。又一张。老人剪了一辈子，剪到认不得人还要剪，原来不是手艺，是差事——替两个孩子，把天底下的沉默，一张一张，剪出声音来。

原来是这样。原来一直是这样。

他抱着样册站起来，往走廊走。走了十几步，腿一软，扶住了墙。

竺长生在养老院的走廊里哭得像个伢。护工王姐小跑过来，问他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摇摇头，把怀里的册子抱紧了些。

"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了十九年，今天就到。"

王姐没听懂，替他拍背，一下，又一下，像拍一个呛了奶的孩子。

哭够了，他把蒋阔前天那条短信翻出来又看了一遍。快了。他当时回的这两个字，原来不是安慰徒弟，是给自己报信——账到最后一天才对齐，可对齐的那一笔，得他亲自去落。他把眼泪擦干，扶着墙站直，把外衣的扣子一颗一颗系好。明天，他去落那一笔。

王姐不敢走，隔着两步陪着。走廊尽头的窗外，养老院的银杏落了大半，金叶子铺了一地，护工在扫，扫成一小堆一小堆。有个坐轮椅的老人经过，看了竺长生一眼，说，哭吧，哭了就好了。

哭完了，他把脸擦干，对王姐说，下个月我还来。王姐说，老爷子就盼来人。他说，不是他盼，是我盼。

这话没头没尾，竺长生却听进去了。他点头，朝老人笑了笑。走廊两排门都关着，门后是各式各样的晚年，有人忘了儿子，有人忘了自己，只有阳光房里那个老人，糊涂了十几年，独独没忘寄信。他把册子往怀里又拢了拢。这栋楼里最重的行李，今晚跟他回家。

临走，传达室看车的大爷叫住他，塞给他一粒水果糖：天冷，含着提神。大爷不认得他，只当他是来看人的。他道了谢，把糖揣进兜里。车棚底下，他

那辆旧自行车还锁在那儿，车把上落了层灰。他没骑，推着走了一段，又锁了回去——明天他不想赶时间，他想走着进城，走着去南广场。

· · ·

天擦黑，竺长生到家。

他把米面柜下层的隔板抽开，夹层里的木箱取出来，灰擦净了，样册和箱子并排放好，一本蓝布，一只旧木，肩挨着肩，像两个提前到齐的人。

秀珍坐在藤椅里看电视，电视里咿咿呀呀唱着戏。她转头看他，眼神干净得像小时候。

"账齐了。"竺长生说。

"齐了就吃饭。"秀珍说。

竺长生应了一声，真去厨房把饭菜热了。两菜一汤，他摆了两副碗筷。那天晚饭，两个人吃得很干净。

夜里秀珍睡熟以后，他把样册又从头翻了一遍。这一遍翻得极慢，每一页都凑到窗户的月光底下，看纸的背面。有几张的背面留着极淡的铅笔印，是当年书写时压出来的痕迹——那些信，果然都是从一张桌上写起的。他把册子合上，摆正，让蓝布的边和木箱的棱对齐。摆好了，他退后一步看了看，像布置一场小小的展览。展品只有两件：一件等了二十年，一件藏了一辈子。收拾碗筷的时候他想，这箱子跟了他十几年，样册跟了齐伯一辈子，今天凑到一处，像两股绳子总算拧在了一起。剩下的，就看明天那把刀快不快了。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八点，嘉木堂。

距开业还有十四个小时，大厅里灯火通明。一千二百平的挑空，水晶般的茶墙从地面顶到二楼桁架，泛光灯还没调好，光一会儿聚一会儿散，像水底下摇。

蓝溪拿着核检单，一个区一个区过。签到墙，三百个名字牌，她数了两遍；剪彩台，金剪和红绸各就各位；三十六席茶席，席席配了明日的口粮；直播机位——明天市融媒体来两台机器，她自己那套旧设备用不上了。她把用了九年的补光灯装箱，箱子上贴着褪了色的标签：白鹭。胶带撕下来的时候，连底下的漆都带起来一小块。

包装箱码在后台，一共二十六只。九年里门店换过三批货架、四套茶器、五版工服，只有这些箱子一直跟着，箱角的胶带摞了一层又一层。搬进嘉木堂那天，搬家公司的小伙子问，老板娘，这些旧箱子还要不要。她说，要。新的地方再亮，也得有几件旧东西压秤。

走到一号茶席，她停下几秒。这张席子明天要演"六羡"，配方是唐老师亲手定的，山泉水，炭火，三沸而止。她想起自己第一年背《六羡歌》，背到"千羡万羡西江水"，唐老师纠正她说，最后一句要轻，像水走远了还回头。九年了，她每次念到最后一句，还是会不自觉地放轻。

九年前也有这样一个前夜。西湖路的门面刚装修完，漆味没散，她和唐老师坐在门槛上吃锅盔。唐老师说，开茶店的人，手要干净，心要静。她问，要是手不干净了呢。唐老师说，那就什么都别开了。她当时以为是句玩笑，还笑出了声。唐老师没笑，掰了一半锅盔给她，焦的那面朝上。

今天这顿晚饭是给大家点的三蒸居外卖。年轻人抢着夹肉，抢黄焖的抢黄焖，蓝溪端着一份鳝鱼丝，坐在后台的台阶上吃。九年前的那个晚上，她和唐老师分一张锅盔；九年后，她一个人吃一份鳝鱼丝。味道都不差。差的只是，身边那把椅子，从明天起要空很久了。

晚九点，唐老师从总控台那边走过来，让全体员工都回去，早点睡，明天要站一整天。

人群呼啦啦散了。有人说明天见，有人说老板娘辛苦，一个小姑娘跑回去跟唐老师合了个影，闪光灯一亮，像提前彩排了庆典。空场一下子大了，脚步声的回音撞在茶墙上，碎成很多片。

有个临时工从北便门进来收工具箱，朝她点头哈腰地过去了。白工作服，棒球帽。她没多看。这两天进场的人一天几十拨，电工、木工、花艺、保洁，谁也不认识谁。

可这一个走过去之后，她莫名回头多看了一眼。看什么呢，她也说不上来——大概是那背影太安静了。工地上的走路带风，说话带嗓，只有他，来去像一片纸落在纸上，没有声音。

蓝溪收尾。试饮台上摆着八只品茗杯，是为明天体验区预演的，茶汤早就凉透了，面上结着极薄的一层光。核检单最后一项：员工通道消防门，确认关闭。

她在单子上打了对勾，笔尖顿了顿，又加了一行小字：员工已全部离场，老板娘留场盯灯。写完她盯着这行字看了看。九年了，核检单从来是她写给明天的人看的。这一行，不管明天来的人是谁，都算数。

写完，她把九年的核检单从文件柜里抱出来，一摞，按年份捆着，最底下压着一张空白的，是给明年留的。压完她自己笑了：哪有什么明年。这一行留不留得下，明天就见分晓。

她抱起箱子往通道走，走到一半，停住了。

空场对面的二层桁架上，有个电工在调灯。白的工作服，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左手举着对讲机，右手拧着什么。十一月的夜里，大厅的空调还没开足，他没戴手套。

而唐老师站在空场正中央，仰着头，看他。

隔着整个空场，一上一下。谁也没有说话。

灯光把两个影子投在地板上，拉得很长很长，长到在空场中央——碰在了一起。

蓝溪抱着箱子，站在原地，不敢动，也说不出为什么不敢。她看了大概只有几秒钟。几秒钟里，桁架上的人低下头，看了唐老师一眼，又转回去拧他的

灯。唐老师收回视线，转身面向签到墙，站定了，像一株栽在场地中央的树。

桁架上的灯忽然调好了，一束追光笔直落下来，正落在唐老师站的地方。她没有躲，也没有让，就站在那束光里，仰着脸，朝上看。光把她的影子收得很短，短得像踩在自己脚下。

后来很多年，蓝溪都会想起这一眼。可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看见了什么。她只知道那一幕安静得反常，像大雪落在雪上。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屏住了呼吸，直到胸口发疼。

她想喊一声唐老师，喉咙里却像塞了棉花。九年来，她见过唐老师对客人笑，对镜头笑，对供应商笑，那种笑像一层擦得极亮的玻璃。可现在这个背影不笑。背影里有一种她从没见过的东西，静得像深潭的水面。她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敢动——不是怕撞见什么，是怕自己一出声，就把什么珍贵又危险的东西惊碎了。

她推开员工通道的消防门。闭门器拖着液压杆，门缓缓地合。就在门缝只剩最后一线的时候，她听见身后空荡荡的大厅里，唐老师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像说给这座空场听的：

〝明天，亮一点。〞

门合拢了。

背靠着门，她数自己的心跳。一下，两下，数到第十下，才想起来自己还有半张单子没核完。她把箱子放在墙角，把手里的事做完，每一步都走得很轻，像怕吵醒这栋楼。

· · ·

员工通道里只有一排声控灯，她走一步，亮一盏。走到消防栓箱跟前，她低头，看见地上有一张纸。

剪纸。

被通风口的气流掀着角，一掀，一伏。她蹲下去捡起来。剪的是明天的大厅：满场的剪影，举手机的，抱花束的，牵孩子的，鞠躬的，密密匝匝几百个人，全是黑影。

只有场地正中，两个小小的纸人，手牵着手。

纸很轻。蓝溪的手却抖了。

她站起身，四下看。通道里空无一人，声控灯一盏一盏暗下去。这纸是从哪里来的，是谁的，为什么会在这里，她一个答案都没有。她只知道一件事：这张纸不是给她看的，也不是掉落的。它是被放下的。放在她一定会经过的地方。

她把剪纸放回原处，连掀起的角都按原样伏好，然后退了两步，才转身走。

有些纸，不是捡给警察的，是捡给天上人的。

退出去的时候她又回了一次头。那张纸在暗处静静伏着，两个牵手的小人朝着满场的人影，像在人群的正中央，守着一件全世界的热闹都容不下的事。

回到后台，她把外卖盒收进垃圾袋，把台阶扫了一遍。扫到第三下，她直起腰，对着空荡荡的后台说了一句连自己都没听清的话。这九年，她有很多话都是这样说的——说给空屋子，说给旧箱子，说给一切不会回嘴的东西。

走出员工通道，穿过侧门，她在玻璃幕墙前停了最后一秒。空场里，唐老师独自走到试饮台前，端起那八杯凉茶里的一杯，一口一口，喝干了，把杯子扣回台面。

那座明天会挤满三千人的大厅，此刻只有她一个人，和一杯凉透的茶。人还没来，茶已经凉了。她把凉茶喝完的样子，像在替很多人把一桌散不了的席，一个人坐到席终。

蓝溪推门出去。夜里十点的园区几乎没有人，路灯把她的影子拉长又收短。

广场上明天要摆的三百张椅子已经码好了，蒙着防雨布，一排一排，白白胖胖。她从椅子阵中间穿过去，脚步声让布吸掉了。明天，这些椅子上会坐满人，会有掌声，会有航拍器在天上转。到那时，今晚的空场、今晚的影子、今晚那句亮一点，就会像从没存在过一样。她走出景区大门，回头望了一眼。

内场试灯刚刚结束。茶经楼的景观灯一层一层熄下去，九层，八层，七层——像有人把一座楼，一张一张，收进抽屉。

最后全黑了。楼顶那点警示红灯，孤零零地亮着。

蓝溪没有直接回家。她绕到西湖路。老店黑着，卷帘门放到底，玻璃门左下角那道旧划痕在路灯底下显出来——像一棵树。九年里她每天推门，都从那棵树上过。明天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人推开这扇门了。

她伸出手指，隔着玻璃，顺着那道划痕从根到梢量了一遍。树是划痕，也是年轮。

她想起九年前搬进来那天，唐老师站在这扇门前看了一会儿，看着那道划痕说了一句话：留着，别打磨。她那时不懂。现在她想，树留住了，门要关了。

回家路上，湖面一丝风都没有。她记得天气预报说明天是个大晴天。走到湖边她停了一下。九年前白鹭开播那晚，也是这样没有风的夜。她对着湖水站了一会儿，学唐老师的样子，把明天的流程在心里过了一遍：开灯，迎客，奉茶，剪彩。过到剪彩，她停住了。剪刀在谁手里，单子上没写，她也没问。

湖对岸，老城的灯差不多都睡了，只有茶经楼顶那一点红，还醒着。她想起店志里那句没写完的下半句，回去补上了：简历写完了，也得有人念。念的人来不来，不由写字的人定。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夜里十一点，北京路的老宿舍。

晚饭后的碗是竺长生洗的。洗完，他打了一盆热水，给秀珍烫了脚，又把她明天要穿的袜子放在枕头边。秀珍看电视看到十点，自己摸回床上去了，路上还哼了半句戏。

七点半，儿子小江来了视频电话，武汉的灯亮在他身后的墙上。小江问，爸，明天真去？他说，去。小江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我明天回来。他说，你管好你的病人。挂电话之前，小江说，爸，穿厚点。他说，厚着呢。挂了。爷儿俩一句多的话都没有，可那句穿厚点，他来回听了三遍。

台灯下，竺长生铺开稿纸。钢笔是儿子小江前年买的，他说用不惯，还是用了。

动笔之前，他把米面柜夹层里那只木箱最后清了一遍。封仓账本的复印件，王春发交来的红布包照片，剪刀的照片，笔迹鉴定文书的原件，还有四张剪纸——每张下面用铅笔标了拾得的年月日。二十年，一箱纸。他年轻时以为破案靠腿，后来以为靠证，如今才知道，最重的东西轻得像纸。

箱底压着一张字条，是他自己十年前写的，只有一行：此箱之物，无一来自卷宗，无一不可示人。当时写这行字，是防着哪天家里遭贼，贼翻出箱子，倒显得他藏私。如今想想好笑——二十年没人来偷，倒是这只箱子，一天比一天重。

剪刀的照片他看了最久。红布包，家用剪，刃口磨得很薄。王春发交来那天手一直在抖，嘴里翻来覆去一句话：文霞走了，这东西在我手里就是个雷。物证科验过，形制与〇五年的创口同类。同类，不是同一。差这两个字，差了二十年。

他开始写信。信的开头：小江。

"妈妈的近况你知道一些。这两周夜里要人看着，护工王姐靠得住，工钱我结到了明年三月。往后你要接去武汉，就接；她不肯走，就依她。她糊涂了，只糊涂别人，不糊涂我。"

″家里米面柜下层，隔板是活的。夹层里有只木箱，钥匙两把，一把用胶布贴在《茶经》一九八二年版的函套里。我若明天之后回不来或回不去，你把箱子交给天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蒋阔，或交局纪委，由你选。箱子里没有一件东西见不得人，只有一件东西，迟到了二十年。″

″另有一本蓝布面的剪纸册，是一位老人的东西，他早说过捐。你替我送市档案馆，捐献人写齐守拙，经办人写你，别写我。册子要按页码装订，暗层里的纸一张都不能少，那是两个孩子的家书。″

″你的工作忙，我都知道。这些事不急。急的是明天，不急的是往后。你妈那边，天冷了记得让她戴帽子，她嫌丑，你哄她。″

″你小时候问我，爸爸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爸爸抓的不是人，是没还的账。你那时不懂。这二十年，我手里攒着一笔账，对不上，也放不下。明天要做的事，你往后要是从别人嘴里听见，别替我吹，也别替我慌。账是账，爸是爸。″

″饺子在冰箱冻着。你的那份，回来自己煮。″

″还有一句。你妈要是问你爸去哪了，就说上班。这个词好。人这一辈子，把该上的班上完，就不欠了。″

信写得很平，像交代买菜。五页纸，写错一个字，他就划一道杠，没有涂改。写完，他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压在门口的鞋柜上，明早投进邮筒。

压信的时候他想起小江八岁那年，他也这样往鞋柜上压过一张字条：爸爸出差，三天。那三天，是〇五年的十一月。儿子在字条背面画了一个拿枪的小人，说，爸爸抓坏人。那张画他收了二十年，就在箱子最底下，紧挨着双童奉茶。一张画给英雄的，一张留给收信人的，睡在一只箱子里，睡了二十年。

他回到里屋，打开木箱最底层，取出一只透明文件袋。袋里那张黄纸，二十年了，脆得不敢大声翻动——双童奉茶。〇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从望湖仓现场的铁盒旁边收起。当年结案，物证处理签收栏上，有他的名字。这张纸在他手里睡了二十年，比任何一份卷宗都完整。

他把文件袋装进胸口袋，隔着布按了按，像按一封信。

那年初查，队里的人都说，一张剪纸算什么证据。他自己也说不清。后来他想了二十年，想明白了一件事：那晚茶仓里那么乱，铁盒里的现金一分没动，值钱的货一件没少，凶手偏偏留下一张纸。留纸的人不怕人看见，怕的是纸上的话没人听见。二十年来，他一直替那个人当着收信人。今晚，这张纸要归位了。

他把箱盖虚掩上，又打开，从最底下摸出那张卷了角的画。圆脸的英雄，举着一把比人还高的枪，右下角是八岁小江的名字。他把画也放进胸口袋，贴着文件袋。明天不管发生什么，爸爸都带着。

关箱子之前，他把箱底铺平了一遍。二十年攒下的东西，明天各奔前程：账本走公门，剪纸走档案馆，画跟爸爸。只有一样哪儿也不去——秀珍的袜子还在枕头边。他想好了，等回来，给她洗个脚。

门后穿衣镜里站着一个穿灰夹克的老人。他整了整领子，正了正下摆，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像四十七岁那年出勤前一样。那年他也是这样整领子，只是镜子里的人没有白头发，也没有等了二十年的账。

四十七岁那年冬天，他也是这样出的门。那晚回来，袖口上沾着仓房的白灰，秀珍没睡，给他留了一碗热汤。案子后来结了，他一直觉得那晚有什么东西没带够。想到今晚他才明白，那时缺的不是证物，是名分——一个案子结了、人又退了的警察，凭什么再走进那座灯火通明的大楼。今晚，他把名分带上了。

镜子里的老人对他点了点头。他也对镜子里的人点了点头。两个老搭档，谁也没说保重。

出门前他又检查了一遍。文件袋在，私章在，退休证在。他站在玄关，把三样东西的位置在心里默了一遍，像出车前查仪表。其实用不上的可能性更大——他想过一百种明天：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灯亮了，人散了，他站在人群

里看完一场热闹，回家吃饺子。他把这种可能放在心里最上头。可还有另一种，得先备好。

秀珍半梦半醒地躺在床上，听见动静，睁开眼。

"长生，你去哪？"

"上班。"

"这个点上班？"她往被子里缩了缩，含含糊糊地说，"早点回来，饺子给你留到明早。"

"好。"他说，"留到明早。"

他站了一会儿，替她把被角掖好。秀珍又睡着了，眉头松松的，呼吸匀匀的。四十年前相亲，媒人说这姑娘实诚，会过日子。实诚了一辈子，糊涂也糊涂得实诚。

他在床边又站了一会儿，听见她梦呓似的喊了一声什么。凑近听，是喊他吃饭。他低低应了一声。四十年，她喊他吃饭的声音，没有变过。

床头柜上摆着两个人的合影，玻璃框擦得发亮。照片是二〇〇六年照的，那一年他刚接手那桩案子，人瘦得厉害。秀珍后来常说，案子结了，你人就回来了。他说，结了。其实他知道，人是留在那儿了，留在〇五年十一月十九号的凌晨，一直没回来。今晚，他去把人领回来。

他轻轻带上门。

· · ·

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他没跺脚，摸黑站了一会儿。天窗里漏进来一片月光，十七的月亮，圆得只差一线，白得干干净净，把楼道的水泥地照出一块斜斜的方。

他在月光里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上衣两个口袋。

口袋里还有一样东西，他没跟谁提过——一粒水果糖，傍晚在养老院门口，看车的大爷塞给他的，说含着提神。他把糖也揣上了。二十年前出勤，师父也塞过他一粒。

左边，私章。右边，退休证。

二十年了，这回我把"名分"也带上。

他下了楼，走进那片白得过分的月光里。

巷子口静得很，一只猫从墙头走过，尾巴扫落一小片月光。他在巷口站了站，辨了辨方向，往城南走。兜里那两个硬币硌着腿——本想路上买个热馒头的，这个点，摊子都收了。天边最黑的那一块，是茶经楼的方向。

走到大路口，末班公交正进站，车门开了又合，没装几个人。他没坐。六十七岁的腿，还想再走一走二〇〇五年没走完的那段路。月光把他的影子铺在前面，像有人替他引路，又像有人替他送行。

◆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点五十九分，城东写字楼十七层。

整层楼只剩小周工位上一盏灯。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十五个月的材料，最后都压进了眼前这封邮件。

小周是罗家第三代用过的第三个法务。头一个老先生干了三十年，退休那天说的话，小周记得：咱们这行，笔就是秤，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十五个月里，小周删过的字比写过的多。删掉的那些，不是没查到，是不该由罗家的人先说出来。罗家的事，到解约为止；往下的事，是天下人的事。

这份报告起于去年十二月。那时罗成峰只说了一句话：查，查到底，哪怕是查我自己的心。小周查了三个月，查到"嘉木"是两个孩子的名字，查到上游的供应商是个死人，查到每一根线头都通向同一座城。中间有两次，小周把报

告存了草稿，想辞职，想一走了之。第三次，是看见罗成峰在退婚协议上签字时那半分钟的沉默，才把草稿箱清空了。

十五个月里，小周跟自己打过三场官司。第一场，报告要不要写名字。写了，就是一支箭；不写，就是一张废纸。小周写了，锁进保险柜，等它长成一支箭。第二场，报告给谁。东家说过，交给该收的人。谁是该收的人？小周查了半个月法条，最后在"追诉时效"四个字上停住了——原来天底下最该收这封信的，是时间。第三场，要不要等十八号以后再发。不要。过了十八号，这封信就从证词变成了悼词。

附件，尽调终版报告，一百四十七页。目录四条：一、身份；二、名字；三、链条；四、明天。

这份目录改过七版。头一版九章，像一篇论文；第二版并成六章；定稿只剩四条，多一条都嫌赘。老法务退休前教过：报告写到让人十分钟看完，才算写完了。小周用十五个月，换来了这十分钟。

为了这十分钟，小周记满了四个笔记本。第一本记资金，第二本记人，第三本记日期。第四本，记的是自己的动摇——哪一天想放弃，为什么没放。前三本，明早都要进文件袋。第四本，今晚烧掉。烧之前翻了一遍，动摇最多的一天，是三月二十一日。那天有人在窗边问了一句话。第四本上记着：今天有人问我，能不能装没看见。我把这句话留下来，是为了记住，问出这句话的人，不是坏人。

第一条，身份证号429006项下的持有人陈小满，男，一九九四年生，二〇〇八年八月因车祸死亡，户口注销；而这个名字在二〇一四年之后，在福建活生生地签了十年字。

第二条，"嘉木"二字，出自一本手抄《茶经》的扉页——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同一页纸上，还有另一个孩子的名字。名字即人。这个人，一九九四年二月生。

第三条，漳州工坊、封仓账本、并于昨日核出的临时电工。

写第三条的时候，小周手边摊着福建警方的公开通报和三份纸质附件，附件页脚都有一行小字：本材料流转过程已脱密。脱得有多干净，小周不知道。小周只知道，这世上替真相搬砖的人，比想象的多，也比想象的沉默。

第四条只有一行：十八日，南广场，人证物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合。此后二十年，不会再有这样的二十四小时。

写第四条的那天夜里，小周把整层楼的灯全开了。一个人坐在亮堂堂的空办公室里，把这一行读了十遍。这不是法言法语，这是倒计时。写报告的人不该写倒计时，可小周写了——因为读到这行字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在一秒之内明白：再不动手，就永远不动手了。

写完这一行，小周把窗开了条缝。夜里的风进来，吹得台灯的光晃了晃。楼下有烧烤摊在收摊，两个年轻人扶着栏杆，争论明天去不去南广场看热闹。一个说去，一个说人太多。小周听着，把窗又关上了。人太多，才好。人多，有些纸才递得出去。

收件人：罗成峰。主题栏，小周敲了五个字：

嘉木是名字。

发送。

进度条一秒走完，"发送成功"的提示弹出来的那一瞬，窗外城南，半个天亮了。

泛光灯预亮。茶经楼的整幅轮廓从夜里浮出来，一层一层，金白金白，楼前的广场亮得像落了一地霜，半城的天都是白的。玻璃幕墙上映着那片光，也映着小周捏着鼠标的手。

小周小时候随父亲来过天门。那年茶经楼刚封顶，脚手架拆了一半，父亲指着楼说，这是给陆羽盖的。陆羽是谁？写茶的圣人。父亲说，圣人写的头一句是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你记住，名字是能当家的。小周那时不懂。十五个月后，小周把这句经文，写成了一份报告的结论。

小周站在窗口看了很久。三月里，律师楼走廊上自己说过的那句话，说完就后悔，又庆幸说了。人这一辈子装不了几回糊涂，装一回，少一回。今天起，可以不装了。

手机还开着对话框。小周敲了第二封信：

"报告已发。明天开业，您去不去？"

回得很快。

"不去。帮我把这张纸交给该收的人。"

小周回了一个字：好。发出去之后觉得太轻，想补一句什么，打了一行，又删了。有些时刻，一个字够了。罗成峰没有再回。小周知道，那个人此刻大概也站在某一扇窗前，望着同一片灯光。查了十五个月，婚退得干干净净，最后连开业都不去看——不去，就是他给过的最大的真心。

真心这两个字，查案的人平时不敢用，一用，秤就歪了。可这会儿屋里没人，秤收起来了。小周想起三月里罗成峰把补偿方案退回来的那张便签——项目是给天门的，不是给罗家的。那句话小周当时读成体面，现在读，是遗书。一个把自己那部分人生整段退回去的人，往后只剩一件事：看着别人，把剩下的事做完。

小周把手机扣在桌上，走到打印机旁。报告打印了两份，装订，齐整得像两块砖。

打印机吐纸的时候，窗外那片预亮的光还剩最后一点余晖。小周站着看它暗下去。十五个月，从第一页到第一百四十七页，小周只在自己名下写过一行字：尽调人。该丢脸的时候，丢的是罗家的脸；该担责的时候，小周得是个活人，不能只是个名字。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回，小周把名字签在了信封骑缝上。

一份装进文件袋，封口压实，骑缝签名——三月里跟那位退了婚的东家学的规矩。快递面单填好：天门市公安局，积案专班，内件品名：材料。明早第一班寄出。

另一份，揣进随身的包里。

〞明天我亲自送进去。〞

说这话的时候，屋里只有小周自己，声音落在空办公室里，没有回音。小周把包的背带调短了一格，像当兵的人紧了紧枪带。明天九点开门，人最多的时候，保安最忙的时候，谁也不会多看一个提文件袋的人一眼。进门，安检，前台，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袋子放在最能被人看见的地方。听说明天南广场就有执勤点。听说而已，到了再找。

四下收拾干净，灯一盏一盏关掉。走到窗前，最后看了一眼那片白昼一样的城南。

楼下的街没什么人了。一辆洒水车慢慢开过，把刚落的一点灰压下去。小周忽然想起白天填的快递面单：积案专班 收。专班还在不在，里面还有没有人，十四个月过去，换了没换人，都不知道。可是邮局的大姐敲图章的时候，没有多问一句。天底下肯把信送到的地方，总比想象的多。

小周从包里把那份砖头一样的报告又隔着帆布摸了一遍，边角方正。摸完，忽然想起该给家里留个话，于是给母亲发了条消息：妈，明天我回天门一趟，办点旧事，勿念。母亲秒回了一个字：好。过了一分钟，又追来一条：早点回，妈腌了藕带。小周看着那条消息，在黑下来的玻璃前站了很久。

站够了，小周把工牌从胸口摘下来，看了一眼。照片上的脸比现在年轻十五个月。工牌没有扔，也没有带走，就搁在台灯底下——明天以后，罗家的工牌戴不戴，两说。可天门那边，得去一个有名有姓的活人。

零点整。

全城的景观灯同时满负荷亮起，亮得天地一白——只亮了一瞬，像整座城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齐齐熄灭。

街道黑了，楼群黑了，连茶经楼那身金白也整幅沉进夜里。只剩楼顶最高处一盏警示红灯，在整座黑透的城市上头，一明，一暗。

像一颗还没落下的泪。

第十三章　白夜

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天没有亮透，茶经楼景区南广场的红毯已经从嘉木堂门口铺到了东缘的台阶下。

毯面上落了一层夜露。蓝溪蹲下去按了按，指尖一片凉。露水要等太阳出来才收，可今天的仪式定在晚上，等太阳出来，这卷红毯已经被踩过千百遍了。

她五点五十到的。整条竟陵西寺路只有豆浆摊冒着白汽，沿街的卷帘门一扇一扇往上响，像这条街在清嗓子。保安亭里的值班员冲她点点头，把今天的第一杯热水推过来。她捧着杯子走完最后五十米，手心是烫的，指尖还是凉的。

六点整，安保进场，在门口支起两道安检门，指示灯还是崭新的绿。承办会务的公司是市里协调来的，负责人捏着对讲机满场转，嗓子哑了半边。蓝溪把开业茶会的座次表交过去，对方核了三遍，在第四桌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

门锁咔哒一声，店里的灯一排一排亮起来。

货架是昨夜十一点才定好位的。每一饼茶之间的距离，她拿尺子量过，误差不超过半指；礼盒按高低错落堆出三座小山，缎带全部朝右。九年前她入职的头一天，唐老师手把手教她包第一饼棉纸，一句话没有多说。九年里她学会的只有三句店规：不问价值，不问来路，不问十一月十八日。

七点，请柬台在檐下摆开，烫金的帖子按姓氏笔画摞成三摞。蓝溪一页一页往下核，核到第一百零八位，手停住了。

整张请柬只有一行字：竺长生先生——唐老师亲笔。

钢笔字瘦硬，起笔带锋，收笔处有一点点顿，像写字的人一辈子习惯在纸上用力。其余的请柬全是套打的印刷体，字号、行距、落款，一个模子。她把这一张单独抽出来，压进柜台底下的红木匣。

九年里她见过唐老师改茶单、改陈列、改一泡水的温度，改到后半夜是常事。亲笔写请柬，这是头一回。

排座次表的时候，她又核了一遍这个名字。第一百零八位，安排在贵宾区末排，靠走道，离消防楼梯最近的位置。排座的同事说，老人喜欢清静，靠门进出方便。蓝溪没有多想，把它抄进了桌牌清单。

七点半，简明堂到了。

老人穿一件洗旧的灰呢大衣，由老伴扶着，从无障碍坡道一步一步挪上来。工作人员迎上去要搀，他摆摆手。媒体立刻围了半圈——前年公开质疑“千羡水桩”、去年拿碳十四和纤维检测把做旧钉死的人，就是这位汉口一盏楼的半盏翁。官司打过，和解签过，保密的纸也按过手印。今天，他的请柬端端正正躺在第三摞的第一张。

有话筒递到他下巴底下，问他对今天的开业怎么看。

老人不急着答。他先看了看那座楼，又看了看楼前崭新的门头，铜字在晨光里泛着一层哑光。

“她连我都请。”他说，“胆子不小。”

记者们笑起来，笑声里没有人敢接下一句。有相机的快门响成一串，老人由着他们拍，等声音稀了，才扶着老伴的手往店里走，走两步，停一步，把每一块地砖都踩实。

在店里，老人停了半个钟头。他不看茶架，只看人：看唐老师给客人让座的角度，看店员递茶的手势，看两个年轻人合抬一只箱子的默契。走到收银台前，他站住，看了一眼墙上那三句店规的铜牌，很久。老太太低声问，要不要带一饼茶回去留念。

“今天不买茶。”他说，“看看就行。”

八点过一刻，一辆掉漆的面包车停在媒体区外。龚小凡跳下车，登山包上捆着三脚架、稳定器和两块备用电池，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贴在镜片上。保安核过备案，屏幕上跳出“竟陵旧事”四个字——一个公众号的名字，也是一对兄妹的名字合在一处。

主办方没有人拦她。没有人说不请，也没有人说请。

她把机位架在媒体区最边上，镜头先对主舞台，又顺手对了一眼嘉木堂的门头。蓝溪端了两杯热水过去，她接了一杯，说了声谢谢。两个人都没有多话。有些名字两个人都认识，认识的方式却隔着一整座广场。

龚小凡调试机位的时候，直播间的弹幕从零开始滚。滚出来的头一个问题都差不多：她今天会出现吗。小凡没有念弹幕，把镜头缓缓转向了湖。

蓝溪在流程表上勾掉一项，抬头时，看见嘉宾区边缘立着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深色西装，怀里抱着一只牛皮纸档案袋，抱得很紧，像抱着一件不能落地的东西。

是小周，罗家的法务。罗总没有来。

春天解约的时候，法务函就是从一样的袋子里抽出来的。小周今天大概也带来了什么，只是没有人知道该由谁来接。礼仪小姐引他在嘉宾席第三排坐下，他把档案袋平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一直压着。

· · ·

上午的人潮一层一层涨上来。

汉口来的茶商，省里的协会，本地的乡贤，从南广场两侧的通道涌进红毯区。临时茶点区里，三蒸居的笼屉冒着白汽，黄潭米粉的鳝鱼臊子香混着锅盔的芝麻香，一直飘进媒体区的遮阳棚。有孩子举着糖塑跑过红毯，糖人里的孙悟空举着金箍棒，粘了一裤腿的阳光。

签到墙立在红毯入口，白底水墨，来宾用毛笔在上面留名。伴手礼是一只素色棉纸包：一饼新茶，一枚书签，书签上印着《茶经》里的一句。三百份伴手礼码进藤筐，蓝溪的指头被棉纸边缘磨得发亮。

签到墙上的名字有讲究：嘉宾用行楷，乡贤用正楷，孩子们用铅笔。有个小姑娘踮着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角落里，写得很大，又拿手指偷偷描小了一圈。蓝溪看了一眼，没有笑，替她把毛笔扶正。

摇臂从媒体区后方缓缓扫过全场，信号车顶上支着碟子。八家平台的直播机位一字排开，补光灯把上午的脸照成晚上的脸。

唐穗十点整出现在店里。

月白的衫子，头发一丝不乱。她从东墙走到西墙，整整走了十一分钟，中途停了两次：伸手把第三排的一饼茶转了半寸，又把展柜里一只公道杯挪开一指宽。蓝溪跟在半步之后，看她弯腰、直起、微笑，每一个动作都像先用铅笔打好了底稿。

门口的动线上，她站了三分钟，看客人怎么进门，先看什么，在哪里停步。然后她把迎宾的花架往左挪了一尺，把门口的迎宾毯转了个方向。

忙完这些，她从后堂端出一杯温水，站在门口慢慢喝了一半。蓝溪迎上去想接手，她摇头，把剩下的一半喝完，杯子递回来，指尖在蓝溪手背上轻轻点了一下。九年了，这个点法是表扬，也是交托。

有记者隔着人缝喊，问今天这个日子是不是特意选的。礼仪小姐笑着往前一让，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把人墙重新砌好。

正午过后起了风，湖上的雾一绺一绺往岸上爬，广场顶上的旗子响成一片。

风把红毯的一角掀起来，工人拿铁压脚重新压好。蓝溪蹲下去查了四角，起身的时候看见湖那边有一队鸥鸟贴着水飞，飞得很低，像要赶在天黑之前，把湖面从头数一遍。

十六时三十分，灯光师带人试灯。

发电机从配电间一侧接出来，线缆沿红毯边缘走，用绿色地毯压得平平整整。灯光师举着对讲机喊了一声预备，广场四角的泛光灯唰地一下全亮了。

天还没有黑透，灯一开，暮色齐齐退了半步。整座南广场从黄昏里被捞出来，白得发青，柱子的影子钉在地上，像用墨线弹出来的。湖那边同时亮起一线，亮得反常，亮得不合时令。

人群里有人嚯了一声，举起手机。直播间的弹幕滚起来，说这是仙宫，说这是白昼，说天门的老板娘真敢花钱。

有一盏灯没亮。灯光师蹲在灯架底下换了保险，嘴里念叨线路是三天前才拉的。换完，四角的光重新齐了，比先前又白一层。

灯光师对着对讲机报数，信号、色温、功率，一样一样念过去，末了添了一句，声音从对讲机里漏出来：晚上七点正式亮灯，湖面上亮得像铺了层白霜。

蓝溪站在自家檐下看。她在这片景区待了九年，见过茶经楼在春天里、在雪里、在正月的花灯里，泛光灯这样亮法的夜，她是这两年才见熟的。别人管这种夜叫亮化，她私底下管它叫白夜——黑夜被灯泡煮开了，滚出来的全是白天。

蓝溪忽然想起那三句店规。九年前入职头一个月，她差点问出那句最不该问的话。那天唐老师正在擦一只玻璃盏，从杯口擦到杯底，擦了很久，一句话也没有说。后来她就懂了：有些问题不能问，不是怕答，是怕问的人担不起答。

她头一回上夜班那阵子，这广场到了晚上黑得只剩路灯，湖是黑的，楼是黑的，收了摊的早点车推过桥洞，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两年不一样了，天一黑，光就把湖面摁住，水汽散不开，连雾都是亮的。

灯亮了三十秒，灭了。暮色重新合拢，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广场上安静了几秒。这几秒的暮色像是借来的，借来再还回去，人人都知道，它随时会被讨走。

· · ·

十八时，蓝溪到流程台领最后一版流程表。

剪彩定在十九时十八分，红绸八条，金剪刀由礼宾托盘奉上。她一项一项往下核，核到剪彩那一行，停住了。

背景音乐一栏，原本印好的《庆典进行曲》被划掉了，划得很直，一道钢笔线。旁边一行小字换上了它：古琴曲《流水》。

改动处没有部门会签，会签栏空着。她去问执行导演，执行导演两手一摊：唐老师下午亲自交代的，琴和琴师都在后台备着，谁也不许改回去。

蓝溪翻到流程表末页。备注栏里有四个字，笔画瘦硬，起笔带锋，和第一百零八张请柬出自同一支笔：

“这曲子合。”

蓝溪把这一页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她不懂琴。她只知道行业里流传的一个说法：这支曲子很多年前跟着一颗卫星飞出了太阳系，替地球上所有的人，去问了一句有没有人听见。

问没问出结果，没有人知道。曲子还在，卫星已经飞得很远了。

她把那页流程表折好，放进板夹最底层。有一瞬间她想问一句为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九年了，她问过的问题，唐老师都答；她没问的，一定是不该答。

唐老师把一句话划掉，换上这支曲子。蓝溪把流程表夹回板夹，抬头看天。天边最后一点橘色正在沉底，湖面已经先黑了，黑得像一块等着的绒布。

再过一个钟头，这里会亮成白天。她跟着人流往店里走，忽然停了半步——九年了，唐老师从来没有在夜里办过事。

只有这一次，她把夜，当成了白天来用。

◆

傍晚十七时二十分，竺长生在景区西门出示请柬。

保安对着名单核了一遍，又核了一遍他。第一百零八号，栏框里的名字后头画着一颗手写的星，那一行还被人用铅笔轻轻描过一遍。帆布包过了机器，屏幕上只有纸和布的影子，值班员朝他抬了抬下巴。

包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只对折的牛皮纸袋。袋里两张剪纸：一张黄纸的“双童奉茶”，二〇〇五年的原件，三天前他打了借条从物证室提出来，借条这会儿就折在左胸口袋里；另一张剪的是一个人把手电筒递给另一个人，去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在工地围挡外的雪地里拾的。

纸很轻。他往前走一步，左胸口沉一下。

红毯从西门一直铺到嘉木堂的台阶下，他的路线却不在红毯上。白手套把他引向茶经楼方向的迎宾线。线拉在台阶旁，礼仪小姐一排白手套，他前面还有六位客人：协会的，商会的，一位乡贤和他的全家福。

乡贤们轮流与唐穗合影，快门响个不停。她的站姿一直没变，只有搭在身前的两只手，每隔几分钟悄悄换一次重心。

轮到他。她伸出手来，掌心温热，袖口有一缕很淡的茶香。

“竺叔叔，楼上风大，顶楼的座位给您留了。”

一年不见，她又瘦了些，妆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笑起来嘴角的弧度，跟二〇〇六年念庐天井里那个站在晾衣绳底下的十一岁女孩一模一样。那年他在天井里做苏彩娥案的回访，她给他搬了一张竹椅，倒了半杯凉茶，然后一直笑，什么也不说。

“楼上风大。”他说。

她笑意不减，视线在他脸上停了一秒，移向下一位客人。白手套引他进场，路上轻轻说了一句：您家走这边。

进门是大厅，暖气烘着，满厅都是茶香混着新装修的木料味。签到台的姑娘请他留名，他把毛笔接过来，写了两个字，笔画瘦硬。姑娘端详了半天，小声念：长生。他说，是竺。

茶经楼在广场正北，五十三米八五，九层。暮色里楼身是青黑色的，像一枚立在湖边的印章，印文朝湖，印钮朝南。电梯口排着队，他绕开，推开安全门的横杠，走楼梯。

楼道里比外头暖，转角有一扇窄窗，一层一个朝向。西窗里，湖在楼下摊开，白夜还没有开始，湖面暗着，像一把收进鞘里的刀；东窗对着围墙外的老街，白天卖锅盔和糖塑的地方，这个钟点黑着，只有一盏通宵打印店的灯白白亮着，像谁忘了关的白天。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他每上一层，灯在身后一盏一盏灭下去，像有人替他把来路收起来。他慢慢往上走，像翻一本记了二十年的账。

楼是九层，经是十章。讲解词他背得出：一层本源，二层采具，三层造法，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顶楼把九之略、十之图并成一层收梢。九层楼，装下一部一万来字的经。他干了一辈子刑警，知道有的人的二十年，也只够装进一万字。

一层，一之源。本源殿迎面一堵影壁，刻的正是头一句，六个字描了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影壁背后是一圈展柜，柜里躺着几片老茶的残叶，标签上写着出土的字样。金字的反光落在玻璃上，把残叶也镀了一层金。

影壁前有保洁在换灯笼，踩着人字梯，一个一个摘旧挂新。他侧身让了让，等灯挂稳了才往前走。灯笼里没有蜡烛，是电的，一按就亮。

他有一本账，记了二十年。这一页记的是：某年冬天，有个男人在手抄的经文扉页上，从这六个字里给儿子取了名字；后来，有个女人拿这六个字做了

招牌；再后来，这六个字要替一条命收尾。

二层，二之具。展柜里是采茶的籯、蒸茶的灶、拍茶的甑，竹木石陶，模型做得一丝不苟，连竹篾的绞口都摆得清清楚楚。

讲解员带着一团客人从电梯口过来，声音在楼道里荡：工具齐了，茶才做得成。客人们点头，举手机，走过去。

他的账记的是另一件具。二〇一九年九月，王春发从米缸底下掏出一个红布包，布里裹着一把家用剪刀。米缸养人，也养剪刀，一养十年。有一件具，这满楼的展柜里，永远不会有它的位置。

三层，三之造。展墙把造茶拆成七道工序，蒸、捣、拍、焙、穿、封，一道接一道排下去，末尾注着一行小字，意思是：到这一步，茶就成了。

他的账：漳州山坳里也有一间“造”坊。棉纸刷浆，高湿闷仓，七天造出三十年的旧。他看过案卷照片，摊在地上的茶饼一层压一层，像摞起来的日历。照片里还有一张工作台，台上摆着木刻的印版，版上的字口磨得发亮。他当时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像盯着一口井。急火出不来老味，得慢慢熬——假年月跟真年月，熬的法子是一样的。

四层，四之器。二十四器一整套，风炉、鍑、碾、罗、涤方、滓方，按古图复原，铜绿做旧做得恰到好处。

风炉的炉膛里塑着一个小人，讲解词说那是守火的。竺长生多看了一眼。守火的人不喝茶，守火的人只管火候。

他在玻璃前数了一遍，二十四件，一件不缺。他的账：有的人成年的全部家什，拢共三样——一把剪刀，一沓纸，一包天黑以后的时间。

这句话他没有说出口。展柜前的客人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人人都看得见那二十四件器，看不见那三样。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才是命里的正经家当。

在四层的转角窗前，他站了一息。窗外能看见嘉木堂的门头，铜字被探照灯照着，亮得像另一座小楼。

五层，五之煮。展柜上方悬着一条水纹木雕，鱼目、涌泉、腾波鼓浪，三沸刻成三道梁。梁下挂着三块小牌，写着一沸二沸三沸的样子。有客人在那儿拍照，闪光灯白了一下。

煮水的人守着火候，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他这些年经手的案子，十个里有八个，是人自己沸过了头。他的账只有一行：也有一种沸，不响，二十年不响。

六层，六之饮。他在这一层停了一步。

展墙头一行刻着八个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二十年前那个冬夜，望湖仓外围了三层警戒线。后半夜起了风，封锁布响得像雨。一个穿校服的伢从人缝里钻出来，把一杯热水塞进他手里，转身就走。搪瓷缸，缸身上印着红双喜。他追出两步，人已经没了；那杯水他捧到天亮，一口没喝——他怕它有毒，更怕它没毒。

后来他把那只缸写进了走访记录，编号到今天还记得。查了三年，查不出是哪家的孩子。

那只缸后来留在他办公室，缸沿磕掉了一块瓷。秀珍嫌它旧，要扔，他拿了回来，锁进卷宗箱。箱子里锁过很多东西，只有这一件，不是证据。

现在他站在六之饮的展墙底下，把这笔账对上了。缸是温的，手也是温的。十一岁的手。

墙上的刻字一行一行往下排，他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末尾，讲解员领着一团人过来了，人声把他推到一边。他让开了。这一层的话，他不需要听。

七层，七之事。从上古到清，历代茶事抄满四面墙，越往后字越密，抄到晚清，墨色淡下去，像力竭了。角落里立着一面镜子，正对着满墙的字，人站过去，字就从背后把人围住。

他的账没有上墙：曲健，广州，灯饰仓；周小奈，昆明，出租屋；龚一凡，文创园，塔吊。三桩案子，三本卷宗，三地互不往来，每桩办到一半，线

头就断在同一堵墙里。墙里住着什么，他上礼拜才看见——样册的暗层，一层纸隔开两个世界，隔了十九年。

八层，八之出。产地的名录从山南排到江南，一方一方木牌挂满整圈墙，牌子上是地名，是山场，是水色。

一个孩子指着墙上的地名念，念到江南，回头问大人，我们家的茶在哪儿。大人往楼上指了指。

他在墙上找了两遍，没有竟陵。

茶圣把自己的家乡从产茶名录里略去了。八之出写尽天下的好茶，独独不写自己门口的两棵树。他的账：有一类人，连生身之地都要亲手划掉。二〇一四年春天，一个活人搬进了一本户口，户主是一九九四年生、二〇〇八年车祸死了的男孩。名录上添一个名字，阳册上就得抹掉一个名字。

那个名字用了十一年。坐车，住店，开户，样样都用，像一件合身的外衣。外衣底下的人，画师一样瘦，一样白，十年没添过一根白发。

顶楼到了。

九层，九之略，十之图，合成一层，展板薄薄两块。九之略讲省法：山野寺园之间，器物可以从省；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缺一件，茶就不成席。

他的账：他办了三十三年案，知道天下的案子也是“略”出来的。略去一页不予立案的说明，略去三行查无此人的记录，略去一场四十七秒的停电，案子就略成了另一桩。

十之图说，把全经抄在绢素上，张挂起来，四座之人一看就懂。展板尽头留着一块空墙，讲解词说是留给今后展览的。空墙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灯。

他想，有的图，要挂二十年才挂得起来。

檐廊的门在展板背后，虚掩着。

按流程，顶楼观景座要到十九点才对嘉宾开放，这道门本该锁着。他伸手一推，门无声地开了条缝。

门后的檐廊黑着，只有广场的光从檐口翻上来，把地砖的缝照成一根根亮线。风从湖上过来，比楼下大得多，带着水腥气。就在门轴转动的那一下，一张纸贴着地皮翻过来，打了个旋，停在他的鞋尖上。

他弯腰拾起来。

纸在风里响了一下，像谁低低应了一声。

黄纸。剪的是一座九层的楼，檐口层层，剪得极细。楼顶上，站着一个小人。

他认得这张的“前身”。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七日，这座楼开放的头一天，他在人群外的台阶上拾到过一张：一样的楼，小人被压在楼底座底下，只露出半个头。

十一年，小人从楼底下，走上了楼顶。

他把这张纸与袋里那两张放在一处比了比，纸的黄是一样的黄，剪的手是同一只手。十一年的纸，排成一个没有人读过的句子，今晚到了句读。

竺长生把两张剪纸收回纸袋，向檐廊里走去。

◆

十八时整，景区消防控制室改成的临时指挥部里，六块屏幕一起亮着。

指挥部是十六号夜里设起来的。那天核出“陈小满”的户口是本死人的，支队连夜把人马拉到了景区，对外名义是开业安保，实际是一张网。网眼收多紧，收在什么时候，全看那条鱼往哪边游。

蒋阔把对讲机的音量调低一格。白板上画着平面图：南广场，红毯，主舞台，配电间，三个红圈是便衣组的位置。外围布控铺满半张桌面——南广场十

二人，东西通道各一组，配电间所在的北侧通道，消防雨棚底下蹲着两个人。屏幕最右一块，单独挂着配电间的门禁记录。

屏幕上还有一路画面轮着切：楼梯间，大厅，各层转角。蒋阔要求留一格给南广场的倒计时屏，支队长问为什么。他说，倒计时也是证据，得看着它走到头。

支队长当时没有说什么，挂了电话两分钟，回过来一个字：好。

白板右上角贴着一条时间轴：十七时二十分嘉宾入场，十八时试灯，十九时十八分点亮，十九时三十分剪彩，二十四时，追诉时效届满。最后一个刻度是支队长亲手写的，写完把笔帽按得啪的一响。

名单上第一百零八位那个人，布控图里没有。蒋阔核名单的时候问过支队长，要不要跟师父打个招呼。支队长想了想：他是嘉宾，不是专案组的。顿了顿，又说：他要去哪儿，让他去。

蒋阔把这句话想了很久。让他去——三个字说得像批一张假条，又像还一桩愿。

支队长跟师父是同一期警校的，睡过上下铺。这层旧，蒋阔平时想不起来，今晚想起来了。

“陈小满”的临时工证是三天前办下来的。劳务公司经手，照片、指纹、体检，全套干净得像刚洗过的床单。门禁记录停在十八时零六分，刷一次，进，此后再无。

劳务名单上一共五个临时工：保洁两个，搬运两个，配电间值守一个。三天里，“陈小满”上过三回班。带班的工头后来回忆，这个人话少，手巧，搬东西不歇气，裁纸箱用的是左手，裁得比谁都直。工头说这话的时候直搓手：早知道，说什么也不敢要他。

领班还提供了一个细节：这个人干活的时候帽子从不摘，歇下来也不摘，喝水都侧着身子。领班比划了半天才说清楚，就是那种，脸不打算给任何人看的侧法。

收网令两天前就批了。支队长在电话里只给了三个字：等他动。

蒋阔跟了师父二十三年，懂这三个字的分量。这种案子，等比抓难：人一动，才是人；人不动，二十年也只是一沓纸。二〇二二年积案攻坚，他把这案子从头到尾重走了一遍，走完的那天夜里，他在办公室坐到天亮，一支烟没点，就那么捏着。那年收队，卷宗重新入库，编号都没变。他在档案室坐了一天，把二〇〇五年的现场照片从头看到尾，连照片背面技术员的钢笔字都看了，看得很慢，像在听人说话。

档案室的老张头那天陪了他一下午，临走说了一句：小蒋，这屋里的纸，一张有一张的命。他当时不懂，现在懂了——有的纸的命，是等人把它读完。

方案里备了两手。他不动，就等二十四点一到，把案卷移进下一道程序；他一动，就收网。没有人想过他会往楼顶动——查了两天的布控图上，顶楼连一个哨位都没有。

蒋阔把布控图又看了一眼，在配电间那个位置画了个圈。他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对劲——一个开了十一年死户口的人，做事不留毛边，偏偏三天前大大方方办了张临时工证。这不像疏忽，像请柬。

他把这个念头压下去，压了三次。第四次它自己浮上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晚饭是盒饭，没人动。指挥部里只有三种声音：对讲机的电流声，键盘声，空调的风声。徒弟小杜第三次问他要不要换班，他摆摆手，把椅子往屏幕跟前拖了拖。

指挥部的窗子糊了一层膜，从里看不见外，从外也看不见里。膜上留着上一场活动贴的字：平安天门。从里看，笔画都是反的。

白板的时间轴上，有人用蓝笔在十九时三十分后面画了个小小的问号。谁画的，没有人认。蒋阔看了那个问号一眼，没有擦。

十九时十八分点亮，十九时三十分剪彩。主舞台两侧的倒计时屏红得像两串炭火，数字一秒一秒往下掉。

十八时三十九分，门禁又闪了一下。

刷卡。陈小满。

蒋阔坐直了。他按住喉振送话器，一个个组点名，声音压得很平。北侧组回话：雨棚下未见人员进出。十八时四十一分，北侧组又补了一句：人背着个包进了配电间，灯一闪，就看不见了。

主舞台方向，主持人正领着全场为点亮仪式试音，一遍一遍，稳稳的。安检门外的游客还在往里涌，被便衣不动声色地分成两股。

十八时四十二分整，主电柜跳闸。

六块屏幕里，南广场、红毯、倒计时屏，齐齐黑成一块。指挥部的空调声一下子浮了出来。屏幕时间码一跳一跳，蒋阔盯着它数：一秒，两秒，三秒……黑地里，手机的星点亮起来，星星点点，像水面翻了白肚。

四十七秒。备用电源合闸，光一层一层爬回来，倒计时屏重新跳出数字，接上了先前那一秒，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

蒋阔的手表也在走。他后来在笔录里写：那四十七秒，他是数出声的，声音很稳，屋里没有一个人接话。

屏幕里，人群起了掌声，还有人吹口哨。都当这是安排好的节目。

掌声里有人举着手机录像，屏幕的光一小片一小片，把前排孩子的脸照亮。孩子仰着头问妈妈，灯还会再灭吗。妈妈说，不会了，不会了。

北侧组报告：配电间空门，闸刀上缠着新鲜的胶布。雨棚下的哨位压着嗓子补了一句：刚才好像有个人贴着墙根过去了，还当是找厕所的。南侧组清点临时工，五个名字，四个应到。

陈小满，失联。

倒计时屏的数字还在跳，红色的一格一格，像替谁数着什么。

小杜低声问，师父上午来过指挥部，坐了十分钟，说了什么。蒋阔说，问了两句，一句是顶楼的门锁，一句是十一月的湖风大不大。

蒋阔已经出了指挥部。楼梯口两个组同时到位，他一边下楼一边下令：封东梯西梯，电梯停运；檐廊监控切指挥部大屏；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踏上顶楼。

有人问：抓不抓？

“围死。等命令。”

他布置完，抬腕看了一眼表。十八时四十八分。从配电间到楼梯口，快的话，两分钟。那根绷了二十年的弦清楚——“等他动”三个字，在四十七秒前就用完了。

他对着送话器把楼里的调度过了一遍：一楼大厅两人，五楼平台两人，七楼转角一人，全部背对楼梯，面朝窗外，只看不拦。

檐廊监控切上大屏。云台是景区自己装的，本来用来看落石和观景人流，像素不高，夜里的光把人照得发白，像两张剪影。蒋阔让人把画面同步到支队长手机上，支队长回了两个字：收到。

耳机里能听见风，一阵一阵。蒋阔盯着那两个白点，注意到一个细节：矮的那个始终站在高的那个下风处，风从他那边吹过去，吹向湖。

画面里先有一个人：帆布包，灰夹克，站在檐廊中段，面朝湖。蒋阔认得那件夹克，也认得那个站姿，他见了一辈子。

师父退休那天的最后一个卷宗，就是这件案子的复印本。他说过一句醉话：这案子不归我管了，归天管。天管了七年，今天把它交回了人间。

十八时五十一分，画面左缘走进第二个人。工装，鸭舌帽，贴着柱子的影子走。监控没有声音，可蒋阔看那种走法，就知道那是一辈子没有声音的人。

他按下对讲机。那头很快接起来，背景里全是风。

“师父，他在您那层。”

风声空了几秒。师父的声音传过来，平得像在说今天立冬：

“莫上来。这个人，是我先看的。”

对讲机里随后一声极轻的电流音。蒋阔按着送话键，手指停了停，松开了。

跟着师父办了二十年案子，他头一回听见这种口气。不是请示，不是商量，是一个人在还一笔债的时候，不许别人搭手。

支队长在耳机里问要不要强攻。他答：顶楼只一条梯，人在檐口，前后是风，强攻是逼他。支队长沉默两秒，批了，又添四个字：人要活的。

蒋阔没有接这四个字。他把音量拧到最大，站在大屏前。

所有指令都发出去了，剩下的只有看。二十三年，蒋阔头一回在指挥位上无所事事。他把手从桌面上拿开，又放回去，掌心汗津津的。

画面里，两个身影隔着四五步，一个面朝湖，一个面朝楼。高大的那个把帆布包往脚边挪了挪，坐下了；矮半个头的那个帽檐压得很低，两只手一直垂在身侧，垂得很自然，像工具挂在工具架上。

师父教过他，盯人先盯手。

时间码在跳。十八时五十三分，五十四分，五十五分。两个人影一动不动，檐廊的风把他们的衣角吹得连成一片，像一张纸的两个角。

指挥部里没人说话。小杜把蒋阔的盒饭往他手边推了推，又轻轻拿走了。屏幕的光把每个人的脸照成青白色，谁看谁都像纸剪的。

一个六十七岁，一个三十一岁。二十年的两头，终于在一张画面里碰头了。

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像盯着一锅将开未开的水。

◆

十八时四十七分，茶经楼九层檐廊。

风从西湖上过来，带着水汽，往人领子里钻。泛光灯的灯位在广场四角，光从下往上打，檐廊每一根柱子都拖着一条斜斜的影子，光柱里浮尘缓缓地

翻。檐角的铃铛响一下，停一下，像有人在数拍子。

湖面真如那个灯光师说的，白得像铺了一层霜，霜上还留着风犁开的沟，一道一道，推向对岸。对岸的树影黑成一排。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星星都被灯洗掉了。

檐廊中段摆着一把藤椅，椅背上搭着一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棉大衣，崭新，领口的商标没有剪。座位给他留了，衣裳也给他备了。竺长生看了一眼，没有坐。

他伸手试了试椅面。藤条是新的，还带着仓库里的干气味。搭在椅背上的棉大衣厚实，领口缝着一小块水洗布，布上没有字。他把大衣拿起来又放下，放回原来的角度，一丝不差。

做完这个动作，他后退半步，站回影子外头。泛光灯的每一束都从他背后绕过去，把他的影子钉在檐廊另一头，长长的，一动不动，像一个先到的人。

他把帆布包放在脚边，面朝湖，等。

身后的楼梯间黑着，电梯停了，整座楼只剩风的声音。楼下的广场远远传来主持人试音的声音，一遍一遍念着来宾的名字，念到谁，谁就应一声。念名单的声音顺着楼板爬上来，爬到第九层，只剩下一点点嗡嗡的底。

湖上有夜钓的人，头灯在霜白的水面上浮着，一点，两点。楼下的红毯边缘，礼仪小姐在换新的一排茶盏，瓷器磕碰的轻响顺着风爬上来，爬到一半就散了。

他在这个嗡嗡的底里，把牛皮纸袋打开，就着檐口翻上来的光，又看了一遍那张“双童奉茶”。黄纸都脆了，两个小人的衣角剪出锯齿的花边，二十年前的刀口，如今翻着毛。他把纸收回袋里，把这一天从早到晚过了一遍：红毯，迎宾线，那句顶楼的座位，九层楼的账，脚边这张纸。

他还想过很多种见面。在渡口，在茶山，在某一场雨里。他也想过最坏的一种，想过很多遍。可真站到这道檐廊里，他还是希望那个人别来。人别来，就能活得久一点。这份私心他压了一下午，此刻随着脚步声，一起到站了。

脚步声就是这时候出现的。

很轻，踩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回音，三四步之外停住。工装的布料硬，人站定了，布料还在沙沙地蹭。

竺长生转过身。

泛光灯四面八方地打，把那张脸照得没有一处阴影。很年轻，很白，白得像檐外的湖。鸭舌帽压得很低，帽檐下面一双眼睛安安静静，像两口不起波澜的井。

那人比照片上瘦，也比照片上高，站着的时候肩往里收，像常年把自己放在窄处。工装的袖口挽到小臂，手腕细得看得出骨形。那双手的虎口有一层厚茧，是十几年握剪刀的手。工装胸口别着一张塑料牌，牌上三个字：陈小满。

名字是借来的，站姿是自己的。这个站姿竺长生见过：去年，工地围挡外，隔着一条马路，雪里。

那天雪停之后，他在围挡外的泥地里站了半宿，鞋里灌满了雪水。人没有过来，纸过来了，从围挡底下，慢慢推到他脚边。他弯腰去拾，抬头的时候，马路对面已经没有人了。

那人用左手从粗布包里取出一张纸，向他递过来。

他接了。

黄纸，剪得极密：一座楼的檐廊，檐廊上一张小桌，桌上一把壶，两只盏，两个小人相对而坐。两个小人的背后，各剪了一轮月亮，一样圆。壶嘴里升起两缕细线，剪工把那两缕线剪得又直又轻，像怕惊动了谁。剪口全是左手刀的路数，收刀的地方藏而不露——这一手，他上礼拜在齐伯的样册暗层里，刚一页一页见过。

纸上剪的，是两个人在楼顶上喝茶。

两个小人的眉眼剪得很省，几刀而已，可坐姿剪得极认真：一个正身，一个微微侧着，中间那只壶的提梁完整无缺。竺长生想起卷宗里一句老话，民间

剪纸，剪人难剪坐，剪坐如剪碑。

竺长生看了很久。然后他打开牛皮纸袋，抽出二〇〇五年的那张“双童奉茶”，递过去。

“这张，我替你们收了二十年。”

那人接纸的动作停了半拍。

左手接过去的。他低下头，帽檐的阴影盖住半张脸。风把纸角掀起来，放下，又掀起来。他看那张纸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楼下的名单念完了一轮，久到湖面的霜白换了一个方向。

有一阵，他的拇指在纸面上极轻地动了一下，像在摸一道旧疤，怕摸疼了。

风大起来，檐角的铃铛连着响了几声。那人把黄纸折起来，折得很小心，对齐每一个角，收进工装胸前的口袋，用手掌按了按。那张纸离他的心跳，只隔一层布。

竺长生看着这个动作，喉结动了一下。他这辈子见过人藏刀，藏证，藏钱，头一回见人把一张纸贴着心口收起来，收得像收一道圣旨。

“茶要遮光，才甜。”

声音很轻，落在风里几乎接不住。语调平直，没有起伏，像在念一条行规，又像替谁解释一句再普通不过的道理。

竺长生在刑侦这一行里听过太多最后的话，嚎的，骂的，喊冤的，交代一半闭上嘴的。没有一句像这一句。这一句不辩解，不求饶，也不告别，倒像师徒之间交代一门手艺——往后用不上了，白白留给你。

竺长生点点头。

他想问的其实很多。剪刀是怎么磨的，十九年怎么忍的，一包一包剪纸寄出去的时候，信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他把这些都咽了回去。三十几年里他问过很多人很多话，今晚这一场，问出口就是逼。

他想起自己办公室抽屉里那半盒没有送出去的名片，印了三十年的名字，替很多人问过路。今晚他把所有的身份都留下了，只带来一个退休老头的一句家常话。

檐廊的风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把两个人的沉默吹得很匀。沉默有大小，今晚这一场是最大的一种，大得像一座楼。

他不劝降。来之前他想好的话只有一句，此刻说出口，比想的短：

“我不问你为什。我就问一句——冷不冷？”

那人抬起头。

泛光灯把他的眼睛照得很亮。他望了竺长生一眼，又望向湖。湖白得晃眼，霜一样的亮，一直亮到看不见的地方。

两个人有一阵都没有说话。湖上的白光一阵一阵漫上檐廊，漫过鞋尖，又退回去，像潮水在试探一条船的吃水。

竺长生等着。风把两个人的衣角往同一个方向掀。

远处湖心的夜钓人收了一根竿，头灯晃了晃，灭了。白霜似的水面上少了一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座楼，和楼上这两个不说话的人。

“楼上看西湖，白天也是亮的。”

他说完这句话，往后退了半步。

这句话接得快，答的却不知是哪一年的问。而这句话前面，还有半声很轻的、几乎不存在的笑。那半声笑落在风里，竺长生很多年后想起来，仍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听见了。

那半步退得很从容，像散场后从座位里让出一条过道。竺长生扑过去的时候，风衣下摆带翻了藤椅，藤条在地上磕出一声脆响，指尖堪堪够到工装的后襟，布料从指缝里滑出去，像一尾鱼。

风把椅面上的灰卷起来，在光柱里绕了两圈，散了。

那人已经站上了檐口。

粗布包是从肩上滑下来的。包口没有系，千张剪纸腾空而出，风接住了它们。

满天的黄纸向上飞，越过檐口，越过光柱，成团成片地往天上去。楼，灯笼，伞，小桌，搪瓷缸，两个人对坐的年月。雪片一样密，却一片也不肯落下来，像一场逆着下的雪。

有几张擦着光柱飞远了，白得发蓝，越飞越小，往湖心的方向去了。

有一张掠过竺长生的肩头，他偏头看了一眼：剪的是一间小屋，屋门开着，门口一个提水的人。纸从他肩上飞出去，没有回头。

竺长生扑出去的手，只抓住一片纸。

纸上剪的是一个提灯笼的小人，灯苗剪得细细的一瓣，像随时会灭，又像已经亮了很多年。

然后是一声很短的风断。铃铛哑了一瞬，又响起来。

檐廊的灯影晃了一下，又稳住。楼下的掌声正到高潮，隔着楼板闷闷地涌上来，一浪推着一浪，像很远的潮水。

檐角的铃铛接着又响了两声，一长，一短。竺长生后来想，那大概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短的丧钟，也是最长的。

他后来向蒋阔复述那退后半步，复述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说，那不是跑，也不是跳，是退出——像一句唱完了的戏文，把台口让给下一个音。

竺长生扶着栏杆探头往下看。北侧通道的地面上，四角灯打不到的死角里，正好空出一小块最亮的地方，光圈一动不动，安安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

泛光灯在他落地的地方留出一圈亮，像舞台给最后一个演员留的光区。

光圈里没有影子走动，也没有声音传上来。风从他衣襟里穿过去，把手里那片灯笼吹得直抖。

他把那片灯笼凑到眼前又看了一遍。纸很薄，灯笼的提手剪成了一个小小的环。二十年的通信，开头一封是双童奉茶。他如今愿意信，最后这一封，是

这个灯笼。

翻倒的藤椅底下，那件棉大衣摊开了一半，商标朝天。竺长生把它拾起来，抖了抖，搭回椅背；断了两根藤条的椅子，他顺手扶正了。做完他自己怔了一下：都这个时候了，他还在收拾东西。

他把剪纸攥进拳心，转身去找楼梯，第一步就踩空了半级——腿比心慢了半拍。

牛皮纸袋还敞着口，贴在肋边。里面剩的那张剪纸，凉了一路。

楼下，掌声轰然起来了，隔着九层楼板和风，闷闷的，一浪接一浪。开业庆典到了剪彩的时辰。楼下传来开业庆典的掌声——一墙之隔的两个世界，一边在剪彩，一边在收尸。

◆

十九时整，南广场的主舞台亮得没有一丝阴影。

蓝溪站在侧台，板夹的边硌着掌心。泛光灯四角齐亮，光柱把广场照成一面白瓷盘，人脸上所有的细纹都被抹平了。湖那边的光铺到岸边，真像提前落了一层霜。

这一晚蓝溪站的不是柜台，是侧台。她在心里把站柜台的日子过了一遍：九年，她习惯站在光的边上，替光里的人递东西。台上每亮一次追光，她就在板夹上轻轻点一下。点到第七下，剪彩。点到第八下，掌灯。点到第九下之前，流程就该走完了。

台下的椅子坐满了，后排还站着人。媒体的机位架成一排，无人机的灯在半空里一明一灭。龚小凡的机位在最边上，补光灯亮着，屏幕里的弹幕滚成一条白线。

白线的密度在十九时二十分之后变了，一条白线涨成一匹白布。蓝溪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后来才知道，全城的、全国的陌生人，正在同时往这一间直

播间里涌。

主持人报幕，声音洪亮：现在是十九点十八分，吉时已到——嘉木堂开业庆典，正式开始。掌声。古琴响起来——《流水》，第一个音很淡，像一滴水掉进很深的碗里。

琴师坐在台角，穿一身靛蓝，手起手落，看不清指法，只见袖口一荡一荡。曲子不快，一个音接一个音，像有人在很深的水里，一步一步往前走。

台下的老茶客闭着眼睛听，有一对老夫妇跟着节拍轻轻点头。琴声不大，可整座广场都安静下来，安静得连湖对岸浮灯船的小马达声都听得见。

唐穗从后台走出来。月白的衫子在白光里几乎透明。她走到台中央，向三个方向各鞠一躬，弧度一致。

礼宾托盘奉上金剪刀，红绸八条，八位剪彩嘉宾一字排开。简明堂坐在第一排，巴掌拍得很慢，拍两下，停一下；罗成峰的位置空着，红绸由小周代持，小周抱着那条红绸，像抱着烫手的东西。

嘉宾里有两张生面孔，胸牌上的单位印得很小。蓝溪后来才想起来，那是省厅来的人。他们从头到尾没有鼓掌，站的位置也很讲究——一左一右，把主舞台的退路看在眼里。

剪刀落下去的时候，琴声正好流到一段最平缓的地方。八条红绸断成十六截。掌声、礼炮的电子音、头顶无人机的蜂鸣，一齐涌上来。

礼宾的小姑娘捧着托盘退到台侧，手心也是汗，金剪刀放回去的时候磕了一下托盘边。八位嘉宾各自退开，红绸头子被收进一只纸箱。到这一步为止，一切都和彩排过的一样。

蓝溪跟着鼓了掌。她鼓掌的时候在默数流程——下一项，掌灯仪式，十九时三十分，湖面浮灯。

骚动是从广场西北角起来的。

先是一两声短促的喊，接着人声像锅里进了冷油。

蓝溪扭头看了一眼大屏。倒计时屏还亮着，红色数字跳成了别的页面——有人切了信号。屏幕上先是雪花，然后是空黑，最后跳出四个字：信号检修。西北角是配电间和员工通道的方向。人群朝那边偏了偏头，又转回来——多半人当是哪个环节出了故障。

一个穿马甲的志愿者从侧台跑过去，对讲机贴在嘴边，声音压得很急。几个保安往西北方向小跑，跑的姿势不对，不是维持秩序的跑法。

音响师在侧台骂了一句线又被人踩了，弯腰去理线缆。理到一半，他的手停在配电箱的门上——箱门上的铅封少了一枚。他抬头朝西北角望了一眼。那一眼之后，他再没有回过舞台。

琴声停了。

主持人在台上连说两遍请大家稍安勿躁，话筒里的声音有点飘。警笛声由远及近，先是一两辆，然后是成串的蓝红光扫过景区上空的树梢。人群里，四十七秒停电时那阵掌声的记忆忽然复活了，真的有人又鼓起掌来，还笑着招呼同伴：快看，效果来了。

蓝溪听见身边两个年轻人在嘀咕，说这动静设计得真像。她说不出话。她数过流程表上的每一分钟，知道这个时刻本该是琴，不是警笛。

黑暗里，有人拉住了身边人的衣角，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蓝溪没有拉谁。她的手在板夹上。板夹里有全场的流程，她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底，最后一项后面是空白。空白的纸页上什么都没有，比哪一页都沉。

蓝溪没有鼓掌。

她看见龚小凡从媒体区逆着人流往西北角跑，三脚架拖在地上，手机支架倒在箱子上，屏幕还亮着，弹幕滚得发了白。她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一瞬间变成了另外一群人，袖口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有一个便衣从她身边挤过去，风衣下摆扫到了她的板夹。她往后让了半步，让到墙根，正好把整座舞台的侧面看进眼里。她看见一个眼熟的记者扒开人群往台前挤，话筒的防风罩举得老高。

那个记者蓝溪认得，九年前写过一篇《茶圣故里出了小茶仙》，写的是她的唐老师。报道里说，这孩子笑起来，眼睛里有光。蓝溪当年把那篇报道剪下来贴在床头，贴了三年。

贴到第三年，她把报纸取下来收进了抽屉。不是不喜欢了，是她慢慢看懂了：报纸上的唐老师和柜台里的唐老师，隔着一层她够不着的玻璃。九年了，她一直站在玻璃这一边，替那边的人守着店。

台上的唐穗没有动。

她站在白光正中央，像一根钉进光里的钉子。

蓝溪看她在光里站着，忽然想起店里那杆秤。唐老师称茶，从不多一钱，从不少一钱，秤杆挑起来，永远平的。此刻这个人站在光的正中央，也像一杆挑平了的秤，一头是三千人的广场，另一头看不出放着什么。

月白的衫子一动不动，只有裙角被风掀起一线，又落下。她等骚动的声浪在台上这里变成嗡嗡的背景，然后朝主持人侧了侧头。主持人会意，报出下一项：掌灯。

蓝溪在侧台看得清楚：报幕的时候，唐穗的两只手在身前交叠着，左手搭在右手上，稳得没有一丝颤。灯光从头顶浇下来，她的影子缩在脚底下，小小的一团。

湖面浮灯亮起来的时候，广场上响起今晚最整齐的一阵惊呼。几百盏莲花样的灯从岸这边往湖心铺过去，一盏一盏，把黑水点成一条星路。

第一排的客人里有人小声念了一句什么，像祈福，又像只是念给自己听。旁边的人跟着念。很快，前排一片低低的念声，念的是什么，各人都不一样。星路上方，白夜还亮着，泛光灯一盏不灭，照着灯，也照着人，照着所有往西北角跑的人。

有浮灯漂到一半，被风推着转了个圈，又接着往前走。

剪彩后的群访安排在台前。头一个问题是开业的感受，第二个问题刚起了个头，那个眼熟的记者已经挤到警戒线最前面，声音穿过所有嘈杂：

“楼上坠楼的是谁？您认识吗？”

警笛还在响。无人机在头顶盘旋。几百盏浮灯在湖上静静地漂。

唐穗对着话筒，答了三个字。

“不认识。”

她说完，把话筒从唇边拿开，朝台下点了点头，转身向后台走。月白的背影穿过白光，穿过侧台的暗，一步一步，不快，也不慢。

没有一个人看见她回头。

蓝溪追上去的时候，主持人正在宣布掌灯仪式礼成。

台下的掌声还在延续，为浮灯，为音乐，为这场谁也说不清的庆典。礼花筒响了最后两声，彩纸飘下来，落在蓝溪的头发上、肩上，落在那截没人收走的红绸上。

· · ·

后台的消防通道里没有灯。门框上方两个字是红漆刷的：安全。

唐穗站在通道尽头，背对着门口那一条光，整个人站在暗处。她的右手里还攥着那把剪彩的金剪刀，礼宾忘了回收，缎带缠在腕上。指节攥得发白。

那把金剪刀是新的，刃口还闪着开刃的光。缎带在腕上绕了两圈，结打在脉门上。蓝溪的目光落在那个结上，挪不开。

蓝溪在门口停住，没敢出声。

说不清是哪来的一个念头，像别人塞进她脑子里的：她攥剪刀的样子，跟三十年前攥铅笔盒的样子，一模一样。

这个念头把蓝溪自己吓了一跳。她一九九八年才出生，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唐穗松开手。金剪刀搁在消防栓顶上，轻轻磕了一声。她从蓝溪身边走过去，走进光里。经过的时候，蓝溪闻到她袖口一缕很淡的茶香，像雨前的毛尖，又不太像。

她没有停步。消防通道尽头的门开了，又合上，把这一天的后台合在了门里。

地上有一小片剪彩落下的红绸，被风推着打转。蓝溪弯腰去捡，绸子滑得抓不住，像一小段热水。她把它叠好，放进板夹的夹层。这是今晚唯一从台上带下来的东西。

蓝溪低头看流程表。下一项，答谢茶叙，被谁用铅笔轻轻划掉了。她把板夹抱在怀里，在原地站了很久。广场上的浮灯还在往湖心走，一盏接一盏，走成一条不肯断的线。

◆

十九时四十分，茶经楼北侧通道拉起了第二道警戒带。

第一道是景区拉的，隔游客；第二道是市局拉的，隔一切。广播在广场上循环：因设备检修，今晚活动提前结束，请各位嘉宾有序离场。人群往外走，一步三回头，手机举得比头高。

有游客不肯走，隔着第一道警戒线往北张望，被劝了三次才挪动。一个直播的年轻人把镜头对着天说，家人们，今天的云不对，红得发黑。他说了三遍，掉了一半的观众。

技术队的人蹲在那圈白光边上，动作和平时没有任何不同：拍照，固定，编号。相机快门一声一声，像很守时的小钟。物证袋一个一个传出来，袋口的

编号用记号笔写得很大。光圈中央罩着一块蓝色的布。蒋阔只看了一眼，就退到警戒线外。

勘查区的灯是临时架的两盏，打下来的光和楼上那盏泛光差不多白。技术队长蹲在光圈边上，用镊子夹起第一张纸，动作轻得像怕纸疼。

第一张纸展开来，是两个背靠背的小人。队长把它放进证物袋之前，多看了两秒，在登记表的备注栏里写下两个字：完整。

完整这两个字，技术队长一天里写了七遍。包装是完整的，捆扎是完整的，连挂历纸的折痕都是完整的。一个人把二十年的东西保存得这样完整，队长说，要么是有处安放，要么是没处安放。

写完第七遍，队长摘了眼镜揉眼睛。镜片上蒙着一层白汽，他朝光圈那边望过去，那块蓝布还在原地，白汽后面看不清，他也没有再走近。

人是从九层檐廊下来的，路是垂直的。地上能收的东西不多，檐廊上的东西多。

粗布包一只，洗得发白，包带断过，接口打着细密的结。包里的剪纸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每沓用旧挂历纸包着，一百张一包，挂历的年份从二〇〇六排到二〇二四。两张桌子，四个人，一直数到二十二点：一千零九十三张。

有楼。有人。有灯笼。有两个人对坐喝茶的小桌。有一张剪的是一把伞，伞底下站着两个小人，雨丝剪得比头发还细。有一张剪的是一只搪瓷缸，缸身上一个双喜字，缸沿磕掉一块。有一张剪的是一座九层的楼，楼底下压着一个小小的人——和二〇一四年那张一样，只是这一张上，小人的头顶又多了一座楼。

这一张被单独装了袋。蒋阔把它对着灯看了很久：黄纸的老边上剪着细密的锯齿，一层压着一层，像楼群的影子，也像一圈一圈的年轮。

清点的时候，四个人都没有说话。数到后半夜，手都轻了。

小杜数到第三百多张的时候停过一次。那张剪的是一双童鞋，三十三码的样子，鞋尖对着鞋尖。他捏着纸站了一会儿，重新坐下去，数得比刚才慢了。

家用剪刀一把，老式的，柄上缠着一圈红绳。形制鉴定的初步意见当晚就出来了：与二〇〇五年死者创口特征属同类器械。红绳缠得极密，一圈压着一圈，是那种怕东西脱手的缠法。

技术队的小伙子捏着那把剪刀看了半天，没说话。卷宗里也有一根红头绳，二〇〇五年的现场照片上，它在茶篓里。两样东西隔着二十年，红的程度差不多。

鉴定的老同志在意见栏里写完，把笔搁下，隔着桌子又看了那把剪刀很久。三十年前他参与过那起现场的勘验，创口的照片到现在还记得形状。他说了一句话，谁也没有接：剪子不认人，认手。

手机一部，旧款，双卡，卡是街边办的，户名查无此人。相册是空的。通讯录里只有六个号码：劳务公司，房东，五金店，快递驿站，殡仪馆，最后一个没有存名字。

技术员把六个号码一一回拨。五个通了，是各自的单位；最后一个关机。营业厅的记录调出来，开卡在二〇一四年春天，用的现金，办卡网点的监控早就轮转掉了。开卡那一天，与这本户口过户的日子，前后只差三天。

二十一时，比对结果先到。

省厅实验室的回函从打印机里出来的时候，机器响了好一阵。三年前王春发交上来的那个布包里，有一把旧木梳，梳齿间的毛发按程序提存过，封了三年，今天开了封。回函的结论只有一行字：死者与柳文霞符合单亲遗传关系，母子亲缘关系成立。

打印机吐纸的声音在夜里的指挥室里格外响。蒋阔把那张纸看了两遍，交给记录员入卷。

死者身份随之落定：沈嘉木，男，一九九四年二月生，天门竟陵人，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松风茶行沈松庭被害案侦查卷内列明的犯罪嫌疑人。

而“陈小满”——户籍信息系冒用，被冒用者二〇〇八年死于车祸。一个活人，在死人的户口里活了十一年。十一年里他坐过高铁，办过银行卡，租过房，进过这座景区的配电间。门禁记录替他记着：十八时零六分。

蒋阔把这条记录打了个星标。十天前核这个户口的时候，电脑的光照在脸上，他知道十一年白熬了；今天这条记录跳出来，他知道那十一年又回来了一天。只回来了一天。

二十二时四十七分，市里的通报发布。

蒋阔看见那篇通报的时候，它已经在他手机上了，转发正在往上跳。全文三句话：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沈松庭被害案，经侦查，犯罪嫌疑人沈嘉木（已死亡）系被害人沈松庭之子。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其余线索另案处理。”

三句话，五十四个字。发出去十一分钟，转发过了十万。热评头一条只有四个字：哪来的正义。第二条说：正义来晚了二十年，还不许它进门。第三条是一个问号，被人顶了几万次。

蒋阔把那篇通报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写字的人很用力，每个字都站在该站的地方。他想起师父说过，有的文书是写给今天看的，有的是写给二十年后的法庭看的。这一篇，哪一头都不沾。

二十三时起，“其余线索”在指挥部里有了各自的名字。漳州做旧坊，另案，涉案货值待估；深圳旧案材料，并案移交；龚一凡坠亡案，撤销原结论，重新立案侦查——塔吊那年的勘查意见本来就存疑，现在疑点有了编号。

龚一凡的名字在白板上从“外围”一栏挪进了“另案”一栏。挪磁贴的是蒋阔自己。擦“外围”两个字的时候，板擦上的灰落下来，落在他鞋面上，他没有拍。

小杜把龚一凡案的新卷宗抱进档案室，路过蒋阔身边的时候停了停，问：队长，龚家妹妹下午来过电话，就问了一句，算不算结了。蒋阔说：你怎么答

的。小杜说：我说，算了，但没结完。

小杜说完自己先愣了。蒋阔点点头：就这么答，一个字都不要改。

还有一份材料，蒋阔单独装了一袋：封仓账本的复印件，样册暗层的翻拍，十九年剪纸通信的目录。这些不属于任何一桩立得住的案由。它们属于二十年。

这一袋材料最后去了哪里，指挥部里没有人问。蒋阔在移交清单上签收的时候多看了一眼目录：十九年，三百多封，每一封只有一行剪纸的话。目录最后一页的落款日期，是今年十一月十六日——师父把它读完的那一天。

至于唐穗两个字——蒋阔把全部卷宗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她出现在合同里，在公章里，在媒体报道里，在监控画面里，每一处都干净。没有一张剪纸通到她那里，没有一句话落过她的签名。证据止步的地方，文书就必须止步。

小杜忍不住问了一句：就这样了？蒋阔没有抬头。他把那页清单翻过去，压平，像把一句话压回喉咙里。办公室的老规矩，卷宗合上之后，谁也不许替它说话。

指挥部角落里有一台饮水机，咕嘟了一声，翻起一个泡。夜深了，热水在里头自己响，没有人去接。

指挥部外的广场上，清洁工开始清扫红毯。扫帚划过地毯的声音一下一下，传进窗口，像很旧的钟摆。有人提议把红毯卷了，被支队长拦下了：现场没有清完，什么都不要动。

清洁工扫得很慢，一寸一寸，把这一夜往一处扫拢。

“其余线索另案处理”，八个字，替所有人挡住了往后的路。

二十三时二十分，家属通知栏的处理意见下来。柳文霞，故；沈松庭，故。能通知的人一栏，最后填了王春发。电话是蒋阔打的。那头沉默了十一秒，说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问，遗体现在在哪儿。

蒋阔报了殡仪馆的地址。那头嗯了一声，隔了几秒又问：能让娃穿双新鞋走吗。蒋阔说，可以。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蒋阔在拨号界面停了一会儿。他跟这个案子二十年，头一回有一笔账算不清：刀是二十年前的，剪刀是二十年前的，连恨都可能是二十年前分好的。只有那双新鞋，是明天的账。

指挥部的六块屏幕一块一块暗下去，最后一块还停在檐廊的画面上：一把翻倒的藤椅，椅背上搭着一件叠好的棉衣。

二十三时四十分，蒋阔在结案报告的落款处签下名字。笔尖离开纸面的时候，他把这支笔看了一会儿——用了六年的中性笔，笔杆上还缠着一圈旧胶布。

他拉开抽屉，把笔扔进最深处，推上。

“这支笔，我这辈子不想再用第二次。”

◆

二十二时二十分，嘉宾大巴停在景区外的辅路上，车门一开，媒体的手臂从警戒线外伸过来一片。

简明堂由老伴扶着，从人缝里穿过去，一个字没说。闪光灯在背后一片一片地亮。

有人朝他递话筒，递矿泉水，递名片，他一样都没有接。老伴的手一直挽着他的胳膊，挽得很紧。两位老人像两棵被风推着的老树，慢慢地，一寸一寸，从人缝里直了过来。

有记者追出二十米，喊：简老，一句话，就一句。他停下的不是脚，是肩——肩往后压了压，像把一句话压回骨头里，然后继续往前走。有个记者认出他，追着问：简老，嘉木堂的茶，到底还能不能喝？另一个问：您今天到场，是和解吗？

他停下脚，回头看了一眼那座亮着的楼。楼顶的檐廊黑着，九层窗格只剩零星几扇亮。

“今晚的茶，泡坏了，不能怪水。”

记者愣在原地，笔停在半空。老太太替他理了理围巾，两个人上了出租车。车门关上，把追问关在了玻璃外面。

的哥从后视镜里看了两位老人一眼，伸手把收音机拧小了。收音机里正在播通报，播到“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半句，被拧成了沙沙的电流声。

的哥从后视镜里又看了一眼，忍不住说：老爷子，这事儿邪性，我下午还在广场边上拉过活儿。简明堂没有接话。老伴替他答了一句：师傅，开您的车吧。的哥从镜子里再没敢看第二眼。

车里安静下来。收音机拧到最小，还在漏出一点唱腔，咿咿呀呀，唱的是哪一出，谁也没有听清。老伴在膝盖上轻轻拍着拍子，拍着拍着，停了。

车出城，过汉北河老桥。桥下的水黑着，桥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四十年前简明堂头一回走这座桥，是挑着两篓春茶去赶早市。那时桥是木头的，人也是木头做的，不知道累。

车过皂市的时候，老伴靠在他肩上睡着了。收音机换了个台，在放老戏，一句一句，慢得像老两口过日子的脚步。简明堂没有睡。他这一生验茶，先看条索，再看汤色，最后看叶底——叶底最难作假。人也是，临了最难作假。

行业群在手机里炸了。

老伴把手机递给他，屏幕的光照着两张老脸。消息一条压一条：嘉木茶事全线停业，各地门店卷帘门落锁；库存与商标整体转让，受让方是一家昆明某供应链公司，注册于今年十月，注册资本认缴一百万，地址在写字楼的联合办公区，法人是个九五年的年轻人。

有人把卷帘门落锁的照片一张一张贴进群里：汉口的，长沙的，昆明的，铁锁一模一样，像同一个师傅打的。

群里渐渐分成了两拨。一拨贴蜡烛，一拨在算货。算货的人越算越心惊：市面上流通的假年份茶，量远比做旧坊的产能大，多出来的那些，是从哪条河里进来的，没有人知道。这条消息没有人接话，慢慢沉了下去。

简明堂把群设了免打扰，过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重新打开。他这辈子没有怕过什么，今晚却有点不敢看同行说话。做茶的人和验茶的人，睡的是同一张行业的大床，只是梦里想的不一样。又有人贴出那家昆明公司的注册信息截图，截图上除了名字，什么都查不到。

有个年轻同行私信他，问：老师傅，这一行还有救吗。他没有回。回到一盏楼再点开，那个人已经撤回了消息，头像灰了。

简明堂一条一条看完，把手机还给老伴，看着窗外的黑。

“她连尾巴都不是自己的。”

老伴没有接话。老太太跟他过了五十年，知道他这句话不是骂人，是验尸——他验了一辈子茶，也验了一辈子人。仓是租的，工坊是别人的，户口是死人的，连这条深夜放出的消息，都掐着通报发布之后的钟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

干净，利落，一根毛边都不留。货沉进商业的海里，卷宗捞不动海。

他把这盘棋看了几十年。先手弃子，中盘换字，末盘清仓——每一手都落在规矩里，规矩拿她没有办法。棋盘上赢不下来的人，只能在棋盘外等。等什么，他也说不清，也许是等一个比他年轻的人，等二十年后的某一份卷宗。

车进汉口，路灯把车窗切成一格一格的亮。老伴醒了，问到了吗。他说快了。老太太从包里摸出一块糖剥开，掰了一半递给他。他含了。甜味在舌根上停了停，化成一缕苦——他这些年品出来的年月，都是这个次序。

老伴把糖纸折成小方块，收进包里。老太太过日子的手，和做旧坊压茶饼的手，某种意义上是同一双手，都是把日子压实、压出光来。只是压的方向不一样。

高架上车灯连成河，红的尾灯，白的前灯，各行其道。他看了一会儿，想起白天广场上那些乱成一片的手机光，红的白的搅在一处，分不出哪一盏是往前走的。

他靠着椅背闭上眼。今年春天，罗成峰托人送到一盏楼一饼茶，没有附字条，快递单上连寄件人姓名都是空的。他掂过分量，看过大票，量过饼面的窝——千羡水桩，做旧做得最好的一饼，好到碳十四都要犹豫一下再开口。

他做过三次检测，取样一次比一次狠，数据一次比一次干净。第三次做完，他把报告锁进抽屉，在家里坐到天亮。老伴问他在等什么。他说，等做这个茶的人犯一个错。这一等，又是两年。

两年里他给三位老友各写过一封信，问同一件事：要是有一天，做假的和卖假的不再是同伙，这笔账该怎么算。两位劝他放手，一位没有回。没有回信的那位，前年冬天走了，走之前把自家的茶样全烧了。

那时他就懂了送茶来的意思：这饼茶，从此与他无关，也与她无关。东西自己会说话，东西也自己会闭嘴。

· · ·

二十三点四十分，一盏楼。

店里没有开大灯，只点了柜台一盏。简明堂从怀里把那饼茶取出来，先站在门口的路灯底下看了看。棉纸的包脚压得极匀，茶饼的油光从纸缝里透出来。他凑近了看大票，看那个“羡”字——第三笔的豁口还在。八年前他在放大镜底下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这个豁口，为这个豁口，他把自己半辈子的名声押上了桌。

那年为这个豁口，他在行业年会上被围攻了四十分钟，茶商、藏家，还有两家拍卖行的人。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我不是跟哪一家过不去，我是跟做假过不去。今天夜里，这句话总算有了个着落，虽然着落的方式，谁也没有想到。

散会那天，一个藏家在走廊里拦住他，压低声音说：老简，你赢不了的，那背后是一座山。他当时回答：山我也爬过。今夜他想起这句话，笑了一下。山他没有赢，山自己塌了一角。

塌下来的这一角，压住的是一家家门店的门头，一片片库存的棉纸，和一个年轻法人名下的章。山塌的时候没有声音，账房里最安静。

豁口还在。刻这个版的人，今天夜里变成了通报上的一行字。

他推开门，把茶饼放进柜台正中的琉璃罩里，摆正。琉璃罩是他收最贵的茶用的，里头垫着深蓝的绒布。

绒布是老伴陪嫁箱子里的料子，裁了十几年，一直没舍得用完。琉璃罩摆上柜台正位的时候，他从抽屉里取出放大镜，最后看了一眼那个豁口，然后收了放大镜。往后它就在这儿了，不用再看，看也是它了。

柜台后头的墙上挂着一块老匾，一盏楼三个字，是他师父写的。他把琉璃罩往匾的正下方挪了挪，退后两步看了看。灯光从上头打下来，茶饼的影子，恰好落在匾里那个楼字上。

匾的边角磨得发亮，是几十年里袖口蹭出来的。他伸手摸了摸那个亮处，木头是温的。屋子里的东西住了人，就都带体温。他又摸出一张空白的标价牌，就着柜台的灯，一笔一笔手写：

“非卖品。样品号：001。做旧。”

写完他没有回后堂。他站在柜台里侧，隔着琉璃看那饼茶，像隔着玻璃看一个旧相识。两个人都上了年纪，都替别人背过不该背的东西。

老伴在里屋烧了水，问他喝不喝。他说泡一盏吧，就柜台这儿。老太太真就取了两只盏，茶是他手边最普通的一撮炒青。两个人隔着琉璃罩，就着一盏粗茶，把今天夜里坐过去了一半。谁也没有提那家店，谁也没有提那个人。

炒青是本地茶厂的散货，三十一块钱一两。老伴续第二道水的时候问，加不加糖。他说不加。老太太笑他，说你的嘴一辈子比脑子硬。他也笑。灯影里

两个白头人笑出了声，柜台那头的琉璃罩安安静静，没有笑。天下的茶，大多数是干净的——这句话他搁在心口，压了一辈子。

“你这一辈子，替人背了二十年的年月。往后你就在这儿，替我背。”

灯灭了。柜台的琉璃罩上，剩下窗外一格一格的路灯光，慢慢地爬过那行手写的字。

◆

十一月十九日，清晨六点四十，天门新城，出租屋的窗帘缝里透进灰白的光。

桌上两只碗，一只泡面吃完了，一只没动，筷子架在碗口，是昨夜的样子。哥哥的拖鞋摆在床脚，鞋头朝里。

白天的出租屋和夜里不一样。夜里它是作战室，白天它是两个人的旧房间。墙上还贴着一张手绘的天门地图，哥哥画的，红笔标了十七个地方，有的地方她至今没有去过。

第十七个地点没有标名字，只画了一个小圈。她问过一次，哥哥说，等别的圈都填满了就告诉她。现在十六个圈她一个一个都走过了，只剩这一个。它画在湖对岸，楼的位置上。

数据是五点五十七分破的一千万。终章《二十年的灯》挂了二十六个小时，转发还在涨。这条曲线小凡看过很多次了，头一回是哥哥出事那年，这一回的形状和那一次几乎一样，只是高得多，也陡得多。评论区滚得最快的三个词是：真的吗，悬疑到底了吗，还有谁。

也有人只留下一支蜡烛的表情，成千上万支，从傍晚排到天亮。

有一条评论顶得最高，只有六个字：小凡，睡一会儿吧。她看了很久，没有回。她怕自己一回，这一夜就塌了。

后台的留言挤了两千多条。有同行来谈转载的，有书商来谈出书的，有自称知情人爆料地址的，她一条都没有放出来。哥哥的账号只发查证过的东西，这条规矩她替他守着，守到二十年后为止。

有一家平台发来合作邀请，价码后头跟着一长串零，条件是独家授权、定期更新。她回了两个字：抱歉。对方又发来一句：流量就是正义啊。她看完，把对话框关了。正义要是能靠流量长出来，哥哥就不必死。

小凡伸手关掉了直播。补光灯灭的那一瞬间，屋子显出原来的旧：哥哥的折叠桌，哥哥的转椅，哥哥的白板。

白板立在墙角，两年没有挪过窝。

三角形的结构图是哥哥生前画的：三个顶点，两条实线，一条虚线，虚线顶端的空格一直空着。哥哥走后，她接过这支笔——蓝字是她添的，红字是后来才加的，红蓝两色的批注爬满白板四周，像一树开坏了的梅花。

哥哥画三角的那天，她在旁边看着。哥哥说，两个人画一条线，第三个人画一个点，这个案子就立起来了。她当时问，要是点找不齐呢。哥哥说，那就找齐为止。现在点齐了，是用他的命换来的齐。

昨夜通报出来以后，她在那个空格里填上了三个字：沈嘉木。马克笔的笔迹盖过虚线，三角闭合了。

按下笔的那一下，她的手很稳，稳得连她自己都意外。两年了，她从不敢在深夜碰那块白板，昨夜她把它填满了，手没有抖。人到了不抖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最坏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她从便签盒里抽出最后一张黄色的，写了一行字，贴上去：

“沈嘉木，1994—2025。”

贴完她退后两步，看了一会儿。白板上什么都有了，她反而不知道该先看哪里。然后她拿起板擦，从上往下，一格一格地擦。结构图没了，时间轴没

了，红蓝两色的批注没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夜，一块板擦就干净了。板擦上落满彩色的灰。

擦到左下角，板擦停住——那里是哥哥的字，两年前写的，她一直没有动过：

“缺一个人。”

她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把板擦放下，又拿起来，把“缺一个人”三个字擦掉，咬开笔帽，在原处写了两个字：

“齐了。”

写完把笔帽扣回去，咔哒一声，像什么东西落了地。

她把板擦拿到水池里洗净，搭回白板槽上。水从蓝的冲成灰的，再冲成清的。水池上方那面小镜子里，她看见自己眼底两团青黑，像两块没擦干净的批注。

· · ·

七点半，她把一段视频传上了网盘。

是齐伯的采访原片，今年秋天在养老院拍的，一个半小时，没有剪过。老人九十二岁了，说话慢，手抖，剪了一辈子纸的那双手，托着那本样册，一页一页翻给镜头看。翻到暗层的时候，老人停了很久，只说了一句：纸是薄的，事是厚的。后来老人靠着椅子睡着了，摄影机没有关，又拍了十七分钟窗外的梧桐。

梧桐叶落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子在风里慢慢晃。老人睡着了，风没有睡。她剪这段素材的时候看了三遍，三遍都想掐掉，三遍都没掐。

第三遍看完，她在素材库里给这一段起了个名字，就叫：停手。后来她懂了：老人一辈子的手艺，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停手。

齐伯是哥哥生前最后一期视频的受访者。视频发出那天，老人让孙女打来电话，只说了三个字：拍得稳。就这三个字，哥哥高兴了好几天。如今拍的人

和被拍的人，隔着一座白板，都在她的屋檐下。

上传进度条走完，她在分享设置里把解锁日期填到二十年后，备注栏里写了五个字：

“给未来的警察。”

然后她从床底拖出哥哥的航拍箱。密码锁是哥哥的生日，她试了两次没对，第三次试的是自己的，开了。

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机器，备用电池，遥控器的说明书，还有半包哥哥没吃完的薄荷糖。她倒出来两粒含了一粒，其余的原样放回去。糖是凉的，放了很多天了。

薄荷味在嘴里慢慢散开，凉丝丝的。她含着糖核对说明书，忽然想起小时候哥哥把糖让给她的样子，鼻子一酸，赶紧仰头看天——说好了今天不哭的。

眼泪逼回去之后，眼睛反而亮了。她想起哥哥教她开机器时说过，无人机拍不到天亮，电池只够拍到天亮前。今天拍到了。哥，拍到天亮了。

· · ·

天台上的风还带着夜里的凉。她按哥哥教过的顺序开机、自检、校准，每一步都对着他留下的手写卡片核对。桨叶转起来的时候，她蹲在地上，膝盖发软，扶住了栏杆。

机器升上去了。嗡嗡的声音在清晨显得特别响，几只麻雀从水塔后面炸出来，骂了一阵，又落回去。

云台稳稳地转，视野从大道移向湖面。她忽然想起哥哥说过，拍东西不要急着拍主角，先拍主角的四周——四周拍清楚了，主角是谁就不言自明。

镜头掠过湖面的时候，她把高度降了两米。水面上还漂着几盏没有收回的浮灯，东一盏，西一盏，像谁撒了一把没打完的牌。她拍了十秒，停住。牌局散了，灯还亮着——这十秒，她想留给二十年后的人。

镜头摇起来：晨光从东边过来，先照亮陆羽大道，把早点摊的白汽照成金的；再爬上茶经楼的九层檐口，檐角的铃铛一动不动。楼是青灰色的，湖在楼西，平得像一块没有磨开的镜。南广场空着，红毯还铺在那儿，毯面上一夜的露水，白花花一片，像落了一层没有化开的霜。

霜字她在心里写了一遍，又觉得不像。霜是死的，这层白是活的——是昨夜几百双脚和一整场灯火，一起呵出来的一口气，到早上还没有散完。嘉木堂门口有几条人影在钉木板，叮，叮，叮，声音顺着光传上来。

她把镜头在红毯上停了很久。哥哥的云台稳得像一只手替她端着。

小凡盯着监视器，手指按在遥控器上，很轻地说了一句。天台上没有别人，她还是说了：

“哥，白天来了。他们的夜，过完了。”

八点五十分，她下到屋里，坐进哥哥的转椅，点开终章下面最新的一条评论。有人问：所以，到底还有没有隐情？

她用公众号的账号回复，只有一句：

“真相不在评论区，在二十年后。”

发送。她把回复置了顶，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转椅扶手上，像给这一天盖了一个章。然后她按了返航键。楼顶上，嗡嗡声由远及近，机器稳稳落在檐口边上，桨叶慢慢停了，像一只终于肯落下来的鸟。

◆

十一月十八日，深夜，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三楼，走廊尽头的灯管坏了一半。

竺长生坐在他坐了三十年的那张旧木椅上。椅子是一九九八年大队置办的，扶手磨出了包浆。桌上的茶早就空了，杯底一圈褐色的印。对面几间办公

室都黑着，整层楼只剩他这一盏，还有值班室一点细细的键盘声，隔着走廊传过来。

桌面上摊着白天移交的清单，最后一页还没有填完。三十三年，他经手过的大小案件九百余起，立卷的，并案的，悬着的，都在那间档案室里。只有这一件，他跟了半辈子，比任何一件都近，也比任何一件都远。

抽屉里有一盒图钉，一沓白纸。老习惯，结案前他会把关键的时间地点写在纸上，钉在墙上，站远一点看。今晚他连纸都没有铺开，墙上干干净净，一颗图钉都不缺。

从前不是这样的。从前的墙钉满红线和小卡，秀珍进屋吓一跳，说像蜘蛛的洞。后来红线一根一根取了下来，不是案子结了，是他学会了把线收进脑子里走。

墙上的挂钟走到二十三时五十九分。

这一天还剩最后一分钟。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夜里，他在望湖仓外拉起第一道警戒线，那时他比现在年轻二十岁，头发是硬的。法律规定追诉时效二十年。二十年来，他每一年的台历上都有这一天，圈了一年又一年，圈成了一个墨点。

台历是前年印的，秀珍从单位领回来的。今年这一页她替他圈过一次——老太太的病让她记不清日子，却记得住这一天。每年到了这天，她都把台历翻好，圈好，再去睡觉。今早他出门前，把家里那本台历上这一页撕了下来，折好，带在了身上。

挂钟走完最后一格。

零点到了。没有哨声，没有钟声，连走廊里都没有脚步声。时间自己走完的，没有哨声。

值班室的键盘声停了一下，又响起来。楼下大院的路灯把梧桐的影子印在窗玻璃上，风一过，影子碎了，又合上。他在这一分钟里坐得笔直，像在等一

道检阅的口令。口令没有来，来的只是钟摆。

他想起了很多人。曹局的拐杖，秀珍的台历，小江在电话里那句爸你少熬夜，王春发那双鞋。人这一辈子办不完的案子，最后都变成了这几样东西：一根拐杖，一页台历，一句叮嘱，一双鞋。

想到鞋，他想起白天檐廊上那件棉大衣。大衣随遗物一起登了记，领口的商标没有剪。没有商标的衣服，走的时候带不上牌子，也带不上名字。

他把兜里那页台历掏出来，揉成一团，又展开，抚平，夹进笔记本。

零点过二分，值班民警送来一份文书，签收单上要按手印。

按手印的时候，他的手指在印泥上按得很实。三十年里他让无数人按过这个印，轮到自己，才知道这个印有多小，又有多重。

文书的抬头是撤销案件决定书，正文他不用看也背得出：因犯罪嫌疑人死亡，依法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落款的日期，仍是十一月十八日。

年轻民警把文书放下，站了一会儿，像是想说什么，没说，敬了个礼走了。

文书很薄，三页纸。他办过的案子里，最厚的一本卷宗四百多页，压手。这三页薄的，他捧着走那几步，比四百页还沉。

他签了字，把文书放进脚边的卷宗箱。

箱子是下午从家里米面柜夹层里取出来的。三十年的私人卷宗，他今天一件一件交割清楚：剪影照片给了蒋阔，走访记录复印存档，样册暗层的翻拍原样封存，连那只磕掉一块瓷的红双喜搪瓷缸，也按程序登了记。

登记表上“来源”一栏，他写的是：走访收集。年轻民警问要不要写得更细，他说不用，往后有人翻到，自然会去查。查的人会看见一只缸，看见一段走访记录，看见一个查了三年没有名字的孩子。名字昨天有了，可惜晚了二十年。

年轻民警走后，他把登记表的复联看了一遍。表上的字迹是自己的，一笔一划，很稳。三十年前他填第一张走访记录的时候，师父教他：字要稳，稳字底下压着一个正。他一直没敢忘。

复联的背面是空白的。他把表翻过来，就着台灯看了很久那张白纸。有的案子的结尾是一片白。他这辈子头一回觉得，白也是一种交代。

他把白纸折起来，夹回登记表里，没有扔。

现在箱底只剩一层空空的纸味。这只箱子跟了他半辈子，装过两千多个日夜的疑心，今天头一次显得这么空。

空，不是轻。他提起来的时候胳膊沉了一下，比满的时候还沉。满的箱子压的是手，空的箱子压的是别的地方。

箱子里排过很多次队：谁在什么时候该压着谁，他心里有一张图。今晚这张图作废了。他把笔记本放在文书上面，想了想，又把文书抽出来，放在笔记本上面。次序这东西他讲究了一辈子，最后这一下，他让文书占了先。

他从帆布包里取出那张“手电筒”剪纸——去年雪夜里拾的那张，一个人把手电筒递给另一个人。纸角已经软了。他把它夹进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压实，合上。

屋子空空的，灯管在头顶嗡了一声。

“收工。”

他对着空屋子说。声音不大，落在墙上有一点回音，像当年收队时喊的那一嗓子，又轻得多。

收工这两个字，他练过很多遍，想得很隆重，念出来却只有这么轻。他站在空屋子当中，听了一会儿自己的回音，把灯关了。

他提起箱子，夹着笔记本下了楼。门房的保安在打盹，他没有惊动。值班室的年轻人抬头看见他，站起来喊了一声竖队，他摆摆手，示意人坐下。

年轻人要说的话都写在脸上：师父，您受累了。他摆摆手，把这句话摆了回去。有些话今晚不能说，一说就要说出一夜来。

经过门房的时候，打盹的保安醒了，隔着玻璃朝他举了举茶缸。他回举了一下。走了三十年，这条从大队部到家的小路，他头一回走得这么慢。

外面的冷是干净的冷。泛光灯全关了，景区方向黑沉沉的，茶经楼恢复成夜里一座普通的楼，九层窗格，只有零星两扇亮着灯。湖看不见了，只闻得到水汽，还有桂花残过之后最后一缕似有似无的甜。

路面上的白线在夜里发着微光。他走得不快，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揣着笔记本，步子还是当年的步子。三步一岗，两步一哨，是他自己在给自己站最后一班岗。

风从街口过来，带着湖水的凉。一年里的这一天，湖总是最凉。凉有凉的好处，凉让人清醒，清醒的人才能把最后一行字写好。

他竖起衣领，从大队部往家走。路过南广场的时候，他在嘉木堂门口停了一步。

门口的射灯灭了。两个人踩着脚手架在拆门头，铜字一个一个往下卸，泡沫箱摆在脚边，已经装了四个字。工人看见他站着看，搭了一句：老板让连夜弄，明早拆完。

他点点头，没有问那位老板是谁。

铜字卸下来的时候发出闷闷的一声。两个工人里年轻的那个忽然直起腰，朝楼顶望了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去干活。谁都知道这里今夜发生过什么，谁都不说。这座城就是这样，把事情咽下去，把日子过上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楼顶。九层檐廊黑着，铃铛不响了，风大概也歇了。二十年前他站在仓顶下问天问地，如今他知道，天不答话，天只亮，或者只黑。

楼下有一扇窗亮着，是蒋阔的办公室。灯影里那个人坐得很直。隔着两层玻璃，谁也没有朝谁挥手。有些告别不需要挥手，各自把灯坐完，就是礼数。

门头空出来的地方露出水泥的底色，比方才亮堂，也比方才冷清。红毯还铺在台阶下，被夜露洇得发黑，踩上去没有声音。二十年前，望湖仓的警戒线，就拉在这块水泥地的位置。当年那道线的四个角，他都用量步的方式量过。今晚这块地安安静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又像什么都被还清了。

他在警戒线原来那个角上站了一小会儿。二十年前这里堆着受潮的茶饼、麻绳，和一只烧塌了半边的炉子。现在这里是崭新的水泥，崭新的门头。明天这里会有新的招牌，新的生意，新的不长记性的人。

人不长记性，纸长。他拍了拍怀里的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二十年的纸。往后这本子不进档案室，跟那只箱子一起放回米面柜的夹层，让日子把它捂旧，捂到没有脾气为止。

他退到路灯底下，打开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片提灯笼的剪纸压着纸角，去年那张手电筒夹在页底，台历上撕下来的十一月十八日叠成小方块，躺在页缝里。

笔尖悬在纸上。按他起草文书的习惯，结案陈词要把事实、证据、结论三段写全，先把桩桩件件列清楚，再落最后一句。今夜他只想要一句。二十年的账，一万字写不完，一个字也许就够了。

结案陈词四个字，他先写了上去，笔停了很久很久——三十年里，他给几百桩案子写过结案陈词，没有一桩像今晚这样难落笔。

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笔记本上，笔一动，影子跟着动。他想起白天那道檐廊，想起那句冷不冷，想起那句白天也是亮的。有些话不是答案，是镜子。他此刻要写的这一行，也要当一面镜子用。

最后，他只写了一行：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尾声　明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清明。天门落了半夜的雨，天亮时收住，街面湿而发亮。竺长生六十八岁，醒得比雨停更早。他轻手轻脚起身，把老伴儿床头的水换成温的，药按顿分好，又替秀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让天光先进去。

他先绕到陆羽故园，在那口老井里提了半桶水。山水远，江水也远，井水是将就里顶好的水。看井的老头认得他，说照老话，清明的水要带一壶回去。他笑了笑，说老话有理。半桶水提着一路晃，到院里正好温吞。提水时看见墙根下一丛老茶树，头茬新叶正嫩，他看了看，没有掐。

儿子小江从武汉捎回一罐明前茶，昨夜他用棉花衬好，连同茶具包进蓝布包袱。包袱皮四角打结，是秀珍当年教的打法。包袱不沉。有些东西就是这样，越重的心事，拿在手上越轻。

西湖路早市正在收摊，锅盔炉子的火还红着，头一张出炉的锅盔，照例给巷口晒太阳的老头留着。有人踩着凳子，把门头上的旧柳摘下来，换上新柳。人家门楣上新插的柳条湿着，纸钱的灰叫夜雨压得服服帖帖。卖糖塑的老汉闲着，随手吹了个糖人举在杆头，没有人买，他也照吹不误。竺长生看了一眼，没有停步。

样册是三个月前退回来的。案子结了，东西退回原主；原主坐在养老院的窗前剪纸，他便替原主跑这一趟腿。市档案馆他前后跑了三回：头一回，人家问他有没有单位介绍；第二回，问他要不要先做张年代鉴定；第三回他学乖了，把退休证先递过去，人家才收下。登记表上，"品名"一栏写：民间剪纸样册（带暗层）。"类别"一栏，经办的小姑娘想了想，落笔四个字：非遗实物。

"捐赠人"一栏，他写：齐守拙。

″来源″一栏，小姑娘抬头问怎么填。他捏着笔，想了想，写下四个字：两个学生。

小姑娘说：″这个来处写得新鲜。″

他说：″是个顶正经的来处。″

她又问，暗层是什么。他说，夹层。姑娘笑了，说老手艺真讲究。

起纸那天他在场，一张一张过手，姑娘的白手套换了两副。有几张跟底纸粘得死，姑娘说揭不动了。他说：″那就让它连着。″原样入盒，原样入柜。二十年的话，从此排上架子第七层，牛皮纸盒外贴一张标签：待研究。姑娘戴着白手套翻到其中一页，说这条鱼剪得活。他说是，剪的人手稳。她把摊开的纸一样一样登记，念一样，写一样：童子奉茶，楼，灯，渡船，一把伞，一只猫。念到后头几张，她放慢了，像怕念错。他在旁边坐着，听见自己说：″照原样写。″

有人劝过他，这样的东西不如拍卖，或者自己收着。他说，纸的东西归公家，恒温恒湿，搁得住。馆里给样册的编号，头一个字是″竟″。说明词也拟好了，头一句是″旧时学童习剪之底样册″，落款没有写他，也没有写别人，只写了年份。他听着，说好。

全部捐了，他一张没留。办完手续，馆里开了收执，说清明过后给样册做个小展柜。他说：″好，光别太强。″收执他折成小方块，回家放进米面柜的夹层。夹层空了一个冬天，如今存着两罐茶。

案卷封存那天，蒋阔请他在局子对面吃了碗粉，师徒两个谁也没提案子。粉来了，两个人低着头吃了半天，谁也没抬头，吃完，连汤都喝干了。临分手，蒋阔站直了，敬了个礼：″师父，结了。″

他说：″结了。″

回去的路上，他在湖边站了一会儿。对岸的新楼盘打完了地基，围挡上画着大幅彩绘，陆羽蹲在炉边问茶。

· · ·

养老院在城北，公交七站。清明放假，车上人多，提篮的，捧花的，有人抱一叠纸钱。竺长生把包袱抱在怀里，像抱一件怕碰的东西。车过陆羽大道，梧桐新叶刚齐。院里玉兰开过了，落瓣扫成一小堆，还没运走。保洁工扫得很慢，扫帚过处，香气反倒重了，只是白得发旧。

门房老远给他开门，说今天来探视的，他是头一个。楼下花园里，几个老人围着石桌下象棋，观棋的比下棋的多。

三楼临窗的位子上，齐伯坐着。窗玻璃上有层薄灰，日头一照，像蒙了雾。九十三岁的人，腰背塌下去了，一双手还稳。面前一张旧方桌，红纸黄纸裁成小叠，桌角一枚顶针，一把小剪，还有一碗清水——剪坏的碎纸不乱丢，都投在水碗里，纸色慢慢沉下去，像一场极小的雨。他剪一张，举起来对着窗光看一眼，搁到左手边，再剪一张，全是同一幅：两个伢，一棵树。伢剪得极小，树剪得极大，枝枝杈杈占满一张纸。一张，又一张，像在给一棵树数叶子。剪坏的，他捏在指头里搓成小团，塞进围裙口袋，不肯叫人看见。

剪口全从左边走。跟他看了二十年的那些，一个样。

护工小陈端着水盆过来，先把盆搁在墙根，给窗台的橘子皮喷了点水，说：〞老爷子天不亮就要求坐到这儿，劝不住，早饭都得端到桌边。夜里也剪，枕头底下掏出过多少纸团，攒了满满一个罐头瓶。〞左手边那一摞，今早已搁下九张。小陈又问他，是齐老师的什么人。

他说：〞学生。〞

竺长生在老人对面坐下，没有出声，先摆茶具。茶具是家里那套旧白瓷，壶嘴上有道细磕，磕了十几年了。包袱里多带了一包茶，他顺手搁在窗台，留给值班室，谁值班谁喝。案子的事，他一个字不提。老人手上这点明白，干净，不掺这些。

样册里那些话，他去年冬天在台灯底下一页一页读过。有几页他翻回去看过许多遍，哪一页夹过什么，闭着眼也数得出。读过的人，全城如今只剩他一

个。有些话压了二十年，如今压进恒温柜，比压在他这里稳当。

烫盏，投茶，注水。水在壶里静了静，等那点滚头过去。头道洗茶，水线一提，香气就起来了。齐伯的剪刀停住，鼻翼动了动。第二道出汤，汤色浅金。竺长生把盏放到老人手边。

齐伯放下剪刀，双手捧起来，喝了一口。他闭着眼，忽然抬起头，眼睛亮了，像换了一双。

"今年的茶，明前的？"

"明前的。"竺长生说，"您教他们的手法，我照着泡的。水，是老井的水。"

齐伯笑了，眼角的纹里存着水光。

"那就有底子了。"

这三秒里，老人的眼神是个先生的眼神，点过名，收过作业，把两个孩子的手艺都摸过底。说完，那点光退下去，像退潮。老人重新低下头，剪刀沙沙地响，像春蚕，像细雨，像很多年前文化宫里满教室的那种响，把方才那三秒钟，从上午里裁了出去。他把那三秒在心里又存了一遍，存得深深的。

竺长生把自己那盏也喝了。凉了一半，他续上热水，陪着坐。窗台上一簸箕橘子皮，晒得半干，是护工替老爷子攒的。走廊里飘着炖梨的甜气，活动室的电视咿咿呀呀放着戏，两个老头为一句唱词拌嘴，声音很大，谁也不让谁。

坐到晌午，竺长生收拾茶具，把桌上的碎纸拢了拢。齐伯没抬头，剪刀没停。忽然，他从纸叠里抽出一张，探过身，塞进竺长生手里，随即低头接着剪，像没有这件事。

一个老人，一盏茶。老人坐着，茶烟笔直一线。

和他从前收过的那一张，一模一样。

走廊里的光很淡。竺长生把那张纸夹进棉袄内袋，贴着心口那一侧。先生手上的记性散了，暗层里的记性还在——原来先生的暗层里，也留着他这个名

字。

◆

二〇二六年三月末，清明前十来天。城还是这座城，只是快了。快递当天到，早点摊出摊更早，连麻将都打得急了些。高铁一通，什么都快，茶还是慢的，蓝溪替它守着。

天门站是去年年底通的车，站前广场的树苗还没缓过劲，砖缝里先拱出草来。出站大屏上滚着车次，去汉口四十来分钟。出租车排成行，司机举着小牌：茶经楼，陆羽故园。有旅客拖着行李箱问，看茶圣的地方远不远。司机说：″一脚油的事。″有人问茶城怎么走，司机们互相让生意：″新人，你带。″

蓝溪二十八岁，接店快半年。店在南广场西侧，还是原来那间门面，门头的字是腊月里换的：溪语茶事。换字那天，工人问旧匾怎么处置，她说：″烧了吧。″″嘉木堂″三个字从墙上卸下来，金漆在冬天稀薄的日头里晃了一晃，进了灶膛。对面糖画摊的老师傅看热闹，说新字好看，念着顺口。转盘上的生肖换了新的，糖稀熬得金黄。三个字是她自己挑的字体，圆圆的，不锋利。导览图重印，路牌换新，导航里的点位也改了名。城里把那两个字，擦得很干净。

店是腊月里盘给她的，价钱低得不像话，过户那天，没有一个人来。改名的事，她没有同谁商量。换字那天下着雪子，她在空了门框的店前站了一会儿。

每天早上，她卸下半边门板，烧水，擦一遍玻璃，把柜台上一排茶罐的盖子逐一松一松。做这些的时候不响，像老店原来的人做过的那样。

柜台是旧柜台。玻璃板底下压着些纸：价目表，进货单，名片。当中一张剪纸，剪着一个男孩，男孩双手举着一盏灯。这张纸的来处，她没有对人讲过。擦柜台的时候，她把它挪开，玻璃擦净，再原样压回去，边角对得整整齐齐。她想过哪天翻修柜台，把这张纸取出来裱一裱。想了好几回，柜台一直没翻修。

抽屉里还压着老店规，三条，纸黄了。她拿出来看过一回，又放回去。新店规她一直没写。写出来，就少了。仓库里最后一批贴着旧标的茶，她腊月里封了箱，没有卖，也没有拆。茶单倒重新印过，头一页只有一行字：本店茶，皆当年新茶。

· · ·

这天她一早吃了碗鳝鱼臊子的粉，沿西湖路走一圈。摊主照旧多给一勺辣子，说姑娘家的气色要靠这一口。接店以后落下的习惯，名义上进货，其实是看城。清明前十来天，家家门楣上的柳条还绿着，糕点铺子把蒸米团子的笼屉摆到了门口。

云香居的麻将声响过一条街。郑胖婶坐在门口择豆角，手边照旧一缸子酽茶，说是提神，其实是占手。见她过去，扬声招呼：″清明前后客多，桌子都约不赢——″说完自己先笑。她的桌子，从来没满过。屋里有人胡了一把大的，推牌哗啦一响，像谁家提前过了年。抱怨的那个说着说着掏出手机看孙子，自己又笑了。桌上缺的那个角，照旧空着，没人提，也没人坐。

再往前是老年大学。窗根下停一排老年代步车。玻璃窗里，毛慧芳举着一张样纸给底下看，黑板上两行粉笔字：第一课，奉茶。十几双老手跟着剪，纸屑落了满桌，红的白的，一场很慢的雪。有个老太太剪坏了要重剪，她摆摆手：″纸还长。″放学的时候，接孙子的、买菜的从门里涌出来，人手一张不成样的红纸。

王胖的肉铺挂了新招牌：文霞鲜行。红底黄字，广告店里最普通的那种字体。铺面里没有人，电子秤隔一阵自己报一次价，门口的排水沟冲得干干净净，肉案刷得发白。招牌是他半夜自己挂上去的，街坊说，没有人问过他为什么。有个主顾问，文霞是谁。他想了想，说：″家里人。″傍晚收摊，他会拿块布把招牌擦一遍，擦得很慢。

景区门口多了个卖剪纸纪念品的小摊，机器刻的，一张一张压在塑料套里：楼，桥，茶壶，童子。摊主是个后生，守着扫码的小音箱打瞌睡。

研学团一拨一拨从景区出来，小何举着小旗，嗓子哑了，还在一件一件地答。孩子们把"问茶"的小旗传着扛，谁也不肯撒手。有孩子问顶楼让不让上，小何说让，风景要自己爬。队尾的老师说，孩子们回去要写作文，题目就叫"问茶"。有个小黄帽跑进店里买茶点心，仰头问，招牌上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她说："溪水的溪，说话的语。"孩子说："听着像有人在水里讲话。"她笑了，说："差不多。"孩子举着点心跑了，跑两步又回头喊，说水里的讲话他也想听。

有老客来问，从前那种茶还有没有。她说："没有了。"老客叹口气，说那茶确实好。她给老客包了二两新毛尖，没有收钱。老客临出门回头问："明年还有没有？"她说："明年有今年的。"

有生客夸她泡茶的手势稳，问跟谁学的。她说："跟店学的。"熟客又说，如今比从前泡得还好。她说："不能好过从前。"

回程沿湖走。柳条拂着水，游船试新水，船工一篙点开岸。茶经楼在水里立着，倒影比楼身干净。

· · ·

回到店里，她在柜台后头坐了会儿。小凡的那个账号，停更在去年冬天。最后一条是定时发送，标题五个字：《二十年的灯》。评论还在一条接一条地涨，像一排没有烧尽的蜡烛。头像换成了灰色，再没动过。有条评论问：灯还亮着吗。没有人答。底下常有人问更新，一条一条，都没有回音。最新的一条只有四个字：等下一篇。她给那条点过一回赞，点完又取消了。

明信片是前两天到的。薄薄一张，邮票是最普通的那一种，邮戳糊了，像隔着许多年盖下来的。正面印着昆明的茶山，绿得发暗，一垄一垄下去，像谁把水波种上了山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背面只有四个字：

茶，第三泡。

她把它先立在价目表旁边，立了半天，才想起来它不该给客人看。拉开玻璃板，压进去，挨着那个举灯的男孩。她本想回一张，提起笔，半天，只画了一盏茶，没有画人。也没有寄。邮戳那个地名，她没有去查。查了，账就记复杂了。她算了算，从昆明到这儿，慢车也要一天一夜。这张纸走了几天，没人知道。信封她也收进了抽屉，邮票角上有个很小的折痕。

有些账，两个人记，就够了。

年前有熟客说，在上海的茶城见过一个像唐穗的女人，坐着泡茶，手腕稳得吓人；开春又有人说，在武夷山也见过一回。说的人多了，说法各不一样，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人泡茶，从头到尾不说话。也有人说，早就不做茶了。做不做，茶知道。蓝溪给客人续水，不接话。熟客的话像茶叶，浮一浮，自己会沉。

打烊前，日头斜进店堂，把货架照成一格一格。最后一单是小何，包了二两新茶，说明天还有一团，嗓子还得哑几天。她把"营业中"的木牌翻了个面，门口的风铃响了一声，是风。研学团的旗收了，最后一辆车开走，广场空得能听见湖水。广场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是去年那种白得逼人的光，是寻常路灯，照得见人走路，就够。

有个戴帽子的游客在门外站了几秒钟，帽檐压得很低，人清瘦，衣领整齐，就那么对着招牌站着，站的位置正对着店里茶台这一侧。她低头的工夫，帽檐那一点影子从玻璃上滑过去。

蓝溪正给客人出第三道汤，抬头想招呼一声。再抬眼，人已经走远了。

玻璃板底下，男孩举着灯。

◆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清明，午后。风从西湖上过来，带着水汽和新叶的青气。上午的雨把人关在家里，午后放晴，出来的人脚步都轻。雨后的湖面平得像还没醒，风一来，才想起自己是水。竺长生上午从养老院回来，睡了个短

觉。秀珍在院里晒太阳，护工陪着剥豆子。他出门时，老伴儿抬起头，很清楚地喊了他一声：长生，早点回。

他说：〞好。〞

这一声，比药还顶用。护工追出来交代，说老太太今天午觉睡得长，让他放心。出门前，秀珍往他兜里塞了两颗水果糖，橘子味的，他小时候也吃这个牌子。

小江来电话，问清明回不回武汉吃饭。他说不去了，湖边有事。小江问，茶喝了没。他说：〞开了。给齐伯泡的，自己也留了一罐。〞那头静了一静，说：〞好。〞

他在陆羽公园东岸寻了张石桌。这张位子是他挑惯的，背后一株老柳，面前正对茶经楼。下午的光把石桌面照得温温的。摆开随身的茶具，茶则、茶巾，一样一样来，摆得不快——慢，是这套动作里最要紧的。最后从布袋里请出一个扁铁罐。罐身的字磨得快平了：嘉木茶事。

二〇二三年，唐穗托人送来的明前茶，附一张卡片，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卡片他没舍得扔，夹在家里那部《茶经》里，正夹在第一章。有一年他抽出来看过，看完又夹回去，位置都没挪。这一罐他收了三年，没舍得开。今天，舍得开了。

罐盖撬开，干茶紧结，白毫隐隐。明前的叶子嫩，经不起大滚，水是家里灌的，在保温壶里闷了半路，他倒进公道杯里晾着，看它平下来，像等一个急脾气的人缓过气。烫盏，投茶，注水，头道洗了，二道出汤，汤色杏黄，香气不急不猛。头两泡他喝得慢。出第一道汤的时候，他多取一只盏，斟了小半盏，搁在石桌另一头的空位上，盏口对着湖。

他喝了一口，闭上眼。又喝一口。第三泡上，喉咙里回上来一点甜，不张扬，是往后退着甜的那种。

苦的咽了，甜的也咽了。

啜苦咽甘，茶也。书上的这句话，他到这个岁数，才算真正认得。书上还有一句，茶性俭，不宜广。他的壶小，正好。

明前的茶，赶在清明前头离了树。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有两个孩子，一个生在二月，一个生在六月，都长在了节气外头。这罐茶搁了三年还立得住，是茶的本事，也是存茶人的手艺，他认得这手艺。他把这一点念头，就着茶咽了下去。

这片水，他打了二十多年交道。捞过人，找过一只鞋。如今它只管映楼、映云，映今天这些活人，不管旧事。游船码头刚收了早班的船，保洁船跟在后头捞柳叶。水鸟贴着水面掠过去，翅膀尖挑起一道亮。岸边泊着两条小划子，缆绳松松地系在桩上。骑行的孩子摇着铃，从身后过去又拐弯。石桌往东几步，有人蹲着烧纸，火苗压得很低，烧完，拿树枝拨一拨，鞠了个躬走了。火星子灭了，青烟贴着地皮散。他坐着没动，替那家看着火。

何采采背着相机寻过来，老远就喊人，头发剪短了，从包里抽出一份提纲，纸边卷了毛。头一页印着候选书名，头一个就是《茶经楼下》。他看了一眼，把纸推了回去。提纲里夹着几张打印的旧照片，他一张一张看过去，看得很慢，看完，合上，还给她，一个字没说。采采也没问。

"竺老师，出版社的意思，二十年的案子，您是最完整的见证人。写下来，值。"

"案子结了。"竺长生给她倒了一盏茶，"书莫写了。写了，就又把他们拉回灯光底下。"

"总得有人记得。"

"记得，不等于摆出来给人看。"

采采说："您就不怕烂在心里？"

"烂不了。茶渍泡过的东西，结实。"

采采说："您家就是固执。"

″我是刑警，不是判官。″他说，″判官的笔，在人心里。″

采采不劝了。她换了个话头，说今年庙会上有人卖剪纸，剪的是双童奉茶，孩子们买去当书签，卖得很好。还有较真的人考据那图案的来历，说得有鼻子有眼，只是没说对。他搅了搅茶。

″纸厚，″他说，″经用。没说对，就好。″

采采又说，听说档案馆收了齐老爷子的样册，开春要展。他说：″展的是非遗。″采采说：″那也是他们活过的法子。″他没接话，给她续了茶。

采采把相机搁在石桌一角，先看茶，说闻着是明前。他说：″鼻子灵。″她笑：″吃这碗饭的。″末了她看了一眼石桌另一头那盏茶：″等谁？″他说：″等茶凉。″采采点点头，没再问。她又问：″那您说，结尾该怎么写？″他想了想：″没有结尾。茶喝完了，人洗杯。第二天，接着喝。″

采采把这句记在本子上，说这个给他留着。然后她举起相机，拍了一张湖，又拍了拍那只旧铁罐，没有拍他。临走她退到柳树那边，回头举起相机，拍了他一个背影。这一次，他没有拦。她说，那她用自己的法子记。他没有问是什么法子。柳树那边安静下来，只剩水声。

高架那边，一列高铁无声地滑过去，像水面上拉过一道白痕。白痕散尽，湖面还是湖面。卖茶水和风筝的小车推走了，保安过来换班，冲他点点头，交接的本子上记了两行字，字很大。楼里十章的展陈照常开，讲解词他听过一回，同他知道的不一样，也不能算错。那只跟了他二十年的帆布箱，上个月腾空了，如今装着秀珍的毛线团，红的灰的，挤挤挨挨。

茶经楼前的广场上，研学的场子散了，地接导游在收小旗。楼门前铜牌上铸着《茶经》的头一句，日头照着，字缝发亮。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沿台阶一路小跑，大声背书：″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上午，楼前都是这一句的回声。背到这里她卡了壳，急得直跺脚。

年轻的母亲牵着她，随口问：″嘉木是什么意思？″

小女孩想了想，说：″就是很好的树。″

母亲笑了，说是，就是很好的树。娘儿俩从楼门前过去，母亲替她理了理书包带子。进楼前，小女孩回头朝她妈喊了一声什么，脆生生的，惊起两只水鸟。

竺长生端着茶盏，坐在原处。风把那两句话送过来，又送走了。嘉木两个字，往后就归《茶经》了。他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没有出声。杯子里的热气慢慢直了，像一炷短香。

日头偏西。茶经楼站在白天的光里，九层，不高不矮，同货栈、居民楼、售楼处的灯箱挤在同一条天际线上，平凡无奇。售楼处的灯箱坏了一角，闪了两下，不闪了。楼身上那一圈泛光灯，去年冬天检修过后，就没有再亮过，管理处的窗上贴过一张条子，两个字：待议。

灯，交还给白天了。到了夜里，楼就交给月亮。

湖风一阵接一阵。楼影折进水底，随波纹一寸一寸碎开，又一寸一寸合拢。一只水鸟落进影子里，影子碎了又合。对岸新起的一片楼，脚手架拆了一半，灯火一户一户地亮，照着寻常的晚饭时辰，有炒菜的味道隔着水飘过来。

他把桌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收进布袋，茶具留到最后。壶里的热水正好剩一泡的量，他全倒进了杯里。石桌另一头，那盏茶早就凉透了。他端起来，喝干了。兜里的糖轻轻响了一声。风停了一停，湖上安安静静。

竺长生把杯里的茶喝干，连杯底的叶子也嚼了嚼。他站起身，拍拍裤腿上的光，朝湖对岸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